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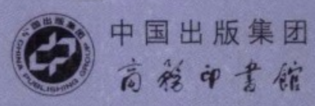
下卷

法国史

[法] 乔治·杜比 主编　吕一民 沈坚 黄艳红 等译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 à · nos jou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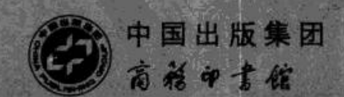
Histoire de la France :
des origines · à · nos jours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法国史

[法] 乔治·杜比 主编
吕一民 沈坚 黄艳红 沈衡 顾杭 杨庭芳 田军 译

Histoire de la France : des origines · à · nos jours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sous la direction de Georges DUBY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史/(法)杜比著;吕一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100-06904-5

Ⅰ.①法… Ⅱ.①杜… ②吕… Ⅲ.①法国-历史 Ⅳ.①K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6571号

责任编辑 郭 可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65258899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32 1/2
字 数 1800千字
印 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8元



目录 Contents

第十九章　大革命

第二十章 帝 国

第二十一章 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国

第二十二章 第二共和国

第三部分　新的时代：从1852年到当今

第二十三章　一种新文明的演进

第二十四章　第二帝国

第二十五章　第三共和国

第二十六章　知识传播和文化变革

第二十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章　史前时代

第三章　罗马征服前的高卢

第四章 罗马高卢人

第五章 蛮族大迁徙

第六章 墨洛温王朝时代

第七章 加洛林王朝的建树

第八章 最后的入侵

第九章 封建主时代

第十章 12世纪的飞跃

第十一章 卡佩王朝的整合

第十二章 伟大的王国

第二部分　王朝与革命：从1348—1852年

第十三章　苦难时代

第十四章　重　建



第三十章　战后法国经济社会史

1945年至1980年间生产力的飞跃，
对危机的担忧，新社会的矛盾

19世纪初以来，法国的经济经历了若干快速增长期：1850—1870年，1896—1913年，1920—1929年，1946—1970年。其中，最后一个时期的增长最为稳定、最为迅猛，尤其是最为持久。这一特征可部分归因于此前累积下来的滞后性。只是因为有19世纪以及20世纪头30来年众多“低谷”的陪衬，最后这个时期才显得突出。如果把我们的成就与其他发达工业国相比，我们的看法得更为低调：法国的业绩只能说勉强达到中等水平。

不过，我们确实需要对这一经济节奏的剧烈变化和增长的动力作出解释。也许可以冒失地提出这样的假设：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冲击，反过来成了许多法国人进行深刻反思的动因，政界、军界、知识界和工会当中都有这样的人士。1918年的停战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在心态上我们是胜利者，但从力量上说，我们是失败者，两次大战之间那些危险的幻觉和致命的奢望就根源于此。相反，1939年“奇异的溃败”和纳粹占领的漫漫黑夜促使我们进行富有创建性的思考，由此便产生了一场特别热烈的思想运动，这些多少具有革命色彩的思想体现在地下抵抗运动中，也反映在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纲领中。在这个全面的

纲领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在解放后变成了事实。不过，这成为了思想变革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开端。虽然 1948—1950 年之后出现过反动，但人们还不敢公开对一些社会成就提出挑战，国有化和指导性计划等经济改革措施也是如此。

872　精神上的振奋看来走在了人口复苏的前面，不过，法国的人口很快也开始重新增长。事实上，人口增长的效应表现得颇为缓慢；当人口浪潮波及政府、生产商等诸方面时，法国经济复兴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已经准备就绪了。应该承认，政治当局、行政机关、公私企业中的一些人士头脑清醒，并具备分析、预见和实现关键点的必要能力。比如，经济结构改革使得国家具备了有效地介入国民经济运作的手段。再如，现代化和装备计划的实施——公共资金的参与具有关键意义——逐步消除了能源、交通和基础工业对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还有，生产率政策也曾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

各社会集团的压力、政治局面的不稳定、以预算赤字或货币政策来为国家的重建和装备提供资金，凡此种种，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加剧，以致国家终于决定尝试自由市场政策。于是，"通胀螺旋"的时代过后迎来了稳定性计划的时期，这一转变开始于 1963 年。但是"彻底抑制通胀"不啻于猝然切断一个过热的锅炉的通风管。实际上，通胀中的增长过后是一个衰退期，其间间或有些刺激举措。1968 年五月风暴之后出台的"宽松放任"货币政策抑制了——但为期甚短——最初的衰退迹象。1973 年年底的石油危机很快就席卷了西方，它终结了强劲增长的时代，标志着危机阶段的开端。在向欧洲共同市场开放之前，法国并不是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战后的国际环境严重制约了法国政策选择的范围。不过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人士很早就表现出远见卓识，他们发起欧洲建设运动，努力降低对外依附的程度。如果说今日欧洲建设的局面并不符合其"发起人"的构想，那可能要归因于顽固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经济的复兴。不过在今天，我国经济社会的演变与欧洲的演变紧密相关。如果最初的欧洲六国不能超越共同市场——即关税同盟、不能进入真正的经济政治共同体阶段，那么，我

们难以料想，法国如何能应对某些科学、文化和政治挑战，如何能长期抵制经济霸权国家的引力。如果法国的历史紧密依附于其他发达国家，即便它们是自己的近邻，似乎仍让我们难以接受。

一、法国经济扩张的背景

873

国际环境

与美国"挂钩"的法国（1945—1951 年）

美国很早就致力于重建被 30 年代的保护主义浪潮和大战破坏的世界市场。但美国人的一个很大的先见之明是，他们懂得，如果不事先巩固某些地区性的、首先是欧洲的国家集团，构建世界市场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们的这种考虑并非完全没有政治方面的盘算。根据 1947 年 6 月 5 日马歇尔将军提出的想法，美国将向欧洲提供大规模援助，这些援助将在几年内分期实行。这一"欧洲复兴计划"在欧洲更以"马歇尔计划"著称，它主要就包括这些援助。

但这一计划的根本新颖之处在于，各受援国应采取协同行动来接受援助。这样，美国人在不放弃重建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希望的同时，也鼓励欧洲国家采取集体行动，以协调各自的重建和装备计划、恢复财政稳定和货币的可兑换性。

总体而言，马歇尔计划有效地支持了欧洲在经济复兴和重建方面的自我努力。及至 1951 年 6 月，法国共获得 20% 的美国援助，约合 20 亿美元，因而它一方面得以支付必须的进口，另一方面又可利用相关款项来支持它的第一个现代化和装备计划。不过，马歇尔计划的根本性成果也许是，它最终引导欧洲国家走上了寻求逐步联合的道路，它们的努力不无成就。

1950 年 7 月到 1952 年 1 月间，国际主要初级产品价格上扬，此间的冷战对法国的打击比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经济衰退的影响还要严重。但尤其重要的是，法国无法也不愿避免的殖民战争使得其政治、经济

和社会困难与日俱增。

非殖民化

几年之中，人们一直认为印度支那的冲突只是一系列维持秩序的军事行动，但当法国在高平（1950年10月3日）和龙山（1950年10月22日）遭受重挫之后，这场冲突发展成一场真正的战争。

当时的历届法国政府都试图向美国人表明，这场冲突是西方反对共产主义的宏大的十字军行动的重要环节。事实上，法国获得的美元军事援助起初是附属于马歇尔计划的，但这一援助后来一直延续到1955年末。从1952年到1955年末，法国获得的经济援助或纯粹的军事援助总计约30亿美元。但是，大笔的美元并不总能平衡对外支出，这或是因为贸易收支和无形交易的形势不利，或是由于殖民地冲突的加剧。

印度支那战争、接踵而来的1955—1956年阿尔及利亚“事态”的恶化以及苏伊士远征，是造成这一时期法国内外交困的基本原因。无疑，殖民战争、特别是阿尔及利亚战争能够刺激某些部门的增长，而且能维持某些行业的企业家们那危险的乐观主义，因为通货膨胀使国内需求出现了病态的扩张局面。但是不应忽视殖民战争对经济造成的一长串消极影响：非生产性的军事开支膨胀；由于军队动员和服役期延长造成的可支配性劳动力的稀缺；因为向国外、特别是向美国采购军事物资的膨胀，对外支出的赤字增加了；法国的部分工业被动员从事军工生产，这就妨碍了它们开拓国外市场——这种市场虽然更难以开拓，但它为时更为长久；因为“苏伊士远征”而带来的外贸体系的混乱，等等。最后，因为对前殖民地的眷恋而在体制上导致的政治局势的动荡，同样是此间一直困扰法国的货币和财政危机的一个因素。

874

重建中的欧洲

不过，这些困难并不妨碍法国有效地参与欧洲的建设。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罗贝尔·舒曼和让·莫内的倡议，人们才得以在最初的

成果之上更进一步，这些成果有：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 E. C. E. ），欧洲支付同盟（U. E. P. ），以及像荷比卢同盟、法意关税同盟这样的地区性的联合。旨在创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舒曼计划”诞生于1951年，它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愿。一方面，它通过建立各国基础工业的联合体、创建一个相互依存、此后难以分离的网络，试图让昨日的对手、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相互接近；另一方面，它试图避免煤钢业中私营卡特尔的重建。但这个联盟还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联盟机构的雏形，后者就是1957年3月25日罗马条约中诞生的“共同市场”和“欧洲原子能机构”（Euratom）。事实上，如果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钢产业领域获得了全面成功的话，那它在煤炭的生产和商品化方面的成就要逊色得多。看来如果不关注其他能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话，要推进煤炭方面的共同政策是不可能的。地区性和过于专门化的联合方式也显示出其局限性。此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观念就开始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尽管有政治方面的不利因素。

戴高乐将军的上台曾一度让法国的伙伴们深感不安。不过，共同市场还是于1959年1月1日生效。此后，“关税同盟”（即逐步取消配额制和共同市场的内部关税）的进展开始加速，其最终的完成比1968年7月1日的最后期限提前了很多。与此同时，共同体六国也率先对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共同贸易政策。

在构建关税同盟、即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市场的同时，各成员国、特别是布鲁塞尔委员会各国也谋求联手解决一系列的棘手问题，这须以更全面、更有效的联合为前提，它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问题如：打击卡特尔和企业之间的恶意协定，男女同工同酬，社会保险开支的协调，税制的协调等。但尤其重要的是农产品共同市场的实施和共同农业政策的制订，这些成果是欧洲经济共同体（C. E. E. ）、更确切地说是欧洲委员会最引人注目的作品。

然而，这些局部性的成就并非总是毫无争议。共同市场的实施大大超前于各成员国之间经济政策方面的协调步伐。一个国家遵循自由主义的逻辑——如人们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任其所为，自由往

来”的政策；而另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则服从于共同的政治意愿，同875 时也会放弃某些国家权限。然而，如果说迄今为止德国一直表示它反对任何徒有虚名的联合计划的话，那么就法国而言，至少从戴高乐时代开始一直不愿放弃任何国家主权，这就几乎不可能“推进六国经济的协同发展”。由于戴高乐将军的后继者们的立场更为灵活，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制度上跨入了新阶段：随着1972年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加入，共同体经历了第一次扩大；1975年设立了拥有专门拨款的各共同体的联合预算；1979年3月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S. M. E.）；1979年5月签署了接纳希腊的条约，这预示着共同体将扩大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后，1979年6月举行了欧洲议会的直接普选。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不断扩大的同时，各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联合却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于是，共同体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风险：它在一个由美国占据无可比拟的领导地位的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将会被弱化。我们下面将看到，这种风险已经在具体问题上显现出来，如在工业政策方面、在能源领域……尤其是在货币方面。另外，英国的特别附加条件，间歇性的“货币紊乱”，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某些英联邦国家的竞争，这些都损害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基础，从而也动摇了整个共同体大厦。

在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与非洲国家和马达加斯加之间那些谨小慎微的合作政策（1964年和1969年的雅温得协定）、以及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更为广泛的合作（1975年的洛美协定）面临无法执行的危险。我们离让·莫内企盼的“欧洲合众国”还很远。

国内背景

经济复苏的力量

战后经济复苏的首要因素是人自身，是他们的创新能力、他们在人口学上的行为取向，以及他们适时推进的结构性改革。

人口的增长

1946年到1978年间，法国的人口从4000万上升到5300万，也就

是说30来年中增加了1300万，这几乎等于1800年到1946年一个半世纪的增长额……这种增长既来自于“自然盈余”（出生数与死亡数之间的差额），这个盈余反映了迄至1974年的人口学行为取向上的变化，同时也来自于“迁徙余额”（移入数字与移出数字之间的差额）——及至1974年，这个差额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此从各方面来看，1974年标志着法国人口演变史上一个明显的断裂。

1946—1974年人口的复苏

从1946年到1960年，法国平均每年新生的人口为81.1万，1960—1974年接近85万。

如果考虑到此前法国人口出生率曾在十分漫长的时期内呈剧烈下降趋势的话，战后法国出生率的复苏就显得更加显著了。事实上，在19世纪最后一段时期内，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但在法国，它开始的时间要早整整半个世纪。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稍有中断外，这一下降趋势一直在持续，再加上新生儿的损失和战争的损失，法国陷于灾难性的境地，它的人口甚至无法维持原有水平。1935年到1945年，人口总出生率下降为1.5%。由于人口死亡率达到了1.6%，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变成了负数：-0.1%。

876

20世纪初以来平均寿命的演变

	1898—1903	*1928—1933*	*1946—1949*	*1966*	*1976*
男子（岁）	45.3	54.3	61.9	68.2	69.2
妇女（岁）	48.7	59	67.4	75.4	77.2

表中数字来源于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 N. S. E. E.）的《法国经济》中的图表。

战后，平均出生率在1946—1954年上升为2%，1954—1964年为1.8%，1965—1974年稍低于1.7%。

而在死亡率方面，20世纪初以后已有明显下降，从2%降为两次大战期间的1.7%—1.6%，1960年代则为不足1.1%，这个数字看来将是个持久的界标，其原因在于居民普遍享有良好的健康、医

疗和饮食水平，特别是因为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从 1950 年代初的 4% 降为 1975 年的 1.4%。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均寿命的延长：每人平均要比 20 世纪初多活了 24 年。而女性更是多活了 28.5 岁。

移民运动

最后，法国人口发展的普遍趋向的一个原因还在于移民运动。由于大危机和大战的影响，“净移入”（移入数减去移出数）在 1936 年到 1946 年间实际上停止了，战后它有所恢复，但到 1954 年之前速度仍相当缓慢：每年略微超过 4 万人；但从 1955 年起开始加速。从 1955 年到 1960 年，平均每年为 15.5 万，其中最高的 1957 年为 22 万；1961 年到 1964 年的总数为 148.5 万，其中的两个高峰出现在 1962 年和 1963 年，分别为 86 万和 25 万，这是从阿尔及利亚的大量遣返所造成的；从 1965 年起，移民余额数字明显下降，到 1974 年为止，平均每年略微超过 10 万人——1970—1972 年是个短暂的高峰期，每年约 15 万。从 1974—1975 年起，这一正数值迅速下降，从 1977 年起降为零；最后，由于法律管制措施（博内法和斯托勒吕法）的影响，移民余额从 1980 年起变成负数。

在法国生活的外国人，1979 年略微超过 400 万，但此后每年减少 20 万。

要理解这种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的基本原因，不仅应注意人口的总体变化，而且应关注处于工作年龄、即 20—60 岁的人口群体的演变（见下页表）。

实际上，我们在表中可以发现，“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的百分比自 1946 年到最后三年之间不断下降，尽管移入民主要由工作年龄段的人口组成，但其带来的净增加数只能填补可就业人口（包括已从事或期待从事工作的人口）的缺失。从 1936 年到 1962 年，可就业人口数字几乎没有变化，一直保持在 1900 万左右。根据 1968 年的人口普查，这个数字估计为 2040 万，1975 年达到 2180 万，其中 810 万为妇女，在 1968—1974 年间可就业人口的增长中，她们占到了 3/4。一直

到1965年，法国还只能大量依靠移民来弥补其自身的工作年龄段人口的不足。1962—1965年以后，由于大量青少年成为成年劳动力以及妇女就业率的增长，法国对移民的依赖已不再那么紧迫，而移民的数字也开始明显下降。从1974年起，经济危机限制了工作机会，但可就业人口却猛增。于是，外国人被视为失业率增高的一个因素，这就导致了对移民的冻结。

877

各大年龄段人口分布状况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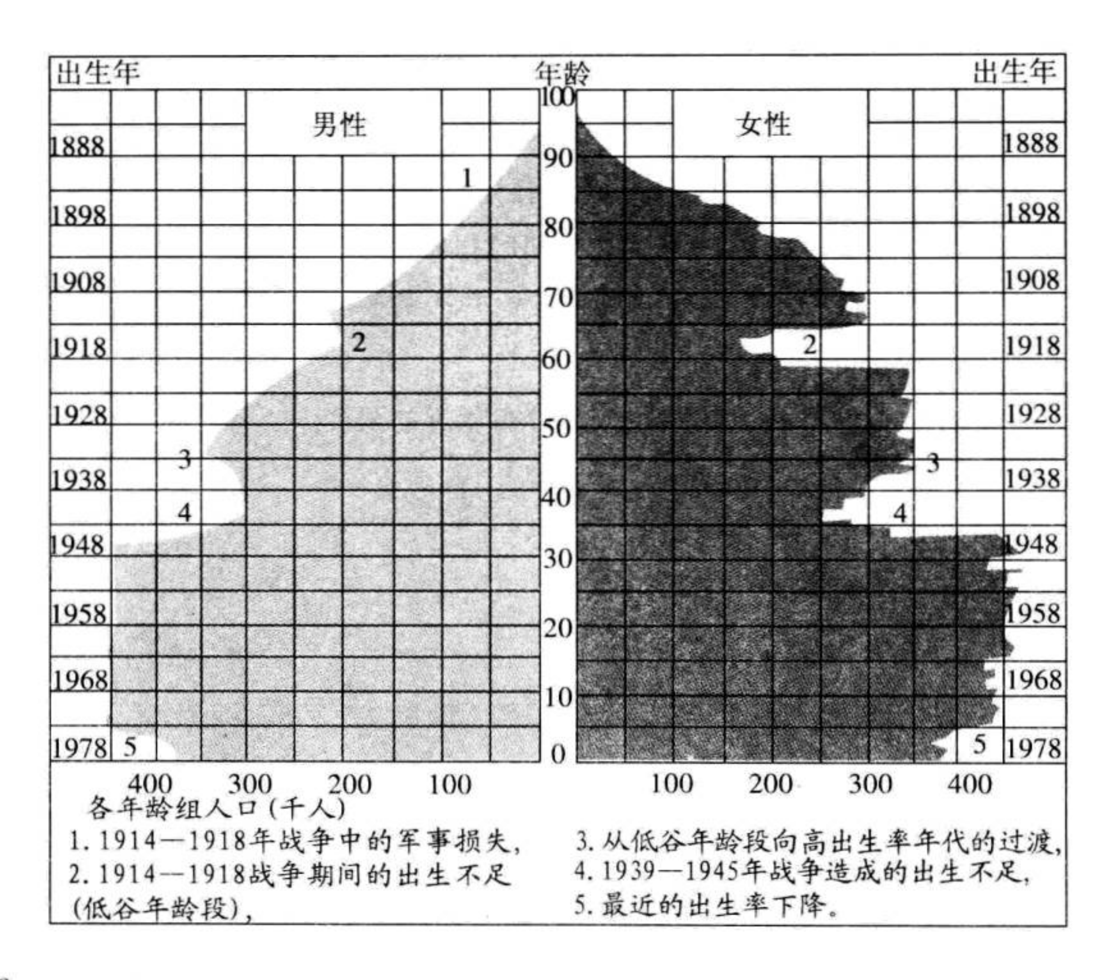
年份	比例（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		
	20岁以下	20—64岁	65岁以上
1901	34.2	57.3	8.5
1946	29.5	59.4	11.1
1954	30.7	57.8	11.5
1965	33.9	54.1	12.0
1978	30.7	55.4	13.9

资料来源：1966年法国统计年鉴（大事记）和全国人口研究所(I. N. E. D.)。

如果法国不是在1946—1965年间接受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的话，其青少年和老年人口对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构成的负担将更为沉重。

根据1975年的人口普查，外籍劳工估计为160万人。但有人认为这一数字偏低，真实数字接近190万，即占可就业人口的8%。但外国人占工人总数的17%。在建筑业和公共工程部门，这个数字高达32.2%，金属制造业为23%，采矿业为18.5%。从1975到1977，外籍劳工的数字估计下降了16%。根据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的估算，1977年外籍劳工总数略低于150万（与1975年的190万相比下降了20%）。

下表为1979年1月1日法国人年龄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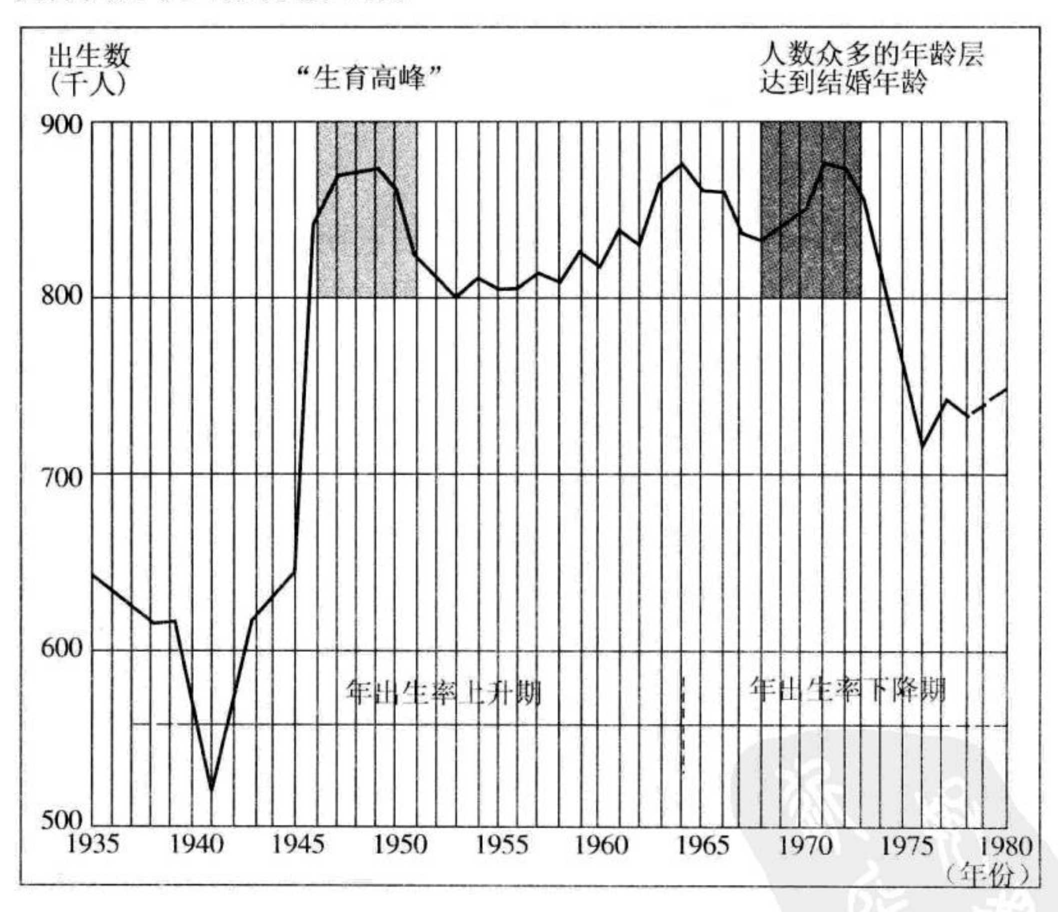
878

下表突出地显示出 1946 年后"可就业人口"与实际就业人口之间的差距，这一差额被称作"就业需求未被满足"，即失业。不过，由于人数日益众多的青年阶层（1946 年以后的几代人）的可就业率看来并没有变动（它在 1968—1972 年间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义务教育期延长至 16 岁而导致的效应），由于 25—54 岁妇女可就业率的增长（这与一些必然性的新局面紧密相关联，如第三产业中就业机会的增加、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妇女学习期限的延长和职业教育的发展等），政府和雇佣者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工政策手段就是限制外籍劳工的移入、削减劳动时间和降低退休年龄。尽管可以采取这些措施，但在 1985 年之前，可就业人口的增长甚至更为迅速（当年的数字为 2400 万，而 1978 年为 2000 万），1986 年 9 月，等待工作机会的人估计达 250 万。欧洲所有国家都出现了这一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

总人口，可就业人口和实际就业人口

年份	实际就业人口（百万）	可就业人口（百万）	申请就业者（百万）
1946	19.4	19.4	0
1954	19.0	19.2	-0.2
1962	19.5	19.7	0.2
1968	20.2	20.6	0.4
1975	21.2	21.8	0.7
1978	21.2	22.6	1.4

资料来源：人口统计及劳工部。



879　　劳动时间

每周工作时间的变化是总劳动供给的一个重要变量，因而也是劳动供给和需求关系的重要变量。

在大战末期，法国已经无法维持1936年通过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尽管劳动时间随经济扩张和萧条而有所变化，但从1945年起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44小时，而1966年时非农业部门则上升到46小时。但这一增长只是弥补了每年带薪休假时间的延长，后者由1954—1956年的每年2—3周延长至1962—1964年的3—4周。因此，总体而言，年度劳动时间在这一时期内显然维持稳定。

一直到1968年，法国的每周工作时间仍显著高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41—42小时）。根据格勒内尔协定，每周工作时间每年以1%的速度下降，而制造业中的下降速度要高于建筑和公共工程部门、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到1978年1月1日，工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1.5小时，职员为40.7小时。于是法国终于达到了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 C. D. E.）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人口复苏的原因

如果说我们对死亡率稳定下降的原因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话，对出生率上升的原因则一直在探讨之中。法国的人口学家们认为，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愿意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孩子的夫妇的比率上升了，较少一部分夫妇甚至愿意有三个孩子。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没有孩子的青年夫妇和超过三个孩子的家庭，其人口数量在战后几乎没有变化。这就是说，生育行为方式的转变远非整齐划一的现象。

目前能够解释接受不止一个孩子的家庭的态度变化吗？对此已有各种假说。如有人认为，大战削弱了有关个人安全的准则，因此反而引起了人口爆炸，因为从前的那些准则总的来说是要求控制生育的。同样，经济扩张和充分就业的大环境造就了有利于生育的局面。最后，社会保险的设立、1938年及战后资助家庭的措施的实行（家庭法、家庭补贴的普及、预产期和哺乳期补贴等）无疑有利于维持出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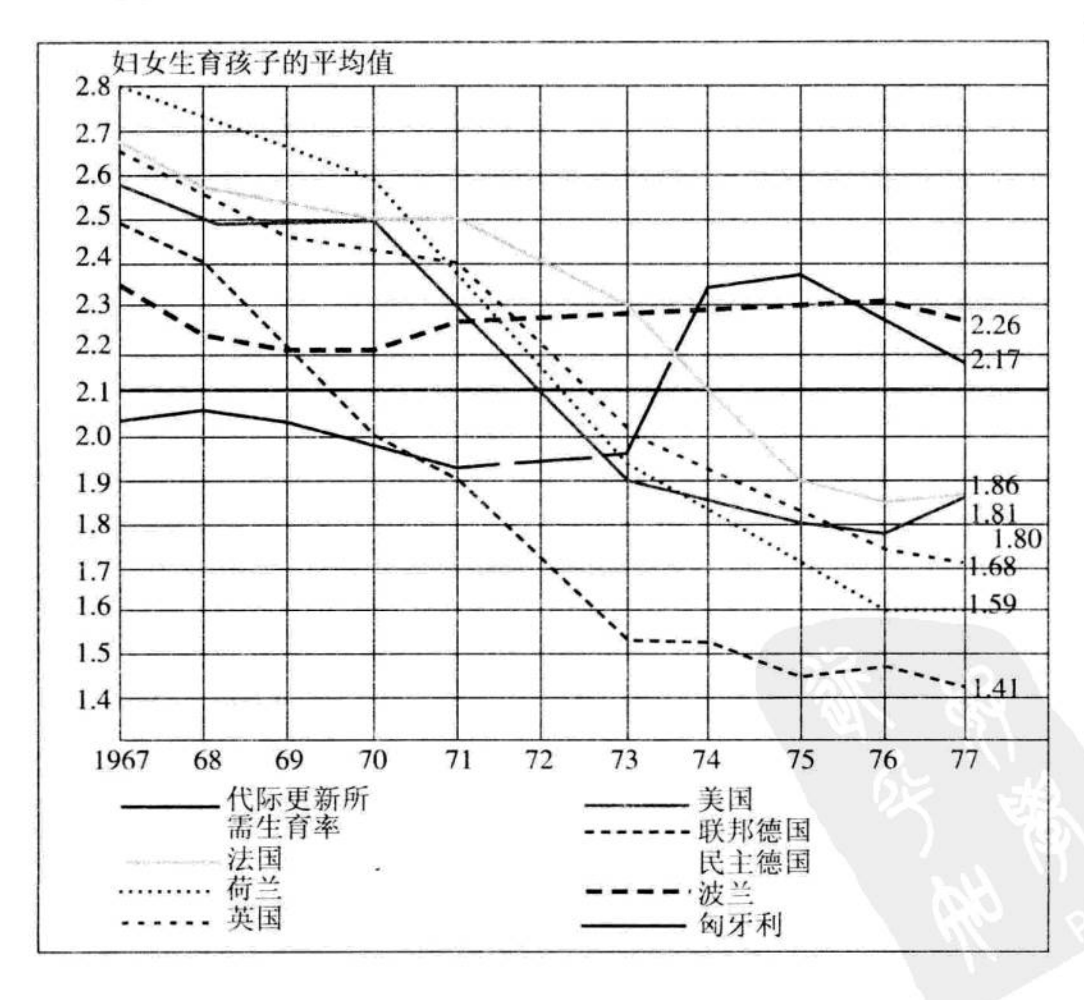
1974年后出生率的下降

1974年后，每年的新生儿数量降到75万以下，比1960—1974年间少了10万。但是人口自然超额仍维持正数。这种下降是由于从1964年

起出现的“生育能力”的下降造成的，1973—1974 年的下降速度更快，从 1976 年起，生育能力降到代际更新所必须的出生率之下。

人口学行为方式的这一新变化，其原因看来是多方面的：如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妇女希望从事职业生活和在其低龄期养育孩子的愿望；甚至还与年轻人的行为方式有关（结婚率的下降、婚姻初期生育数字的下降），与家庭立法的不健全、与技术的发展和节育的合法化有关，也与社会配套设施（托儿所等）和可供年轻人使用的住房的不足有关。我们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生育数字的下降是所有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见下表），尽管它们采取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或家庭政策。如人口学家们仍不能肯定，1973 年匈牙利的举措和 1976 年联邦德国的政策是否对出生数字的深远走向产生过持久的抵制效应。

880



人口演变和经济发展

战后“年轻人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这种联系表现在大量低龄人口对基本需求品供应所产生的压力上，这些需求包括耐用品（住房、各种配套设施）、日用消费品（食品、服装和药品）和服务需求（教育、医疗、交通和休闲等）。为了满足新增的需求和逐步提高的平均生活水平，可劳动人口，特别是那些承担家庭的人，就必须更多和更好地工作。

但还有其他因素：人口不仅增长了，它的地理分布也有了深刻的变化。从 1946 年至今，城市的人口集中一直在加速。人口超过两千的居民点、特别是大城市吸收人口的效应导致了消费和生活习惯的重大转变。这些新习惯直接得益于工业品的增长和为数众多的第三产业部门；它们“提高了消费倾向”，即收入中用于消费的平均比例比以前更高的倾向。

这种持续的压力改变了企业家们在投资和创新方面的行为方式：“创新不再是一种风险，而是一种必须”（阿兰·科塔）。

1974 年后出生率的下降可能会导致相反的后果：教育中集体投资的削弱，国内对于配套设施、耐用和非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减缓，创新精神的减弱等。不过，由于人口现象的惯性作用，这些后果只是逐步显现出来。从 1975 年到 2000 年间，可就业人口的绝对数将持续增长（从 2870 万增长到 3340 万），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亦然。因此不可就业人口的比例将会下降，这是件好事——如果同时令人不安的失业率不再上升的话，因为失业很可能反过来维持低出生率，甚至会使其进一步下降。如果情况向坏的方向转变，那么，阿尔弗雷德·索维那独具洞见的话仍具有现实性：“法国在 1951 年成功地提高了出生率，但并没有因此而获得青春和活力。”

881

结构方面的重大改革

国家的新功能和公共部门的发展

根据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纲领中的重大抉择，解放运动中建立的

政治权力机构走上了一条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改造的道路，这一改造有时具有某种小型革命的色彩。改革的发动者们在结构改造中追求的目标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不相容的。左派势力希望建立某种社会主义类型的体制。其他赞同改革的政治力量，如戴高乐派和人民共和党则试图纠正这一体制，以捍卫自由主义的体制。

根据 1945 年 2 月 22 日法令设立的各种企业委员会很能说明各种目标之间的冲突。工会认为，各企业委员会是迈向工人控制的第一步。相反，其他政治派别的代表（尤其是戴高乐派）认为这是资本与劳动联合的开端。同样，对于某些人来说，社会保险和家庭补贴的普及主要是一种实现社会正义的措施、人口政策方面的一项重大举措，而另一些人则把它们看作可以在经济社会体制中确立某种强大的稳定因素的社会津贴。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战后公共财政的地位、特别是公共部门在财政上更为广泛的权力，应成为推动不可逆转的资本主义改造的因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解决现存体制中某些暂时或长期性困难的有效手段。 882

公共部门与物质生产和服务业

在物质生产和服务业领域，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造来自于 1945—1946 年的国有化浪潮。两年之内，生产领域内部设立了一些大型公共企业，它们至今仍存在：法国煤矿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气公司，原子能署和雷诺工厂。

巴黎独立运输公司同样如此。还应该提及众多公共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混合型经济公司，如 1938 年曾实行国有化的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国营宇航工业公司，法国航空公司，国际航空公司，法国石油公司，哈瓦斯通讯社，各大国土整治公司（下罗讷 - 朗格多克运河公司等），各远洋航海公司（大西洋轮船总公司等）。还有一些著名的公司，如勃朗峰隧道公司和埃斯特雷尔高速公路公司等。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虽然 1959 年后公共企业的数量和相对地位有所下降，但它们的子公司数量有明显的上升，这反映了法国大型公共企业介入工商业活动、特别是介入国际交往的战略。

总的来说，以法律形式或其他形式出现的法国公共企业雇佣了近12%的可就业人口，控制了全部的铁路运输、几乎全部的能源产业、大部分的航空和航海业、大部分的信息和出版公司、1/3的汽车工业、1/3的住宅建筑业，等等。在总固定资本的构成中，公共企业占了1/4强，特别是1974年经济危机之后。但尤其是在战后的财政金融领域，公共权力的影响最具决定意义。

公共部门，信用调控和战后对经济发展的全面资助

根据1945年12月2日的法律，法国设立了全国信贷委员会，重组信用体系，对法兰西银行、四家大型储蓄机构和各大保险公司实行国有化，这些措施使国家掌握了控制财政金融机构的强大工具。但这还不是全部。国家同样严密控制了大部分专业信贷机构，如农业信贷银行、国民信贷银行和旅馆业信贷银行等等。储蓄银行网、邮政支票、储金会定期向国库提供后者所缺的现金，以平衡国家的日常收支。

国家或是通过直接的资助、或间接地以经济社会发展基金（以前的现代化和装备基金）提供的贷款、或通过由它控制的专业信贷机构为中介进行投资，上述这些方式的投资占到战后国民投资的近一半。50年代后，这一功能被削弱。另外，有一些国家控制的专业化财政金融机构（储金会、地产信贷银行、国民信贷银行、农业信贷银行、旅馆业信贷银行等）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基金（各种形式的资助和贷款，特别是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基金的部分），这一现象被称作非预算化。不过，在1973年，国家控制的投资占固定资产资产投资总额的31%，而1962年这个数字为28%。但1974年经济危机后，这个比例随着私人投资的不振而明显上升。储金会尤其值得一提，由于它从各私人储蓄基金、国民储蓄银行、各个社会互助基金以及其它储蓄机构中汇聚了大量资金，从而成为一个由各地方金融机构组成的大型银行，它是社会住房贷款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国家和公共部门在各个信贷方面的重要助手（如向各种公共基金进行长期、中期和短期投资）。

当然，国有化没有波及“商业性银行”的广大领域，因而后者没

有受到国家的控制。这个空白无疑削弱了国家用以控制金融流通的武器的力量。然而，在经济增长中，公共部门的发展无疑是比采取指导性计划更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法国的计划化

总计划署设立于1946年。它的倡导者让·莫内曾于1947年提出第一个现代化和装备计划，这一计划是对三个紧迫要求的回应：确定重建的方针、协调各公共部门的运作、分配马歇尔计划中的援助物资；该计划优先考虑基础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的重建，如电力、煤炭、钢、水泥、铁路运输、港口、农业装备等。总体上说，第一个计划完成了：从1947年到1953年，煤产量从4700万吨提高到5800万吨，发电量从2100万千瓦时增长到4000万千瓦时，钢产量从600万吨提高到1000万吨，拖拉机从3万台增长到20万台，交通设施得到恢复或改善。只有农业发展远低于预期水平。

第二个计划（1954—1957年）启动的时机很好。此外，国民核算的进步使得此后能较好地进行预期和协调整个计划的实施。这个计划比第一个计划更侧重于加工工业。它同样也关注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改进。最后，起初还有一些重大措施旨在促进制造业和区域发展。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位在经济方面颇为出色的政治人物：孟戴斯·弗朗斯和埃德加·富尔。

883

第三个计划（1958—1961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1960—1961年的临时计划，这是由于经济衰退、货币贬值及1959年1月通货的稳定而必须作出调整；第三个计划致力于加强经济迅速扩张过程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对外收支的失衡，通货膨胀和某些农产品、特别是牲畜产量的不足。

第四个计划（1962—1965年）名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它着重考虑的是法国经济发展中的三大因素：为数众多的年轻一代开始大量步入就业年龄；随着共同市场的实施而不可避免地逐步开放边境；全面的非殖民化运动后法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转变。它第一次强调应优先发展公共设施。

第五个计划标志着法国计划化历史的一个转折，这时应对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之演变作更为全面的审视。

1963年后公共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之演变

法国经济的自由化——即国家和公共部门在经济和金融运作中切实而明显的退出——究竟始于何时，这很难确定。当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63年提出的稳定计划开始于1964—1965年间取得成效时，转折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计划旨在稳定经济增长，在稳定中求发展。它强调价格的稳定，为此甚至可以暂时牺牲经济增长。它的第二个目标是恢复预算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64、1965和1966三个年度中，法国"调整"了用于国内生产的公共支出的增长，裁减了某些投资，人们本来打算通过公共部门自身的资金、金融市场和专业信贷机构的资金来为这些投资融资。德斯坦的计划还试图遏制国库及其私营连带机构（如储金会）在银行系统中和金融市场上进行的"不诚实竞争"。所有这些技术性措施所追求的一个根本目标十分明显：重新激活金融市场，按熊彼特的话来说，后者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参谋部"，并为此而把巴黎建成一个欧洲规模的金融市场。最终来说，这就是恢复私人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调节作用，即恢复自由经济的基础。

第五个计划（1966—1970年）中体现了上述政策的主要方面。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甚至更大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该计划大力强调增强生产性投资的必要性，同时加速集体性公共设施的建设，这类设施由于青少年人口的增长和近来十分迅速的城市化进程而显得必不可少。因此投资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致力于提高法国经济的竞争力，即转向了外贸，因为外贸此后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推进器的角色。为此，应遏制国内的个人消费，故必须转向一种价值的计划化，或者说某种收入政策，而在近期内这无非就是工资政策。这同样还需在公共部门实行一种"诚实付出"政策，以便削减公共开支、重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健康竞争"的环境。

884

第六个计划（1971—1975年）是在1968年5月的社会风暴、是

年秋天的货币调整和1969年的贬值后实行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明显在于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它把工业律令置于绝对的优先地位。它的逻辑是适应“受威胁产业”之紧迫需求，即适应工业部门的战略，工业正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威胁。为此它牺牲了住宅业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只有那些直接服务于工业和贸易的设施除外（如电信和交通等）。但该计划的实施受到了国际经济危机（1974—1975年）的猛烈冲击。

第七个计划（1976—1980年）拟定的战略计划以调整优先行动纲领（P. A. P.）为核心，旨在全力应对经济危机，这一战略致力于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失衡问题：贸易失衡、失业、生活环境的恶化、通货膨胀、社会不平等，等等。因此它试图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事实上，该计划既没有背离第六个计划的工业政策中的优先目标，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它也没有背离第五个计划的自由主义逻辑。它首要的目标是工业调整和使法国经济加入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为此首先应提高资本的回报率（所实现的利润与投入的资本之间的比例）、企业自我筹资的能力，并由此刺激新的生产性投资。

第八个计划（1981—1985年）的方针确定于1979年，其主旨与此前一脉相承：通过“出口工业的专业化”推行“积极的出口政策”，新增产值的分配应有利于利润，因而也应有利于储蓄，而储蓄可“促进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并因此而刺激生产、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今天的失业者（当时为150万）可以对政府当时表达的减少失业的诚意表示怀疑。该计划注重能源问题（节能、核能、能源供应的多样化等），这是它的一个新特征，另一个新颖之处是它拒绝对经济增长作数字上的预测。

因此这一计划基本上是一项工业战略，这个战略提出了国家和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新关系。令人困惑的是，尽管60年代初开始的自由化努力在此后20年间未曾中断，但它并没有导致公共开支在国民产值中的比例的下降，恰恰相反，这一比例有了明显上升。公共开支

（国家、地方单位、社会保险及其他行政机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 1950 年的 36% 上升为 1960 年的 40%，1970 年为 45%，80 年代初达到 50%（但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开支明显下降，而社会保险和其他行政开支则上升了）。

如果我们把上述情况与有关公共企业的评论结合起来看，也许可以说，真正的风险不在于大量公共经济部门的虚弱，而是国家及其整个行动和干涉机器服从于私营部门的经济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外在于公共经济的性质和自身使命的。

增长，波动，通货膨胀，危机

增长的节奏

要评价法国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应该在与过去比较的同时，也应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较。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法国经济增长的特点。这一增长的速度相对较快，而且延续的时间特别长。此外，这一增长是相对稳定的，就是说，它在 1973 年之前没有特别剧烈的波动。

P. 杜布瓦把 1945 年到 1969 年的增长分为四个阶段。从 1945 年到 1951 年：经济的重建和重振时期。这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得以修复、工业的瓶颈制约因素逐步被消除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头几年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很快，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础性生产活动的大规模恢复。1949 年后增长率的减缓只表明向正常的生产及消费状况的逐步回归。

885

从 1951 年到 1957 年：进入战后的第一个循环。此前的增长在这一时期的初期开始加速，并由此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1951 年和 1952 年初）。为稳定价格，政府通过通货紧缩政策来抑制经济增长（比内的第一个稳定政策），这一措施取得了成效，经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1952 年一段时期和 1953 年）增速放缓。随后的年增长速度维持在 5%—6% 的水平上。

1957—1963 年是一个新的历程，这第三个时期被称作第二个战

后循环。实际上，1956 年和 1957 年的快速增长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再次于 1958 年采取稳定政策（比内的第二次实践），1958 年末和 1959 年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1959 年 3 月起，由于剧烈的通货贬值，经济又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局面，这一局面在 1963 年达到顶峰。

1963—1969 年的发展更为复杂。1963 年，吉斯卡尔·德斯坦采取稳定政策，以图抑制以通胀为代价的增长，他的政策于 1965 年取得成效。但这一政策导向也有其自身的弊病。由于此后法国国民经济更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1966 年的萧条局面又因为 1967—1968 年的国际性衰退而加剧。为重振经济而采取的一些小步骤（从 1967 年末到 1968 年初的德布雷计划）不足以平衡这些不利影响。1968 年 5—6 月的动乱过后的通胀刺激了 1968 年末到 1969 年初的经济复苏，但这多少带有人为性质，不过随后很快便出现了世界性的经济复苏。1968 年，戴高乐将军拒绝通货贬值，这似乎表明法国将导向通货紧缩政策。

法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

	1870—1913	*1913—1950*	*1950—1960*	*1960—1970*
法国	1.6	0.7	5.0	5.8
英国	2.2	1.7	2.8	2.7
美国	4.3	2.9	3.2	4.0
意大利			5.5	
德国	2.9	1.3	7.7	4.8
日本			9.5	10.0

资料来源：J.-M. 阿尔贝蒂尼，《国家报告》。

上表说明了法国和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史的不同阶段的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在较早的两个阶段，法国的增长速度远远逊色于其他国家；1913—1950 年这一时期的增速特别缓慢，这是因为此间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大经济危机的影响。

可以说，法国在后两个时期的“扩张竞赛”中占据中等位置，其经济增长速度

高于英国和美国，但明显低于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这些发生“经济奇迹”的国家。

886　但 1969 年的政治事变改变了这一政策。事实上，戴高乐将军的去职以及随后于 1969 年 8 月宣布的通货贬值意味着，过于刻板的通货紧缩政策已经被抛弃，政府准备通过以新的货币政策为基础的对外贸易来促进经济的持久增长。

1951、1957 和 1963 年是三个经济十分景气的年份，但它们随后的经济增长率明显减缓，此外，1949 年，工业经历了轻微的衰退，1967—1968 年也发生了衰退；不过，总体而言，我们不能认为法国经济经历了二战之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所曾经受的剧烈波动。这并非法国独有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危机”一词都从经济学词汇中抹去了。

70 年代的危机

70 年代初，某些国家，如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已经显露出一种新型经济危机的症状，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滞胀”（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但这种危机尤其表现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如当 1971 年 8 月 15 日美元终于暂停可兑换性之时、以及随后导致的货币紊乱中。但是，只是在 1973 年末的石油危机发生后，国际经济危机才在 1974—1975 年间全面爆发。

法国年经济增长率的演变（百分比%）

1970—73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5.8	5.4	2.8	−0.3	4.6	3.0	3.3	3.2	2.5

资料来源：全国经济及统计研究所，法国经济年表。

在法国，人们在战后第一次看到了生产总值的下降，工业生产下跌了 10% 左右，这与 1970—1973 年间的优异表现形成强烈的对比。

整体来说，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如下表所示。

若干国家国民总产值的变化——年平均增长百分率

	1970—1973（平均）	*1973—1977*（平均）	*1978*	*1979*	*1980*
法国*	5.8	2.6	3.3	3.2	2.5
美国	4.7	2.0	4.0	2.5	1.7
德国	3.9	1.7	3.1	3.5	2.6
英国	4.2	0.3	3.0	1.4	0.5
意大利	3.9	2.0	2.6	4.0	1.8
日本	8.1	3.1	5.6	4.8	3.7

* 国内生产总值（P. I. B.）

资料来源：经济部。

887 面对这一局面，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当作优先任务，在当代开放的经济体系中，通胀被认为是危机最危险的表现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稳定计划（1975 年的福卡德计划，1976 年 9 月的巴尔计划及其随后的各种变革）。看来已经有必要对法国通货膨胀的演变作一点更为详细的考察。

法国的通货膨胀，从战后到 1968 年

大战结束后即出现的剧烈通胀，其性质过于特殊，此处不做探讨；如以 1938 年为基准（100），那么 1944 年巴黎的零售价格水平为 285，1949 年达到 1817。

1950 年以后，持续的通货膨胀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较之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通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强度特别剧烈。1950—1966 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价格指数增长了 143%，而英国为 80%，德国为 69%，美国为 68%。

各部门的增幅存在巨大差异（见 1375 页表格）。155% 的平均价格增幅是各种因素“合成”的：仅房租一项的巨额增幅就占了价格总增幅的 10%。

另一方面，几个典型的通胀时期中间间隔着价格上涨较为缓和的时段，对于后一种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稳定期。

1. 1950—1952 年：通胀剧烈期。
2. 1953—1955 年：稳定期。
3. 1956—1959 年：通胀期。
4. 1960—1961 年：缓慢的上涨期。
5. 1962—1963 年：通胀期。
6. 1964—1967 年：缓慢的上涨期。

通货膨胀的原因有时是本国政府不能左右的，如战争的破坏造成的抑制性效应，朝鲜战争（1950年）引发的国际原料价格的上扬，农业歉收（1957年）以及阿尔及利亚战争带来的紧张局面（1956—1957年），等等。但多数情况下，它是由各社会集团为分配实际国民收入而发生的争夺所引起的。在激烈对抗的社会和政治气候下，公共权力机构所努力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各对抗的社会集团中引起的直接反抗应是最小的。此类灵活措施就表现在大规模地利用通胀政策上，这是一种有利于国家和私人生产者的财政手段。作为这一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消费者的购买力会受到价格上涨的慢慢侵蚀，但不像官方强制性的税收那样直接损害购买力，就此而言，这是一项刺激性较小的政策。1946年，戴高乐将军选择普列文的方案而放弃孟戴斯·弗朗斯倡导的严厉主张时，情况就是如此，1951、1956和1968年亦然。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步骤么？理论上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是，各社会阶层有可能就严厉的政策达成一致，换言之，这说到底需要更为广泛的政治团结。既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50—60年代的经济增长就只能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实现了。

当然，随着人们逐渐远离重建时代，通胀的程度也在降低。就五年期的平均价格上涨水平而言，1949—1954年为42%，1954—1959年为32%，而1959—1967年则降为18%。不过在最后一个时期，法国进入了自由贸易、特别是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时代。这就意味着，法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以价格稳定的角度来看——

就不应再通过与过去的法国作比较、而应通过与它的伙伴的比较来进行考察。然而，无可置疑的一点是，在这一时期内，欧共体其他国家和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胀率总体而言都要低于法国。法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价格变动上的差异，其产生的后果将拉动对外贸易，这种局势当时已然显露出来。

1949—1968 年各经济部门的价格上涨

888

经济部门	上涨百分率
住房服务业	+1043
其他服务业	+247
木材、纸张，其他产业	+212
建筑和公共工程	+209
交通和电信业	+176
建筑材料和玻璃业	+141
石油和天然气	+138
矿石和非铁金属	+132
铁矿石和冶金业	+118
机械和电气工业	+113
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	+112
煤炭和煤气	+106
农业	+93
电力工业	+89
服装纺织，皮革	+77
化工	+69
平均价格水平（国内生产总值）	+155

资料来源：收入和成本研究中心。

从经济学观点来看，法国价格的较快上涨，其第一个后果就是导致外国在法国的采购代价更高，从而对法国的出口造成困难。反过来，很多外国产品会变得相对便宜，从而刺激法国的进口。因此，在通胀

相对较快时，法国的贸易平衡将会出现严重的赤字。在这种局面下该如何应对呢？可以选择的最简单的可行措施是，让外国用于购买法国产品的法郎变得更便宜，这显然是使法国产品降价的间接手段。这种办法被称为货币贬值。为了恢复外部竞争力、也为了挫败抽取法国黄金和外汇储备的投机行为，第四和第五共和国政府曾如同第三共和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那样，多次采用货币贬值政策。法郎在41年内13次贬值：普恩加莱法郎合纯金65.5毫克，但1969年8月1日贬值过后，每个旧法郎（生丁）的价值定为1.6毫克。变化何其剧烈，由此可见！

货币贬值旨在使贸易市场上的法郎减价，但它也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失。实际上，如果说通货膨胀被当作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财政手段，那是因为它可以在各社会群体之间实现大范围的收入转移。如果从这种转移中得益的集团用这一以隐蔽方式抽取的收入来进行生产活动的话，即如果用它来对生产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话，那么通货膨胀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这种转移也可能有利于那些寄生性的社会群体。

889 法国同时存在这两种情况。实际上，价格上升的一个自动后果就是现有债权和债务的贬值。因此当企业家们从国家债务的贬值中获益后（这主要发生在战后初期和50年代），60年代当他们债台高筑时，他们再次受益。但是，通货膨胀会产生对价格上涨的预期——更为通常的说法是“连锁涨价”——以及财政上的宽裕局面，这样就会使得大量边缘企业得以维持下去，甚至会出现一些并没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的行为。显然，当价格上涨放缓或停滞时，这些企业和行为就会陷入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布热德运动只有在真正的价格稳定期才呈现猛烈的发展势头的原因所在，第四共和国时的1953、1954和1955年正是这样的稳定期。换言之，对大量在战后的通胀中滋生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而言，价格的稳定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尽管通货膨胀存在这样的“反常效应”，我们仍然可以说，这种削弱债权和债务的机制，首先是导致1945—1954年间公共财政直接和大量进入投资领域（约占

总投资的30%）的重要原因，其次它还是1956—1964年、1969—1973年间投资旺盛的重要根源。

但某些社会集团明显因这一政策而受损。这包括所有拥有固定或相对固定收入的群体，即公共债券（主要是长期债券）和私人债券的持有人，以及受固定租金或农业租约规章限制的小业主。但主要的受害者是工资劳动者，这或是因为当价格上涨速度比工资涨幅更快时他们的购买力明显受损——1944—1950年、甚至1956—1958年间，众多工资劳动者阶层的状况就是如此——或是因为他们的实际收入停滞而造成。像退休者、“最低工资者”、农业中的工资劳动者、外籍劳工这样的社会群体，他们受价格上涨的打击尤为严重，因为最低工资或退休金的调整是滞后于价格上涨的。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在1972年之前，如果没有通货膨胀，法国的经济增长肯定不会这么快。但是，这种通胀中的增长造成了众多的不公正现象，它无疑加剧了法国的社会紧张局势，并使得选择某种可以为各社会群体广泛接受的、在稳定中求增长的政策成为难题。1968年5—6月的学生造反之所以在工人中赢得出人意料的反响，其原因就在于此。

1968—1973年间通货膨胀的加剧

这种通胀的加速度尤其体现在下面的数字中：

	1965—1968	*1968—1972*
法国	3.3	5.5
英国	3.7	7.8
德国	2.3	6.7
意大利	2.3	6.4
美国	3.3	4.6
日本	4.8	

资料来源：J.-M.阿尔贝蒂尼，《国家报告》。

1973年后，国内生产总值的价格增长每年约为3%，但年通胀率　890

在 1969—1972 年间就已经超过了 6%。根据全国经济及统计研究所的研究，这 3% 的超额增幅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农产品价格加速上扬，工业生产能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直接影响成本和价格的投资增长不断加速，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增高——尽管生产率有了提高，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过快。上述大部分因素同样也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效应，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在 1968—1972 年间的通货膨胀率比法国还要高。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政府放松对通胀的控制的原因，当时流行的格言是，“蠢事不该干得比别人多”。

1973 年后的通胀危机

1973 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甚至在该年年末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冲击显露之前就是如此。几乎所有国家都已达到或贴近“两位数的通货膨胀”。1974 年和 1975 年的情况尤其恶劣，随后几年中，尽管各国采取了抑制通胀的政策，但局面没有什么好转——只有德国、美国和日本例外（见下表）。1979 年再次出现通胀加速的局面。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法国	8.1	15.2	11.7	9.6	9.6	11.8	
英国	9.8	17.1	24.2	16.5	15.9	11.2	17.2
德国	6.6	6.9	6.0	4.5	4.0	2.4	5.4
意大利	11.4	19.3	17.0	16.5	17.0	13.3	18.8
美国	7.8	11.8	9.1	5.8	6.5	9.0	13.3
日本	11.3	25.0	11.8	9.3	8.1	3.5	5.8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 C. D. E.）。

1974 年后，通胀率居高不下，而经济又呈现出持续的停滞趋势，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在这个问题上，各种以十分不同的理论为依据的观点彼此交锋，但它们通常更多地是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矛盾的。确实，原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从三个方面（价格机制、心理影响和政治后果）对价格结构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持久性紧张效应。但这个原因不能解释，为什么法国和意大利的通货膨胀要比德国和日本厉害得多。

同样正确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恶化，以前以完全可兑换性（金本位）或部分兑换性（金汇兑本位）准则为基础的“货币秩序”被抛弃，于是就造成国内和国际层次上（第二个层次对第一个层次有强烈的感染效应）货币发行的过量，而这又引起价格的上涨——不过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更具根本性意义的是，学者们发现了与自由主义经济之运作紧密联系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在各国都以不同的程度发生作用，于是这就能解释，除了上述普遍性的通货膨胀的起因外，为什么各国通胀率存在巨大差异。

因此，对削减就业机会的抵制导致了单位产量的工资成本上涨，这种抵制在法国和意大利以及日本要比德国和美国强烈，在德国，危机开始后，有70万移民劳工离去。同样，由于购买力难以降低——其原因在于确定名义工资和间接工资（社会保险）规章制度——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工资成本方面的负担要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但还存在其他因素：由于利息上涨而造成的货币发行量和银行利润的过度增长；对于某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本难以生存的企业，价格的上涨恰好弥补了其利润率的下降；1978年后的价格自由化促使消费品的预期价格上涨；地产和不动产投机行为极大地推动了住宅价格走高；公共开支的过快增长——尤其是因为军费开支的增长，但难以避免的公共设施开支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等等。

891

二、国民经济的各大部门

法国生产体系的总体演变

在对每个生产部门或产业进行深入考察之前，我们必须对法国生产体系演变的一般性动力稍作说明。在这方面，我们有全国经济及统计研究所的巨幅“历史画卷”可资利用，这一画卷从1952年一直描绘到1972年（从重建结束到增长趋势出现逆转的前夕）。

1968年后的几年中，法国经济在结构和目标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

转折。一直到1968年，经济政策尚能实现资本积累、增值与提高国内劳动者购买力、保障就业之间的某种妥协，但此后，经济政策的优先、实际上唯一的目标是争取和维持法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所能取得的较好的地位。因此就必须降低成本（以提高竞争力），推进专业化（“调整”）、使整个经济（包括公营经济）服从于理性化和合理化的共同标准。经济动力已经完全不是为了促进充分就业，“对于法国资本主义的硬核来说”，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已经过时了。

11个经济部门的价格演变（1952—1972年）

	年平均增长率（%）
1. 农业	3.7
2. 农产品和食品加工	3.6
3. 能源	3.1
4. 中间产品加工业	2.4
5. 装备工业	2.8
6. 消费品工业	4.1
7. 住房服务业	10.2
8. 交通和电信业	4.3
9. 建筑和公共工程	5.2
10. 服务业	6.65
11. 商业	3.6
整体经济	4.2

892

法国11个部门的经济增长（1952—1972年）

（以1959年价格计算）	年平均增长率（%）
1. 农业	2.5
2. 农产品和食品加工	4.25
3. 能源	7.2
4. 中间产品加工业	6.9

续表

5. 装备工业	7.4
6. 消费品工业	4.7
7. 住房服务业	4.85
8. 交通和电信业	5.2
9. 建筑和公共工程	6.55
10. 服务业	5.3
11. 商业	5.35
整体经济	5.55

资料来源：历史画卷——全国经济及统计研究所。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尽管这一时期内年均增长率为5.55%，但11个部门各自的增长率却大不相同，增速最低的是农业（2.5%）、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4.25%）以及消费品工业（4.7%），而增长最快的是装备工业（7.4%）、能源（7.2%）、中间产品加工业（6.9%）和建筑及公共工程部门（6.55%）；接近平均水平的有住房服务业（4.85%）、交通及电信业（5.2%）、服务业（5.3%）和商业（5.35%）。随后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上述原因，各部门对这一时期内总生产的贡献也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我们对经济动力的考察便有了一个新维度。可以看到，1952—1972年间，下列部门中生产率的年增长速度高于平均增幅（5.6%）：能源、中间产品加工业、农业、消费品工业和装备工业；相反，其他五个部门（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交通和电信业、建筑及公共工程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增长率则低于平均水平。

法国经济中11个部门以现行价格计的增长率（1952—1972年）

以实际价格为准的增加值	结构比例（%）		年增长率（%）
	1952	*1972*	*1952—1972*
1. 农业	13.6	6.9	6.3
2. 农产品和食品加工	8.5	5.9	8.0
3. 能源	5.9	6.5	10.5

续表

以实际价格为准的增加值	结构比例（%）		年增长率（%）
4. 中间产品加工业	7.7	6.7	9.5
5. 装备工业	12.5	13.8	10.4
6. 消费品工业	10.7	8.8	8.9
7. 住房服务业	1.9	5.2	15.5
8. 交通和电信业	5.9	5.7	9.7
9. 建筑和公共工程	7.7	11.3	12.1
10. 服务业	11.1	16.8	12.3
11. 商业	14.5	12.4	9.1
整体经济	100	100	10.0

893

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1952—1972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
能源	8.8
中间产品加工业	6.7
农业	6.3
消费品工业	6.2
装备工业	5.7
平均	5.6
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	4.4
交通、电信	4.3
建筑和公共工程	3.8
商业	3.3
服务业	2.7

由于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演变、比较价格、国内外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1952—1972年间各部门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劳动力转移。正如下表所显示，农业中的就业人数（及其在总就业人口中的相对位置）明显下降（减少了270万人），消费品工业和能源业中也有较小

程度的下降，就业人数分别减少了41.5万和74.5万；而在其他部门，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都有了增加，尤其是在服务业（增加114.3万）、商业（增加76.8万）、建筑及公共工程（增加81.5万）、装备工业（增加81.2万）中；随后是交通和电信业（增加17万）及中间产品加工业（增加13.1万）等等。

11个部门中就业状况的演变（1952—1972年）	千人			百分比（%）	
	1952	1972	1952—1972	1952	1972
1. 农业	5201.0	2505.0	-2696.0	31.4	14.5
2. 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	646.1	648.3	2.2	3.9	3.8
3. 能源	411.9	337.4	-74.5	2.5	2.0
4. 中间产品加工业	811.7	942.6	130.9	4.9	5.5
5. 装备工业	1553.2	2364.9	811.7	9.4	13.7
6. 消费品工业	2271.2	1855.8	-415.4	13.7	10.8
7. 住房服务业	62.1	82.5	20.4	0.4	0.5
8. 交通和电信业	935.5	1106.0	170.5	5.7	6.4
9. 建筑和公共工程	1220.4	2035.5	815.1	7.4	11.8
10. 服务业	1771.0	2914.5	1143.5	10.7	16.9
11. 商业	1657.3	2424.9	767.6	10.0	14.1
各部门合计	16541.4	17217.4	+676.0	100	100

按现行价格计11个部门新增产值的分布（1952—1972年）

894

	1952	*1972*
	（%）	
1. 农业	12.0	6.7
2. 农产品和食品加工	7.6	5.9
3. 能源	6.6	9.0
4. 中间产品加工业	6.4	8.3
5. 装备工业	11.4	16.1

续表

6. 消费品工业	10.5	8.8
7. 住房服务业	3.3	2.8
8. 交通和电信业	6.0	5.7
9. 建筑和公共工程	8.2	9.9
10. 服务业	13.1	12.5
11. 商业	14.9	14.3
整体经济	100	100

农业

农业虽然取得了出色的技术成就，但其地位相对衰落。

在1968年，农业的从业人口为312.5万，从这一角度看，它仍然是法国的“首要产业”，但到1977年，上述数字降为200万。不过，农业总产量在1959—1977年平均每年增长略微超过3%；因此可以说，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农业产量翻了一番。如果考虑到农业用地面积下降（与1928年的农用地面积相比，减少了10%，1977年农用地面积为3200万公顷）、农业劳动者人数迅速减少等情况，这一成就更加引人瞩目了。因此这一发展反映了单位产量的显著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重大进步。

在这30年中，每头奶牛的年产奶量从1000升提高到1977年的3300升，等等。

单位产量的提高主要是1950年之后的成就。从这时起，农业部门的中间产品消费及农业设备的购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向化工部门的采购（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向机械工业的采购（拖拉机、农业机械等），但向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的采购（主要是牲畜的饲料等）、国外采购（油饼饲料的进口）也是如此，最后还有农业部门内部的贸易（饲料和畜用谷物的购买等）。不应该忘记农业从业者自身在生产方法和管理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这得益于职业培训的改进和各种技术机构（专业性的或工会创办的）的支持。最后，每个全职农业劳动者的劳动面积的增长也有利于生产率和单位产量的提高。

单位产量（公担/公顷）	小麦	玉米	马铃薯	甜菜
1930—1938 年平均水平	15.3	15.4	110.3	269.3
1961—1966 年平均水平	28.9	32.3	178.3	386
1977 年	40			

895

农业地位衰落的基本原因

对于农业地位的相对衰落——农业产量的增长要比总产量的平均增幅慢两倍——应通过经济的总体演变来解释。我们可以找出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因：家庭消费模式的变化，某些工业产品在用途上取代了农产品（如纺织品和染料），一些工业生产代替了农业生产（如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的发展）。

上述原因中，第一个最为重要。1949 年，食品占家庭消费的 42%，而在 1966 年这个数字降为 32.3%，1977 年更降为 22.6%。不过，在整个这一时期内，家庭的食品消费量一直在增长；只是它的增幅要慢于总消费的增长，而且食品消费呈现多样化。因此国内市场无法消化强劲增长的农产品，其中包括非畜用的谷物。这就使得法国1/4 以上的农产品用于出口。种植业变化的原因也在于此：1959—1966 年，种植业产量明显下降，畜牧业产量则有了上升，但随后种植业又重新发展，占到了农业总产值的 45% 左右。

这样，到 1976 年，法国共生产了 4 亿公担谷物，而 1948 年产量仅为 1.4 亿公担。同期内的牛肉产量从 80 万吨提高到 160 万吨。猪肉产量翻了一番以上，达到 170 万吨。牛奶产量从 1 亿百升提高到 2.5 亿百升。

但这些显著的进步并没有阻止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的下降，这个数字从 1952 年的 14% 降到 1977 年的 5% 左右。这一现象的原因部分在于农产品价格的相对较低，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每个劳动者产量的增加），其增幅在 1952—1972 年间为 6% 左右（而各部门总体水平为 5.4%）。上述情况导致 1954 年后农村人口加速外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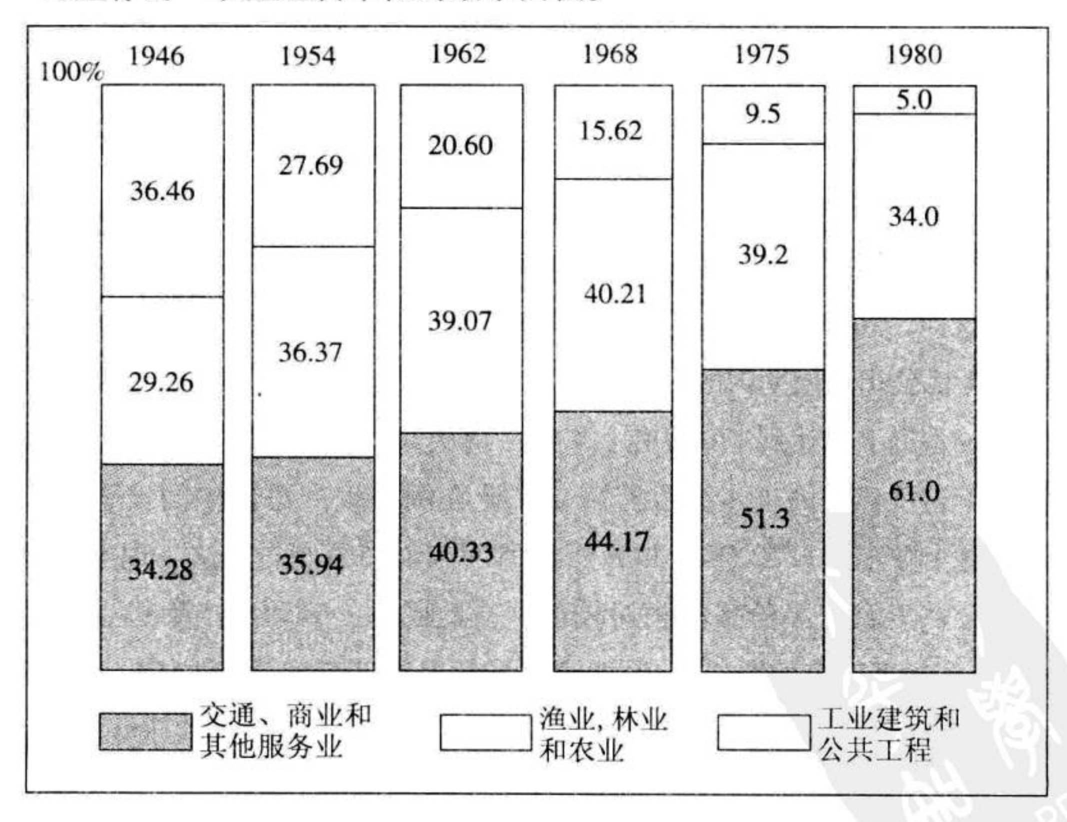
农民的迁徙

农业人口首先受到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的不利影响。但是促

使农民离开的决定性因素看来是非农就业机会的存在。当这种非农就业机会离农村不远时，这一因素的作用尤其明显。这表现在如下的事实中：总体上说，农业劳力减少最多的地方就是法国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同样，迫使或吸引农民离开的动力对农业中的工资劳动者和年轻的家庭帮工的影响，要远大于农业经营者、特别是 40 岁以上的经营者。

但“农业经营者”离开的速度相对较慢，这带来了有害的后果；农业经营单位的数量之下降要比其劳动者数量的下降来的缓慢。因此法国仍存在大量的农业经营单位，而这又意味着平均经营面积过小、农业设施的利润不足。

不过，由于农业经营单位缩减的现象更多是波及小业主而非大农场，因而可以看到地产资本集中的现象，但这一集中相对缓慢，因为 896 69%的农业经营单位面积在 20 公顷以下，而 20 公顷被认为是欧洲“可生存的”农业经营单位的最小面积。



三大产业雇工结构演变图

农业收入的演变

由于农村人口外流和食品消费的明显增长，人们也许会认为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自1950年后应有大幅度增长。

但应该看到，家庭食品开支的增长只是部分有利于农业生产者；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为农业提供中间产品的产业、商业和运输业也从中受益。

农民向其他部门的日常采购（中间消费品）在相对价值上一直在增长。它的比例在1949年占农业总产值的20%，1972年提高到34%。

此外，由于购买设备和土地而缔结的分期偿还的贷款也削弱了农业的纯收入，到1976年，这类分期偿还的到期贷款占农业总收入的21.4%，比1960年高出一倍；农业中的负债在1960年占其总经营收入的44.6%，到197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68%！这一现象显然是农业现代化和经营面积增长带来的副作用，尽管两种情况是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重要原因。

不过，虽说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的增幅没有其他社会-职业阶层的整体增幅高，但它在1959—1972年间仍翻了一番。但此后开始下降，随后又陷入停滞状态。但这些一般性趋向仍可能掩盖了法国农业中存在的严重的收入上的差异。农业劳动者平均收入的停滞和衰退及其在政治上的重要影响，是导致农业政策措施繁多的重要原因，这些政策措施首先是在国内领域，随后也发生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

价格政策和农业市场

价格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对价格行为、因而也就是通过对市场的组织来维持农业收入。这一政策可以追溯至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设立的小麦署，这个机构在1940年发展为全国跨行业谷物管理局（O. N. I. C. ）。但只有等到1953年，当战后首次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抗议后，范围更为广泛的农业市场组织才得以奠定基础。首先采取的组织和援助措施针对的是乳制品和肉类产品。1957年，第一个有关农产品价格的全面体制终于在第三个计划的框架内建立起来。

为此，1957 年 9 月的条例和当年 12 月的法律在维持此前设立的各种机制的同时，明确了调控的方式，调控依据的是一整套的复杂的价格体制，这一体制旨在保护生产者（最低价格和指数价格）、消费者（最高限价）以及确保公共权力机构的普遍目标的实施（目标性价格，竞争性价格）。理论上说，这一体制在共同市场条例实施之前一直有效。在 1960 年 8 月 5 日的农业指导法的框架内，政府致力于完善过去的农业互助保障和生产引导基金，后来这一基金成为农业指导和市场协调基金，而随着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新基金又成为向欧洲农业指导和保障基金（F. E. O. G. A.）过渡的形式。

1960 年的农业指导法以及 1962 年的补充法（或称皮萨尼法），其主旨在于缓解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设立生产者联盟和农业经济委员会的目的也在于此。

这一组织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小型农业区，第二个层次是农业区域；组织工作的目标是为生产者组织调控生产、实现其产品的商品化提供方便。尤其重要的是，它旨在增强这些组织在商业流通中的契约性力量。1964 年 7 月 6 日的法律同样是为了规范契约经济的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合同），特别是通过确立模范协议来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保护。最后，这项法律还通过设立现代化的屠宰场网络和对肉产品实施更为严格的监控，试图改善肉类的商品化流通，并通过设立国民信得过市场来改进水果和蔬菜的流通。

对这些措施的列举只能是印象式的，但它们的效果很快便在公共财政方面显现出来。

整体而言，对价格采取维持政策，其消极后果要比市场机制小。另外，在很多情况下，这一政策避免了剧烈的价格波动，对鲜肉业来说尤其如此。但这项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主要有利于大种植业地带的大规模的经营者，对谷物种植者比对畜牧业者更为有利，而且它加剧了不同种类的生产之间、各类型的经营单位之间的不平衡，因而也加剧了地区间的差异。

结构政策

1960 年的法律和 1962 年的皮萨尼法的新颖之处特别表现在某种“结构政策”的要素上。它们的全面目标是：对农业收入进行补缺、并使其提高速度与其他部门的收入增长速度相仿，以此来实现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地位平等”。为达到这一目标，人们不仅试图改善维持价格的机制，而且试图“推动和促进某种家庭经营的结构，使其最大限度地利用现代生产技术和方法、实现劳动力和经营资本的充分利用”。因此这个目标与 50 年代国家青年农民中心的要求不谋而合。这种农业经营模式由两个劳动力来维持，其经营面积由“自然区域和作物或经营类型的性质来决定”。因此首先应促进经营土地的集中化。为此，根据农业指导法而设立了农村建设和地产规整协会（S. A. F. E. R.），这类协会通过对土地市场的干预来促进归并和扩大农业经营单位。此外，1962 年的法律还鼓励年迈的农业经营者引退，将他们的产业转卖给更为年轻的经营者。设立改进农业结构社会行动基金（F. A. S. A. S. A.）的目的就在于此，该基金向超过 65 岁的农业经营者提供一笔终身引退补偿金（I. V. D.）——如果他愿意将其产业转让给农村建设和地产规整协会或其他经营者的话。

898

最后，该法律还通过共同经营组织（G. A. E. C.）来促进农民的重新组合。尽管这一政策的倡导者有这么良好的意愿，但按照罗西埃的看法，农业结构只是有了“缓慢然而难以避免的地产集中运动，其得益者是那些已经居于优势地位的经营单位”。由于缺乏资金和政策上的连续性，农村建设和地产规整协会对土地市场的影响力十分微弱，它根本无法遏制土地投机行为，70 年代以后，投机行为使得“中等”经营单位的发展显得十分艰难。因此 70% 的农业经营单位面积仍在 20 公顷之下，土地集中主要发生在 20—100 公顷的层次上。另一方面，关于土地兼并的禁令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

共同农业政策及其后果

1962 年 1 月 14 日的布鲁塞尔协定使得共同农业政策成为现实。

这一政策几乎完全是有关市场组织的。它的目标是创建共同农业市场、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相互采购（集体优先的原则）；它同样旨在将农产品价格维持在保障农民的“公正收入”的水平上、并使价格与期望中的生产导向一致。因此这一政策的措施中有两个关键性要素：一是价格维持机制，二是针对第三国“不公正”竞争的“外部保护”机制。

这一欧洲价格维持体系涉及大部分的农产品（占农业总收入的72%）：谷物、牛奶和乳制品、牛肉、某些蔬菜和水果。它的基础是每年确定的指令性价格或指导性价格（牛肉）。在必要的时候，欧洲农业指导及担保基金（F. E. O. G. A.）的干预性价格将成为一种保障性价格，特别是对谷物、乳制品和牛肉。对众多不受这一价格体制保障的农产品来说，可以通过针对第三国的保护体系受益，以免受外部竞争的威胁。最后，像葡萄酒和糖这样的产品可以享有某种保护机制或特别资助。

上述政策的实施大大推动了共同体内部贸易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农业收入，但正如法国的国内农业政策一样，它也加剧了产品之间、不同类型的经营单位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可以说它尤其有利于大型农业经营单位。从 70 年代初，国际货币体系的紊乱局面进一步恶化，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等货币疲软的国家纷纷实行通货贬值或连续性的货币下跌政策，而德国和荷兰等货币坚挺的国家则实行货币升值政策，这对共同农业政策的运作造成严重的冲击。货币补偿金（“绿色基金”）的设立是为了避免因货币兑换率的
899
变动而对共同体内部的农民收入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事实上它严重扭曲了欧洲农业经济的成本和价格，它对德国农业极其有利，但损害了德国消费者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生产者、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农民的利益。

最后，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在今天受到多方面的严峻挑战：牛奶、牛肉和葡萄酒长期性的生产过剩，英国提出的新要求——它希望在维持其内部农业的保护体制的同时，也能以更有利的价格从

世界市场获得农产品——欧共体向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开放等等。

工业部门

能源，经济发展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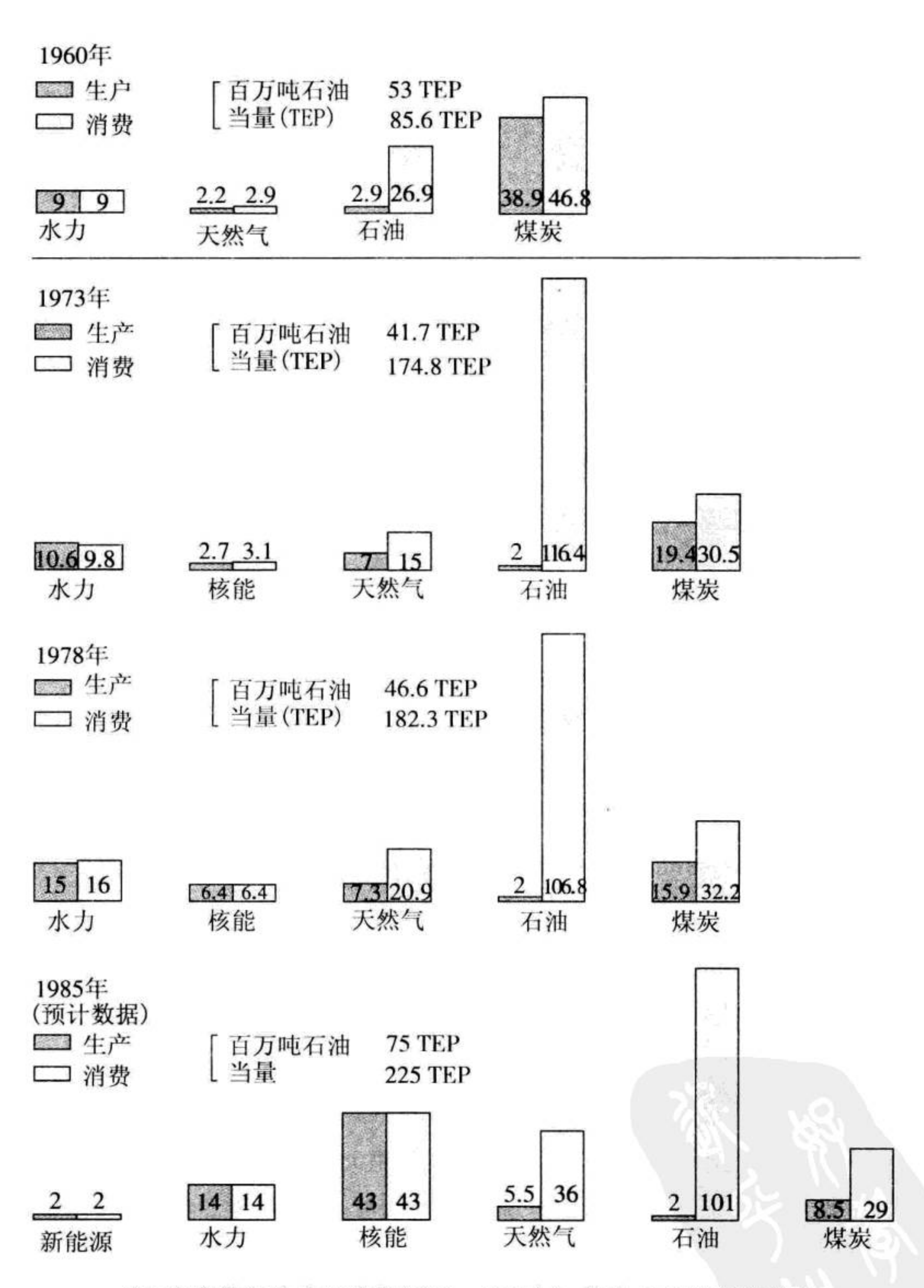
能源资源的扩充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发展。不过除此之外，能源也对物质福利水平有重大影响，因为它有众多的家庭用途，甚至能为交通、通信以及休闲活动的发展提供极为广泛的可能性。因此1973—1974年的“能源危机”不仅标志着法国经济增长节奏的一个断裂，而且标志着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方式的断裂。

1960—1978年，法国的初级能源消费，若以石油当量吨数计算，从每年8560吨增长到18230万吨，即翻了一番多，但同期原油进口量从2600万吨上升到10600万吨，即在数量上翻了两番。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看，1960年法国只进口了其初级能源消费量的41%，但1975年这个比例为75%，此后也一直维持在这个数字上。因此在1978年，法国3/4的能源消耗量依赖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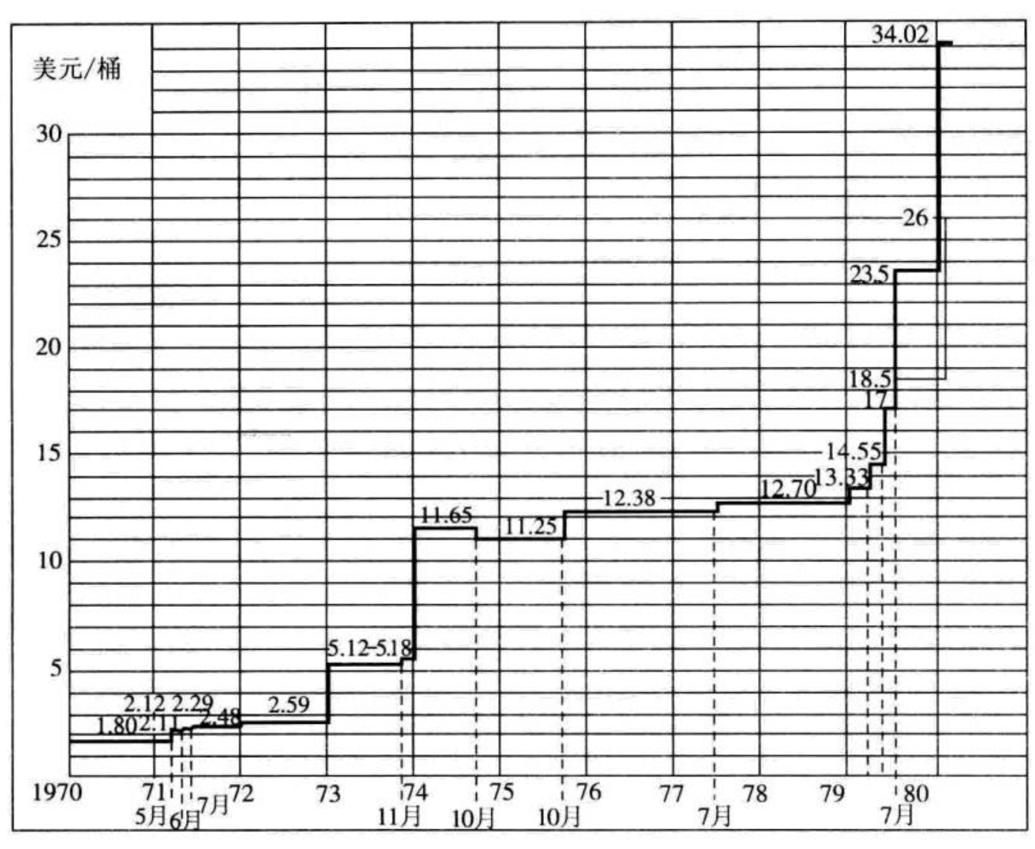
这种对外部依赖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从战后到1950年代，法国的能源政策是煤炭政策，1959年，戴高乐将军还声称：“我们决不要放弃煤炭”。为此甚至采取人为的措施将其他形式的能源的价格维持在可使国产煤炭能继续销售的水平上。

但是从60年代起，随着法国经济的开放，人们开始转向那些最为低廉的能源，以增强法国的竞争力。到1965年，法国开始实施代价低廉的石油政策。1958年到1970年间，在工业用途中，依靠燃油获取的每兆卡热量的价格，与同等热量所需的煤炭的价格之比从1.05降为0.58。自从法国煤气公司（G. D. F.）改用天然气后，法国的采煤业已经失去了在该公司的大部分市场，随后它又很快失去了在法国电力公司（E. D. F.）的各热电厂的市场。

900



法国初级能源生产及消费(1960—1985年)，单位：百万吨石油当量



原油价格上涨示意图(1970—1980年)

因此，煤炭产量在1958年达到6000万吨的高峰后，1978年已降到2240万吨——尽管1973年后曾采取过抑制生产下降的人为措施。在这期间，北方—加莱海峡、洛林和中南煤田纷纷转产，矿工人数大为减少，从1945年的35.8万降为1978年的6.9万。因此到1973年末，石油和天然气已经取得胜利，法国能够从国际市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获得这些资源，很久以来它便从国际能源市场上获益。实际上，从20年代起，国家已采取政策，创建有公共资本参与的石油公司，如C. F. P.，该公司曾从中东获取利益；1940年代设立了石油专营局，阿基坦国营石油公司，以及石油勘探局；1960年又设立U. G. P.（为了开发撒哈拉的石油）；这些机构在1966年和1967年合并为国营石油勘察和生产集团（ERAP-ELF）。最终，到1960年代末，不仅国家直接控制的法国公司在各产油国获得了坚实的利益，而且这些公司连同安塔尔集团控制了法国市场的50%，与设在法国的外国石油"巨头"（如

埃索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菲纳公司等）的市场份额相等。如果说这种石油政策导致了原油供应方面的严重依赖，但它反过来保障了法国在炼油及销售方面的某种独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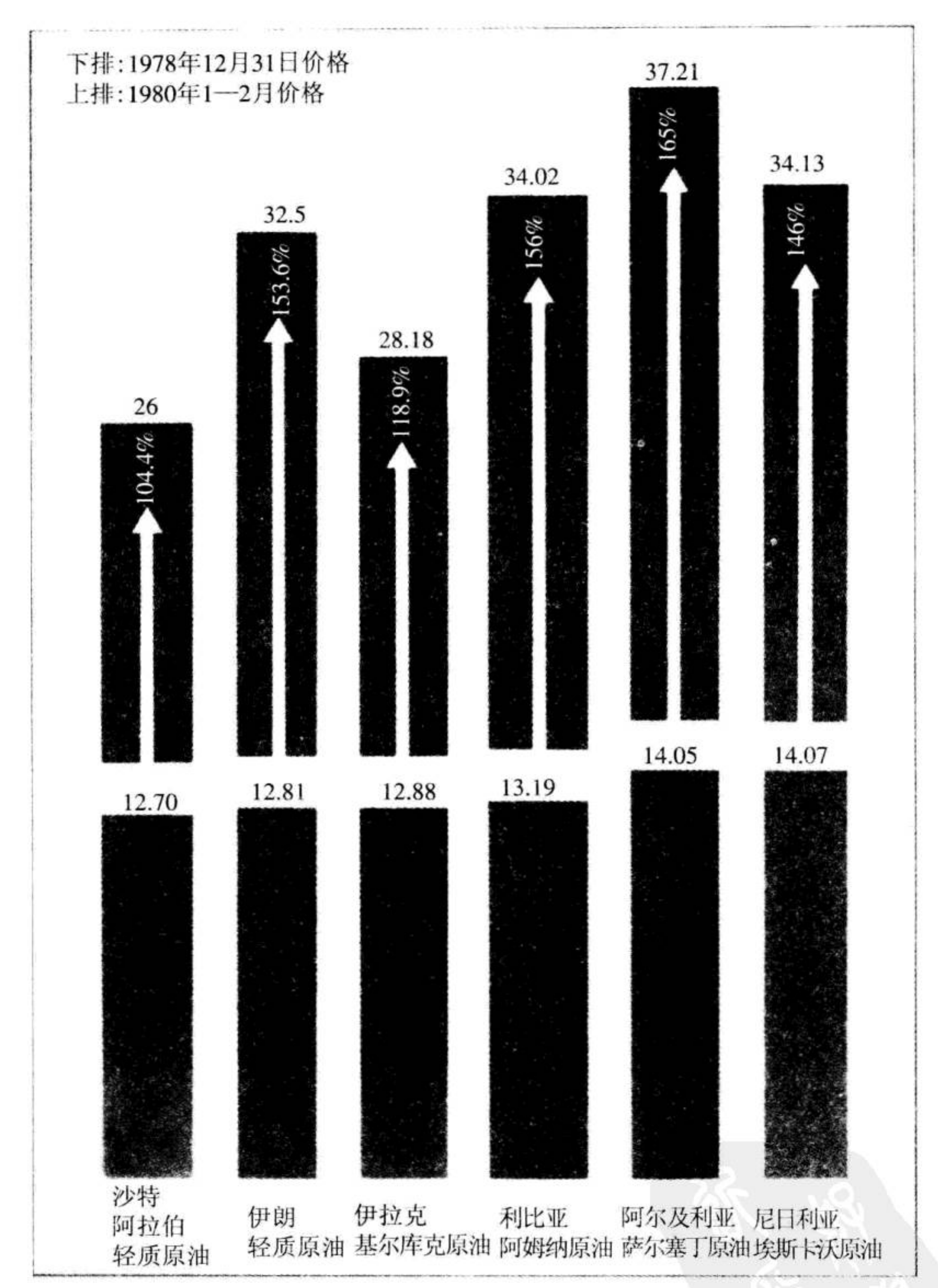
然而就在石油政策十分成功的同时，法国开始推行原子能政策。不过在这个领域，法国电力公司曾在电厂建造商的支持下，出于利润率的考虑而敦促放弃法国的原子能反应堆，人们认为法国的反应堆不如美国西屋公司的合算。因此原子能中心（C. E. A.）与法国电力公司的实验室及工业界之间的主要联系就中断了。此后，原子能试验就被推上了另一条道路，这就是研制增殖反应堆：1967 年在卡达拉什建造“狂想曲”反应堆，1961 年与法国电力公司合作在马尔库尔建造“凤凰鸟”反应堆。

“能源危机”鲜明地体现在如下方面：1972—1974 年，原油产量翻了两番；1972 年到 1979 年，以美元计算的每桶原油价格增长 9 倍（从 2. 598 美元增至 23. 68 美元），到 1980 年则涨了 13 倍。能源危机迫使法国的能源政策作出深刻的调整，这一政策调整以如下原则为轴心：

● 节能政策（1985 年节能总量相当于 3500 万吨石油当量）。它主要针对三类耗能大户：冶金等工业部门（总耗能量的 2/5）、住宅和第三产业（2/5）和交通部门（1/5），而农业只占最终能源消耗量的 2%。迄今为止，工业和交通部门主要的节能措施仍基本上是减少经济活动。但真正有效的节能方式应是工业技术的深入改造、新的建筑标准的实施、以及新的交通和城市化模式。事实上这就意味着法国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 国内能源资源的利用最佳化。1978 年，法国 1/4 的初级能源来自国内，人们期望到 1985 年把这一比例提高到 1/3。国内资源包括：

——煤炭。尽管各煤田恢复生产，但 1985 年它们提供的能源只占法国总能源消耗量的 13%，而 1978 年这个数字为 17%，原因是法国“技术上可开采的煤炭储量”已经枯竭；



1978 年末后石油价格的上涨（美元/每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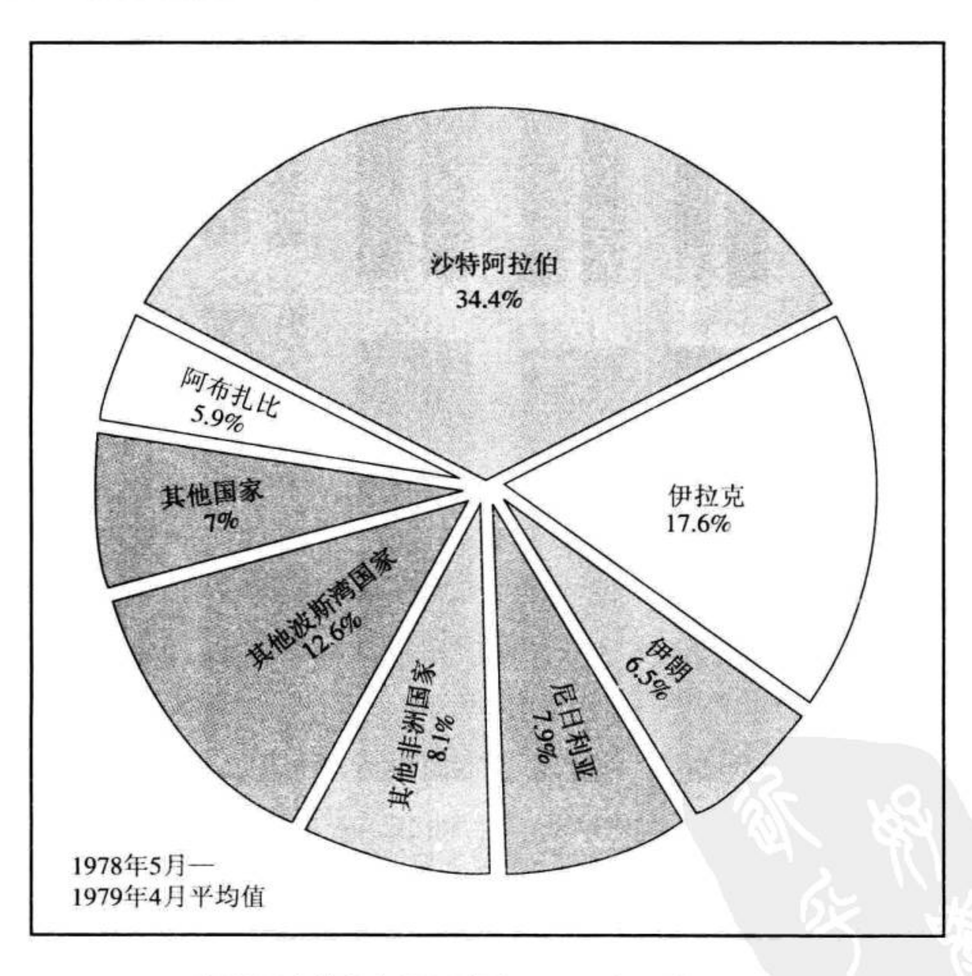
——石油。虽然在勘探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但这方面的产量

仅为 200 万吨石油当量，而进口的原油则为 11500 万吨石油当量（1978 年）。法国的石油估算储量（位于巴黎盆地和阿基坦盆地）为数甚少；

——天然气。虽然阿基坦气田的开采情况尚可，但十年以来，法国每年消费的 250 亿立方米天然气中，来自这个气田的只有 40—80 亿立方米，即不到 1/3；

——水能。1960 年在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例为 10%，到 1978 年降为 8%，等于 1500 万吨石油当量。按最近的清查，水力资源至多能为法国提供 2000—2200 万吨石油当量的能源，这个数字相当于 1985 年法国能源消费的 10%；

903



法国石油供应来源示意图（1979 年 7 月 17 日）

——各种新能源。但其前途各不一样。据估计，到2000年，它们总共能满足3%—4%的能源需求；

这样看来，至少在将来30年的过渡时期中，核能是法国获得较大的能源独立的主要解决手段。

核能发电量在电力生产总量中的比例，1963年为0.5%，1968年为3.6%，1978年为13.4%（相当于法国能源需求总量的3.6%或640万吨石油）。在80年代，核能提供了1950亿千瓦时的电力，占当时法国能源消费的近20%。

• 能源来源和供应来源的多样化（国内资源开发之外的）。这就要降低法国对某些能源和世界上某些能源产区的依赖程度。为此，1975年，法国决定增加天然气在初级能源供应中的比例（1973年为8.4%，1975年为11.5%，1985年为16%）。1978年，法国的进口天然气主要来自荷兰（103亿立方米，进口总量为174.5亿立方米），余为苏联（27亿立方米），阿尔及利亚（27亿立方米）以及北海地区（18亿立方米）。

另外，法国还扩大了煤炭进口，主要来源国是联邦德国（占1985年2500万吨进口总量中的870万吨），波兰（470万吨）和南非（670万吨）。而石油的情况则相反。尽管提出了供应来源多样化的政策，但法国的原油采购严重依赖于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量占原油进口总量的52%（1978—1979年），而五年前仅为40%。

铀的供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法国本土的铀储备不足，只能从中非共和国、尼日尔和加蓬大量进口。2000年实现铀的自给还只是期望。

法国发电站和核电站示意图(1978年12月4日)

格拉维林
4×900MWe
舒兹
1×300MWe
4×1300MWe
D.U.P.
巴吕尔
4×1300MWe
旁利
4×1300MWe
加特农
2×300MWe
D.U.P.
弗拉芒维尔
4×1300MWe
诺让
2×1300MWe
D.U.P.
蒙达雷
1×70MWe
当皮尔
4×900MWe
费森海姆
2×900MWe
普罗戈夫
D.U.P
4×1300MWe
勒佩勒兰
4×900MWe
D.U.P
圣洛朗德索
贝尔维尔
4×1300MWe
D.U.P.
比热
2×900MWe
2×900MWe
1×500MWe
希农
1×200MWe
1×500MWe
4×900MWe
D.U.P.en cours
克雷-马尔维尔
1×200MWe
圣莫里斯-圣阿布兰
2×1300MWe
2×1300MWe
克吕亚
4×900MWe
勒布拉耶
4×900MWe
D.U.P.
特里卡斯坦
4×900MWe
戈尔菲什
4×1300
MWe
D.U.P.
马尔吉尔
2×40MWe
1×250MWe



工业实力

1957 年签订的罗马条约对法国工业来说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几十年的保护主义政策和与尚未完全瓦解的殖民帝国之间的特惠关系使法国工业陷于麻木迟钝的状态。尽管经历了战后重建，尽管国家通过计划性手段、通过生产效率和公营企业公署来采取各种干预措施，但法国工业很少出口，基本上是为国内市场生产，而且这个市场因为受到保护而缺少刺激。因此 60 年代初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的加速实施为法国打开了一扇巨大的窗户，强劲的竞争之风终于吹了进来。从此，工业部门的重建就在双重动力的影响下快速前进：一个是国内和资本主义本身的动力，另一个是来自国家工业政策的动力。根据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的说法，“边境的开放使得法国工业投身于世界经济的运动战中”。确实，在石油危机前夕结束的第一次“战役”过后，法国工业已经在海外市场赢得了部分地盘。另外，在 1972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专家们为经济发展、特别是法国工业的发展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但这种乐观主义到 80 年代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经济危机不时显露出法国工业结构的失衡及其在世界市场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业绩的不稳定。在推行适应国际竞争的战略 20 年之后，为什么还有这种相对失败的表现呢？我们是否可以从近来的历史教训出发，预测一下法国工业的未来呢？

法国已成为工业强国了吗？

上面已经借助于几个总体指标对法国工业生产的体制演变的一般特点作了考察，这些指标如：工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各大工业部门（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中间产品加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建筑及公共工程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新增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它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各自的年均增长率等等；我们已经指出，装备工业和中间产品加工业表现优异，而消费品工业稍逊一筹。因此最近 30 年来，法国工业的转型特别明显。但这里还存在工业的内在业绩问题。要知道法国是否成为了工业强国，就应该与

主要的外国竞争对手作比较。我们既可以根据法国工业品在出口方面取得的或多或少的进步，从外部、在国际市场上与对手作对比，也可以根据外国产品在法国市场上渗透的程度，从内部进行这种比较。法国在国外的投资的分量以及外国在法国投资的分量同样是比较的一方面，因为一个公司或集团既可以选择出口，也可以选择在国外建立经营机构。稍后我们将对法国的外贸发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里我们考察的目的只限于更好地明确法国工业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相对地位。

工业与国际交换

根据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我们首先来考察从罗马条约到石油危机前夕这一时期。在 60 年代初，法国与工业化国家的贸易结构看起来就像是个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农业方面的贸易虽然实现了专业化，但出口的工业品是初级产品（电力、玻璃、铁矿石和冶金产品，如粗加工的金属等）和传统的消费品（纺织品、服装、皮革等）。906 第五个和第六个计划中的工业政策，主要目标在于发展装备工业和中间产品加工业。不过在这一时期，这些政策的成效并不明显。

"从 1959 年到 1972 年，法国在世界竞争中稍显落后。当然，逐步融入欧共体后，它在出口方面的业绩不错，这符合第六个计划的预期，但进口的增长更为显著，尤其是制成品的进口。

"在这一时期，法国制成品的进口对于贸易自由体制的敏感度要远高于出口。如果对产品项目进行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半制成品的进口有增长，但这并没有改善制成品贸易的格局。机械、电气、电子和化工等先进性技术工业只出口了其产品的很小一部分（1972 年为 1/4，化学工业为 1/3），出口量最多的工业与 13 年之前没有变化。

"因此法国的生产机制没有对其内在特点作充分的改造，以致当边境开放时，对外贸易也不能在地理和结构上作充分的调整，换言之，法国工业不能提高其竞争力。"

从经济危机开始到 70 年代末，上述情况是否有所改进呢？在这个问题上，斯托法埃斯的分析强调了危机对法国外贸的结构性缺陷的指示性效应，也就是法国工业的相对薄弱，它在其主要竞争对手之间

“备受折磨”，这些对手如：德国、日本、美国和新兴工业国或地区（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墨西哥、巴西，等等）。危机之后，法国工业与国外之间的贸易关系呈现如下特点：

—成套设备和耐用消费品（尤其是汽车）呈现强劲的出超趋势，但这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和东欧的出口快速增长的基础上的，而且过于依赖靠运气签订的“长期合同”（如核电站和武器出口合同等）；

——消费品的贸易状况加速恶化，1975 年这一贸易仍是盈余的，但此后就出现了赤字；糟糕的局面还表现如下：外国产品大量涌入法国市场（在耐用电气和电子消费品领域，如家用电器、收音机和电视机，照相机等，德国、意大利、日本的产品占垄断地位，在纺织品和皮革制品方面甚至更为严重）、法国产品丧失了在国际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的部分份额。不过，直到最近一个时期，法国在纺织业、服装、皮革、制鞋、农产品和食品工业方面相对来说更为专业化，但如今这些产业也已受到结构性的威胁。

相反，法国在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方面的地位与法国在农业方面的优势地位却没有什么联系。就是说，法国出口了过多的初级农产品。

——对中间产品而言，外贸呈现逆差趋势。尽管法国的企业高度集中，生产技术非常现代化，但除了玻璃业外，它们与德国的企业相比并没有什么分量，尤其是在冶金和化工方面，非铁金属产品的情况稍好。

——在装备工业（包括汽车和军工）方面，法国明显已赶上德国。不过，这一行业内部呈现出反差的局面。汽车工业的成就很显著。

——在专业化的成套设备领域，专业电气和电子设备已经达到在全球进行竞争的水平。相反，同德国在工业车辆和机床方面的贸易赤字却有增长。

907

——危机之后，机械工业在出口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这些成就过于依赖某些重要工厂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造船业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

——此外还有高技术复杂装备，如武器、民用和军用电子设备、

民用和军用航空器、核燃料循环设备（核燃料浓缩和再处理设备等），以及电信、航天设备和信息技术（但这后三项要稍逊一筹）等；法国在这些领域占有牢固地位，但得益于国家持续性的、大规模的支持。

斯托法埃斯最后评论道，"总起来说，法国工业没有充分利用一个发达经济体系的天然优势，没有最大限度地开发其高素质的劳动力，没有很好地利用其整齐的工业组织"。

怎样解释如此不尽如意的成就呢？经常提到的几个原因是：工业集中化程度不高，劳动力价格过于昂贵，生产性投资不足，研究和开发事业过于薄弱，税收压力过重，国家支持不力等。

但事实上，对法国与欧共体、甚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竞争国之间的比较研究表明，上述大部分论证并不十分可靠。

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普遍高于法国。这一现象还因下面的事实而更加可信：20 年来，法国工业的一个特点是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移民和妇女）。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大部分成员国（美国和日本除外）的总体税收负担也高于法国。虽然法国在研发力度（相关的人均支出）上远远落后于美国，但这方面它在西方国家中仍是最领先的之一，不过，法国的研发工作以尖端技术为导向，而尖端技术的应用并不总是可靠的，因而这一政策导向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战后各种形式的国家资助（公共市场、补贴、优惠贷款等）实际上一直很可观，它是工业政策的支柱之一。

最后，在生产性投资方面，所有研究都证明，法国的表现十分强劲，特别是从 60 年代到经济危机之前资本加速集中的时期；总的说来，法国生产投资的增长同所有主要工业国一样快，或者更快，而且增长一直是最稳定的。因此还剩下一个关键问题：法国企业的集中程度真的不足吗？

法国工业的结构重组

根据贝隆的说法，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结构重组发端于七月王朝时期，当时随着以银行为源头的金融资本的初步形成，大资产阶级与国家之间结成了特权同盟。在以后的岁月里，特别是从 1958 年至

今，这种与银行机构和国家机器的双重联盟一直是工业的结构重组的特征。

直到最近一个时期，银行业之外的集中主要涉及冶金业以及化学工业，后者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推动，组成了四大集团：圣戈班、佩西内、罗讷-普朗克和库尔曼集团。另一个特例是石油工业集团，它们或是来自外国的集团，或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起来的法国公营企业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改变这一局面，但到1945年，其它工业中仍主要是中小型企业。不过，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由于国家工业政策以及国际竞争和外国资本涌入的多方面影响，工业机构有了深刻变化，当然，如果从金融（集团化）、经济（企业经营）和技术（设备）三个角度看，各部门的情况存在差异。从1950年到1958年，工业的集中化行为为数甚少，而且主要牵涉小企业；但1958年，随着边境的开放和非殖民化进程的结束，工业集中局势出现了转折。随后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加速期，一个是1964—1965年，而1967—1973年更为突出。最后，经济危机和“经济战”的加剧再次触发了大范围的集中，这主要涉及国际企业集团或有跨国抱负的集团。

908

如果从技术集中的层次来考察，即考察生产单位、工厂或设备的集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集中在60年代资本积累加速的时期有了重大发展，比经济危机的那些年要快。技术集中的表现是：小型企业（10—20名工人）迅速减少，生产普遍集中于中型企业（200—500名工人），大型企业（1000名工人以上）有了少量增长。

若与其他各大工业国相比，法国用工人数超过50人的生产单位的增长速度不如德国快，但法国的增速可以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拟，即便不是更快的话；同样，在所有先进国家、主要是在装备工业和中间产品加工业部门（非铁金属、电气制造、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玻璃、化工和冶金等部门），大工厂的规模都呈现统一化的趋势。看来企业规模是服从技术需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集中的层次上，即企业或法律上的经济单位的层次上，手工业的消失、各部门中地方企业的集中是

个很明显的趋势。因此在60年代，雇佣工人超过1000人的大企业在企业总数中的比例明显上升。除此之外，个体小企业的数量下降，尤其是在纺织、服装和木材加工业中，但建筑和公共工程部门并非如此。看来下述情况有扩大的倾向——甚至在经济危机过后仍在继续：最为集中的部门更加集中（如汽车、造船、飞机、炼铝、军工），但过去集中程度很低的部门的集中化进展很小（如服装和木材加工）。在60年代那些已经实现集中化的部门，我们可以看到寡头垄断的强化，因此像美国一样，在70年代，法国某些行业中四大公司的营业额占该行业总营业额的90%以上（汽车、炼铝、平板玻璃、汽轮机等）。

但法国工业的结构重组在金融集中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集中在最近20年中（1960—1980年）体现在集团化的层次上。这种集中形式是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演变的典型，它不仅与体现在第五、六、七个计划中的政策意愿相一致，而且特别与国际和国内金融及工业集团的战略相一致，这些集团因为争夺世界市场而彼此竞争。这种结构重组前后经历了几次浪潮：第一次是在1958—1965年期间，主要体现在法国前500家集团的经营活动的重新组合上。第二次浪潮是在1966年到1971年之间，这一时期的金融集中加速发展，大部分部门都出现了大型的工业集团。第三个时期——1971—1977年——是个新的“阵线调整”期，各集团进行了内部重组（如合并子公司等）。第四个阶段开始于1978年。这一时期的结构重组与生产性投资迅速减缓所导致的流动资本集中联系紧密。换言之，这些集团不是优先采取以投资实现内部增长的方式，而是再次采取通过兼并或价格控制达到外部增长的模式。

909

可以举几个最近的例子：标致－雪铁龙收购克莱斯勒欧洲公司（1978年），阿加什－维罗集团兼并布萨克集团（1979年）；在农产品加工业领域，威廉·索兰集团受勒希尔集团控制（1979年）；在钟表行业，雅兹公司控制了耶马（1979年）；在纺织行业，坝迪控制了拉博纳尔；在造纸业领域，贝尼奥尔－法尔戎集团与布拉齐·孔泰·吉尔贝公司合并……

法国工业的金融集中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特征：它具有社会性后果（关闭和拆迁工厂、裁减人员等），各集团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规模（市场占有额，集团规模等），有时引起轰动效应的运作模式（公共采购）；尽管有上述特征，但与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结构中的同类集中化进程相比，法国的金融集中化力度显得相对薄弱。可以通过两组数据来证实这一点：一组数据是法国最大的集团与其国际竞争者之间在实力上的对比，另一组是有关法国的工业集团的国际化程度。

根据《财富》杂志的统计，全球50家最大公司中（以1977年的营业额为准）——全部是“跨国公司”——法国公司只有5家：雷诺（第22位）、法国石油公司（第24位）、标致－雪铁龙（第33位）、埃尔夫－阿基坦（第46位）和圣戈班－蓬塔穆松（第50位）。在世界前20家大集团中没有一家法国集团，而1400万人口的荷兰却有3家，德国则有4家。

在法国的20家最大公司的名单中，可以指出几家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真正有分量”的企业：在汽车工业领域有雷诺集团和标致－雪铁龙集团，尤其是在后者收购了克莱斯勒欧洲公司后（但这家被收购的公司不包括在名单中）；在石油领域有法国石油公司和埃尔弗公司；在玻璃和建筑材料行业有圣戈班－蓬塔穆松公司和B. S. N. －热尔韦－达能（它同样是专业化的食品公司）和拉法基公司（水泥）；在炼铝业中有贝西奈－犹齐纳－库尔曼基公司）；在飞机制造业领域则有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国营）。

相反，这里列举的法国公司中没有一家在化工（德国企业占支配地位，如霍希斯特公司、巴登苯胺苏打公司－BASF、拜耳公司）、冶金（德国和日本公司居于垄断地位）、电子和电气制品［美国、荷兰（飞利浦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AEG-Telefunk-通用电气公司）］、机械（日本公司占主导，如三菱）、信息技术（美国企业占垄断地位，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等领域“具有影响力”；在造船（日本占支配地位）和纺织（英国占主导，如库托尔德公司）领域甚至没有法

国公司上榜。

很显然，这些公司“没有什么影响”（这里只是以营业额的规模来衡量的）不意味着它们在经营上的业绩（增长率、盈利率、特别是海外销售的发展）就不出色，而是说这在国际市场的无情斗争中是一个不利因素。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法国工业集团在国外的拓展。若以销售业绩来衡量，各集团的对外发展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从本土向外出口以及直接在国外设立分公司。很多时候这两种形式是联合采用的。

雅尼娜·高昂曾对 14 家企业集团进行过研究：罗讷－普朗克、P. U. K.、米其林、S. G. P. M.、鲁塞尔－武克拉夫、电力总公司、汤姆逊－布朗特、Air Liquide、克勒索－卢瓦尔、欧莱雅、标致－雪铁龙、雷诺、拉法基、B. S. N. －热尔韦－达能；各石油及冶金业集团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受到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研究的结果是：1977 年，9 家集团一半以上的营业额是在境外实现的，而 1973 年这样的集团只有 4 家。在同一时期内，14 家集团中，有 11 家在境外的营业额的比重增加了。只有雷诺、B. S. N. －热尔韦－达能、拉法基三家在海外的销售额有下降。

如果我们观察各家集团分别在国内和国外营业指数的增长（以 1973 年为 100），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家集团外，其他 11 家在海外的销售额增长要明显快于它们在法国销售额的增长。正是由于在海外的业绩，这些集团仍能在危机中维持其总体销售指数。而且，对大部分被研究的集团而言，海外分公司的销售额增长比向外出口的增长更快。因此这一现象突出地反映了法国大工业集团的跨国化和组织上的调整。

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外国的集团也并非无动于衷，它们也打入了法国市场，或是通过出口——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或是通过在法国设立分公司（收购或新投资金创办的）。虽然美国公司一直存在（如 IBM、通用电气、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埃索、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但进入法国的外国公司主要是欧洲的：荷兰（壳牌公司、

联合利华、飞利浦公司等)、瑞士(雀巢公司、汽巴嘉基等)、联邦德国(霍希斯特、拜耳、西门子等)、比利时、英国(BP、ICI 等)。

外国企业渗透最深的行业依次为:办公设备和信息处理设备制造业,石油天然气生产,农业机械制造业,综合化工,铁矿开采和加工,多种金属生产,制药工业,淀粉制品加工业,精密工具仪器制造,基础化工,家用和专业电子设备制造,等等。

虽然近几年来法国工业的结构重组在加速,虽然海外发展的成就有时也颇为可观,但总的来说我们只得到一个虚弱的印象;法国工业的强势和它的缺陷通常互相抵消掉了——这种局面过于普遍,严重的不利条件依然存在: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力量不足,海外发展过分局限于某些领域,外国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过于剧烈。谁该为这些难尽人意的局面负责呢?是决定工业政策的国家,还是实施工业和金融战略的集团?

计划措施和工业政策

从第五个计划开始,国家在致力于重组公营工业部门的同时(对石油勘探和生产集团以及法国化工公司所属煤矿的集中、对雷诺及航空工业公司的重组等),对法国工业的关键部门也给与了必要的推动力;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如下事例:国家和冶金业之间的协议(1966年到1970年),第一个计算机国产化计划(1967—1971年),造船业的专业合同(1968年),大规模的航空工业计划以及空间计划(1969—1970年)。这些重要的结构重组计划以重大的直接或间接财政措施为辅助,但除此之外,国家还通过有利于投资、企业联合、开拓国际市场及有价证券流通的税制来促进工业发展。

因此20年来,国家在工业结构重组中扮演着公开和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还有什么可责备它的呢?斯托法埃斯提出了三点批评:

——“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国家的经济政策有明显的提供方便的色彩:持续不断的推动措施、货币发行的宽松、无节制的通货膨胀、“竞争性”的通货贬值——如果说这种贬值举措短期内能改善法国企业在欧洲市场的地位,但它同时也使得各企业没有必要采取“本应采

取”的持续调整的努力；

911　——“对变革的某种阻碍态度……对于农业、煤炭和铁路等受发展形势所迫而进行调整的部门进行普遍的支持，这就分散了资源，对工业不利”。在斯托法埃斯看来，这样做的代价“也许就是导致失业人口维持在150万以上，国土规划整治政策屡遭质疑，那些本应以十年而不是三年为支持期限的众多促进政策同样如此”；

——“工业结构的集中化努力尽管产生了一些财政上十分强大的集团，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工业企业会推行部门协调的战略（化工、冶金）”。相反，法国存在“某种与世界市场缺乏联系的中小企业网络，这些企业不具有德国或日本的国际商业公司的组合形式（它们1500家企业的出口额相当于法国5万家企业的出口……”

而科塔则认为，“法国为那些竞争力十分可疑的高档产品而牺牲了其工业体系”；于是这就再次对戴高乐的大型计划（如核武器、航空和航天计划）提出了质疑，它们占有了太多的资源。

但米斯特拉尔的意见相反，“法国工业的薄弱远非是由出口发展不振造成的，原因毋宁说在于外国生产者对法国市场的占有份额不断增长。因此应重新占领国内市场，首先是在投资领域，而且理论上说这不排除采取有选择的保护主义政策”。因此这是宣扬某种“专断”的供给政策，国家在这一政策的各个层次都应发挥影响。

金融力量和工业

贝隆认为，“一些集团可以说是金融性的，因为它们集中了对工业、商业和金融进行干预的重要实力（如罗斯柴尔德、昂潘－施奈德、苏伊士、巴黎巴、拉萨尔等）”。因此，工业集中只是范围更为广泛和多样的金融资本集中化的一个可见的方面。在圣戈班－蓬塔穆松、罗讷－普朗克、施伦贝格或贝西奈－犹齐纳－库尔曼这样的集团背后，都存在某种有组织的关系网，后者在重大战略决策（如合并、收购、控制和结构重组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关系网的核心越来越多地出现“大财团”之类的合作者，尤其是苏伊士和巴黎巴集团，这些财团都有错综复杂的联系网络。

为什么这种联系有日益增多的趋向、从而使金融集团对法国的工业产生重大影响力呢？因为证券市场成效不高、工业集团自筹资本的能力降低（与资本利润率下降和新增产值的分配比例不利有关）使得银行的长期信贷越来越必要。从这时起，银行不再是单纯的资金投放者，它在确定金融发展战略方面成为积极的合作者。当然，某些工业集团曾吸收或自己创办了银行机构。这样的集团如马里内·文德尔（德马齐银行）、米其林（私营动产和工业银行）、达索（凡尔纳银行）、P. U. K. 和法国石油公司（化工信贷银行）、电力总公司（电力银行）、标致（金融银行）、汤普森（电力金融银行）、D. N. E. L.（电力金融银行）和雷诺（不动产及金融银行）。

但另一方面，又有多少工业集团，由于其债务、为了参与防御或进攻性的国际化重组而陷入金融依附网呢？

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

912

服务业的功能有时被分为两大类：可以直接实现“人员的增值”的功能，“为组织或企业增值”的功能。

与第一类功能相应的服务业的目标是，“通过满足个人的教育、健康、信息、安全、流动（交通、旅馆业）、通信、信贷、卫生、休闲娱乐等需求来改善他的福利水平”……这些需求还包括“家庭消费的食品和工业品的运输、储存和分配（销售或租赁）及其消费过后的清理”。我们这样的社会是靠税收来维持的，并且完全或部分地依靠公共管理才得以运转，这种情况下，某些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反过来，这些服务是人的基本需求，但后者可以毫不迟疑地从市场上获得之，如食品和工业制品。于是大部分的服务可以分为两个领域：“商品性服务”和“向个人提供的非商品性服务”（但也有可同时涉及这两个领域的服务：医疗健康，教育，社会救助和社会行动，娱乐、文化、体育服务等等）。

使企业或组织增值的服务，其目的在于“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优势来协助组织或企业更好地经营，或取代组织或企业的某些职

能”。这样的服务我们可以列举如下：交通运输、仓储、商业、信贷、保险、职业培训、物品租赁、大众饮食业等……此外还有广告、安保、国际过境的组织安排、工程设计、信息情报、研究咨询、临时性劳务的提供，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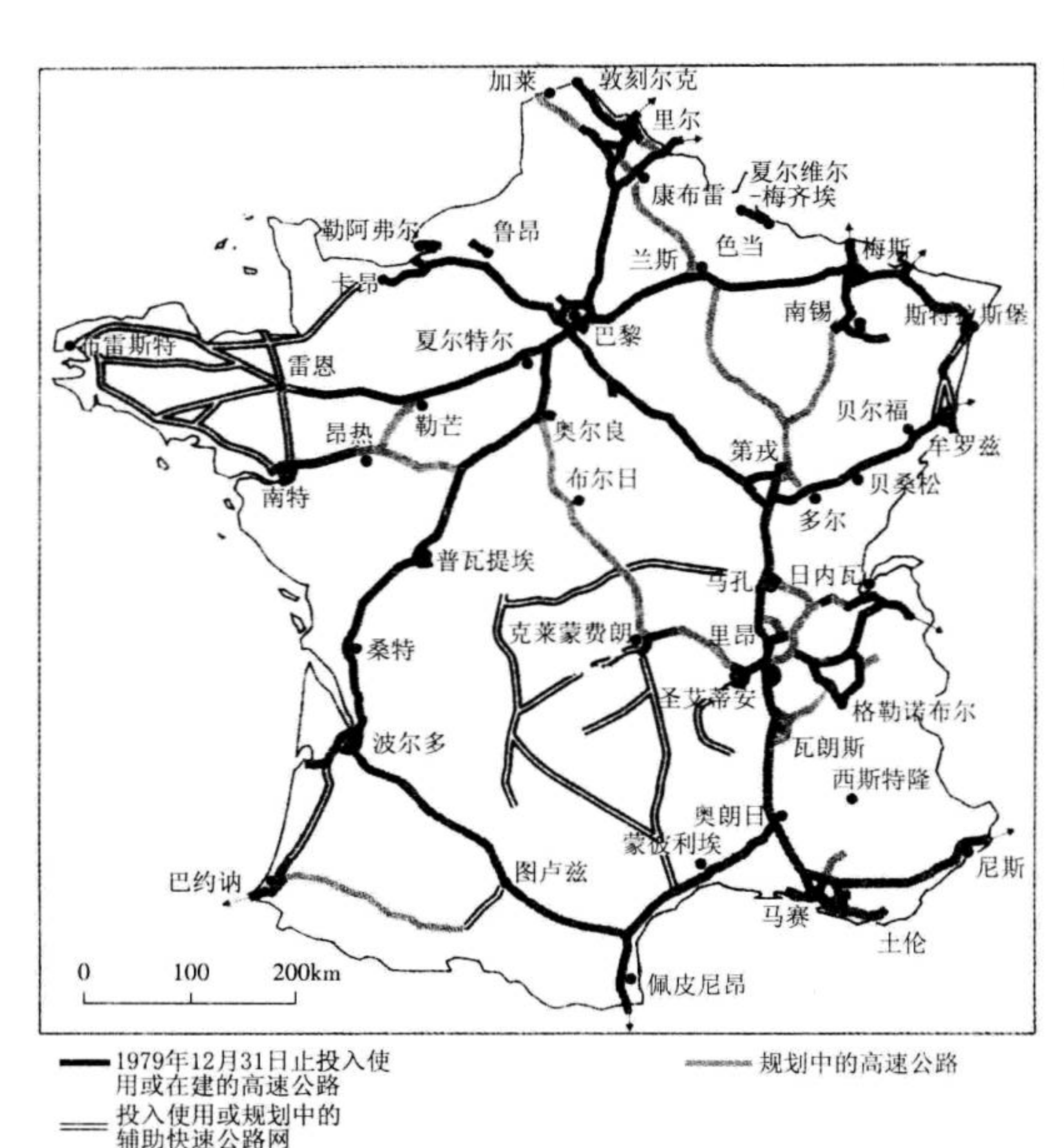
这些服务中，有很多以前是工业企业的业务范围。不过到今天，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把这些业务托付给了第三产业，这也能部分地解释第三产业的扩张、以及工业部门在就业人口方面与其它部门相比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同样，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瑞士和德国这样的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低，因为它们与法国不同，很多第三产业的功能仍被纳入第二产业的企业中。

因此，功能范围的扩大是战后“服务业”迅猛发展的原因。

1946 年，第三产业的从业者实际上只占总就业人口的 46%。到 1977 年，这个比例为 53%，即从业者约为 1100 万，而 1980 年的比例更上升到 61% 左右。另外，从 1962 年到 1975 年，在 370 万个新增的就业机会中，有 280 万个是由第三产业创造的，占总数的 3/4。如果以工薪劳动岗位来推算，从 1974 年 1 月 1 日到 1978 年 1 月 1 日（即经济危机期间），农业中的工薪劳动岗位减少 8.2 万个，工业减少达 51.4 万个（!），而服务行业则增加了 45.44 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最多的部门为“多样性服务业”、国家民事部门、商业和银行业。虽然这种发展经常被视为不健康的，但它完全可以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成员国的同类业绩相比拟。

第三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也以同样的幅度在增长。1976 年，新增产值总额的 55% 来自第三产业，这个比重堪与其从业者人数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份额相比。

如果对各服务行业作更为准确的考察，我们会注意到，若以从业人数为标准，从 1954 年到 1975 年，增长最强劲的行业是银行、金融保险业（+158%），“其他服务业”、电信和公共管理部门（+68%）；随后是商业（+36%），交通运输（+15%）。但家政服务业出现了负增长（-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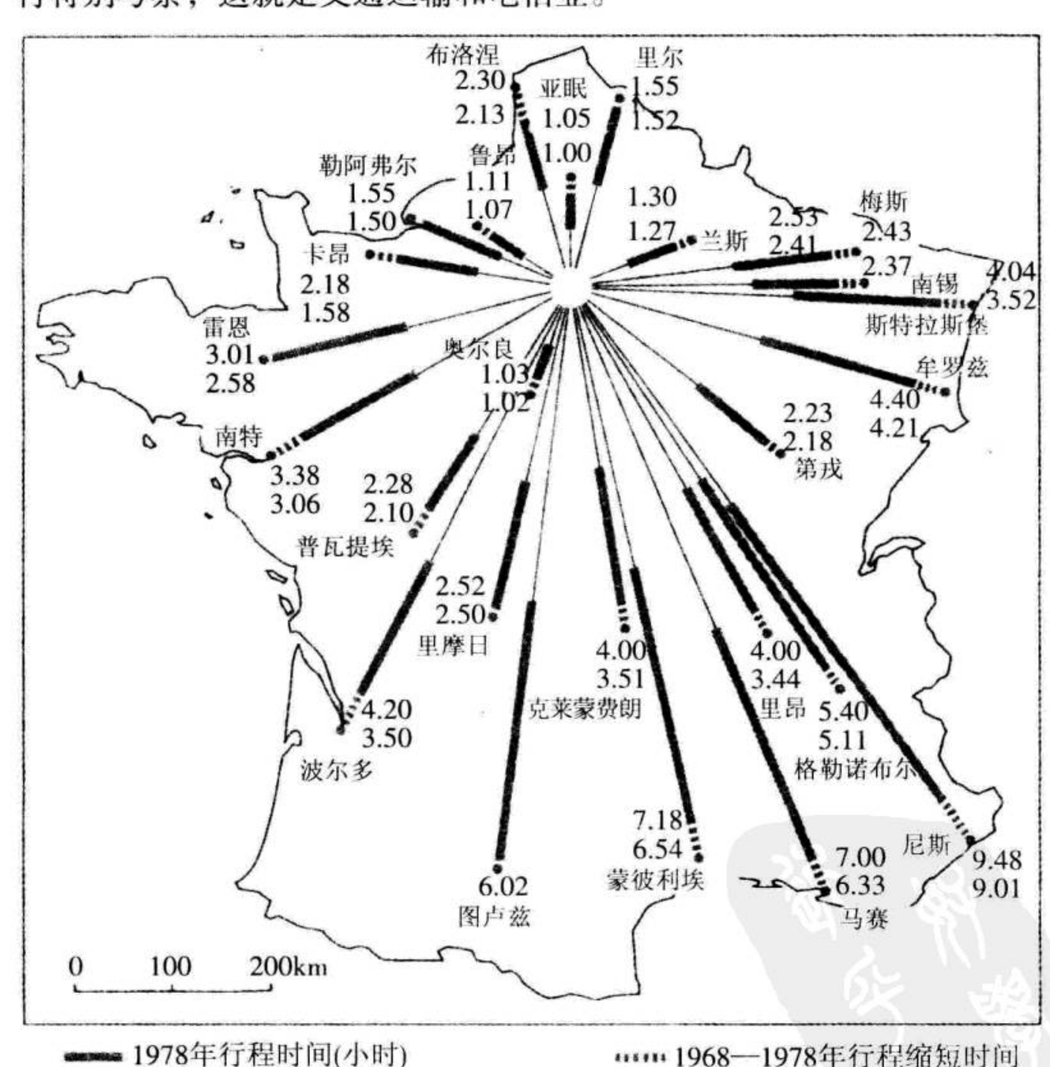
我们还应强调两点变化。第一是第三产业的女性化。总体来看，妇女占总就业人口的36.64%，但在第三产业，这个比例为47.35%。66%以上的妇女在第三产业工作。

以下行业中妇女从业者所占的比例更高：医疗服务（79%）、办公文秘（65%）、商业职员（60%）、教师及脑力劳动行业（超过50%）；不过在工程技术人员、高层管理干部等领域，虽然妇女比例增长更快，但她们所占的比例较低。

最后，还应注意到第三产业在对外收支平衡中的贡献。它的作用很重要，不过常被忽视。1976年，服务业出口达420亿法郎，若包括

旅游业则为 580 亿，为商品出口价值的 21%。主要的出超行业基本上是为企业提供商业服务的部门，而不是旅游业，后者的收支状况刚好维持平衡。这些服务行业根本上说代表了先进工业国的“技术能力”，它们的发展非常快（与商品出口同步发展，1970—1976 年增长了 168%），而且它们的出口实际上关系到商品、特别是成套设备的出口。这就意味着，这些服务业是与先进工业国在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专业化优势相对应的。

914　我们将对一个与法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空间变迁有关的服务行业进行特别考察，这就是交通运输和电信业。



1978 年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旅客运量图

交通运输和通信手段的重大变革

像能源一样，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发展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正因为如此，这一行业才在纷纭庞杂的第三产业中占据优先地位。

客运

客运的演变，特别是近十来年的演变的一个特点是个人交通的迅猛发展，而公共交通则有所下降。若以1959年的基数为100，那么到1966年，每个法国家庭用于个人交通的开支指数为220，公共交通开支指数为123。虽然经历了能源危机，法国人对于个人交通的偏爱——实际上就是对于汽车的偏爱——到今天仍很明显；由于这一现象涉及市内交通、国内和国际交通，因而其后果也就各不相同。

运送同等数量的人员，私人汽车所需道路面积是公共交通的4—5倍。从大城市、甚至较小城市市中心的每平方米的道路价格来看，很显然，私人汽车应该无法长期与公共交通竞争。在今天的大城市，路政开支已经是引起公共债务的主要原因，这不利于其他设施的支出。915 但是，公共权力机构或地方官员，或是出于选举方面的考虑，或是为了不开罪于汽车制造商及其众多的同盟者，因此不能利用恰当的时机推行严厉的管制措施或课征税收，以此来限制市内汽车交通。于是私人汽车的平均速度比20世纪初的马车还要低，空气污染有时竟达到警戒线，合法的和违章的停车导致公共空间几乎全被侵占。

在跨城市和跨地区交通方面，汽车交通最近20年来有了惊人的发展，而且，鉴于法国人一般的收入增长速度、鉴于像住房这样的家庭优先性投资的滞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样的发展是过度的。正因为如此，法国的汽车保有量从1962年的700万辆增加到1977年1900万辆，100个居民有汽车35辆。

1960年的交通流量为每天8800万车次/公里，1977年流量增加到55亿车次/公里，即单是轻型机动交通工具的运量就达到4370亿人次/公里。道路交通的增长是与道路网、特别是高速公路网的发展相关

的。1971 年，法国有高速公路 1600 公里，1979 年末为 5000 公里，另有 1100 公里在建。

在这种局面下，铁路要想维持自己的地位就有很多困难了。不过它也有自己的优势。在假期的时候，铁路是唯一能在两三天内保障数百万法国人出行的运输方式，而且这种情况每年有好几次。只有铁路能在每天的交通高峰期保证 130 万巴黎郊区居民的往返（仅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运量）。从里昂到巴黎的行程，高速列车只需 2 个小时，因而这条线上的航空运输就被排挤了。1978 年，市内交通每年的客运量为 4. 31 亿，总计 74. 6 亿人次/公里，另外还需加上巴黎独立运输公司（R. A. T. P. ）的 20 亿旅客（94 亿人次/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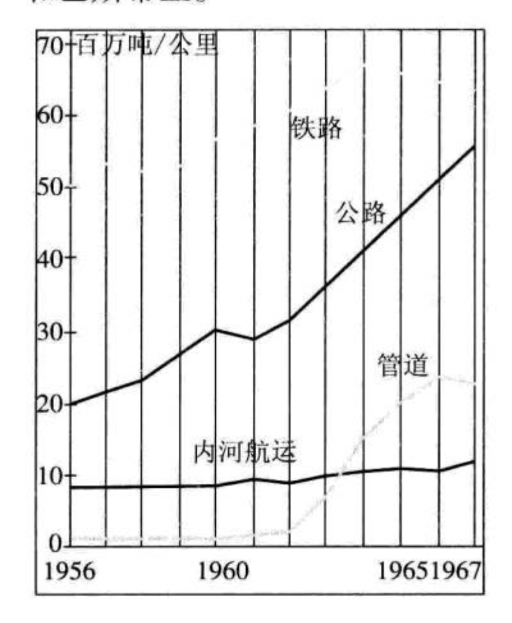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 N. C. F. ）的非市内交通的旅客运量为 25300 万旅客，合计 460 亿人次/公里。不过，1978 年，市内和非市内公共铁路交通总计才占私人汽车运输量的 14. 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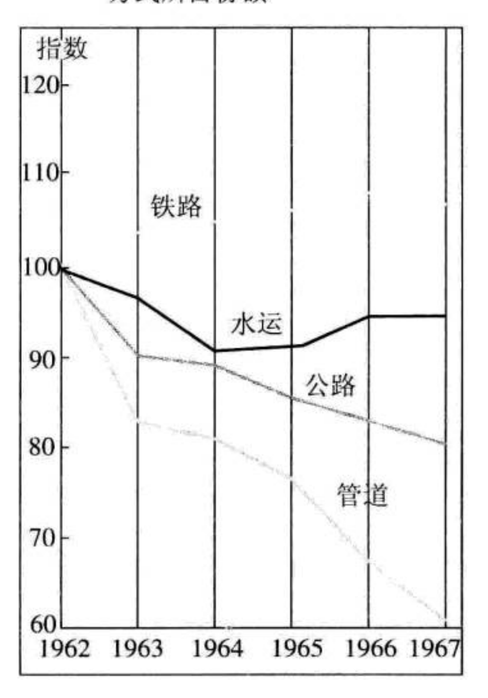
法国国内航空公司最初是银行家、运输业主、法国航空公司和国营铁路公司发起创办的，并且得到政府和地方团体的支持，这家公司有三个目标：为国土规划整治服务、连接落后地区及其他交通工具运量不足的地区，以及普及大众航空运输。1960 年以后，国内航空运输不断增长，客运量从 1960 的 1. 6 万增长到 1968 年的 200 万，1978 年达到 800 万，合计 54 亿人次/公里。不过，作为大众型的交通工具，飞机还不像美国或苏联那样普遍，在后两国，飞机运费并不比法国的二等铁路客运价格更高。其中的原因显然在于，较之这些幅员辽阔的国家，法国的航空网要小得多，旅客平均旅程也短得多。到 80 年代，选用航空为交通方式的法国旅客不足 4% 。

最近 20 年来，飞机真正显示出其优势的是在国际交通领域。从 1963 年到 1978 年，在法国的飞机场登机作国际旅行的旅客数量从 300 万上升到 1700 万。1977 年，法国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运输公司（U. T. A. ）的国际运量为 245 亿人次/公里（旅客总数超过 1000 万）。另一方面，海运在 1958 年的旅客为 250 万，1977 年达到 600 万，但若扣除与科西嘉岛的交通（1967—1977 年间年均增长 7. 4%）则只有

320万。主要的海运通道是加莱、布洛涅、马赛、勒阿弗尔、迪埃普和巴斯蒂亚。

916





各种货物运输价格的成本

货运

货物运输的分布状况要比客运远为多样，它不仅与不同运输手段的速度和灵活性（能否直接送货上门）有关，而且尤其与各自的运输价格有关。

从产值上说，铁路货运在货运总量中的比重从60%以下降到1978年的34%。铁路运输地位下降的第一个原因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它几乎垄断了货运，但现在这一垄断已经消失了。水运曾是其传统的竞争对手，不过20年来水运很少有增长；但除此之外，铁路

917

不得不面临着公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且1962年之后，它还受到输油管的挑战。1960年，输油管和其他管道运输的货运量只占1%，但1978年提高到15%左右（过境运输包括在内）。

公路运输1956年时只占20%，1978年达45%（如果排除输油管的过境运输和国内水运，这个比例将会更高，约为50%）。另外，在前些年经济危机时期，我们可以注意到，公路长途运输（400公里及以上）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也对国营铁路公司及水运的专业化运输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应该仔细分析一下公路在竞争中胜利的确切原因。这些原因在于，铁路负担着双重重负：高昂的固定运费和因公共服务带来的扭曲效应；而在汽车运输商和车辆制造商的压力的影响下，公路运输业主实际上没有负担任何基础设施方面的开支以及社会成本；这种情况对整个运输业产生了不利影响。1961年，铁路和公路的协调措施被取消，于是引发了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形势完全有利于公路运输业主和车辆制造商，而不利于整个运输业集体。正像我们的各个邻国、特别是德国的情况所充分显示的那样，没有哪个工业大国能抛弃运输业的协调政策。

1962年后，输油管运输成为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在国际运输领域，碳氢化合物和天然气同样也复苏了整个海运行业，并由此复苏了造船业。由于碳氢化合物和天然气运输的刺激，港口运输量从1959年的8200万吨上升到1968年17500万吨，1977年则达3亿吨（国际运输、国内海运、过境运输和转运）。马赛及其附属港居于首位，达1亿吨，随后是勒阿弗尔（8000万吨）、敦刻尔克（3350万吨）、鲁昂、南特－圣纳泽尔及其附属港（后二者均为1700万吨）。

石油产品一项就占了海运总量的70%左右。某些港口，如马赛－福斯和勒阿弗尔，这个比例高达85%。

航空货运业务尽管一直在发展，但它在运输总量中的分量仍可忽略不计：1975年的运量为2.8亿吨（为1969的9倍），但只相当于国营铁路公司国内运量的1.4%。不过若以吨公里运量计算则已达到数

亿吨公里（最近几年）。从国际联络的角度看，航空货运的地位很重要，因为今天大部分的邮政运输是由飞机来完成的（1975 年为 4.2 万吨，是 1948 年的 20 倍）。最后，就法国的外贸发送量来说，虽然飞机的运输吨位无足轻重（低于 0.2%），但它在价值上却很可观（占进口的 10% 和出口的 12%）。

能源危机打乱了各种运输方式在价格上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到，始自 1974 年，个人交通的价格指数及公路货运价格指数明显大为提高。从逻辑上说，这应能促进公共客运的发展、抑制个人交通——如果不是使其缩减的话。但是，从 1974 年到 1980 年，这种演变趋势并不明显，碳氢燃料的消耗与其价格相比明显缺乏弹性，这似乎表明，汽车也已经像食品一样，成为一项不可缩减的个人开支……

918

在货运方面，碳氢燃料价格的持续走高再次给了铁路和水运一个机会，但后二者在 1974—1977 年间的负增长（-6%）完全让人不能理解。不过，这种后果的一个原因必定存在于交通政策中：这一政策有明显的倾向性，尤其是在用于装备设施的信贷再分配上有利于低耗能的、与国土规划整治政策更为协调的运输方式。不过，运输产值的增长（尤其体现在国际贸易方面）特别有益于两类运输方式：公路和航空。

邮政运输和电信业

在经历了一个适应大众通讯新需求的艰难的调整期之后，邮电部门（P. T. T.）在第七个计划期间看来旧貌换新颜，无论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是如此，这得益于对该部门装备和运作的信贷投资的巨大增长。到 1980 年，邮电预算再次成为各民事部门的首要项目。财政方面的强化使得邮政分拣和电信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这与第七个计划中的两个优先目标是相适应的。

尽管从 1968 年到 1978 年间的信件发送量有所下降（从每年 46 亿件减少到 43 亿件），但其他邮政发送量明显增长，各种函件发送量达到惊人的 64 亿件，期刊发送量为 22 亿件，其他物品 36800 万件，等等。四大信件自动分拣中心（第戎、勒芒、奥尔良和普瓦提埃）和三

大信函和包裹分拣中心（阿拉斯、里摩日和里尔）的建立进一步提高了服务质量。

1972 年，法国电话密度为每 100 居民 9.5 个用户，是欧共体各国中最低的，远远落后于美国或瑞典（每 100 居民中有 48 个用户）。而且，从以各种国际标准来计算的服务质量来看，法国也明显落后……不过在第七个计划期间，法国大大弥补了这一欠缺，实现了四大优先目标中的一个："改善国家的电话通信设施"——1979 年电话用户达 1370 万，而 1968 年仅为 350 万；服务质量指数接近 80%；平均安装期低于 8 个月（1974 年在巴黎是 15 个月以上）。从此，"阿斯尼埃尔 22 号"① 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显著成就的取得受益于经费的大规模增长，正是有了投资，程控电话网和电子切换的快速发展才有可能。由于财政方面的优惠和可望与电话交换局之间缔结"美妙合同"的前景，过去的同行对手之间达成了牢靠的默契。汤姆逊－布朗特（法国）、电力总公司（法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美国）、飞利浦（荷兰）和爱立信（瑞典）分享了切换、传送、电缆、用户电话、电传电报、卫星通信等市场。不过根据 1976 年 5 月的政府决策，法国的汤姆逊和电力总公司成为市场占有额最大的集团。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汤姆逊集团获得了 L. M. T. 和爱立信法国电话公司的控制权，前者是从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收购的子公司，后者是瑞典爱立信集团的子公司。于是汤姆逊集团成了"空间转换业"的霸主（梅达孔塔和阿克斯电话交换局）。而电力总公司则巩固了其在"时间性转换装置"中的领导地位（E-10 和 E-12）。1976 年后，电信业着重于空间交换设施的建设，这些项目的许可证被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瑞典爱立信集团拿到，虽然法国的工程师大量参与其中。作为法国技术成就的"时间性"电信体系由此居于二等地位，这大大损害了法国电话设备的出口。

919　今天，法国电信业十分关注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另外，它还

---

① Le 22 à Asnières，是法国喜剧演员费尔南·海诺（Fernand Raynaud）的一部幕间短剧，剧中讽刺了电话通信业务的低效和缓慢。阿斯尼埃尔是地名，位于巴黎近郊。

与工业集团联合，将发展方向定位在电话传真、文献的远程处理、电视文字传送和专业化的业务服务（如旅游业电传信息处理、银行电文切换服务等）上。法国人的通讯方式正在逐步发生改变。信件的传送量已经明显下降，而与此相关的是，电话用户的通信量有了增长。

法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

被觊觎的宝地与被遗忘的角落

《巴黎与法国的荒漠》——30 年前格拉维埃的这本书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呢？确实，在 1947 年，农村的人口减少才刚刚开始，产业大调整还没有动摇某些地区的工业和人文景观。不过，对于某些敏锐的观察者来说，发展上的空间不平衡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政治家、经济学家、拟定经济计划的技术至上论者以及部长们忽视了地区因素；他们推算的只是国民经济的平均水平和增长率。第二个计划（1954—1957 年）对于地区发展的关注颇为微弱，国土整治和地区行动评议会（D. A. T. A. R. ）的成立还是 1963 年的事。它的目标呢？从形式上说，目标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大变化："一种有意识的发展地理学……其目标指向勒阿弗尔—马赛一线以西的地区（西部、西南部、中央高原），以及经济转型的地区（北方、加莱海峡和洛林）。一个紧迫的任务是：抑制大城市——特别是巴黎——的膨胀，抑制农村地区的衰落趋势。"它的措施？基本上是来自政府各部之间的协调和鼓励行动，以及一系列财政、税收制度和一些政策性手段。它的成果？我们可以看看近 20 年来的情况：一方面，农村被遗弃的现象更为广泛，"有意识的发展地理学"成效微弱，各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仍是一个神话。

没有规划的城市化和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失

城市人口（生活在人口为 2000 或 2000 以上的居民点的人口）在第二帝国时期只占总人口的 1/4，到 1980 年这个比例提高到 3/4。1954 年到 1975 年间，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尤其显著，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旨在强化"地方性平衡都市"、削弱巴黎的政策（1965—1970 年

的第五个计划期间实行）取得了积极成果。同样，随后第六个计划的中等城市（人口 2 万到 20 万的城市）政策、小城市政策（1974 年）、有关“乡村契约”的缔结人政策等等，都有助于人口重新分布的自发性趋向，而人口流向的地区是大城市或中等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不过这一运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下局面造成的：公路交通的发展、市中心的地皮和住房价格昂贵以及大城市的拥堵。

从统计学上说，向“城市周边农村地带”持续的移民运动掩盖了 1954—1975 年间农村地区的人口外流现象。如果农村人口外流指的是农村地区移出人口数量与移入数量之间的净差，那么就平均水平来说，整个法国的农村人口外流速度实际上下降了。相反，如果我们把大中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带不算入农村地区，并且，如果我们按照让·罗沙的意见，把农村人口外流定义为“农村地区青少年和壮劳力的净流出运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外流的势头仍很强，特别是最近 15 年来。农村青少年人口加速外流所带来的显著后果之一是，农村的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因青少年人口离去和退休人员经常返回农村所造成的人口老龄化。

920

另外，地区平均水平掩盖了各省之间、甚至一个省的各个区之间人口状况的极大不平衡。1968—1975 年间，43 个省出现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记录；而且一般来说，这些省也就是人口净流出的省份。这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农村人口将会迅速衰退，特别是，在众多“乡村地区”，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会急剧减少。如果我们把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带排除在外，法国其余的农村地区的人口都在减少，或是由于人口外流，或是由于出生率呈现负增长，而且这些情况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

人口这种空间上的重新分布，尤其与 1954—1975 年间大部分地区农业就业岗位的迅速减少有关。这种减少在以下地区特别迅速：阿尔萨斯（下降了 4 倍），洛林，弗朗什 - 孔泰，普罗旺斯 - 阿尔卑斯 - 蓝色海岸，罗讷 - 阿尔卑斯，庇卡底，中央地区，上诺曼底和勃艮第（减少 3 倍）。

下降幅度较小（2.5 倍）的地区有：卢瓦尔，布列塔尼、普瓦图－夏朗特，阿基坦、朗格多克－鲁西永，奥弗涅，利穆赞，南方－比利牛斯，北方－加莱海峡以及法兰西岛；香槟－阿登和下诺曼底下降较小（不到 2 倍）。

不过，尽管 20 年来的人口演变速度很快，但农业从业人口仍维持较高的比例（全国平均水平为 9.1%）：

利穆赞、下诺曼底和布列塔尼（21%，1954 年为 50%）；

卢瓦尔地区、南方－比利牛斯、奥弗涅和阿基坦（16%—18%，1954 年为 42%—45%）；

另一方面，在一些工业化地区，农业从业者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法兰西岛（0.9%）、北方－加莱海峡（5.1%）、洛林（4.9%）、阿尔萨斯（4.7%）、罗讷－阿尔萨斯（7.2%）；甚至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也是如此，如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6.4%）……而且，各大区的平均数也掩盖了各省之间及省下属的各区之间在人口变化和状况上的巨大差异。

国土规划整治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如果从改善城乡人口的空间分布的角度看，可以说"有意识的发展地理学"的业绩乏善可陈，不过从平衡地区间发展的角度看，情况要好一些。

从 1963 年到 60 年代末，国土整治和地区行动评议会中盛行圣西门主义思潮，这激发了奥利维埃·吉夏尔及其后继人杰罗姆·莫诺自称的法国的新专家治国主义者的热情，因为"现在应该重新分配经济增长"（D. A. T. A. R.，维希研讨会，1978 年 12 月）。因此，应该协助因为经济过于单一化而有衰退之虞的地区实现经济转型。

洛林的铁矿和采煤业、冶金、纺织和建筑业最近 20 年中陷入困境，外籍劳工大量涌入，占据了 60% 的工业就业岗位。现在，洛林的某些地方已经面临极大的困难，如摩泽尔河地区。在阿尔萨斯，传统的纺织工业因为缺乏灵活性而造成难题。在北方省，"三老"工业（煤炭、纺织和冶金）迅速衰落：到第六个计划末期，北方省和加莱

海峡省的煤田产量减少一半；由于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里尔 - 鲁
921 贝 - 图尔宽纺织工业三角区迅速进行了产业重组；桑布尔盆地陷于停滞。在勃艮第，三角工业区——勒克勒佐、蒙索雷明、索恩河畔夏龙——的生产活动明显下降，失业率很高。在阿基坦，冶金、造船、飞机制造、造纸、制鞋业（位于比利牛斯 - 大西洋省）受到严重威胁。在普罗旺斯 - 阿尔卑斯 - 蓝色海岸大区，在马赛港这个过去“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门户”，那些步履沉重的工业也进行了产业调整，一些船只修造厂被关闭，由此造成的难题十分棘手，因为大量移民涌入马赛，其数量仅次于巴黎。我们还应提到索杜 - 塔恩炼钢厂的危机，南部 - 比利牛斯大区的德卡泽维尔和卡尔摩谷地的产业重组，还有朗格多克的塞文山区那些被关闭的矿山。

简言之，行动的空间很广阔，问题是要知道“有意识的地理学”行动能否平衡这些不利之处，或这类行动有时是否能伴有有效的地理和经济上的决定性成效。

交通方式、通信和远程信息处理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可以大为克服因远离首都和经济发展中心而造成的困难。同样，新的能源资源及其运输方式也能减少以前的“地理决定因素”的约束。但这样的进步具有矛盾性，因为它可能威胁到过去的有利因素和当地的固有优势。正在进行产业调整的地区、尤其是各大矿区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局面。

虽然说地理上的限制不像以前那样明显，但它并未消失。因此，对于像上诺曼底、中央高原、庇卡底、香槟、勃艮第、弗朗什 - 孔泰、阿尔萨斯、洛林和北方等地区来说，靠近巴黎或大型边境工业区便是一张王牌。不过周边地带也可能因为靠近过于强大的中心地带而变成后者的附庸。阿尔萨斯与德国的巴登 - 符腾堡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巴黎地区的周边地带亦然。另外，天然交通要道仍然构成一种重要的优势，至少是一种希望。实际上，重要的工程规划通常就是以天然交通要道为起点的，而这就给了一些地区以新的机会。政府选择福斯港和敦刻尔克港为冶金业基地、以勒阿弗尔为石油工业基地，就说明天然的区位优势在战略决策中仍具有重要意义，即使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的话。同样，在不

久的将来，通过连接罗讷河－莱茵河而实现北海－地中海的海洋轴心规划可能会给法国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带来新的机遇。

新开创的经济活动可以替换衰落的产业，或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这依赖于几个因素。例如，德国在阿尔萨斯的投资便有如下几个原因：该地区的中心位置、有可资利用的能源（阿尔萨斯大运河的水坝，马赛到卡尔斯鲁厄的输油管等），土地价格相对便宜，劳动力充足……雷诺公司把一些工厂分散到北方、上诺曼底和卢瓦尔地区，雪铁龙的工厂下放到布列塔尼，米其林的工厂则放到图尔，所有这些分散行动无疑都受到公共权力机构的支持；不过这样做也是因为可以利用更好的生产条件：充足的劳动力、土地，等等。可以说，在布列塔尼、东南部和中央地区建立电子工厂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之所以在上诺曼底的勒阿弗尔、卢瓦尔地区的东齐、波尔多、贝尔洼地、里昂和斯特拉斯堡设立石化联合企业，主要是考虑到原油进口或供应方面的便利条件，以及石油炼制品及加工品的出口和输送的便利。 922

因此，国土规划和地区行动评议会的防御性战略在北部和东部是面向德国和比利时，在西南部面向西班牙或“大西洋沿海”，这一战略无疑对某些工业部门在空间上的重新分布起过重大帮助作用（不管怎样它们在尽力而为——福斯港在这方面具有完全的说服力），但它没有真正改变事物的发展进程。1954—1975 年间工业就业状况（建筑和公共工程除外）的演变能衡量工业非集中化政策的成效。与国土规划和地区行动评议会的目标相一致的是，法兰西岛的工业从业人口有所下降，而西部（普瓦图－夏朗特、卢瓦尔地区、布列塔尼）的工业人口数字的增长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最大的受益者仍然是巴黎盆地地区。朗格多克－鲁西永没有从平衡计划中获益（工业人口仅增长 2.2%）。经济转型地区的变化是灾难性的。洛林的增长幅度仅为 4.83%，北方地区的工业就业岗位减少了 71800 个（－12.63%）。1975 年，布列塔尼的工业从业者只占就业人口（建筑和公共工程除外）的 19%（全国平均水平为 30%），但建筑和公共工程业的从业人口占 10.4%，全国水平为 9%；在朗格多克－鲁西永，上述比例分别为 17% 和 12%，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

海岸大区为 19% 和 12.4%。

1974—1977 年的经济危机影响到整个工业，但对于那些发展速度低于全国总体水平的地区（北方 - 加莱海峡、法兰西岛和洛林）来说，危机的打击尤为严重。南方-比利牛斯大区在飞机制造、建筑材料、食品工业等部门经历了明显的衰退。船只修造、机械工业和食品加工业的衰退对普罗旺斯 - 阿尔卑斯 - 蓝色海岸地区造成严重影响，但危机同样波及石化和冶金业。甚至罗讷 - 阿尔卑斯地区的基础化工、纺织、服装和造纸 - 纸板业也受到严重打击。

总起来说，“经济危机抑制了经济的灵活性，从而阻碍了工业平衡计划，各地区停顿在原有状态下。以国土规划为名义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因此也就越来越小了”。现在还不能肯定，1978 年 11 月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报告的这一结论是否让规划政策的新负责人感到为难。事实上，从 60 年代末起，特别是在 1974—1975 年的危机期间，人们开始懂得，“规划和竞争力并不必然能协调到一起”。换言之，有意识的规划政策与基本目标在于恢复自由市场机制的工业政策（因而也就是大公司的自主决策政策）之间是无法调和的。在 1978 年 12 月有关国土规划的维希会议上，看来共和国总统已经得出了这一逻辑上的结论，这次会议还敦促大企业在国土规划方面承担责任。从此，地区性政策就以企业为轴心，实际上只是工业政策的延伸。按照斯托法埃斯的看法，这一政策选择应导向“以几个大型平衡性都市的发展为中心（法国可以有 5—6 个），并应放弃全面铺开、无所不为的做法”。因此，1978 年设立的工业调整基金被认为是“一台强有力的作战机器”，但它不是为了支撑衰落中的经济部门，而是为了以“健康而持久的就业岗位”取代之。

因此可以预想的是，那些处境最不利的地区将会经历新的工业衰退，因为今后是人员流向资本而不是资本流向人员。现在远不是要求“在老家生活、工作与作出决定”的时候了。923

第三产业就业状况的演变是削弱还是加强了上述的工业就业状况呢？国土整治和地区行动评议会曾努力分散某些第三产业，尤其是高

层培训和科学技术研究活动。

国家法律研究中心设在波尔多，公共健康学校设在雷恩，税务学校设在克莱蒙费朗，高等航空航天学校设在图卢兹。矿业学校的实验室分散到昂蒂布附近的瓦尔伯内，等等；某些社会机构也进行了分散化：军队退休金管理局设在拉罗歇尔，储金会的补充养老金管理处设在昂热，干部退休机构设在布卢瓦，等等；根据达里翁报告的建议，另外一些社会机构也进行了分散化。

但是，这种分散化的意愿也遇到了严重的阻碍，首先是君主主义、柯尔伯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传统，即强烈的经济和财政集权的传统。因此分散化的成效十分有限，尽管从数字上看情况可能相反。确实，在1968—1975年间，法兰西岛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增长比其他地区要慢。增长最快的是罗讷－阿尔卑斯、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朗格多克－鲁西永、南方－地中海等地区。相反，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是：下诺曼底、上诺曼底、普瓦图－夏朗特、奥弗涅、勃艮第，而利穆赞的情况尤其严重。

不过，仅从数量上来看待第三产业的问题是不够的，还应该有质的维度。然而，非常明显的一点是，高层次的第三产业过分集中于法兰西岛。一些重要公司的机构所在地也多密集于此。1958年，法国的前500家企业中，375家的公司总部设在法兰西岛，1976年这个数字为388家。罗讷－阿尔卑斯地区是另一个第三产业的中心，但设在那里的前500家公司从20家减少到15家。

1971年，一项对55%的第二产业工资劳动者的调查表明，在70年代，设在法兰西岛的企业控制了其他地区所有工业就业岗位的40%。

几乎一事无成的地区改革

根据1972年7月的法律实施的地区改革是否能以地区政策的意愿，去代替已然抛弃了地区平衡发展目标的全国性政策呢？

从事实和法律上说，当局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严格限制地方权力、维持中央政府的权力：1972年的法律给与各大区的法律地位只是简单

的地方公共机关，而不是某种地方行政单位——这样的行政单位本可以享有远为广泛的权力。大区理事会（协商会议）的成员不再由直接普选产生，因而也不再具有与此相连的道义权威。被视为代表“大区的活跃力量”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实际上只具有咨询权，其角色可有可无。22个大区的税收和财政资源是有限额的，它们低得可笑（占国家预算的0.5%）。大区公共机构甚至无权安排自己的部门人员。大区的行政官是省长。最后，省长的权限也受到法律和内政部通报的极为严格的限制。

弗朗索瓦·格罗斯里夏尔对大区的权力作过一番形象的描述：“某个社区要想救助濒临倒闭的企业？规章法令会禁止这样做。某个冶金工业区要想推行一个拯救钢铁业的计划？巴黎的专家们会把它的报告束之高阁。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要求赋予地方语言以更高的地位？巴黎的人会说，这会损害国家的统一，但他们不知道，非中央集权化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物，它同样意味着传统的恢复。地方当选者要求能决定当地工业补贴的分配比例？国土与地区行动评议会会感到不快，认为它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山区社区要求暂时打破条例规章以建立医疗救助机构？不可能：因为规章对所有人都应该一样。甚至在这些积极主动的意愿表达出来之前，整齐划一的中央集权就已经使之饱受挫折。国家好像害怕在放弃管理权限时会失去自己的政治权威”。

924

实际上，类似的情况还远不止这些，法国的国家机构拒绝各大区直接向欧洲地区经济发展基金（F. E. D. E. R.）求助、拒绝让它们从欧共体获得本可以稍微改善一下地区不平衡状况的资源，而这种地区不平衡不仅在法国、就是在整个欧洲都在不断出现。

法国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演进

1978年，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居于第四位，次于美国、联邦德国、日本，同英国的地位很接近。实际上，这一地位从1954年后就没有变过，不过此间世界贸易的发展十分迅速。

对法国经济的各部门的分析已能让我们通过产品和服务的门类来了解法国外贸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对法国与国外商业联系的各大发展阶段作一下总结，这既可以通过产品、也可以通过各大地理区域来进行考察。

1944—1962 年。国际贸易体系的恢复和结构性政策的选择

在这一时期，有两个重大事实可以解释法国为什么敢于采取一些出色的外贸政策：法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欧洲支付同盟获得了重要的外援。这一援助使得法国得以弥补长期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法国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或多或少具有隐蔽性。这两个因素可能有利于推行某种短暂的灵活政策。相反，它们所能允许的结构性政策要到 1962 年后才能取得成效。

灵活的贸易政策主要侧重于某些工业的发展及生产效率的提高，首先是侧重于成套设备、机器和运输工具的生产，如后面的图表所示。从 1950 年到 1958 年，成套设备的出口在法国出口结构中的比例提高了 6.5 个百分点；而 1958 年到 1966 年只增长了 3 个百分点。

但是这种以未来为赌注的政策严重依赖于外援，不可能一直推行下去。不过，它使得 1950 年到 1958 年间的结构性进步成为可能，而这一进步又与 1957 年和 1958 年货币的成功贬值、以及 1960 年到 1963 年间的贸易出超有密切联系。

1962—1972 年。法国向世界开放及贸易的地理格局的调整

可以注意到，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商业交换明显加强。此间进口额的增长速度几乎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高两倍，而 1952—1962 年的十年间只高 1.5 倍。出口的增长稍慢（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高 1.8 倍；出口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 1962 年的 10% 上升到 1972 年的 13%；进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10% 上升为 15.2%）。1972 年，出口和进口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意大利分别为 16.7% 和 17.4%，英国是 17.8% 和 17%，联邦德国是 19.45% 和 16.7%。

925

从产品类别看 1950—1966 年间法国出口结构的演变

	1950	*1958*	*1966*
食品、饮料、烟草	10.8	13	15.8
能源、润滑剂	6.1	6.2	3.4
初级产品	16.1	7.3	7.1
制成品	66.9	73.4	73.6
其中：半制成品	26.5	27.6	27.3
工业设备	11.6	17.1	20.2
农业设备	0.8	0.6	0.9
消费品	28	28.1	25.2
贵重工业品	6.1	0.1	0.1
总计	100	100	100

我们可以以产品门类为依据，指出这一时期法国贸易结构演变的特点，这就是某种持续性的不稳定：农产品和食品的业绩很好（1962年还是赤字，1972 年呈现巨额出超：58 亿法郎）；能源的依赖性不断增长；制成品贸易状况恶化，进口（特别是家用耐用消费品的进口）的增长远远快于出口；成套设备、机器和交通工具的贸易状况良好。

从地理格局上来说，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法国同其欧共体伙伴的贸易关系的强化。1972 年后，欧共体占法国销售和供应市场的一半（1959 年为 27%左右）。联邦德国是法国首要的顾客和供应国。不过法国与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的贸易增长最快。另一个特点是与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国家的贸易也是如此，包括日本。法国与发展中国家（法郎区之外的国家）的贸易仍有出超，与东欧也是如此，但增长很小。不过，从 60 年代末开始，从中东的进口增长非常快，这是法国石油政策的一个反应。最后，与法郎区各国的贸易持续衰退。

1973—1978 年。贸易关系的扭曲导致法国长期存在外贸难题

在这个危机的时期，法国的贸易结构发生了某些转变。可以指出

如下几点：

——能源进口造成的赤字迅速增长，1978 年这个赤字占法国出口的 20%，而 1972 年只有 12%；

——工业品出超的增长刚好弥补能源价格的上涨（覆盖率，即出口价值与进口价值——包括战略物资的进口——之间的比例达到 123%）；

——服务业的出口增长很快，特别是“重要劳务服务和技术合作业务”，很大程度上说，服务业的优异表现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和东欧国家缔结的“重大装备设施合同”有直接联系。

——相反，消费品的贸易状况急剧恶化，这主要是因为法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赤字造成的（1973 年还有 20 亿的盈余，1978 年的赤字则达到 60 亿）。不过整体而言，1978 年出现了贸易盈余：25 亿法郎，而 1977 年的赤字为 139 亿。此外，“无形贸易”的平衡情况有所改善，盈余达百亿法郎（服务业的盈余高达 240 亿）。

926

从贸易的地理分布来看，也可以看到明显的转变：法国与欧共体国家之间继续维持重大的逆差，同这些国家的贸易仍占贸易总额的 50%（1973 年的覆盖率为 97.5%，1978 年降为 95.8%）。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法国与德国的贸易逆差（法国的农产品出超无法弥补因采购设备、原料、金属和化工制品造成的赤字）以及同荷兰的逆差（大量进口天然气和水果、蔬菜和牛肉）都很大。相反，同英国的贸易顺差有增长，同意大利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的贸易能维持平衡；

——法国同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欧共体之外）的逆差也在增大（从 1973 年到 1978 年，贸易覆盖率从 95.5% 降到 87.7%）。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法国同美国的贸易一直存在逆差——法国在农产加工品、谷物、大豆等贸易上呈现入超，半制成品（化工）、特别是专业和家用设备方面亦然——同瑞典的贸易也存在逆差，同日本和西班牙（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的逆差则急剧增长。相反，同瑞士的贸易一直维持顺差；

——同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的贸易不平衡在 1974 年创下纪录（330

亿法郎)。此后，法国设法削减进口——这在危机时期相对容易——增加民用和军用设备的销售。由于这双重的努力，1978 年的逆差降为 240 亿法郎；

——由于同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法国同经合组织及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的逆差有了部分减少。但同东欧各国的顺差有所下降。法国同发展中国家的顺差几乎可以弥补同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包括欧共体各国）的逆差。因此，法国的外贸有点类似于“中间国家”的外贸状况，因为它的特点也是，同高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是逆差，而同较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是顺差。

这种状况远非让人满意，而且很不稳定。因此我们应指出几个让人担心或引人思考的问题：

——法国同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除外）的贸易顺差相对来说代价很高，因为它必须以大笔的优惠贷款为附加条件（1977 年接近 180 亿，1978 年为 165 亿，这几乎等于两年内法国从外部获得的 380 亿的借款）。情况就像是，法国以苛刻的条件从国外获得贷款，然后再以优惠条件贷给东欧和发展中国家，让它们向法国采购，但这些国家并不都是完全有偿付能力的。此外，东欧国家的“平衡”政策越来越成为法国的负担，这种平衡就是以并非法国经济必须的产品来抵消从法国的进口；很显然，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目前看来，法国还不能削减同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的贸易逆差，原因至少有三：1978 年后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元在 1979 年停止贬值，石油输出组织各国的设备采购不可能无限期地增长，何况这一“世纪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十分激烈；

——最近法国在农产品－食品贸易方面的良好局面受到了两方面的威胁：在欧共体内部受到意大利、荷兰、德国等国家的农产品的竞争，由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走高，它们的这一行业也有发展，而且法国还受到第三国或各联系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在谷物、大豆市场的支配地位也威胁到法国，众多外国集团对法国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的控制也是如此；

927

——只有武器（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武器）出口前景仍然看好，因为“需求”是无限的，而且75%的交易是在国与国之间完成的。若以法郎不变价计算，1969以来的武器出口翻了两番（以法郎时价计算则增长7.5倍）。因此，武器出口比整个法国贸易的发展速度快2倍，1978年，它占法国总出口额的5%。

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前面提出的问题：法国工业以后真的没有能力重新占领国内的专业化设备、耐用消费品等市场、真的无法扩大它在经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市场份额吗？

三、社会阶级和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

法国社会的结构

法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受到经济发展和由此造成的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这种大规模的转移和迁徙可以在我们前面区分的三大产业之间进行；但也可在每个产业内部、在该产业的不同行业之间、甚至在行业内部的不同社会－职业类别之间进行。社会研究的一个巨大困难在于，有关就业的统计范畴恰恰不包括阶级和社会阶层概念。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对主要社会－职业类别的演变进行分析、借助于最近四次法国人口普查的资料绘制一个图表，这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出发点。

可以看到，工人在法国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大（37.7%），实际上，1962年以后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上。1954年后，职员、中层干部和技术人员、高层干部和自由职业者的相对比例不断增加。这只能解释为农业经营者数量及工商业主的增加，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来说都是如此，不过后一类别的增长幅度较小。

我们将依次讨论工人阶级和与之接近的“社会阶层”，随后是“中产阶级”，接着是由工商业主及公共或私营部门的“经纪人”组成的资产阶级，最后是农民。

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工薪阶层和工人

今天，我们已经明显不可能像19世纪的马克思那样，把工薪阶层和工人混为一谈。最近的人口普查表明，人口整体的工薪化（工薪者同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水平已经超过82%。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几乎与大部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相上下。但各工薪者阶层的变化很不一样，我们可以在后表中看到这一点。

工人的增长明显比其他工薪阶层慢。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在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刚刚能维持原有水平的原因。

这些演变上的差异不应该使我们忽视这一点：增长的速度导致从业人数的绝对值的重大差异。

928

1962—1975年各类工薪者的增长

	1962—1968	*1968—1975*
农业工资劳动者	-30%	-36%
高层干部	+33%	+50%
中层干部	+34%	+58%
技术人员	+54%	+43%
职员	+26%	+28%
工人	+7%	+6%
服务部门人员	+11%	+7%

因此，如果采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严格定义："直接的生产性劳动集体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阶级——这个定义相当接近于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关于"工人"的社会-职业阶层的定义——那么我们会看到，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远不是占压倒优势。在工人阶级内部，工段长和技术工人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普通熟练工人、特别是非技术工人；但后两类工人目前仍占工人总数的56%，前两类工人的相对比重从1962年的37%上升到1975年的42%。在所有类别的工人中，学徒和矿工下降的速度最快，在绝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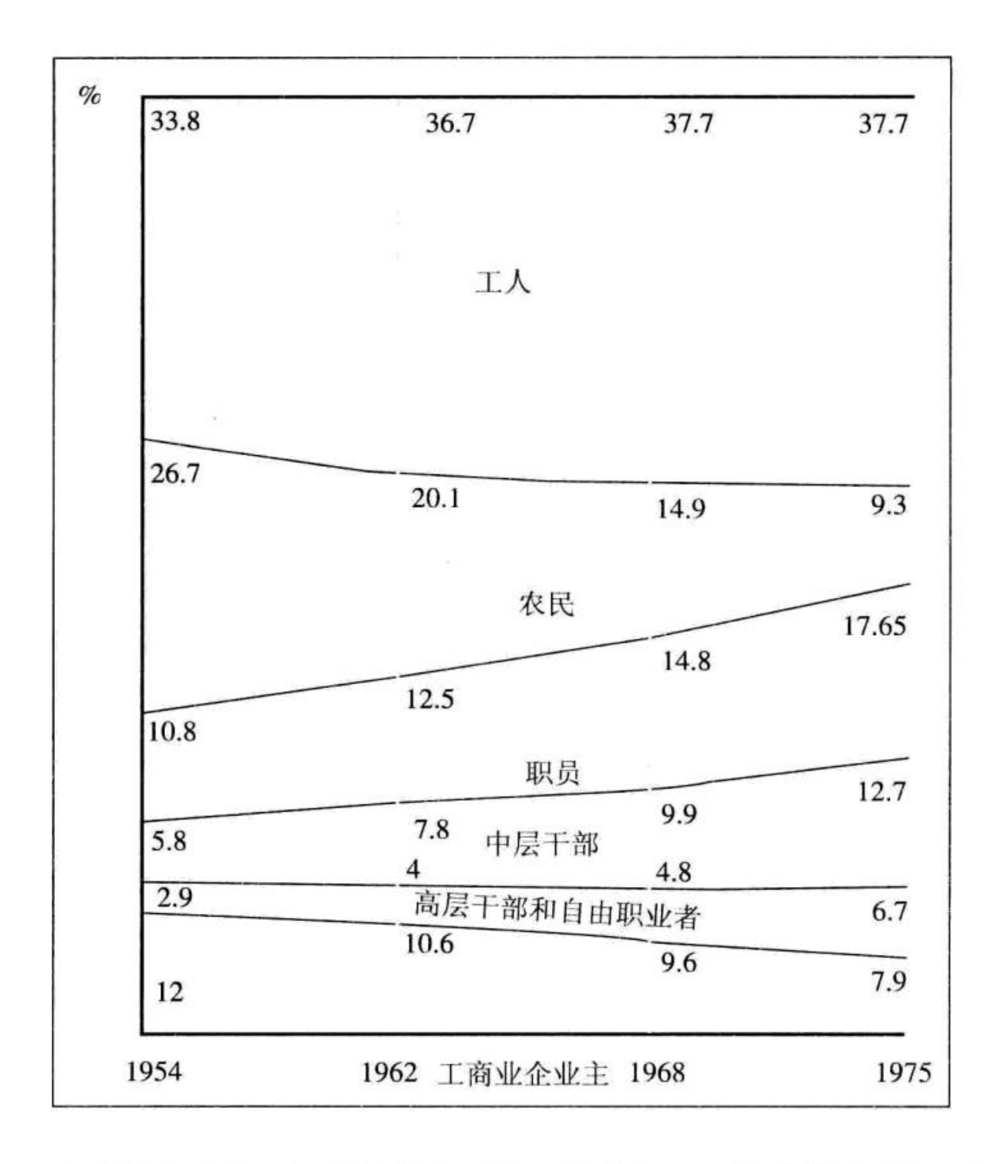
和相对值上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在社会行为方式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工人已经在工作之外寻求满足，寻求其社会特征的本质。不过，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19世纪城市规划中体系化的阶级隔离的结束，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所有这些都从某种方式上促进了工人融入社会整体中。因此，在社会整体中的多样化和整合性应成为人们所称的“新工人阶级”的两大特征。

如果按照塞尔日·马莱的看法，各个类别的工薪劳动者在介入同一劳动程序时并没有发生分离，无论他是工人、职员、技术人员、抑或是在他同一生产单位中工作的工程师。相反，尼科斯·普兰查斯认为，与工人共同工作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与前者存在阶级隔阂，因为从功能上说，工程师和技术员是领导者和监督者，他们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也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事实上，工程师和技术员的生活方式、社会声望和他们所享有的权力、甚至他们的政治行为，都足以使他们与工人区分开来，因此人们能够接受普兰查斯的见解。是否还应该对工人阶级进行更为深入的分类呢？是否应把37.6万农业工资劳动者、125万服务人员、特别是384.1万职员彼此区分开呢？对此雅克·朱利亚尔的看法如下：

	1962	*1968* （千人）	*1975*
工人	7061	7706	8207
职员	2396	2996	3841
中层干部	1501	2006	2770
高层干部	641	854	1243
服务部门人员	1047	1266	1243
技术人员	344	531	760
农业工资劳动者	826	584	375

929



法国就业人口的社会－职业构成，1954—1968年。百分比数值说明各社会－职业阶层同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指数为100），但服务部门人员（分别为5.3、5.4、5.7、5.7%）、技术人员（分别为1、1.8、2.6、2.5%）和“其他人员”除外。

“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说，在直接的生产性劳动和其他的工资劳动形式之间进行区分的做法基本上已经过时了，这只有一点学究意味。确实，在任何情况下，劳动者自己对这种分别并没有体验：一个冶炼厂的铸工、一个大商场的女售货员、一个邮局的职员，他们之间确实有区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或更确切地说，肌肉劳动与文案劳动之间的差别仍然是不同劳动者的外在的和文化上的标志。但是人们大概不

会想到要去确认谁是被剥削者，谁又不是。这就意味着，在日常的经验中，收入数额及收入所允许的生活方式要优先于收入的性质”。

不过，我们虽然不否认这些深刻的转变，但也应该强调，一些构成某个命运共同体之基础的特征一直存在。如相对贫困，依附性，一直困扰大多数工人的不稳定。这三大特征看来可以解释为什么传统的工人阶级意识长期维持着。法国工人的工会运动虽然有过分裂和危机，930 但仍具有活力，这就是工人阶级意识长期存在的最明显的表现。

工会

根据勒弗朗的意见，我们可以把解放以后法国工会运动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4—1947 年：与当局的合作及工会的团结。在大战及抵抗运动的“漫长黑夜”期间，由于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的谅解（1943 年 4 月 17 日的佩勒协定），法国总工会（C. G. T.）恢复了统一；另外，总工会还与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C. F. T. C.）合作，这两个组织都赞成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纲领。因此在法国解放的时候，工会重新活跃起来，1944 年 7 月 27 日，两大组织也得以重建。有一段时期，不仅工会的思想、甚至工会人员也进入了权力机构，如昂布瓦兹·科瓦扎、马塞尔·保尔、罗贝尔·拉科斯特、克里斯蒂安·皮诺和阿尔贝·加齐埃等。总工会和天主教工人联合会支持掌权的左派多数派的行动纲领，后者也推行了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纲领之内一些重大改革：国有化、设立企业委员、创办社会保险等等。正是在这个时候，法国总工会提出了“先生产，再提出要求”的口号。在天主教工人联合会方面，虽然它拒绝实行组织上的联合，但完全赞成与法国总工会采取共同行动，为此甚至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不过，分裂的种子已然萌芽。由于共产党在法国总工会内部的影响力上升，少数派组建了自己的组织，创建工人力量派（1945 年 12 月）。此外，全国劳动联盟的无政府主义者或邮电局工会联盟开始组建独立工会。不过，使工会团结发生动摇的是最初的政治困难、特别是价格的上涨。尽管 1946 年 7 月的罗亚尔宫会议后，工资提高了 20%—35%，但购买力仍不断下降，

这就成为触发强烈的不满情绪的原因，并导致法国总工会和天主教工人联盟之间早期协定的废除。1947 年 4 月，法国爆发了罢工，接着共产党部长们被排除（1947 年 5 月 4 日）。1947 年 11 月和 12 月，罢工运动进一步扩大，在冷战开始和马歇尔计划被提出的背景下，罢工有时几乎带有暴乱的特征，特别是在马赛和巴黎的冶金工厂中。这时，工人力量派与法国总工会分离（1947 年 12 月 19 日），不久便建立新的联盟，名为工人力量总工会（C. G. T. -F. O. ）。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明确拒绝跟随法国总工会可能导致总罢工的路线。最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出于维持自身团结的考虑，也成为独立于法国总工会的组织。

1948—1953 年：工会多元化和工会运动的衰落。工人力量总工会的分裂、因各派别政治上的对立而造成不信任，这些都削弱了工人运动，它失去了大战刚结束时的一些追随者。另外，与当局之间的关系也在恶化，政局已经明显向右转，而且工会运动受到外部事务的强烈冲击。事实上，法国总工会在一些国际政治问题上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尤其是它宣称反对舒曼计划。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其他工会组织的立场很不一样。1953 年大会后，法国天主教工人联盟因受到极少数派的影响而发生转变，从此它比以前更为明确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信奉计划制度；另外，它还再次表达了同法国总工会共同行动的意愿。

931 1954—1958 年：幻灭。孟戴斯·弗朗斯、埃德加·富尔和居伊·摩莱的先后执政为工人组织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1954—1955 年，经济在价格稳定中实现了增长，这使得孟戴斯·弗朗斯的“亲和”政策和劳动者购买力的提高成为可能。但 1955 年夏，局势开始恶化。圣 - 纳泽尔发生了暴力事件。作为巴黎冶金业集体协议的补充，1955 年 9 月的雷诺协定无疑充当了资方的灭火器。确实，这个协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重新开启了集体谈判运动，并实现了劳资双方代表数的对等。三周的带薪休假很快扩展到大部分工薪劳动者，而以法律形式推广这一做法还是稍后的事。苏伊士远征和匈牙利的事变、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升级，再次扰动了当局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各工会之间的关系。1958 年 5—6 月的事件以及第四共和国的告终（群众对共和国的

垮台几乎无动于衷）再度突出了工人运动的幻灭和失落。

1959—1962 年：防御时期。三大工会对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普遍持保留态度。戴高乐主义者关于劳动与资本联合的信条，在工会那里只引起了猜疑，而提高社会地位的举措也遭遇到普遍的怀疑。简言之，可以说三大工会对于新政权采取的是防御策略。比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出笼起初也不利于解决这些事务。这时很多工会分子倾向于同资方进行单独谈判。于是，1958 年 12 月底缔结的一项重要协定设立了补充失业保险。

随着 1961 年 12 月补充退休金的推广，劳资双方代表对等的形式有了新的发展。但 1960—1963 年通胀中的经济增长激化了不满情绪。不过，由于阿尔及利亚局势的演变而引发的颠覆危险使得三大工会在提出要求时颇为低调，而且它们也支持戴高乐将军的阿尔及利亚政策。

1963—1968 年：重新采取攻势。颠覆的危险渐渐远去之后，工会又与政府拉开了距离。1963 年春天的矿工大罢工赢得大批群众的支持，政府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它征调军队的命令现在已经受到公开的嘲讽。最后，在经历了贤哲委员会这一异乎寻常的插曲过后，政府只得作出重大让步，这对它是个严重的失败。不久，关于收入政策的马塞报告和关于国有化企业的工资增长的图泰报告又于 1964 年初引起工会组织的反对，它们谴责这一“工资管制”计划，并声称它们拥护集体谈判的基本原则。不过，在劳工部长吉尔贝 - 格朗瓦尔的支持下，一些计划仍在推行，这其中包括企业委员会的改革计划，该计划于 1966 年 6 月 18 日实施。与此同时，在天主教工人联合会成员马特维的倡议下，一份试图为企业的工会部门提供法律基础的文件被交付经济和社会委员审议，根据格勒内尔协定，这份文件终于在 1968 年 12 月 27 日成为法律。1964 年具有特别意义的一件事是，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的世俗化计划终告完成。是年 11 月的特别大会创立了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 F. D. T. ），少数派在经过 20 年的努力后，终于赢得了多数派的支持。但矿工和职员中以及在阿尔萨斯 - 洛林地区，有很多人反对世俗化，他们重新组合，并决定沿用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

会的名称。12 月，政府承认“继续维持的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具有代表资格。1966 年 1 月 10 日，法国总工会和民主劳工联合会缔结联合行动条约。在工会运动的历史上，这两大工会组织第一次确定了共同
932
行动的纲领。从此，双方开始联合行动，斗争的矛头尤其指向调整社会保险的法令（1967 年 9 月）。但是双方还是出现了策略上的分歧，这些分歧由于政治基础的不同而不断扩大。一方面是法国总工会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民主劳工联合会的某些工会分子与左派联盟及统一社会党的联系，这两大派之间长期不和，1968 年 5 月的事件终于导致双方的分离。

1968 年 5—6 月的社会风暴。学生的反抗直到 5 月 11 日才引发工会组织的联合行动，当天，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发起总罢工，以抗议警察的暴行，罢工定在 5 月 13 日星期一，当天是阿尔及尔反叛事件（1958 年）10 周年。5 月 13 日的游行打出了“工人、教育者和学生团结在一起”的旗帜，声势十分浩大，这很可能是工人阶层中迅猛发展的宣传运动的发端。14 日星期二那天，南特的南方飞机工厂被工人占领。不久工人运动便蔓延到雷诺集团设在克莱翁、弗兰、比扬古尔和勒芒的工厂。到 18 日星期六那天，罢工已经发展成总罢工，虽然没有哪个大型工会组织曾公开作出这样的决定。由于向国民议会提交的不信任提案没有获得法定的多数，由于总统的迟疑不决，24—25 日夜间发生了暴乱，气氛一时十分紧张，而食品和汽油的匮乏更加剧了紧张局势。

在这种情形下，总理邀请全体雇主联合会和劳工组织在格勒内尔街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会谈的结果是 5 月 27 日达成的一份“总协议”（工会称之为一份“报告”）。政府和资方一夜之间作出的让步比“通常情况下”十年中作出的让步还要大。但是，各工会组织试图从底层来检验这个报告。于是，比阳古尔的雷诺会议过后，罢工运动又有反弹。5 月 27 日后，法国进入了一个复杂时期，政治问题和社会难题纠缠在一起。从此，各工会组织在策略上的对立反映的是更为深刻的社会斗争，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P. S. U.）也

在涉足这些斗争。

6月间，法国总工会和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对立不断升级。民主劳工联合会在“质的胜利”方面（如企业中的工会权力等）总是能得偿所愿，它谴责法国总工会过于侧重物质利益上的要求。法国总工会一直担心其主张过于激进，它竭力谴责那些“冒险主义者”。尽管如此，工业、商业和行政部门的谈判还是按部门展开了，总协定已经在公共部门实行，后者在6月初复工。相反，在几乎整个6月份，冶金和汽车工业中的局面一直十分紧张。6月10日，弗兰发生严重事端，蒙贝利亚尔的标致工厂也是如此。

当雷诺在比扬古尔的工厂、布尔利埃和雪铁龙的工厂、以及弗兰的雷诺工厂依次复工后，罢工运动从6月20日起迅速平息下去。不久的选举投票给了那些“沉默者”以发言权，所谓沉默者就是农民大众、经营小商业的中产阶级、全体资产阶级，甚至还有被迫无奈地参加了罢工运动的部分工薪劳动者。立法选举的结果无疑表明了5—6月的风暴给法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分裂。

无论是对劳工整体的社会关系，还是对各大工会组织的发展而言，1968年5—6月的“风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我们随后将谈一下几个大工会发展的特点。

1968—1980年：工会多元化趋势的加强或“分裂的工人阶级”。某种意义上说，工会多元化趋势的维持甚至强化，正反映了工人运动不断的分裂，或工人阶级自身的分化。这一现象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某些“工人贵族”与非技术工人或粗工之间，男工、女工、童工等之间的隔阂就已十分明显。后来又出现了新的分化，如本国工人和移民劳工之间的隔阂。这些隔阂至今没有消失，而且1968年后，其他形式的隔阂还在不断发展，尤其是当经济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开始进行调整后。于是，现在人们通常把“稳定工人”与“不稳定工人”（临时工、非全职工人、国家的辅助或合同雇员）对立起来，甚至“有保障”的工人与无保障的工人之间也存在隔阂，后一类工人的身份、职业或所属的企业不受契约性或法规性社会保障的涵盖，而且这通常是

933

因为他们没有参加工会。

这些新隔阂经常与旧的隔阂交叉在一起（比如我们在“不稳定”或“无保障”工人当中发现有很多妇女、移民、和单一工种工人等）；不过，由于经济危机和工业结构的调整，分包制、生产委托制（就是把部分生产活动或“中心企业”维持的工作交给“边缘企业”，准确地说，就是把这些生产和工作推向不受保障的部门）等行为层出不穷，因而新旧社会隔阂并不必然是重合的。

事实上，各大工会组织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通过某种要求权利的行动使分裂的工人世界重新统一起来，这一行动应使阶级利益观念反映到事实中。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龙指出的，“选票主义可以以社会的分化和团体化为基础，但工会的活动意味着工人阶级须对自己的未来提出某种看法”。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工会之间的分裂表露无遗。

首先是具有革命理想的工会所带来的阶级性分裂，这些工会的战略是按照阶级斗争的模式同资本主义决裂。法国总工会从一开始，特别是从亚眠宪章①以来就信奉这种革命的传统。举例来说，革命传统使得该工会明确拒绝公营和国有化部门的契约化政策，因为“对这一政策的倡导者来说，这事实上就是匿名形式的合作，甚至是消融工会”。对法国总工会来说，“社会合作伙伴”事实上是“阶级对手”。

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在其 1970 年的大会上采纳了即将卸任的主席让松的决策，从而在形式上也拥护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正如雷诺指出的，“把阶级斗争置于优先地位，确认自己属于社会主义家庭，这样它重拾起过去的传统，并给了革命的工会运动以新的形式”（特别是工会自治的主张）。因此，民主劳工联合会原则上也反对契约政策和官方的协商政策。

相反，工人力量总工会和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并不认为其改良主义的选择是个神话，尽管它们也拒绝阶级合作政策——尤其是工人

① 这个宪章于 1906 年 10 月通过，1912 年后被称为亚眠宪章，是法国工会运动、特别是革命工团主义的纲领。它有两项重要原则：1. 捍卫直接的日常的权利要求；2. 在完全独立于政党和国家的前提下，为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而斗争。

力量总工会更是如此，它的核心成员中仍有托洛茨基主义的工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天主教工人联合会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按德国的模式实现共同管理。这一政策导向使得工人力量总工会尤其赞成跨行业的大型协定的磋商，特别是1969—1974年公营部门的“进步协议”的商订。

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分裂也使各工会组织发生分化。这是由工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造成的，或更为根本上说，是由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的模式选择引起的。这种分裂主要表现在法国总工会和民主劳工联合会之间的对立上，不过其他工会对这些问题也很敏感。

934

在第一个层次上，民主劳工联合会和其他工会组织谴责法国总工会说，如果后者不是共产党的“传送带”的话，至少它与这个自称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党派及其主要领导人之间有众多而且密切的联系。事实上，虽说法国总工会的成员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属于共产党（235万会员中有25万属于共产党），但其联合办公署的成员中，一半是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已加入共产党者。该工会的许多分会或省工会的书记也是如此。至于民主劳工联合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支持者、某种程度上还有天主教工人联合会的支持者，虽然他们也参与政治争论，也具有社会主义或倾向社会主义的传统，尽管它们众多的活跃分子也信奉有左派的政治原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工会组织一直强烈主张工会独立于政党的原则。另外，在事实上，虽然它们的许多领导人参加了某个党派，但他们在其中不承担任何责任。

但是，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说，民主劳工联合会拒绝代议制或间接民主，而这是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也是如此。实际上，如果按雅克·朱利亚尔的话来说，这个模式导致如下后果：法国共产党在“宣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也是宣称‘工人阶级政党’的这一作用时，它就是在为有效地领导自己缔结的政治联盟寻找依据，也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以至高无上的口气在发言”。在这种条件下，法国总工会不可能有多大的活动空间。

这些问题不纯粹是理论性的，它们反映在不同的行为方式中、体

现在工会行动的策略上。

法国总工会试图在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内部保持“坚强核心”的控制权，它看重所有形式的全国性行动，这类行动应以“一致要求”的纲领为中心，应使法国总工会表现为工人运动的伟大的团结者。换言之，这类总体性的、受领导的行动方式可以使其在群众组织中的特殊地位合理化（这是列宁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它明显有别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法国共产党的先锋队角色。

相反，1968 年 5 月以后，民主劳工联合会更倾向于直接行动，这类行动以接近于直接或半直接的民主模式为基础。与法国总工会不同，它对“极左分子”要宽容得多，并且更倾向于支持下层群众的大胆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举动。简言之，按照埃德蒙·迈尔的说法，就是“使工会行动更加贴近每个劳动者”。

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这一立场有时走得太远，特别是它支持自发性或“粗野”的冲突，70 年代初，社会底层的这类冲突日渐增多，它们是“边缘性”工人（移民、妇女、年轻的非技术工人、来自农村的工人等等）的行为，而不是男性“工人精英”的作为：如布尔热的基罗斯蒂尔移民罢工，里昂的佩纳罗亚移民工人罢工等，摩泽尔的新艺廊职员罢工，圣布里厄的法国联轴公司的单一工种工人罢工（1973 年）。最后一次罢工充分表明了民主劳工联合会奉行的“深渊边缘”的立场和策略：不仅它自己完全支持这次无限期的罢工，而且它还接纳共产主义者同盟进入支援委员会、鼓动布列塔尼及其他地区的声援斗争，因此罢工有明显蔓延的趋势。不过，更为普遍的情况是，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经常直接或通过其地方活跃分子为中介卷入众多的冲突，这些冲突大大超越了传统工会行为的框架，它们更多涉及全面的社会选择问题，就是说，它们涉及的是政党通常追求的目标：环境斗争，反对核能的斗争，城市斗争，妇女斗争，等等。尽管民主劳工联合会在 1978 年提出，要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谈判为中心，“重新制定”工会政策，但它似乎并没有放弃为解决危机而承担“新的社会运动”的抱负。

各工会组织的成员数量

	1968 年之前[1]	1977 年[2]	在 1979 年在劳资调解委员会选举中所占的百分比[3]
法国总工会	150—200 万	235 万	42.4
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	50—70 万	82 万	23.1
工人力量总工会	50—60 万	80 万	17.4
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	8—10 万	22.5 万	6.9
全国教育联合会	40 万	55 万	
企业干部总会	16—20 万	25 万	5.2

1. 估计数字
2. 各组织宣布的数字
3. 投票率为 63.3%

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总书记贝热隆曾说，“目前通行的实践方式只能导致混乱，导致对工会组织的否定，并最终导致它的瓦解”。他认为，“工会不能是工会之外的其他东西，它只是男女工人聚会的场所，这些人都意识到必须保卫他们的职业利益”。因此工人力量总工会信奉集体契约和协商的原则，它对工会的政治化持怀疑态度。这些情况能为工人力量总工会提供合理性吗？更为宽泛地说，能为像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和企业干部总会这样的改良工会提供合理性的论据吗？

经济危机开始后，法国总工会和民主劳工联合会成员的人数都有明显下降。这是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 1974 年起，长期被视为工人斗争的象征的企业，如贝尔福的阿尔斯通和卡昂的萨维扬，其工会成员的数量都开始下降。工人遭遇的经济困难是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工会甚至走向了瓦解，如隆威和洛林的冶金业就是如此。1978 年和 1979 年，当左派在大选中失败后，工会活跃分子的数量也在下降；工会甚至在选举中持观望态度，这就使

得左派的失败更形严重。不过，工人力量总工会的成员看来并没有下降。这是因为它一直坚持社会谈判的政策路线吗？换言之，是因为它的政策针对的是企业和职业的层次、是因为它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吗？

各大工会组织，或更广泛地说，各大工薪劳动者组织，它们的成员数量及各自的影响力有何变化？

工会的追随者依地区和部门的不同而呈现明显的差异性：1979年，法国总工会在工业部门的劳资调解委员会的选举中赢得了50%以上的选票，它在商业领域也一马当先，但在农业中则被民主劳工联合会超越。

众所周知，民主劳工联合会在西部地区根底很深，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在北方的矿工中影响很深，而工人力量总工会则在科西嘉岛、在公共机构和某些公营企业中（国营航空航天工业公司、银行及保险业）根基牢固。

936　如果我们认可各工会组织（包括各“独立工会”）自己宣布的成员数目，那么全体工薪人口中参加工会的比例为30%。事实上，这个比例更可能是在25%左右，而且各部门之间有很大差别，每个部门内部又因企业规模而有不同：如在农业工资劳动者当中，参加工会的只有10%，出版业中的比例则超过50%，小学教师中的比例达80%。另外，可以看到，大企业中的比例要高于小企业。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1974年后，这些比例开始下降。

尽管大部分部门和行业中参加工会的比例不高，尽管法国的工会在组织上是分裂的——有时在工会组织内部也存在各种难以调和的派别，我们却不能据此推论说，工会并不是法国工人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甚至此前的社会斗争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工会组织发动的大规模行动总是有众多的工人群众追随，这一方面是因为，行动的动机有时并不因为政治环境的不明朗而含糊不清，另一方面是因为各大工会组织有时能达成最小限度的谅解。另外，如果说在意识形态的取舍方面各方存在深刻的分歧，但它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存在

十分广泛的一致性，如拒绝作为一种制度的资本主义（这与北美和德国等地的工会运动有深刻的差别），其次，拒绝纯粹同业公会形式的工会运动。最后，在重大的行动目标和要求的层次上也存在广泛的一致：如保卫工会的权利，工资的自由磋商，提高工人、特别是处境最不利的工人阶层的购买力，保障就业，削减劳动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其中的某种主要目标受到政治权力机构或资方的严重威胁时，各大工会组织都会采取行动（即使不是共同行动）的原因所在。这样，尽管工会的分裂在加深，工会仍吸引了大量劳动者，最近我们仍能看到这种情况，如贝尔福地区的阿尔斯通－大西洋企业的冲突和1979年的劳资调解委员会的选举。

中产阶级

根据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确定的社会－职业范畴，我们可以对下述次级范畴作出十分粗略的区分：这就是人们有时所称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但是许多特殊情况也说明，在“社会阶级”之间引入这样的社会－职业分类方式是武断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类表中的特殊情况何其之多。

首先是“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社会－职业的次级范畴分类法。根据这个分类方法，在工程师这一类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从高等专科学校毕业、通常在公营或私营部门担当“经理”或领导职务的人，也能看到“普通出身”、或曰二流学校毕业的人员。非常明显的一点是，这两类人一般来说在收入和资产水平上很不平等，他们一般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且他们担任的也不是同样的干部职务。同样，在“教师、文化和科学职业”和高级行政干部中也有次级分类：但大学教师的收入明显高于中学教师；而一个代理人或助手与大律师或部门主管竟处于同一类别中。

其次，“中产阶级”和“大众阶级”之间也有问题。大部分技术员的教育水平只相当于或低于专业技能合格证书的水平。很多中层管理干部不能归入中产阶级，单是他们的收入低于技术工人就构成一个理由；很多小学助理教师也是如此。另外，小学教师普遍信奉世俗化、　937

互助制和共和主义的传统，他们构成一个十分特别的阶层，他们参加全国小学教师联合会（S. N. I.）的比例非常高，这就是一个表现。相反，某些服务业的职员，如空姐和咖啡馆的服务生，他们在中间阶级中“占据一席之地”肯定更为合适。

最后，很大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像某些“小商人”、某些手工业者、当然还有稍后我们将看到的部分农民，难道他们不正在被无产阶级化么？

博德罗、埃斯塔布莱和马勒摩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努力确定“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并将它与其他社会阶级区分开，后者如资本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等。为此他们试图明确今天的“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占的位置。

根据他们的看法，这个中产阶级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小产业和服务业小资产阶级；

——国家机器中的干部小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经济机器中的干部小资产阶级（尼科斯·普兰查斯称之为“新兴小资产阶级”）。

正是最后一个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承担了“资本家阶级”原本承担的生产关系的某些次要方面：监管，生产性的脑力劳动，管理工作，生产组织。

“这个阶级不应与资本家阶级混为一谈，因为它只分享后者权力的很小一部分；它自身并不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对于资本积累的政策，它没有发言权。”“但它也不能混同于无产阶级。从历史上说，它的出现及存在的根据只在于群众的无产化和无产阶级向资本的逐步屈服之中。”

例如，教师大体上可以被归入小资产阶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部分剩余价值的转让中获益（严格来说，他们的工资高于对其劳动能力的估算和其再生产的价值），而且因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不过，尽管从收入水平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说，人们可以说小

资产阶级存在某种一致性，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总是具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更不用说“同样的阶级意识”了。他们非常不同的政治选择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参加工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正是我们关心的。

以公务员、特别是教师来说，我们已经看到，一般来说，他们组成的是十分独立的联合会，如全国教育联合会，不过这些联合会的政治选择相当接近于各大工人工会组织，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上述的种种分歧。

小商人处于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之中，他们受到因大规模的集中而被无产阶级化的威胁，十几年来，这种集中波及到商业销售业，因此小商人们以团体为基础进行自我组织，但往往具有十分反动的色彩（如布热德运动和尼库运动[①]等等）。

此外还有公营或私营企业的干部，我们将把他们与领导干部仔细地区分开。1944 年成立的企业干部总会（C. G. C.，1975 年后夏庞蒂埃继马尔泰尔成为总书记）起初没有能从各大工人联合会的干部中吸收大量成员，不过 1968 年对它而言是个转折点，虽然一些技术人员表示不满，并导致了 1969 年的分裂，后者创建了干部和技术员联盟（U. C. T.）。事实上，近 10 年来，在企业委员会的选举、补充退休金管理协会的选举及劳资协调委员会的选举中，企业干部总会的影响力在稳步发展。今天，该协会已经拥有近 30 万成员，它尤其是企业中层干部的思想意识的代表者，这类成员约占协会总人数的 40%（工程师和高层干部占总数的 45% 左右）。

① 尼库（Gérard Nicoud）于 1969 年发起成立“独立劳动者全国自卫联盟”（CID-UNATI），这是一个抗税运动，从其思想观念而言堪称布热德运动的延续。

938

社会阶级中的社会－职业类别分类

	大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	工人阶级或相邻社会阶层	农民
农业经营者	"大农产主"			中小经营者
工业工资劳动者			375000	
工商业主	工业家→ 60000－20000 大商人→ 187000－23000	手工业者： 534000－86000 小商人或 渔业经营者： 930000－115000		
自由职业者和高层干部	自由职业者→ 172000＋32000 工程师 256000＋70000 高级管理干部（包括法官） 654000＋200000	←教师、文化和 科学工作者 377000＋164000		
(939) 中层干部和技术员		小学教师↔ 737000＋175000 医疗和社会服务业↔ 298000＋125000 技术员↔ 759000＋228000 中层管理干部 97000＋230000		
职员			3841000	
服务人员		其他服务人员 855000＋197000	仆人 234000－46000 女佣 154000－73000	
其他		艺术家 59000＋9000 教士 197000－20000 军队，警察 348000＋10000		

我们有意把某些社会－职业的次级类别放在两个阶级之间，以显示它们在不同阶级之间的流动性——当然这一流动性并不强，同时也是为了说明这样的分类法中的不确定性。箭头正是为了表明这种不确定性，说明某个次级类别可以根据标准之不同而归入这一类或那一类。数字是1975年人口普查中各次级类别的人数。正负号说明1968年和1975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变化。

从策略上讲，如果说法国总工会下设的工程师、干部和技术员总会与工人力量总工会下设的全国工程师和干部联合会在方针上有时会相互接近的话，那么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的立场相对来说较少等级化色彩，这让法国总工会中的干部感到不快，因为后者十分注重维持等级制。在某些行动方式，如占领工厂和拘押企业领导人等问题上，双方的对立更加明显，这样的行动有时会引发"白领们"的激烈反对，如他们就曾反对圣布里厄法国联轴厂和南特的巴黎工厂的工人罢工（1973年）。 940

大资产阶级或领导阶级

从19世纪以来，有关法国资产阶级历史的著述向来丰富，直到最近还是如此。这里只对这个"领导阶级"作一点简要的述评，并简要回顾一下最近30年来其权力战略的演变。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把这个领导阶级称为"资本家资产阶级"或"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是否依然保持着这一地位，还是被比尔南所称的"经理们"或加尔布雷斯的"技术阶层"从昔日的宝座上赶了下来呢？

如果说，60年代初以来法国所经历的工业和金融的高度集中化深刻改造了法国的资本主义的结构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结构，那么它并没有导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消失。不过，这种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也在发生演变。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上的所有制和法律上的所有制之间是相对分离的。这个现象与股份制公司的发展有关，它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它是最近20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特点。在有关经济权力的社会学意义上，它带来了明显的变化。

集中化运动使得许多“资产阶级的世家大族”失去了昨日的地位——如我们可以想到“布萨克帝国”[①] 的衰败——但别的家族由此得益，它们在70年代充分显示了“家族资本主义”的活力，如勒诺·吉耶（罗讷-普朗克），弗朗索瓦·米其林，标致，文德尔（冶金），贝甘和萨伊（制糖），阿加什-维罗（纺织）。莫兰指出，法国的前200家工业公司中，100家仍处在家族的控制下。但是，今天的家族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声势逼人，还不如说备受威胁，很多情况下，它们只是由于同银行集团（尤其是苏伊士集团）的联盟关系才得以继续生存。

不过，随着法国资本主义中金融结构的演变、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发展，70年代出现了新的企业控制形式，并使一批作为受雇者的管理者——新的“经理”阶层掌握了权力，比如圣戈班-蓬塔穆松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罗歇·马丹，电力总公司的总经理昂布鲁瓦兹·鲁，贝西奈-犹齐内-库尔曼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菲利普·托马斯，弗朗索瓦·塞拉克所代表的技术管理阶层被称为“老板们的老板”，但这些人甚至不占有或只占有很少的生产资本。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技术专家控制下”（F. 莫兰的说法）的大型工业企业，无一例外地都与苏伊士和巴黎巴这样的银行集团捆绑在一起，而后者也处在技术专家们的控制之下。

941 既然这些大经理们并不占有重要的资本，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些工薪者有类于中产阶级呢？我们不能这样认为，因为领导的职责不能混同于日常的管理或干部行为。经理们可以进行战略决策，但大部分的干部（工程师和高层干部）则无法干涉经营管理的决策。双方之间存在一个实在的社会界限。

事实上，“经理们”知道，他们应把自己当作权威的受托人和企业利益的捍卫者。只有在严格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他们才能获得

① 布萨克（Boussac）是20世纪法国的一个工业家族，业务以纺织品著称。1978年，这个家族企业倒闭。

和保持最高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领导者们，不论他们是不是所有者、是不是受雇者，都具有同样的立场的原因所在。虽说他们并不是从小就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观，但这些观念现已内化于他们身上，因为为了达到权力的顶峰，他们需要始终按照这些价值观行事。所以，这些高级管理干部类似于工商业主阶层。

国家的“重要官员”和政治人物，与公营企业的干部和绝大部分的公务员之间，同样也存在这种区别。

归根结底，这一领导阶级、即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成员，其数目是非常少的。有多少？这里我们只能作一点估计。

在法国的160万家企业中，如果我们排除150万家具有手工业特征的企业（不雇用工人或受雇者少于10人），那么工商业主大概为10万左右。根据1975年的调查，工业企业总数为6万家，由于近五年来的集中，这个数字肯定有所下降。1977年，在这余下的数字中，雇用200人或200人以上的企业为数甚少（3346家）；500或500人以上的为1243家，1000人以上的仅为541家。同一调查还显示，“大商人”计18.7万人，但调查使用的标准（雇佣3人或3人以上的商家）完全不能用作“大资产阶级”的标准。不过我们可以利用1977年超级市场和大型超市的数字来估算大商业资产阶级的数量（这两类商场的数量分别为3297和368，前者平均雇佣30人左右，后者超过200人）。因此，可以归入上层阶级的工商业主很可能不超过1万。不过这个数字还应加上金融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的领导人的数量，他们可能是总经理、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或是大股东；此外还应加上大部分保障工商和金融业产权的自由职业者的数字，这些人如交易人，公证人，律师，顾问，研究所人员，专业地产代理人等。上层阶级中还应包括负有保卫生产制度的特殊职责的人，如维持内外秩序的人员（军队和警察的高层干部等），或更为普遍地说，就是国家机器的负责人（权威机构中的高级官员）。甚至还可以加上一小部分致力于捍卫和宣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教育工作者）；最后，当然也可以

加上政治领导阶层和大地产主……因此可以看成大资产阶级的领导阶级的总数可以有几万人。这个阶级在数量上很少，但它集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却很大。

代表这一社会阶级的是哪些工会或职业性组织呢（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应被排除在外）？这些组织十分多样，从俱乐部和简单的协会（如高等专科学校同学会及其他各种联谊会），到雇主联合会（如法国天主教雇主总会，青年领导干部总会——1968年之前名为青年雇主总会，工业领导干部协会，以及大企业联合会），直到名副其实的仲裁组织（如工商议事会等）或同业协会；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最后一类机构。

942

由于近十年来经济的迅猛演变，如今，“小业主”大众与大企业主们的命运已经判然有别了，前者组织在1944年让冈布尔建立的中小企业总会中，后者的组织是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C. N. P. F.）。应该指出的是，莱昂·让冈布尔虽然一直是中小企业总会（C. G. P. M. E.）的首脑，但他那不可分享的权威不时受到冲击，这就是布热德（50年代）和尼库发起的更为激烈的行动。1954年以后，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数量迅速减少，因而直接的暴力行动方式比这位中小企业总会总干事所代表的更为古典的方式更能获得成功。

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的成立宪章于1946年5月12日签订。事实上，大战结束时，资方的声誉很坏，因为其成员过多地与占领者合作，而且同维希政权设立的行业委员会也存在制度上的合作。不过，在戴高乐将军的特别推动下，1945年初开始的谈判终于决定设立一个联席委员会，后者负责起草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的计划。

战后的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是法国雇主总会的继承者，雇主总会是于1936年从法国中小企业生产联合会中产生的。不过此后，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是作为各协会和联合会的联系组织出现的。所有企业都应在职业性组织和地区性组织中拥有代表者。不过它与工人的工会组织有所不同，因为后者试图对地理或水平的结构（同盟）和垂直的结构（总会）一视同仁，但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

则明显优先于各个行业协会。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某些行业协会，如冶金和矿业工业同盟，长期以来在资方的政策导向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战后的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在组织上有了发展，但直到1969年10月的改革之前，它基本上是个联系各个性质不同的企业的组织机构。由此便产生了许多矛盾，首先是以外贸为导向的大企业和众多受到边境开放之威胁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冶金、机械和化工等协会是会费的主要缴纳者，它们与那些穷协会之间也存在矛盾。此外，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在面对其他“对话者”（即国家和工薪者的工会）时，内部的不统一也使得它缺乏组织性，显得力量不足。

这种状况造成的困难在1968年6月的格勒内尔谈判中清楚地显现出来。尽管参加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的企业占全国净增产值的3/4，雇员近千万，但实际上它无法约束自己的受托代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严厉批评他们的主席保尔·于弗兰实际上是冒用他们的名义而承担某些责任。于是，弗朗索瓦·米其林及全国橡胶工业协会脱离了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1969[①]年5—6月的事件过后，资方的代表们不得不于1969年10月28日进行改革。

943

改革后的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旨在确认和推行一种“工商企业的发展政策”。就是说，它的章程将不再像1965年1月19日浸染着“原生自由主义”精神的宪章那样，强调“资方的功能”，而是侧重于“工业政策”——令人奇怪的是，一直到当时，公共权力机构几乎是工业政策唯一的代言人。其次，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将承担起在公共权力部门、社会对话伙伴和舆论面前代表全体企业的责任”。以前，这种作为资方组织的代表的性质只是例外的情况，现在则成为通例。

1968年后，有两个事件明显地使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发生了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1968年。

转变。

首先，无论是从成员的数量还是从对他们的控制的有效性上来看，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显然已经成为法国全体雇主的代表，只有中小企业是个例外。1972 年，弗朗索瓦·塞拉克接替了保尔·于弗兰的职位，从而也继承了 1969 年改革的成果，他个人并不反对同中小企业总会的联合，但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紧迫形势，特别是在 1978 年 3 月之前左派势力上升导致的恐惧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之下，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的代表性同样也得到了加强。

其次，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自身拥有了某种经济、特别是社会方针。在经济方面，从第六个计划起草过后，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成为高速增长和开放经济的拥护者，即使在经济危机中亦鲜有动摇。此外，它还毫不掩饰地主张回归市场经济的原则，主张提高企业家的作用，并捍卫作为增长的引擎的利润。

但资方在社会方针上的演变最引人注目。塞拉克甚至称之为“雇主的革命”。按他的说法，“集体谈判的普遍化已经使得社会问题真正被下放到各个协会去化解。人际社会关系之处理中的指导性和等级化做法正逐渐被排除。大批的协会占据了这个领域……”

因此，雇主革命旨在重新占据社会领域。怎样占据呢？就是取消工会的抗衡势力的基础，当时，这个基础在于工会通过员工代表、企业委员会的代表或工会本身的代表而营造的“不满情绪的资本”。而 1968 年 12 月 27 日关于企业中工会权利实施方式的法律又大大加强了工会的权力。为理解“雇主革命”的要害所在，我们应考察 1968 年以后集体谈判的演变。

1968 年之后的集体谈判和契约政策

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在法国，法律的地位十分重要，它通常可以确定有关各方的关系状况，从而取代它们之间的谈判。确实，法律的作用十分重要，即便它只是确定集体谈判的制度框架和条件。如，1950 年 2 月恢复工资的自由谈判制的法律，1968 年关于企业中工会部门的法律，1971 年 7 月 13 日关于集体谈判和在全国推广行业

性和跨行业协定的可能性的法律。不过，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大部分这些法律都是在有关各方长期谈判后制订的，这样的谈判有时是采取非官方的形式（如根据"贤哲"们起草的报告），有时则是在官方（如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斡旋下举行的。另外，行业协定经常是作为法律规定或其补充条款实施的。例如，1967 年洛林的冶金业社会协定和 1969 年关于就业的跨行业协定，与 1963 年有关全国就业基金会的法律不可分割。有的情况下，这样的协定是法律的先行者和雏形。如 1970 年 7 月 9 日的协定，该协定初步制定了职业教育改革和资助继续培训的计划，因而成为 1971 年 7 月 16 日关于上述问题的法律的前身。而 1976 年 7 月 9 日的协定最终补充和明确了该法律的责任。同样，1978 年 1 月 19 日的法律扩充了 1977 年 10 月 10 日按月领薪的协定。 944

因此，在法国，法律和协定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它们有紧密结合的趋向。同样，在有关劳资冲突的处置中，公共权力机构在介入时经常撇开了有关仲裁或斡旋的法律程序，这些程序实际上很少运用。为了解决棘手的冲突，劳资双方经常接受这样的调解，有时甚至请求公共权力机构慎重地介入……因此，政府会根据冲突的程度，委派劳工监察员、省长或某个高级官员充当程序之外的调停人。因此正如雷诺提出的，"当必须作出让步时，接受行政机关的建议是一种能保全颜面的方式（有时可能是迫使政府的受托人接受这些让步）。"

不过另一方面，集体谈判中产生的规章不能取代劳动市场上各行为方的决定。因此在法国，工资的实际水平很多情况下不在谈判之列，谈判一般只涉及最低工资表、工资级差和相关的指数条款。

最后，集体谈判可能给与资方的单方决定以重要地位。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行业协议没有达成时，资方的决定会生效，但在这种情形下，资方的决策不能不考虑谈判决裂前双方达成的结果。此外，工会的多元化局面只会使单方决定日益增多，这实际上在真正的集体谈判和纯粹的单方决定之间造成了"中间状况"。

但是，单方决定可能也是资方的某种策略意愿的结果，他们希望绕过集体谈判这个“社会变迁的主要工具”，因而也就回避了工会本身的抗衡势力。

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最近15年来的发展有什么特点呢？

1968年的风暴之前，集体谈判曾长期被冻结。这种冻结的原因可能在于资方和官方十分愿意相信的一种说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导致对立各方的缓和，因而使得罢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无益的事……

1968年的风暴和总罢工在各派势力之间造成的可怕关系将这些美妙的幻觉一扫而空，随着格勒内尔“报告”的出台，一股巨大的集体谈判浪潮席卷了公营和私营企业及公共机构。1969—1974年间进行的谈判比整个1950—1968年间还要多。1969年后，由于诺拉报告的实施，“契约政策”首先在公营部门的“重点”企业中推行，这些企业中先有法国电力公司和法国煤气公司，接着是国营铁路公司（1970年）。公营企业中签订的协定共计约150个。其他协定涉及的是公共职能机构，牵涉200万民事部门的工薪职员以及40多万军人，这其中还不包括退休人员和地方机构的职员。它们涉及薪金、级别的调整、劳动时间及社会问题等等。应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协定与“年度碰头会”使得上述人员的待遇明显赶上了准公营部门的水平。但是，总体上说，从1977年起，公营部门内部的谈判十分艰难，因此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脱节。

对于私营部门，经济危机在1968年后重新开始的集体谈判的历史上标志着一个明显的断裂，此前的集体谈判中产生了某些引人注目的“最佳”跨行业协定：局部性失业补贴（1969年），继续培训（1970年），对解雇的经济补偿（1974年），1969年签订、1974年修订的关于保障就业的协定，以及关于改善工作条件、调整工作时间的协定，等等。与此同时，集体谈判的层次日益侧重于企业。1968—1972年的四年间签订的协定，比1954—1968年14年间还要多。

945

不过，尽管以工会组织为中介的“冲突的制度化”和“工人阶级的合法化”的进程在发展（埃德尔曼的说法），但按图雷纳的意见，边缘化的工人或自认为被边缘化的工人中的“决裂行为”也在增长，这包括私营企业（见前述勒芒的雷诺工厂和法国联轴厂单一工种工人的罢工）和公营部门的工人。因此，每年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持续在400万左右徘徊（这个数字远低于当时的意大利和英国，但大大高于联邦德国和荷兰）。

不过，经济危机也使得公共权力机构和资方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随着第一个巴尔计划的施行（1976年秋），公营企业和公共职能部门的“契约”政策被搁置，因为这些部门实际上已经不再举行集体谈判了。但资方态度的转变尤其显著。此后，工会运动在社会领域内没有了行动，后者被视为自由竞争的场所。事实上，企业管理层通过信息通讯、以管理干部为中间，可以与员工建立直接的联系，而无需以员工代表、工会代表或企业委员会的成员为媒介。这种策略在1978年以后变得十分明显；而这只能导致集体谈判的减少。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生产单位的迁移战略（有时迁往国外）、分包式生产方式的增多、临时性工作的增加等等，过去商定的协定的适用领域大为缩小。这种双重的趋向——协定的扩展受到阻碍、协定的适用领域缩小——对工薪者的工会组织来说构成巨大的威胁，并对1968年之后出现的“工人阶级的合法化”进程造成障碍。

农民

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不承认存在整体性的农民群体。人口普查把农民分为农业经营者和农业工资劳动者。四十年来，这两个社会-职业阶层的人数急剧下降，今天他们在可就业人口中只占200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700万。怎样解释马里沃纳·博迪盖尔提出的悖论：“农民的消失使得农民的意识形态充分发展起来”呢？这只是因为“农民成了一个象征：被忽视的文化遗产的贮存者、受威胁的地方特性的化身、危难中的大自然的园丁”么？或是因为“农村世界”

仍然是——要持续多长时间呢？——我们政治制度的脊柱么？确实，伊夫·塔维尔尼埃曾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保守派政治力量使得农民的观念持久化，使后者成为社会秩序的守护人，并总是试图让主张变革的人遭受失败”。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法国农民内部的政治派系千差万别，但应该承认的是，从第五共和国以后，农民经常是支持现存体制的：“1969年4月27日的全民公决投票中，农民是唯一以压倒多数投赞成票的社会群体，1974年5月19日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他们的选票占吉斯卡尔·德斯坦总得票数的69%。1978年3月12日和19日的立法选举再次证实了上述情况。

946

但从农民那里受益的不仅是政治势力。“大农业经营者”——通常也是大地产主——不只是种植谷物和甜菜。他们也培育了统一的农村世界的神话。所谓的农民利益的一致性，即便不符合实际的话，也仍是以农民中间强烈的阶级意识为基础的，这种一致性实际上使得农民中最大的经营者能从固定化的农产品价格机制中获取切实的利益，以前这种机制只限于国内，现在则扩展到欧共体。因此我们必须分析农民一致性的外表后的多样性。

农业工资劳动者

首先应该考察农业工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即便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时类似于“贫困农民”，但他们在身份上不应与经营者及其家庭助手混为一谈。实际上，虽然60%的农业工人仍能享受某些天然的优惠，特别是住房和食品上的优惠条件，但今天看来，“农场帮工”的时代几乎已经结束了。在组织行为和政治行为上，农业工人与工人群体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小。

在战后，民主劳工联合会、法国总工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等工人工会组织已经大大削弱了农业总会几近于垄断的地位。这些工会组织的所有行动都试图使农业工资劳动者成为完全的工薪者。在1968年5月到格勒内尔谈判期间举行的瓦莱纳辩论部分满足了这一重大要求，特别是它赞成确定跨行业最低保证工资（S. M. I. G.）。但是，只有等到1973年，农业工人才和别的工人一样，享有同一社会保障体系中的

权利，而且很多时候，按省签订的集体协议在基层得不到遵守。

今天，农业工人的某些要求已得到满足，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的数量却在迅速下降：1954 年为 120 万，1975 年不到 40 万，不足原来的 1/3。而且，根据 1975 年农业部的数字，在农业经营单位中长期工作的工资劳动者只有 25 万。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大农场的快速机械化，这些农场或是面积庞大，或是采取集约化经营（畜牧、苗圃、园艺、蔬菜和水果业等）。农业工人数量下降的原因还在于：今天的年轻人几乎都不愿从事如此艰辛（每周工作时间仍是最长的：49 小时）、如此危险（死亡事故率与建筑和公共工程部门相当）、薪水如此低（他们税后和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只有全体法国劳动者税后平均收入的 50%）的工作。由于这些原因，长期性的农业工人中已有越来越多的移民——季节性的农业工人更是如此；1975 年前后，长期性农业工人中的移民估计有 7.5 万，季节性工人中达 13.5 万，北非人和葡萄牙人逐渐取代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

不过，虽说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工资劳动者数量迅速下降，但农业工会、职业和互助性组织却有发展，农业教育机构中的就业机会有了增长，而农产品-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更为显著——1974 年，该行业中的雇员达 67.4 万。这里我们再次回到了前述的职业-社会分类（职员、工人、中高层干部、工程师等等）。

农业经营者

947

农民首先是农业经营者及其家庭助手，因为今天 85% 的农业劳动是由他们完成的。农业经营者在 1954 年仍有 190 万，1975 年只有 110 万左右；家庭助手的数量下降得更为厉害：从 210 万减少到 50 万。如果我们要区分这些笼统数字背后的社会阶级，那就应该根据某些简单的标准，如农用地面积和雇佣劳动力数量，来考察农业经营单位的分布状况。

根据克拉茨曼的数字，1976 年法国一公顷或一公顷以上的农场共有 120 万个，总面积约 3000 万公顷；其中 70 万个面积在 20 公顷以下的农场只占总面积的 1/5，即 600 万公顷；35 万个 20—50 公顷的农场

和15万个50公顷以上的农场占了总面积的80%。

其他指数：160万个农业经营单位中，110万个没有雇用长期或季节性工人。只有面积至少在30公顷以上的农场中（或温室型的集约化经营单位中），雇佣劳动才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100公顷以上当农场中，雇佣劳动远比家庭劳作更为重要（占64%以上）。

"大"农业经营者

因此，如果把这两个标准结合在一起，我们便能确定大农场、或称雇主式农业经营单位的大致数目：100公顷以上的3万个，接近于经营单位总数量的2%；较小的单位（50—100公顷）约为10万个。罗西埃把这些农场称为资本主义式的农业，它在巴黎盆地和北方尤其具有代表性，不过我们在卡马格或某些面积较小的单位中也能看到这种生产方式，如优质葡萄园，集约化的蔬菜和花卉栽培业（特别是温室栽培），工业化的畜牧业，等等。能进入这个接近于大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的农业经营者总共不足10万。

经营者和农民

但其他农民呢？毋庸置疑，他们属于范围更为广泛的家庭式农场，不久前德巴蒂斯曾如此定义道："家庭农场，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有些专家则试图确定这些农场的类型学。

例如，路易·马拉西斯在韦戴尔报告中对传统手工式的农业经营和新型手工式经营进行了区分，大部分穷困的农业就是由第一种方式构成的，它的经营面积不足，多种作物和畜牧业并举，几乎没有技术手段；后者虽已越过了生存底线，但代价是技术进步成本高昂和负债。1963年，第一类型的经营单位有100万，第二类型为60万个。

罗西埃首先区分了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农业，"它的面积不足，通常是由年迈的农民经营，主要坐落在难以应用现代技术、特别是难以实行机械化的困难地带（山区或半山区：阿尔卑斯山区、中央高原和比利牛斯中部地区）"。随后他又区分了现代农业，大部分的家庭经营单位属于现代农业。

948

罗西埃认为，尽管这两类农民存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但他们构成同一社会阶级。“现代”农民受“农民病”的困扰可能尤为严重，因为他们虽然进入了现代化进程、被经济增长的大潮席卷进去，但这是以家庭劳动的强化、负债的增长和对“吸收器”式的农产品－食品企业的日益依赖为代价的。

农民世界的多样性鲜明地体现在农民的收入不平等上。克拉茨曼认为，没有哪个社会集团像农民那样，存在如此大的收入差别。在这里，平均收入几乎没有意义。1975 年的相关数字比较准确。“就全国平均水平来说，10—20 公顷、以‘养牛和种植’为导向的农场，收入维持在 1.7 万法郎左右，100 公顷的农场为 8.3 万法郎，更大的‘通用型’农场收入更高。差距为 1∶5。但全国平均水平掩盖了地区差异。阿基坦－南方－比利牛斯地区的小型养牛场的收入明显低于同类型农场的全国平均水平，而北方－庇卡底地区的通用型大农场的收入则大大高于平均数；上述这两种类型农场的收入比为 1∶10 左右。西南部最贫困的养牛场与北部最富庶的大农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非技术工人与大国营企业的总经理的收入差距肯定要大得多。”另外，“法国的地区差异既表现在生产的自然特征上，也表现在经营规模上。因此可以料想，农业收入的地区不平等相当严重。实际上，以省为单位的平均数（1975 年家庭农场的总收入）就显示出了这些重大差距。”

说实话，很多农民家庭只是靠农业经营之外的零星收入（工资、退休金、津贴等等）才得以摆脱困境。对非全职农民来说更是如此，而这些人占了法国农业经营者总数的 1/3 强。

农民的工会和行业组织

经济地位的不一致、收入上的差距、对前景展望的不同，凡此种种，已经足以解释农民在工会和行业组织方面的多样性。不过，对“农民世界”还不能简单地采取经济类型的一维分析方法，远不能这样。其他因素，如历史、宗教和人口，同样也在起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业中的职业组织和工会运动尤其受到代际冲突的支配。代际冲突动摇了古老的左与右、教权主义与激进主义、

君主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对立关系。如，除了传统的农业信贷和互助组织，保守的农业同业公会，全国农业经营者总协会和专业化的行业协会（如葡萄酒协会），一个与它们相对的年轻农民的工会组织逐步建立起来，这就是全国青年农民总会（C. N. J. A.），它深刻影响了工会和行业运动。

起初扮演启蒙者角色的是天主教农业青年会（J. A. C.），它帮助年轻人认清农业的处境，批评农业的结构，并寻找新的出路。米歇尔·德巴蒂斯在全国青年农民总会成立前曾是这个协会的总书记，后来他还担任改革后的全国农业经营者总协会的总书记。但他独特的立场、全新的话语使得协会的地位从特许性的自治迅速转变为彻底的独立。全国青年农民总会也很快放弃了传统农民组织的要求，949 这些要求涉及保护家庭小农场（但这一要求有些虚伪，因为所有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大地产主），要求必须维持农产品价格。全国青年农民总会遵循天主教农业青年会最初的思想路线，强调改变农业经营结构的紧迫性，强调应通过农业的集团化来解决问题。它的很多成员在农业经营和技术推广组织（如农业管理中心和核算中心）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这些做法受到皮萨尼政府和埃德加·富尔政府的十分积极的响应。因此，1960年以后，全国青年农民总会与公共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确立起一种对话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对于全国农业经营者总协会和行业性组织来说是陌生的，因为它们总是倾向于向议会施加压力，并乐于涉足选举计划。全国青年农民总会的行动导致了1960年的农业指导法、特别是1962年的补充法（或称皮萨尼法）的出台。

但是，当初的年轻农民渐渐老化，他们控制了大量全国农业经营者总协会的省级协会及全国管理委员会的席位。因此，他们提出要求的方式和组织策略都在发生转变。德巴蒂斯现在是农产品－食品加工业的国务秘书，而此前他还担任着全国农业经营者总协会的主席，全国青年农民总会看来也很好地融入到全国农业经营者总协会中。当然，所有前天主教农业青年会和青年天主教农村运动（M. R. J. C.，1961

年成为天主教农业青年会的后继者）的成员并没有因此而“被归化”；例如，他们中有些人与贝尔纳·朗贝尔一起创建了农民－劳工运动，该运动与民主劳工联合会和统一社会党相接近，虽然它只团结到几万名活跃分子，但在西部和罗讷河谷地各省十分活跃。它的特点是通过突击性行动来支持自己的要求和斗争。

全国农业经营者总协会是个庞大的农民工会组织，由于1959年4月协调和保卫家庭农场运动（M. O. D. E. F.）的建立，它再次经历大规模的膨胀，协调和保卫家庭农场运动受到卢瓦尔河以南中小农民的地区性联盟的推动，首先是“普莱委员会”（1954年）成员的推动。这个运动在1975年改组成工会，并声称拥有20万成员；在最近几次农业同业公会的选举中，协调和保卫家庭农场运动获得的得票率接近于20%。共产党对它有一定影响。

中部和大西洋沿岸的农业名流有自己的组织：法国农业联合会（F. F. A.），但它只获得农民选票的5%。该联合会为提高农产品价格和保卫财产权而斗争，这就是说，它强烈反对任何农业结构性调整的政策。

全国农业经营者总协会在农业同业公会选举中获得的选票略微超过60%，它还与40来个专业性协会（小麦、甜菜、养牛、牛奶协会等等）结成同盟，但它已经丧失了作为全体农民代表的准官方垄断地位。它与政府商讨农业政策的垄断地位也已失去。各种互助组织（协作会、信贷机构、互助会）也致力于经营经济和社会事务。最后，农业同业公会的常设会议（A. P. C. A.）是个行业性的公共机构，除了咨询职责外，它还可以干预各省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如发展计划）。

农业社会互助基金会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农业互助保险金，从事个人、财产和责任保险，共有地方储金会26000个，省储金会66个，中央储金会一个，合同总数超过700万；另一个是农业社会互助金，它经营着三大基金：家庭补贴（工资劳动者和经营者）、养老保险和农业互助救济金。

农业协作会长期以来存在政治上的分裂：左派的“圣日耳曼街”
950 协作会和右派的“雅典街”协作会。1966 年以后，农业协作运动融入到法国农业合作协会（C. F. C. A.）中。

在经济方面，法国农业合作协会内部的两大集团至今仍相互对立，不过阵线逐渐模糊：一方是拉法耶特集团（其名称来自总部所在地街道的名称）和合作总同盟；另一方是左派的麦克马洪集团，从起源上说它主要是谷物和食品行业的专业化组织。今天，近 1/4 的农产品－食品加工业的营业额是由农业合作组织完成的。它的雇员约有 6 万人，占该行业受雇者总数的 15%。

在接近于农业生产的实际运作中，合作化行为特别活跃，但它随着产品深加工程度的提高而下降。这就是说，合作行为主要集中在利润最薄弱的生产中，而利润最丰厚的生产则由私营大型农产品-食品公司投资经营（泛西公司、B. S. N. －热尔韦－达能、勒希尔、雀巢等）。不过，几个合作集团成功地跻身于法国前 20 大农产品－食品加工企业的行列（索迪马－约普莱、布列塔尼合作总会、雷吉莱、联合科帕、加拿等等）。

农业信贷银行的基础是 3000 个地方性储金会和由地区储金会控制的、分布在全法国的 8500 个办事处。这些储金会受一个公立机构管理，这就是全国农业信贷基金会；各储金会为维护自己的行业利益，组成了全国农业信用联合会。农业信贷银行几乎垄断了农业部门的信贷业务，近 15 年来，它的客户范围大大超出了农业部门，在城市也扎稳了脚跟，而且城市客户更为稳定。出色的宣传工作、稳固的组织以及在税收和规章方面的特权，这一切使得农业信贷银行成为世界一流的银行企业……今天很难想象哪家银行主要是农民的银行。

1968 年和 1969 年的动荡主要是由令人不安的韦戴尔报告造成的，该报告计划在 1970—1985 年间“冻结”农用地 800 万或 1100 万公顷，也就是说要将耕地面积缩减 1/3（此前受到猛烈抨击的基索尔计划中缩减的数字仅为 500 万公顷），此后农民一直感到，作为一个群体，他

们受到了威胁。现在我们能理解，他们受威胁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农场从总体局面中获益甚大，我们可以从土地的快速集中运动中看到这一点。贫困但不负债的农民数量进一步减少，这或是因为他们中最年迈的人不可避免地消失，或是由于这些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何况经济状况在这一时期内一直不太好。经济状况最不稳定的是"现代农民"。几年来他们的状况由于第三国和欧共体其他国家的竞争、特别是英国的保护主义立场而恶化。不过，依克洛德·塞尔沃兰所见，尽管存在这些困难和威胁，仍将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家庭农场可以提供农业体系运作中不可或缺的小型商品生产，因为家庭农业经营者所承受的负担肯定要低于完全按收益最大化模式运营的资本主义农业。此外，还有一些因素（虽说不是全新的，至少是农民的集体意识中日益感受到的）可能为法国的家庭式农业经营提供新的契机：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国家令人不安的食品短缺，自然保护事业中日益被看重的农民的作用，更为平衡的区域发展措施，最后是对法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更大程度上的能源独立——这尤其包含食品生产、森林和生物性生产等等。

1975 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分布状况

951

年收入	家庭数量（%）
1 万法郎以下	9.6
1 万—2 万法郎	15.9
2 万—3 万法郎	17.3
3 万—4 万法郎	17.2
4 万—5 万法郎	13.4
5 万—6 万法郎	9.2
6 万—10 万法郎	13.3
10 万法郎以上	4.4
	100

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

前面我们对战后到 1974 年间法国经济增长的幅度进行了评估，接着又对经济危机后增长的明显放缓作了考察。但生产出来的财富如何在其创造者之间进行分配呢？或者说，如何在各社会－职业阶层分配呢？各社会阶级之间、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间、男子和妇女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是否有缩小的趋势呢？……

1949 年以来人均收入的演变

从 1949 年到 1954 年，人均税前的实际收入增长了 24%；1954—1959 年间的五年期增长率较低：18%。1960—1978 年间的增速翻了一番。若以 1978 年的法郎价格计算，1960 年的人均收入为 18060 法郎，1978 年达到 35690 法郎。以每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计算，1960 年为 43000 法郎，1978 年增加到 83000 法郎。

很多户主可能会认为这个数字偏高……原因何在？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这个数字指的是家庭取得一切货币资源，包括津贴和虚拟房租，而且一个家庭平均获得的不只是一份收入（据估计，每个家庭的劳动力平均为 1.3 个）。不过另一方面，平均收入掩盖了极大的不平等。上表已经对 1975 年每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的分布状况作了一个说明。

各社会－职业阶层的收入差距

根据下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各大社会－职业阶层内部每个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的大致状况。

从国民核算的数字以及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C. E. R. C. ）的计算来看，自由职业者和高层干部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是农业工资劳动者家庭的 2.5 倍，这再次与那些根据各方生活方式而作出的简单化评论相左。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统计学的组合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实际上，在某些阶层、特别是社会高层和农业经营者阶层，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比不同阶层的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明显要大

得多。如我们前面曾提到，一个博斯的谷物种植者与西南部一个小养牛户的收入差距可以达到10：1。

952

1978年各社会－职业阶层的平均可支配收入

非农自由职业者	15.31万（法郎）
高层干部	15.55万
中层干部	9.76万
农业经营者	8.23万
职员	7.90万
工人	7.51万
工业工资劳动者	6.20万
非就业者	6.14万
总计平均	8.40万

资料来源：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国民核算及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的计算。

同样，小商人和大企业的总经理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可以达1：7，如果以各“中等”阶层为参照，极端情况下差距可达1：25、50、100、150……

“原始”收入的分配

正确评估法国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困难在于，全国性核算虽然可以确定各大社会－职业阶层的群体收入（接近于真实状况），但如果我们想了解个人收入的话，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法。个人收入只有通过税收申报或调查才能了解。而在这两种情形下，某些种类的收入被大大低估了。

不过我们可以从中提出大致的数量级，以此来估计特别富裕和特别贫困的人所申报的“原始收入”的差距。

真正的富人

根据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1970年，1.1%的法国家庭向税务部门申报的收入超过10万法郎，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认

为，这在 1977 年相当于 23 万法郎。根据纳税统计，在这些家庭中，我们可以发现 8000 个纳税户，即 0.4% 的家庭，其 1973 年的收入申报超过 40 万法郎，根据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的估计，这笔收入相当于 1977 年的 68 万法郎。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在对各种低估的收入进行修正后认为，这 8000 户的年收入高于 105 万或 135 万法郎，这其中还不包括他们的遗产收益，当然也不包括遗产买卖和炒作而得的资本收益（证券、地产或不动产、商业基金等）。因此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人是真正的富人。

相反，要从质和量的维度来描述贫困现象则更为困难。

今天的穷人

贫困现象并非法国独有，但一般来说我们的了解很不充分。人们顶多只是偶尔从报刊或电视上知道一些“贫困的悲剧”。我们更加不了解这一现象的范围、特别是“贫困的恶性循环”的运动进程。富裕国家、特别是在法国，不仅存在“绝对贫困的孤岛”，而且还存在代代相传的贫困阶层。更有甚者，在多数情况下，贫困的演变进程是退化性的，就是说，物质上的长期贫困最后会破坏家庭稳定，引起各种阶级性失调症状：犯罪，身体和精神疾病，文化适应问题，等等。

953　这些穷人和不幸者到底有多少呢？有关的统计数字异乎寻常地遮遮掩掩。要获得确切的信息还应追溯到 1962 年的一项研究。这一研究披露，当时 27% 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低于 4000 法郎，就是说，即使再加上家庭津贴，这些家庭也很难维持基本的食品、住房和衣着开支。这众多真正的贫困家庭主要包括以下一些特殊阶层：非就业者（年迈者、病人、长期失业者，这样的人在衰落的老工业中心尤其多）和外籍劳工家庭，小农业经营者，农业工资劳动者，失去父亲的家庭，小商人等等。今天他们有多少呢？对此可以作出各种估计，它们可以因贫困的标准不同而相差甚大。

根据健康和社会行动局（D. A. S. S.）的一项统计，1977 年，6.7% 的工商业工薪者（约 80 万人）的实际收入低于跨行业最低增长工资额（S. M. I. C.），即每月低于 1530 法郎，每年低于 18360 法

郎。有人还估计，独立职业中（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约有80万从业者每年“赖以为生”的收入低于2万法郎。领取最低养老金（1977年7月后每年1万法郎）的人数估计为200万，享受残疾人津贴（每年约为1万法郎）的为25万。最后，如果加上60万接近于跨行业最低增长工资水平的劳动者、没有津贴或领受最低公共补助的失业者（申请工作的人数约为60万），“基本”贫困者，即低于或刚好达到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其数量大约为500万。但是，如果把“贫困面”扩大到1977年的工资水平高于S. M. I. C.、但每月低于2000法郎（仅比S. M. I. C. 高30%）的工薪者，那么我们还应该加上约400万这样的劳动者。不过，由于有些人是单身，有些人的家庭只有一份收入、或只有几份很低的收入，而有人的家庭则有其他更高的收入，考虑到这些因素，贫困者的个人状况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此外，“援助一切苦难－1/4的人”行动和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对5万—50万人口的城市居民进行的调查显示，1975年，7%的有孩子的家庭的原始收入低于S. M. I. C. 的标准（在兰斯，他们的收入每月为717法郎，而S. M. I. C. 的月工资标准为1260法郎）。

1950年至今工资的不平等

各种收入中我们了解最多的是工资。今天工资的分配状况如何？它的分布状况如何演变？以技术资格（等级标准）、性别、行业和地区为标准而区分的各大工薪阶层之间的工资差别又有何发展？更为普遍地说，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是趋向于缩小还是扩大？

下页图表根据工薪者的各大社会－职业阶层的工资额对工资的分布状况作了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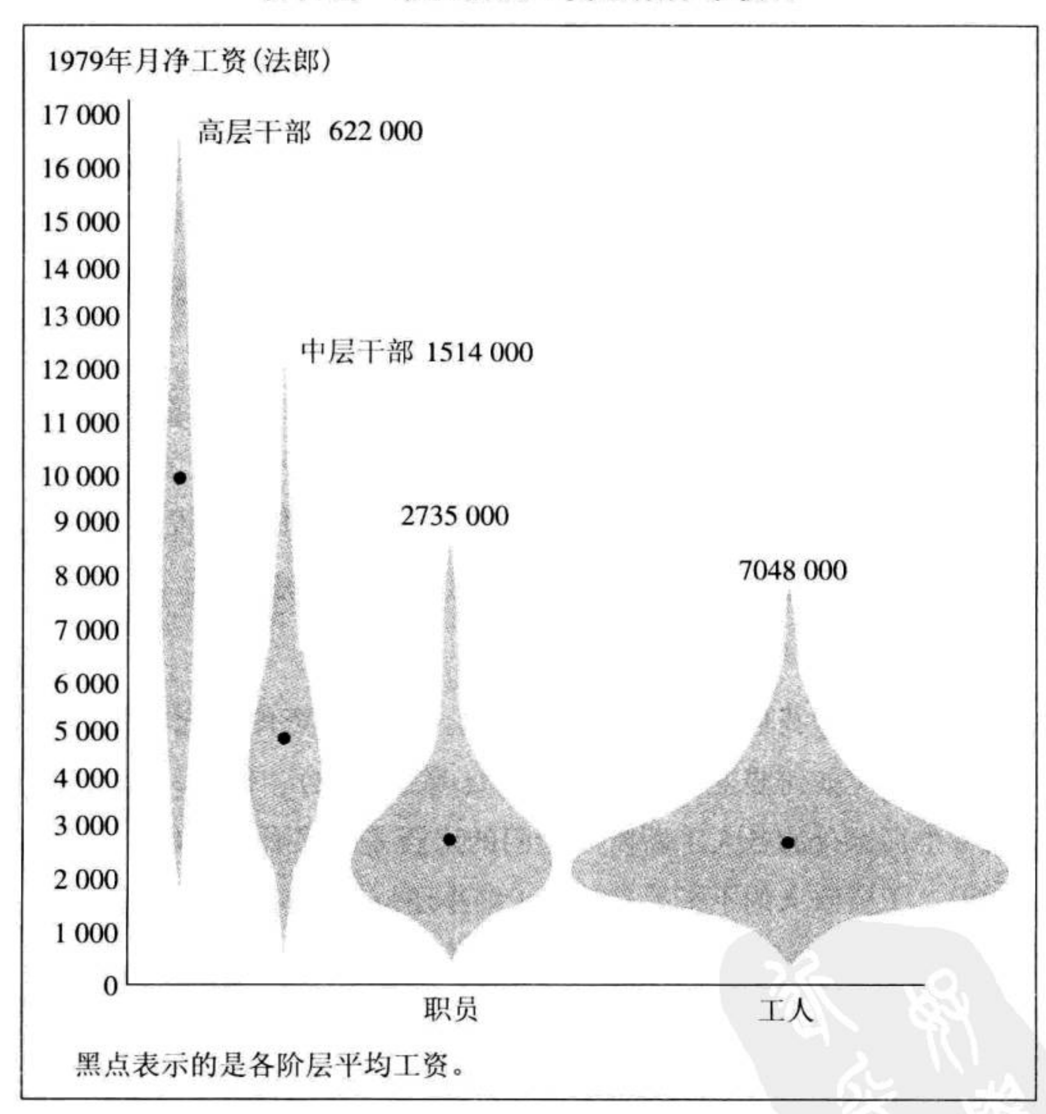
1954—1972年工资差距的扩大

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曾对1954—1972年间工资不平等的演变状况作过研究，它把这一时期分为1954—1963年、1963—1967年、1968年和1969—1972年四个分段。就全体工薪者来说，如将所有阶

层混合起来计算，1972 年的工资差额幅度明显高于 1954 年。差额在 1954—1963 年间有扩张；1963—1967 年维持原有差额幅度；1968 年差额曾急剧缩小；1969—1972 年又重新开始扩大。我们将对各个分段时期的不同趋向作大致的回顾，以了解各大工薪阶层（干部、职员、工人、男子、妇女等等）工资差别的演变状况，1968 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各社会—职业阶层工资总额分布状况

954



资料来源：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1979。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一时期工资的主要差距。我们首先可以从社会-职业阶层的工资级差概况开始，1972 年时这种级差具有如下特点：

——干部的平均工资是工人的四倍；

——男子的工资是妇女的 1.5 倍（当然，这个差别主要反映了男子和妇女各自从事的职业在技能级别上的平均差别）；

——“石油和液态碳氢燃料”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卫生和家庭服务”行业的三倍，大约是服装、皮革、木材加工和家具、纺织等行业的 2.5 倍；

——最后，巴黎地区的平均工资是外省平均工资的 1.5 倍。

那么，1972 年的工资差距与 1954 年相比是呈现增大还是缩小的趋势呢？

——1972 年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差距与 1954 年大致持平，有关数据如下：

比　例	*1954*	*1972*
“高层干部”平均工资/“工人”平均工资	4：1	4：2
“中层干部”平均工资/“工人”平均工资	2：0	2：0

955

不过，整体而言（将所有位于高层干部和工人之间的中间阶层囊括进去），1972 年的工资等级差异要明显高于 1954 年。

——相反，职员和工人之间的差异缩小了，其比例从 1.13 降为 1.06。但应看到，这种结果部分是由各行业中职员工作的女性化造成的，因而也是妇女平均工资处于较低水平的一个反应。

——1972 年男子与妇女之间的工资差异大致与 1954 年相同。

——尽管工资地带制度被废除，但巴黎地区与外省的工资差异仍有轻微上升。

——各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别有十分轻微的下降。

总起来说，在整个 1954—1972 年期间，增长最快（远比其他类型的差异快）的工资差别是等级工资差别。随后是巴黎与外省的工资

差，但性别工资差维持原有水平，部门之间的工资差有所下降。

如果对工人阶层内部的工资差距作更为细致的考察，我们会发现，1972 年熟练工人与非技术工平均工资的等级差实际上与 1954 年持平，但这个差别在 1954—1968 年间曾有扩大，不过随后大幅度缩小。相反，巴黎 - 外省和行业之间的差异减小了。

干部阶层内部的演变十分特殊：1954—1967 年间，工资差缩减，而当时普遍的趋势是工资差在扩大；这个独特的现象在 1968 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而“风暴”过后工资差普遍急剧下降，1969 年后又有扩大的趋势，但在干部阶层内部的演变趋势大体与之相反。

在所有可以解释工资结构演变的因素中，我们可以指出其中的两个：跨行业最低保障工资（S. M. I. G.）和跨行业最低增长工资（S. M. I. C.），以及劳动市场的状况。

从 1955 年到 1967 年，S. M. I. G. 只是勉强且“很不情愿地”跟上了生活费用的上涨。它并不被视为确定低工资的优先标准。因此，劳动市场的紧张关系在工资差的总体演变趋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某些技术工种的短缺造成工资级别差距的拉大；相反，由于农村人口外流导致的“普通”劳动力供应充沛、由于更多的妇女和外来移民进入劳动市场，普通工资水平的增长受到抑制。事实上，每次提高 S. M. I. G. 都是从底部缩小工资差的扇面，但几个月后又会发生相反方向上的“拉手风琴运动”，即拉大工资差的扇面，如此确立的工资等级有利于那些薪水更高的工人和工薪者。在这种条件下，S. M. I. C. 逐渐严重滞后于平均工资的增长。

1968 年及随后几年中，S. M. I. G. 变成 S. M. I. C.，它被看作为提高低工资而优先运用的一项工资政策工具。

不过这一次，S. M. I. C. 的连续提高并没有导致工资结构中其他部分的补偿性手风琴运动。这一现象的原因应到 1968 年后劳动市场的新趋势中去寻找：由于就业培训水平和参加人数的提高，劳动市场不再那么紧张；失业率有增加的趋势，甚至经济危机前就已很明显，这其

中包括技术工和干部；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工资差的缩小，特别是 S. M. I. C. 与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从 1972 年至今

最近几年的大体趋势已很明显，特别是经济危机以后。

956

1970 年以来工资指数的演变

	1970	*1975*	*1978*
S. M. I. C.（年平均水平）	100	213	311
工人每小时工资水平	100	196	282
工人每周所得	100	187	267
每月所得：			
——职员	100	186	259
——技术员和师傅	100	181	247
——干部	100	170	230
公务员的待遇：			
——C 类和 D 类（最低级）	100	182	246
——B 类	100	174	235
——A 类	100	165	227

资料来源：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n. 51.

最低工资的增长幅度在工资等级的整体结构中更为迅速，无论是在私营部门还是在公共职能机构都是这样，对此上表已作出了很好的说明。S. M. I. C. 的增长尤其突出。

再分配和不平等状况的演变

法国也像大部分西方国家（日本是个例外）一样，转移支付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因此，各种经济因素从经济活动中直接汲取的资源的份额也就不断下降。

1960 年，原始收入，即经济行为中的各种“因子”以工资、利润、利息等形式获得的收入，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为 66%。

1978年，这个比例只有61%。但原始收入又因为收入税而再次打了折扣。因此税后可支配的收入在1960年占61%，而1978年略低于55%。在此期间，再分配系统的总征收额从37%提高44%。各种社会津贴在1960年占国民收入的15.5%，1978年达26%。1960年，家庭收入的1/5来源于社会津贴，今天则占到1/3。另一部分“社会收入”，或称再分配的收入，是由免费提供的社会服务构成的，这部分收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占国民收入的20%左右。

因此无可争辩的一点是，20年来，各种形式的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收入，或曰按社会标准进行再分配的收入，其比例大为增长，而劳动者直接从经济生活中获取的经济收入的比例则降低了。

这种再分配的机制如后表所示。

但这一普遍趋势并不自动意味着它是一种垂直型的再分配，即从最富的人向最穷的人的转移支付，再分配也可以是水平的：健康者向病人、单身者向家庭负担者、青年人向老人的再分配，等等。

1960年至今法国的状况如何呢？大规模的再分配明显缩小了前面提到的原始收入的不平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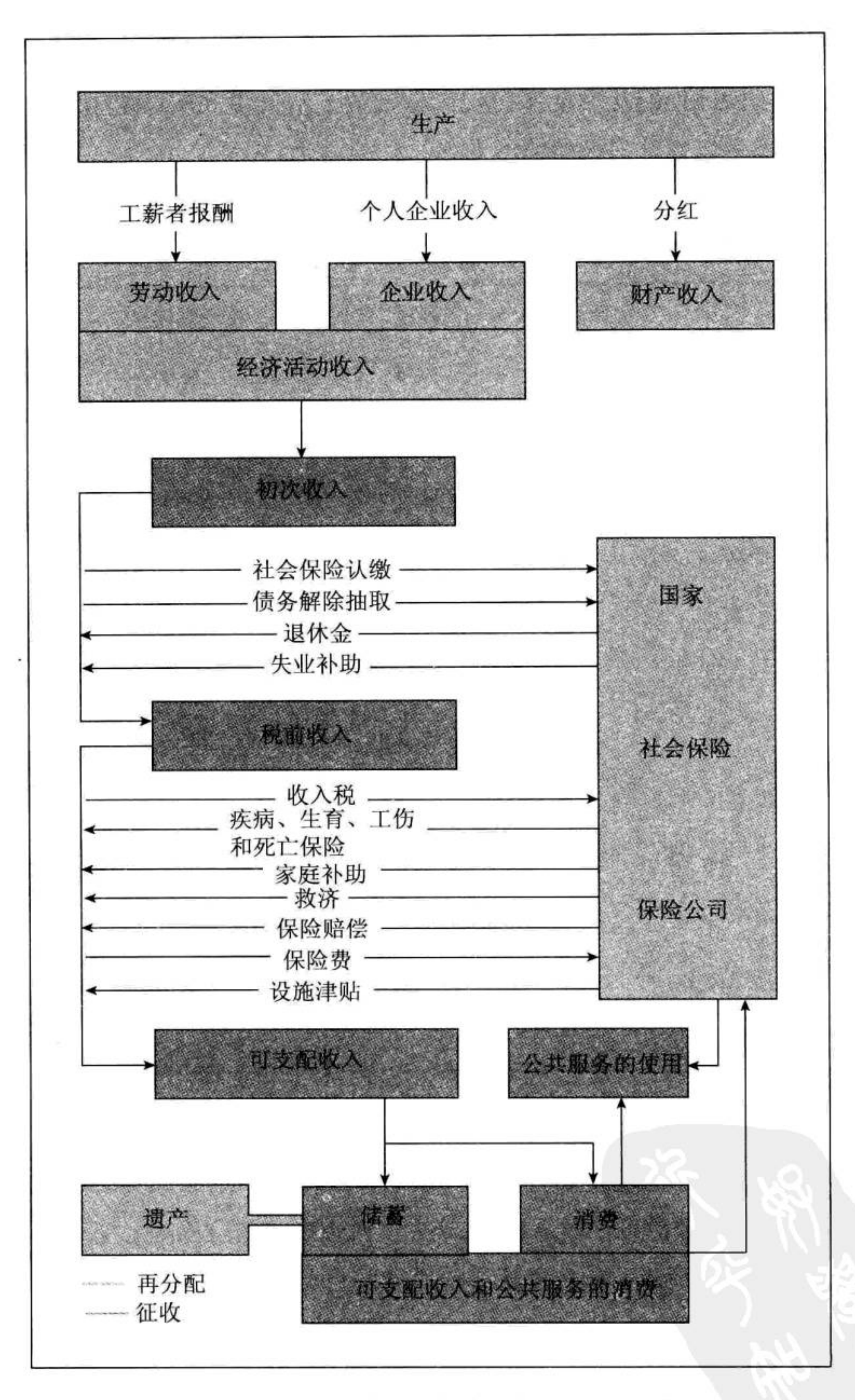
税收和附加税征收的不平等

消费调查研究资料中心和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确定1976年的税收和附加税征收在各社会－职业阶层的原始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基数为100）。（见1476页表）

957

直接税一栏涉及的主要是个人收入税（I. R. P. P.），很明显，这种税有累进的特点：整体而言，收入更高的社会上层比较低的社会阶层负担更重。

间接税一栏涉及各种消费税，特别是增值税（T. V. A.），与直接税不同的是，这一栏的情况显示，该税是极不公正的，它的征收额占家庭原始收入的12.1%，而直接税只占7.6%。实际上，收入越高，免于此税的收入的比例也越高。因此，富裕阶层的原始收入中只有一



收入分配示意图（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1977年）

小部分缴纳了这种税收。相反，收入低微者几乎在消费中花费了所有的收入。因此他们几乎全部的收入都缴纳了增值税。所以增值税的差别比率不足以弥补它极端的不平等。

958

1976 年各种税收与家庭原始收入之间的比例

	原始收入	直接税	间接税	社会保险金	合计
0. 农业经营者	100	4.4	8.4	10.0	22.8
1. 农业工资劳动者	100	2.2	13.2	30.8	46.2
2. 独立职业者	100	11.7	6.3	8.6	26.6
3. 高层干部	100	12.6	9.6	19.6	41.8
4. 中层干部	100	7.5	12.5	24.5	44.5
5. 职员	100	4.7	13.2	27.3	45.2
6. 工人	100	3.2	13.2	32.8	49.2
7. 非就业者 （1）	100	5.4	11.2	7.1	23.6
（2）	100	1.0	23.0	14.5	48.5
总计	100	7.6	12.1	21.7	41.4

（1）包括退休金；

（2）不包括退休金。

资料来源：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1977 年。

我们从社会保险金一栏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这项义务性税收的份额最高：占家庭原始收入的 21.7%。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它的不平等尤为严重，因为实际上这是一种逆向的再分配：最低的工薪者阶层（工人、农业工资劳动者和职员）缴纳的保险金占其收入的比例最高。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显然是社会保险金的封顶制度，虽然 1967 年后不断取消最高限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制度。

总体而言，法国的税收和附加税制度仍然存在深刻的不公正，从上表的最后一栏可以看出这一点。

被抽取资源的再分配较为平等

对生产和法国人的原始收入征收的税款数量庞大，谁在这些税款的再分配中得益呢？受益者可能是家庭、退休者、老人、病人、失业者，等等。但也可以更为广泛地说，最贫困的人也是受益者。

下表表明，如果我们承认各大社会－职业阶层之间可以进行贫富区分的话，那么确实存在从最富有者向最贫困者的垂直型再分配：实际上，非就业者、农业工资劳动者、工人和职员所获得的再分配收入与其原始收入的比例最高。这个表格对义务性征收和税款再分配的效果进行了综合。

由于再分配过程的平等化效应，最后一栏“可支配收入”的数字有了修正。首先，非就业者看起来是再分配最大的、唯一的纯粹的受益者（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是他们除退休金外的原始收入的两倍）。不过，农业工资劳动者和工人在再分配中的净收益也不比中高层干部更少，这再次表明确实有某种垂直型的再分配。相反，农业经营者和独立职业者的处境相对来说较好，这可能反映了垂直型再分配的不足之处，也反映了这些阶层内部存着巨大的差异，后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

959

各社会－职业阶层再分配的结果

	原始收入	税款征收	再分配	可支配收入
0. 农业经营者	100	22.8	19.3	96.5
1. 农业工资劳动者	100	46.2	34.1	87.9
2. 独立职业者	100	26.6	7.9	81.3
3. 高层干部	100	41.8	11.3 (2)	69.5
4. 中层干部	100	44.5	20.0 (2)	75.5

续表

5. 职员	100	45.2	23.1（2）	77.9
6. 工人	100	49.2	29.3（2）	80.1
7. 非就业者（1）	100	23.6	21.6（2）	98.0
（2）	100	48.5	149.0（2）	200.5
总计	100	41.4	31.7（2）	90.3

（1）包括退休金；

（2）不包括退休金。

不过，下面的表格显示，如果从原始收入转向每个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大社会－职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扇面缩小了。

最后，如果考察一下1962年到1978年间可支配收入差距的演变，我们能再次看到差距扇面有普遍缩小的趋势。毫无疑问，这是再分配的收入总量不断增长的结果。

再分配之间和之后的收入差距

	原始收入（在此指工资）	可支配收入	
		两个孩子	四个孩子
家庭 I	1.0	1.0	1.0
家庭 II	1.4	1.3	1.3
家庭 III	4.4	3.5	3.2

资料来源：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n. 37—38.

不同规模的家庭的再分配

上表说明的是1976年的情况，它清楚地表明，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机制显著缩小了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表格中，再分配之前的原始收入差距是1：4.4（家庭 I 和家庭 III 之间的比例），再分配之后，这个比例分别降为1：3.5（两个小孩的家庭）和1：3.2（四个孩子的

家庭)。

这个表格说明，上述现象是由直接税制度及家庭津贴的联合作用造成的，但双方某种意义上又具有矛盾性。

但随后的表格显示，从1970年到1975年，各种规模的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大了。1970年，单身者的人均收入是六口或六口以上家庭的人均收入的2.7倍；1975年这个比例为2.9。这很可能是两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一方面，单身者通常是老人，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人是领取最低养老金的，但养老金的数额提高了；另一方面，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收入增长要比其他家庭慢，因为家庭津贴的增长慢于其他收入的增长。

1970年和1975年各种规模的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960

	1970	*1975*
1人	141	144
2人	137	138
3人	124	116
4人	96	94
5人	75	74
6人和6人以上	53	49
总计	100	100

资料来源：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n. 51（1979）。

因此自解放以来，法国的再分配制度发生了某种变化。二战刚结束时，几乎全部的家庭援助都与收入水平无关，因而民族团结是完全支持家庭政策的一个因素，10年以后，在垂直型的再分配体制之外又扩大了援助的范围，不过新的援助是根据收入状况而渐次递减的(1978年确定了住房补贴和家庭补助金的最高限额，1980年又提高了限额，等等)。这种以经济条件为根据的援助金当时只占家庭补贴总额的7%，但现在达到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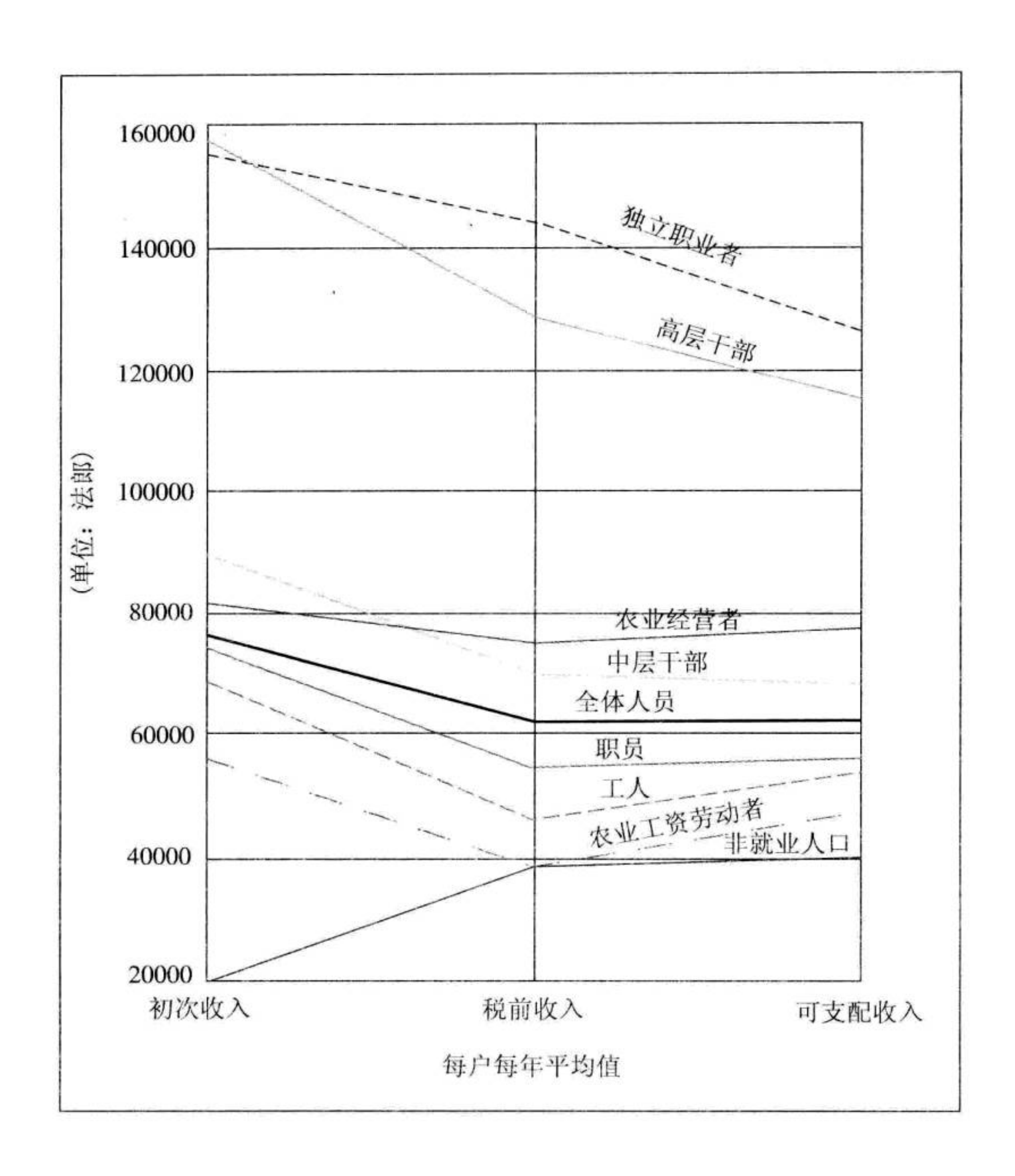
进入再分配的资金既来自社会保险预算，也来自国家预算，还有的来自地方机构的预算（所有这些措施都被统称为国家的社会预算），如果考虑到这些资金的总额之庞大，那么我们会觉得，垂直型再分配（从最富的人向最穷的人的分配）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今天，如人们想切实改进再分配的平等化效应的话，那就不应该注重社会收入的总体性增长——这会对生产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不应在如何扩大用于社会分配的蛋糕上做文章，而更多地应在税收和附加税征收体制上下功夫。这个体制存在深刻的不公正现象，如：对工薪大众征收的消费税和社会保险金相对来说过高（这些征收尤其具有逆向的累进特征）；"家庭收支商数"（quotient familial）尤其有利于高收入的家庭；针对资本收益（红利、利息、地租等）的税制特别轻微；资本税在法国几乎不存在（尽管有一些对剩余价值的税收特许……）；而且，由于不同的工薪者在逃税和税收舞弊方面的可能性并不一样，因而所有这些不公正现象又进一步加剧；等等……但历史已经充分表明，在法国，提出新的社会措施比质疑税收体制更为容易。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赞成社会改革的人是希望借此把主要代价转移给别人呢?

生活水平的不平等

各社会阶层的人均总体消费水平存在差距，1972年，一个工人与一个高级干部之间的差距大约是1∶2，与中层干部的比例为1∶1.4，这些比例比平均收入的差距要小。这就意味着储蓄水平大不相同。因而个人的资本积累（可以有地产、流动债券等各种形式）也就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比最富有阶层和最贫困阶层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更为明显。

961

根据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的研究，我们可以对不同社会－职业阶层在遗产总额方面的差异做一个有效的估算，当然这样做可能会低估最富有者的遗产，而且对于像自由职业者和农业经营者这样存在巨大内部差异的阶层，谈论他们的平均值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在各社会－职业阶层的家庭遗产对比表中，我们可以发现，遗产差距要比各社会－职业阶层的平均收入的差距大得多。例如，工人家庭和高层



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演变图（1962—1978 年）

干部家庭在平均遗产总额上的比例为 1: 5.9，但他们的收入比仅为 1: 3.3 左右。

资本使用方式的不同显然是由于生活水平的不平等，但也是由于收入和收入税方面的不平等，因为 1965 年以来，有利于储蓄的税收措施一直在强化。

个人消费变化的不平等

下面的表格显示的是1950—1974年个人和各大种类的消费的演变情况。可以看出，增长最快的开支项目是医疗卫生、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衣着，相反食品开支明显低于平均水平。除了这些平均演变趋势外，我们还可以料想，各社会－职业阶层或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类型应有明显不同的演变趋势。

962

1975年家庭遗产总额的平均值

	每户平均遗产	家庭的总体指数
自由职业者	1 330 000	620
工业家和大商人	1 270 000	590
农业经营者	620 000	290
手工业者和小商人	500 000	230
高层干部	480 000	225
中层干部	200 000	93
非就业者	200 000	93
其他就业者	110 000	51
职员	100 000	47
工人、农业工资劳动者和仆役	80 000	37
总体水平	251 000	100

资料来源：法国人的遗产－收入和价格研究中心文献，n. 49.

这些数字包括遗产所有人的四种用途的遗产：家庭用途（主要和次要的住宅，家具等），职业用途（生产经营性建筑、农用地、生产经营性材料、牲畜等），为获得收入而出借的物品（证券投资、出租的不动产等）以及出于其他理由而出借的物品（储存、投机等）。若从使用功能上看，各个社会－职业阶层的遗产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农业经营者的遗产66%用于自己的职业。在工业家和大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那里，这个比例分别为33%和37%。非就业者、自由职业者、高层干部和大商人中，有收益的遗产比例特别高（40%以上）。工人、职员、农业工资劳动者等阶层中，60%的遗产属于家庭用途的财产（住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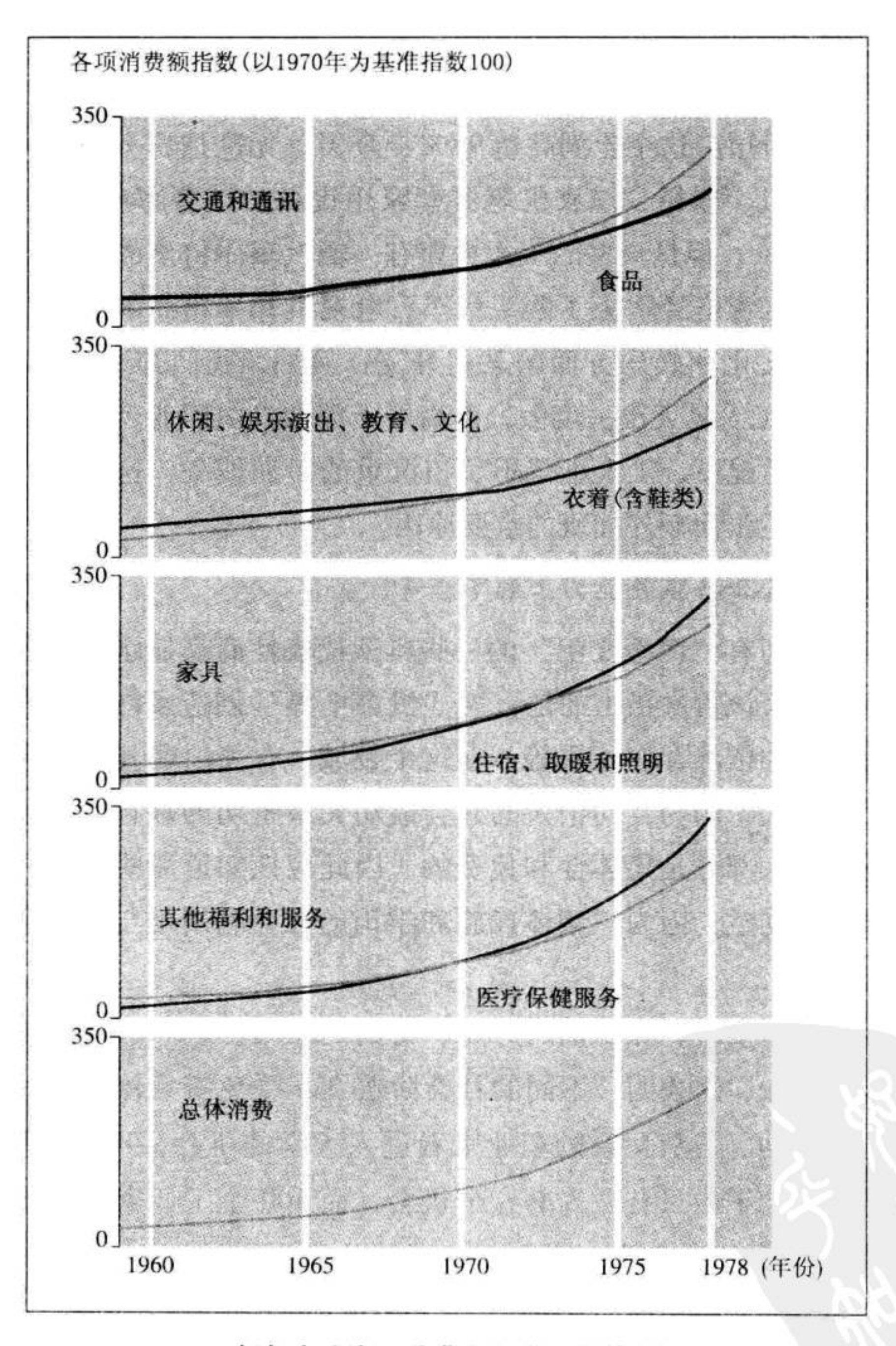
如果考察 1952 年到 1972 年消费品类型的演变，我们就会看到，在食品开支方面，低收入者的开支与高收入者的开支差别相对较小：最多1∶1.3。相反，其他消费的差异更为显著，特别是交通通讯以及整个“文化、娱乐和休闲”开支；这方面的差距可以达1∶4。1953 年至今，这些差别有轻微下降，但下降更为猛烈的是“住房”和“交通”等耐用消费品购买方面的差距。例如，1953 年，只有 8% 的工人拥有汽车，到 1976 年，75% 的工人至少拥有一辆汽车；在高层干部和自由职业者阶层，这个比例高达 93%；今天，无论是哪个社会 - 职业阶层，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成套家用设备的装备率都大体相当，普遍高于 80%。但是众多的工人为拥有一辆汽车而付出的代价该有多 963 大呢？低收入家庭经常为了购买汽车、电视机和冰箱而削减住房、食品、特别是文化和娱乐方面的某些开支：例如，我们知道，1976 年，只有 52% 的工人夏天出去度假，而高层干部和自由职业者的比例则为 84%。多数情况下，工人不得不负担沉重的短期债务，这是他们违反工会一贯的主张而额外加班的重要原因。

获取免费公共服务能力上的不平等

如果说拥有“消费文明”的一些典型代表性商品显示了某种平等的话，那么应该再次指出的是，为“机会平等”创造条件的个人或集体消费类型中依然存在不平等。在这个领域，有关消费开支的研究对 964 我们用处不大，因为，同个人的社会成功关系密切的教育、培训和文化服务事业大部分是集体性和免费的。因此应该知道那些社会群体从这些服务中受益，因为“集体设施和学识的社会利用是与利用它们的能力相称的”。

我们仍能发现，在学识的分配、特别是在获得最高层次的教育方面，差距很大，这表明，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享受免费集体教育的能力上是不平等的。若从父亲的职业来看进入大学的机会，100 个农业工资劳动者的儿子中只有一人有这个机会，而 100 个工业家的儿子中则有近 70 人可以进入大学，自由职业者的儿子则超过 80 人。这种不平等首先是由于文化遗产的差异。“各种不平等的社会因素的效率在于，经济能力上的平等可以实现，但大学体制仍然在把社会特权转变成个

人的天资或优势，从而使得这些不平等神圣化。更明白地说，学校在实现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后，就可以为特权的合法化服务，并给这一行径披上一切合理性的外衣。”（P. 布尔迪厄和 J. -C. 帕塞隆）因此，社会和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仍是文化上占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的专有领地。



每年人均主要消费项目的消费演变

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幅度还是从速度上来说，这一变革在法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与经济和社会的加速演变形成对照的是，法国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已经僵化了。

这种逐渐加剧的紧张关系已经引发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而且那些从集体无意识中诞生的青年先知们已经在索邦的墙壁上表达出了这种紧张："别再迷恋经济增长率了"，甚至别再沉湎于"当权者的空想"。但是，右派和左派"正统思想家们强烈的恐惧"很快就把"美妙的五月"中灼热的炭火掩埋在他们的特权和代议制民主的死灰下。但是，就在社会行动到处寻找自己的领地时，不安的火焰仍不时被点燃，点火者是青年、妇女、移民、单一工种工人……总之，是那些"边缘人"。其他的病灶也在发展，或是由于新的问题，或是在十分古老的领域：生态、社区生活、地方主义。墙壁上再次贴出了标语："生活、工作，国家决策归于我们"，"对原子能说不"，等等……政治机构和工会组织有时也会利用某些要求。

1974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看来曾短暂地揭露了问题，唤醒了人们的意识，就像35年前那场"奇异的大溃败"一样。能源危机、或更宽泛地说，国际经济危机，是否能让我们迈上一条不那么浪费自然资源的发展道路、一条伊萨西·萨克斯提倡的"生态－发展"道路呢？人们还会冲向"新社会运动"的竞技场么？不过，一时的踌躇期间，法国人的言谈之中似乎有了一些新的思索，踌躇过后他们猛然走向了世界经济战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的"总动员。现在，决定性的逻辑就是坚定地进行结构调整，从此，经济和社会的广阔领域都要经受无情的国际竞争的风暴的洗礼。对"竞争中的落后者"的扫荡确实是一场大屠杀，从失业、农村人口的加速外流、乡村的荒芜和中小企业组织的消失等现象中，我们可以衡量出这场屠杀的影响力。这种调整究竟要发展到何种地步？广阔的经济空间被冻结，这难道不是作为

965 硬核的那些“健康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得以继续生存所必须的吗？

实际上，我们对近来法国经济和社会演变趋势的分析，主要是以可计量的现象为基础的，就是说，这是官方的经济和社会，是统计机构所能跟踪、测量和监控的经济和社会。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发生过的现象似乎很大程度上又重现了，这就是“地下经济”的发展，之所以是地下经济，是因为经济和社会核算体系对此无法了解：家内生产活动，直接用于自我消费的小生产，家庭互助，邻里服务，物物交换，各种形式的黑工，等等。这就印证了皮埃尔·罗桑瓦龙曾支持的那种看法：“一切都好似社会支配着各种看不见的、可更新的资源，社会在其自身结构中拥有内部储备，这是不同于事先积累起来的储蓄的另一种的资源。这个领域因为完全避开了国民核算的视界而被称为地下经济，但它并不是随危机一起诞生的。它只是利用这个机会而再次活跃，蔓延扩张。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危机不能被视为经济和社会空间的分裂和重组过程。官方监控的公营和私营经济领域的萎缩，并不表现为与整个社会生产的变动幅度一致的降低或减缓现象。”

在工业化社会，特别是在法国，经济危机中的“资金存储能力”与官方的经济指数会有一些差别，个中原因正在于此。

简而言之，这种局面是“社会机体”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反映，但是它也突出了两个法国的分裂，一个是官方的、受保护的、受控制的、核算过的、规范化的法国，另一个是更为隐蔽的、不受保护的、没有监控的，一句话，边缘化的法国。法国会朝意大利式的社会和权力模式发展吗？

第三十一章　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

966

从 1945 年到 1980 年

“法国的统治形式是、并且仍然是共和国。在法律上，共和国没有停止过存在。”像纪念章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一提法，来自 1944 年 8 月 9 日法令的第一款。它恢复了共和国的合法性，把维希插曲视为意外之事，并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即借助 1940 年 7 月 10 日的宪法性法律，让这一意外之事在共和国的延续中画上句号。但是，提法的美妙与根源的纯正是一回事，而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实际上，若想消除维希制度的痕迹，以及有效地重建共和国的合法性，至少还需要 30 个月的时间。

一、寻求一种新的政体

967

临时政府

当 1944 年 8 月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已经获得解放的巴黎设立之时，除了解决宪法方面的问题，它还有其他需要操心的事情：它应当站在同盟国这一边继续进行战争，光复全国的所有领土；确保食品与物品的供给，开始取代维希政府的行政管理，以及避免某些将解放

与革命等量齐观的抵抗组织的行动所包含的危险。此外，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戴高乐将军本人，还是他的合作者，对究竟该让第三共和国东山再起，还是为法国提供一种新的政体，似乎还没有形成定见。就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包含着形形色色的与德国占领进行斗争的团体或派别——而言，它对于有待完成的社会、经济改革已提出了相当明确的观点，但对于政治纲领，抑或是制度安排方面的方案，确切地说，仍然暂付阙如。至于征求全体国民的意见，只要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以及战俘和被征调到国外做劳工的人还没有返回自己的家园，就不可能如是行事。得到解放的法国因此处于一种临时状态之中，而要结束这种状态，还需再过两年。

为了使自己的权威具有更好的基础，临时政府为内地抵抗运动的代表们提供了位置；本着同样的精神，临时政府决定扩大咨询国民议会的成员，在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中，这一咨询国民议会扮演了国民议会的角色。上述不同的做法，先于所有的选举活动，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新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维希制度妥协的传统右派，仅仅由某些孤家寡人所代表。左派在来自抵抗运动的所有坚决要求中，占据着多数派的地位。在这一左派内部，共产党举足轻重，之所以如此，要归因于自纳粹德国向苏联发动战争以来，法共大规模地参与了地下斗争。不过，一种难以估计其支持者并预见其前景的新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了政治角逐的舞台上，这就是受基督教民主思想影响的人民共和党[1]。该党意欲忠于其领导人在其中作用甚大的抵抗运动的精神，并打算支持戴高乐将军的行动。戴高乐无论是出于其个性还是策略考虑，均不太打算处于某个政党——即便是自己的友人的政党——的影响之下。他打算与所有的政治组织保持距离，继续充当民族团结的象征。

然而，当时的局势表明，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自 1945 年 4 月底以来进行的市镇选举验证了左翼力量的推进：临时政府与咨询国民议会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诸多事端，这些事端表明了政治领导人的急不

① 一译人民共和运动。

可耐，以及他们意欲摆脱一个以法令来制定法律，实际上摆脱了一切控制的政府的监管。对双方来说，这一形势令他们都觉得颇不舒服。

全民公决

要隐约看见出路何在，还得等到1945年7月。是时，政府决定通过全民公决方式，让人民来选择新的政治体制。此举在程序方面的创新性值得一提：在法国，除了曾在波拿巴主义体制下有所采用外，这是首次诉诸一种直接民主的技术手段。即便人们无法排除采用公民投票方式的或然性——如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对此不可能予以排除，由此在代议制传统中打开的缺口足以明显地改变民主原则的游戏：人们此后可能将当选者的代表性与来自全民赞同的最高合法性对立起来。一如人们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将观察到的那样，这方面的教训将不会失去意义。

选民们面临的问题有二。第一个问题意在解决第三共和国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冲突，它所问的是：应当回到战前的制度，还是另起炉灶重新起草一份新的共和国宪法？赞成回到战前制度的惟有激进党人，戴高乐将军以及所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均表示赞成改变政治体制。1945年10月21日的全民裁决以压倒多数的得票率（赞成者占96.4%），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理。就这样，第三共和国寿终正寝，而维希政府的统治将只是一桩属于例外的事件。1875年的体制既没有幸免于1940年的战败，也没有幸免于1945年的胜利。但是，全民裁决也证明了对法兰西民主根深蒂固、与生俱来的信仰，根据这种信仰，在制度的调整中寻求解决政治问题、乃至社会经济困难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通过重新打开与宪法相关的卷宗，法国不知不觉地恢复了与一种政治不稳定的悠久传统的联系，这种传统仅因第三共和国异乎寻常的长命被中断。

968

光是废除一种体制是不够的，所以还应当为建立起一种新的体制达成共识。在这一点上，舆论分歧明显，人们在全民投票时对于第二个问题所作的回答，亦将显示出这种分歧。若回到第三共和国的做法被否决，政府将要人们在下述两种解决方法中作出选择：其一是选举

产生一个拥有唯一最高权力的国民议会；其二是建立一种过渡性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中，议会的制宪权限将受到限制（期限为6个月，其制订的宪法是否可行须交付公民投票裁决），并以议会制的方式，为政府与议会在过渡时期的关系制订规章制度。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体制”的戴高乐支持后一种解决方法，但共产党和激进党却竭力支持建立一个拥有唯一最高权力的国民大会。因占66.3%的选民反对，共产党、激进党所支持的解决方法未被接受。在制宪问题上的分歧，从一开始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制宪议会

这种分歧不可能不在制宪议会内部重新凸现。此届制宪议会是通过将选举权扩大至妇女和军人（1945年4月市镇选举时被采用的新做法）的方式选出的，但它同时也首次引入比例代表制（伴随着以省为单位的名单投票）。左翼政党以民主的名义要求的妇女投票权的到来，就长远来看，似乎起到一种缓和作用，甚至是保守作用。至于比例代表制，则是大多数政党所主张的，不过，它们的动机可谓复杂，而且经常相互矛盾。某些人辩护说它体现了选举公正，而另一些人，如共产党，则将其视为尽可能地弥补其选民在地理上分布过散之不足的手段。最后，还有一些人吹嘘它具有多元化的诸多优点，并认为可以借助比例代表制去抵御议会多数派可能出现的专制。人们可以把选举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均可修改，以及甚至没有从宪政的相对稳定中受益，视为法国政治制度的一种奇特现象。在这一点上，第三共和国已经提供了一种令人遗憾的榜样。虽然第四共和国是在比例代表制的标记下诞生的，但其领导人不会始终忠于这种选举制度，而他们的继任者们则将重新回到采用单记名两轮投票制上来。

目前，引入比例代表制的结果只在选举层面显示出来。这种制度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有方的大党：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控制了80%的议席，更有甚者，仅前两个政党就拥有了制宪议会的绝对多数。其他政治组织几近化为乌有。由此一来，三大政党的领导班子就能够对政治生活加以控制，而且，他们完全打算立即显示他们的

969

权力。正是这一原因，他们与戴高乐将军个人发生了冲突。

戴高乐政府

戴高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乃是一个“被历史赋予使命者”。如果人们相信他在其回忆录中的记载，他或许从这一时刻起就对其合法性具有一种富有个性的想法。自 1940 年 6 月 18 日发出呼吁以来，他的命运实际上已同国家的命运重合在了一起。没有人会打算去与这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争夺执掌临时政府的大权。但是，从民主程序恢复生机的那一刻开始，历史性的人物回到了普通大众之中，而且，如果他还想继续执掌权柄的话，就不得不屈从于新的合法性的规则。由于缺少一种来自人民的授权——他不愿为请求这种授权而使自己受制于政党，他只有接受议会的授权，而议会已经准备根据公民投票通过的关于过渡时期公共权力组织的相关法律中的条款授权于他。就这样，作为临时政府首脑的他，经过几乎是一致通过的投票，成了过渡政府的首脑。但是，这种授命充满了误解。这种误解一旦涉及到组成新政府时即表现了出来。因为拒绝向各政党的坚决要求让步（尤其是共产党，它在选举中赢得了巨大胜利，遂要求得到关键性的部长职位），政府首脑请求议会对其委任作出处置。只有艰难的妥协，才会使决裂得以避免，才有可能至少是暂时地使对立的观点趋于一致。

始自这一时刻，造成戴高乐将军与各政党相互对立的并非别的什么，就是对政权的看法本身。自由法国的首脑指责政党道，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政党，其维护的均是该党的纲领和特殊利益，而不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争论在同年年底就军事拨款投票时再次爆发。只是凭借扬言自己将不惜辞职——此举仍完全符合议会制度的精神，戴高乐才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不管怎样，这场初步的小争论不足以解释戴高乐将军 1946 年 1 月 20 日作出的出人意料的辞职决定：他的辞职，通过制度恢复正常运转正式地说明了其理由。但是，相关论据没有让任何人上当，每个人都试图看透这一只可能是策略的“隐退”的含义。此后发生的形势演变将证明，戴高乐将军并非是向一场议会议员对他发动的“消耗战”让步，而是他尤其希望通过让其他人来掌管国家，来保持自己与这些人的距离，并对宪法草案保持审判的自由——该宪法

草案已表明其体现的是一种与他自己的政权观格格不入的政权观念。

三党制

戴高乐将军的挂冠而去留下了一个空白，在制宪议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三大党，力图通过将他们的力量团结在新的政府首脑周围来填补这一空白，这位新的政府首脑名叫菲利克斯·古安，是位来自社会党的议员，此前担任议会议长。由此开始了将在 18 个月的时间里支配法国政治的三党制的统治。然而，将这三个政党联系在一起的协议只涉及政府与议会的行动；这一结盟因宪法问题而破裂；最后，由社会党与共产党组成的微弱多数在 1946 年 4 月 19 日提出了一份新宪法的草案，该草案的主要特点是削弱行政权，将权力托付给一个一院制的、享有全权的议会。人民共和党对于这一草案不予认同，认为它多有使国家向人民民主制方向转变的征兆。选民们将让人民共和党获得双重的胜利：其一是否决了宪法草案（虽然这一否决有点勉强，反对者只占 53%）；其二是因为该宪法草案遭到否决，就得在 6 月 2 日选出新的制宪议会，而人民共和党通过这次选举，成了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人民共和党的议席已超过了社会党与共产党，后两个党的绝对多数亦已不复存在。在联手组成左翼，并且直到此时仍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的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简而言之，1946 年春天的全民表决标志着对极左的明确抵制，并且显得将会把国家重新引到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中间道路上去。

970

但是，一个新的过渡时期开始了，能够被各政党所接受，以及得到选民赞同的一种宪法问题上的妥协，仍然机会渺茫。人民共和党凭借选举胜利使本党的乔治·皮杜尔成为政府首脑，但它希望纳入对 4 月 19 日的宪法草案的修改，如加强国家元首的权力，重新组建一个第二议院，为与海外属地的关系创建一种新结构等等，仍有可能不被极左派所接受之虞。至于寻求一种可供替代的多数，则由于制宪议会中右翼党团的势单力薄与左翼在国民中的强大影响，显然难遂人愿。

虽然第四共和国宪法仍然在 9 月 30 日的制宪议会获得通过，并且通过 10 月 13 日的全民投票为国民所接受，但这一切，似乎可归因于两种不同的、但其影响却聚积在了一起的因素：其一是舆论的厌倦之

情唆使人们希冀最终摆脱临时状态——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临时状态持续的时间已接近两年；其二是戴高乐将军重返政治舞台，他在6月14日在贝叶表达了自己对与宪法相关问题的看法，并在此后不停地公开抨击第二届制宪议会的努力方向，这可能使三大政党的领导人担心，若宪法草案再遭否决的话，可能会为戴高乐所主张的体制开辟道路。但是，因被迫屈从于妥协性的解决方法引发的痛苦，以及戴高乐将军引导的强烈的反对，使得第四共和国宪法只能以“少数人的好感”获得通过：在超过2600万登记选民中，赞成者为926.3万，有800万人弃权，也就是说弃权者比5月份多了300万。从其诞生伊始，这一体制的合法性就遭到怀疑，而且，这一状况从来没有停止过。

新的制度还应当再等待数周才能够正式生效。公共权力的设置要求有新的选举和长久的期限。在这些选举中，共产党大获全胜，而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则极为明显地受挫。在舆论面前人民共和党的成员们，因为在围绕宪法展开的争论问题上与戴高乐将军决裂而受到损害。大多数保守力量投靠的“忠诚派”，尚没有从这次意外事件中重新振作起来。

在共和国总统得以选出之前（政府的组成有待于此），人们别无他法，只能召请莱昂·勃鲁姆领衔组成新的、同时也是最后一届临时政府，该政府的成员均为社会党人。只是到了1947年1月21日，被新当选的共和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指定的总理候选人保尔·拉马迪埃才得到国民议会的授权，并因此成为第四共和国的首位部长会议主席，亦即政府总理。这种没完没了的“分娩”的痛苦，注定给新体制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

过渡体制的成就

这些曲折不应该致使人们遗忘自解放以来一直到1946年，相继上台执政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局势艰难，公共秩序已得到了维护或重建，公共自由得到了恢复，符合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纲领的诸多改革先是通过法令，继而是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实施，对经济活动中的广泛部门（电力、信贷和工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设立了计划署，确立了企业委员会制度，改革高级公职人员的录用方式，凡此种种，构成了一整套广受好评的措施，而且，这些

措施应广受好评亦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解放的征服"由此被纳入了这些基本权利的遗产之中——法国历史的每个阶段皆为这种遗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这方面的延续性与法国的政治制度的脆弱无常形成了反差。不幸的是，这些改革缺乏一种与之匹配的考虑周全的财政政策；为此，第四共和国不得不经常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在解放的热情驱使下投入的开支付出代价。

在外交方面，戴高乐将军的毫不让步使法国很快在列强内部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些列强中的一些国家原来并不怎么打算赋予法国此种地位，法国被赋予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即是明证。的确，在已经在德国、日本战败后的世界出现的重大争执中，法国的特定影响仍旧微弱，但是，一种更广泛的行动前景依然在敞开。法国领导人以为，为了支持其在国际事务领域里的行动，可以指望殖民帝国助以一臂之力——曾因战争而变得松弛的殖民帝国内部的联系正在耐心地被恢复。不过，自布拉柴维尔会议以来在这一帝国吹拂、并导致法兰西联邦[①]应运而生的变革精神畏畏缩缩。没有一位法国领导人能正确地解读已经表现出来的对这种政策的抵抗（尤其是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征兆。

对"伟大"的梦想以及"同化"的神话，把法国拖入了一条最终使第四共和国覆灭的道路。

二、第四共和国

宪法决定新的政治游戏的规则。正因为如此，应当由宪法入手来理解新体制的运转。不过，制度仅仅为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框架，政治生活是由一系列的政治力量赋予生命的，这些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合所产生的影响，归根结底堪与法律文本等量齐观。如果法国实行过一种英国式的政党制度，由两大结构紧密的政治组织轮流执政，那么，第四共和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提出这一问题，就足以意识到

① 一译法兰西联盟。

在制度内部发挥作用的诸多力量的重要性。

宪法

1946年宪法是一种艰难妥协的产物。不过，它呈现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制度的外表。共和国总统的确不再拥有1875年宪法性法律曾赋予其前任的权力，但是，他始终介入到政府首脑，亦即部长会议主席，以及最高司法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的任命之中。他拥有规章制订权，并决定最高级别的文职和军事官员的任命。最后，他是当然的法兰西联邦的总统，组成该联邦的是法兰西共和国（其包括本土、海外省份和领地），以及宪法邀请其与法国结合的国家与领地。他以这一名义主持联邦的最高会议，后者是希望能充当整个联邦的政府的执行机构。所有这些职权并非仅仅是名义上的，即使会签的规定将使政府参与到国家元首的行动之中，并把总统的行为的责任转移到了政府身上，根据议会制的原则，共和国总统保有某种主动性的余地，且拥有仲裁权——经验表明，这种仲裁权绝非可以忽略。在樊尚·奥里奥尔七年任期结束时，勒内·科蒂竟然得经过13轮投票才得以当选，这足以说明，议会对总统这一职务的任职者的选择，不该被视为一种形式而已。

972

但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行政权真正的负责人是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后者觉得自己拥有宪法文本最终认可的权威。宪法同时让部长会议主席充当政府的首脑，最高行政权威的执掌者，以及可优先与议会对话者。法国由此被正式赋予这样的政府，即只要它享有议会的信任，就有资格领导国家的事务。

面对行政权，宪法增设了诸多会议，其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们不由得回想起“各部会议”[①] 国民议会与共和院[②]构成了共和国的议会，而法兰西联邦议会则有权代表组成这一跨国组织的各国人民。经济委员会在议会之外召集主要利益群体的代表共同商议社会经济措施。不管怎么样，这种外表只能是装门面的玩意儿。法兰西联邦议会与经济委员会只具有咨询功能。在议会内部，共和院只不过是参议院

① 18世纪初摄政时期一度实行此种制度，以会议代替各部大臣。

② 一译共和国参议院，但为与下文的相关内容呼应，故译为共和院。

的影子，宪法不仅取消了它"参议院"的名称，而且也取消了它的部分权限，尤其是对内阁的责任予以讨论的权利。它还继续参与立法工作，但不能试图与国民议会分庭抗礼。根据宪法第三条，国民议会才是主权真正的拥有者。因而，宪法尤其约定了国民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处置方式。

从这一点来看，1946 年宪法确认了议会制的原则，即政府得对人民的代表负责。但是，它也力图修改这一原则，以便避免重新陷入第三共和国的实践已经暴露无遗的恶习。虽然这一切在今天会显得如此奇怪，但对内阁不稳定的担忧，确确实实缠绕着 1946 年宪法的制订者们。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人们力图以规章制度严格地限定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关系。

为了使政府在建立之际就稳固地获得信任，人们取消了国家元首自由地挑选内阁总理的权力。此后，共和国总统只能够指定一位内阁总理候选人，而这位候选人是否能获得授权，则得由国民议会决定。由于这种授权必须在议员投票时获得绝对多数的赞同，人们希望在一种真正的契约的基础之上取得新政府与议会多数的一致。除了这一最初的保障，人们又围绕内阁责任的追究，增加了若干预防措施：对内阁的信任问题只能由内阁总理在部长会议商议后提出，就信任问题或不信任案进行的投票，只能在提出采用这一手段后再经过一整天的考虑，方可进行；最后，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拒绝予以信任以及通过不信任案，必须在国民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同意。因而，在理论上，内阁危机不再会因为辩论时出现的偶然情况、一时的冲动，以及统计票数时的失误等原因而出现。制宪议会的议员们认为，只有异常严重的局势，才有理由推翻赞同授权的多数派作出的相关决定。有关国民议会解散的规定，进一步从外部加强了这种机制。解散国民议会必须具备的条件有：每届议会任期最初的 18 个月（此间被视为该届议会的试验与摸索期）已过，在 18 个月内，并在宪法所预先考虑到的条件下，两次出现内阁危机。这样一来，解散国民议会就显得像是一种威慑的武器。宪法草案的报告人可以乐观地下结论说，这一制度"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总体，并真正地筹划了内阁稳定"。

973

这种巧妙的建构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未能通过事实的考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忽视了对各种政治力量的状况予以考虑：在实行两党制的情况下，这类机制已显得毫无用处；在实行多党制（而且其还得到比例代表制的推波助澜）的情况下，这类机制注定立即毫无效果。

政治力量

事实上，首先构成第四共和国时期政治力量状况之特征的乃是多党制。但是，与此相关的并非仅为政党的数目，还应当考虑到各党派的拥护者令人惊讶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与公共舆论的摇摆不定有关，而且，公共舆论的摇摆不定还导致了犹豫不决的选民的比例高得离谱。总之，这些特征导致了一种政党制度的脆弱，使其难以抵挡利益群体蔓延开来的诸种压力。

第四共和国时期的立法选举

	制宪议会		国民议会		
派别名称	1945年	1946年	1946年	1951年	1956年
共产党 进步主义者	5 005 336	5 119 111	5 489 288	4 910 547 146 058	5514 403
各种左派				38 393	393 219
社会党	4 561 411	4 187 818	3 431 954	2 744 842	3 247 431
激进党 共和党左派 联盟	2 131 763	2 295 119	2 831 834	1 887 583	2 240 538 593 727
人民共和党	4 780 338	5 589 059	5 058 307	2 369 778	2 366 321
戴高乐派			312 635	4 125 492	842 351
温和派	2 545 835	2 539 845	2 565 526	2 656 995	3 257 782
布热德运动分子					2 483 813
极右派					260 749
其他党派	165 116	69 789	63 976	87 346	98 600
弃权	4 965 259	4 481 749	5 486 536	4 859 868	4 634 209
登记选民	24 622 862	24 696 949	25 052 233	24 530 523	26 772 255

表中凸显了许多颇有意思的数字变化：如果说共产党基本保持稳定的话，那么，社会党与激进党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这一衰退通过1956年的共和阵线联盟勉强被遮

掩。人民共和党自1956年起开始出现无法避免的衰落，它的拥护者1951年起一分为二，分别流向戴高乐派与温和派。戴高乐派在1951年的崛起与普热德运动分子在1956年的崛起，则说明了存在流动选票现象，这一现象通过选举对议会里的派别组合产生了影响。

第四共和国是在三党制的标记下诞生的，因为其以保尔·拉马迪埃为首的第一届政府由社会党、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的成员联合组成。但是，这种联盟没有能够持续多久：1947年5月，总理以政府内部无法意见统一为借口，解除了共产党人部长的职务，并因此使一个自解放以来始终参与行使政权的政党处于反对派的位置。此项决定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议会层面，均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就社会层面而言，它使得各种困难积聚在了一起，而就议会层面来说，则是需要寻求建立一种居于中间地位的新的多数派。由于因前几次选举受挫而士气低落的右翼力量重新得到了组织，并且发起不仅反对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还反对第四共和国政体本身的运动，遂使寻求建立中间派的多数派的行动，变得更加必不可少。自1947年4月以来，戴高乐将军通过建立法兰西人民联盟重返政治舞台。这一组织在同年10月市镇选举中获得的成功，促使戴高乐将军通过指出议会缺乏代表性，质疑这种体制的合法性。不过，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影响力亦渗透到了议会，并凭借建立跨党派集团以及双重归属的策略，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议员。除了法兰西人民联盟这一威胁，从1948年起又出现了因温和派的复兴而引发的一种新威胁，这些温和派人士力图在全国独立人士中心的旗号下，重新聚集原本有如散沙的相关力量，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面对来自共产主义和戴高乐主义的这两种威胁，居于两者之间的党派力图寻求一条中间道路，由此，“第三力量”应运而生。“第三力量”包括社会党、人民共和党人以及站在他们一边的激进党人和温和派人士。但是，这种联合乃筑基于种种不牢靠的平衡，尽管其受到了两种来自外部的威胁，“第三力量”亦只能极为困难地去克服他们自身的种种内部矛盾（尤其是在涉及教育计划和经济计划时存在的矛盾）。“第三

974

力量”联盟不久日益缩小，它之所以能够在本届议会任期结束以前继续存在，乃选举方面的需要所致，即因为选举联盟制度的规定，相关党派力图将其保留到选举期限之后。

虽然有选举联盟制度（一种旨在通过把议席的分配限定于在某个选区“结成选举联盟”，并在该选区共同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的一些政党，使比例代表制变形的制度）的作用存在，1951 年 6 月的选举仍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势力进入国民议会为特征。左翼在这次选举中大为受挫，共产党失去了 50 万张选票，其议席由原先的 177 席减少为 103 席，社会党从 340 万票减少到 270 万票，至于人民共和党这一戴高乐派崛起的主要受害者，竟然失去了一半的选票与议席。戴高乐派成员获得了 400 万张选票和 118 个议席。

在这种状况下，第三力量的继续存在已不可想象。在两届过渡政府（普列文政府与埃德加·富尔政府）之后，国民议会自议会中的戴高乐派势力开始在里面发挥作用之际，倒向右派中间派（比内政府与拉尼埃尔政府）。惟有孟戴斯·弗朗斯的执政经历（1954 年 6 月—1955 年 2 月）打断了这一演变进程。此公的上台靠的是激进党人、戴派分子以及温和派人士的联合，同时亦受益于共产党的中立和社会党的支持，对其持敌视态度的仅有人民共和党。在这一插曲过后，第二届埃德加·富尔政府回到了右翼中间派联合执政的老路，而右翼中间派执政可谓充分反映了此届国民议会的主要导向的特征。

埃德加·富尔宣布的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使国民议会的选举提前至 1956 年 1 月 2 日举行。这次选举的特点是左翼的推进和右翼力量的重新洗牌。共产党收复了 1951 年失去的部分失地。团结在共和阵线旗帜之下的社会党与激进党，明显地取得了更好的选举成绩，并有可能问鼎组阁大权。就中派来说，人民共和党显得变化不大；但对右派而言，戴高乐遭到了惨败，并且已无望在议会中起任何作用：他们在选举中所丧失的成果主要为全国独立派人士中心所获得，后者获得的选票创下了新高；与此同时，亦有一个新的组织，即保卫商人与手工业者同盟（布热德运动）从戴高乐派的失利中受益，该同盟在法国中

975 部与南部的省级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在由居伊·摩勒担任总理、且其执政时间之长在第四共和国创下记录的“共和阵线政府”过后，财政困难与阿尔及利亚政策遇到挫折，导致了由激进党人为首的左翼中间派政府的上台（担任总理的相继是布尔热-莫努里、加亚尔），在这些政府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某种第三力量的翻版，亦即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议会外的反对派（戴高乐派以及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支持者）。

公共舆论对政治组织的不规则行为负有部分责任。但是，这些党派的领导班子同样难辞其咎。这些政党，多有打上某种意识形态烙印的宗派团体存在，彼此不愿作出妥协，因个人冲突导致的内讧时常出现，它们明显地表现出更注重捍卫自己的地位而不是公共利益。不过，已被赋予第四共和国的“政党共和国”的称谓，同样显得有名无实，虽然它符合大部分政治阶级的心理状态，却仍然与现实相去甚远。由于其数目过多，这些政党极为弱小，在第四共和国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中，这些政党党员的总人数在迅速减少：及至第四共和国结束，拥有党员证的选民或许不会超过50万。除了共产党，大多数政治组织简化为一个领导委员会和几个选举委员会。基层与最高领导层之间的联系不再通畅，因为它们既没有在全国范围真正做好了布局的工作，也没有真正的选民团的框架。因为过于弱小，这些政党亦没有能力去控制政治活动。每当舆情出现变动，就会催生一种新的组织，而这些组织与其意欲取代的组织一样，往往是昙花一现。面对这样一些政党，有组织的利益群体便会翻云覆雨。它们一会儿得以侵占某个政党，让该党成为自由派、小公务员或耕作者的政党；一会儿通过竞出高价和与政党做交易，向这些政党，并通过它们向议会、政府和行政部门进行“投资”。政治力量的虚弱最终导致公共权力受制于利益群体的压力。惟有这些利益群体彼此之间的矛盾可以减弱这种现象的危害性。公共舆论并非上述所有现象的上当受骗者：大致可以第四共和国体制等同的政党，在第四共和国不得不面对在阿尔及尔发生的武力考验时，亦同样大大失去了信任。

内阁的不稳定

在这种状况下，很容易理解政治力量的角逐对政体的运行产生了极大的并且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影响。制宪议会议员曾打算在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很快就难觅踪影：内阁的不稳定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并呈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即其该蒙受指责的程度与第三共和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实说，这种现象尚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分析：的确，内阁更迭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出现，权力空缺期——有时需要4至5周的时间来摆脱内阁危机——时常使国家领导层的整个决策能力完全陷于瘫痪。但是，这种危机是联合组阁制度必然会带来的现象，这种制度本身即有赖于政党的数目繁多与不甚强大。对于实际情况所作的审视表明，内阁不稳定并非始终会产生政治的不稳定：方向的变动（从三党制转变为第三力量，从第三力量转变为右翼中间派等等）仍然是非同寻常的现象，并非必然与政府的更迭同时发生。大部分内阁危机发生于一种相对的延续性之中。人们不妨把这些危机视为执政的手段，因为，确实每个内阁班子的组建，均是围绕着某个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形成的多数派来进行的。一旦新的障碍出现，这一联盟即分崩离析，而危机则用来寻找一种适于克服新障碍的新的联合。因而，与其表面现象相反，内阁的不稳定与其说是一种政治不稳定的标志，毋宁说是一种墨守成规的表现。

不过，这种实践具有不幸的后果。除了对公共舆论产生的心理影响，它还在政府与议会的关系中引发了严重的紊乱。议会在整个第四共和国时期，以某种角色的颠倒为特征。由于因内部分歧所造成的瘫痪，以及被它的控制功能所缠身，议会无法承担全部的立法功能；因而它被引向周期性地同意赋予新政府权力委托法，此举导致了即便不是在法律上，至少是在事实上，将相当一部分立法活动转移到了政府手中。这一程序最初被用来解决经济与财政问题，随后扩大到来解决因阿尔及利亚危机而引发的绝大多数问题。权力委托的惯例，最终被列入解决内阁危机的仪式之中。但是，由于诸多事情发生奇怪的突然变化，议会控制的滥用导致剥夺行政权的立法创议权和决策权。若事

先未经议会商议，没有一项重要的措施可被采用。此种习惯做法甚至扩展到了根据传统该归属行政权的对外政策领域。人们有时甚至看到，议会着手进行长时间的辩论以及数目繁多的投票后，仍无法为执政联盟规定行动路线。这样一来，在议会把一大部分立法重任转移到政府身上的同时，却又插手该归政府来管的诸多事务。如果要不惜代价地为显示第四共和国的实际体制的特征寻求一个修辞语的话，那只有“国民议会制”较为合适。但是，假如这一说法会让人想起一种至高无上、享有全权的议会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本身有骗人之嫌。诚然，议会把政府当作负责执行其政策的受委托人，但是，由于议会的内部分歧较之政府要严重，加之两种权力在共同的无能为力中需要更为团结，所以，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非上下级关系。同样不应该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政体没有能力去应对 1958 年 5 月阿尔及利亚事件引发的全国性危机；但是，决策中心的瘫痪，也解释了行政部门在第四共和国时期进行的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

关于这一政体的总结

尽管这一政体的运行存在着诸多困难，但它实际上并非毫无值得肯定之处。首先应当承认，第四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实现了值得称颂的复兴。重建的任务，尤其是现代化的任务极为繁重。在以马歇尔计划之名从 1948 年起向欧洲提供的经济援助的帮助下，以及在从 1952 年开始出现的有利的国际局势的促进下，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人们不仅成功地改进了生产设备，而且还成功地提升了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这方面的努力中，个人的积极性一直得到公共机构的激励，与之相关的有计划化或信贷政策。毋庸置疑，在这一领域中，政治权力的相对中立，通过高级官员和技术人员团队的坚忍不拔，得到了最佳的补偿。但是，议会与历届政府的软弱无力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即以牺牲国家的财富来确保法国人的繁荣。当 1958 年 5 月危机突然发生之际，国库空虚，公共权力的经费已经用完。

在国内事务方面，第四共和国没有留下任何因改造结构而造成动荡的痕迹。无论是涉及高级行政部门的管理还是地方机构的管理，它

均满足于幅度较小的整治。这种谨慎可能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加以解释：在跨过维希的鸿沟之后，民主机制与共和传统的重建，构成了某种人们试图寄予信心的胜利。另一方面，为了巩固解放后不久积聚的种种改革，以及减缓公共事业管理方面发生的变革产生的影响，仍旧任重而道远。不管怎么说，这些解释没能说明大量缺乏远见行为的理由：农村人口外流的后果没有及时被人觉察；应当更早地预见到这种现象对地方管理计划、城市化计划以及住房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同样，1945—1950年间人口的大量增加，将注定会促使公共权力更多地去关注对教育结构进行深刻改革，而不是延续在学校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但是，议会与政府之间几乎每天发生的争论、各政党之间持久不断的对立，使得宏伟计划的制订变得不太可能。不过，并不是这种缺陷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导致其垮台的原因，毋宁说是它的外交政策，或更正确地说，是它无力解决海外问题。

977

外交问题

在对外政策方面，第四共和国可以提及的是，在两个互为补充的方面表现出一种值得注意的延续性。首先，自1949年以来，其大多数领导人明确表示，支持力图确保西欧免遭苏联侵略威胁的大西洋同盟。这种选择与在两个阵营之间搞平衡的政策形成了对照，后者的象征是1944年12月的莫斯科条约，而前者则可由冷战引发的紧张状态加以解释。但是，该体制对“大西洋同盟”的忠诚可谓持之以恒。不过，在另一方面，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人们选择赞同的一种解决方法是欧洲一体化，这种解决方法倾向于在反苏联盟内部平衡美国的过度影响。1956年5月，舒曼抛出了“煤钢联营”的想法，这一想法在翌年促成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诞生。虽然欧洲防务共同体在1945年8月被法国议会否决，并因此导致与之相关的政治共同体计划被放弃，但人们在1957年通过罗马条约重新采取了主动行动。该条约建立了共同市场与欧洲原子能联营集团。1958年，法国与另五个西欧伙伴国投身到了一体化的宏伟事业之中，其在为此而努力时表现出来的坚定不移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在试图解决海外问题时同样表现出坚韧不拔，但可惜的是方向不对。领导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正确地解读殖民地的叛乱的预兆。对"同化"与"最伟大的法兰西"的神话忠贞不渝的他们无法理解，自由主义改革只有在处于独立的视野之中时，才有望得到好评。这亦是法兰西联邦注定仍然是一个空架子的原因。处在联合国托管之下的海外领地（多哥、喀麦隆），无法自由地掌握自身的命运，而掌握其行政大权的法国，亦不能主宰它们的命运。联系国的类别是法兰西联盟为接纳保护国而预备的：漫长的印度支那战争以奠边府惨败和日内瓦协定告终，与印度支那半岛上新独立的国家进行制度化的合作的一切希望由此破灭。至于北非的保护国，它们的统治者对联系国的资格予以拒绝。他们选择要求，并且在历经艰难后终于在1957年获得了纯粹的独立。这些事件已经明显地影响了一种业已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舆论。但是，这场危机系由"法兰西共和国"解体达到了顶点。这种解体已在1956年通过修改海外领地（黑非洲与马达加斯加）地位的框架法正式开始。不过，人们以一种相对冷漠的态度接受了这一措施。978 因1954年以来发生的叛乱产生问题的阿尔及利亚的命运则难以同样对待。大量欧洲出身者的存在、与法国保持的密切联系，导致在相当多的人看来，不可能实行"放弃"的解决办法。从此以后，法国不得不投入一场漫长的反对颠覆的战争，这场战争逐渐地预示着会演变为内战。在1958年5月13日叛乱发生后不久，当发动叛乱的将军们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支持者们串通一气时，第四共和国政体已经精疲力竭。然而，它的垮台仍然与其所作的妥协的特性相一致。它没有向军事首领让步或去冒一场内战的风险，而是选择采取迂回策略，并把权力交给了戴高乐将军（他的支持者们已经经常与阿尔及尔的煽动闹事者们保持联系），后者注定立即让求助者为他的帮助付出改变体制的代价。由此，再次证实了这样一种法则，即制度的命运与为控制权力而展开对抗的阵营的命运休戚相关。

三、第五共和国

第五共和国的名字曾经一直，并且或许还将长时期地与戴高乐将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不仅新体制的诞生要归功于戴高乐，而且它的地位，尤其是其最初的风格，同样如此。但是，第五共和国在其创建者引退后继续存在，因而，这一政体注定得发生演变，如果人们考虑到它曾强烈地倾向于权力的个人化，则尤其可以理解这一点。假如人们想为这一政体作个总结，尤其是不惜冒某种预测的风险去这样做的话，那么就应当通过依次体现这一政体的夏尔·戴高乐、乔治·蓬皮杜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追踪它的演变历程。

戴高乐的共和国

从1958年6月的起点开始，一直到1969年4月的终点为止，这一最初阶段被戴高乐将军非同寻常的个性打上了烙印。这位为向国家贡献自己的服务而重新出山者，绝非像加斯东·杜梅格之类的人那样，只是前来促成内阁的组建，他甚至也不是为帮助国家穿越一段艰难的航道而前来效力。自1940年6月18日以来，他就以“被历史赋予使命者”自居，自认负有一种使命，不过，他在1946年1月辞去政府首脑一职，一度令其履行这一使命的历程中断。第四共和国的失败，使他此后得以放手地履行自己的使命：让法国复兴，使法国得以实现他赋予法国的种种抱负。为此，当务之急是改变在1946年无视他的反对意见而建立的可憎的政体。正因为如此，他以为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赋予他的全权作交换，要求并且为其政府获得了委托制宪权，凭借这一点，他可以在需要提交全民投票表决的前提下，选择新的政治制度。新宪法在权力分配方面作了令人瞩目的变动。但是，让新体制的面貌不断发生改变的，更多地还是相关实践。

制度框架

由政府制订，并在1958年8月的全民投票中高票通过（赞成票高

达 80%）的宪法文本，总的说来，是戴高乐将军在著名的贝叶演说（1941 年 6 月）中提出来的想法与第四共和国最清醒的领导人们的改良设想相互妥协的结果。国家元首的权威得到了加强；其选民团扩大到了议会之外；不管是在正常时期，还是在危机时期，总统的权限均有所扩大，前者表现在其具有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权（每届议会的第一年任期除外），以及使用公民投票的权力；后者则表现在著名的第 979 十六条上；总统最终还具有一种“仲裁”职能，这一职能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确保公共权力之间的平衡的手段。对公共权力的整治包含明显的变动：在议会内部，第二院恢复了“参议院”的名称——但没有恢复第三共和国时期参议院的所有特权。经济委员会变成了社会经济委员会，它在此后具有更令人满意的代表性，但其权力仍严格地限于咨询性质。就政府而言，出现了名称的变动，“部长会议主席”从此改称“总理”，此举似乎预示着行政权的加强，因为第二十条宣称：“政府决定并引导国家的政策”，还有第二十一条宣称：“总理领导政府的行动”。

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尤其受到了宪法条文的影响。这些条文正式地维持着议会制的原则，即政府须对国民议会负责；但是，这些条文亦力图将这一原则与“分权”规则结合起来。实际上，这种分权似乎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想的，亦即确保行政权优先于立法权。一言以蔽之，国民议会失去了它在第四共和国拥有的绝对权力。它只能在宪法规定的例会期限内举行会议；它制订的法律条文得提交宪法委员会评判，后者有权去除相关法律中有悖于宪法的条款；它的立法权本身，亦严格地被宪法第二十四条限定了范围，该项条款准许政府在明确归“立法者”行事的范围之外的所有领域颁布条例。而且，仍然是由宪法委员会在与之相关的棘手问题上，就政府与议会之间的争议作出最终裁决。最后，一系列“程序性”的条款支配着议会的工作（议事日程的确定、各议会委员会的工作），使其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主动性，并对议会的控制（如信任问题和不信任案）予以制约。这类做法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要国民议会没有以绝对多数表示不再

予以信任，行政权就处于一种临时组成的反对派的庇护之下，并且能够继续得到议会的合作。

以上即是用来最终建立一种“真正的议会制”（此说出自新宪法的起草者之一米歇尔·德布雷）的主要措施。人们实际上可以想象，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即通向一种得到改善的制度的精神来制订的宪法，它所采用的风格与其说是法国式的，不如说是英国式的。但是，它与议会制的特性是相吻合的。事实上，这些预防措施是在内阁不稳定的烦扰影响下积聚的，并且自相矛盾地通过在国民议会先后设置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党和多数派，使其变得一无是用。但是，它们尤其因为戴高乐将军的行动被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方向，通过巧妙地利用时机，戴高乐将军让这一政体向着某种总统制的方向转变。

总统权力的确认

除了人的意愿，时机在政体的转变过程中亦起了作用。在第一阶段（1958—1962 年）期间，统领整个政治游戏的是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方法。的确，在 1958 年 12 月被选为总统的戴高乐将军，丝毫没有掩饰其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个人手中的意愿。但是，绝大多数法国人——其中包括其为数可观的反对者——为找到阿尔及利亚悲剧的出路，对他寄予信任。与米歇尔·德布雷——此人虽对戴高乐极为顺从，但也怀疑戴高乐先前采取的支持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立场的理由——为首的政府相反，在这一问题上得到一股强大的舆论支持的各个政党与议会，把赌注押在了国家元首身上。而这位国家元首毫不耽搁地显得像是行政权名副其实的首脑，而那些部长们，包括他们当中的总理，亦只不过是忠实的助手。伴随着标示政体演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的 1962 年危机突然出现之际大多数国人存有的默契，政体的转变轻松地开始进行。 980

因为阿尔及利亚事件被认为已通过埃维昂协定和这片领土走向独立获得了解决，各党希望能够恢复自己的行动自由。但是，戴高乐将军利用 1962 年 9 月在珀蒂－克拉玛尔发生的针对他的谋杀案，决定通过全民投票的途径，由国民对关于修改宪法以及通过普选来选举总统

的方案进行裁决。这一方案立即遭到了政治阶级的抵制，被第二帝国的幽灵所纠缠的他们，在戴高乐的创举中看到了适于建立一种合法的独裁的诡计。被选择的程序越是寻常，就越容易把反对者动员起来。由于公民投票未被列入宪法所预先考虑的修宪方式之中，反对者遂以此大做文章。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在1962年10月5日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的一项不信任案，迫使乔治·蓬皮杜政府辞职。由此，通过政府，国家元首与议会之间发生了冲突。然而，戴高乐将军在两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战胜了议会：其一是他成功地使其方案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赞成票达61.7%）；其二是他的支持者在几周后，赢得了与不信任案通过后即被批准的解散议会相关的选举。

从此，政体向着加强总统权力的方向演变。总统权力实际上绝对地被运用于国家事务的顶端——较小的问题则由负责日常事务的政府处理。所有重要的决定，实际上均是在爱丽舍宫拍板决定的，其援引的条款和采用的方式，有时会令观察家感到困惑。国民议会被当作一个普通的登记室，"负责制订好的法律"，也就是说投票通过由政府提供给它的法案。就连司法部门也感到其独立性受到了国家元首的某些意图的威胁，后者甚至在1962年宪法改革实施前就认为，其作为最重要的领路人的使命，是建立在全民委托的基础之上的。

不该被遗忘的是，总统权力也是一种来源于人民的权力：在巡访各省，参加会见，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广播电视讲话，以及在其有可能被迫辞职时采用全民公决的过程中与民众的接触，同样是越过所有中间人直接召唤人民的手段。因为法国人只在第五共和国时才有如此之多的投票机会，起来反对权力过度个人化的民主人士们遂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

的确，1965年的总统选举标志着戴高乐将军的影响力明显减弱——他未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即胜出，且在第二轮选举中亦只获得了55%的选票。不过，这一不大的胜利却开启了一个新的七年任期，在这一新的任期中，自然而然会进一步加强先前的行动。甚至在议会多数派因1967年3月的选举略有削弱之后，第五共和国政体仍显得稳操

胜券。作为行政权名副其实的首脑，共和国总统因其不用承担责任，可以免遭议会的批评，而承受这种批评的只会是政府。但是，他同样受益于1958年宪法确定的权力等级制度，并因此拥有比面对本国国会时的美国总统更为广泛的权力。议会制与总统制别出心裁的结合，使行政权得以享有人们在一个民主国家所能梦想的最大的独立性与权力。然而，这种关于权力的设想是建立在不断得到人民支持的假设上的，981 一旦失去人民的支持，以此为基础的一切就会不复存在：由于制度内部没有设置出口，人们会被迫面临政体的危机或共和君主的退位，对于这两种情况，戴高乐将军也注定会亲身经受。如果说能吸引人们效忠的权力在危机时期轻松地得到承认，那么，当一种政体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时，这种权力应当懂得与其他政治力量妥协。

政治力量的角逐

虽然政党与政治力量通过1958年宪法首次得到承认，但它们对于戴高乐的共和国的方向，仍只能起一种次要的作用。这首先得归因于戴高乐将军的个人威望，但同时也源于这样一种事实，亦即将围绕着支持总统的行动形成一个议会多数派，而面对这一多数派，反对派从未成功地向公共舆论提供一种可信的唯一可替代的方法。不过，一次民众力量的大爆发将在1968年让这一政体发生动摇，而由一些党派组成的联盟，则将迫使国家元首在1969年挂冠而去。

1958年的立法选举并未产生什么令人震惊的结果。在第一轮选举中，社会党与人民共和党获得的票数及其所占的比例维持不变；激进党获得的选票较之1956年的选举少了50万票。但是，共产党少了170万票，而且其选票所占的比例自1945年以来首次低于19%。普热德运动分子实际上已从选举舞台上消失，而保卫新共和联盟这一新成立的戴派政党，则以360万票（法兰西人民党在1951年获得的票数是412.5万票）获得了17.6%的得票率。独立派人士增加了100万票，其得票率接近20%，就选举而言已成为最重要的组织。除了共产党的票数令人印象深刻地大幅减少之外，选民似乎显示出一种相对的稳定。但是，以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取代比例代表制，势必会加大差距，

并且使国民议会充斥以各种名义支持戴高乐将军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议员。

鉴于各政党在1962年危机爆发过程中所持的立场，11月份举行的立法选举确认了戴高乐派人士的推进。他们在第一轮选举中所获选票就超过了580万张。就公民投票时持反对立场的派别而言，共产党收复了一小部分失地（其获得的票数从380万票增加到400万票）。但是，这些选举最为突出的特征乃是立场较为居中的组织的衰落：在靠左翼这边，社会党与激进党所失选票竟多达180万票，其得票率从26%降为13%。人民共和党亦同样如此，它丢掉了80万张选票，得票率从11.6%降为5.1%。至于右翼中间派，则分化为两大块，其一是支持戴高乐将军的独立派人士，其二是对法属阿尔及利亚念念不忘的人士。极右派则已退缩至微不足道的地步。

在这种状况下，可供这一政体的反对者使用的策略有二：第一种策略与竞选总统未遂的加斯东·德菲尔（社会党人）所作出的相关努力相吻合，它力图在共产党之外，把从社会党到人民共和党的所有反对戴高乐派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在此，人们似乎可看到一种重建“第三力量”的企图。这一企图因为社会党与人民共和党之间的谈判破裂而注定失败。第二种策略是弗朗索瓦·密特朗所采取的策略。他在1965年总统选举时独自充当了总统候选人，并显示出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整个左派的候选人。尽管在某些中间派选民那里积聚着对戴高乐派的怨恨（故此他们在第二轮投票时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了密特朗），这一联合仍因为大多数选民对共产党心存疑惧的原因而注定无法成功。

982　但是，左翼联合的策略在1967年3月却大获成功。密特朗创建了社会民主左翼联盟（由社会党、激进党以及一些俱乐部成员组成），他甚至以英国式的但却完全是非正式的方式，组建了一个“影子政府”。社会民主左翼联盟与共产党在1966年12月签订的选举协议在1967年立法选举中严格地得到了遵守，执政党（由保卫新共和联盟与站在它一边的独立派人士组成）勉强保住了多数派地位，其获得的虽

然仍是绝对多数，但并不牢靠。

与总统选举一脉相承的是，政治力量似乎正在围绕着一个多数派和一个反对派重新组合。但是，相对立的两种联盟既非旗鼓相当，亦非可相互替换。如果人们目击了多数派中戴派分子与独立派人士之间初步的小争论，那么就会发现，他们在议会支持国家元首行动时所需要的凝聚力并不成问题，至少是在 1969 年前是如此。而在反对派这一边，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的谅解却要逊色得多，这种谅解的最大成果只是 1968 年 2 月达成的共同声明，而在这一共同声明中，关于彼此之间的分歧或共识的陈述紧紧相连。双方与将在 4 年后达成的《共同执政纲领》还相距甚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尤其导致了左派的分裂。共产党人赞同戴高乐的部分外交战略（在东西方之间搞平衡、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社会党人则仍然极为赞同大西洋同盟和欧洲一体化。但是，反对派也包括一些“中间派人士”（基督教民主党人、激进党人和温和派人士），他们的特点是既反对左派，同时也反对戴高乐将军的内外政策。如果反对派赢得了 1967 年的选举或是在 1968 年议会解散后举行的选举，他们在上台执政时将会极为费劲。

此外，这些组织对 1968 年“5 月事件”的爆发完全觉得不可思议。对于这一事件，所有的政党和工会的领导层皆与统治者一样深感意外。左翼寻求立刻恢复造反行动，这场从大学而起的造反行动有如一根导火索，蔓延到了大多数社会阶层。但是，在这场短跑比赛中，左派因为戴高乐将军迟缓的“发力”，在终点败下阵来。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已有 10 年的政治阶级，反过来在 1969 年利用公民投票，对国家元首进行了报复，使其因此受挫。反对派的政治力量最后终于战胜了其对手，但之所以如此，得部分地归因于其对手的同谋串通，以及因为内讧没有能够从他们的胜利中获得好处。

内外政策

戴高乐的共和国持续了 10 年，但它给国家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方面可归结为在从财政、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直至行政管理等各个领域实现的复兴时所作的努力。不过，如果人们因认为这

些领域应当脱离导致其在 1968 年失控的老套路而将上述的一切一笔勾销的话，那么，就谈不上采取过任何引人注目的改革。所出现的变化在于各种事务在被处理时不再缺乏效率与权威，延续性在国家领导的层面得到了保证。尤其是在外交领域，新的举措接二连三地推出，并因此完全改变了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983

第五共和国头十年期间的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

派别名称	1958 年 11 月 23 日	1962 年 11 月 18 日	1967 年 3 月 5 日	1968 年 6 月 23 日
共产党	3 907 763	4 003 553	5 029 808	4 435 357
非共产党极左派	261 738	427467	506 592	814 212
社会党	4 193 786	2 298 729		
左翼联盟			4 207 166	3 654 003
激进党	1 503 787	1 429 649		
人民共和党	2 273 281	1 665 695		
民主中心			2 864 272	2 290 165
独立派人士全国中心		1 404 177		
独立共和派		1 089 348		917 539
戴高乐派	4 010 787	5 855 744	8 453 512	9 663 605
极右派	533 651	159 429	194 776	28 871
弃权	6 241 694	8 608 199	5 404 687	5 631 892
登记选民	27 236 591	27 526 358	28 291 838	28 171 635

1958 年采取的投票方式的变化，即从比例代表制改为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使得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投票结果难以比较。鉴此，我们在此只保留了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在这一图表中，人们尤其可注意以下几点内容：1. 共产党的相对稳定；2. 共产党除外的左派的分裂（尽管在社会民主左翼联盟的旗号下进行了重组）；3. 自 1962 年以来作为政治组织的人民共和党的消失；4. 中间派的犹豫不决，该派最后一分为二，其一与基督教民主党联手，其二则倾向戴高乐派；5. 戴高乐派的持续壮大，这一现象显然是中间派与右派力量大幅削弱的结果。

不过，戴高乐将军的“宏伟计划”是逐渐地展现出来的。他首先不得不解决耗尽了全国精力的阿尔及利亚问题。通过与对手进行艰难的谈判，并与支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人——部分军队曾两度对这些人施予援手——进行艰苦的斗争，这一问题在1962年得到解决。虽然阿尔及利亚问题通过协商得到了解决，但对戴高乐来说，它的独立丝毫谈不上有何荣耀，而年轻的非洲国家迅速地取得独立则更是如此——自1960年起，这些非洲国家摆脱了“共同体”过于僵硬的框架的束缚，而这一共同体当初是通过1958年宪法并根据它们的愿望建立的。不过，对于这些挫折，始自1962年，戴高乐肯定会以“非殖民化的捍卫者”和“第三世界的优先对话者”来为自己辩护。就欧洲事务而言，他接受了罗马条约的遗产，并在最初规定的日期，即1959年1月1日，开放了共同市场。但是，在此之后，他显然像是一位国家利益毫不妥协的捍卫者，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在1965年抵制布鲁塞尔为防止出现无意推进共同体一体化行动的可能而设立的制度达6个月之久。作为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漂亮地达成的和解的主使者，他却反对英国申请加入共同市场，以避免美国的影响力通过英国这个中间人渗入到欧洲事务之中。与此同时，他与美国保持了距离，拒绝签署1963年关于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让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66年），公开批评美国的越南政策（1966年），鼓吹为取代美元的霸主地位而恢复金本位，成功地对拉丁美洲进行了巡访（1964年），支持魁北克独立（1967年），推进与苏联的关系（1967年）以及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在1967年访问波兰、罗马尼亚），此外还有打开与中国的联系，并在1964年与中国建交。最后，1967年爆发的“六天战争”使他有机会采取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法国这一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欧洲病夫”，在1960年代末成了国际政治领域的“喜欢惹事生非者”，到处表现自己，并且似乎准备充当第三种世界性的力量的领头羊，与两大阵营的霸主抗衡。 984

这种战略绝非没有矛盾之处，并且难以肯定它在没有引起强烈抵制的情况下，能够长时间地展开。但是，它尤其因为内部的阻止而减

慢速度，继而甚至是完全停顿。“经济问题从属于政治决策”：即便此言有值得怀疑之处，但它充分强调了这一点，即在戴高乐将军眼里，对内政策注定得为对外政策服务。然而，尽管出现了国民得以受益的繁荣浪潮，一些部门的不满和社会的紧张状态在积聚，并且没有希望在政治体制的运行中找到一种出路。就在戴高乐将军在布加勒斯特受到隆重之极的欢迎之际（1968年5月13日），法国的首都落到了从大学里出来的闹事者的手里，而更为危险的是，这些人在行动时并没有什么纲领，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证明政权的无能与制度的脆弱。暴力事件的逐渐升级，很快唤醒了所有不为人知的不满，而这种不满的充分流露则以掩盖和压制大学生运动告终。一场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社会悲剧持续了数周之久，只是通过社会让步（乔治·蓬皮杜与各工会签订了格勒内尔协议）的沉重代价，以及向人民重新发出请其选出一个新的国民议会的呼吁，秩序才得以恢复。

从此，魅力已被去除，法国政治的弱点暴露无遗。也许是为了恢复他那已受到损害的威望，戴高乐将军不顾其顾问们的劝阻，决定通过公民投票，让全体人民对关于把权力下放到各省以及彻底改革参议院的法案进行裁决。形势的演变表明，法国舆论对于这些法案并没多大的兴趣——这些法案最终在1972年通过立法途径，并且以低调得多的形式获得通过。但是，戴高乐此举的主要弊端是把参议院的存在与否重新提出来讨论，因为参议院是年代久远的共和制度机构，对它采取动作会让许多地方利益的保护受到威胁。这一步骤有失谨慎，而且，虽然没有任何法律文本要求他这样做，但当戴高乐将军根据自己的习惯，决定把公民投票的结果与自己的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时，这一步骤更是带有自杀色彩。在投票者中，反对者占了53%。甚至在这一结果被正式公布之前，戴高乐将军便通过一则简单的公报宣布，他将停止履行共和国总统的职权。他后来甚至没有重返过爱丽舍宫，而且从此以后不再介入任何公共生活。戴高乐退隐后置身于科隆贝的静谧中重新思索着“事物的微不足道”，但其救世主的影子仍将长时间地笼罩着法国的政治舞台。不过，他离去时的局势表明，甚至对于伟人来

说，要让法国的伟大与法国人的幸福协调一致，仍非易事。

蓬皮杜的法国

"我不是戴高乐将军……"，乔治·蓬皮杜在总统竞选活动开始之际首次发表演说时曾如是说。18个月后，蓬皮杜总统在向国人宣布夏尔·戴高乐逝世的噩耗时选择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用语："法国失去了亲人……"[①] 从这位主要当事人的言词中可以看到，两位国家元首之间在身高上的差别大得令人难以忍受，前者的遗产要让后者来承受的话显得太过沉重。

不过，乔治·蓬皮杜并不缺乏政治家必备的素质。文学专业培养出来，而且还毕业于巴黎高师的他，曾是戴高乐将军在解放后不久时的私人幕僚，而先后在行政法院和银行任职，则使他又获得了行政管理和做生意的经验。1958年，他再次为新的国家元首效力，并成为埃维昂协定主要的谈判者之一。1962年4月，他接替米歇尔·德布雷担任总理，并在这一位置上一直待到1968年7月。是时，他与其前任一样，"等候共和国差遣"。虽然他因有失轻率，亦即过早地表露出想当总统的念头而让戴高乐很不高兴地对他另眼相看，但在戴高乐派的所有领导人中，他仍是最被看好的继承人。但是，这种继承，即便无法改变政治方向，也必须改变风格才行。

他的权威已不再是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者的权威，毋宁说是可在记者招待会上干练、清晰地阐述其案卷内容的能人的权威。对伟大的梦想，逐渐地让位于一种带有其地方特色的谨慎。对妥善管理的关心，压倒了外交领域的抱负。他活像一个了解自己企业、明白它经不起再折腾的董事长，凭经验就知道在经过1968年5月伤痕累累的危机之后，法国需要某种短暂的休息期。这位总统更喜欢利用而不是动摇国际力量的均衡，因此，他喜欢的是温和的方式，而不是生硬的方式。人们可以说，戴高乐主义被蓬皮杜给庸俗化了，但它毕竟始终还是戴高乐主义，因为乔治·蓬皮杜在涉及国家权威、

① 原文为La France est veuve...，若直译的话，有"法兰西成了寡妇"之意。

国家利益或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始终不会打算妥协。人们后来可以看到，尤其是从 1973 年秋天开始，当中东危机突然改变了国际局势的原有状况时，蓬皮杜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如果他没有受到病魔的折磨并在 1974 年春天溘然去世，他的前途会怎么样呢？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乔治·蓬皮杜不会将自己的使命归结为简单地向后戴高乐主义过渡。不过，政治气候的变化与外部紧张局势的加剧，迫使这位新的国家元首在困难的条件下在各条战线进行拼搏。

政治力量的觉醒

虽然反对派始终存在，但在戴高乐将军担任总统期间，党派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徒有虚名，这既是因为国家元首的个性，同时也得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戴高乐的对手没有能够组成反对他的统一阵线。乔治·蓬皮杜的当选仍然证明了这种状况，因为社会党与共产党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在第二轮选举时，人们看到与戴高乐派候选人对垒的是阿兰·波埃，此人是右翼中间派的代表人物，深受基督教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并倾向于支持欧洲一体化，因而，新的共和国总统完全可以放手组建一个由清一色的忠于戴高乐主义政治路线者组成的政府。

在忠于戴高乐主义政治路线者当中，据载有某些怀疑蓬皮杜是否会不折不扣地奉行戴高乐主义政治路线的人缺席。但是，保卫新共和联盟的绝大多数人对新任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予以支持，后者已经表现为是戴高乐主义的“头面人物”之一，同时亦是戴高乐主义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支柱之一。保卫新共和联盟同时同意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让某些民主进步中心的人士入阁，而该中心此前曾与戴高乐将军唱过对台戏。力图刷新政府形象的沙邦-戴尔马抛出了一项新的计划，这就是在协调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和实行“参与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这种创新之举没有能够吸引反对派中的中间派，同时却使左派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反攻。反对派中的中间派继续谴责“保卫共和联盟国

家”在政府与行政管理部门的独裁，同时，尽管戴高乐派在欧洲问题上的政策让他们感到满意，但他们仍批评戴高乐派的外交政策民族主义色彩过浓；而左派则进行了重组：乔治·马歇及其班子掌握了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弗朗索瓦·密特朗成功地在1971年6月进行过革新的社会党中居于领导地位。这两大党与左翼激进运动展开了谈判，希望能签订一项若左翼在下次立法选举中获胜可充当施政纲领的协定。

为了能够通过让左翼的两大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化来挫败这种企图，蓬皮杜宣布，他打算恢复就是否批准让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举行公民投票的程序。这一策略果然不错。因为共产党发出指示，在4月份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以此表明其对一体化的敌视；而社会党人虽然赞同共同市场向英国开放，却因为不愿落入国家元首的圈套而发布了投弃权票的指示。但是，这一中途发生的小事故没有阻止相关的三大党在1972年6月27日签署了一项《共同施政纲领》。这一事件使法国政治的前景可能发生巨大改变，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想到，终于取得和解的左翼（自1947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将对选民产生的吸引力，远大于围绕着某个普通的选举协定而形成的政党联盟。不过，这样一种选举协定在1967年就足以威胁到戴高乐主义的多数派。从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成员开始，每个人都心里明白，在1968年事件的直接影响下选出的国民议会，在1973年正常结束任期时不可能“重新获得”。法国从此将进入一场多数派与左翼联盟分庭抗礼、成果各异、持久不衰的选举战之中。

1972年7月初，蓬皮杜总统通过让沙邦－戴尔马辞职摆脱了这位总理，他在这一过程中所采取的做法此后在第五共和国成了一种惯例，即辞职相当于“得到本人同意的解职”。沙邦－戴尔马的个人威信部分地因为《鸭鸣报》披露了他的税单而受损，他有点过于无拘无束的风格，以及在电视屏幕上明显显得不够灵巧，尤其是他力保的合同政策陷入困境，凡此种种，皆令共和国总统觉得，此公不是一位最适于领导多数派投入选举战的政府首脑。为了赋予这种责任，乔治·蓬皮杜召来了皮埃尔·梅斯梅尔，此人是一位绝对的戴高乐主义者，但其

个性不是那么突出，而且或许会比其前任更加顺从地听从爱丽舍宫的指挥。在政府内部，“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戴派分子的份额得到了加强。如果说，在这种状况下，新的政府班子没多少机会来扩大现有的多数，那么它至少可以指望挽救多数派的团结，并以这一堡垒为中心，遏制反对派的推进。

1973 年 3 月的立法选举证实了这种预兆，因为原来的多数派尽管明显受到削弱，仍在议会中掌握支配地位，占据了 473 个议席中的 275 席。虽然失去了 90 个议席，保卫共和联盟仍是多数派中的第一大党。左派的进展，尤其是社会党这边能明显感到的进展，仍然受到限制（其获得了 176 席，而在 1967 年和 1968 年分别是 91 席和 193 席）。改良主义中间派组成的反对派则毫无进展。在这种状况下，延续性显得注定可以让人接受，而皮埃尔·梅斯梅尔亦可继续执掌总理大权。除了将一个部长职位，亦即外交部长一职赋予了米歇尔·若贝尔——此人原为爱丽舍宫的秘书长，堪称国家元首的亲信，他的政府班子只是略微作了调整。国际形势的演变很快就让这一任命显得更加突出，并赋予蓬皮杜总统的最后一年任期一种强烈的戴高乐派色彩。

987

外交政策的影响

较之戴高乐将军的外交政策所顺延的脊线，蓬皮杜按理应为 7 年的任期的最初几年实际上处于退缩状态。通过撤销戴高乐对英国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否决，主动地重新推动欧洲建设，蓬皮杜似乎希望同时向反对派中的中间派人士交出某些抵押品，并对法国的亲密伙伴作出一些安抚，后者 10 年来因戴高乐外交政策的捉摸不定、大起大落而经常心生不满。就东西关系这一条轴线来说，防务政策的独立得到了维持（还有与法国已退出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似乎得到了改善），并在美国与东方国家各自作出的诱惑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蓬皮杜总统甚至还是首位造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国总统，在先后于 1970 年 2 月和 1970 年 10 月对美国和苏联进行礼节性访问之后，他在 1973 年 9 月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南北关系这条轴线来讲，法国的领导人们显得像是希望优先考虑一种“地中海政策”，这一政策从

来没有被清晰地加以界定，但其动力显得是来自这种考虑，即确保石油供应的需要，以及力图恢复与阿拉伯国家的特殊关系。

这种由三部分组成的战略始终遇到了多种障碍。虽然允许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使法国人得以获得可用来平衡联邦德国的影响的砝码，但它却不利于实施邦联计划——此事将处于错综复杂的谈判之中，不过，法国人既无能为力，同时又有点不安地看到了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的进展，而这种东方政策带来了联邦德国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并使联邦德国由此摆脱一种曾严重地妨碍其外交行动自由的障碍。就东西方关系的轴线来说，美国毫不迟疑地扭转了自己的外交战略，其具体举措包括与中国建交，寻求与苏联缓和关系——这种缓和通过在1972年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及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6月签订的协定得到了体现。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两个超级大国意欲共同主宰国际事务。欧洲与法国被排除在了这场游戏之外，但让法国聊以自慰的是，它充当了谋求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的东道国。欧洲和法国同样因美国在1971年8月15日采取的货币与商业方面的措施而饱受打击，这些措施将逐渐地引发二战结束后不久建立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清算，并威胁到贸易的稳定。至于“地中海政策”，它几乎立即就因与阿尔及利亚在石油问题上发生的冲突而受挫，后者在1971年通过国有化清偿了法国根据埃维昂协定在这一部门保留的股权。如果说戴高乐的外交政策始终得到肯定的延续性确实得到了维持的话，那么，它只是通过一种次要的方式，并伴随着不如说是乏善可陈的结果来维持的：因为迅速地暴露出法国外交似乎正向一种不太好的唯利是图的方向逐渐演变，所以某些既纯粹又顽固的戴高乐主义者焦急难耐。

这方面的觉醒来自1973年10月爆发的“赎罪日”战争。面对新的阿以冲突，米歇尔·若贝尔也强烈地采取了戴高乐将军在1967年曾有过的支持阿拉伯事业的立场。诚然，法国的外交在解决相关冲突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很大，起决定作用的仍还是美苏之间的交易。但是，一旦冲突结束，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即增强了主动性。1973年11月，

他在西欧联盟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种关于欧洲防务的想法，翌月，他又在哥本哈根签署了关于欧洲特性的宣言，在这一宣言中，9个成员国保证，“在国际事务中以同一种声音说话”。不过，只是在石油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法国的地位才尤其显得突出。米歇尔·若贝尔不仅在西方国家的所有代表中单枪匹马地反对美国提出的关于建立国际能源机构的建议，而且他还在阿尔及尔会见了布迈丁总统，并与他一起为1974年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材料问题的特别会议奠定了基础。一个起来反抗美国统治并准备充当第三世界的优先对话者的法国，这就是能让人回想起戴高乐外交的辉煌岁月的行为。即便它不再如同1960年代那样涉及到一场巨人之间的斗争，但是，大卫对巨人展开的英勇斗争似乎表明，戴高乐主义的影响并未消失，第五共和国政体可以在一种大胆的外交政策中，找到补偿它在国内事务中遭受的困难的方式。不管怎么说，这正是乔治·蓬皮杜的溘然去世使这些企图得以实现的过程突然中止时，留在许多人脑海中的图像。

988

吉斯卡尔的共和国

1974年4月3日起展开的“继承战”，标志着第五共和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如同在1965年一样，左翼团结在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标记下并肩战斗，并且还首次打出了1972年通过的《共同施政纲领》的旗号。左翼此役可谓功亏一篑，因为在第二轮投票时，在总共2600万张选票中，两位对垒的候选人各自获得的选票最多相差42.5万票。新的因素尤其来自这样一种事实，即在竞选中胜出的人并非一位戴高乐派人士（雅克·沙邦－戴尔马因在第一轮只获得15%的选票而被淘汰出局），而是一位独立派人士的领头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那么，人们是否可以说共和国改换门庭了呢？首先，一些表面现象显得延续性一仍其旧。雅克·希拉克，这位戴高乐派领导人中少有的积极支持原担任财政部长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出马竞选总统者，被赋予了总理一职。保卫新共和联盟仍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但是，

戴高乐派分子已不再在政府中占据多数。人们在这届政府当中看到，除了有新国家元首的亲信，还有改革中心的一些代表，后者此前一直既拒绝支持戴高乐将军，也拒绝支持蓬皮杜总统。更有甚者，政府班子的重心亦有移动（说到底，这纯粹反映了在总统选举中对吉斯卡尔·德斯坦表示支持的选民的逐渐变化），新的重心已转到新任国家元首这里。

受过科学训练（毕业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并曾就读于办学历史不长的国立行政学院，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很早就步入政界，起初是作为国民议会议员（1954 年），接着是作为国务秘书和财政部长——他曾两度出任财政部长，其一是 1959 年到 1966 年，其二是 1969 年到 1974 年。因而，他的经历紧紧地和第五共和国体制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这位既年轻又出类拔萃的部长——他在议会讲坛上侃侃而谈时的风采早已为媒体和公众所熟知——可能担心的却惟有不折不扣地忠诚于戴高乐主义的戴派分子。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首先，因为他不是那些人的同道；其次，是因为人们可能会指责他曾建议大家在 1969 年 4 月的公民投票中投反对票，而正是这次公民投票加速了戴高乐的退出政坛；最后，则是因为他公开而直截了当地宣称，法国渴望以不左不右的中间立场来加以治理。除了上述客观事实，还出现了仅凭揣测意图来进行的指控，这些指控可能会为多数派的内部以及多数派与反对派之间的争论火上加油。

在此，出现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反常现象中的一种：正是通过依靠第五共和国体制带有戴高乐主义色彩的各种制度，共和国总统才得以保持对政治局势的控制；而且，正是通过拿外交领域中的困难来大做文章，他才得以遏制国内各种反对派的推进。 989

政治力量的角逐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不得不面对的威胁有二：一个是反对派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另一个则是多数派的分裂。两种威胁哪种让他更觉得可怕，却很难说。

在其总统任期的头两年，政治力量的角逐呈现的是一种两极化的

态势。在多数派这一边，总统力图通过一种比其前任更为直接和放松的方式来博取舆论的好感。他在这一方面因其年轻和在电视上的表现令人赞叹而受益良多。与此同时，他力图让一种自由主义在立法和习俗中占据上风，对于这种自由主义，坊间可谓毁誉不一，尤其是一些人担心它是对一种“宽容的社会”的正式确认。至于总理，他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在议会与议员们交锋，并在与因石油产品涨价而造成的社会经济状况更为困难的条件下，同各种社会力量进行谈判。众所周之，恼恨与低声埋怨在戴高乐主义的阵营当中颇为盛行，但如同宁愿维持不和而不愿离婚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样，面子总算是保住了。

然而，分道扬镳还是在 1976 年夏天到来，对此，人们很难说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雅克·希拉克的辞职信有如一份针对共和国总统的“过于宽容”的起诉书，但共和国总统随即亦不失时机地宣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上升得归咎于其总理的软弱无能与缺乏预见。至此，戴高乐派分子与总统的支持者之间的决裂已成定局。希拉克毫不迟疑地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保卫共和联盟（1976 年 12 月）并担任该组织的激情洋溢的主席，重新把戴高乐派控制在了自己手里，而在共和国总统的支持者这一边，也出现了重新组合，并最终在 1978 年立法选举前夕组成了一个选举同盟——保卫法兰西民主同盟，它虽然是有点拼凑而成，但对多数派选民中希望与戴高乐派划清界限者的吸引人却颇大。这一策略显得富有成效，因为保卫共和联盟失去了 30 个议席（它只获得了 153 席，而在 1973 年时为 183 席），而保卫法兰西民主同盟则以 137 人当选或与之联合，较之 1973 年大致增加了 30 个议席。翌年，保卫法兰西民主同盟更是在欧洲选举中明显地超过了保卫共和同盟（前者获得了 28% 的选票，后者只获得了 17% 的选票）。虽然戴高乐主义派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它已显得只能成为与其他政治派别一样的政治派别，惟有一场戏剧性的社会危机才有可能重新赋予它机会，并使它得以重新入主爱丽舍宫。

在多数派内部的各种力量发生重组的同时，多数派与左翼反对派之间发生的另一场战斗也在展开。面对总统这一派的力量，左翼同盟

的力量显得注定要在一种潜在的，以通货膨胀、失业和货币方面的困难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氛围中获取自己的成果。在1976年春天的区级选举中，左翼明显地超过了多数派。尽管出现了雷蒙·巴尔——此人系政治经济学教授、前布鲁塞尔委员会成员，自1976年年初以来，在希拉克政府中担任外贸部长——带来的复兴，但舆论继续对多数派表示不满，后者在1977年的市镇选举中又遭受了新的失败。不管是属于哪个派别的观察家当时都认为，现在的多数派没有多大可能在定于1978年3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中获胜。左翼的胜利看来会开始一场政体的危机，因为人们不怎么认为，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自由主义信念可与左翼纲领中列出的结构改革的实施协调一致。国家元首与政府之间发生一场冲突的前景，解散国民议会或共和国总统辞职的可能性，无疑对选举天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肯定是因为共同纲领的签订者们公开了他们的分歧而确认了自身的失败。通过主动提出就1972年的共同纲领“重新谈判”，共产党在1977年初夏着手采取一种竞相许诺的做法，而此举势必迫使其伙伴，即社会党人与激进党人要么屈从于他们，要么在右翼那边遭到抵制。毋庸置疑，鉴于该联盟的活力尤其有利于社会党人，共产党希望以此在左翼联盟内部重新获得主动权，因为若获得这种主动权，它就有望在未来的左翼政府当中取得一种支配地位。但是，很可能是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对这种手段的结果并不抱有幻想，所以他们宁愿暂时寄希望于多数派的获胜，并最终寄希望于社会党的分裂。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必为在困难局势下不得不采取的不受欢迎的措施去承担责任，并在资本主义危机达到骑虎难下的地步时，以有利的地位进入到政府。对于一个自认为肯定是沿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的政党来说，时间因素关系不大，最终夺取政权的战略，比与一个过于强大的盟友联手行使政权的战略更为重要。

990

1977年9月23日，左派关于实施共同纲领的谈判破裂——对于这一消息，法国人始终深感意外。左翼政党将在没有政治纲领的情况下，分别投入选战，并满足于在第一轮投票后不久，草率地达成一项不足以扭转趋势的退出竞选的协议。左翼获得了大致为49%的选票，

但因为受到多数两轮投票制的不利影响，只获得了 201 个议席。共产党获得了高达 20.6% 的得票率，但只赢得了 12 个议席，而社会党以 22.6% 的得票率居于左翼政党之首，却仅仅得到了 9 个议席。

多数派勉强保住了政权；但是，法国这个向来被人们认为是分成彼此对立的两大部分的国家，从此被划分出四个政治家族，这四个政治家族注定得在两条战线持续作战，也就是说既要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性与其竞争者相斗，同时又要与自己的对手战斗。这种力量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便于国家元首发挥仲裁作用，不过，它迫使各政党为迎战 1981 年的选举而施展巧妙的手段。正是在这种全新的“政治风景”之中，吉斯卡尔·德斯坦的 7 年任期走向结束。

外交政策

如果说多数派需把自己的获救归因于反对派的分裂，那么，虽然有点不合常理，它亦同样受益于国际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然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外交政策颇为让人琢磨不透。在有些方面，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戴高乐主义的遗产：首先是通过他直接并且亲自处理事务的方式，把该由外交部负责的事情托付给一些高级职员；其次是通过他关心亲自并且积极参与处理重要的与时事相关的案卷。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他自己的风格，亦即与其说像一位战略家或外交家，不如说更像是一名对问题的复杂性了如指掌的技术人员。以下诸多创举似可归功于一种新型的“世界主义”：其一，创建欧洲理事会，此举提供了一种可与罗马条约规定的制度相匹配的机制，使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得以定期召开商讨欧洲问题的峰会；其二，举行南北国家会议，这一会议于 1976 年在巴黎举行，会议之前，吉斯卡尔·德斯坦曾对阿尔及尔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其三，维持在美苏两国之间的平衡以及防务政策的平衡——对此，人们众说纷纭，尤其是在戴高乐派分子那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不过，如果考虑到凭揣测意图来指控以及局势的因素，那么，军事、外交方面的大方向还是得到了维持。

991

折衷主义和姑息手段往往会引来争论。中间派人士期待着新国家元首推出重大的欧洲政策。他们被告知，欧洲在“行进”，欧洲唯一

具有的一体化前景是组成一种不明确的邦联，或者还有在1979年通过直接的普选选出的斯特拉斯堡议会，这一议会将满足于根据罗马条约赋予它的种种权力。在南北国家会议失败之后，法国在支持第三世界方面并未推出非同寻常的举措，而且，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在撒哈拉危机最为激烈的时候亦历经艰难。法国的打击力量得到了维持与加强，但这只是一场辩论的结果，在这一辩论中，陆军总参谋部力主的“交战”战略未能压倒“威慑”战略。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所保持的表面上的平衡，只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大西洋这边的国家更希望维持这种平衡，尤其是在涉及解决财政与经济问题时更是如此。

不过，1980年5月的华沙之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此行中会晤了勃列日涅夫，但却空手而归——留下了令人遗憾的印象，让人觉得法国在向一个刚刚对阿富汗进行侵略与军事占领的国家施行一种绥靖政策。

法国采取过冒险行动的唯一领域是非洲事务。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有所松弛的与黑非洲的特殊关系得到了恢复，它甚至超越了原有的法国领地的界限。更有甚者，为了保护当地的现有政权，法国还毫不犹豫地对乍得与扎伊尔进行了成果各异的军事干涉，而在中非进行的军事干涉，则是为了结束博卡萨皇帝的血腥独裁统治。

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政策显得相当不错，尽管（或者是因为）其在某些方面带有只有愿望没有行动的特征，以至于它在法国国内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1978年选举战役的主题，显示出大多数人如同支持维持法国独立的打击力量一样，赞同继续推进欧洲建设。这种在1960年代曾引起激烈争论的相关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并没有明显地免除不可告人的想法，后者或许就是通过冒险地尝试重新评价法国在外交领域里的义务，来争取那些曾在这一问题上支持左翼政党的选民。外交政策方面的延续性由此充当了国内政策的调节器。但是，尤其是国际舞台上的混乱与动荡——对于这一景象，国家元首始终在小心翼翼地加以利用——让政府的政策受益非浅。在这一舞台上，产油国充当了替罪羊，意大利或英国的国内动乱充当了陪衬物，联邦德

国的繁荣充当了楷模，世界性的平衡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为法国的作为有失平庸作了辩解，而法国的日常生活面对暴力事件到处蔓延时仍能相对平静，则无疑是一种安慰。从理智的角度来看无可非议的这些论证，却显得不便于让舆论倒向选择顺从。主张采取强硬措施者不乏抵制之举，但他们未能，或至少是暂时没有提出足以替代这种世界主义——在这种世界主义中，法国试图退回到采取守势——的做法。惟有未来可以决定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是否为法国选择了明智的道路或放弃的道路。不管怎么说，外部的困难将为遏制国内的请愿浪潮提供帮助。

无论对其 7 年任期如何总结，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呈现出了这样一个特征，这就是他是 1962 年宪法改革以来首位干满正常任期的总统。准备赢得 1981 年总统选举的竞争热情表明，这种改革已经为大家普遍接受。如同这一选举的参与程度极高所显示的那样，它在舆论中颇受欢迎，而且，它亦被大多数政治阶级作为游戏规则予以接受，这些政治阶级的主要领导人们，为赢得相关机构最为关键的位置——这一位置从此以后处在了爱丽舍宫——而投入竞选活动。

992

虽然这一改革值得肯定，但它绝非始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有待知道，这一体制是否能够经受改换门庭和左右共治的双重考验。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在 1990 年代给出。



第三十二章　文化表述与传播

1945—1980年，未来走向？

本章的内容、地位和目的，就其自身而言，具有深刻的意义，甚至显得有些不同寻常。过去，艺术和文学只是历史学家的仓促之作，穿插在众多重大历史事件比如王朝更迭、革命动乱、战争、和约、政治危难、社会和经济危机之间；如今，它们以广泛模糊的“文化”之名，在历史书籍里，引发人们的共鸣，形成了震撼和冲击，庄严而又短暂地实现了和谐统一。

时代的象征，易于描绘，却难以研读。怀着勾勒一定时期文化历史的意图，我们所能做的，至少可以自问什么是文化，并且试着找到答案。而这个答案无疑是冒险而大胆的，因为我们考虑的对象是刚刚经历的时代，或者说，是正在经历和介入的时代；尤其这段时期相对而言并非是停滞的、定性的，或者说完全是不可定性的，它所承载的文化影响和分量，纷繁复杂，导向不可未知、充满想象的将来。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想象。否则现在，稍瞬即逝的现时，即我们探讨的对象，不仅变得难以解释，而且毫不现实。总之，哪怕充满多样性和矛盾性，甚至各执一词，或者存在误解，我们关于文化——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可是不愿直呼其名；因此，蒙泰朗认为：“人们害怕说‘文化’，因为要对文化做出定义是不可能的。”——的概念，以

及这一概念在未来的投射，才是我们历史的核心，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过去四十年间的文化行为和成就——亦有人称：已故文化。抑或，如果人们愿意的话，文化行为，特别是1968年以后的文化行为，就是对文化和现有文化整体的质疑和诘问：我们不去探询、扭曲或者摧毁存在的一切。抛开所有关于文化的定义，科学的，任意扩充或是缩略的；我们发现：现代西方两大思想倾向平分天下：一为“简化型”，二为
994 “广延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结构的”和“存在的”。20世纪整整75年间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思潮”最终确立，它们是“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

学者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他们已经属于过去。然而风靡西方一个世纪，历史更为久远的两大“思潮”，在目睹其他思想流派从兴起到衰落之后：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理论至今仍然对峙着。尼采之后，“上帝死了”。一切，只要是上帝的，神灵的，就会丧失生命力和作用力。

我们因此就能对孕育虚无主义文化（生物意义）的古老基督教义妄加议论吗？不要忘记，有人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人类也已走向灭亡。尽管这句话似乎越来越不确信；而且倾听的人也越来越少，显得更加漫不经心。

因此，我们讨论的正是人类自身，也是文化自身存亡的问题。不过，首先什么是文化？狭义的文化：就是金字塔顶；高雅的文化。必要的，也是点缀的——对于人类历史和社会，文化位于宗教和民族之后（因此，历史书籍里，文化遭遇边缘化），甚至有的时候几乎成为纯粹的摆设。于是，文化出现局限性：超越文化的文化。根据哲学解释和自身含义：阶层文化，即特权文化，属于贵族阶层的特权；或者，世世代代的传承：简而言之，人文主义。这恰恰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无可取代。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无法建立人类的人文主义，取代人文主义的人类。这种文化受到质疑、威胁和憎恶；尽管同时，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一丝喜爱。人类天性是矛盾的，文化也是矛盾的，所以，文化总是徘徊于死亡和重生之间，如同人们在两种荒唐可笑的态度之间摇摆不定：要

么完全否定、摒弃，全面革新；要么，为了大众，从特权者手中夺回文化，使之神圣化：至高无上，不可触犯。

第二种态度将我们引向第二类文化：与特权文化并存的大众文化。很快人们发现大众文化与特权文化的唯一区别在于文化传播的受众。工业文化，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旅游社（旅行、饮食、休闲，只是令人称奇的移动场景）、《周报》、连环画、娱乐杂志、暴力刊物（公正的社会学家认为所有图书以及读物都归功于文化；任何事物都会诱发"反面"，并且趋向"反面"，反文化，对于文化而言，必然具有一定价值），文化被生产，被复制，被传播、被商业化；受众数量可观，但是也被同化，被贬低。如同大型连锁商店，按照高级时装的模式，永无休止地进行复制，向所有顾客输出同一商品。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所有人都应拥有真正的迪奥。贵族文化应该得到普及，吸收新的成员，实现由上而下的民主。换句话说，少数人的太阳能够成为普照万民的光辉。尽管有人认为纯属空想，但是，马尔罗满怀雄心壮志：文化的目的在于引领每个人瞻仰想象的殿堂，倾听寂静的声音，走向精神和感观的"王家大道"；人文主义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

995

法国文化广播电台，"文化之家"，可以说是这种文化的雏形。然而与此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反对的声音。一是，相信理想的真诚以及认为有可能达到目标的人们；二是，认为"这种文化的天堂就是地狱"的人们。他们认为与其利用文化塑造人类，不如摧毁文化，让人们得到重生。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宗旨和原则。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文化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优点，仍然倾向于在另一种文化中拯救灵魂，祈求永福。

另一种文化，等待人类的建构。它源于前面两种文化，可是与之抗衡，形成辩证的存在。这是一种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文化，既非特权或者少数团体对于知识的占有，也非文化产品的消费，而主要植根于"创造性"。最终这种文化成为——意识和幻觉的呈现——生命的创造，充满愉悦和满足。唯一的担忧是即使最为真诚的创造者，也

会提倡，甚至强加入自己的幸福观念。万事万物皆倾向如此，人们应当时刻警惕全民文化衍变成为极权文化。

无论如何，反对无生机的文化，向往活力充沛的文化（由爱神厄洛斯赋予、灌溉及延续的生命）——性爱，就是象征和宣言，通过破坏获得绝对快乐的绝对解放：萨德——这是 1968 年春天自发兴起的“五月风暴”的诉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作为导火索的马尔库塞，有意或者无意间，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当然“没人看过马尔库塞的作品”，如果我们相信革命领袖的说辞——顺便提一句，这就无法证明他们，无论教师还是学生，是因为过度阅读而犯下过失；其实根本不需要去读，马尔库塞的思想早已弥漫在空气中，潜移默化。

各种思想的共同影响，最终掀起“五月风暴”；其中不乏两股力量的推动，并在随后数年逐渐扩大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十年前人们还对“生态学”一无所知。但随着人们不断赋予新的含义和情感内涵，如今成为时代的热门词汇。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几乎仍旧代表边缘人物的社会政治诉求。“女性解放”运动（特殊话语，“女性写作”），渴望颠覆传统的社会秩序。五月暴动的中心思想，就是女性获得对身体完全的、自由的支配：针对男性（性解放，至少是原则上的；消除性别歧视和等级划分）；针对社会与宗教（摒弃“自然”功能观念；建立合乎情理的法律：避孕以及流产的立法）。这些抗议和要求理应引起强烈的反响，甚至激烈的争论，然而事与愿违，迎接她们的却是冷漠和无动于衷。

正好相反，生态运动几乎成为人人接受、认可、支持和参与的“文化理念”，甚至许多政治机构也被迫投以关注的目光。生态运动就是重新思索本质问题：工业技术文明，经济持续增长的神话，“进步”的概念、手段和目的。这种思索（受到科学的启示），不仅源于人们对“能源”破坏的意识和担忧，对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堕落的担忧，也是源于地球最终走向灭亡的担忧，曾经被认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及“财富”逐渐枯竭，首当其冲的就是水和空气。

996

由于女性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共通，女性自然而然地关注生态问题，

发展生态意识，两种不满现实的思潮在濒临死亡的社会——而这正是人类自食苦果，他们创造社会，并且只为人类服务（当然这里的人类指代男性）——越走越近。女性解放运动和生态主义运动，具有双重意义的彻底革新，完全超越大同小异、互为利用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应该记住，女性群体对于“解放”做出的种种阐释恰恰说明——实践亦是如此——一个时常被忽略的现实：自由的本质在于任何自由都不是必然的。

现代意义的文化，要求我们——至少暂时——突破以往狭义文化和“贵族”文化——我们称为“精英文化”——的局限，还原人类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在社会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思想的变迁，任何形式的创造以及知识的获得。在此我们有必要重申：文化投向社会、表现社会以及象征社会。文化无处不在：暴力，恐怖主义，规模主义（建筑，技术），汽车狂热（也是全球普遍现象，但是在法国极具破坏性，甚至连总统也不能免受其影响），毒品，“嬉皮士”，道德危机，对宗教信仰的漠视，与此同时，新的宗教信仰产生（不同宗教派别的极端化，印度教派，等等）。关于性解放，至少理论上，人们怀疑是否成为另一形式的修正、约束和消费刺激（以“性解放”为噱头的广告就是证明）。总之，文化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无论如何，根据文化的定义，我们始终在两种态度之间左右摇摆：平民大众的文化普及，即普适文化，普通人也能够与苏格拉底在柱廊旁高谈阔论；或者，文化就是一切，是生命，是福祉。然而，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此，两种态度尤其后者，作为一种复杂和重要的社会想象——文化层面的，也许也是历史层面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世纪后期的标志和主导，我们称之为未来的第一道曙光。

一、政治舞台的想象

997

如果要对近期文化资产（既然不得不用这个经济词汇）或者文化遗产做出总结，可供选择的作品不计其数，按照传统方式，依据作品

“价值”以及类型，可以分为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这些作品构成文化的内涵，如今——人们开始感受过去——充其量被视为美丽的偶然，时间的风化和历史的沉淀。但是在此之前，还是有必要探讨一下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创作者在法国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地位和功能。

知识分子是优越的，尽管也要忍受各种地位、各个阶层的权贵和名人都会遭遇的非议。但是无论如何，作家曾经享有的，以及仍在享有的尊重——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艺术家更加不值得信任——仍然令人心生向往，并让众多国外作家羡慕不已。第三共和国期间，作家的地位高高在上，不过仅限于精神层面。由于“文化政策”的缺失，所有政体里面，第三共和国的文化功能回归到最为简单的用途——文学艺术的资助者。即便如此，在设立博物馆的巨额开销面前，政府也感到捉襟见肘，对于作家来说，只要不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当然包括革命），他们的地位就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巴雷斯、阿纳托尔·法朗士之流充当旗帜、军号、陪衬和宣传工具，走在良知的边缘。他们审时度势，装聋作哑，从来没有权力，更谈不上什么影响。那么在共和国后期，是否有所改变？儒勒·罗曼摆出一副秘密顾问的姿态，提醒国家警惕纳粹白色政权的倾向。吉罗杜响应国家号召唤醒民族热情和血性之前，早在政坛有所作为。当战争阴云笼罩，人们失去欢笑冲动的时候，国家认为应该推出一位官方喜剧文人，于是萨沙·吉特里这位御用“莫里哀”登场了。同时，御用凡尔赛也登场了。1937 年博览会，转眼间即将化为废墟的建筑和花园里，人们正在欢庆，40 个国家的部长、大使和代表聚集在此参加大型闭幕晚宴，其中不乏德国代表——塞纳河畔，早已飘起纳粹卐字旗帜，我们看到，于是萨沙·吉特里在议长之后起身发言，赞颂法国精神，法国文学的辉煌传统以及文化，更加确切地说是法国文化。仿佛一幕悲喜剧中发人深省的场景，天才皮埃罗面容苍白，穿着一袭黑衣，在阴云密布的欧洲夜幕上空投射信号弹。

战争一旦拉开帷幕，形势大为改观。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日益重要。那些反动力量，或者缺乏思想的人，甚至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即

使蒙泰朗远离政治的高傲姿态，也有一定意义。终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左拉式的人物大批涌现，《我控诉!》式的文字变得平常。与此同时，政坛对文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44 年后，一股新生力量登上“艺术”宝座，以往才华出众可是碌碌无为的官方文人和“二等政客”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我们重新回到过去的“恶”习，继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后，伟大的作家再次参与政治。

当然，我指的是安德烈·马尔罗；而且，我说“参与”而不是“获得”，也不是“占有”，更不是“成为”政权。因为，对于能够代表国家、政权和法律的作家而言，政治光环似乎已经遮蔽和掩盖艺术的想象，而其真正的力量恰恰源于后者。现在，我们再也无法，或者几乎无法见证如此完美的结合。拿破仑·波拿巴的身上有着夏多布里昂的影子；或者，夏多布里昂的政治抱负与文学才能密不可分。夏多布里昂、博絮埃、圣西门和莎士比亚式的人物掌握了权力。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们强烈呼吁想象和创造的空间，并且如愿以偿。

998

这与我们之前谈论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同样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且无伤大雅。也许，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看到世纪中叶的 30 年间，文学创作以及作者才赋紧跟时代，表现时代——不管愿意与否，他的一生，无论曲折的情节还是终场的落幕，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物、演员以及作者合而为一，以现时为依据进行创作，并且加以演绎。然而这并非全部：在幕间或是散场的时候，作家仍在撰写他的《墓外回忆录》。

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哲学家参与政权的话，马可·奥里略（公元 121—180 年）就是典型例子，但是，无需证明他的半途而废，因为很快他就否认曾经学习哲学的经历。在此之前，柏拉图早就认识到：“哲学王”一旦朝王位迈进一步，其哲学之路也就从此结束；国王之间的相互影响远远不止学问方面。尤其当这位君主只是学识平庸或者冒充有识之士的碌碌之辈，哲学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时的权宜之策，不得已而求其次：伏尔泰的学生弗雷德里希身为王储时，曾经写过《反马基雅维里》。可是不久以后当他接过权杖，立即成为

高高在上的君主。

那么，现在饱受世人非议的“知识权力”到底是何物？第四种权力（或者新闻媒体与之结合而生的第五种权力?），还是化为乌有的权力？以莱奥纳多·西阿西阿为首的少数人士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三分之一的群体将“超越现有规则”，首先就是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他们或是迫于无奈，或是基于天性不为政权服务。这种极端的假设就其本质而言，还不必纳入知识权力的考虑范围。

可以肯定的是，知识权力必须毫不妥协地遵循与其他权力分立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拒绝所谓的“权力”，仅此而已。否则人们将在权力的迷雾里丧失灵魂、智慧、深远的目光、深邃的思想以及想象力。知识权力只有在思索和想象的过程中才能发挥作用：继而控制和约束另外一种权力（内部实施民主的前提，在于外部有着强大的舆论监督）。在曾对全世界的政治家的失败进行总结的《精神》杂志上，某个人指出许多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政府部门，不管怎样的政治机构，就会立即变得平庸，因此文章提出尖锐的问题：“政治难道会让人变傻吗?”总而言之，似乎——无论何时何地——想象需要超越政权。

二、民众戏剧与阿维尼翁的剧作艺术

1944年夏，法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如果还称不上革命，至少也是文化热潮）；戏剧，无论从持续时间还是重要性，都占据了首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必然。无论从其起源、本质、天性，还是功能来说，戏剧的艺术就是大众的艺术、参与的艺术、交流的艺术。戏剧是即将来临的文化活动的核心内容，最初源于青年文化之家。

999　如果我们认为，1945年戏剧“去中央化”仅仅只是地区行为的话，那就大大低估了它的意义。“去中央化”是对空间和观众的征服。此前，真正的戏剧大众还在沉睡，毫无自知，科波称之为“虔诚的信徒”。然而，他们大多停留在“教堂门口”，但自始至终，毫不怀疑它的存在。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国家推动民族戏剧的发

展，并且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戏剧的宗旨在于服务大众。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经历长期的准备和试验。人们不得不等待数年才看到戏剧舞台升起一轮新生的太阳。对于这股新兴力量，后来的人们将分析其发展历程，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戏剧作为大众性、群体性、表演性及庆祝性的艺术，不是自发的创造，也不是个人或天才的创作，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晶。要而言之，戏剧是遭遇人生变故和命运波折之时，在强烈的冲动驱使下，灵感、境遇、意愿和力量相互之间的碰撞。也许法国戏剧，必然兼具悲剧色彩和民族解放的特性。如果说，让·维拉尔最终实现了科波的梦想——后者只能通过预言希冀未来，但他之所以能够成就民族和人民戏剧的事业，也并非因为他是维拉尔，而是因为他生逢其时，"时势造就英雄"。

客观地说，时代创造了维拉尔。社会和政治环境固然重要，同时也必须有人能够抓住时机承此重任。有一男一女先后担负起了这一重任，前者是一位名叫皮埃尔·布尔当的部长，后者名叫让娜·洛朗，她是位意志坚定、热情激进的政府官员。如果没有洛朗非凡的勇气和始终不渝的坚持，很快淡出人们视野的布尔当，也只能在书本上谈论"去中央化"、戏剧节日和国家人民剧院的理想。戏剧改革，由此奠定了原型。

法国戏剧史上，维拉尔设计和创办的阿维尼翁——无论思想观念，还是演出场地——是戏剧节的先驱和原型；它的历史有待我们去书写，意义有待我们去挖掘。事实上，阿维尼翁绝对不是先存戏剧的扩展和兴起，而是真正的蜕变；或者说是本质的回归，重新的征服。请相信，我们一定是最早谈论阿维尼翁戏剧艺术的人。三十年前，还是一种理想，三十年后，成为艺术现实。这一文化"成就"如今再也无人心存质疑，即使那些曾经对此嗤之以鼻的人。阿维尼翁的衰落，意味着维拉尔艺术生命的终结。为什么呢？阿维尼翁不仅是维拉尔作为戏剧家取得的非凡成就，也象征着一种理念和艺术活力——遵循戏剧大师的原则，同时在实践中摒弃过去的空洞理论。无论从哪方面看，维拉尔

都是组织者，他选择场地，为戏剧带来新的活力、启示和灵魂。人们发现，回归的戏剧艺术——接受时代的更新和洗涤——在经历长期的没落之后猛然觉醒，挣脱死亡的威胁，最终走向自由。阿维尼翁的高墙内，戏剧终于回归自我。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如果不是祭礼，至少也是一种盛大的庆祝仪式。

培养新人新作（唯一没有实现的愿望），重新演绎各地戏剧和名家作品，只是新生戏剧的目标之一。最重要的是，戏剧被呈献给真正的观众，实现观众和戏剧的完美结合。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是热情洋 1000 溢的戏剧舞台。只要有表演的地方，就是戏剧和观众的集体狂欢。教皇宫内的中央庭院，木板架起露天剧场，维拉尔怀着一丝崇敬而又谦卑的心情尽情演绎，舞台一直延伸到伊丽莎白一世的诞生地。因此，尽管高乃依、毕希纳、克莱斯特和缪塞都曾在此获得新生，阿维尼翁辉煌的时刻——以及最初的时刻——永远属于莎士比亚。唯一的遗憾（也许，我们可以探讨原因）是现代作家的缺席，除了个别作家，没有新生成员的加入——克洛岱尔、蒙泰朗和絮佩维埃尔——而且，他们的存在只是陪衬。

阿维尼翁戏剧节，成为舞台艺术的圣地和典范。刚开始时，它只是一次令人侧目的大胆创新。随着其影响和规模的日益壮大（事实也已证明），阿维尼翁戏剧节充满生机和活力，满足了人们长久以来的期待和需求。此后，以阿维尼翁为典型，法国迎来了戏剧的全面繁盛，地方戏剧终于得到苏醒。雷蒙·埃尔芒谢尼姆旧城导演了《尤利乌斯·恺撒》，对舞台空间的运用具有划时代意义。除此以外，值得称道的是，埃尔芒谢对新兴作家以及戏剧的关注：莫里斯·克拉维尔的《阿尔比人》和《康杜埃拉》，儒勒·鲁瓦的《美血》，让·莫然的《各取所需》，伊夫·弗洛雷纳的《金铠骑士》。这位充满激情的创作者，回溯戏剧的原生状态，并从非洲带来令人着迷的《麦克白》。虽然只是浓墨淡彩的一笔，却是人类文化少有的成就。

组织者、戏剧节以及地方剧院层出不穷。戏剧盛会在征服法国各地城镇之后，重回文化之都巴黎。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戏剧题材极为

丰富，表演充满无限的想象力。即使舞台再小，也能给予人们期望和需要的表演。甚至可以激发人们的期望和需要。戏剧节吸引数以万计的观众重新走进剧院，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成为表演者和参与者。因为它的存在，经典剧目走出了少数享受政府财政资助的剧院，或者所谓的“先锋”剧院。莎士比亚最终赢得无数民众的喜爱，成为法国上演率最高、家喻户晓的戏剧名家。虽然，传统经典剧目并不适合面向众多观众，也不适合露天演出，但它却在短短二十年内吸引了——无论数量还是阶层——过去三个世纪都无法召集的观众。大型音乐演奏代替室内音乐，更好地烘托出舞台气氛。一方面，受到经典作品的感召，观众——新型的、庞大的以及多元的观众——数量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经典作品和观众的共同演绎，现代戏剧表演和观众之间形成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

如果说最初对演出空间和露天舞台的探索主要围绕古典建筑、市区和古老剧院的话，那么，让·德尚戏剧节的导演和建筑师克洛德·佩尔塞则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剧院设计。最具代表性的也许就是塞特的海上剧院，它如同贝壳一般，嵌入海浪汹涌的沃邦堡垒中心，坐落在“海浪的坟墓”和灯塔脚下。

我们必须认识到，戏剧节既不是一时潮流，一种偶然，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插曲，而是戏剧发展的关键阶段。毫无疑问，它也是这段时期戏剧历史的重要事件。

戏剧从沉寂走向复兴，最初的发起人和主力军还是战前的重要创作者和组织者，他们继续此前的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皮托耶夫，1939 年）。科波潜心思索与写作，并在 1949 年去世前夕，完成最后一部作品《金色面包的奇迹》。同年，他那一代所有作家中最富有和最慷慨的杜兰逝世；接着，巴蒂、茹维（和杜兰一样来自科波的老鸽舍剧院），后者将吉罗杜死后出版的三部作品当中的两部搬上舞台（《夏约的疯女》，1945 年；《贝拉克的阿波罗》，1947 年）。其第三部作品《为了吕克莱斯》，则由巴罗于 1953 年改编执导。

1001

战后，勒诺－巴罗剧团成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虽然几经变迁和沉

浮，剧团为了法国和世界戏剧的发展，始终坚持“延伸”创作，即经典剧目的全新演绎和心怀好奇的现代研究二者结合。在尤内斯库和贝克特之前，让－路易·巴罗首推克洛岱尔的作品《缎鞋》以及禁演剧目《正午的分割》，由埃德维热·弗耶尔倾情演绎。至此，克洛岱尔的所有作品都被搬上各种各样的戏剧舞台，包括《黄金头》。与此同时，巴罗不断追求新的表现手段，《缎鞋》（直到1980年，长达6小时的完整版）及《克里斯朵夫·哥伦布》（1975年，由达斯泰担任舞台时装设计）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半个世纪以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克洛岱尔的剧本几乎无人问津，如同定格乐谱的音乐无人演奏和聆听。戏剧只有找到真正的舞台，才能获得生命。如今几乎没有一部作品能够与之媲美。克洛岱尔主宰了我们的时代。但是，他的作品属于我们的时代吗？还是属于“我们的未来”？显然，谁也不知道上帝的安排。一方面，存在很大风险；另一方面，还有流传和永存的希望。

尽管如此，战前从事戏剧创作的人们仍然坚持着，发展着，戏剧作品不断涌现：阿尔芒·萨拉克鲁、马塞尔·阿沙尔、克洛德－安德烈·普杰、乔治·内沃、安德烈·奥贝、科克托、儒勒·罗曼、莫里亚克。他们中间的阿努伊更加接近我们的时代，他惯用娴熟的手法表现古代英雄和神话故事（《安提戈涅》，《尤丽狄丝》，《罗密欧与让内特》，《阿卢埃特》）。除此之外，三位作家也开始投身戏剧领域，其中一位年龄稍长，早已成名（主要在小说和诗歌方面），他就是亨利·德·蒙泰朗；另外两位则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的接班人。随着《死去的王后》、《圣地亚哥的团长》、《马拉泰斯特》、《罗亚尔港》、《西班牙主教》等作品的相继问世，蒙泰朗成为戏剧舞台的王者。作家运用优美的语言，悲剧的情感，借助舞台营造超越现实的世界。与之相反，阿尔贝·加缪特别是让－保罗·萨特，更强调戏剧对社会的介入。在《苍蝇》，《禁闭》（1944年），《死无葬身之地》，《毕恭毕敬的妓女》（1946年）中——时代的羞耻之心似乎荡然无存，萨特在《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1951年），《阿尔托纳的死囚》（1959年）中，运用最传统最理性的语言和方式（除了最后一部作品），推动现时哲学（当然首先是他本人的）

和社会改革的影响。相对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阿尔贝·加缪更加关注人类的命运，描写荒诞、绝望和反抗，讲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但作者的内心仍然怀着一丝温暖，一分激情（萨特经常描写的爱情，在加缪笔下同样炽热），尽管语言时而冷酷，时而温情，却始终自然流畅、一气呵成，不会让人有任何的突兀之感。他的作品包括《误会》（1944 年）、《卡里古拉》（1945 年）、《戒严》（1948 年，被我们视为他的代表作）、《正直的人》（1949 年）；最后，去世前夕（1960 年），他发表了《修女安魂曲》（根据美国小说家福克纳的作品改编），以及《附魔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1002

另外一位介入作家——尽管方式不同——是蒂埃里·莫尔尼埃，战前其学术影响与加缪不相上下，他凭借《国王的追逐》、《渎神者》、《让娜与法官》开始戏剧创作生涯，并且改编了《人类的命运》（1954 年）。令人惊讶的是，马尔罗这位悲情华丽、出类拔萃的语言大师却一直游离在戏剧之外。同期，出现了一位与克洛岱尔命运相似的作家米歇尔·德·格莱德洛德[*]，其作品长期受到人们的冷落，在其家乡比利时甚至也无人知晓。后来安德烈·雷巴把他领进法国，从此声名大噪。格莱德洛德的作品富有表现力和爆发力，悲情，粗犷，风格鲜明（充满弗拉芒色彩），抽象晦涩（《地狱的盛宴》，《阿尔维先生》，《巴拉巴》等等）。这种改变，标志新生时代的来临。诗歌的时代。也是思索、质疑和颠覆的时代。

几乎同一时间，让·热内走进人们的视野《女仆》（1947 年），还有，奥迪贝尔迪《果阿－果阿》（1946 年）、《急转直下》（1947 年）、《黑色节日》（1949 年）、《身体的蚂蚁》（法兰西喜剧院）、《效应》以及《最后的骑士》（1963 年，巴洛克式的梦幻空间，介于悲壮与滑稽之间，语言的不断突破和创造）。的确，诗人的时代已经来临。亨利·皮谢特（《卢克雷阿》在国家人民剧院上演之前，奥迪贝尔迪已将皮谢特的另一作品《第十二夜》搬上舞台），让·沃捷（《巴达上尉》，1953 年；《鲜血》，1970 年），乔治·舍尔德（《波布勒先生》，1951 年；《瓦斯科的历史》1957 年）；独行者朱利安·格拉克写下唯一的剧本《渔夫国王》，毋庸置疑，作品的艺

术魅力挑战世俗的评判标准。与此同时，在德克鲁、让－路易·巴罗和马尔索的推动下，法国哑剧也得到复兴和发展。

1950 年，正值这个世纪的分水岭，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尤内斯库推出独幕剧《秃头歌女》——“反戏剧”——从而掀开戏剧新的一页，宣告标新立异的创作理念。尤内斯库的作品采用超现实主义的语言和视角，其表现内容荒诞抽象，主题多为夫妇，尤其是生活幽居的老年夫妇彼此的欲望和仇恨：《椅子》（1952 年）、《责任的牺牲者》（1953 年）。在尤内斯库的笔下，神秘、封闭的舞台不断延伸，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理解和认同，短幕剧因而获得不断发展：《不为钱的杀人者》，《犀牛》（1960 年），《国王正在死去》（1962 年），《渴与饥》（法兰西喜剧院，1966 年）。尤内斯库成为当之无愧的“荒诞派经典作家”。因此，蒙泰朗（《死去的王后》）和尤内斯库（《阿麦迪，脱身术》），先后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位经典作家就是亚瑟·阿达莫夫，1950 年凭借《大小演习》和《进犯》两部作品脱颖而出。不知是否有人认同让·维拉尔稍具挑衅意味的评价：“我喜欢阿达莫夫甚过克洛岱尔”？但阿达莫夫，毫无疑问，属于这一时代。其作品结构松散，没有情节和心理刻画，“晦涩难懂”（显然，作者也不担心是否拥有读者），目的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造成的人性扭曲和异化（《弹子球机器》，1955 年；《保罗－保利》，1957 年）。最后，贝克特创作的《等待戈多》（1953 年），《最后的一局》（1957 年），《啊，美好的日子！》（1963 年）疯疯癫癫、充满梦幻、思维混乱、语言支离破碎，表现了在冷漠的世界里，人性逐渐走向死亡，一切都是让人感到绝望的虚无。美国剧作家阿尔比认为：“戏剧创作分为前贝克特时期与后贝克特时期”。

1003　问题在于，当传统的条条框框已被打破，戏剧是否仍然存在？按照里瓦罗尔的说法，荒诞戏剧盛行时期（先锋人物贝克特、阿达莫夫或是尤内斯库，至少有一位可以称为“经典”），法国语言和文化仍然得到持续普及。1960 年，运用法语创作的西班牙剧作家阿拉巴尔加入荒诞戏剧流派，成为新兴团队的后起之秀，其他人物还有克里斯蒂

安·利吉耶、弗朗索瓦·比耶杜、罗兰·迪比亚尔、阿尔芒·加蒂，以及维尔科尔《动物园》（1963年）、《俄狄浦斯》（1970年）。同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时代最为杰出的通俗喜剧作家安德烈·鲁森、奇幻荒诞的幻想大师马塞尔·埃梅，以及幽默逗趣的默剧演员马尔索。

此时，戏剧摈弃了所有高谈阔论，主张行为超越语言——至少超越文本语言，导演渐渐成为戏剧的中心。除了上述人物之外，还有十几位作家不得不提：从“去中央化”的先驱让·达斯泰到新型“去中央化”（即巴黎和郊区的文化发展）的领袖伊·雷托雷。但是在此我们主要提及两位最突出的革新人物安托万·布尔塞耶和罗歇·普朗松。

1968年后，法国戏剧迎来两大重要事件。首先，巴黎市立剧院十二年的辉煌成就。作为古老的市镇建筑，巴黎市立剧院并不适合现代戏剧的演出，因此人们开始对它进行改造（夏约宫的前车之鉴，无疑成为有益的启示）。拿破仑三世时期富丽堂皇的剧院最终成为一栋现代风格的建筑。在19世纪的旧址之上，坐落着由千颗太阳照耀的希腊式剧院。在曾经影响剧院的灵魂人物中，有莎拉伯恩哈特（已经成为过去）、杜兰（影响仍在），还有奈瓦尔（昔日诗人自缢的地方，成为后来的舞台）。

如果没有让·梅屈尔，巴黎市立剧院的命运将会如何？“文化活动”——陈旧的字眼在此重新找到深刻的含义，这里充满着生命和激情。每天两场演出或集会，吸引着络绎不绝的艺术家。歌曲、音乐（从卡拉扬到布莱）、舞蹈（大型国际芭蕾舞剧，当然，少不了贝雅尔），这些都是戏剧表演的陪衬或序曲。十二年间，共有37部作品被搬上舞台，其中不乏新剧首演。从经典作家莎士比亚、高乃依、马里沃，席勒到现代作家萨特、加缪、维尔科尔、阿瑟·米勒、尤内斯库、比耶杜、柯本；还有更早期的拉比什、契诃夫、皮兰德娄、布莱希特、萧伯纳、克洛岱尔（代表作品之一《交流》），等等。梅屈尔不顾社会评论的一致贬低，用事实证明吉罗杜的作品能够赢得观众的认可。剧院除了上演经典的保留剧目之外（世界巡演，从莫斯科到纽约），还有其他包罗万象的戏剧作品。在巴黎——然而不仅在巴黎——巴黎市

立剧院填补了夏约宫的空白（顺便提一下，没人能够预测普朗松加入国家人民剧院），完成了国家剧院的使命，尽管只是市立剧院，影响却是全民的。在短时间内，维拉尔原先的或潜在的年轻观众，纷纷走进巴黎市立剧院。总之，当前景令人堪忧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乐观的一面，相信法国戏剧的命运。

另一方面，由于与观众的疏离，位于夏约宫的国家人民剧院逐渐走向衰落。（在此，我想提及两位革新家：朗格，偏向理论，策划的埃皮纳勒戏剧节一度成为欧洲戏剧的盛地；帕特里斯·舍罗，极具魅

1004 力的全能导演，如同维拉尔，最后转向歌剧领域）。幸运的是，夏约宫的衰落推动了国家人民剧院的"去中央化"[①]，在罗歇·普朗松的管理下，国家人民剧院获得新生。普朗松是先锋导演，同时也是作家，1979 年，他出色地导演了品特的《无人地带》，此人是内心充满虔诚和胆识的"莎士比亚"式人物，自始至终坚持事业的初衷，以独特新颖的手法，赋予经典剧目全新的、现代的和永恒的生命，拒绝任何形式的曲解。正因为此，他的表演才能大大拉近了我们和作品之间的距离。《贝雷尼斯》，《达尔丢夫》（两种版本）就是最佳例证。总而言之，普朗松集导演、作家、演员和管理者于一身，不遗余力地推动了法国戏剧的发展。他最早认识到"创造性"对于戏剧想象的重要性，也是最早的实践者。

因为 1968 年后，最初的激情和怀旧的情绪，驱使着人们升华本能的冲动，希望创造性代替创造的作品。这是时代的特征。所有人——重新回归文化的童贞时代——都释放其表达的欲望，乃至纯粹的欲望，无法释怀的烦恼或者虚无边际的幻想，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的财富。但是，继承作品并且进行一定创造的理论甚至信仰，是否走得太远，以致扼杀已故作家，或者已故"职业"作家的创作想象？我们发现，不同分工彼此混淆。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只需各司其职，一切就会向最好的方向发展。戏剧也会从中获益。毕竟，它始终需要一位真正的

① 1972 年，里昂维约巴尼市剧院改名为里昂国家人民剧院。

创造者。

阿里亚娜·姆努什金，就是一位倡导“集体创作”的导演，主张用出于本能的即兴表演（仍然还是“被引导的”）来感动观众，引发共鸣。由她创建的“太阳剧社”，目前仍是法国享有盛名的剧团（《1789 年》和《莫里哀》，此后，不再通过戏剧表现的手段而是现实生动的手法还原 1979 年布拉格的审判）；与之齐名的还有洛朗·特泽夫剧团，特泽夫本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戏剧演员，也是一名真正的舞台诗人。

纵观戏剧发展的历史，从世纪之初开始——1913 年，科波改建“老鸽舍剧院”，1926 年，成立“卡特尔”联盟——活跃戏剧舞台的新人不断涌现，并且很快成为不可一世的绝对权威。导演不仅控制舞台、演员，还控制了作家（尤其已经去世的作家），总之，成为作品的主宰。他丰富的创造力，有时过于强大，甚至有意进行破坏。尤其当他成为或者想要成为作者的时候，过度创造或者过分幻想的倾向无疑更加明显——或许因为，他们经常演绎莫里哀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每个人都想独树一帜，长此以往，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对于作品（甚至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的破坏，含有一丝施虐的意味。

近期的作品，几乎与戏剧节日格格不入，因其不能在大型露天舞台生存。更加困难的是，它们无法吸引成千上万、来自不同阶层的观众，并且引起他们的共鸣（作为观众的学生群体，往往导致错误的判断）。跟随这些戏剧作家，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入现代戏剧艺术，那就是交流的渴望伴随着交流的丧失。艺术家和他的话语或者话语探索，都被囚禁在小圈子里。他，痛并快乐着。

既然我们无法一一介绍导演，那就谈谈作家吧。我们看到，在如此重要的章节（至少我们认为），作家的人数并不多见。与其假装相信，并且不断重复“作家是不存在的”，还不如索性承认——主要由于资金问题，以及导演的独断专行——对于他们而言，戏剧舞台可望而不可及。 1005

然而，抱着不计一切代价“走出困境”的心态，作家尝试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型剧场，最初观众不过几十人。咖啡剧场由此诞生，

主要分布在郊区及外省（最早在波尔多）。这既是一场戏剧实验，也是大众参与的演出。从出现到消失，再到重生，临时剧场的新兴团体成为法国戏剧的前沿力量。这里充满个人或者集体的创造，反抗，斗志，甚至挑衅，象征一股朝气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他们想要“特立独行”。

最后，必须特别提到这座地位显赫、几近神圣的戏剧殿堂——法兰西喜剧院。战后，法国戏剧走向自由、革新和净化，戏剧哲学大师皮埃尔－艾梅·图沙尔被任命为法兰西喜剧院的院长。在任期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在经历争议和令人不快的插曲之后，一种新的传统似乎逐渐确立，剧院管理者必须一方面得到演员的信任，另一方面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代表。莫里斯·艾斯冈，成功周旋于两种角色之间。接替他的皮埃尔·迪克斯，带领剧院走过最艰难的时期，他在传承古老传统的同时，亦奉行开放政策。总之，只有非常之人才能成为这座古典主义殿堂，同时也是当代艺术长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戏剧博物馆——的现代管理者。

三、大众传媒：图像和话语

大众传媒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从1950年开始的）电视的普及。电视，无疑也是大众传媒（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叫 mass media）最强大最关键的形式。虽然，就法语而言，“大众传媒”（communications de masse）这种表达方式相当模糊，改为“面向大众进行的信息交流”（communications en masse aux masses）似乎更能体现现实。如今，不论是好是坏，“信息的交流”已经变成一种“行为的影响”。

卫星的使用，为信息传播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和欧洲之间的信息分享，由于阿里亚娜火箭和欧洲卫星的发射而得以付诸实现。

电视

电视，很快就成为统治和说教的手段，或者威慑的力量。它要么通过传播，要么通过直接对话——当然，对话的一方永远是缄默

的——权力和人民的对话而成为政权的工具。权力通过话筒和屏幕得到确立和维持。每当遭遇重大危机，电视的作用总是至关重要。60 年代就曾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战争前夕，政府已经尝试（尽管还有一点怀疑和保留）通过电波向全国公众发布信息。但是，6 月 18 日抵抗德国入侵的广播号召与戴高乐将军谴责阿尔及利亚军事叛乱的电视讲话，仍能显示广播和电视之间的差距。消失在遥远而伤感的未知——过去，永远只有声音——通过电视画面，变得直接了然和充满魅力，成为“现实的存在”。

从广播到电视与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尽管正好相反[①]——两种转变具有可比性。但是，第二次转变的意义完全不同。首先，电视—图像—话语，传播和渗透的能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然后，随着各种因素的转换，过去三十年间，图像变得与话语同等重要。总之，通过电视，外面的世界可以随时随刻进入每家每户的生活。即使足不出户，根据帕斯卡尔的说法，所有的不幸和灾难也会呈现在眼前。这不再是一扇面向街道或者乡间的窗户，而是面向世界的平台。借助电视，所有的人都能直接、快速地接收各种信息，至少那些人们想要公布的信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人们期待建立一种超越信息交流的关系。它不仅是信息的交流，也是人性的觉悟和情感的互通。电视画面弥补想象的空缺，展现人类的灾难、不公和恐惧。不幸的是，我们似乎正走向反面。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电视观众由于通过虚拟手段了解真实世界，往往倾向于认为“电视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虚拟”。战争、屠杀、灾难、犯罪，如同电视剧的情节，缺乏真实感，甚至不如戏剧舞台的悲剧演出，能够激发内心的情感和共鸣。

1006

人类几乎从出生起，就会沦为“电视网络”的俘虏。有人预言，操纵权将在有遥控的一方与被遥控的一方发生置换。政权成为高高在上的法官，检视国民的一举一动；电视成为舞台，引人关注；而观众，待在镜头和“画面”里，成为被观察和被操控的对象。至此，我们已

① 前者增加图像，后者增加话语。

经充分认识电视特有的影响，包括最令人担忧或者最为“邪恶”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电视带来的诸多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交流信息，娱乐休闲，演绎或再现作品，传播音乐、艺术、科学和技术。确切地说，电视与后来的电影和唱片，共同成为蓬勃发展的视听传播和教育的手段。

视听传媒

视听是一种“渗透式”或“浇灌式”的文化手段——与“深入式”和“启发式”相对，如同伊索的语言——缺乏专注、思考、严谨、深度和反省。这种观点，部分反映了事实，部分缘于人们的习惯，因为我们深受文字和印刷文明的影响。虽然，文明早在古登堡——甚至“大众文化”——之前就已存在。更不用说纯粹的口语文明，譬如，凯尔特语（无视它的存在是错误的）。无论远古时期还是中世纪，最辉煌的文明，多数都是话语和绘画的文明。问题在于绘画终有一天褪去色彩，话语也只不过是声音，稍瞬即逝。

“这些”是否终将摧毁“那些”？毫无疑问，视听文明早已存在，随着视听传媒现代形式的出现和更新，人们开始预言印刷的消亡。对于这种毫无来由的推测，我们嗤之以鼻。正如曾经有人猜测“火星存在生命”——总是骇人听闻，如今四分之三的人已经归于沉寂。“世界大战”也没有如期发生。有的只是人类彼此的争斗和地球的灭亡。这些就够了。

出版物

无论如何，印刷始终都是文明和文化的基础。随着袖珍书籍的问世，书本也开始进入大众传媒领域（出版印刷总是作为支柱之一）。1007 现在，这根支柱开始摇摇欲坠了吗？的确，报刊经营的经济状况令人担忧。此外，集团垄断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1914年，巴黎有80家日报，如今仅剩11家）。但是，人们对报刊的需求仍然存在。相对战前，报纸的全球发行量有所下降。面对视听传媒的强烈冲击，报纸根本无法与其抗衡，但是并非全面崩溃。报纸的种类不断增加。比较两

者，数据更具说服力：视听传媒拥有约3000万受众，而报纸只有1000万（仅指日报），但是，这种抵制和维持的意义不容小觑。报纸的机遇在于，它能够不断反思，面对政权保持独立，甚至与之分庭抗礼，打破政权垄断视听媒介甚至信息的格局。

目前，报业出版的变化体现在：一、印刷总量达到200万的“报业巨头”逐渐消失（《巴黎晚报》，《小巴黎人报》）；二、巴黎地区庞大的日报体系日益衰落，外省报纸不断扩张（前者低于200万，后者超过300万）。如此一来，报纸的读者总数基本持平，与人口增长保持一致。但是读者到底期待什么？的确，不管他们是否愿意，相对所得，读者的期待并不那么重要。信息来源？文化来源？毫无疑问，两者皆有。但是与此同时，报纸的内容良莠不齐，有时甚至存在歪曲。

我们总是说：透过报纸和杂志，印刷制品传播色情与暴力，培养了低级趣味甚至病态的怪癖，偷窥私人生活的欲望。但是，不管出于怎样的动机，商业利益或是其他，针对电影和印刷读物败坏社会和人性的指责真的客观吗？难道根源不是淡薄的道德意识吗？要知道，对刺激或发泄加以区分是很难的，就如同要在文化和反文化之间划清界限一样。

关于出版印刷，最意味深长、表面看来也最有悖常理（但也很有可能属于自卫反应，体现真正的需求）的现象莫过于，于贝尔·伯夫-梅里创办和管理的《世界报》的成功与飞速发展。这是唯一一份做出大胆挑战，拒绝采用照片（很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照片，但是最近有所妥协）的报纸，希冀它能够不受视觉直观效应的限制，充分利用文字传播信息。人们一致认为《世界报》更加严谨，更具权威。也许这是文字和印刷最有力也最出其不意的回击。同时我们看到，伴随传统文学期刊的没落——《新法兰西评论》的勉强维持，《法国信使》的亏本出售——评论期刊，学术期刊和专业期刊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尽管影响深远，读者众多，《如实》仍然无意跻身大众传媒之列。从过去到现在，阅读量最广的都是关注社会、针砭时政的刊物，如《现代》，《精神》等。作为其中资历最老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欧洲》，在不断求新的同时保持本色，成为公认的百科全书，反映全球文化和文学动向。相隔150年，经历时代变迁之后，《新两世界杂志》致力于追溯1830年的创刊精神，让我们欢迎传统的回归吧。除此之外还有：《诗意》，理论期刊；《文学》，创刊于1968年，发源地为巴黎八大；《改变》，从《如实》中分离的产物。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诗歌刊物的异军突起（调查表明，共有250种诗歌期刊）。相对而言，人文科学、政治（或多或少关注文化问题）、以及文化期刊（或多或少具有意识形态的倾向甚至受其支配）的兴起，属于意料之中的事。最后，女性期刊——与利用女性的杂志和报纸截然不同——出现，并且不断发展。

1008

所有报纸期刊，如果不是集团经营的话，印刷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发行量达100万的日本杂志《文学》在我们看来，如同天方夜谭。书籍亦是如此，少数特例并不能掩盖普遍现象。有句风趣的玩笑，一语道出真谛：在法国，所有人都在写作，却没有人阅读。

广告与时尚

报纸已经部分地或者完全地成为移动广告，巨型印刷字体和图案引导读者的视线以及消费行为。它与电视、墙体以及户外广告一起，成为广告的载体。然而，广告并非简单的经济行为，除了消费本身的“文化”因素以外，也是图案的消费，“观念”的消费以及刺激的消费。广告弥补想象的缺失，象征心理信息，甚至审美情趣。广告日益突出的特点就是色情倾向，哪怕看来毫无关联的也能和色情扯上关系：家庭主妇环抱梦寐以求的冰箱，如痴如醉。广告利用色情达到宣传的目的；同时，色情通过广告大肆流传。戴上面具的萨德无处不在，他以最邪恶的方式，偷偷潜入我们的生活，继而成为时尚（时尚，尤其女性时尚，毫无疑问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不知所以的女性褪去罗衫，取而代之的是质量低劣的绉纱。

没人能够否认，大众传媒即使无法等同，至少本质也是信息的传递。大众被激励、被感化，或是处于被动，或是消极接受。“创造性”作为新型文化的要素，依然显得遥不可及。在此期间，以广告为起点，

大众传媒尝试进行创作，并且不断推出一些“经典”作品；电视和广播也在寻求适合各自的表达方式。然而，在此之前，电影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

电影

电影——无论电影美学，还是市场收益——将在我们的时代迎来飞速发展。早在1945年，即电影诞生半个世纪后，有声电影就已得到普及。然而直到战争时代，人们才开始从事各种技术研究，试图开辟新的发展领域。1955—1958年是电影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的重要转折期。让-吕克·戈达尔受到观众的推崇，同时，贝雅尔和布莱成为各自领域的代表人物。新的纪元来临。电影经历市场和美学的冲击。从1957年到1967年，电影的观众入座率下跌近五成：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市场的饱和，另一方面因为新的消费群体——电视观众的出现。

耐人寻味的是，在战争时期，电影不仅得以幸存，而且偶有佳作，似乎在物质贫乏和生死危机中找到了一种刺激和振奋。法国沦陷期间，卡尔内拍摄了《夜间来客》；接着，1945年《天堂的孩子》（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绝对经典）问世；1946年《夜之门》上映。1947年，克洛德·欧唐-拉腊执导《魔鬼附身》（从此以后，无论在屏幕还是在舞台，热拉尔·菲利普成为与碧姬·巴铎媲美的男性神话）。销声匿迹15年后，勒内·克莱尔带着作品《沉默是金》、《夜美人》重返巴黎。科克托和帕尼奥尔再次回归银幕创作。元老级人物，阿贝尔·冈斯与马塞尔·莱尔比耶依然活跃影坛。同时，新锐导演崭露头角：勒内·克雷芒，雅克·贝克，亨利-乔治·克鲁佐。 1009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包括马克斯·奥菲尔斯，尤其让·雷诺阿。奥菲尔斯死于1957年，其导演手法深受德国表现主义影响。雷诺阿秉承他的风格，拍摄了《黄金马车》（1953年）、《法国康康舞》（1955年）、《埃莱娜和她的男人们》（1956年）以及《科尔德利耶医生的遗嘱》（1959年）。至于喜剧电影，具有一定风险，因为人们经常会将喜剧演员和某一人物相互重叠（卓别林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通过雅克·塔蒂，传统喜剧电影获得新生。

自1956年起，一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电影——新的电影观念，新的拍摄手法。虽然罗杰·瓦迪姆最早成名，但算不上“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上帝创造了女人，那么《上帝创造女人》最终成就了一个女性神话——碧姬·巴铎。《电影手册》集团，在法国电影史上占据了非同一般的地位，这里聚集了多位电影艺术家：弗朗索瓦·特吕弗、克洛德·夏布罗尔、让-吕克·戈达尔。特吕弗先是发表了电影评论，随后导演了《四百击》（1959年），影片颇有《操行零分》（维戈）的遗风，呈现个人传记色彩。这种关于个人经历的艺术创作不断延续：《射杀钢琴师》（1960年），《黑衣新娘》（1967年）；而《朱尔与吉姆》（1961年）无疑就是特吕弗迄今为止的巅峰之作。阿兰·雷奈从拍摄短片开始导演生涯，凭借首部成名作品《广岛之恋》跻身一流导演行列。他所执导的另外一部影片《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年）则由罗伯·格里耶担任编剧，运用巴洛克式的空间和时间转换，别具风情。我们不会忘记乔治·弗朗瑞的暴力影像，也不会忘记路易·马勒的欲望描写——《孽恋》（以现代手法，完美演绎维旺·德农的小说《没有明天》）、《好奇心》和《拉孔布·吕西安》。最后，经历长期的冷落之后，卡尔内推出了电影作品《弄虚作假的人》。

让-吕克·戈达尔，是新浪潮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拍摄题材广泛，技巧大胆，代表作品有：《筋疲力尽》（1959年），《我知道的关于她的两三件事》（1966年）。特别是《疯狂的比埃罗》（1965年），可谓其对电影语言的全新探索和与永恒诗意情怀的结合。对于影片故事的发展，观众可能一头雾水，经过导演有意的处理，叙事方式显得灵活随意，缺乏连贯。罗贝尔·布雷松的电影风格简约自然，故事往往超越时间的界限：《乡村牧师日记》、《死囚越狱》、《巴尔塔扎尔的遭遇》、《穆谢特》、《圣女贞德的审判》——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又《武士朗塞罗》（1973年），《很可能是魔鬼》（1977年）。让-皮埃尔·梅尔维尔，作为独立电影人，不仅独立经营而且拒绝归属任何流派，作品如《海之沉默》，《武士》。埃里克·罗梅尔和他的“道德故事系列”：《收集男人的女人》、《在莫德家的一夜》、《克莱尔的膝盖》，

等等；科斯塔·加夫拉斯的《焦点新闻》、《证词》，伊夫·罗贝尔的《纽扣战争》（1962 年）和《相会在天堂》（1977 年）。

电影？电影流派？对于后者，有些不合习惯，但是更能说明丰富多彩，而又不失分歧的创作现实。如今，各种类型的电影大获成功，包括短片（拉莫里斯《红气球》）、纪实电影（《如此冷酷的心》）、动画（将美国远远甩在身后，格里莫的《牧羊女和扫烟囱工》，1952 年，普雷维尔担任编剧，相同的创作班底《国王与小鸟》制作的），当然还有纪录影片（伊沙克，库斯托）。作为一门足以胜任各项功能的艺术——从简单的信息传递或教育到美学——电影仍然存在无限的可能。它是大众的艺术，影迷的艺术（1936 年，电影资料馆建立）、视觉的艺术，同时也是全面的艺术，因为电影剧本也是至关重要的（从普雷维尔到玛格丽特·杜拉斯，一边写作，一边从事电影编剧寻求新的突破；吉罗杜是最早的实践者），音乐也为电影起到不小的作用（由职业电影配乐师和众多“纯”作曲家共同谱写）。 1010

四、文学

在文学方面，应该说多样性是其主要特点。如果说在法国文学中还维持着一种美妙而庄严的和谐，那么这种和谐不是作家们勉强营造的，就是他们刻意维持和安排的。这种和谐很容易就被众多不同或者相悖的宗派所打碎。杜阿梅尔所称的法国文学殿堂似乎被各种反传统的势力威胁着，撕裂着，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但是，不管是这些破坏势力还是那些企图重建传统的势力，他们都不是文学的一个主流，而他们造成的后果也并不符合他们的预期。在他们之中，很多人，甚至可以说很大一部分人，虽然他们对文学殿堂的膜拜是令人怀疑的，却也不乏一些革新者和怀着赤子之心的改革者——尤内斯库就要求在文学界筑一个传统的巢穴以缅怀莫里哀这样的文学巨人。

跨世纪的文学巨匠

虽然此时的文学出现了断裂，老一辈的文学巨匠们不懈的努力与

非凡的创造力使它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统一。由克洛岱尔带头，他和拉塞尔等老一辈的作家开始表达自己对这个时代的愤怒。克洛岱尔的日记于1969年开始出版发行。而他的通信稿也被陆续出版，尤其是他与苏亚雷斯和雅姆的往来信件。这个时代另外一个伟大的诗人圣－琼·佩斯，在沉寂了二十年后，创作了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多部作品：《流放》（1942—1945年）、《风》（1946年）、《大海》（1957年）、《岸标》（1960年）。1960年他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出生于1887年的儒弗，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那个时代最出色却也最简单的作品《在镜中》。实际上，这既是一部自传作品，也是一部给濒临威胁的人性的警世之作。

安德烈·纪德于1951年去世。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他出版了自己的日记。应该说日记这种文学形式是适合纪德的。在这种文学形式中，他可以自如地把记忆的回流与事情发展的连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样，日记就成为了片刻的感受和纪德式的不连贯交融的文学表现形式。纪德曾把他的《梵蒂冈地窖》搬上舞台，还让人出版了他与克洛岱尔、瓦莱里、苏亚雷斯、罗歇·马丁·杜加尔和多罗蒂·比希往来的信件。在这些通信稿中，我们可以看到纪德刻意营造的却并不过分的亲切感和他在《忒修斯》中所要传达的信息。直到生命的尽头，高烈特才出版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多描写强烈的肉欲。直到80岁，莱奥托的文学创作才能才被公众承认，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出版了一些作品。但是，应该说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他死后才得以发行的。他的《文学日记》对真与假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人性是真的，而历史与传记却免不了掺假。在他的作品中，真真假假、人性、历史和传记这几个概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科克托－普特以其在各个领域的创作同样吸引了一大批的读者，他的创作主要涉及戏剧、诗歌、绘画、电影等等类型。

第二代作家

一些年轻的作家这时也开始了他们的文学探索：马塞尔·阿尔朗使短篇小说这种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文学体裁重新大放异彩，并在其小

说《我们活过吗?》（1977 年）、《就是这样》（1979 年）中寻找逝去的时光；安德烈·尚松著有《雪与花》、《我们的日子》（1954 年）。吉奥诺在《屋顶上的轻骑兵》中实现了艺术上的创新，塞利纳凭借他的《长夜漫漫的旅程》达到了其艺术创作上的巅峰。儒昂多坚持不懈地给文学的殿堂添加了许多北欧传说并创作了《农村短工》。朱利安·格林出版他的力著《莫伊拉》，尝试了戏剧创作并发行了他日记中的前几卷。如果让娜·加尔兹不是一位女作家，或许我们今天也不会仍把她视为文学史上的一棵常青树。在她 80 岁时，出版了一部小说续篇，即六大卷的《活着的喜悦》。这个大部头的作品简直可以与传统小说《一个家族的历史》媲美。

1011

超现实主义并没有消亡。布勒东于 1966 年逝世，几个月之后，“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的创造者比罗也离开了人世。《超现实主义第三宣言序言》出版于 1946 年，《奥秘 17》也于 1945 年出版发行。里伯蒙 - 德塞涅于 1958 年出版了《达达主义已经过去或者从达达主义到抽象空间?》。菲利普·苏波尔在这场超现实主义的运动中总是活跃的。超现实主义似乎在文学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皮耶尔·德·芒迪亚格、格林和格拉克那儿。如今大众对各种各样的展览抱有的兴趣和对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关注无不显示着这场运动的现代性。虽然盛行在 20 世纪初，但在如今的社会中，它仍不失为一盏指路明灯。1968 年提出的“想象力至上”的口号，促使人们不断地革新，这难道不正是超现实主义的本质所在吗?

阿拉贡、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先锋者，属于 19 世纪末期出生，成年时正赶上二战的这一代作家。二战对他们的人生观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有些人来说这种影响是巨大的，战后余生犹如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阿拉贡的作品以多产、严肃与和谐为主要特点。《生气的弗朗索瓦》使他这个最初不得不秘密出版作品的诗人又产生了《在他乡如若在我的祖国》这样的作品。他还著有“艾尔莎系列”，这个系列以《艾尔莎的眼睛》开始，《艾尔莎》为过渡，以《艾尔莎的疯狂》结束。一位伟大的作家就由此诞生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在阿拉贡早期的作品中看到某些还不是很完善的地方。《奥雷昂》——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标志着阿拉贡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时间和回忆在这本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他的《爱的教育》。他的多产和卓越的创作才能还体现在以下三部代表作中：《受难周》（1958年）、《处死》（1965年）、《白朗茹与遗忘》（1967年）。

相反，对于某些作家而言，他们在创作上的巨大改变却以放弃（至少是暂时的）小说这种形式为主要特点。他们或者转向戏剧的创作，或者开始思考美学问题并进一步把研究的领域扩展到人性这个层面。战后不久，莫里亚克就着手研究当代世界和政治，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便条本》；同时，他还著有回忆录（《内心回忆录》）。然而，在他80岁时，他的文学创作开始回归到小说并通过《告别青春》显示了他经久不衰的小说创作才能。他的这种活力往往是他这一代人所不具有的：他比圣-琼·佩斯和儒弗要稍微年长一些。1945年到1963年，莫洛瓦在他的人物传记长廊上又增添了对以下这三位重要人物的研究著作：雨果、乔治·桑和巴尔扎克。

贝尔纳诺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或许到现在我们仍不会认识他的作品。在《乌义那先生》（1946年）这部悲剧小说之后，他又创作出版了《给英国人的信》（1946年）、《法国反对机器人》（1947年）和《灵魂之路》（1948年）。他的不少遗作对50年代那些信奉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影响颇大。蒙泰朗（贝尔纳诺曾把他奉为时代最杰出的作家）潜心写作他的戏剧，而在1947年到1966年间，他在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他的《笔记》。《沙漠中的玫瑰》，这部三十年前就已经完成的著作也已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莫里亚克的《告别青春》一样，《那些男孩》标志着蒙泰朗的创作回归到小说。虽然他的这种改变很晚发生，但还是卓有成绩的。在众多的作家中，若论创作类型改变最大且几乎彻底地放弃了小说这种形式的，当属安德烈·马尔罗。而他也恰恰是我们所谈论过的作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1945年，他开始创作美学研究著作《艺术心理学梗概》，之后他继续进行这一主题的研

究并创作了《艺术心理学》和《沉默的声音》。此后，他的另一个三部曲《想象中的世界雕刻博物馆》也问世了。马尔罗熟悉文体和艺术形式的处理方式，他文章的风格也因自成一家而备受推崇。他总是恣意地驰骋自己想象力，并且坚信艺术首先是一种风格，而不是一个观点。他也相信，古往今来艺术都不失为缓解“忧虑”（他的作品处处向人们透出）的一种好方法。马尔罗经常对过去进行反省，在回忆的过程中使时间清晰，使过往的片断相互交织相互缠绕。这位回忆录作者拒绝陷入到自私主义中，他说“如果一个事物只对我有用那它究竟于我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正是他的回忆录《反回忆录》的名字由来。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对疾病与死亡的叩问越来越强烈，这种思考主要表现在《拉扎尔》这部作品中。不久前，还出版了他与戴高乐将军的对话与思想录《砍倒的橡树》。

1012

第三代作家

1945 年，新文学在美学、经济及意识形态方面基本成型。书面的材料开始在各大出版商那儿堆积着，甚至在经过筛选、摆上书店的架子后仍让人觉得泛滥。从文学中催生的类文学开始展现蓬勃的生机，在市场上也被大为看好。而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它的类别也在不断增加，它的语言在不断地被肢解破碎，而且像所有别的艺术一样，文学创造者和它的接受者之间的鸿沟在一步步地扩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文学等同于小说，而事实却是：小说这种形式在法国传统文学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地位，甚至在 19 世纪时，它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也是排在诗歌和戏剧之后的。诗歌和戏剧（主要指它的文本形式）地位的下降主要源自小说地位的上升。另外，小说这一名称指的是一段既无规则又无形态的言语，它可以包含散文、诗歌、思索、忏悔录、语言的实验等等。总之，在现代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任何文学种类的踪影，除了——正像有些意在调侃的人所说的——小说本身。不管小说究竟是什么，不论作者是出于传统的、常规的还是商业的目的来写作，小说的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湮灭了整个文学创作。

因此，我们可以说小说家这一代从 1945 年在法国文坛上占据了重

要的一席之地。虽然在这一代人掌握了时代发言权后，他们历经了多年的战争与痛苦，但反抗使他们的文学深深地打上了“介入”的标志，苦难使他们拒绝相信任何浪漫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诗意。加缪就是一位对自然充满热爱并对它加以讴歌的作家。

存在主义和萨特在1945年到1955年的法国文学界和思想界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演讲总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兴趣。而他的文学创造也正如他的听众一样无所不包，除了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对他来说是难以渗透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戏剧，也不说他的哲学散文、文学评论与政治文章，也不说他是《现代》杂志的领军人物和整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在此，我们只讨论他的哲学和小说作品。在《存在与虚无》中，我们已能见到萨特文学理论的完整表述了。而在娜塔莉·萨洛特《一个陌生人的画像》的前言中，萨特更是多次提及了现代小说应该讨论的问题和小说创作的原理。应该说，萨特本人的小说创作是存在争议的，他本身似乎有时也脱离“自由之路”。虽然他在创作中总以中立的面貌出现，但他的笔总向人展示一幅幅巴尔扎克式的现代人的精神画卷，这足以使他的作品显得充盈。让人遗憾的是，这种充盈并没有在他的自传作品《文字生涯》中得到再现，于是，这部作品也就显得干涸而毫无生机了。对于波德莱尔的研究，他的文章也显得晦涩难懂。而与此相反的是，他的研究著作《福楼拜》倒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文学评论。

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一样很善于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其小说创作紧密结合起来。她的著作《一代名流》向我们描摹了一幅解放时期的社会画卷，尤其是当时一群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但她的创作中真正称得上小说并且是凄切感人的小说的是她的《女房客》。波伏瓦曾发表过多部哲学散文，她也懂得如何不落俗套而又有力地对女性的地位进行分析（在这方面她被认为是先驱），《第二性》就是她这方面的力作。最后几年，她似乎发现了另外一条成功的途径——自传，并且小试牛刀就轻松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

的自传作品以《少女时代》开始，以《归根到底》而告终。此外，还有一篇散文《老年》。

加缪也能在哲学和故事之间掌握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只是在他的作品中诗的成分更多，而哲学的成分更少了，毕竟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家。他的小说创作《局外人》、《鼠疫》、《堕落》总是与他的哲学散文《西绪福斯神话》、《反抗者》、《现状》一一呼应，简洁却经典的语言总能透出这位受着地中海的阳光影响的艺术家的犀利与敏感。他的思想是现代的，他为新小说的出现刻画了最初的轮廓。他的文学世界中，小说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抱着这样一种想法，即面对人生的虚无，一切皆徒劳无益。有时这种虚无的情绪甚至衍生出厌恶来。应该说，这是加缪的成功之处，广大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共识。而与此相反的是，在雷蒙·格诺看来，荒诞意识的觉醒首先是以对语言危机的认识开始的（其作品有《文笔练习》、《扎齐在地铁里》）。我们通常也把以下这些有才华的小说家归入存在主义的行列：维奥莱特·勒迪克（《斜圆字体》）、阿尔贝蒂娜·萨拉赞（《半圆环饰》），尤其是弗朗索瓦丝·萨冈（《你好，忧愁》）。她的卓越才华及作品中潺潺而出的音乐感足以让她的作品一下子在读者心中激起片刻的温柔。

解放之后涌现的还有其他一些文学趋势，这些趋势与存在主义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让·杜图尔代表了战时进入20岁而战后开始文学创作的一代。他是一位小说家（作品有《香浓的奶酪》、《杜桑》、《爱的恐惧》）、散文家、伦理学家和回忆录作家（《马恩河上的出租车》、《半价出售》、《底部与形状》）。这是一位充满活力的作家，他总用一种坚定的、强健的或者有时只是用简练而凝重的语言来描摹他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风尚和人的品格。维尔科尔在成为作家之前是画家让·布鲁勒，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和抵抗运动期间开始崭露头角，并出版了一些作品。《海的沉默》是他的成名之作，紧接着他出版了《走向星空》。当然，这些书都是秘密出版的。他同时也是午夜出版社的创立者。但是他的历史作家的特殊身份使他的作品受到了不公正的看

待。而事实上，他是多产的，其作品也是多样化的（在关于戏剧的一章中我们已经提及）、宽容的，对人性及人类的命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的散文和小说主要有：《西尔维娅》、《变形了的动物》、《在海岸》、《愤怒》。同时，他也是一位敢于探索未知的理性主义者，他的《似马般奔驰的时间》因其梦幻的笔调成为此类作品中的佼佼者。

罗歇·瓦扬也出生于抵抗运动期间，他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可笑的游戏》。在这本书中，作者很快就透露出他作为种族主义作家的习性和写作风格。除了评论文章以外（诚然，它们同样颇为出色，但同时亦存在可加以质疑的地方，例如其论文《关于危险关系的论文》就是如此），他还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恶意的打击》、《法律》、《节日》、《鳟鱼》。在他英年早逝后，人们出版了他的日记。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既沉迷于声色世界又极渴望明晰的罗歇·瓦扬。

法国解放战争期间的文学成果还有：艾尔莎·特里奥莱的《阿维尼翁情人》（她是一位极为擅长小说这种体裁的作家），罗曼·盖瑞的《欧式教育》，儒勒·鲁瓦的《令人愉悦的山谷与从地狱的回归》，大卫·鲁塞描写集中营世界的绘画。战时硝烟弥漫的世界和纳粹的暴行在杜勃罗夫斯基的《扩散》中形象地得到了再现。1945 年的这一代作家总不断地向人呈现着多样性。以下这些名字生动地展现了这个时代的面貌：亨利·特鲁瓦亚、罗歇·贝尔菲特、居尔蒂斯、巴赞、雅克·贝雷、罗歇·尼米埃、弗朗索瓦·努里西埃、贝克、布尔尼盖尔、卡巴尼斯、克洛德·鲁瓦、巴斯蒂德、普瓦罗－戴尔佩施。而接下来的一种诗意的现实主义（克拉维尔、卡马拉）。雅克·德·波旁·布塞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位思想新颖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有抒情小说《婚礼中的爱情》。

1014　另外，我们还得单独讨论加埃唐·皮贡所谓的“变形小说”。“变形小说”这个词既带神秘主义的色彩，又带着浓重的传奇色彩。因此，我们可以猜想这类小说产生于某种古怪荒诞的宗教感情。由于有了 P. H. 西蒙，吕克·埃斯坦，吉尔贝·赛布隆，皮耶尔·埃玛纽埃尔等人，天主教小说经历了复兴。让·凯罗尔的基督抒情诗在创作技

法上颇似新小说派，因此，人们通常把他归入新小说家一列。神秘主义在米歇尔·施奈德那儿有了一个回归，并被打上了一个鲜明的个人的烙印。而马塞尔·布里翁的小说带有浓浓的德国浪漫主义的色彩。在勒伯维尔的《恶魔般的爱》中，恶魔般的神力使感情渐渐发生了蜕变。在尼科尔·韦德雷的作品中变化经常诗意般地发生，而亨利·博斯科的作品总是洋溢着一种普罗旺斯行吟诗人的灵性。多戴尔在一位阿登省女孩的触发下产生了诗一样传奇的作品，并且在这方面成为了先驱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变形总是通过一种历史的视觉来完成，就如女巫操纵黑色的水晶球一般。

现在，我们将谈及的是朱利安·格拉克的超自然主义。他的超自然主义通常用浪漫的传奇故事来表现，有时甚至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故事被设置在一个没有时间的世界中。《流沙海岸》（1951 年）用它优美的语言给我们构筑了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世界。此外，朱利安·格拉克还是一个十分独立的作家。他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林中阳台》，1958 年；《半岛》，1973 年）都不是为了取悦大众而做的。这些作品也没有使之具有盛名。他的突然走俏应该归功于他的抨击册子《肚里的文学》的出版。另外，皮耶尔·德·芒迪亚格通过他非凡的超现实的情色想象力和近乎完美的写作风格向世人证明他的才能，他的作品主要有：《黑色博物馆》、《摩托车》、《边缘》。让·热内和萨德一样是一位经常做非法的勾当，意识到荒诞并反抗荒诞的诗人。他的作品最初都是秘密出版的，直到 1951 年和 1953 年间才开始公开出版。他的作品主要有《鲜花圣母》、《盛大的葬礼》、《严加监视》、《小偷日记》。但他与萨德不同的是，他的情感从罪恶感中解脱了出来，衍生的单纯和轻松转化为他的诗歌。克罗索夫斯基的色情小说《今晚的罗伯特和南特赦令的废除》总透着一股傲慢的冷淡和异端的神学色彩。乔治·巴塔耶在他的《我的母亲》、《眼睛》和《爱德华夫人》中经常使用模糊、依稀不可辨的措辞，也经常把天堂、地狱、色情、神圣和死亡这些截然不同的概念放在一起讨论。他也是一位沿袭了萨德风格的作家。

我们应该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这批 1945 年后涌起的最好的色情小说——波琳·瑞芝的《O 的故事》，这部作品的成功至今仍无人可以匹敌；《依雷娜》（出版时作者尚未署名）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艾田蒲的《身体的徽章》；安娜·洛依的《岛屿》——这也是最后一部好作品了。由于商业化的发展，社会风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涉及文学创作时，我们只能说现在的作品出炉越来越快，却也越来越平庸了。

这些作家中大多数同时也是诗人，他们的作品同其他诗人的作品（儒弗，博纳弗尔）一样，更多地隶属于塔铁尔所定义的诗化的叙事，而非只是单纯的小说。

新小说和新小说派

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文学中的小说写作风格和写作技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创作技法的变革首先以对传统小说结构的质疑开始。新小说派的作家们对传统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及心理分析的传统写法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一些相左的看法。对此，萨特在《一个陌生人的画像》的前言中曾用反小说派来定义这个流派。在娜塔莉·萨洛特（代表作有《天象仪》、《黄金果》）的笔下，对话成了重要的表达方式。但是她所注重的是通过对话来展现人的“内心动作”和下意识活动。罗伯－格里耶（作品有《橡皮》、《窥视者》、《在迷宫中》、《美貌的女俘虏》）等作家在创作时着重写物，倾向于由物及人、从物见人，但是我们可以说，正是他们的这种写作视角使得他们笔下的世界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的世界。罗伯－格里耶的著作《自然、人道主义与悲剧》为新小说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新小说派的最好阐释者当属米歇尔·比托尔。在其作品《变化》中，故事的叙述者用第二人称“你”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很好地协调了物（火车和他的旅程）、内容与内心情感的关系。极少数人能在故事的拆分与重组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但是比托尔在他的作品《米兰巷》和《日程表》中做到了。在其创作中，体裁的分类变得模糊，有人将这些难以分辨其类型的文字称之为“文本”，于是，他的创作变成了多样性纷呈的文本。

1015

新小说对物与视角的重视，总让人对它与电影艺术的联系产生联想。应该承认的是罗伯-格里耶在其创作中也运用了电影艺术常见的表现方式，玛格丽特·杜拉斯也同样喜好这种表现手法。无疑，杜拉斯是对新小说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作品有《慢板如歌》、《直布罗陀的水手》、《广场》、《劳儿·维·斯坦茵的迷醉》）。而英国小说（乔伊斯）和美国小说（多斯-帕索斯）对法国新小说的产生也施展了深远的影响。其他不容忽视的人还有：在前人中有福楼拜，而在我们这代中有塞利纳，《局外人》的作者加缪（而他又与克洛德·西蒙的《背德者》相似），《游戏规则》的作者米歇尔·莱里斯，《黑暗中的托马斯》的作者布朗肖等。

这种新的文学（即科学的文学）在杂志《如实》中呈现着活跃的生命力，小说作品、理论作品及关于创作技法的作品在此时层出不穷，但很快就遭到萨特及《现代》杂志的批评。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个团体倾向于根据语言学的发展做出相应的创作语言的更新。这个团体的领袖人物菲利普·索莱尔斯，创作了《公园》、《戏剧》）等作品。法耶也宣布与《如实》决裂并创办了一个文学工作室“改变”，他同时还创作了《裂痕》、《闸口》、《类似》和《尤尼克传说》等作品。

除了新小说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文坛中各种流派各领风骚。正如瞬息万变的时尚界一样。在文学界中，一切皆有可能，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些极端的现象。有些作家（鉴于不胜枚举，恕不一一举例）喜欢用传统的写作技法来体现新颖的想法，这类作家有伊夫·贝尔热，博雷尔，高昂，多米尼克·费尔南德兹，拉乌格和图尔尼埃等。而另外一些作家喜欢在叙述中穿插几条联系密切的线索同时展开情节，此类作家有杜勃罗夫斯基和埃莱娜·西克苏。西克苏还在其教学中渗透了她的理论批评，在小说创作中时时处处显示出女性写作的特点和要求。让-马丽·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是把抒情诗与新小说创作技法相结合的典型人物，其作品有《诉讼笔录》和《滂沱大雨》。

诗歌

从解放时期以来，现代诗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众多的甚至相

悖的诗歌运动中，这种长达二十五年和谐相处的状态越来越明显。或许是因为与现实的联系更紧密了，诗歌的表达方式也越发地显得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加重了诗歌的一些问题。在一个交流如此重要的时代，诗歌自然也会寻求与读者的沟通，但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首先，表现在大众对诗歌的冷漠，其次，是源于诗歌本身。现代的诗歌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不可言传的东西，它拒绝用带感情色彩的，甚至带政治或人道主义色彩的笔调来创作，因为诗人们越来越多地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诗歌本身上。超现实主义仍然在诗歌中发挥着影响，但是诗人们并不像之前那么热衷于信笔由缰。现代诗歌的最新趋势是放弃神秘主义，在诗人中甚至产生一种破除神秘的偏好而把写作的重点放在语言上。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诗歌的变革是紧随语言研究的发展的。

从1945年起，那个世纪最重要的几位诗人相继去世：瓦莱里（1945年），阿尔托（1948年），艾吕雅（1952年），克洛岱尔（1955年），勒韦迪（1960年），继他们之后的有奥迪贝蒂（1965年），布勒东（1966年），儒弗和圣－琼·佩斯（1975年）。但是也应该看到的是，另外一些上世纪的诗人们仍在向世人呈现他们的伟大作品，如亨利·米修，他一直坚持抗争并创作了《经过》、《旋涡教会的知识》、《风与尘》等作品。

1016

有些诗人如阿尔托，直到逝世后，他们的作品才被人们所重视。他们的诗受到了年轻一代的追捧。儒弗的诗对皮耶尔·埃玛纽埃尔和伊夫·博纳弗尔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贡的诗总是借助于现实。保尔·艾吕雅，这位以战争和抵抗运动为题材写作的诗人同样对超现实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超现实主义和抵抗运动是相互交映的，夏尔的作品同样显示着这种交映。抵抗运动使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诗人，如埃玛纽埃尔、皮谢特（《三王来朝》，1947年）、富歇认识到诗歌应与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超现实主义继续在诗人们的身上发出光芒，如埃梅·塞泽尔，让·马尔厄，吕克·德科内，皮耶尔·德·芒迪亚格。勒内·夏尔主张诗歌的写作应重视瞬间语言的灵感。

皮耶尔·埃玛纽埃尔构筑了一个充满唯灵论神话的诗的世界，帕特里斯·德·拉图尔-迪潘尝试着向我们的世界展现她的《神圣的戏剧》，玛丽-让娜·杜里是一位关注人类命运，以人类之忧而忧并总带着某种温情的诗人，作品有《伊甸园》、《俄耳甫斯》等。让·格罗让从《圣经》激情的赞歌和抒情诗中汲取了灵感（正如梅肖尼克在他的翻译中得到灵感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德莱尔对很多的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儒弗到伊夫·博纳弗尔——他受波德莱尔艺术批评的影响颇深，他的作品《动态和静态的护城河》（1955 年）和《昨天沙漠统治一切》（1958 年）是诗歌现代史中重要的篇章。蓬热的诗总是把写作的视角放在物上，而其他的诗人诸如吉耶维克、福兰、弗雷诺、塔迪厄也总呈现这种趋势。在现代诗歌的交响乐中，克朗西耶通过他植根于现实的写作与宽广的视界奏出了自己的乐章。

在去除诗歌神秘化的运动中，安德烈·迪·布歇（《在空虚的热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潮流中，雅克·杜班，马塞尔·普莱内和《如实》中的诗人们也不甘示弱。

罗贝尔·马莱是一位对人类和文学创作同样感兴趣的批评家，但他首先是一位诗人（诗作有《当镜子也讶异时》）。同样地，米歇尔·德吉（《岛的诗》、《沟渠》、《形象》）的诗歌作品也甚为重要。对于他来说，诗歌是“语言的语言”。这个定义很好地体现了现代诗歌的发展趋势。诗歌是对一种诗意语言的探寻。因此，对于那些最伟大的诗人们来说，这种探寻不仅不会导向一种枯燥的思考，反而导致了“圣言”的辉煌。

散文、哲学与文学批评

哲学面临着和诗歌一样的难题：由于自身存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而很难被大众接受。毕竟，哲学的作用和影响不应仅仅限于少数专家和内行人。在哲学界同样存在一些发展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像其他领域一样，哲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另一方面，哲学在广义的文学中渗透得越来越多。

艾田蒲公开反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对人和艺术的束

缚。而事实上，这正是战后盛行的三种思想潮流。存在主义主要在《现代》杂志内盛行，而小组的核心成员有萨特、波伏瓦和梅洛·庞蒂。梅洛·庞蒂最终从这个小组中脱离出来，在他逝世 1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其实要比萨特的更为深刻也更为重要。亨利·勒费弗尔著有一本抨击存在主义的小册子，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卓越代表。加罗迪的立场则要缓和一些，穆尼埃以及新托马斯学派坚决拥护人格主义和唯灵论。世纪之初，马利坦、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西蒙娜·韦伊等作家给宗教思想增添了绚丽的一笔。德日进[①]的进化 1017 论和他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他的宗教思想。此外，埃蒂安·苏里奥、让·瓦尔、雷蒙·吕耶尔、雷蒙·阿隆、勒内·吉拉尔（作品有《暴力与神圣》）、梅洛·庞蒂及冉克雷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们承认）都或多或少地深化和发展了哲学的不同领域，尤其是美学。

如果再来一次变革，那些“新哲学家们”又是怎样的呢？虽然他们没有带来一种全新的哲学，但他们做出的努力却足以动摇前人根深蒂固的受人膜拜的地位。对于利奥塔的“欲望哲学”，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应与德勒兹和伽塔里的“分裂的机器”理论联系起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和文学批评：莫隆的精神讨论法使拉辛、马拉美等作家本人成为了文学研究的对象，而德里达等人关注的则是文本本身。

另外，我们这个时代还出现了另一种更为久远却富传奇性色彩的思想的回潮，即对物质本身做深刻的、多面的以及文学性的精神分析。这种想法由加斯东·巴什拉尔提出，它大大推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

如果这种种的变化和发展没有出现异常的势头，那么我们应为之感到庆幸，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快，文学批评发展壮大并吞噬了文学创作。它宣称文学批评本身应被视为一种创作，这样文学批评成为时下最时兴、最优越也最排他的一种艺术创造。语言学的发展（主要由一些年

① 本名泰亚尔·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德日进系其中文名字。从 1923 年至 1946 年，先后 8 次来中国，在中国地层、古生物、区域地质研究中作出过重要贡献。

轻的语言学家促成，像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文本产生文本，而文本本身的痕迹却慢慢消失，批评却在这个无休无止的“照镜”游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正是这种使革新者都为之害怕的恐惧促使千千万万的文学创造者们不断地进行探索。

这种恐怖也遭遇了“热月政变”，只是它没有引起任何的骚动和断头台下的牺牲者。只有文人们感到了一阵喘息和一种想到别处呼吸新鲜空气的愿望。大众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加入到这种潮流中。文学批评越来越转向其本身，也越来越封闭，于是它只能自己寻找出路：它只能顺应文学史的发展或传记的要求来确保自己的存在。或者，简单地说，在它阅历了那么多的文本后，突然欣喜而又天真地发现了阅读的乐趣。

文学原理、诗歌以及文学本身都既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也不依赖于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而存在。如果说瓦莱里被认为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奠基人（关于这一点应该是毫无异议的），那么跟埃德加·坡同路的波德莱尔早已走在了他的前头。虽然这种文学批评有自己的侧重点和深刻的直观感受，它有时也会倾向于做一些感受上甚至脾性上的批评。为了能够运行自如，批评者有时需要无意识，有时需要抱一种天真的想法，而有时则需要对各家之言保持冷漠的态度。如果太投入就会迷失，对于一个充满激情的人来说，如果不加以压制，这种强烈的情感必然会影响他的人生和作品。

在这里，至少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想卷入到学院派文学批评和反学院派文学批评的旋涡中去。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反学院派也完全是由一批大学教员发起和维系的。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极少是大学教员们创造出来的。与其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不如说这与经济因素相关，而这无疑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新批评不同于常规的和教条化了的批评，它通常采用两位作家对话的形式，以提问和表达感受的方式进行。他们中的一个只想成为一个思考的读者，而并不想表现为一个善于阅读的人。他的任务

1018

是使不可读成为可读。

诚然，文学批评在瓦莱里、迪博和苏亚雷斯等作家看来，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造。时间（任何时候，对于各个不同的或对立的宗派都一样），不仅仅在文学上通行，它也必须勾起我们对伟大先人马拉美的回忆："我所知的关于艺术的观点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为不重要，因此我在处处享受文学的乐趣……"应该承认，拿艺术开玩笑是很可耻的，冉克雷维在这一点上对布莱抱以强烈的批评。

通常，"文学"批评是或者说它尝试成为一门科学和一种哲学。它试图使作品和作者分离，至少对于那些为批评而批评的人来说，批评家甚至不是笔和墨的创造物，于是只留下一些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的人。而恰巧，文学领域中的科学家是作家。在年长的一辈中（他们通常是自由主义者）有贝甘、布朗肖和布里翁，而在第二代的作家中，他们的领军人物乔治·布兰研究司汤达的创作技巧，也为波德莱尔式的艺术创造带来了新的光亮。同时，布兰对从洛特雷阿蒙到夏尔的现代诗歌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影响。《小麦筛选工》奠定了他艺术批评的风格，而他在法兰西学院开讲的第一堂课上为自己的文学批评勾勒了基本的轮廓。普莱研究的是人类的时间观念。斯达罗宾斯基对卢梭表达法的透明性和隐晦性尤为感兴趣。马克·索里亚诺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一系列向来不受重视的领域，如口头文学、民间传统（佩罗认为它是素材和源泉）和青年文学加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让·穆东潜心钻研普鲁斯特（贝尔萨尼和塔铁尔同样对普鲁斯特的研究很有心得），迪·布贝勒曼－诺埃尔则研究"对文本的无意识"。马塞尔·雷蒙研究从超现实主义到今天的诗歌世界。让·皮埃尔·理查德开创了主题学研究，而且在想象力的探索方面走得极远，他尤其长于对马拉美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散研究，同时他也更新和丰富了自己的方法论（《微观阅读》，1979 年）。

《如实》小组集中了一批具有新颖思想的文学批评家，像热内特和茨维坦·托多洛夫。这个小组成员中的一部分对结构主义很感兴趣。既被视为一种理论也被视为一种分析方法，结构主义被运用到所有的领域：社会学、哲学（对此，它是抱质疑的态度的）、语言学和文学批评。

如果说结构主义对当代思想的渗透有如之前的存在主义，那么我们说结构主义的大师主要有：列维－施特劳斯，米歇尔·福柯、德里达、路易·阿尔都塞、吕西安·戈德曼和罗兰·巴特（著有《零度阅读》和《神话学》）。

在那些散文家中，着眼于思考哲学、美学和历史问题的大家主要有：罗歇·卡洛瓦，布里斯·帕兰（《从线到针》、《关于话语的玄想》），让·格雷尼埃，德尼·德·鲁热蒙，西奥朗，乔治·巴塔耶（《文学与恶》；《色情史》，1957 年）。而莫里斯·克拉维尔在尝试了戏剧、预言和抨击文章后重新回到哲学上来，他不也正是一位大师吗？

最后，我们还应提到不比我们之前提及的作家和思想家影响小的让·波朗。他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极大，而且极为关键。在此，我们还应提到一些艺术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他们通常沿袭富西蒙，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无不显示了作家的非凡才能，如勒内·于依格，让·卡苏，弗朗卡斯特尔，夏斯泰尔和莱马利。

近三十年来在文学（实际上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上形成的特征似乎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抱着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得重新开始的想法；越来越多的实验室被建立，越来越多的研究在进行。总之，一股智力的明胶在发酵。而另一方面，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一起也在逐渐地消逝。而剩下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能与我们历史上的伟大作家相媲美的，我们得称之为幸存者了。 1019

在即将离开文学之际，我们应该说这种讨论是无穷无尽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讨论时对文学进行了分类。但是，往往一个事物既在我们给它的这个范围之中，也在这个范围之外。通过分类，我们将它分解了但并不能总是完全地掌握它。例如，我们只是在谈及别的作品时才触及了日记、回忆录等体裁。在此，让我们记住这两位已故的女作家的名字吧，她们的创作不论是在文学意义上还是在历史意义上都是十分卓著的：西蒙娜女士，她是我们文学的佼佼者；路易丝·韦斯，她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和这个世纪的编年史。我们又该如何归类卡萨梅约尔那些观点犀利、新颖而又针砭时弊的文章呢？

在此，我们把戏剧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来讨论，然而既然戏剧是由文本构成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被认为是文学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有人对我们的分类有所质疑，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其进行分解以明晰我们的观点，而这个人就是雅克·科波。他是一位理论家和戏剧家，同时也是老鸽舍剧团的创立者和著名的杂志《新法兰西杂志》的创立者之一。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戏剧、文学和精神遗产。他的主要成就主要有他的戏剧，他与马丹·杜加尔的往来信件（最近才发表）和他的日记。在他的日记中，他关于戏剧和文学的观点、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私生活展露无遗并相互交织。这无疑与纪德的日记一样对我们的研究极为重要，因为在他的日记中，他经常开展与自我的对话。

文学是所有笔墨留下的痕迹，但它首先表现为书的形式。书和文学是密切相连的。然而，在对戏剧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作家反对对他们的戏剧创作进行舞台阐释。于是，书在那儿只保留了它一部分的功能并像别的物品一样成为了一种商品。同样，在这种逻辑下，作家成为了一种商品的供应商，而他们的文学评论实际上发挥着广告的作用。这也意味着，用更贴切的话说，文学正濒临着灭绝。只有在那些没有完全屈服于市场，而只是与市场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某种渗透关系的领域中，文学才侥幸得以存活。这也是文化在市场的作用下正在付出的代价。

五、时空艺术

历史学家们对于艺术的变革总是寄予一种厚望：他们希望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领域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经常用激进的、闻所未闻或前所未见的一类词汇来形容这种变化。然而，我们今天呈现的艺术并不是今天凭空产生的。艺术的变革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从昨天到今天的缓慢的发展过程。绘画艺术的发展，也不仅仅是近三四十年来的一个变化，而是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这

种变化以其非凡的创造力和颇为卓著的艺术成果给我们带来了艺术史上的一场伟大变革——印象主义。1874 年，人们对绘画艺术的目的论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绘画在于反映外部世界，但从此，绘画为其本身而存在。在这场变革中，人们提出印象和感觉要比智力的安排更为重要。莫奈主张追求光线效果的变革难道不是德拉克洛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的影响？还有什么能比从远处看是一幅猎狮图，但实际上画里既没有狮子，没有马匹，也没有猎人，而只有一条闪闪发光的螺线的绘画作品更美的呢？

1020 绘画

我们的时代不仅与过去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照亮后世，产生这个现象的一个令人欣喜的背景因素就是一些“伟大的前辈”的长寿，而且这点在绘画领域比在文学领域表现得更加突出。尤其是毕加索，他像提香一样，活过了他的那个世纪，很好地确保了绘画的延续性。凭借他惊人的“变化多端”，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表达、纳入并接受绘画的特征，向往，想象，矛盾（甚至是欺骗）：形象和反形象，毁坏实物又钟情于实物，“纯”绘画和深切关注人性的绘画，甚至还有强烈“介入”的绘画。控制了去外形和去形象时代的那些绘画作品是最有力、最令人欣喜、最热烈、最为形象创造者（疯狂追求形象的人）所陶醉的，这点有着深远意义。那些形象创造者的创造则是死亡、改观和总是出人意外的变形的延续。毕加索在其绘画历程的最后时期同样颇为多产，这个时期堪称是绘画以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令人惊奇的时期。这期间的作品，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新的形式和女性人体中，创作和生命相互交织，结合，带着明显的敏感，热烈和情欲。相隔六十年，毕加索最初的令人惊叹的蓝色和粉色时期的《智慧》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再次展示，除了形式和风格不同。

《曾经是法国荣誉一部分的这个人逝去了》——马尔罗以此言向撒手人寰的布拉克致敬，后者凭借着他从 1945 年的《台球桌》系列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自己的艺术顶峰。他在作品中融入了死亡，在那里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物体的死亡，感受到自己灵魂的出现；那些以鸟

为主题的绘画在卢浮宫的天花板上尽情飞翔（1952—1953年）。布拉克（他也像德拉克洛瓦一样是艺术的“思考者”）的两句话这样描述绘画道：“我不是个革命画家”——这个看似温和的人将弄乱一切，燃烧一切，不顾一切。他的风格超出那个时期艺术的特征，形式与非形式，画家做出绝妙的断言：“我从非形式出发，我形成形式。”

就在布拉克逝世的同一年，年近84岁的雅克·维隆同意进行第一次大型展览，展出他自己的全部作品。展览并没有随着作者一起逝去，过去由他创立的黄金分割派反映的那些需要和追求，在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个时期仍然没有变：追求富有旋律性的严格比例，理想的数学赋予美的格式，追求匀称和造型的诗意。雅克·维隆是在60岁之后才开始着手这种空间追求，并在这个空间内实现自己的艺术。然而对于马蒂斯来说，他是在75岁之后才开始的。提到马蒂斯，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他的《旺斯教堂》（1951年）或者《年轻的英国女人》（1947年），《红色画室》（1948年）；但是1970年在卢浮宫举行的展览带来了他的其他作品：《穿黄色裙子的卡迪亚》，还有和《旺斯》同时代的作品《大洋回忆》（1953年），或许马蒂斯内心的音乐从来没有找到比在《画家一家》（1947年）和《蓝色的裸女》（1952年）中更完善的表达方式。鲁奥——他只比马蒂斯小两岁并为马蒂斯服务了四年——在87岁逝世时，得以修复了自己的800幅画，并焚烧了其中的315件。尤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拓展了视野，更换了色彩，艺术风格完全改变。他用剪影的方法将镶嵌画转变成一幅画：《圣经景象》（1949年前后）和《萨尔》（1956年）。“圣经启示”在夏加尔的绘画作品中达到了顶点，有1969年有关圣经的103幅插图特别展和1967年在卢浮宫内举行的17幅大型油画展可以为证，其中描绘了飞翔的婚姻场面的《雅歌》最为著名。

在那些不断追求艺术，有时对当今的绘画，如迪诺瓦耶·德·塞贡扎克之类的画家所表现出来的“懈怠”极度厌恶的画家当中，还应该列出德兰，弗拉芒克，莱热，洛特等人的名字。此外，还有在1964年展出其宏伟代表作《世界之歌》的路沙，此人将一生都贡献在壁毯

1021

艺术的复兴上。

发生在罗歇·比西埃尔身上的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是，从年龄上来说，他属于他那个时代，然而从他作品的实质来看，他却属于我们的时代。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一个几乎是标志性的转变，他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位伟大的“祖师爷”：从为期五年的“盲目”走出来，他在1945年步入一种新的信仰，这种信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征服艺术界，这就是抽象。另外，这个词引起了一些人理智的令人恼火的反响。其实，更准确地来讲，这个词所涉及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指和精神，社会习俗以及形象艺术的断裂，最终，这幅画仅仅是画，就像音乐仅仅是声音一样。著名的《抽象画家》属于完全另外一个时代而不是比西埃尔的时代，甚至身为美国人的预言家波拉克也因为自己是个抽象派作家而大喜。我们则列举出几个法国人（或者已经法国化的）的例子：哈当、尼古拉·德斯塔埃尔（他在自杀前又重新回到形象艺术）、福特里埃、马迪厄、波利亚柯夫、苏拉日。

抽象倾向于多样性和波动起伏，不仅征服了艺术，还逐渐征服了艺术市场，直至成为官方艺术。在它似乎已是未来的唯一出路时，抽象却受到质疑并被打败，尤其是被那些通俗艺术的支持者，达达主义的新形式和那些反对一切的人打败。一些最重要最有创意的抽象派画家——森吉埃，马纳西埃，巴泽纳——此时就像站在法国传统绘画、立体主义、抽象主义的十字路口。有时候某个艺术家精神上的灵感会让作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常常是在这些画家这里并通过他们，神圣的艺术发生变化。其中就有1944年举办第一次展览的让·杜布菲，他被奉为粗犷艺术的创造者，非形式之父，他的影响曾经是并将继续是巨大的？还有米罗，在他的最后时期创作了诸如拉斯科岩洞里的画作那样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丰富改变形象的和创造梦想的画家：安德烈·马松（他在一场化妆运动中追寻黄金年龄），神秘的伊夫·唐居伊，德基里科的哥哥马格利特，还有大量超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和继承者——拉比斯、库托、巴尔蒂斯、德尔沃、博尔吉、雅纳·格拉弗

罗尔（色情一直是她艺术的中心）和勒普里。但是最漂亮的同时又是最孤独的超现实主义的女儿，在这个时候重新兴起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现代绘画，她也是波德莱尔的合法独生女，这里所指的人毫无疑问就是菲妮。在她虚构的魔幻的、超现实主义的、同时也是“超自然主义”的艺术中，人类的命运通过死亡和空想的色情被解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艺术，是通过梦幻和象征来进行形象表达，比如《担忧的黑夜》中的天体运动（1977年）。《无用的梳妆》则是纯油画，然而它同时也是抽象的：漂浮的脸和手被拿掉，剩下炽热的旋涡，正好与德拉克洛瓦的《狮子》相吻合。至此，绘画正好转了一个圈。

列奥诺尔·菲妮——她也是素描和插图的高手——很少为演出布景，却通过她唯一的布景来创造演出。她提醒我们，我们的时代是盛产戏剧布景师的独一无二的繁荣时期（除了已经提到过的画家德兰、库托、马松、拉比斯，等等，还有布拉克本人）：克里斯蒂安·贝拉尔（他曾经为《唐璜》和《夏乐宫疯女》的布景花了很多工夫）、吉施阿、卡桑德尔、沃克维奇、马尔克莱、加诺、杜邦、波内尔、勒马里利埃、戴德。

最后，在一种搅动、毁坏、再创造形式的艺术中，如何忽视已经出现的艺术的新的可能性：机械的，光学的，活动的，动力的……以及韦伊的《元形式》——埃德加·坡的观点，麦司卡林幻觉，化妆谎言——在投射彩色的活动图片时获得的。绘画？电影？雕塑？

1022　不管如何，活动的物体被它的创造者卡尔德在大战前夕引入雕塑，一下子就有了抽象雕塑。当艺术家在树根、矿物上署上名字，抽象的最后一步——创造者使他的作品抽象化——就完成了？然而：抽象雕塑还是具体雕塑（就像具体音乐一样?）两者之间的含糊不清很明显。不过雕塑界确实从来没有关于抽象与形象的讨论，讨论完全针对雕塑本身：空间、体积、材料的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就雕塑而言，著名的创新者——在他们自己的绘画上前进——有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雕塑家们产生于立体派，反常的是，如同洛朗斯那样，他们在创作中更重视的是曲线。利普契兹从立体派中完全脱离，抛弃涡卷线状图案的立

体，创立他的《透明雕塑》理论。我们可以在那些查德金从 1940 年开始的探究中发现类似的东西，这位雕塑家力图让自己的作品显得更加简洁、轻盈。他的代表作——也是当代宏伟雕塑的代表作——是“鹿特丹的被毁”（1948—1951 年）的纪念性作品。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没有一点不是抽象的：不仅人类的外形，人类的悲剧也一直是这件雕塑的本质。在这件雕塑里，对有时显得有点矫揉的表达，甚至是表现主义的追求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更准确地说，这件雕塑通过多样性，亦即与贾科梅蒂蒂或热尔梅娜·里希埃，甚至是塞萨尔之类的艺术家同样多的多样性得到表达，其中包括用一下焊枪或机动锻锤，就展现了带有原始天真的巴洛克表现主义。在艺术活动中对“抽象”、“科学”、“集体”的关注和推崇，作为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似乎不再前进，而是被 1950 年拿起凿子雕刻的一代超越并赶走。这一代标志着形象艺术在新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灵感中回归。换句话说，形象艺术与继罗丹之后，将留下众多世纪杰作的那一代人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与马约尔和德斯皮奥等人联系起来。马约尔所传授的经验仍然被雕塑家使用，对于这些雕塑家而言，人体，尤其是女人的裸体仍然是他们在黏土石头里的所有创作的对象；扬塞斯对它们有着非常敏感的虔诚和偏爱。在更年轻一代的人类形式的再创造者中，作品所表现的东西最私人、最本能、最原始、最肉欲的当推吕西尔·帕萨万，但是因为仍然受到雕塑起源的纠缠，他在苏美尔前后的作品有了巨大的转变，转向一种虚构的、梦幻的，同时也是伟大的表达。

最后，应该相信这个时代，它清除城市的各个方面，恢复历史文物的价值（然而我们注意到这是件越来越稀罕的事情。巴黎，与很多首都相反，是座“石头”的城市），重新建起我们的图书馆并使其现代化，同时增加展览和他们的参观者，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些人群在卢浮宫门前排着比在电影院门前还长的队伍，他们像喜欢电影一样喜欢绘画吗？然而文化为大家追捧总是因为赶时髦和附庸风雅而不是希望学习并发现它，另外，附庸风雅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更多的法国女人，好像总是小说的读者一样，她

们曾经一直是展览的观众），不久以前逝去的时光变为再次追寻的时光确实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会在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成功中发现这种“文化”的一个变种。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之家，它同沿河公路一样，平等地有意义地分享着蓬皮杜总统的题词。公众似乎能从那里的演出和经常参观那里得到快乐，就像去文化的《月亮公园》一样。老实说，那里的建筑采用人体的机能逻辑和美学，将人体消化的、呼吸的、血液循环的管道系统和内脏，还有一大部分骨胳放在建筑的外面、不管怎么说，内容还是丰富多样，而且是有用的：开放的图书馆、博物馆、展览、出版物、持续多样的“文化活动”。但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和吸引力，除了非常短的活动：游手好闲者的比赛（确实，我们使巴黎应该有最多行人的地方，变成行人其实是那么少，汽车反而是最多的地方，除了这一点，我们还使这些汽车在人头上行驶）、音乐家、要把戏的人、表演吞火的人的聚集和其他走钢丝或走绳索的杂技演员，就好像旧的巴黎中央菜市场，新桥和中世纪的教堂广场的民间思想突然在这地方重新出现。

1023

建筑

直到 1945 年二战结束前，除了美国和欧洲一些地区，“新建筑”主义还没有自己的建筑理念。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战后重建迫在眉睫，这种建筑艺术，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国际式”建筑风格开始在全球流行。在当时，也只有纽约和芝加哥的建筑能够以这种风格相称。那时候，也有一些建筑思想者认为，这种风格应属于过去。建筑的静态平衡是与古代比例体系相联系的。而“国际式”建筑风格则是建立在动态平衡上。总的来说，它越过了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风格，在一切审美之外或者说超越了之前的审美观念。这种建筑理念最具意义的结果以及技术上的进步之一就是用工程师代替建筑师，工程师成为了不可缺少的助手。举一个法国建筑上的例子：鲁瓦扬圣母院就是由工程师拉法耶和建筑师吉耶联手共建的。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种工程－建筑师成为未来建筑中的一种独特形式。

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师的建筑。要么，它是源于“国际式”风格的建筑。此风格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总体上看，是以钢铁为表现形式，而从分析的角度来讲的话，则以混凝土为主打。还有一类建筑分支“有机建筑”艺术介于二者之间。这个建筑分支是在1947年由怀特先生创建的建筑艺术风格。要么，它介于两种互斥的建筑套路中。这种建筑风格也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矛盾。一方面，诸如让·普洛夫和罗兹的建筑研究主要在工业建造方向。这种工业建造也仅在建筑理念上要求遵循包豪斯[①]提出的观点。另一方面，这是审美观的一个很强烈的回归。勒科比[②]后期的作品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在龙尚，以及在圣玛丽-德-拉图修道院，如同在哈佛[③]和在昌迪加尔[④]一样我们都可以看到雕塑建筑。不过，我们在对建筑进行总结评判时应忽略那些屈指可数的思想新颖的建筑者的所有作品。他们在一些人文性的建筑观点上加入一些新方法，绝不是为了功能而牺牲美感，而是在功能中体现建筑的美感。拉普拉德代表的是秉承古老建筑风格的一代，而普莱则属于成熟的一代，他们有着很强的创造能力，是这一建筑风格的典型。然而，不久出现了一些建筑思潮，如野性主义，表现主义等等，这些思潮是建筑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最为“极端”的就是“流行建筑”。在这里，建筑师重新发现了雕塑和绘画在建筑中很好的协调。1967年，一位伟大的画家杜布菲开始造房子，并且是那种可以住人的房子，他成了这一行业的指南针。1970年后，社会和建筑都在脱离常规，向常规宣战。一些打破常规的

---

① 包豪斯（Bauhaus，1919—1933），是德国魏玛市的“公立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的简称，后改称“设计学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习惯上仍沿称“包豪斯”。在两德统一后位于魏玛的设计学院更名为“魏玛包豪斯大学”。她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的诞生，对世界现代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豪斯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

“包豪斯”一词是格罗披乌斯生造出来的，是德语Bauhaus的译音，由德语Hausbau（房屋建筑）一词倒置而成。

② 一译勒·科布西耶。

③ 此指勒科比西埃在美国设计的唯一建筑——哈佛大学视觉艺术中心。

④ 此指勒科比西埃设计的旁遮普邦的新首府。

房屋建筑和塔楼应运而生，建筑重新回复到艺术。一些人认为这种回归就如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致命的罪恶，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建筑回归于艺术，也带来了更富人性的东西。

音乐

音乐就是时代的建筑，并且像数字那样精确严密吗？过度严格的道德准则，反而会把音乐推向一种纯享乐主义，使之有如情感和精神的宣泄。但是这种感情的流露亦很容易被推向反面，让人不开心，这也是艺术和文学共有的准则。由此，某些人认为，一些音乐作品（包括其中含有的乐趣）乏味之极。

1024

在战前开创的研究，已经将其领域从激烈的半音性音乐扩展到电子音乐，进而发展到具体音乐（将自然音响记录下来剪辑而成的音乐）。大众也爆发出了同样的激情，当在节日里举办的音乐会时，他们会蜂拥而至，电台和唱片承载着信息传播，文化以及接近音乐作品的任务。但是这两项运动是同时平行进行的。吸引听众的并不就是那些新音乐，因为创作本身会随之陷入混乱和矛盾中。在急切想体验音乐和逃离发音含糊，找到稳固的音乐结构的强烈愿望下，有时我们会很痛苦地感受到这两层愿望的折磨。既然半音性已不再像1950年那样吸引听者，长期以来摇摇欲坠的音乐调性体系或可得到重生吗？音乐进入了十二音体系的后期阶段，开始找寻语言和要求极为严格的音乐建筑来保证其连续性。

战后音乐蓬勃发展，百花争妍，音乐流派很难加以区分。极具个性的音乐家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但是他们都属于战前音乐。在1945年时年方20岁的一代进入音乐领域，标志着50年代音乐的一个转折点。随着国家获得解放，雅克·伊贝尔、克洛德·德尔万古、马塞尔·德拉努瓦成为这一代的主要领军人物，用伊贝尔自己的话说是“使之颤动”。后来的J. 里维埃、罗兰·马尼埃尔、CL. 阿里厄、J. 弗朗塞克斯也属于这一代。

“六人团”在战后继续存在，在1955年英年早逝的奥涅格，与达律斯·米约一起，仍然是那个时期重要的代表人物。奥涅格创作

了一些伟大的作品：《第三交响曲》，《圣歌》，以及《第四，第五交响曲》。乔治·奥立克尽管身居行政管理职位，也丝毫不影响其作品的多样性。弗朗西斯·普朗克的作品所拥有的精神，智慧和魅力继续影响着后世音乐的创作。在阿尔古尔一行人中，亨利·索盖写出了几部完美的作品，尤其是《流浪艺人芭蕾和戏剧》，《孤注一掷》，《任性的玛莉亚娜》。达律斯·米约为现代音乐话剧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拘泥于形式系统，将多调性音乐发扬光大。1962年，他创作了《大卫》，《柳条小摇篮》，《第十一交响曲》。安德烈·若里韦对音色音质和音乐形式进行了大胆的研究。在所有这些音乐创作臻于成熟的音乐家中，作品最为新颖别致，同时灵感未被研究扑灭的人是亨利·迪蒂耶。他所创作的《交响曲》似乎可被视为"经典"。属于1936年的"青年法国"派的达尼埃尔·勒絮尔依然关注如何"更加具有人文色彩"，谈他本身似乎比研究他的言论显得更为迫切。他的管弦乐作品《雅歌》，《小夜曲》以及吉他片段在其优雅和音乐表现力上都堪称完美，其歌剧作品《安德拉·戴勒·萨尔都》则是现代浪漫主义的完美体现。

奥利维埃·梅西昂是绝对现代的音乐家，而且是现代音乐之路上的先行者。二战后，他开始在他之前策划的音乐道路上前行。他具有的极强的创造力，使他免于陷入传统音乐的窠臼。他对传统音乐加以变形。在他既丰富深刻而又风格多样的音乐作品中，让我们记住一些颇为雄壮、具有创新性的音乐作品：《图伦加利亚交响曲》、《圣灵降临弥撒曲》和《鸟鸣集》。

皮埃尔·布列兹[1]在1952年在萨尔茨堡上演了他根据勒内·夏尔的作品改编的《水太阳》的片段。以两架钢琴来演奏的"结构"，显示出了其在十二音体系音乐方面的更新。从1955年起，这位年轻的作曲家进一步显示出自己的独创性，这在其创作的《无主之槌》中表现尤甚。从1960年开始，音乐家的创作趋于成熟和平衡，听众 1025

① Pierre Boulez（1925—　），一译皮埃尔·布莱，法国作曲家、指挥家。

范围也在扩大。他成了当代音乐的核心代表，其执掌法兰西学院的教席即为明证，他创立的音乐与声学协调与研究学会（I. R. C. A. M）也被认为是科学家和音乐家交流的平台。

虽然布列兹的作品在音乐演奏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却被排除于“具体音乐”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音乐演奏的概念在这个范围内没有意义。演奏者如同乐谱评估一样不合时宜。作曲不仅要通过持续的声音和收到的音乐变体来创作音响材料，还要通过剪辑磁带的片段进行筛选。在法国，对于“具体音乐”的研究始于战后，它尤其是在皮埃尔·施爱菲的指导下在电台广播的录音间中开始的。皮埃尔·施爱菲曾经创作了四首《练习曲》等作品。他的合作者皮埃尔·亨利从1958年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总结，撰写了总结报告，该报告包括了从具体音乐到电子音乐的相关内容。

在此，我们无法一一列举那些以其音乐作品留下痕迹的音乐家。但在趋于成熟或者已达到成熟的这一代音乐家中，需要着重指出一些代表不同音乐趋向的音乐家，他们分别是：勒卢、普瑟尔、德勒律、夏庞蒂埃、朗多斯基、奥阿纳、艾格那科斯。马里于斯·康斯坦为罗兰·珀蒂和贝雅里谱写了芭蕾音乐。皮埃尔·亨利和皮埃尔·施爱菲联手创作了《一个人的交响曲》，这一点预示着音乐研究与正在发生巨变的舞蹈之间的紧密联系。

芭蕾

也许，由于法国在歌剧方面缺乏《沃采克》[1] 的后继者，人们遂试图从芭蕾舞中寻找类似的。但是，在季亚吉利夫之后还没出现过这样的佳作。塞尔日·利法尔填补了这个空白并带来了他自己的创作，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真正的芭蕾存在于别处：罗兰·珀蒂以其即便不具革命性那也是独具一格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和亨利·索盖合作推出的《流浪者》。雅尼·夏拉懂得如何运用个人的想象力对传统的音乐进行革新。莫里斯·贝雅尔起初在

① 《沃采克》系奥地利作曲家贝尔格编剧并谱曲的三幕歌剧。

马西娜的影响下创作了《一个人的交响曲》（1955 年），这是他得以展现全新艺术的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他还为《浮士德的天谴》，《当代弥撒曲》、《马拉美》、《波德莱尔》等编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贝雅尔，舞蹈这一被成为只限于少数舞蹈天才的艺术，在那时成为了一种近乎是大众化的艺术。贝雅尔艺术是一种更为具有男子阳刚之气的艺术。身体不再是上流社会娱乐的工具，它得通过对礼仪的热忱，在舞蹈中和现代人身上表达一种信仰。和阿尔托一样，贝雅尔回归到了一种作为源泉的东方舞蹈上。这种东方舞蹈重新为西方所有，使人们无法忘记舞蹈不仅是一种宗教活动，而且也是一种人们可以重建空间和时间的广大无边的游戏。

六、科学和技术

科学在决定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它也在建立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科学通过它神秘的，其作用正反皆有的力量开始影响大众文化（甚至很大程度上是精英文化）。尽管知识分子对科学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深感焦虑，但科学本身其实是无所谓好或坏的。不过，无论科学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人们对它的了解实际上是少之又少的，人们可能读得懂但丁，甚至是达达，但对于爱因斯坦或是略带专业性的科学知识却往往是望而却步，很多人，甚至包括其他专业的科学家对略微深入一点的数学运算都感到相当棘 1026 手。但是，数学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却很神奇，通过音乐来认识数学或许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科学具有的这种难以传递性不仅存在于外部，而且也存在于其内部，它的这种内外“不通透性”使得科学家们不得不在其对外开放性和对内综合性方面努力，同时着力于研究科学的超越性，即其宗教性。当然，这些尝试和努力可能是徒劳的，但也有可能具有某种启发性和预示性，就好比是突变体中的炼丹术，总之，科学的这种转变过程就好比是一场魔术：“魔术师们要开始登场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人们对于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甚至包括科学家们自己，却有些混乱，常常过于肤浅。在大众看来，科学的最前沿就是发射火箭或是动心房手术。

这种认识的混乱情况当然要避免，因为纯科学创造极其贫乏，相对而言，科学的应用和技术创造却非常广泛和丰富，这种情况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更是如此。我们将重点阐述和知识、研究及发明有关的几个代表性事件。在解放时期，科学不断创新发展，各种科学组织也不断地在完善，但是政府并没有对科学方面实施相应的鼓励措施，工业也没有在这个时期和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相当恶劣，布朗利就是在简陋的实验室里发明无线电的。并且获得了诺贝尔奖。法国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获得了14次科技诺贝尔奖（英国39次，德国43次，美国75次），而在1945年以后只获了3个奖（文学倒获了5次诺贝尔奖）。正因为研究环境的恶劣，库尔南加入了美国国籍。直到1948年，法国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才正式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该机构成立之后，法国的原子核物理学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在世界上排名第四。

在数学方面，自1938年以来，一群数学家就用共同的笔名“布尔巴基”开始出版著作，1950年施瓦兹发明了分配理论。在天文学方面，多尔弗斯在1966年发现了土卫十，命名伊阿努斯。物理学方面，奈耳发明的磁学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卡斯特勒提出了光泵激方法，并因此获得了1966年的诺贝尔奖。生物学方面，莫诺、雅各布和勒沃夫从1950年起就开始研究胚胎在DNA作用下的合成机制，此项研究获得了1965年的诺贝尔奖。1979年，他们向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主要阐述了他们对细菌生理学和细菌新陈代谢的研究情况，以及他们的新发现，这项新的科学发现得益于库里利斯基与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协助。他们的研究使人们对细胞生命有了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治疗学因此而发生了变革：因为此时人们已经完全知道该如何制服各种各样的细菌。由此，细菌可望用于许多地方，其中包括转化成为取之不尽的能源！基因学因此而打开了新的局面，它把

科幻片里经常出现的空想变成了现实，但这种局面才刚刚开始。

在医学方面，雷宾 1954 年发明了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马瑟在 1957 年成功完成了骨髓移植。杜宾和勒热纳出版了有关染色体变异的著作。节育虽然最初属于司法范畴，但正是这项节育立法刺激了医学事业的发展。

1027

医学就像一门复杂的“艺术”，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融合了许多学科，甚至是人文科学。科学几乎包含了所有学科，甚至是以文学为起点或终点：从数学到诗歌，从宇宙学到透视法，科学无不将其囊括其中。但是，人文科学相对于其他学科更容易理解一些。从理论上来说，一般人都能读懂苏斯戴尔甚至是列维 - 施特劳斯。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常常赋予其作品诗意化的标题：《忧郁的热带》，《从蜂蜜到烟灰》，《野性思维》，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作品属于诗歌，并且丰富了诗歌的题材。

结构主义原本是研究语言的方法，并且促进了语言学在当代的发展，列维 - 施特劳斯在其著作中却“跨界”地运用了它，后人对结构主义的借鉴也由此开始变得频繁。心理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于有些心理学家称其为严密科学。社会学也在大步发展，1957 年起发展尤为迅速，但此时的社会学已经开始细化：文化社会学、休闲社会学、劳动社会学、道德社会学、宗教（勒布拉）社会学。埃德加·莫兰创立复杂思维范式（《奥尔良的谣言》）。由伊夫林·絮勒罗特创立的女性社会学和当时的性学一样，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阿尔贝特·梅米创立的（反）种族（歧视）社会学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往往和个人经历有着密切联系，卡斯多里亚迪斯在这一点上颇具代表性。让·迪维尼奥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为后人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乔治·弗里德曼经过三十年的调查和研究之后出版了《粉碎了的劳动》以及被后人视为经典的《智能的力量》，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文学范畴。我们在谈论科学研究、科学创新甚至是科学变革时一直都没有远离文学。因为跟大众文化一样，历史的传播，甚至是科学史的普及也是以文字为媒介的，也是“书写”的历史。勒华拉

杜里和乔治·杜比的著作或者是《历史》杂志的广受欢迎都说明了这一点。

文学拉近了历史和艺术的距离。人类常常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综合能力，宗教史、信仰史和神话史为此而取得了其重要地位，杜梅齐尔[①]和埃利亚德也因此把科学、艺术和文学表达方式结合起来，进而丰富了作品范围。其实，我们对宗教，社会及文明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考古学获得的，后者已经成为了传播文化的载体之一，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国也因此对本国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例如，拉科斯特－梅瑟里埃尔和他的团队，以及他们的继任者相继发掘了特尔斐遗址。帕罗二战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工作时发现的古城马瑞遗址的发掘工作，在1965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法国本土的发现有，195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鲁菲尼亚克岩画，这是法国继拉斯科山洞16年后发掘的又一重大史前遗址；1953年维克斯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凯尔特文明的认识；1962年起，贝尔蒂埃就将精力投入到确认阿莱西亚遗址的真实身份上，随后开始挖掘，但和之前结论并无根本出入，即阿莱西亚和热尔戈维的考古价值相差无几。

1028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我们都是从两个层次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精神分析法——拉康作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既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也招致了不少争议——和马克思主义，尽管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冲突，但已经开始相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法的诠释越来越多，甚至是同一派别内部也会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当然了，思想正是通过争议、重新审视以及质疑而不断向前发展的。

七、历史的终结

20世纪的一半并不是由1950年，而是由1945年来标示的，更确切地说，是由1944年夏到1945年夏这段时期标示的。这前半个世纪

① 一译迪梅齐。

并不怎么辉煌，有时甚至显得有些黑暗与无知，但它对未来的日子还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的。两个大事件标示了从1945年到1970年的这二十五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及向月球跨出的第一步。第三个大事件发生在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即人类的空间探索达到了它的极限，也就是说到了太阳系的最边缘。那些电子探测器，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收集各种人类所需的信息和资料，它们的运行已经超乎我们能够理解和想象的范围了。瓦莱里早就意识到：对人类来说，世界变成有限的了。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时间和世界本身都是有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预知到世界和时间的尽头是什么模样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三个历史事件是同一种科学技术产生的关键性结果。这种科学技术经常被用于服务于某种思想或某种政治目的，如战争，但令人振奋的是，它也很快成为了一种对人类有利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为战争服务的，相反，它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定。这种力量也衍生为一种关于和平的知识——虽然，它的发展也不免会有延续，不免会发生偏差，甚至是某种背离与败坏。

但是，它们还是具有象征意义：人类自此在虚无和在这个虚无的世界上留下自己的轨迹的愿望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在人类的历史上，这还是其第一次在几年内一下子积聚那么多的能量，对他本身及他所栖居的地球做出如此大的改变。同时，他也意识到这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毁灭，即人对其自身的毁灭。不断投入生产的科学技术、人们所热衷的各种生物实验及资本的不断膨胀，使人在感官的刺激下不断萌生各种欲望、需要和想法。它们也生产出了形形色色符合各种规范与计划的产品。这是改变了人类，还是毁灭了人类？是科技给了人类不断向前的能力，还是人类赋予自身这种能力呢？我们能说这种促使人类发生变化的力量便是文化吗？或者说，除了全球性的自杀，我们还剩下两条路：要么是人类的自由遭到禁锢，要么是在人类的地球上仍留有那么一方自由思想的净土。

1029

第三十三章　最近四分之一世纪

从1975年至今

描述最近的历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段历史经常只能是各种混杂的事实简单的首尾相接，让人丝毫看不出其中的轴线；有时又完全是一些主观臆断，很快就会被后来发生的事情推翻。那些历史研究的常用工具，比如详尽无遗的原始材料、考证，以及两者的对照，对于总结最近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却是最缺乏的。而且历史学家缺少必要的“置身事外”的距离感，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要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有时是见证者、旁观者，有时甚至是参与者。本书涵盖了自史前以来的所有历史时段，而且每一段都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要准确描述最近的历史就更加棘手了。另外还存在着一个危险，即无意识地夸大最近发生的变革的重要性，并人为地扩大其影响力；或者相反，为了不超越社会发展几百年来缓慢的演变节奏，而刻意低估最近发生的变革的重要性。

想要研究最近的四分之一世纪，理解这段政治、社会、文化和国际事件异常丰富的历史，可以从经济增长曲线的拐转中找到其统一性。这一时期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不再增长，而是增长明显减缓，它标志着战后时期和法国“光荣的三十年”的结束，此时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还没有发生，它还意味着1945年5月8日揭开的以大规模重建为主

旋律的历史篇章画上了句号。

经济、社会、政治、法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价值观和文化，都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经济并不曾左右每个人，也不能主导一切社会生活，但在法国这样一个曾饱尝两次世界大战之苦，以及由此而来的长期萧条的国家，经济增长不仅医治了很多创伤，还为社会进步的实证主义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这种文化曾将十九世纪的法国带入了二十世纪最初数年的“美好时期”）。“光荣的三十年”恢复了每个人的信心，渐渐使每个人坚信即使不用平息当时大量存在的冲突，明天也一定会比昨天好。信心还使每个人对历史的前行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即每个人的物质条件都将得到持续的改善，而且这种改善还会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然而随着经济增长出现减缓，失业问题重新凸现，意识形态受到侵蚀，缺乏信心的时代又回来了。法国人必须学会在新的时代生活，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将每个事物各归其位，另外还必须重新为法国定位：法国是一个追求“正常”民主生活的中等强国，在由“大陆国家”控制的这个星球上，不仅要在全球化的经济中面临竞争，还必须适应法国在国内外遭遇的新局限，并在没有“思想导师”的情况下寻找构成法国基石的价值观。为了综合描述最近这四分之一世纪，我们没有按照年代依次记录一个个历史片断，而是决定采取围绕主题来叙述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建立在一种延续性之上，从1974年5月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为法国总统，一直到1997年6月“多元左派”在立法选举中获胜后，形成的雅克·希拉克和利昂内尔·若斯潘的“左右共治”，这种延续性始终贯穿其中。这段时间里，法兰西共和国经历了三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1974—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1981—1995年）和雅克·希拉克（从1995年开始）。先后与他们一起领导法国的共有11任总理：雅克·希拉克（1974年5月—1976年8月）、雷蒙·巴尔（1976年8月—1981年5月）、皮埃尔·莫罗瓦（1981年5月—1984年7月）、洛朗·法比尤斯（1984年7月—1986年3月）、雅克·希拉克（1986年3月—1988年5月，第一次“左右

1030

共治”)、米歇尔·罗卡尔（1988 年 5 月—1991 年 5 月）、埃迪特·克勒松（1991 年 5 月—1992 年 4 月）、皮埃尔·贝雷戈瓦（1992 年 4 月—1993 年 5 月）、爱德华·巴拉迪尔（1993 年 5 月—1995 年 5 月，第二次“左右共治”）、阿兰·朱佩（1995 年 5 月—1997 年 5 月）、利昂内尔·若斯潘（1997—2002 年，第三次“左右共治”）、让－皮埃尔·拉法兰（从 2002 年 5 月开始）。行政权由立法选举中的多数派掌握，右派（1974—1981 年；1986—1988 年；1993—1997 年；2002 年至今）和左派（1981—1986 年；1988—1993 年；1997—2002 年）的轮流执政是 1978 年 3 月、1981 年 6 月、1986 年 3 月、1988 年 6 月、1993 年 3 月、1997 年 6 月和 2002 年 6 月的七次立法选举的结果，这些选举是决定总统（国家元首）和总理（政府首脑）搭档的重要时刻，有时候总统不得不任命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担任总理。

1031

一、经济与社会生活

“光荣的三十年”之后是“可悲的”二十五年，对整个欧洲如此，对法国尤其如此。失业无情地持续增多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伴随高失业率的是经济的停滞，很多从十九世纪继承而来的“工业大教堂”（大型厂房）被关闭，不少从前被视为“成功的橱窗”的地区，如今成了萧条的象征。与此同时，不平等现象、大规模社会排斥、不断出台的社会改革计划造成的提前退休、年轻人在国家就业局门前排长队、全民的灰心丧气，以及经济衰退造成的自答、诽谤和烦扰，都在不断增多。显然，最近几百年的世纪末都是艰难的：美丽的十八世纪由于等级社会的僵化而导致了大革命；十九世纪的长期增长也避免不了陷入 1873—1895 年的大萧条；“光荣的三十年”带来的壮观的民族复兴在迅猛的前进中，因受到 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而戛然而止。

不过，就像对最近几个世纪末的研究那样，我们经过更加深入地观察，发现最近的 25 年并不能简单概括为一幅经济危机和社会断裂笼

罩的灰暗画面。经济危机和社会断裂毫无疑问确实存在着，但它们掩盖了其他很多事实，即在这二十五年里，法国仍然按照此前三十年的节奏发生着转变，只是由于这种转变发生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其模式相对从前大为不同，所以让大多数法国人感到吃惊甚至震惊。因此，我们不仅应该继续强调那些传统的评价（即失业率上升、不平等现象的增加和福利国家的危机），同时还应该用一幅更精确的画面描绘这个阶段，充分展示各个视角的景象：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变得更低，但由于生产率的进步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法国资本主义的突变，成功地适应了开放的全球化经济；工作条件发生了改变，使传统劳动力的地位降低，但妇女得以大规模地融入到生产程序中去。

所以总体来说，最近的二十五年完全不是悲惨的倒退。实际上，尽管各阶层的法国人都遭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法国在过去的遗产的基础上，通过打造新的“工具”，成功地构建了经济和社会的新结构，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适应了持续转变的游戏规则，即扎根于欧洲但又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冲击的开放式经济的规则。

大规模失业

社会的悲观情绪和最近二十五年的不好印象完全可以只用大规模失业来概括。1967 年末，时任法国总理的乔治·蓬皮杜曾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做出这样一个预断：法国政府将可能遭遇就业问题的长期考验。在“光荣的三十年”时期，这样的预测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然而它却有着充分的论据：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的经济开放、生产力的急剧膨胀、各行各业的演变、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年轻人大量涌入就业市场等。当失业问题在 1970 年代初期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时，它仅仅被视为就业供求关系的临时性失衡，而且被认为可以保持在可接受的限度之内。然而从 1975 年开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失业率的不断升高顿时显得不可避免，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巨大而惊人的，它成为“萧条”的主要症候。失业人数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比例，从 1975 年的 5%，在世纪末攀升到 12%，最高峰是 1997 年的

12.4%，如果用具体失业人数来说，1975 年有 87.7 万人，1981 年有 179 万，1982 年有 200 万，1995 年有 300 万，1997 年有 320 万，1998 年则略少于 300 万。除了少数几年，失业率几乎每年都在升高，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基本上没有关系，只有 1987—1990 年是例外，当时第一次“左右共治”刚刚结束，米歇尔·罗卡尔担任总理，在那段时间里，法国经济增长强劲，1988 年和 1989 年都实现了 3.8% 的增长率，创造了 8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同时期取消的工作岗位数量为 64 万），因此全社会总体上增加了 16 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因此从 1986 年的 11% 回落到 1990 年的 9%。然而此后经济增长又陷入低迷，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1998 年经济增长又达到了 3%。出现结构性大规模失业问题的同时，失业持续期也不断变长。比如在 1980 年，170 万失业者中有 46 万人的失业不低于一年，1994 年时 300 万失业者中有 120 万人寻找工作的时间超过了一年，这个数字到 1998 年仍有 100 万。

1032

法国人不仅在失业持续时间上不平等，在就业上也不平等。实际上，如果不考虑不会失业的公务员，失业问题对不同类别的劳动力和年龄段的影响大不相同。干部的失业率 1974 年为 1%，如今达到了 4.5%，而工人的同期失业率分别是 2% 和 16%，那些技能水平低的工人尤其容易失业。随着一些曾大量使用劳动力的传统工业行业（采矿、冶金、造船、汽车制造、纺织等）的经济出现全面萎缩或实现了现代化，法国丧失了大量的就业岗位。1986 年至 1995 年，法国平均每年裁员 40 万人，其中有两次裁员高峰：1984 年至 1988 年，年均 50 万人被解雇，1992 年至 1993 年，每年有 60 万人失去了工作。这些裁员主要发生在上述传统工业行业，比如 1983 年标致—塔尔博汽车制造厂裁员大约 8000 人，冶金业宣布裁员累计 2.5 万人；1984 年，煤炭业宣布 5 年内每年裁员 6000 人。裁员成了时代的基调。从 1974 年至 1998 年，工业在劳动力就业比例中，从 38% 降到了 25%，这意味着数以十万计的劳动力失业。同时，失业问题对不同年龄段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年轻人受到的打击最大，15 岁至 24 岁年龄段的失业率是 25 岁

至49岁年龄段的2.5倍，是49岁以上年龄段的4倍，而且还应该考虑到提前退休的55岁以上劳动者的大规模离职。在失业的作用下，传统意义上的“活跃的人生”（就业期）集中在25岁至55岁之间。进入就业期的平均年龄，从1975年的18.5岁增大到1998年的22岁；走出就业期的平均年龄，则从1975年的62岁减小到今天的58.5岁。1998年，四分之三的劳动力人口年龄处于25岁和50岁之间，而1970年代的该比例仅为二分之一。

考虑到大规模失业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悲剧，引起的社会融入问题，和造成的家庭恐慌（尤其是那些父母即将年满50岁，父母本身就担心失去工作，而他们的子女也开始寻找工作）以及精神（集体悲观）和政治（不信任政府官员）问题等，法国政府的历任负责人，从1974年起，都在极力寻求走出这一地狱般的困局。为了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法国政府首先采取各种振兴经济的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为此，法国政府先后实施了多项振兴计划。雅克·希拉克于1975年、雷蒙·巴尔于1977年、皮埃尔·莫罗瓦于1981年至1982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振兴经济，希拉克的方案中政府主导和意志主义很明显，雷蒙·巴尔的方案更加自由主义、皮埃尔·莫罗瓦的计划则突出国家干涉主义，这些方案都希望能够收获奇迹般的效果，但都未能成功。尽管经济形势也曾出现过几次好转，但都是昙花一现，最后都以通货膨胀率上升、公共财政的破坏和外贸的萎缩告终。1981年至1982年的情况尤其如此，当时缓解失业问题的方案是法国政府最后一次总体性尝试，借鉴了法国战后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主导经济的传统方法：通过提高平均小时工资、跨行业增长平均工资、社会补助金（家庭补助、住房津贴、最低养老金）刺激消费；改变工作时间的分配（每周39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增至5周、鼓励兼职、禁止退休后继续工作、推行将年轻人的工作保障时间从半年延长到1年的“青年未来”计划）；配合重工业的大规模萎缩施行各种提前退休措施。可惜，这一方案很快也以失败告终。法国奉行的是一种开放式经济模式，但在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法国的企业普

1033

遍缺乏竞争力，而且欧洲其他国家普遍受美国（当时的总统是罗纳德·里根）和英国（当时的首相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流行的经济模式的鼓舞，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即自由主义整顿，所以法国的自主振兴计划，由于仍然将法国视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绝缘体（其实早已不是），耗费了大量政府预算，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导致了外贸逆差加剧。法国被迫在1981年至1983年三次使法国法郎贬值，其中1981年10月4日贬3%，1982年6月12日贬5.75%，1983年3月12日贬2.25%；而德国马克在同期分别增值了5%、4.25%和5.5%。另外，法国的通货膨胀率在1981年和1982年保持在14%的高位，而失业率同期仍在不断地增高。于是，在1982年6月13日的《德洛尔计划》和1983年3月更为精细的计划中，自主性振兴的主张寿终正寝，而且再也没有出现法国减少失业的总体政策之中。

从1975年至1983年，法国政府根据对国家干涉主义和柯尔伯主义的思索采取了一些宏观经济措施，这些措施与更加精细的战略相结合，目标是处理一些特殊的问题和范畴。最为显著的是从1970年代末，总理雷蒙·巴尔通过采取降低企业社会保险支出的措施，降低企业的劳动成本，以鼓励企业增加雇员；1977年，巴尔还推行了有利于年轻人就业的劳务协定，企业享有相应的税务优惠。这些措施最初只是振兴计划或自由主义整顿的宏观战略的辅助手段，但从1983年开始，它们升格为替代性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社会保险支出，来扩大企业盈利空间，并推行对企业有利的增加值在工资和赢利之间的分配制度，来鼓励企业增加雇员；从各方面降低工作的“僵硬度”，增加其灵活性，推行多种雇佣合同模式，以促进就业和增加雇员。从1983年至1997年，工资报酬在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从57%降到了53.3%，其中1989年的水平最低，只有52%。而企业的营业毛盈余，1981年为38.5%，到1997年增至40.6%，其中1989年曾达到最高点42.5%。可以看出，从1982年至1989年，工资的压力达到了最大值，营业盈余也出现了显著的好转，但失业问题并没有得到同等明显的减轻，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大规模降低企业社会保险支出的政策，并没

有在增加就业机会上体现出来。

对于解决大规模失业的问题，法国政府自从1983年转而奉行自由主义以来，主要秉承如何促使企业增加雇员的思想，重要途径是向企业提供不受1950年代以来各种用工合同限制的劳动力。比如1987年，雅克·希拉克政府决定取消解雇（工会代表）的行政批准制度，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事务部长菲利普·塞甘认为这一政策会造成企业普遍停止招聘新的雇员，而另外一些人则视之为对抗失业狂潮的威慑性保护。1034 事实上，这一政策既没有创造出数以十万计的工作岗位，也没有造成令人忧虑的大规模失业。

在1970年代末有关政策的基础上，法国政府不断推陈出新，推出多项社会改革计划。左派在设立提供公共援助的“国家就业基金”（主要惠及那些接受提前退休制度、带薪休假转换和职业培训等政策的条件的企业）的基础上，重新激活了1970年代的多项政策，一直实行至1992年。到1998年，劳动部部长马蒂娜·奥布丽再次重拾这些政策的原则，她并没有推出很多的社会改革计划，但着重改善了现有社会计划的内涵，比如惩罚那些滥用提前退休制度和过快解雇员工的雇主。至于针对“非确定性”工作的组织措施，改革计划的更新不断加快。1984年，总理洛朗·法比尤斯推出了《“集体利益工作”方案》，有些人批评该方案只能提供一些报酬低廉的“小活儿”，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帮助年轻人融入社会的好方法。该计划最终取得了成功（1985年有20万人因此得以就业），在政府的公共系统、地方集体和企业造就了多种实习方式和享受政府补贴的合同。1984年后的历任政府都采用了该方法，不过名称有所不同。1984年由此解决的就业岗位为10万个，1997年则达到了45万个。同时，在1984年数量还不到30万个的固定期限合同，到1998年增加到了80万个。另外，临时工作和兼职工作的数量也有了明显增长：临时工合同在1984年大约有10万个，到1998年增至几乎30万个；兼职工作在所有雇佣合同中从1982年的8%到1998年增加至17.5%，其中男人从2%增至5%，女人则从18%增至31.5%。在缩短劳动时间（最初称为劳动时间分

配）的总体政策方面，融入了更多的灵活性，目的是方便企业采用新制度，鼓励企业增加雇员。1993 年 12 月 20 日颁布的五年期就业计划，允许企业每年通过谈判使全年或几个月的周工作时间长度具有差异性，但总体上必须缩短劳动总时间。1996 年的《罗比安计划》将招募员工或维持雇员总数与缩短劳动时间结合起来，该计划旨在缩减 10% 的劳动时间，增加 10% 的就业岗位，作为补偿，企业将享受 7 年的社会保险支出优惠。

尽管这项自由主义的计划看起来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仍然未能阻止失业率的上升。1997 年“多元左派”掌权后再次改变了社会政策改革的方向。于是，法国政府自 1981 年以来，首次优先采用了一个总体方案，目标是在较高经济增长（1998 年为 3%）的背景下，使经济增长能够将法国从大规模失业的困局中解救出来。如果年经济增长率为 3% 可以确保减少 7 万名失业者的话，到 2002 年将可以使 11% 的劳动人口重回就业岗位。1998 年春季，政府推出的一项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新法案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从 2002 年 1 月 1 日开始固定为 35 小时。由此增加的 11% 的劳动成本，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降低社会保险支出）得到弥补，而且企业还可以因此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和更有效的劳动组织。该法案的制定者希望能够促使企业增加雇员，或至少促使企业不减少雇员。不久之前的 1997 年末，“青年就业”计划由劳动部长马蒂娜·奥布丽付诸实施，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私法向劳动法倾斜的合同，在文化、体育、教育、安全和救助等领域创造出 35 万个公共就业岗位，这些岗位最初 5 年可以获得公共财政的支持，但随后将完全成为财务上自主的私有岗位。1998 年，80 亿法郎 1035 的政府预算被投入到该计划之中。这个计划严重依赖于经济增长的支撑和消费的重振，它意味着解决就业问题的意志主义的总体政策的回归，与 1983 年以来的自由主义原则截然不同，是否能比从前的战略更有成效，历史将做出回答。不过，要正确评估最近二十五年来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以及政府为此展开斗争却始终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事实，必须看到法国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欧洲的一个例外。在每个欧

洲国家，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都造成了失业者猛增。1975 年，欧洲平均失业率只有 3%，1998 则达到了 10.2%。当然，法国的失业问题尤为严重（不过应该知道法国的人口增长趋缓来得比邻国都要晚，法国因此拥有更大比例的年轻人），而有些欧洲国家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97 年英国的失业率只有 5.2%，荷兰只有 7.4%。不过德国和意大利的有关数据与法国的相差无几，这说明尽管法国具有一些特殊性（年轻人失业、长时间失业），但“法国的痛”实际上是二十五年来欧洲共同的“心病”。

劳动的新面貌

二十世纪末法国的特点，首先是劳动力在三大传统产业分配比例的深刻变革。1975 年时农业就业人口还占 11%，如今只有 5%。在这个经济领域，欧洲几十年来不懈的追赶仍在继续。法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总数从 1975 年的 200 万减少至 1998 年的不到 100 万，农业经营单位的数量则从 130 万降至不到 80 万，农场平均面积则从 26 公顷增加至 36 公顷。农场的集中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一时期的生产率大约提高了整整一倍。不过，如果该领域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运转的话，这些改变的幅度还会增大。事实上，农业生产成本的下降是稳定的。从 1980 年至 1993 年，各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平均下降了 35%，其中鸡蛋 47%、猪肉 48%、小麦 51%、玉米 56%。农业还得到了数以十亿计的国家和欧共体补贴。在此期间，补贴总金额从 65 亿法郎增加到 375 亿法郎，到 1998 年，农业补贴相当于平均农业国民收入的 30%强，而该比例在 1970 年代末只有不到 10%。农业正逐渐实现公共事业化，所以得以免遭自由主义经济的冲击，尽管农业从业者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接受一些束缚（奶制品配额、休耕、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但是他们波澜不惊地度过了漫长的危机和适应期，而没有遭到严重的打击，他们的平均收入在这 25 年内尽管出现过波动，但总的来说增加了 30%。如今，人们担心土地的荒漠化和集中化的危险（按照现在的趋势，到 2010 年将只剩下 20 万个农业经营单位，而且如果不

抑制生产率的提高，将来只需要 1998 年一半的农业土地面积就足以保持总产量水平），是时候对 1962 年共同农业政策建立起来的农业系统进行改革了。改革的目的实质上是赋予农民一个新的使命：降低产量，但提高质量，保护环境，保证法国全境的土地都有人维护，这就是 1998 年 10 月议会通过的《勒庞塞克法案》的精神。农庄主变成了企业家，除了自己的经营收入，还能得到来自巴黎和布鲁塞尔（欧盟）的财政补贴。农民们除了保持生产粮食的功能，以后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生产。

至于工业，从 1975 年开始，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1975 年使用了 38% 的劳动力，到 1998 年降至 25%。1975 年，法国现代工业的巨型厂房之一——佛旭迈尔钢铁厂建成投产。当时人们预计 2002 年世界钢铁总需求将达到 20 亿吨，所以认为法国北部的和东部的钢铁厂由于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的要求，并无法在水上生产以降低成本，将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如今，世界的钢铁总需求只有 8 亿吨，法国钢铁业的劳动力人口从 15 万降到了 5.2 万，钢铁产量也从 2700 万吨减少到了 1600 万吨，产量下降，但同时生产率大幅提升，钢铁厂也实现了高度集中化。法国北方钢铁联合公司一家的产量就占到了全法国产量的 95%，该集团 1986 年与萨西洛尔钢铁公司合并后，成为世界产量第六、营业额第二的巨型企业。1978 年，政府拥有了该集团的股份，1981 年后，政府对该集团实现了控股，政府先后注入了 1000 亿法郎以吸收社会计划造成的成本，和保证设备的现代化，使法国钢铁业的生产率成为世界第一，如今生产每吨钢只需要 2.6 小时，而 1975 年则需要 9.8 小时。1995 年，该集团实现了私有化。其他传统大型工业领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比如煤炭业，尽管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人为的回升，但该行业最终丧失了所有的劳动力，几乎所有矿井都被关闭。1975 年，雇员总数达到 4 万人的造船业，如今只剩下 4000 人，法国在世界造船业所占比例只有 1.2%，而 25 年前曾经是 6%。唯有位于大西洋沿岸的船厂幸存下来，它们通过分包和降低成本得以维持，目前基本上只制造高附加值的船只（天然气运输船、高速船只、豪华游轮）。1975 年至今，纺织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 50 万，汽车制造业也减

少了同样数量的雇员。在全国每个地区，不断有法国大型工业企业消失，这些企业通常经历了长期的挣扎，而且被媒体广为报道，比如力普、布萨克、克勒索卢瓦尔和马努弗朗斯等，还有一些北部和东部的工业基地，比如 1992 年 3 月 31 日雷诺汽车公司关闭的位于比扬古尔的工厂，这些地方曾长时间是法国“光荣的三十年”以及消费社会和工人世界的象征。、

这真是一场革命。尤其从 1984 年开始，矿工、炼钢工人、船工、汽车工人不断被企业重组、社会改革计划、现代化、自动化的浪潮卷走，这些变革敲响了“工人阶级”的丧钟。如今，法国工人的数量只有不到 650 万，比 1931 年还要少。汽车制造业的情况是这种演变最为典型的例子。雷诺和标致—雪铁龙两家汽车制造公司在 1979 年至 1986 年间，累计亏损达到 400 亿法郎，被迫从 1983 年至 1990 年裁员 7 万人。除了数量的剧减，工人阶层还发生了其他改变。大工厂远没有从前那么有代表性：1975 年，35.6% 的工人在人数超过 500 人的企业工作，而 1998 年只有 22%；1975 年，22.9% 的工人在人数少于 50 人的工厂工作，1998 年则达到了 35%。由此可以看出变革的广度。工业领域中小型企业的不断增长也对工人阶层的分化产生了影响，社会职业的重新分配则使其加剧。在 100 名工人中，只有 44 人在工业领域工作（其中 24 人为熟练工人，20 人为非熟练工人），有 36 人在手工业（其中 24 人为熟练工人，12 人为非熟练工人），还有 5 人在农业，6 人在搬运、仓储、运输等行业。工人阶层是大规模失业中最大的受害者，1980 年只占所有失业者的 6.7%，1998 年达到了 16%，而且其工资从 1976 年至 1995 年年均增长只有 0.4%，而所有法国劳动者的工资年均增长率为 1%。如果看到工业在 1975 年国内生产总值内所占比例为 30%，而现在只有不到 25% 的事实的话，人们就不难想象第二产业发生的变革有多大了。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到 1980 年代中期，劳动领域最有象征性的场景，始终都是工人阶级排成长队上街示威，抗议企业重组和裁员。工人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而且分工越来越细，他们失去了作为一个阶级的标志和身份，是 20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经济快

1037

速转型的最大输家。

工人数量锐减的同时，最显著的变化是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1975 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只占总劳动人口的 51%，1998 年则增至 70%。其中，传统雇员的人数（比工人数量多）继续增长，但比例不大，因为很多行政职位都因为信息化而被取消。不过，某些行业的扩张却是史无前例的。工业从 1975 年至今失去了 200 万个岗位，而商业的就业人口总量达到了 120 万，其增加值是钢铁行业的 6 倍。在这一时期，仅旅游一个行业就创造了 20 万个就业岗位，酒店、咖啡馆和餐馆的增加值超过了化学和钢铁行业，而游客带来的收入在 1997 年达到 662 亿法郎（1998 年，法国共接待了 7000 万游客，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其销售额达到了汽车行业的两倍。新科技（信息和通讯）的发展，由于竞争和边界的开放，企业必须想方设法销售更多更好的产品，这导致企业中的销售人员或技术销售人员倍增；国家、集体和个人在研究、健康和教育领域的投资的剧增，造就了更多的干部、技师、工程师、教授和医生，进一步促进了法国经济的第三产业化。因此，1998 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再是 1975 年的那些大企业和行业。电信、大型销售、连锁酒店、信息行业，比如法国电信、通用水公司（1997 年成为威望迪），里昂水务、家乐福、雅高、凯捷、阿尔卡特等公司是劳动力新格局中的翘楚。

就业人口在三大产业中的快速转移，不仅改变了经济本身的性质，也改变了每个产业自身内部的生产模式，转移还在各行各业体现为结构的转变。前文已经提到兼职工作数量的剧增（尤其是在 1970 年代的法国）和就业年龄在 25 岁至 50 岁之间的集中化，以及劳动时间的缩减，但劳动领域变革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妇女化。二十五年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劳动者是妇女，而 1998 年则几乎占到了一半。80% 介于 25 岁和 50 岁之间的妇女都是劳动者。同时，妇女解放运动使就业成为她们获得社会认同的关键所在，这场妇女就业革命不仅源自培训水平的提高、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经济第三产业化（比如各种兼职工作和人员服务：托儿所、家庭保姆、餐厅），还源自妇女们内心的一个强

烈的愿望（她们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拥有两份工资，从而提高购买力）。在欧洲，法国是妇女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远远高于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相差无几。

此外，劳动的新面孔还使职位和工资的联系变得松弛，特别是终止了从事独立工作和临时工作的劳动力工资的持续上涨的趋势，同时，各行业社会诉求的累计时间持续下降（1976 年因为罢工损失了 5000 个工作日，而 1997 年只有 352 个，期间最高峰是 2005 年的 2092 个，主要是由于当年 12 月份空前绝后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工会也持续萎缩和分散。1975 年，参加工会的劳动者有 23%，1998 年时仅有 9%；1997 年，65.4% 的工人放弃了参加劳资调停委员会选举的权利，创下了历史纪录。传统工会组织如劳工民主联合会（CFDT）、劳动联合总会（CGT）和工人力量总工会（FO）举步维艰，一些新的工会则应运而生，如统一工会联盟（FSU，是 1992 年国家教育联盟分裂后产生的工会联盟）和“团结，统一，民主”工会（SUD，1993 年劳工民主联合会分裂后产生），另外还有一些存在时间极短的针对公共系统局部冲突的超工会协作组织。 1038

增长和自由主义

大规模失业和“危机”这个词的滥用，尤其在经济领域的过度使用，使人觉得 1975 年至 1998 年的法国经历了萧条，在法国经济的黄金时期即“光荣的三十年”之后立即出现了衰退。实际上，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从 1950 年至 1974 年平均每年增长 5%，在二十世纪最后 25 年也没有停滞下来，平均每年仍然约有 2%，这与 1820 年至 1913 年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增速基本相同，而且高于 1913 年至 1950 年的增速。所以，最近这一时期并不是没有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只在 1980 年、1981 年和 1993 年 3 个年头出现了下降），只是经济发展放缓，增长率出现了回落，但同时期生产出来的财富的增长速度却是惊人的。以 1995 年的法郎币值为基准，1975 年至 1997 年之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3 万亿法郎，从 4.8 万亿法郎增加到了 7.95 万亿。随着生产

力的提高，低增长率的规模增长可以创造出与过去高增长率条件下一样多的财富。1995年，法国的经济增幅只有1.6%，但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250亿；相比之下，1955年的增长率达到7.2%，但国内生产总值只增加了1260亿法郎。在使用同样多劳动力的情况下，法国的经济机器比20年前多生产出50%的财富，这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工业化国家。1998年，一个法国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大约为27.5万法郎，而1975年只有17.2万。以1973年的工业生产为参照基数100的话，1997年的工业生产超过了133，主要是出口和家庭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法国经济又变成了1914年以前那样的开放经济，当时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供出口，1978年第一次超过了该比例，1998年达到了25%。尽管来自低工资的南部国家的竞争使法国被迫取消30万个就业机会，但贸易保护主义的终结、欧洲内部贸易和贸易的全球化仍然使法国的国民财富得到了增长。在经历了从1979年至1991年的贸易逆差后（1980年的逆差为600亿法郎，1982年为900亿，1988年为530亿，1991年为630亿），1997年的外贸状况转变为明显的顺差（1997年的顺差为1500亿法郎）。法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出口国，如果计算人口与出口的比率，法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但最近二十五年的增长背景与空前绝后的“光荣的三十年”相比截然不同。从1930年代、“解放”和戴高乐—蓬皮杜主义等时期继承而来的管制经济和覆盖面广大的公共领域，在1974年至1983年仍占上风。但从1983年开始，法国开始向自由主义转变，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完全改变。事实上，这看起来让人非常困惑，因为从1958年至1981年，法国一直是右派政党执政，但政府大力发展的是社会—民主党主张的经济系统，其基础是强大的公共体系、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无处不在的干预、净收入的再分配向工薪族和最贫困人口积极倾斜的福利国家。在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交替执政的邻国，实行的更加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社会经济”，注重人民团结和经济体系的性能，这种经济政策为欧洲各国在战后普遍采用，而法国则以自己的方式实行这种欧洲模式的经济制度，与德国和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1039

相比，法国更强调政府主导、人民团结和国家干预。

1974年至1981年间，自由主义派的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延续了前任们确定的前进方向，即实现国家财富的社会化。各种强制性税费（税和社会保险金）的总额从1974年的37%增加到了1981年的43%。面对经济增长趋缓、失业率猛增和石油危机的打击，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选择了工资，而不是利润；选择了团结，而不是“各扫门前雪”。尽管他的选择由于政治上的缺陷而被很多人诟病，戴高乐主义右派对其心存疑虑，联合左派在选举过程中对其猛烈抨击，工会和劳动者则频繁抗议，但其成果有目共睹。在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下，法国经济进行了重新“发牌”，老板、自由职业者、商人、手工业者和高层干部损失了部分利益。福利国家得到了加强：根据1974年和1975年的法案，没有工资收入的人也普及了社会保险；最低养老金和家庭补助金都有所提高；通过了有益于残疾人的法案；1975年1月通过了有关解雇（工会代表）的行政批准制度；1974年10月新设了等待就业辅助补贴，因公司资金紧张而遭解雇的人可以在1年的时间内领取90%的工资；对价差利益征税，1976年7月的法案被很大程度地缓和；税务压力增大；为了改善雇员的利益，工资在利润中的分配比例得到提高，1973年工资和公司利润基本平衡，但1974年至1981年该平衡被打破，工资所占比例从30%增至32%，公司利润则从30%降至24%。这一变化与强制性税费的增加同时发生，这表明公司及其利润首先被牺牲，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因此得以缓解。工资的增长在“光荣的三十年”之后得以延续，而公司的毛利则开始严重下滑。

毫无疑问，是总理雷蒙·巴尔和他的经济部长勒内·莫诺里在1978年立法选举后，开始了法国经济向自由主义方向的转变。雷蒙·巴尔于1978年4月19颁布政府通告放开物价，最具象征意义的是1978年8月12日面包价格的放开，终结了自1791年7月19日制宪会议首创的价格管理制度（该制度在1945年通过有关法令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雷蒙·巴尔政府还宣布公共企业必须实施“真实价格”（提高使用者的购买价格，必然导致来自纳税人的公共补贴的减少），

该政府还致力于改变家庭储蓄用途的结构，促使家庭储蓄流向企业，从而推动投资而不是消费。雷蒙·巴尔政府的总体目标是在计划和行政干预型的经济体系中，重新导入一些市场经济的实践，不过当时采取的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治疗 1980 年代将要面临的问题显然药性过于温和。由于随后而来的 1979 年石油危机的打击、1980 年代的一系列挫折（失业率的急速上升、通货膨胀率的猛增、收支赤字和外贸形势的急剧恶化）和 1981 年到期的选举，雷蒙·巴尔政府这些饱受劳方、左派、工会和正统派戴高乐主义者抨击的政策所取得的成效，一直都没有机会得到衡量（短期来看，这些政策至少实现了一些平衡，因此不应该对这些政策妄加否定）。在这一短暂的偏离之后，1981 年至 1983 年这一时期，法国经济再次回到了过去几十年的老路上。整体来看，1040 1981 年的振兴计划实际上延续了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停止、前进"传统经济调控模式，并效法了这方面的一些传统办法：增加强制性税费、通过提高购买力促进消费、创造公共工作岗位、财政赤字、提高工资标准、增加劳动成本和企业社会保险支出（再一次对企业增加值进行重新分配，受益的是工资，受损的是企业的赢利）。政策的新意主要体现为大规模的国有化，但形式大于实质，因为法国的资本主义从戴高乐—蓬皮杜时期以来，已经成为由政府主导的工具：由于政府掌握着国有化的银行、一些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和国库，法国 95% 的信贷都依赖于政府，无论从事实还是道理上说都是如此。是政府推动了工业和金融业的大规模集中化；当 1973 年经济出现困难时，还是政府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领导下，通过多种财政援助使得法国的大企业能够顺利渡过难关（政府总共提供了 300 亿财政援助，其中 66% 是直接援助）；在冶金业出现危机时，政府甚至出台特殊的计划（1978—1979 年），对该行业倍加呵护。1982 年 1 月 28 日通过的有关国有化的法案，从法律角度上看引人入胜，实际上该法案不过是对既成事实从法理上进行承认。法国的国有化从时间上来看，可以上溯到 1945 年，从政治上来看，当西方世界普遍实行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推崇的自由主义经济，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之时，法国政府俨

然是政府主导经济的“乐队总指挥”；从实践上来看，政府拥有银行系统75%的股权，而且公共领域占据了29%的工业生产总值和23%的劳动力人口。总的来说，国有化的成本是高达430亿法郎的补偿和870亿的无偿资本援助，这使社会民主的柯尔伯主义经济理论以法国的方式达到了顶点。在米歇尔·罗卡尔决心通过重新采用计划经济（1982年至1983年的临时计划），以确保有效的结构调整、必要的投资、竞争力、生产率和各子公司的持续生产，并将经济与就业联系起来时，当时的政府手中一共掌握了5家巨型工业集团，包括通用电力公司、贝西奈－犹齐纳－库尔曼集团公司、罗讷－普朗克－圣戈班集团公司、蓬塔穆松和汤姆逊－布朗特，还拥有36家商业银行和2家金融公司，即巴黎巴和苏伊士。政府是法国国民经济的总设计师，以绝对的权威统治着整个法国。

但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随后面临的前面提到过的一系列困难，以及欧洲国家在1983年3月作出的共同决定，直接导致了法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急转弯。经过15年时间，尤其在皮埃尔·贝雷戈瓦的大力推动下（他曾在1983年至1986年和1986年至1992年担任财政部长，在1992年至1993年担任总理），法国逐渐走上了自由主义经济的轨道，采用了欧洲邻国和伙伴国早已实施的经济政策。从1983年春季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社会党人大规模推动了自由主义经济运动。终结汇率控制；放宽物价和银行控制的限制；使金融系统现代化（证券交易所的复兴，从1985年开始经历了一轮令人叹为观止的股市牛市；吸纳业绩良好的中小型企业的股票和债券的“第二市场”的创建，使这些企业能够为继续增长进行融资，而不用再依赖公共财政的援助或借贷；通过投资基金使金融产品多样化等）；限制政府对公共企业的干预，以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颁布被称为“公共领域的呼吸”的新法案，为部分私有化打开道路；1984年政府拒绝拯救拥有3万员工的破产企业克勒索卢瓦尔工业公司（当时的工业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宣称：“政府不是为企业管理不善买单的冤大头”）；还有各种以现代化和效率的名义，呼呼提高企业的主动性、赢利性、生产率和

1041

盈利率的言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1983年3月至1986年3月之间，这反映了法国不得不进行的变革的广度。尽管当时失业问题不断增加，而且还有很多要求保留既得权利的诉求和反对社会计划的呼声，但改革势在必行。与这次向自由主义的急转相伴的，是维护强势法郎和进行（盯住德国的）“竞争性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从1981年的14%，降至1985年的4.7%，与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只差2%。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同时，工资和物价不再按指数计算，这也与1945年以来的习惯做法截然不同，直接导致了私有和公共领域的工薪阶层的购买力下降。从1984年开始，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分配转而向企业利润转移，而不利于工薪阶层。到1986年，两者自1975年以来第一次达到了等同，即都是29%，与1983年相比，工资部分的比例减少了4%，利润部分的比例增加了5%。这一转变自开始后一直得到延续，直到1991年其趋势才发生了微弱的扭转。

从1983年开始，共和国总统府弗朗索瓦·密特朗特别强调了随后一年政府预算的紧缩（继1982年和1983年两项《德洛尔计划》之后，作为新政策的第三部分），9月15日，他在法国电视一台的《关键》节目中宣布：“当明年我们制定预算的时候，应该将强制性税费的比例至少降低一个百分点。我们应该开始慢慢地降低强制性税费，彻底改变现在的政策”。从1975年开始，强制性税费的比例实际上每年都增加了1到1.5个百分点，当时已经达到了国民财富的44.5%。密特朗不仅确定了强制性税费的比例极限，还为降低该比例反复进行宣传（期望该比例在1990年代达到稳定，但最近两年该比例开始重新上升：1996年达到了45%，1997年达到了45.3%），他在为自己向自由主义方向转变进行辩解时明确表示：市场从此应该以它特有的方式，从政府手中接过为经济行为设限的职责。从1983年开始，政府有步骤地放弃以前的一些职能，社会自由主义经济道路逐渐替代了社会民主的柯尔伯主义道路。欧洲国家在1983年做出的选择，因1985年的《单一欧洲法令》、后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以及1999年开始走上单一货币道路的决定得到了巩固，这不仅

意味着法国深深地融入到了欧洲和世界竞争之中，还使法国在经济上向自由主义转变在政治上也明确下来，新的发展道路将能够持续下来，而不会为政治更迭所左右。从此，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以自己的方式与之相适应：放松管制、放宽限制和私有化将成为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关键词汇，新政策与1945年确定的政策原则相去甚远。

1986年右派政党获得了立法选举的胜利，开始了第一次私有化浪潮。1986年7月通过的法律（密特朗总统拒绝采用政府法令的形式），旨在用5年时间将65个工业和金融企业（这些企业在1945年和1982年先后实现了国有化）私有化，该计划在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政府干预主义色彩的退却还表现在物价的放开、税费的降低（包括巨富税的取消）、1987年公共开支预算的减少、购买黄金不具名制度的恢复和对资本逃逸的赦免等方面。有关私有化的政改因为1987年的股市暴跌被中断，不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发展在几届左派政府（1988—1993年）的领导下得以继续，并在1993年右派政府回归后得到放大，至今仍未停止。皮埃尔·贝雷戈瓦从财政部到总理府一直持续到1993年5月的长期"统治"、1993年至1995年的爱德华·巴拉迪尔政府（巴拉迪尔在第一次"左右共治"时担任经济和财政部长）、随后的阿兰·朱佩政府、以及1997年开始的利昂内尔·若斯潘总理政府（财政部长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都保持了强势法郎、（盯住德国的）"竞争性抑制通货膨胀"、放松管制和放宽限制的自由主义政策，体现了近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延续性。由于预算政策归于正统，汇率得到保护，开放的欧共体内部市场中的各种平衡得到了维持，这一现代的活跃的市场使法国企业能够在其中找到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资源。法国政府逐渐放弃了主导经济的职责，同时市场接手这一职能，这种交接实际上在1990年代得到了延续。1982年实行国有化时，尚且富裕的法国政府还能够将自有资产大规模强制注入大企业，以提高这些企业的活力；到1990年代，迫切需要借贷以实现集中化和国际化的大企业，却再也不可能从不再富裕的政府获得资金支持。大企业可以在从1984年开始激活的金融市场上获取这些资金，而政府则可以通过私有

1042

化的收入使收支趋向平衡，减少赤字。这就是为什么1988年时尽管密特朗总统既不支持私有化，也不赞成国有化，社会党人仍然能够在1991年至1993年进行了部分私有化，开放了雷诺、法国电信和工商信贷银行等公司的资本，使它们重新变成私有企业；右派也在1993年进行了私有化，主要企业包括巴黎国民银行、罗讷－普朗克、埃尔夫－阿基坦和巴黎联合保险公司等。

这一自由主义经济的演变，显著淡化了政府作为“银行家”、“企业家”和“调控者”的角色，同时发生深刻变化的还有法国的金融系统。从1983年至今，法国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增长了10倍，从1万亿法郎变成了10万亿，其中40%是股票。另外，1980年代初几乎不为人知的大众投资（股票投资基金、债券投资基金、货币投资基金和人寿保险等）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显示了储户们对更具活力且回报率更高的为经济发展融资的金融产品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价证券持有者的总数量在1980年代初只有250万人，但1987年就增至1000万人，今天更是已经达到了1600万人。与当时成为舆论焦点的“金色男孩”（虚拟炒股游戏）相比，1986年至1990年间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人民资本主义”的兴起，它揭示了法国社会的深刻演变，使法国的私有化改革取得成功，而且是巴黎证券交易所和CAC40股指腾飞的起源。与此同时，来自英国的浮动资本——“养老基金”开始大规模进入巴黎证券交易所。1997年，大约29%的交易所资本、50%的CAC40股票（法国获得了232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在全世界排在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由非法国居民掌握，高达13.5%的公债也有外国债权人持有。另外，法国企业资本的国际化也是这一金融革命的重要特征。1982年，为保护资本密集型资产免遭外国觊觎者兼并，法国对一些企业实行了国有化；1986年，在意大利人贝内德蒂对法国法雷奥设备制造公司发出公开收购要约后，法国政府为了保证对法国企业资本构成的控制，避免被外国企业兼并，对一些企业按照“硬核”技术进行了私有化。还有1993年至1994年在新的私有化浪潮中进行的交叉换股，也是为了堵住法国企业股本定额不足的漏洞，防止外国

投资者抓住这个真空，乘虚而入。但是，1997 年法国保险公司被德国安联保险公司收购，表明尽管有各种阻挠，法国企业集团资本的国际化发展仍然迈出了一大步，而且还会有其他法国企业步其后尘。由于外国投资者更加注重管理方式、盈利标准和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使法国逐渐接受并吸纳了英美的“公司治理”规则，按照该规则，股东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加强（有可能进行快速惩罚，比如 1998 年 1043 9 月，阿尔卡特公司的财务数据低于股东的预期时，其股票大跌）。

从 1975 年开始，欧洲各国都在尽力向自由主义转变，但其他国家都比法国的转变要缓和得多，因为其他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比法国小。这也显示出法国向自由主义转变的速度之快，仅仅 15 年时间，法国就抹去了本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而且还是在左派在当时大多数时间内掌握政府权力的情况下。

社会分裂和碎片化

1983 年开始的自由主义变革对很多法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任期内和密特朗总统任期早期，尽管经济发展趋缓，两位总统仍然决心保护社会团结和维持“光荣的三十年”建设起来的“福利国家”系统。“福利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承受的高成本，和缺乏深刻改革以调和社会公正和税收两者关系的税务制度，无法阻止法国社会陷入碎片化，这使在过去几十年习惯看到不平等现象逐渐消失的法国人受到了沉重打击。除了国家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以不利于劳动者的方式重新分配，工资待遇的差异在不同劳动熟练程度的劳动者之间，在不同行业之间，在同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也在不断扩大，由此产生了贫富分化。同样还是劳资分化问题，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劳动收入比资本收入承担更高的税负。1981 年，一个总值为 421470 法郎的有价证券组合可以产生 23602 法郎的毛收益，其所得税为 4126 法郎，其缴税比例为 17.8%。1992 年，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该有价证券组合的总值达到了 80 万法郎，可以产生 44800 法郎的毛收益，其所得税仅为 275 法郎，缴税比例只有 0.6%。1981 年时，

总值 520 万法郎的有价证券组合能够产生 19.5 万法郎的毛收益，须缴税 46405 法郎（15.7%）；但到了 1992 年，这个有价证券组合的价值达到了 1000 万法郎，产生 56 万法郎的毛收益，须缴所得税 12131 法郎，另外需缴巨富税 32860 法郎，合计 44991 法郎（8%）。由于股息收入的税务抵免、较低的投资收益税率和资本投资基金收益免税等优惠政策，使资本持有者获益匪浅。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投资有价证券的人平均每年可以获得 4% 的收益，而投资不动产只能收益 2%，A 种储蓄账户则损失 0.5%。至于工薪阶层所需缴纳的税款，从 1982 年至 1992 年，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1981 年一份总计 50577 法郎的工资，和 1992 年一份总计 96000 法郎的工资，缴税比例分别为 12.8% 和 17.4%。普通工人的工资缴税比例增长比干部的还要快，在同一时期，1981 年一份总计 153310 法郎的工资和 1992 年一份总计 291000 法郎的工资，分别缴税 16.6% 和 20.6%；而对于高层干部，1981 年一份总值 290290 法郎的工资和 1992 年一份总值 551000 法郎的工资，缴税比例分别为 23.4% 和 27.4%。这些关于 1981 年至 1992 年时期的观察结果从来都没有被披露，只是后来政府对各比例进行过几次微调：1991 年米歇尔·罗卡尔（综合社会捐）、1994 年爱德华·巴拉迪尔、1996 年阿兰·朱佩先后降低了中高收入者的税率，而 1998 年利昂内尔·若斯潘则提高了巨富税率。这符合此前对 1983 年至 1998 年其他领域的分析结果，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工资、财富和税率的差距拉大，高级别劳动者、遗产继承人和资本拥有者收益最大。

不平等在这样的法国是显而易见的，失业问题更使从前获得的良好社会局面迅速恶化，“光荣的三十年”形成的大规模社会上升趋势因此戛然而止，每个人都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存状况会走下坡路，似乎下一代能够享受比父辈更好的生活的可能性极小。农业领域出口的集中化和共同农业政策的削弱使很多农业生产者的前景扑朔迷离。超市和大型超市的兴起使城市和农村的小商业领域动荡不安。破产和申请破产的数量激增使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很多干部因为遭到受过更好教育的年轻毕业生的竞争，不得不接受更低的

劳动报酬和更恶劣的工作条件。失业沉重打击了公务员以外的工薪阶层，尤其是小于25岁或大于50岁的劳动者，以及缺乏劳动技能或在传统产业领域工作的人。尽管有使政府预算和国家社会账户承受巨大成本压力的“社会保护网”，但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的人为数众多（占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一半在国家就业局登记失业的时间超过了两年），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过了“权利享受期”，也就是说不能再获得任何失业救济金。另外还有那些低收入家庭，此前拥有两份工资，曾经贷款用于消费或购买房产，他们突然失去了总工资收入的一大部分，陷入了沉重的债务之中。这样的家庭的数量在1990年代每天都在增加，自1991年《奈伊埃尔兹法》以来法国政府实施了多项政策，以减轻他们的负债和保护他们的财产，但都没有成功。

1977年，法国统计局开始使用“新穷人”这个词汇。1981年，这些1974年被勒内·勒努瓦称为“被排斥者”的人终于盼到了左派上台，他们期望左派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但1984年的统计结果显示，贫困问题更加根深蒂固，当时大约有100万失业者没有失业救济金，有120万个家庭平均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37法郎。因此，1984年10月，政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通过与公共机构和社会伙伴的合作，暂停断水断电，发放富余的农业产品，增加发放给50岁以上失业者的国家工商业就业联盟连带救济金。1984年至1985年的冬季勉强熬过，1985年至1986年的冬季的形势却更加严峻。政府不得不开放很多地铁站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避寒之所。政府和地方行政机关不堪重负，根本无法堵住社会保障这条破船四处漏水的缺口。

这时一种新的私人慈善和社会慈善模式应运而生，关键人物是修道院长皮埃尔和创办了“爱心食堂”的人道主义者柯吕什，他们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为饥饿者提供饭食，正如让－雅克·戈德曼在歌中唱到的那样：“我无法给你美味佳肴，但至少让你能够吃饱”。由于柯吕什修正案规定的社会捐赠附加减税，众多慈善协会使这种新的慈善模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模式以传统志愿服务为基础，融入了宣传和营销，一下子进入了市场逻辑之中。在此次济困行动中成立

的新慈善协会和那些老协会（比如“世界医生”，这些面向全球的组织重新将重点放在了法国国内）联手获得了总额惊人的善款，1991 年达到了 90 亿法郎，而 1984 年的时候只有 25 亿法郎。“爱心食堂”在 1985 年的冬季一共为 800 万人次提供了伙食，这个数字在 1997 年至 1998 年的冬季达到了 6200 万，当时法国处于贫困线（每月 2300 法郎）以下的人口数量超过了 500 万人，有 70 万法国人被归入“无固定居所者”。从 1985 年开始，贫困指数及大规模求助于私人慈善的人的 1045 数量不断增加。1987 年 7 月 23 日通过的有关“基金会”的法规，为募集更多的善款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各种慈善活动的方法实现了大融合，人道主义资助也应运而生。1990 年 7 月 4 日的新法规使慈善活动获得了更多的便利。媒体与慈善协会结合起来，通过宣传与倡导，使“排斥”一词深入民心，这个词简单易懂，适用于所有无法享受医疗或健康权利的人，以及那些遭遇经济排斥（食品、住所）、劳动排斥（失业）、居住排斥和歧视性排斥（移民、非法移民、艾滋病患者等）。面对四处蔓延并使几百万法国人边缘化的社会碎片化，慈善协会运动适时地从人道和财力上弥补了日显虚弱的公共权力机构；但是这些协会组织各种被排斥者的斗争，从而导致了新的社会问题。排斥作为 1990 年代的主题，与援助和求援、筹款和示威、个人行动和媒体报道紧密联系了起来。1990 年 10 月“居住权”组织成立，这个协会组织致力于在住房危机的背景下，与恶劣的居住条件和不动产投机作斗争（不动产投机的根源是 1983 年的自由化选择、1986 年开始的房租自由化和公共住房援助的锐减）。经过多年的斗争，“居住权”组织转而采取媒体宣传行动，于 1994 年 12 月 18 日占领了位于巴黎“龙”街七号的建筑物，每个法国人都在当日晚八点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了这一事件。其他协会如“权利优先”和“采取一切行动减少失业”也步“居住权”的后尘，采取了各自的行动，他们组织占领行动和游行（比如 1994 年春季开始的，5 月 28 日在巴黎结束的反失业和反排斥“远足”），这些行动涉及了所有的“排斥”领域（住房、失业、知识、残疾、种族歧视、艾滋病等），法国社会一时陷入较长时间的政治、

媒体动荡之中。

1997 年至 1998 年冬季的失业者运动中，传统工会组织也参与其中，尤其是劳动联合总会。在 1995 年 12 月的失业者运动期间，工会组织还对这些“受排斥者”的命运漠不关心，它们当时只专注于保护既得权利。1997 年末开始的失业者运动正值圣诞，节日的氛围更加凸显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巨大反差。左派多数派掌握的政府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感到措手不及，只能小心谨慎地采取了几个紧急措施。当示威者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如工商业就业局、国家就业局或成人职业培训局之后，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接见了领导斗争的几个协会组织的领导人。1998 年 1 月 9 日，若斯潘委托茹安朗贝尔夫人就失业与相应的社会紧急最低对策作出研究报告，这份 2 月 25 日提交的报告是 1998 年 7 月 9 日在国民议会通过的有关“排斥”的法律的基础。

从 1970 年代开始，尤其是在 1980 年代中期，两个不同的进程即社会碎片化（“未被排斥者”之间的不平等的增加）和社会分裂化（“被排斥者”数量激增和大规模贫困）同时发展，严重侵蚀了社会团结，导致了暴力事件在城市里、公共交通工具上、中学校园内剧增，并造成违法行为（尤其在青少年群体内）泛滥，这又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因为普通老百姓是不安全环境的最直接受害者。不安全感加剧了国民的悲观情绪，使人不得不担心法国会就此陷入持续的危机之中，《共和国社会公约》的基础也因此被动摇（极右派政党“民主阵线”的迅速壮大证明了这一点）。1995 年总统选举时，“排斥”问题成为选战的核心所在，1997 年的失业者运动表明这一问题将长时间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但是，如果因为私人慈善和协会组织对政府的质疑的迅速发展，使人联想到“福利国家”在走下坡路，而且已经无法履行作为“社会保护网”的职责，并断言必须大规模去除公共权力机构在这个领域的职责的话，那将是大错特错的事情。

实际上，社会团结在反排斥斗争中相当重要，公共财力提供的援助尽管不够用，但其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从 1981 年至 1993 年，全国工商就业联合会为失业者提供的救济金增长了 3 倍，从 350 亿法 1046

郎增加到了 1130 亿法郎，劳资双方缴纳的社会保险公摊金比例因此提高，该机构 1993 年的赤字累计达到了 330 亿法郎。从那时起，全国工商就业联合会意识到由此产生的巨大的财政负担，为了减少政府预算的压力，降低公共赤字，联合会严格提高了获得救济金的条件。全国工商就业联合会的收支因此恢复了平衡，1994 年结余 77 亿法郎，1995 年结余 127 亿法郎，其后果是那些已经无权获得全国工商就业联合会救济金的人不得不领取"最低融入收入"（最低生活补助金）。"最低融入收入"从 1988 年 12 月开始施行，其资金来自同时恢复的巨富税，它旨在为每个 25 岁以上的成年人或抚养至少 1 个孩子的人提供保障，使他们最终能够通过工作重新融入社会。领取最低融入收入的人数，从 1989 年的 42.6 万，1992 年的 67.1 万，增加到了 1994 年的 96.8 万，1998 年该人数甚至达到了 110 万。单身者所得为 2429 法郎，一对伴侣则为 3644 法郎，所有最低融入收入总计 270 亿法郎。不过，"最低融入收入"只是并存的 8 种最低社会补助中的一种，这 8 种补助在 1998 年总计支出了 500 亿法郎，大约 350 万人获益。另外两种主要的最低社会补助是特殊连带补贴和单亲父母补贴：特殊连带补贴每人只有 2400 法郎，发给在国家就业局注册，已经用完自己的失业保险金的人，以及 50 岁以上领取递减失业救济金，而且救济金金额已经低于特殊连带补贴的人，其总人数在 1998 年为 48 万；单亲父母补贴则发给那些抚养一个或多个孩子的单身父母，以及怀孕的人，1998 年时，抚养一个孩子的单身父母可领取 4217 法郎，每增加一个孩子可多领取 1054 法郎，当年一共有 16 万人领取了单亲父母补贴。1998 年 7 月 9 日通过的法律，主要借鉴了茹安朗贝尔夫人有关报告的结论，规定对每种最低社会补助征税，主要针对那些既领取最低融入收入，同时又有其他劳动收入的人，该法律使不同紧急援助之间的协作变得紧密。然而，大规模贫困造成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在领取最低融入收入的人中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实现"融入"，最低融入收入只能使他们从永久受助的幻想中走出来；是否将不同的最低社会补助合并为"统一补助"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最低融入收

入”不够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但是提高该补助并使它与最低工资保持较大的差距又非常困难，否则等于给无业者发放“奖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政府在不对支出和政策进行真正改革的情况下，社会是否能够长时间承担大规模贫困，以及失业、社会保险和退休造成的成本，尤其是这些成本已经超过了有关资产总额所能融资的上限。还有，社会保险公摊金比例和社会公共预算的提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阻碍就业，也就是说，解药反而比病痛更糟糕。直到今天，虽然我们看到了太多不幸，但公共团结协会和私人慈善的联合无论如何还是挽救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主体，使该体系能够安然渡过1975年以来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大规模失业时期。期间经历的剧烈的财政动荡，使人们不由得对福利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为社会团结融资

一个贯穿自由主义变革年代（1983年至1998年）的问题是为社会保险和退休融资。从1971年开始，社会支出就超过了政府预算。早在1987年，总理雷蒙·巴尔就决定实施一项财政振兴计划，该计划对 1047 社会保险公摊金不设上限，而增加社会保险公摊金比例，以应对失业和经济增速减缓为社会保障造成的最初的压力。1979年7月，政府为弥补社会保险赤字，对医疗公摊金额外增收1个百分点。1981年2月，当总统大选临近的时候，该政策被废除。在左派获得大选胜利后，在皮埃尔·莫罗瓦政府中负责社会团结的国务部长尼科尔·盖斯提沃宣称自己不希望成为“审计部长”，她决定改善和重新提高社会补助以促进经济复兴。但社保赤字再次出现，所以1981年11月又开始额外征收1个百分点的医疗公摊金，这意味着工薪阶层被额外征收了总共100亿法郎，企业则被额外征收了10亿法郎。这个政策本来就造成了工会和企业家的不满，政府还计划削弱他们在社会保险机构管理中的地位（1982年7月法令终结了1967年法规确定的劳资对等原则）。然而，赤字的扩大并未得到遏制，1981年和1983年分别达到了68亿和77亿法郎，而且前景令人无法乐观（还需要为实行60岁退休制找

到175亿法郎的资金)。1982年6月29日，尼科尔·盖斯提沃被皮埃尔·贝雷戈瓦取代，她为后者留下了一个“烂摊子”：1981年至1982年，仅医疗支出就激增了18.4%。在1983年的社保计划中，政府决定在1982年应税收入的基础上，额外征收1%（110亿法郎），以补充社会保险资金。这一政策使社保资金的收支重新出现了盈余（1983年、1984年和1985年分别实现了112亿、167亿和134亿法郎的盈余），但1986年再次出现了200亿法郎的赤字，1986年至1990年的社保赤字累计达到了387亿法郎。

由此产生了有关社会保险的双重难题：如何增加社会保险收入，如果扩大社会保险公摊金的征收基础，当时的基础只包含工资和企业。1983年实施的，以及1988年恢复的倾向于提高社会保险公摊金的计划，都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为目标，“综合社会捐”再次出台。“综合社会捐”是一项奇特的税收，它从源头进行征税，对象涵盖所有应税收入，包括退休金和资本收入，从社会角度来说它是最公平的税收，实际上中高收入者受到的打击要大于低收入者。可惜希望它能够解决社会保险赤字的问题，有些勉为其难，因为当时正值医疗支出激增，所以还必须同时想办法控制医疗费用。经过总理米歇尔·罗卡尔与国务部长兼财经部长皮埃尔·贝雷戈瓦——他们反对触及退休人员收入的税收，因为那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在选举中“自杀”——为一方，与劳工民主联合会和工人力量总工会——该工会不同意对社会支出征税，以及削弱那些他们实际控制的社会保险机构——为另一方的激烈斗争，最终在总理承诺以自己为首的政府负全责的情况下，综合社会捐获得了通过（1990年11月19日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投票中，共有284票不信任，只差5票未能推翻罗卡尔政府)。社会保险问题进一步成为社会运动的焦点。实际上，由于综合社会捐增加的社会保险收入(1991年增加了1.1%，1994年巴拉迪尔政府时增加了2.4%）不足以堵上从1993年开始越变越大的赤字窟窿（1993年至1996年间，每年都有500亿法郎)。

因为医疗支出在持续剧增。1992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有

9.4%用于医疗，总计6000亿法郎（1985年才3740亿法郎），平均每个人大约消费11000法郎。法国是全世界人均消费药品最多的国家，年消费总量的增长率在1992年至1993年达到了4.8%，而欧盟的平均水平只有2.2%，德国只有1.2%。所有的医疗机构都人满为患：求诊和出诊在1991年达到4亿人次，而1975年只有1.7亿；1991年X光透视总共有9亿人次，1975年只有2.5亿；1991年化验总共有70亿例，1975年则只有20亿。尽管后来增速有些放缓，但1990年代医疗支出在不断增加，综合社会捐尽管也在增加，但始终不足以补偿医疗支出。因此，为了结束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螺旋式下降，总理阿兰·朱佩1995年尝试实行一种真正的医疗支出控制体系。 1048

早在1993年9月29日，国家医疗险管理局就曾与一些医疗工会达成协议，为医生制定“医疗参考”，用来评估医生对某种疾病作出的治疗方案，即其治疗和检查是否在质和量上都符合参考中的标准（当时每年凭处方购药达到了1090亿法郎），这一方法在“朱佩计划”中得到了系统化。1995年11月15日，总理宣布：从今往后，议会将对医疗支出的变化比例进行投票，只有在议会获得通过的计划（像预算一样）政府才有权实施，由此形成对总计2.3万亿法郎的社会支出的民主控制的机制，填补了存在于医疗支出中的法律真空，并使其透明化。议会通过医疗支出总额后，首先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医疗系统进行分配，然后在地区性医疗部门进行分摊。“朱佩计划”还决定对“医疗参考”实行系统化：“医疗参考”是得到医疗方法较好的合作伙伴认可的医疗方案指南；设置病历，迫使人们先看全科大夫，再看专科大夫，以减少了他们看病所走的冤枉路；另外，严惩医疗领域内任何超过年度授权额度的机构和部门。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还需要进行是否符合宪法的复审（1996年2月），它遭到很多医生组织（除了劳动民主联合会）和工会（因为该计划强化了政府在社会保护管理中的地位，并相应降低了社会合作伙伴，尤其是工人力量总工会的地位）的反对。该计划在1997年发挥的作用，并不足以阻止综合社会捐的增高，1997年1月份为3.4%，7月份则为可抵扣5.1%，不可抵扣

2.4%。1990年以来，每届政府都使用了综合社会捐这个新机制，这证明它的作用很大：每增加1%的社会综合捐，可以带来380亿法郎的收入，而每增加1%的医疗保险，只能带来250亿法郎。社会综合捐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劳动税和资本税之间的不平衡，减轻了劳方在社会保险支出中的比重（从1983年开始，为了使企业的负担不会太重，只有劳方的社会保险公摊比例在提高，而且在1990年突破了上限），而且由于1997年7月社会综合捐的提高，医疗保险公摊开始补偿性降低。然而，与其他收入一样，劳方还必须承担为“偿还社会债务”征收的特别税，相当于收入的0.5%，总计每年200亿，这是由1996年1月为弥补过去的赤字而颁布的法令决定的。

可惜的是，所有这些办法还是无法解决社会保护成本过高这个挥之不去的难题。1998年，赤字再次出现，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振兴计划，开发了新的收入，并从社会保障体系债券服务基金获得了资金，当年的赤字仍然达到了133亿法郎。另外，在若斯潘政府中负责社会保障的部长马蒂娜·奥布丽，于1998年9月宣布了一个在1999年恢复平衡的计划，这是十五年来的第19个计划。该计划首先确定了医疗支出年度渐进的目标（1998年为2.2%，1999年为2.6%），然后在医院、私人诊所和特殊医疗系统之间进行分摊，超过自己限额的医生将受到惩罚。政府设立了一个5亿法郎的基金，专门为在私人医疗系统有关医疗分配、治疗研究的创新行动提供资金，药店则被赋予了将处方中的专利药尽量改成“非专利”药品的权力，因为“非专利”药品的价格比其他药品便宜得多，这意味着制药业在医疗支出失去控制的时候也作出了牺牲。还有最高限额为30万法郎的补贴，发给在岗时间超过5年的自愿离职者。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在1999年使社会保险账户的收支恢复平衡，并且从此能够长期保持下去，因为无论对于劳方、资方，还是其他需缴纳“社会综合捐”的人，社会保险分摊几乎都已经没有增加的空间了；而社会保险支出也不可能进一步减少了，除非增加1980年代开始的、在1990年代确定的偿还抵扣额，这个抵扣额通过增加医疗互助保险（医疗保险的私人化）得到补偿，但这种

1049

补偿给没有能力支付医疗互助保险的人又造成了新的深刻的不平等。

但是，社会保障的资金供应还不是唯一让政府和社会保障领域内的人忧虑的事情。从1990年代初开始，退休问题也成为了一个新的焦点。1981年，法国政府确定了60岁退休制度。当时的情况与现在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除了极少几个发出预警的专家，几乎所有法国人都没有预见到1970年代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失业造成的长期后果，人们只是希望通过适当的家庭政策促进出生率的上升，而低估了妇女职业化对出生率的影响，并期待新政府出台目标更加远大的经济和社会计划，控制住就业不足的灾难。1980年代末，情况就大不相同了。1989年政府之所以制定第十个社会计划，就是因为只有进行改革，才能确保退休制度的未来。当时的总理罗卡尔针对这个问题着手进行了最初的研究。1991年颁布的白皮书建议延长缴纳社会保险公摊的年限，在收入最高的二十五年基础上计算退休金；该白皮书还预计2010年特殊退休体制内的退休人员（公务员和公共服务人员）需要700亿法郎的资金。根据退休金净现值计算结果，1995年时平民公务员需要560亿，地方行政机关人员需要500亿。巴拉迪尔任总理时，推动议会投票通过了致力于防止现收现付退休制度（国家分配制）分崩离析的最早的法案。1993年7月，政府决定将缴纳社会保险公摊的年限从37.5岁逐渐延长至40岁（这实际上使60岁退休制度难以为继），并逐渐用25个收入最高的年份取代10个收入最高的年份为基础计算退休金（这造成每个人的全额退休金的降低）。但是这个改革仅限于私人领域的劳动者，在公共领域工作人员享有的特殊体制并没有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同一个退休系统内，才能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有巨大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朱佩在1995年11月15日的计划中，宣布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修改1993年《爱德华·巴拉迪尔法案》确立的一些特殊退休体制，使它们与普遍的退休体制达成一致。这导致了大量在公共领域工作的劳动者的不满，大规模的罢工迫使这项改革半途而废。改革还引起了激烈的政治辩论，右派宣称如果不设置积累制（资

本化机制)，现收现付退休制度的分崩离析将不可避免。积累制在很多英语国家已经很流行，它是一种退休金的个人预期，每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金都将进入养老基金，养老基金通过投资产生的红利来支付每个人未来的退休金。这种体制不仅得到自由主义者的拥护，还让另外一些人非常向往，因为他们看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本将因此而增加，法国资本主义也将因此增添新的活力。对于支持者们来说，积累制不仅是解决退休金财政危机的良方，还是法国企业发展的兴奋剂

1050 (尤其是德国模式的积累制，企业将被赋予管理养老基金的权力)。左派坚决反对这些危言耸听的计划，他们认为社会团结必然要求实行现收现付制，积累制将导致不平等的加剧（最贫困的人群将无法享有补充制度，因为他们在分摊中贡献最小)，并坚信社会综合捐可以使社会保险账户充盈，希望经济强劲增长能够得到恢复。考虑到即将开始的选举将会异常激烈，贝雷戈瓦建议设立一个总额为 1000 亿法郎的退休特别基金（“国家分配准备金”)，该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和保险行业的私有化收入。这样做可以更加直接地从总理主张的“不偏不倚”的困局中走出来，一方面重新开始财政部长和财政部内的自由主义者们期待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可以把这些不再是国有企业的、但属于全体法国人的财产用来为退休保险融资，而不是降低赤字。尽管在社会党（支持设立基金，但坚决反对开始新一轮私有化）的反对下，政府无法将该计划进行到底，但这个草案显示出分摊和退休基金是可以用一种新颖的模式达成一致的，即介于左派的正统观念和右派的自由主义观念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辩论由此展开：1996 年朱佩政府解体后，有关辩论再次开始。既然那些特殊退休体制无法改变，至少可以向退休金基金方向努力。尽管缩手缩脚的《托马斯法案》在 1997 年 2 月得到议会投票通过，但 4 个月后议会多数派的改变，旋即为这个法案敲响了丧钟。1995 年，布里耶完成了有关退休储蓄的报告，预计退休账户的融资需求从 2005 年开始将会增加，另外从 2015 年开始，私有系统的退休金状况将会恶化，社会保险共摊将被迫增加（根据各种“情景”推测，增加幅度在 1.8% 至 6%—7% 之间)，而那些特殊

的退休体制所需增加的社会公摊将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左派在掌权伊始，马上就恢复了设立专门基金的主张，马蒂娜·奥布丽在她的立法提案中，建议对1999年社会保险提供资金，她计划延长1993年巴拉迪尔政府确定的根据物价指数计算退休金的5年（1994年至1998年）计划，设立一个保障基金，帮助现收现付退休制度安然度过2005年至2015年这一退休高峰期，那些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法国人将陆续在这一时期退休。这个基金的资金来源是储蓄产品、私有化收入和（偶然性很大的）社会保险账户盈余，根据国家统计局长让-米歇尔·查尔潘就退休问题所作的调查报告，总理若斯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社会保险账户将很可能因此出现盈余。尽管《托马斯法案》被冻结，总理若斯潘激起政府团队仍然希望保留现收现付退休制度，和设立保障基金，并对在1999年开始创立一个积累制退休系统持开放态度，这个积累制退休系统应该是普通退休制度和保障基金的补充，就像是一枚火箭的第三节助推器。现在还需要解决始终众多特殊退休体制并存的棘手问题，1998年时一共有约400种，而且特殊退休体制内包含240万公务员150万地方行政人员。当时，特殊退休体制的成本对纳税人意味着1500亿法郎，因为这笔钱因社会保险公摊账户的不足而被列入了国家财政预算。特殊退休体制之间也很不一致，比如剧院的舞蹈演员40岁退休，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一线工作人员50岁退休，军官从戎25年后可退休，拥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在工作15年后也可以退休等。社会保险公摊的比例也大不相同，退休金的计算模式更是纷乱复杂。总的来说，特殊退休体制比传统的养老保险更有吸引力，这些不同的体制也分四档，所以它们的重新融合非常必要，但是在政治上非常困难。

不论采取怎样的解决措施，当人们看到养老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67年的6.5%增加至1998年的12.2%，而且期间退休收入增加了2.5倍，增长速度超过了就业人口时，就不难想到占总人口五分之一的退休人员获得的养老金融资来源的重新界定是无法长期避免的。

1967 年至 1998 年，养老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6.5% 增至 1051 12.2%，退休人员的收入比就业人口的收入多增长了 1.5 倍，这些数据让人不难想到（占总人口 20% 的）退休人员将无可避免地遭遇养老资金短缺的问题，为养老找到的新的资金来源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因此在 21 世纪初面临大规模失业、社会分裂和碎片化、劳动的深刻变化的法国，必须想方设法整平保障社会团结的融资机制，使其对最贫困者更加公平；使其更能被劳资双方所接受，而不会对收入和就业产生反作用；使其更加简单化，以便更有力地控制成本和效率。由于 1975 年至 1998 年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光荣的三十年”形成的“福利国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凝聚在一起亟待解决。

二、政治生活

蓬皮杜总统在他的回忆录《戈尔迪的绳结》中这样写道：“我们身处的时代，不像被王宫贵族簇拥着整天待在凡尔赛宫里的路易十四的时代……而更像“圣路易”（路易九世）国王的时代，他坐在橡树下，身边围绕着向他倾诉生活疾苦的人民。”从 1970 年至二十世纪末，法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恢复了欧洲的民主标准。在法国四周，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欧洲各民族有些或早或晚（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实行了传统的民主政治体制：君主或总统，并不直接执政，而是行使着象征性和代表性的权力；政府则必须对议会负责，其主导者总理拥有常规的行政权力；议会拥有广泛的监督政府的立法权和对法案投票表决的权力；通常独立的司法机构则构成了不容忽视的第三种权力。当然，这种三权分立和平衡的结构，因每个国家实践的差异而会表现出一些不同。另外，尽管行政首脑（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德国的赫尔穆特·科尔、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由于任期较长，其个人威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制度的结构平衡造成影响，但还不至于破坏三权分立。众所周知，法国在 1958 年之后，尤其从 1962 年开始，实行的是另一种制度模式。不过，

“戴高乐时刻”尽管在其继承者蓬皮杜任总统时得到延伸，但其最初的纯粹性实际上只延续了 12 年，即从 1962 年至 1974 年。从那时开始，尽管没有按照习惯修改宪法，但法国还是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到了更通常意义上的民主道路，这种方式被称为“选举换频”，目的是为了减少国家元首的绝对优势，在行政系统内，在立法和行政之间，在国家和地方之间恢复权力的平衡，这种方式还包括对一些（司法的、媒体的）新政治角色的意外的甚至生硬的确认，目的是实现权力之间更好的平衡和更有效的分立，即民主的规则。从 1960 年代专制主义下的稳定到今天有组织的不稳定，从将大量权力集中到一人之手到多极并立，法国的政治生活放弃了在欧洲独一无二的史诗般和激情的那一面，重新获得了民主的生命力。有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代表的危机”，但其他人认为这是法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政治动乱后（第三共和国的倒台、维希政权、第四共和国和戴高乐与蓬皮杜任总统时的第五共和国），终于回归正常的民主政治生活。

一元时代的结束

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总统的那几年，不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其他很多领域，法国都处在一个变革的试验期，经过 1958 年至 1974 年的一元时代，法国开始走向多元时代。首先新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不属于戴高乐派，其次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得益于戴高乐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希拉克这个戴高乐派“叛逆”人物的崛起，还有多数派内部突然出现的裂痕，这些分裂导致了“总统党”（法兰西民主联盟）和“不，但是党”（保卫共和联盟）在多数派中的并存。此后，尽管吉斯卡尔·德斯坦与其总理雷蒙·巴尔将爱丽舍宫—马提尼翁府（总统府和总理府）两头行政体制，恢复到由爱丽舍宫唯一主导行政的体制，但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必须与议会、多数派各政党、以及这些政党的选民长期妥协，以确定前进的道路。他不得不面对来自多数派内部的反对，主要来自保卫共和联盟与其领袖希拉克。他无法落实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比如欧洲政治计划和自由主义经济计划。

1052

他还不得不率领法兰西民主联盟进行各项政治斗争，有些斗争取得了胜利（比如 1978 年的立法选举和 1979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不过并没有能够拉开与保卫共和联盟之间的差距，使自己的政党赢得足够的自治空间；另一些更具象征意义的斗争则遭到失败，比如希拉克在 1997 年巴黎市政选举中击败了米歇尔·道尔纳诺，市政选举批准将巴黎市长制度恢复正常，希拉克于是成为“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一位巴黎市长。1981 年总统大选时，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还遭到来自希拉克所谓“高善的呼吁”[①] 的攻击，这个文件质疑吉斯卡尔·德斯坦多数派的合法性，而如果没有这个合法性，爱丽舍宫的主人是无法成为戴高乐希望的共和国君主的。

多元化不仅在总统联盟广泛存在，而且在巴黎、在行政决策中心、在法兰西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组成的奇怪的政党联盟控制的立法决策中心得到了深度的发展。在法国这样一个并没有从理论上完全摒弃雅各宾派中央集权思想的国家，尽管越来越多真正的地方权力兴起，而且政府也向它们下放了一些职权，但还不至于走出地方分权制度化这一步。地方、地区和市政选举不仅是国家政治的试金石，也是权力的关键所在。尽管在选举中占据很重分量的法国农村有着保守主义的传统，但右派在 1976 年地区选举中还是遭遇了不小的挫折（反对派收获颇丰），尤其在 1977 年市政选举中，左派在第二轮选举中成为多数派，赢得了 57 个人口超过 3 万的城市，这样左派一共掌握了 221 个城市中的 156 个，其中社会党 81 个，共产党 72 个。于是，从民主的角度来说，选民将中央政府托付给了右派的同时，将地区行政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交给了左派，这种选择再次实现了权力的平衡。可不可以进一步说，这意味着在中央权力本身，在行政和立法之间已经实现了政治的二元性？这种局面如果在几年前出现会显得非常可笑，却在 1977 年 3 月市政选举至 1978 年春季的立法选举之间成为辩论的焦点。看起

① 即 Appel de Cochin，刚刚遭遇一次车祸的希拉克当时正在巴黎的高善（Cochin）医院接受治疗。

来左派很有可能一举成为议会的多数派，那就导致怎样的政治局面？这正是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政治上的革新所在。1978 年 1 月 21 日，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杜河河畔凡尔登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他并没有说“要么支持我，要么陷入混乱”，也没有要挟说“要么支持我，否则我就辞职”。与其夸大选举结果的得失，拒绝左右交替的主张，固执地坚持左派的立法多数与右派的总统无法共存，他发展了另外一种划分，一种新的对制度的阅读，一种使国民平心静气地接受而不是暴跳如雷地反对的逻辑。吉斯卡尔·德斯坦是法国人选举出的总统，任期 7 年，他宣称自己把这个使命看得比任何选举都重要，希望能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直到任期结束，而且宣布在任期内不想也不会阻止左派联盟政府的计划的实施。这个讲话本身就是一次制度的革命。吉斯卡尔·德斯坦发表讲话的时候，左派获胜还只是可能性较大的一种假设，但 1978 年 3 月，这种假设变成了现实。尽管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请人民做出“明智的选择”，支持自己的右派联盟，但法国人还是选择了左派，于是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无严重冲突的多数派转变，总统多数派和议会多数派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开始被看作是“正常的”（这并不意味着总统乐于接受这个现实，也不意味着所有法国人愿意看到这个局面），行政权力开始从爱丽舍宫向马提尼翁府部分转移。从此左右交替的观念被法国人广泛接受，而不会引起一些未经思考的恐慌，行政权力上的左右共治也变成一种可以预期的组成模式。正因为这一点，吉斯卡尔·德斯坦的 7 年总统任期，成为对产生于 1958 年的政治制度的阅读的决定性转折。

1053

从左右交替到左右共治

从 1981 年至 1986 年，尽管经历多次严重的政治动荡，但法国传统的狂热并没有因此复活，现行制度也没有因此受到严重质疑。政治家们主要就现有制度的文字弹性进行争论，而不会想要去彻底推翻重来，法国人发现在平静的气氛中，也可以使政治格局发生深刻的改变。首先表现在 1981 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因为密特朗是

戴高乐主义坚定的反对者和顽强的敌人，是戴高乐制定的制度的猛烈抨击者。这个结果肯定不能完全归功于左派取得的决定性进展（在总统普选的第一轮，左派5名候选人共获得47%的选票，其中密特朗26%，乔治·马歇15.4%；右派5名候选人共获得48.7%的支持，其中吉斯卡尔·德斯坦27.8%，希拉克18%；而从众多混杂的“小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生态学家布里斯·拉隆德获得了3.9%的选票）。不过，社会党候选人和共产党候选人之间巨大的选票差距，显然对前者有利，社会党因此免受政治勒索，而共产党则不得不接受一个社会党人做总统。但是，如果右派能够动员起来，团结一心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社会党尽管凭借对共产党的巨大优势能够获得左派选民的广泛支持，也仍然难以保证能够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确实，吉斯卡尔·德斯坦已经丧失了1974年那个充满活力的变革者和年轻有为的管理者的光辉，除了7年在位的消磨，一系列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事端（包括朋友路易·德·布罗格里、前部长约瑟夫·丰塔内和现任部长罗贝尔·布兰的被谋杀和自杀，还有接受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的钻石馈赠一事等）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大规模失业，以及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加重的通货膨胀等问题，使吉斯卡尔·德斯坦不再拥有稳定的民意支持和较大的连任可能性。吉斯卡尔·德斯坦最终在总统选举第二轮以47.8%比52.2%输给了密特朗，很多人认为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保卫共和联盟从第一轮就开始的捣乱，以及奉行自由主义的、主张欧洲建设的法兰西民主联盟与坚守戴高乐主义的信条——即更加推崇国家干预主义和意志主义、更注重政府的主导地位、更强调民族——的希拉克党之间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很多右派选民因此失去了投票的积极性，相当数量的希拉克和米歇尔·德布雷的支持者没有参加第二轮投票，其中有些人甚至把票投给了密特朗。所有这些因素，以及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偶尔表现的傲慢，和经常显现的专横（尽管他在任期的最初几年努力尝试着做一个最不像“皇帝”的总统，也取得了赢得人心的效果），使法国人民下定决心，在戴高乐将军重新掌权二十三年之后选择了左右交替。反常的是，尽管被很多人预言

这次左右交替将会导致第五共和国的制度遭到破坏，但结果并非如此，第五共和国的制度不但得到了加强，而且因此焕发出新的光芒。尽管很多社会党的要员迟疑不决，他们担心刚从一场恶梦中醒来的法国人，会在第一时间变卦，不愿意和右派占据多数的议会妥协和并存的新总统密特朗还是决定解散国民议会，他使用了自己曾猛烈抨击的共和国宪法所赋予总统的几个重要武器中的一个。这个决定获得了巨大成功，1981年6月14日和21日的投票，由于多数投票制——要知道，密特朗在选举时承诺的110条纲领中包括恢复比例投票制——的放大作用，密特朗在国民议会获得了优势极大的多数地位：社会党和左派激进党赢得285个席位，共产党44个，其他左派获得5个；而右派中保卫共和联盟有88人当选，法兰西民主联盟有62人，其他右派只有7人；密特朗的社会党单独就占据了国民议会的绝对多数（285/491）。密特朗从此有五年时间按照最纯粹的戴高乐主义的传统管理政府，即总统拥有完全的行政权力，他可以实行比前任们都更彻底的爱丽舍宫（总统府）干预主义政策，全面介入各种国内事务；对马提尼翁府实施监管，总理皮埃尔·莫罗瓦死心塌地地扮演“总管”的角色，忠实地贯彻爱丽舍宫的意图；这种“尾巴主义”可以媲美1960年代新共和联盟中议员的“无条件跟从”，波旁宫[1]因此被禁锢在专门负责登记总统决策的角色上，这正是第五共和国宪法白纸黑字的精髓所在。于是，行政权力在法国政治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其核心是共和国总统密特朗，他最初几年的统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与戴高乐将军真正当政的最初几年非常相似，当时蓬皮杜在1962年10月28日的全民公投和1962年11月18日和25日的立法选举后，被委命主管马提尼翁府。记者招待会仪式、电视讲话、到外省巡视、参加国际峰会（比如1982年6月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峰会），总统职位的光辉在所有人眼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蓬皮杜在1974年的反思中所说的正好相反，更像“太阳王”路易十四，而不像坐在橡树下的“圣路易”国王。

1054

① 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

但是这种对总统的尊崇并不是旧制度纯粹而简单的回归，首先总统本人也不愿意这样。实际上，密特朗忠实于自己的计划，决心进行根本的改革，从深层次改变权力在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分配，即实行地方分权。城镇、省、大区各级行政机关第一次获得了完整的法人地位，它们被赋予了一些新的权力、一些扩大的职能和一些额外的财政收入。经过多个世纪以来的君主和共和权力集中化，法国在1982年3月3日通过了《德菲尔[1]法案》，从此终于进入了地方享有自由行政权力的时代，该法案明确了"城镇、省、大区的权力和自由"。实际上，该法案的实施仅仅是一连串改革进程的开端，权力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平衡将经历深刻的改变，中央政府将放弃一些权力，而地方政治的得失成败将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关键所在。当然，法国的地方分权与几个邻国实行的联邦制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联邦制意味着中央政府只有有限的权力，而地区和城市的权限则宽得多，德国的联邦制由宪法确定，西班牙是事实上的联邦制，而意大利则是程度相对较低的联邦制。但是，法律有着放大事实的作用，地方的国民议会、地方行政机关、尤其是代表这些机构的个人——省级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大城市市长等——通过法律，通过他们的人格、实行的政策、与选民的密切关系，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很重的分量，彻底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格局。众所周知，法国在十九世纪经历了"显贵当权"的时代。那些由地方分权产生的地方政治家，通过普选成为地方议员或行政长官，他们由于职权的累积，很多都进入了国民议会或参议院，他们有着强大的政治、司法、财政和媒体力量，即便强大的中央政府，也不得不与他们妥协，这些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议会，尽管这个议会在制度上并不存在，但确实是权力的重要一极，更不用说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在位多数派的反对者，这实际上降低了爱丽舍宫及其附属机构（马提尼翁府、议会多数派）的无所不能的地位。而且，在1981年让总统赢得了议会多数派地位的法国人，自然不

1055

① 时任内政部长。

会放弃像他们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时期所做的那样，通过投票实行必要的再平衡，尤其是在这个已经实行地方分权的新环境中。1982年3月14日和21日，右派在省级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凭借49.92%对49.59%的优势，右派掌握了59个省，而左派只有36个。1983年3月6日和13日的市政选举的结果与此相似，尽管左派在第二轮投票中迎头赶上，但右派还是取得胜利，掌握了很多大型城市。1986年3月21日的大区普选中，右派又取得了绝对优势的胜利，一共赢得了22个大区的行政委员会主席职位，左派则只有可怜的两个。于是，只用了几年时间，拥有了强大权力的地方行政部门变成了右派的森严壁垒，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首脑影响力较量的微妙的关键所在。

另外，总统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和再平衡的愿望，还具体表现在第五共和国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即已经成为其他民主国家支柱的第四种权力——视听机构，也就是新闻媒体。传统上，新闻媒体一直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第五共和国时的政府广播和电台一直都是政府首脑的喉舌，即“法兰西的声音”。这种在1968年饱受抗议者抨击(“来自家中的流毒”）的无限的依附关系，使新闻媒体成为官方进行宣传的顺从的工具。尽管并非完全如此，但1958年至1982年之间基本上就是这样。1982年，密特朗为了履行总统选举时的承诺，推动了有关新闻媒体的法案的投票，该法案在1982年7月29日通过，终结了政府对新闻媒体的垄断，创立了新闻总署。新闻总署8月31日正式成立，第一任长官是女记者米歇尔·戈塔，这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与宪法委员会有着相同的委任模式，其任务就是保障广播和电视的自由权利，总署拥有任命广播台和电视台主管的权力（从前由部长会议任命)，负责监督新闻规范的执行，以及审批广播节目的播放申请。1982年7月的新闻媒体法案的立法工作开始于1981年9月的“自由广播”行动，后来该法案在1984年春季加入了有关广告的内容，这个法案的通过对公共媒体恢复政治自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从1984年和1985年开始，公共广播和电台还要面临来自私人频道的竞争，比如限定收视的付费频道“Canal +”和其他免费的电视频道，如五台和六台。新闻媒体的多样化和独立还开辟了另一个进

程，尽管其影响最终经过很长时间才显现出来：社会党当局想方设法左右新闻媒体主管的提名，甚至试图瓦解罗贝尔·埃尔桑建立的媒体帝国，这表明政府监管新闻媒体的企图并没有完全消失；右派在 1980 年代也有类似的举动。不管怎样，民主的新空间就此打开，法国人从此能够享有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公共新闻媒体与私人媒体展开激烈的竞争，有关政府部门从当局逐渐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力。媒体权力的突然兴起，就像我们在 1990 年代将要看到的那样，在对很多“事件”的处理上，和地方分权一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减少了政治生活中因总统的权威和多数派的优势地位造成的“一边倒”的倾向的出现。

从前的一元化如今已经让位于多元化，这并不取决于总统的个人意愿，而是制度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反应交汇的结果。另外，1981 年发生的左右交替，让曾将尽量放大行政权力作为政治信条的右派重新发现了议会的优点和作用。右派重新意识到，议会肩负着以民主为目的监督政府，制定法律，成为向公民澄清重大公共争论问题，并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观点的“音箱”。面对那些很快就沦为议会的消极力量的“无条件跟从”的左派议员，右派想方设法表达自己的意见。1981 年 10 月 13 日至 26 日，在讨论有关国有化问题时，右派发动了一场“消耗战”，以至于总理莫罗瓦 19 日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呼吁“法国人的多数派不能容忍成为少数派的那部分人阻碍正在发生的改变，不论是在议会，还是企业或其他地方”。在这个奇怪的宣言发布后不久，社会党人 10 月 20 日至 22 日在瓦朗斯举行大会，会上再次揭露了右派“遏制改变”的企图，这对当时尚对年初的左右交替感到满意的社会舆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反对派受到鼓舞，更加积极地展开议会斗争，右派在国民议会是少数派，但在参议院仍然占据着多数派的地位。不仅有关地方分权的《德菲尔法案》，还有有关劳动者新权利的《奥鲁法案》，以及有关媒体的《菲利乌法案》，右派都向左派展开了激烈的进攻。正是在这些火花四溅的辩论中，一批四十多岁的右派政治家成长了起来，他们代表着戴高乐主义的卷土重来，他们依靠地方分权形成的地方堡垒，成功获得了政治显贵的地位，包括米歇尔·努

瓦尔、夏尔·米庸、吉拉尔·隆盖、阿兰·马德兰、菲利普·塞甘、雅克·杜崩和弗朗索瓦·雷奥塔尔等，还有更多的人从议会半圆梯形会场走上了政治舞台的前台，而一些代表着过去时代的政治家，如吉沙尔、德布雷、佩雷菲特、福瓦耶和波尼亚图斯基等人则逐渐退出了政治斗争。右派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法案获得通过，但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论据的价值，培育了公众讨论，满足了自己的选民，在公共舆论中播下了种子，这些种子在未来左派遭遇困境的时候自然会开花结果。右派还不忘记诉诸宪法委员会，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74年10月29日促成的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超过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者60名参议员有权将法案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其目的是为少数派提供的最后的反驳机会，从法律上稍微削弱实际多数派的无所不能，右派充分利用了这个修正案带来的便利。于是，有关国有化的法案被提交给了宪法委员会的9名委员审议，1982年2月16日，宪法委员会宣布该法案除了有关给股东的补贴以外，符合法国宪法。于是政府在征求了最高行政法院的意见后，提交了新的法案文本，并按照宪法第49条第3款利用快简程序（无不信任意见时无需投票即通过）使该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左派这一次运用了1958年宪法条款中抑制议会权力的最重要的一条。左右两派还在其他法案的文本上锱铢必较，包括1984年有关媒体的法案（这个法案最终也是得益于宪法第49.3条款才获得通过），宪法委员会在分析其政治内涵后，宣布该法案中致力于瓦解罗贝尔·埃尔桑媒体帝国的措施因追溯力的原因不符合宪法的精神。

最终，制度的再平衡因公民社会的抗议得以实现。法国人民选择了左派，选举了一个社会党人作总统，但是法国人民还没有做好接受密特朗竞选时提出的全部110条纲领包含的改革，也不能完全接受政府为了满足多数派、多数派各政党及其选民的意愿而进行的变革。在密特朗上台伊始的“蜜月期”过后，构成社会主体的很多团体通过斗争，反对或逼迫当局做出一些妥协或放弃。来自工业或商业的大大小小的老板们组织了起来，他们反对政府推行新法规以及增加企业社会保险支出。企业的干部们则担心《奥鲁法案》使他们在企业的权威受 1057

到挑战，他们还为增加的税务压力气愤不已。农民们对他们的女部长埃迪特·克勒松颇为反感，因为他们感觉没有得到新政府的爱护，害怕她积极主动的举措会破坏法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的稳定和对法国农业“几乎垄断”的地位。医生则上街游行，反对医疗研究改革和公立医院“私人病床”的取消。私立学校也第一次动员了起来，他们非常担心倾向于公立学校的教育部长阿兰·萨瓦里、社会党议员和执政党，会按照总统竞选时的承诺，取消教育的二元性。从此，占据街头、首都和各大城市的主要是右派的民众。工薪阶层和自由职业的中产阶级、农业人群，以及也发现了大规模动员、上街示威和新闻自由的益处的资方，都因利益受到损害而对政府产生了不满，右派议员则将这些不满传递到了议会。当局尽管拥有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占据着多数派的地位，但也不得不正视公民社会在政治生活中最来越重的分量。另外，当局不久就必须在两条阵线上作战，曾支持左派的商业选民面对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触及汽车业和冶金业的解雇潮，也开始发出抗议的声音。由于社会改革和工资水平的提高，1983 年的局势变得严峻起来，当局的社会支持率明显下降；工会自然也会把工人阶层的不满表达出来。面对权力已经被削弱的行政当局，一些新的力量也进行了上街游行的动员。1984 年上半年，抗议主要集中在私立学校的问题上。经过一系列不间断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示威，6 月 24 日运动达到了顶点，大约有 100 万人走上巴黎街头，最终政府只好屈服，于是《萨瓦里法案》被取消，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总理莫罗瓦也主动离开了马提尼翁府，1984 年 7 月，法比尤斯接任总理。

此时，法国的政治生活和制度状况与 10 年前的设想几乎完全不同：行政权力被削弱、议会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宪法委员会也有机会发挥作用、地方行政机关得到加强、新闻媒体重获自由、全社会都被动员了起来。吉斯卡尔·德斯坦主义和左右交替就这样促成了民主的重生，第五共和国建立起来的政治构架也趋向开放、平衡，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民主规则更加接近。出现在 1986 年至 1988 年之间的左右共治，将进一步推动法国充满矛盾地实现“恢复正常”。

左右共治，"使用说明"

左派在1986年3月立法选举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早在1984年夏季，不论是右派，还是占多数的左派，对此都有强烈的预感，1985年3月10日和17日的省级选举以及民意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左右共治的局面不可避免，但也取决于一些因素。左右共治成为现实，必须有几个重要的条件同时得到满足，而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实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包括左派的改变、右派新的施政方针和社会舆论的转变。

对于左派来说，民选总统密特朗要想履行完自己的7年任期，必须成功地将自己的职位、政治观点和人格，与他的政府在立法选举中遭遇的失败区分开来。总统从1984年伊始就着手努力这么去做，而法比尤斯出任总理不久，就在法国电视二台的《真相时刻》中谈到与总统的关系时，宣称"他是他，我是我"，"这一点将有目共睹"。爱丽舍宫和马提尼翁府之间分离的、但又复杂的协作关系即将确立，这是行政权力内部第一次出现左右共治的局面。此前，马提尼翁府根据宪法第20条的精神已经扩大了职权，而爱丽舍宫根据宪法第5条的精神主要发挥主导作用。爱丽舍宫对马提尼翁府的控制在减少，总统经常在顾问们提交的文件上批示"请总理定夺"或"这由政府处理"，这也反映出总统与法比尤斯协作的意愿，希望后者能够掌管国内事务，尤其是社会和经济事务，而自己则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国际、国防以及"专属于元首"的问题上。总统希望自己"高高在上"，而总理则具体负责管理工作。他成功地实现了"升天"，从此凌驾于普通的政治斗争和日常的成败得失之上，主要起到代表政府的持续性、制度的延续性、军事的安全性和维护国家的重大国际利益的作用。他用法国的方式为自己铸造了一个"制度化的君主"的形象。通过主持1984年6月24日至25日在枫丹白露召开的欧洲委员会会议，到1984年9月22日与德国总理科尔在凡尔登举行的仪式，通过接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共体"和欧洲单一市场，到各种国际峰会上的双边访问，密特朗

1058

总统到处都表现得像一个法国在其中充当最重要角色的欧洲的坚持不懈的朝圣者。利用自己“核武器支配者”的身份（他在 1983 年这样说过：“核威慑战略的关键所在，就是我”），他在“欧洲导弹”和人权等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独立自主的交涉。密特朗还作为“法国的伟大”的化身，积极奔走于华盛顿和莫斯科两地，周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他与一方不卑不亢地结盟，与另一方建立了稳固的对话机制，他处处高举法国的旗帜，让自己的总统角色得到每个法国人（不论政见如何）的承认。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者，密特朗经常视察部队，表明他始终关注法国在这个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地区危机和恐怖主义而混乱不堪的世界上的自身安全问题。总统这个角色按照一种恰如其分的公关策略巧妙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媒体特别是电视使这一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他要么和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大决策者们一起出现，要么被军人们“众星拱月”着出现在战车、飞机、火箭、潜艇之前，伫立在三色旗下，并越来越经常地现身在欧洲的旗帜之下。威严的密特朗仿佛就是慷慨激昂的朱庇特[①]，他与世界各国深入交流，但每时每刻都显现出维护法兰西的利益和伟大的力量和决心。总统不仅以一种精妙的方式超脱于政治阶层之上，同时还努力与公民重新建立亲近的关系。想要成为“走出宫廷的路易十四”或“回到宫廷的圣路易国王”，总统必须在另外一个战场，即通过公关重新赢得失去的民心。1984 年 11 月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密特朗已经成为第五共和国以来支持率最低的总统。于是，1985 年 4 月 28 日，密特朗总统出现在了法国电视一台由伊夫·穆鲁吉主持的《总统先生，我们对这个感兴趣》节目中，他当时身穿浅灰色法兰绒西服，扎着一条杂色的领带。那个非常繁忙的演播室充斥着电视台常用的颜色如蓝色和深红色，在这里人们认识了一位“时髦的总统”或“有线电视总统”，他保持着必须的严肃，但需要时又显得很风趣。当天的收视率达到了 47.7%，几乎有一半的电视观众看到了密特朗的新形象，以至于第二

① 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天的《世界报》上刊登了素描画家普朗图创作的速写画，密特朗总统在画中身穿有着朋克风格的线条的经典骑士夹克装，胸前还佩戴着徽章。密特朗总统的这次电视露面毫无疑问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的打扮看起来不经意，但实际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通过与社会的调子保持一致，密特朗重获了与社会舆论尤其是年轻人的默契，并获得了“大叔”的爱称。经过不断地努力，总统的亲民形象终于扭转了民意支持率曲线的走向，使该曲线在选举来临之际重新攀升到了50%以上。民众喜爱他的为人，尊重他的工作，赞同他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密特朗成功地实现了“升天”。

1059

但这还不足以保证他稳坐爱丽舍宫，他还必须避免立法选举成为一场左派的崩溃，或有利于右派的海啸。对选举进行的各种操纵和政府展开的一系列行动，将证明密特朗对此有着切实的担忧。密特朗在竞选总统时提出的110条纲领中的第47条，提出了“比例代表制”选举制，这是左派政治财富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当左派处于反对派地位，“比例代表制”是对左派非常有利的主题之一，他们抨击右派坚持的“两轮投票多数制”在极化的背景下会造成议会的代表性偏离现实，而让以总统为核心的多数派联盟获得排他的和过多的利益，从而加大权力的不平衡。但是，在1981年密特朗当选总统，并且解散国民议会进行了重新选举之后，不论右派还是左派都忘记了密特朗的这个承诺。在这次立法选举前夕，右派的优势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一心只想着争取压倒性的胜利；而尚为议会多数派的左派已经明显看到自己的“滑铁卢”就在眼前了。为了“尽量挽救颓势”，左派有必要把第47条纲领提出来，并促成它的实行。尽管遭到反对派的激烈批评，该法案1985年3月3日还是在议会获得通过，农业部长米歇尔·罗卡尔认为左派这样做有悖政治道德，愤而辞职。这种新的选举模式，不仅能够起到减少左派的损失，还有分化右派和最近形成的极右派的作用，避免极右派的选票在第二轮多数投票中转移给右派。左派揭露了一部分右派议员与被指责奉行种族主义的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的同谋关系，这是一着妙棋，但是左派忽略了抨击形成这种同谋关系

的几个原因、尤其是在失业和治安状况恶劣的背景下发生的严重的城市危机，已经吞噬了很多大规模居民区的郊区。

为了让这种减轻1986年选举可能造成的冲击的战略取得成功，社会党还必须把在1984年欧洲议会选举时的20%的支持率提高到30%以上。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比例，意味着从1984年开始单独执政的社会党，在1981年总统大选取得权力后，经过在艰难形势下的5年工作，还远没有到被完全否定的地步（在第一轮投票与左派激进党联合的情况下，社会党1978年获得了25%的选票，1981年为37%）。因此法比尤斯和他的政府的任务是至少保持这个水平，凭借年轻、富有活力和现代型的团队，法比尤斯做到了这一点。他成功地安抚了民心，向自由职业者和老板们保证将继续进行工业结构的改造，而又不让"左派的人民"感到失望，"左派的人民"一点也没有觉得他支持"新自由主义"，而是将他视为抵抗右派的"撒切尔—里根主义"的堡垒，右派此时至少在言语上已经接受了流行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和芒什海峡对岸的英国的极端自由主义。1986年3月的选举结果证明，密特朗总统、法比尤斯、几位社会党党魁和一些公关专家在1984年确定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重新联合的社会党和左派激进党一共获得32.65%的选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共产党得票（9.78%）的减少放大了这个胜利，左派一共获得了215个国民议会席位（其中共产党35席）；而右派获得了41%的选票，在国民议会赢得了优势不大的多数地位，占据了274个席位，其他右派取得了14席（3.5%的选票），而国民阵线仅次于共产党，获得了9.65%的选票支持，在国民议会占据了35个席位。

尽管左派并没有失去信誉，但右派将这次选举的结果视为对1981年总统选举的否定，他们要求密特朗总统像戴高乐当年那样主动离开爱丽舍宫。不过社会党仍然较高的支持率、保守党（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继续遭到削弱的地位（1978年46.3%，1981年43%，1986年41%），以及国民阵线支持率的猛增，都淡化了右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成功，而且与1984年和1985年时的预期相去甚远。

右派的吃亏在于轻视了总统和总理这对行政搭档的智慧，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支持率，另外还忽视了来自国民阵线的竞争，国民阵线的领导人让－玛丽·勒庞有效地开发了右派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提出的一些主题。右派最严重的失误是在1986年立法选举很早之前就接受了左右共治，而且关键的问题在于发出这个声音的居然不是接受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78年的立场的法兰西民主联盟，而是一个当时尚不为大众熟知的希拉克—蓬皮杜党人爱德华·巴拉迪尔。巴拉迪尔在1983年9月16日刊登在《世界报》上的一片文章中，赞扬了宪法的灵活性，认为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在爱丽舍宫和马提尼翁府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呼吁法国政治风俗的和平化，拒绝有可能在取得议会多数派地位后，通过否定所有总理人选来排挤总统，或使总统的工作陷入瘫痪的右派，和有可能拒绝按照议会的多数派局面任命新总理组建政府，而倾向于组织全民公投的总统之间的冲突。他宣扬“左右共治，就是双方都接受自己在行动或作决定时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不能立即实行自己的计划”，断言这既是行政权力在爱丽舍宫和马提尼翁府之间的新的平衡，也是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之间的新的平衡。这一立场被保卫共和联盟的领袖希拉克所接受，尽管他认为这种设想有损于共和国制度的精神和戴高乐将军的实践；这一立场还得到了雷奥塔尔在法兰西民主联盟的朋友们的支持，但遭到雷蒙·巴尔和他一些中间派的朋友们的激烈抨击，这些人坚决反对这种与宪法精神“有着不容置疑的矛盾”的局面的出现，认为这种局面，“即便不能说无法存活，但肯定不可能持久”，除非将共和国总统极度边缘化，但这样就会摧毁1958年宪法的精髓，即总统职务作为“拱顶石”的关键地位。这种分歧与两个人之间的竞争密切相关，一个是希望领导政府并在1988年赢得民心当选总统的希拉克，另一个是希望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并利用自己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地位成为总统的雷蒙·巴尔。然而希拉克棋高一着，右派接受了左右共治，中间派则不与政府作太多纠缠。

左派和右派都对左右共治做好了准备，公众舆论也持赞同的态度，

民意调查的结果反映出了这一点。法国人，尤其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中间派，不希望看到戴高乐—蓬皮杜时代的一元化政治重现，也不愿意看到政权的急剧交替，他们认为过去的"社会主义"太多了，又反对未来出现太多的"自由主义"。他们希望在制度内部重新实现平衡，以及实现温和的和有节制的转变。根据这个设想，他们赋予自己更大的监督政治生活的职责，敏锐地调控普选的结果，避免权力向某一派过于完整、过于绝对和过于长时间地集中。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取得胜利的派别的身处爱丽舍宫、马提尼翁府和波旁宫的代表们就会长时间掌权，并沉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这样很可能会导致向君主作风偏移，肆意地进行改革，与民主格格不入地滥用统治性地位。对法国人来说，与其改变制度来进行改变，毋宁推动政治阶层在制度内寻找进行改变的其他途径。公民们的心声被切实传递给了政治家们，尽管他们通常与社会舆论有着不小的距离，但这一次他们明白，时代已经不同了，必须在 1958 年宪法的落实上进行创新。因此，1986 年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即持续的左右共治或"选举换台"，公民和政治家们在其中实现了和平化民主的重新平衡。

持续的左右共治

从 1986 年开始，尽管形式各不相同，但法国的政治生活实际上只是一次长时间的左右共治，表面上形势各异，但都始终遵循着相同的权力平衡和分立的原则。从 1986 年至 1988 年，左右共治日臻成熟，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困难。总统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拥有宪法第 5 条赋予的全部权力，同时他还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和外交负责人，另外还肩负着保证"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的延续性"的仲裁权。政府则充分利用宪法第 20 条赋予的职权（此前一直都未能真正享受过），即"确定和主导民族的政治"。当两者之间出现职权的冲突时，比如涉及到既属于外交又事关内政的欧洲事务，或者在私有化的方式（政令抑或法律）选择上，双方总是努力寻求折衷的方案来解决（这是宪法的拥护者和习惯预言危机的记者们喜闻乐见的事情），而不会让社

1061

会舆论陷入混乱。公众期待着左右共治的双方都能履行自己的职能，并用协商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分歧，尽管公众也能微妙地感觉到总统和总理有时也会“用练习剑（包着皮头的花剑）互相击打”。因为法国人民希望，一方面右派的计划能够得到实施，另一方面总统能够通过他的存在，甚至是他的反对，去除右派的计划中或许存在的过分的内容（1981 年的时候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保证法国在国防、欧洲政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大方向上保持延续性，而左右共治看起来是实现这个希望的最巧妙的形式。但这个形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社会舆论的不满情绪还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出来：1986 年 11 月中学生和大学生奋起反抗大学入学遴选机制；1986 年底，教师、巴黎公交总公司和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职工都举行了大罢工；公众还对监狱私有化改革和对《国籍法》的修改持保留意见；民意调查清楚地显示公众对新多数派和总理的不信任，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爱丽舍宫和马提尼翁府之间，行政和立法之间、现实国家和法律国家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进行了重新平衡，这强化了 1974 年以来形成的左右共治的趋势，按照一些法国政治生活的观察家的说法，左右共治从此再也不是制度的例外，而变成了制度的规则。由于政府在经济（1987 年经济增长乏力和股市暴跌）和社会（失业率持续上升）方面遇到的困难，以及多数派内部希拉克和雷蒙·巴尔之间、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之间的竞争、有关民族阵线的争执（一部分右派人士反对和民族阵线有任何交往，包括米歇尔·巴尔扎什、米歇尔·努瓦尔和克洛德·马吕莱等人；另一部分右派人士认为应该有所妥协，可以借用国民阵线的某些主张，或将其某些思想温和化，来阻止该党的上升势头，以便该党的选票在第二轮投票时能够转移到自己这一边）。经过两年的左右共治，总理希拉克还是在与总统密特朗的对决中败下阵来。1988 年 4 月 24 日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密特朗以 34% 遥遥领先于希拉克（19.9%）和雷蒙·巴尔（18.54%），而勒庞的支持率上升到了 14.4%。经过 5 月 8 日第二轮投票，密特朗以 54% 的较大优势战胜了希拉克，连选连任。1981 年，密特朗推出了

110 条纲领，打出“平静的力量”的竞选口号，7 年之后，他以“团结的法兰西”的竞选口号再次吸引了很多法国人，他在《致全体法国人书》中表达的意愿，与法国人的期待非常吻合，即和平化的政治生活，远离 1980 年代初狂暴的政治情绪和急剧的政策转向。著名的贯彻到私有化和国有化过程中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就是这种对平衡的向往、对过度行为的反感的反映，它凝聚了很多法国人的心，甚至超越了政治派系的界限。

但是，再次当选总统的密特朗一天也不愿意与 1986 年的议会共存，他上任后马上解散了国民议会，于是一元化有可能再次回归。1988 年 6 月 5 日和 12 日立法选举的结果，尽管与此前形成的趋势，即对平衡的注重相吻合，但还是让政治学家们惊讶不已。尽管此时密特朗的威望已经与 1981 年相去甚远，而且他的措辞和抱负已变得温和得多，他发现自己的社会党居然仍旧很强大，获得了与 1981 年相差无几的支持率，在第一轮赢得了 37.5% 的选票，而共产党获得了 11.32%，两党合计 48.8%（比 1981 年的 54% 下降不少，主要是因为法国共产党出现了明显退步）。团结在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主导（和 1981 年一样）的“中间联盟”周围的右派，此次总共获得 40.52% 的选票，而国民阵线赢得了 9.65% 的支持。密特朗总统曾经在 5 月 22 日登上了著名的古迹“梭鲁特大岩石”，他当时发表讲话说，自己当然希望社会党赢得多数派的地位，但他也认为“一党单独执政是不合时宜的”，应该“让其他派别的精神也融入政府之中”，结果普选使他得偿所愿。由于密特朗再次当选后于 5 月 10 日成立的第一届（米歇尔·罗卡尔）政府没有对任何其他党派打开大门，由清一色的社会党人组成，与 1984 年的法比尤斯的政府很相近，6 月 12 日第二轮投票时，法国人民用投票进行了一次独特的判决：右派在选票总数上是多数，但社会党在国民议会的席位上占据多数，社会党议员有 276 名，右派一共有 271 名，国民阵线只有 1 名，共产党则有 27 名。这造成第二届罗卡尔政府只拥有相对多数地位，不得不吸纳中间派或共产党进入政府，否则，按照宪法第 49.3 条的规定，右派和共产党随时可以联合起来提交

1062

不信任政府动议（这种联合存在或然性，但完全没有可能性），政府将沦为“人质”。因此，新政府必须寻求共识，开辟中间路线，这正好符合时代的精神。从那时起，尽管政府并没有向中间派完全开放（只有几个中间派的附属人物以个人名义进入了政府，这些人在科学、体育或公益等领域卓有成就，受到媒体的高度评价，但他们与公民社会实际上不太调和），但米歇尔·罗卡尔将主要按照中间路线执政或与中间派合作执政，以使其温和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政策得以实施。他独特的工作方式，即努力避免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左右两派的冲突和传统的泾渭分明，进行改革，但是寻求被大多数社会舆论、或大多数利益攸关的职业行会和团体所能接受的折衷方案，比如在教育、社会保险、退休、政府改革、新喀里多尼亚、新闻媒体或电信等领域。然而，他难免需要面对一些冲突，尤其是在公共服务职能领域：护士、社会保险部门的职员、感化院职工、警察、税务系统职工、教师和公共服务的用户先后组织了罢工、示威游行和占领活动。罗卡尔不希望增加预算的压力，只在经济增长有所恢复（即使失业状况没有出现好转）的情况才可能做出让步，因为经济增长会产生“红利”可供分配。但是罢工者们并不理解总理的苦衷。当右派逐渐消化了失败的苦果并重整旗鼓的时候，罗卡尔却在左派内部遭遇了最坚决的反对和最尖刻的抨击。因为，左右共治反常地仍然以不同的面貌存在于总统和总理之间、总理和社会党的“大象”们（中年男性政治家）之间、以及立法与行政之间，各派都在竭力拉票以避免宪法第49.3条被过度地使用。总统密特朗和总理罗卡尔之间此时的关系被人称作“平静的厌恶”，这种关系与第一次左右共治时总统密特朗和总理希拉克之间的“白婚”（假结婚）关系相比，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实际上已经对行政两头政治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刻的改善，即一方面，尝试将职权分开，使马提尼翁府获得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由不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质上，不同意见都要多于相同意见的两个人（不论他们是否来自同一个多数派）搭档出任总统和总理。总统密特朗和总理罗卡尔互　1063
不喜欢，他们文化不同，风格迥异，而且在行动和战略的选择上经常

是矛盾的。1988年至1991年，政府搭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机能障碍，对政治生活和政府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密特朗早在1990春季就想罢免罗卡尔，但由于波斯湾骤然紧张的局势而未能如愿，于是他积极支持自己强加入政府的“大象”们：皮埃尔·贝雷戈瓦、杰克·朗、让-皮埃尔·舍韦内芒、皮埃尔·若克斯、让·波普朗或利昂内尔·若斯潘，以及他曾想提携成为社会党党魁的前总理法比尤斯。这些人尽管相互间也经常有矛盾，但都盯上了总理的位置，因为他们在1981年之前和之后都与密特朗有着一个共识，即防止罗卡尔走上当选总统的道路。另外，总统还希望挽回1988年6月的失败，当时他眼睁睁看着皮埃尔·莫罗瓦控制了社会党；现在他看到洛朗·法比尤斯当选国民议会主席，成为大有希望的总统宝座的继承者，所以他希望在下一次社会党大会上，使法比尤斯能够当选为社会党的党魁，从而成为1995年总统大选的社会党候选人。然而此时大多数密特朗的支持者都已经团结到了若斯潘身边，他们反对这个计划，而且若斯潘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和莫罗瓦才是更得民心的社会党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自己更加本真，更加植根于历史，也更加有能力革新法国的社会主义民主。1990年3月15日至18日社会党大会在雷恩召开，当着云集的记者和摄影机，大会始终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社会党的巨头们毫无顾忌地互相诋毁，针锋相对。法比尤斯不敌“除了法比尤斯以外的所有人”，败下阵来，莫罗瓦得以继续坐镇社会党位于索尔费里诺大街的总部大楼，但密特朗雷霆大怒，他严厉抨击莫罗瓦和若斯潘，并把自己推举的候选人法比尤斯的失败主要归咎于罗卡尔。从此，或从1988年就已经开始，几乎什么都不能干的总理必须和爱丽舍宫以及总统身边的人共处，这种沉闷的“共治”很难在行动上有所作为，这对社会舆论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社会党的斗士和选民为此尴尬不已；法国人民则被激怒，他们憎恨这些过度的斗争；而右派利用当权派因内部斗争产生的权力削弱重新振作了起来。

罗卡尔的离职已经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自从他当总理以来，由于社会党没有在议会占到绝对多数派的地位，他不得不奔走于共产

党、中间派和议会其他人士之间，说服他们赞成政府的提案或弃权。这种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中间联盟一般会对三分之一的政府计划投票赞成，对三分之一的计划投票反对，而对三分之一的计划弃权；而共产党则投票反对差不多二分之一的计划，而对另外二分之一中的大部分计划弃权，最终仅赞成了 9 个计划。为了在议会通过自己的计划，总理必须不断组成临时的多数派，这使国民议会多少有了一些第四共和国时候的味道，只有他有时候付诸实施的宪法第 49.3 条，才完全属于第五共和国。总理权力的削弱在不断加剧，罗卡尔离职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但是尽管爱丽舍宫、社会党、“大象”们对这个结果向往已久，社会舆论却似乎很满意当时的“共治”局面，根据 1991 年初的民意调查，74% 的法国人希望罗卡尔留在马提尼翁府。罗卡尔开展了一些改革行动，但是经济形势的突然恶化、政治金融案件的迸发和“医院血液感染”的惨剧使政治气候骤然变得沉重。地方选举的结果显示：社会党已经大为削弱，而反对派则重整旗鼓，再次联合了起来，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在 1991 年 4 月 21 日达成协议，推举共同的候选人参加 1992 年的大区选举和 1993 年的立法选举。立法选举的严峻形势和罗卡尔明显下降的民意支持率（跌至 49%，对政府行动的认可度也暴跌 17 个点，变成负数），使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也 1064 有所下降（降低了 10%，在 1991 年 4 月跌至 55%），愤怒的密特朗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5 月 15 日，埃迪特·克勒松被任命为新总理，她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因为完全无法避免左派计划的落空，克勒松很快就失去了民心：在 1992 年 3 月 22 日的大区选举中，社会党仅获得 18.3% 的选票，在同日举行的省级选举中，社会党也只赢得 18.94% 的支持率。1992 年 4 月 2 日，皮埃尔·贝雷戈瓦取代克勒松，入主马提尼翁府，但他也无法更好地避免社会党在选举中的失败：1993 年 3 月 28 日举行的立法选举，使左派再次失去了 1988 年夺回的权力，社会党仅仅获得可怜的 67 个席位（社会党和左派激进党在 1988 年曾联手获得 276 个席位），共产党得到 24 个，而右派则赢得了国民议会全部 577 个席位中的 485 个。这次社会党的崩溃，再一次显

示了法国人进行“选举换台”的态度，不过法国人一刻也没有产生让密特朗离开爱丽舍宫的念头，即便密特朗的民意调查支持率达到了新低，而且健康状况正在不断恶化。“左右共治”在1978年是个意外，在1986年得到法国人接受，在1993年则成了很自然的事情，它使10年前第一个极力宣扬“左右共治”的爱德华·巴拉迪尔走进了马提尼翁府。由于对彼此的人品和能力都相当尊重，巴拉迪尔和密特朗建立起一种和平化的左右共治，没有互相拆台，只是在恢复贝雷戈瓦政府1992年4月8日冻结的核试验一事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新的议会多数派希望恢复核试验，而总统密特朗坚决反对）。在政治方面，政治系统按照传统的议会规则运转：内政归马提尼翁府，由于有“无双议会”的支持，政府得以轻易地实施自己的计划，这是与仍然有效的第五共和国宪法的精神相去最远的一次；随着任期逐渐接近终点，病情日益加重的密特朗以越来越低调的态度继续行使着总统的权力。由于1995年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和不断来自职业行会和街头的抗议，雄心勃勃的巴拉迪尔一心想要当上共和国总统，他明显放缓了改革创新的步伐。确切地说，巴拉迪尔主要面对的是1993年10月18日至29日罢工的法国航空公司的员工，他们对造成大量解雇的公司重组计划痛恨不已，在此期间组织罢工的还有斯奈克玛（航空航天工业集团）、法国电信、巴黎公交总公司，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等公司的员工。另外，1994年1月16日在巴黎，世俗学校（公立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家长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使巴拉迪尔政府不得不撤销了在修改《法鲁法案》的基础上、对私立学校有利的教育改革计划。而巴拉迪尔政府1994年2月23日有关“职业融入合同”（根据这个合同，雇主可以向寻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轻人支付低于最低跨行业增长工资的报酬）的政令，也因为年轻人的大规模的动员而夭折。巴拉迪尔的民意支持率曾在1993年12月达到了顶点（70%的法国人支持政府的行动），他当时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议会多数派的支持，来落实他的施政计划中的一些要点（修改国籍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变法兰西银行的章程、私有化、就业五年计划、军事计划、国土资源发展法等）。但到

了1994年春季，他发现自己的“幸运星”迅速变得暗淡无光，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超过了满意度。丝毫没有得到缓解的失业问题，以及各种有损政府部长和右派议员的“事件”的发生，明显改变了民意天平的倾斜方向。巴拉迪尔对示威游行的一再退让，让他原来的支持者感到愤怒；而他与希拉克的总统竞选对手关系造成的右派阵营的分野，是他的政治前途迅速幻灭的另一个原因。

此时的左派仍然深陷人事矛盾和冲突中不能自拔。罗卡尔从1993年4月3日开始一直担任社会党第一书记，当时他通过与若斯潘结盟，成功排挤了法比尤斯，然而他在1994年6月12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遭到了失败：作为社会党推举的候选人名单中的头一名，他仅仅获得14.48%的支持率；而密特朗总统授意加入名单的贝尔纳·塔皮竟然赢得了12.05%的选票。1994年6月，亨利·埃马努埃利取代罗卡尔出任社会党第一书记，此时社会党的希望全部集中到了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的身上。可惜，德洛尔在1994年12月宣布不参加总统选举，从此，任何人都不再怀疑1995年总统选举非右派莫属。最有希望的两个人，一个当然是总理巴拉迪尔，他首先是一个欧洲自由主义者和戴高乐—蓬皮杜主义者，得到吉斯卡尔主义者和中间派——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不从自己的阵营中推举候选人——的高度评价，受到中左派权势集团，甚至与德洛尔亲近的社会党人的推崇；另一个是保卫共和联盟的领袖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夹在代表社会民主左派的若斯潘（若斯潘在1995年总统选举中异军突起，成为左派的领袖，他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党传统思想，他谦逊，品行端正，语言简单但充满真知灼见）和争取到多层次选票（从爱开玩笑的民族主义者夏尔·帕斯夸到为德洛尔退选失望的左派，还有蓬皮杜派的戴高乐主义者、吉斯卡尔主义者和中间派）的巴拉迪尔之间腹背受敌，但他巧妙地、富有职业水平地开展了积极的竞选宣传。作为已经成为公共和私人精英们的共识的欧洲自由主义的猛烈抨击者，希拉克通过保卫共和联盟，动员了一部分戴高乐主义者反对巴拉迪尔，勾引了那些对密特朗主义感到失望的左派人物，通过一篇鼓励创业和反对“大学

1065

校”的专家官僚的演讲，吸引了自由职业者和小老板们，他还唤醒了人们对他在蓬皮杜总统时期担任农业部长时的良好政绩的记忆，另外他还通过揭露“社会裂痕”赢得了一部分年轻人和劳动者的信任。尽管民意调查的结果始终对希拉克不利，直到投票前夜他仍落后于巴拉迪尔，而且他一直遭到 Canal + 电视台的《木偶新闻》节目的编导们的粗暴对待，始终受到一些媒体（如深受巴拉迪尔诱惑的《世界报》和法国电视2台等）的抨击，此外还有很多政治观察家都认为他会以较大的劣势被淘汰。然而，锲而不舍而且精明的希拉克，迸发出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活力。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尽管落后于若斯潘，但是希拉克超越了自己“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巴拉迪尔；而若斯潘令人大跌眼镜地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因为投票前民意调查和观察家都认为他肯定会在第一轮就被淘汰。1995年4月23日第一轮的投票结果如下：若斯潘赢得23.3%的选票，希拉克得20.84%，巴拉迪尔得18.58%，勒庞得15%，罗贝尔·于得8.64%，多米尼克·瓦内得3.3%。5月7日第二轮投票，希拉克以52.6%比47.4%击败若斯潘，当选为法国总统。尽管与总统宝座失之交臂，但若斯潘使社会党从密特朗长达14年的统治下走了出来，在距离1993年的崩溃仅仅两年之后就避免了颜面尽失的结局，社会党从此可以乐观地畅想未来，这曾一度是社会党内最坚定的斗士们都不敢想象的结果。

如愿进驻爱丽舍宫，又坐拥优势极大的议会多数地位（希拉克拒绝解散国民议会，标志着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从此脱离关联），希拉克邀请自己的挚友阿兰·朱佩入主马提尼翁府，再次实现了行政权力顶峰的“同谋”两头政治，而不是按照戴高乐的传统将全力集中到爱丽舍宫。但是，由于新总理口才欠佳的技术官僚的风格（专横而不善于协商）；由于总统本人更喜欢处理敏感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险却又不多考虑职业行会的态度；由于实际政策与总统竞选时的口号的不一致；由于总统坚持对一些“事件”（有些还与他有关）进行调查；还由于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以及由此必然而来的失业率上升，多数派和新总统的口碑很快就被毁掉，1995年12月的大罢工和支持率的显

著下降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另外，总统大选还造成了右派的分化，比如右派内部在对国民阵线的态度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意识到政治局面只会越来越糟糕（不仅那些沸沸扬扬的“事件”，尤其是涉及到了巴黎市政府的传闻令人忧虑；经济形势及其对预算产生的后果也不容乐观），总统希拉克和总理朱佩这对行政权力的搭档决定将立法选举的时间提前，遂解散了国民议会。鉴于 1995 年总统选举时的明显优势，似乎右派在这次立法选举中稳操胜券。但这种预测显然过于乐观，一些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首先是左派的社会党、绿党和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团结了起来，在若斯潘的领导下组成了“多元左派”联盟，若斯潘就此确立了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尽管一些社会党人、一部分媒体和权势集团，由于深受 Canal + 电视台《木偶新闻》栏目的《是的，是的，给国家出主意》节目——该节目已成为政治分析和国家领导人民意支持率的重要参考——的影响，对若斯潘还持有很深的怀疑。其次是一心想要给总统希拉克和议会多数派一些颜色看看的国民阵线，因为希拉克不屑与国民阵线的领袖勒庞有任何合作和交流，议会多数派则断然拒绝了国民阵线提出的有条件结盟或放弃部分权利的好意，国民阵线怀恨在心。由于法国人民一旦发现有可能一元政治的威胁就会进行“选举换台”的规律，“多元左派”在 1997 年 6 月 1 日的选举第一轮中以 42. 25% 的支持率战胜了右派，右派获得 35. 78% 的选票，国民阵线赢得 15. 24% 。在第二轮投票中，左派凭借 48. 28% 的选票获得了 310 个席位，右派以 46. 02% 的支持率赢得 237 个席位，而获得 3. 82% 选票的国民阵线也得到 1 个席位。

1066

若斯潘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马提尼翁府的主人，左右共治再次上演。这次左右共治距离总统选举时间最近，只有 2 年，而不是以前的 5 年。尽管若斯潘和左派取得了立法选举的胜利。但是任何人也不会去梦想或请求总统希拉克因此辞职，希拉克本人也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留在爱丽舍宫是很自然的事情。法国的共和国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左右共治、“选举换台”、权力的平衡和分立从此成为法国政治的规则，这些规则是法国人经过一次次选举，通过手中的一张张选票做

出的选择。在这次政治洗牌一年之后，超过 70% 的法国人仍然赞同左右共治，而且代表着这次左右共治的希拉克和若斯潘的民众支持率都在不断攀升。这不仅取决于选民们的意愿，而且也得益于行政权力内部职能的明确分工和鲜有冲突，以及政府与总理若斯潘严谨的工作作风，另外还有经济形势出人意料的好转，1998 年法国经济实现了 3% 的增长，失业率也相应地出现了下降。

除了利用税收的增加和谨慎管理预算和赤字（不过并没有对公共开支进行必要的减少来改善行政生产率，将富余的政府人员向一些敏感部门转移），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走上欧洲统一货币（欧元）的道路，政府还通过多种政策让选民们感到满意，包括 35 小时工作制、“年轻人就业计划”，对国籍法的复审、移民法、反排斥法和对法国航空公司私有化案的否决等。市场和工商业对政府的政策也没有太多不满，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尤其是是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领导的财政部，是否履行有关欧洲建设的承诺和妥善地管理经济。总的来说，社会舆论比较认可政府进行温和改革的计划，和首先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处理从上层突如其来的决定的工作方式。

尽管“多元左派”内部始终有着这样那样的纷争，但右派则完全陷入了混乱之中。由于不能在对国民阵线的态度上达成一致，无法解决内部的人事纠纷，也一直未能形成一个共同的计划，并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领导人，右派在思想、党派、运动和小团体的无序状态之中无法自拔，严重侵蚀了法兰西民主联盟，保卫共和联盟也呈现四分五裂的态势：有对总统希拉克无条件服从者，有怀念巴拉迪尔的人，有新主席塞甘的信徒，还有帕斯夸的朋友。除非能够解决极右派问题，并重新团结到希拉克周围组成一个包括多种思想的统一政党，否则至少在短时间内，看不出右派能够重新找到“左右交替”的道路的可能性。另外，极右派对传统右派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干扰，这一点在 1998 年 3 月的大区选举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在这次大区选举中，左派的支持率略有升高，赢得了几个大区，包括巴黎和普罗旺斯－阿尔卑斯－天蓝海岸地区。同时进行的省级选举也反映出法国的

1067

政治版图正在向对左派有利的方向重新平衡，实际上，左派从 1982 年地方分权以来，在地方选举中一直在节节败退，先后失去了很多重要的地方。大区选举中最让社会舆论错愕的是，右派在与国民阵线联盟的情况下，才得以保留庇卡底、勃艮第、罗讷－阿尔卑斯、朗格多克－鲁西永等 4 个大区的议会主席职位，这进一步导致了右派，尤其是法兰西民主联盟的分裂——自由民主党即从前的共和党分裂；夏尔·米庸创立新的党派“右派党”，总统希拉克则明确地表达了反对与国民阵线联盟的立场。

不过，政治时有不测风云，左派的成功和右派的削弱因为形势的突然恶化而出现了逆转。首先在经济方面，1998 年开始的大好形势在 2001 年春季就可能迎来了危机的回归。在还有一年就要大选的时候，失业率停止下降，随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社会计划”也未能阻止失业率的重新上升。社会保险账户和政府预算严重依赖的经济增长也开始走弱，巨额赤字再次出现。1974 年以来，总是随着失业率和公共赤字反向浮动的政府的民意支持率，此时出现了猛烈的下行，使若斯潘政府自 1997 年以来第一次面临困境。此外还有政治方面的扭转。在左派选民看来，很多政府推动的改革（如公民结合契约、男女均等、医疗统保等）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从中受益，而他们赞成的 35 小时工作制，并没有按照公平的原则得到执行，因为与工人和服务业劳动者相比，干部和公务员从中获益更多，而且 35 小时工作制并不总是能体现效率，很多公共服务部门例如医院的工作节奏被打乱，家庭管理也变得复杂起来。另外，若斯潘似乎忽视了那些最贫困人口的需要，他在处理有关达能公司和米其林公司的案例时辩解说，全球化的自由主义使他在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无力保护最贫困人口。在城市郊区的违法犯罪行为激增的情况下，若斯潘推行的“无罪推定”原则使政府无法采取严厉的措施加以整肃，不仅激怒了普通民众，也让中产阶级深感不安。另外“多元左派”的内部团结也出现了问题（这是第三次翻转），并且内部的分歧因为总统大选临近越来越大，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因为科西嘉问题与若斯潘闹翻；绿党出现了内讧，同在政府

任职的对立的绿党成员居然对外竞相许愿，寻求支持；左派激进党则遭到漠视，并因这种孤立而倍感受伤；处在衰退道路上的共产党，则通过向其他左派慷慨许愿，希望能够实现自我的救赎。

尽管如此，右派的严重分化、希拉克面临的窘境（他因对巴黎市政府的管理问题饱受法官、媒体和一部分左派人士如阿尔诺·蒙特布尔的纠缠），以及极右派的顽固不化，似乎都预示着若斯潘能够在 2002 年 4 月至 5 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为了确保获胜，若斯潘还改变了选举的顺序，将总统大选放在了立法选举之前，因为他确信这样对左派有利。

前文中提到的一些障碍和若斯潘笨拙的竞选策略（希拉克则始终是这方面的高手），尤其是左派候选人的严重分化（共有 16 人），共同引发了 2002 年 4 月 21 日的政治地震。在第一轮投票当天夜里，统计显示有 28. 46% 的选民选择了弃权（1995 年和 1988 年分别为 21. 6% 和 18. 62%），还有 2. 6% 的空白票和废票，排在首位的是希拉克，紧随其后的居然是勒庞，他获得了有效投票中的 17. 19%，以 20 万票的优势将排在第三位的若斯潘淘汰，与希拉克一起获得了参加第二轮投票的资格。从 1969 年蓬皮杜和阿兰·波埃在第二轮对决以来，第一次出现非左右两派竞争的第二轮投票。更严重的是：若斯潘和希拉克两个人的支持率加起来，才占到全部有效选票的 36. 7%，而极右派和极左派共占到 30. 12%，其中和布鲁诺·梅格雷代表的极右派赢得 19. 57%，奥利维耶·贝桑舍诺和阿尔莱特·拉吉埃代表的极左派获得 10. 62%；弃权的人大约占到了全体选民的三分之一；若斯潘在总统大选失败当晚宣布放弃政治生涯；此前多次宣布引退的勒庞的支持率却创了新高。在第二轮投票中，大量左派选民和很多在第一轮投弃权票的人被动员了起来，他们把票投给了希拉克，使他以压倒性优势的 82. 15% 的支持率大败勒庞。希拉克一下子实现了自戴高乐以来所有右派领导人的共同梦想，把整个右派都团结到了“总统多数联盟”（即后来的“人民运动联盟”）之中，只有支持弗朗索瓦·贝鲁的法兰西民主联盟残余除外。在 6 月 9 日和 16 日举行的立法选举中，人民运动

联盟赢得了国民议会400个席位，然后高姿态地接受来自法兰西民主联盟的雅克·巴罗担任人民运动联盟主席，和一个归附人民运动联盟的中间派人士拉法兰担任国家总理。至于左派，由于法国共产党的衰退、绿党的分裂、舍韦内芒的脱离，以及若斯潘引退造成的权力真空，此时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和拥有了空前的所有的权力的右派相抗衡。

民主的演变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法国的政治生活远离了1958年至1962年之间戴高乐将军在特殊形势下确立的特殊政体的海岸线，接近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主标准，即权力的平衡与分立，以及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之间的权力交替和重新发牌。为了在民主标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法国不管是否情愿还是接受了一些分立的和独立的权力，即媒体和司法。这在1970年代还没有存在。1980年代是主要的大众传媒电视进入多元化、竞争和信息自由的时代，尽管这种发展难免会出现冲突和滥用的情况。1982年有关视听（新闻传媒）的法案的颁布和新闻总署的设立是新闻自由的开端（这个自由在1984年因对电视二台总经理皮埃尔·德格劳普的解职和对让-克洛德·艾拜尔雷的继任委命而遭到严重破坏）。1986年，右派通过有关通讯的《雷奥塔尔法案》，设立了取代新闻总署的“通讯与自由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对当局过于顺从：它任命的公共广播和电视台的负责人都与当局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反映了政治“分赃制”的特点，即每次多数派的更替都会造成各个系统包括新闻媒体的国有公司的领导人出现走马灯似的变动。1988年，当左派再次成为多数派后，立即如法炮制，用“新闻媒体最高委员会”取代了“通讯与自由全国委员会”，这个新的委员会被赋予了调节新闻媒体行业、任命各公共新闻媒体主管的职能，而且左派还希望总统密特朗的亲信雅克·布代能够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但“新闻媒体最高委员会”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在1989年8月举行的该委员会主席选举中，与反对派走得很近的菲利普·纪尧姆作为“黑马”当选，这是左派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实际上这个结果应

该归咎于左派自身，因为左派未能推选出一位共同的候选人，这造成1069了该委员会内左派委员选票的过度分散。这件事情反映出控制新闻媒体的做法是法国根深蒂固的政治习俗，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如此。左派当局不停地给“新闻媒体最高委员会”的当选主席菲利普·纪尧姆制造麻烦，拒绝给他提供经费，最终迫使他主动辞职。取而代之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是密特朗的亲信埃尔维·布尔日，他上任伊始即获得了大笔额外的公共资金。在第二次左右共治出现后，总统密特朗和总理巴拉迪尔经过妥协，共同提名了与左右两派都有着良好关系的、声誉良好的专业人士让-皮埃尔·艾勒卡巴什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不过，由于在1996年与媒体主持人和制片人达成了超过权限的协议激起了强烈的社会风波，艾勒卡巴什也不得不离职。他的继任者克萨威尔·古尤-博尚从前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亲信，现在则成为左右两派都能接受的人选。总的来说，不论是电视还是广播，“新闻媒体最高委员会”都未能完全切断行政当局和作为公共服务部门的媒体之间的“脐带”。尽管这种政治亲近关系使当局感到踏实，而且可以给当权者的朋友们提供工作岗位，但政府对新闻本身的实际控制却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并不是因为当局主动放弃对新闻的控制，而且当政者始终都认为对媒体进行必要的控制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和选举（尽管事实一再证明效果完全相反），主要还是因为记者和公共新闻媒体已经拥有了自主权和对自由的强烈意识，他们因此能够面对权力以及直接的和间接的政治压力，在事实上始终保持较高的独立性。此时哪怕是与当局者非常亲近的媒体主管都不可能干涉或影响新闻的编辑，可以说公共新闻媒体的信息是自由的，这在1980年代之前完全是不可能的。同时在私有媒体方面，尽管依赖公共订货的企业集团始终有着利用所属关系，通过旗下媒体的影响力影响当权者决策的欲望，但记者们的独立意愿和竞争的需要，使这种控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再也没有了“来自家中的流毒”、“主人的声音”和“法兰西的声音”，除了极为罕见的情况，从此视听信息被彻底解放，不再从属于政治权力，文字媒体也一样。在新闻媒体在1980年代末获得解放的同时，法官们也表达了

完全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愿望。第三种权力在法国前几届共和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独立存在过，第五共和国最初也不例外——第五共和国的宪法中的第八条也只是提到了“司法当局”，最明显的体现是司法部长与法官的职位之间的等级监管关系，以及司法部对私人案件行使干预权以加快或减缓审案进程的习惯。实际上，法官们从1970年代就开始向上级主管们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只有等到1980年代末各种“丑闻事件”——从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安·努西被牵涉其中的“发展路口”① 资金挪用事件，到1989年1月很多当局的亲信都被指控犯有“知情罪”的贝西奈公司案件的大规模爆发，法官们才真正得以放手行动，结束了政党接受秘密献金、议员和享有公共市场的公司之间进行影响力交易、以及政治家进行违法的个人致富活动——地方分权造就了财政宽松、道德削弱和具有更大行动自由的新环境，很多议员乘机浑水摸鱼。另外，为政党提供经费的企业的假发票事件、公共市场交易中的回扣行为，以及一些弄虚作假的报告和虚构的职位，在整个1990年代都是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这些丑闻事件先后涉及到了各个政党，社会党、共产党、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都未能幸免，有些事件是自行败露，有些则是由于本党议员的揭发，拥有媒体支持的法官们利用手中的自由权力，及时核实并迅速将真相公布于众，这 1070 不仅使政府陷入窘境，而且避免了政府的阻挠，因为此前政府习惯于干预案件的审理，经常破坏预审的秘密，泄露了案情的进展。于是一次大规模“净手”行动在法国展开，尽管远没有意大利的行动那么“野蛮”，但是取得了相近的结果，整个政治阶层都受到了深刻的震动。按照新术语，首先被指控，然后接受审查，从时任国民议会主席的亨利·埃马努埃利（1992年9月14日），到1995年到1997年担任总理的来自保卫共和联盟的阿兰·朱佩（1998年8月21日），从共产党的罗贝尔·于到中间派的皮埃尔·梅埃尼耶里，很多政治家都接受

① 即 Carrefour du développement，成立于1983年，是执行密特朗总统“第三世界主义”的专门机构，专职经营法国对第三世界，主要是非洲国家的财政援助，也经管一些特需款项的处理。

了这种考验；甚至还有些人在诉讼后遭到了监禁，包括米歇尔·努瓦尔、阿兰·卡里尼庸和贝尔纳·塔皮，另外还有些人被迫辞去了部长职务，包括吉拉尔·隆盖和米歇尔·鲁辛（不过有些人保住了职位，比如宪法委员会主席罗朗·迪马）；还有一些名气稍小的议员，其中很多都是政治负责人或企业老板，他们也被迫接受媒体和司法机关构成的新权力的“过堂”审查。至于政府的财政审判机构（最高审计法院和地方审计局），它们也不遗余力地清查腐败行为：对蒂埃里·让－皮埃尔、勒诺·范·吕安贝克、艾里克·阿尔方、帕特里克·德穆尔、爱娃·朱丽、米莱伊·菲利皮尼、洛朗斯·威什尼耶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的长期审查贯穿了法国的政治生活。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上，与法官的对抗从来都没有达到此时的高度；慢慢地，政治领袖们逐渐意识到明确法官独立地位的必要性，不过他们也努力预防出现“法官政府”的风险。社会舆论和媒体则对反腐败和权力再平衡的重要性更加关注。1998 年，总理若斯潘和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亲口承诺，政府再也不会介入个人的案件，政府还向议会递交了一个提案，确定任何对司法的僭越行为都是违法的，该提案还赋予了法官独立的地位和相关的责任，并对法官的任命模式进行了修改——新法官的任命必须得到最高司法委员会的同意，则该委员会将得到扩大，其中非司法体系人士必须超过半数。这样，法官的独立地位得到了确立，但与政府的联系并没有切断，政府始终是刑法政策的主导者，这样就保留了扩大针对法官们的纪律惩罚的可能性，起到了限制法官权力的作用。1998 年秋季，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个新的法律提案，该法案的目标主要是确保无罪推定的原则，加强对预审的保密，限制临时羁押。所有这些有关司法的提案在 1999 年获得议会投票通过。

与此同时，整个立法系统的“武器库的火力”都发挥了出来，政党接受秘密献金从此变得非常困难，竞选支出因此得以减少，对违法者的惩罚措施得到了加强。第一个法案在 1988 年 3 月 11 日经投票通过，很快就有第二个法案需要得到认可，1990 年 1 月 15 日，有关政党和选举经费的法案经投票通过。按照该法案的规定，1989 年 6 月 15

日以前政党领导人在这个方面的违规行为可以得到赦免（通过违规中饱私囊的人和主动或被动贪污的公务员除外）。该法案确定政治献金（给同一个法人的献金必须低于50万法郎）和竞选经费的上限，违规行为将视情节严重被处于最高为剥夺选举资格的惩罚。但是，这个颇具创新精神的法案，由于有关赦免的第18条的存在，未能让社会舆论感到信服，国民议会因此不得不重新进行立法，1992年1月24日通过的新法案规定违规议员必须缴纳不超过4.3万法郎的赔偿金，并补交税款；1993年1月29日的法案则就预防腐败、增加经济生活和公 1071 共程序的透明度做出了新的规定，进一步改革了政党和竞选经费管理制度，并强迫各政党公开提供了献金的企业的名单。根据1990年1月15日法案，“竞选账户和政治筹款全国委员会”成立，负责对每个候选人的材料进行严格审查，监督其账户是否符合法规、所得献金是否符合有关上限的规定，以及从1993年立法选举开始执行宪法委员会做出的“选举资格作废”的裁决，最著名的例子是前文化部长杰克·朗。另外，根据1990年1月15日法案，政府在1993年第一次向各政党进行了公共资金分配（共计5.8亿法郎）。1995年1月19日还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禁止法人向政党和候选人提供献金、实物或服务。

于是，在最近这十来个年头里，法国都经历了真正的媒体和司法的改革风暴，产生了两种新的独立的权力，行政和立法权力从此必须正视它们的存在。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的人从此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党从此只能节俭和透明地获得和使用经费，而议员和公务员们不再能利用他们的身份通过损害纳税人利益的方式发财，这些都是极好的民主规则。法国赋予了自己一个民主的参照标准（尽管这个标准的建立方式非常生硬，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法官和媒体滥用权力的情况），这个标准是法国拥有了更健康的民主的标志，也使法国远离了“表面民主，实际被权势集团控制”的共和国模式，真正成为一个法制的国家。现在只剩下政治阶层（在法国这样一个反议会制的国家，政治家传统上是经常遭到讥讽的一群人），必须重新赢得公民们的信任和尊重，而公民们的政治行为和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期待，在这四分之一世

纪的时间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政治的重新发牌

不论对左派，还是对右派而言，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局面经过过去的两个十年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第五共和国最初的特点是：共产党控制左派，右派集中在至高无上的戴高乐主义者周围，极右派则无足轻重，它因为种族主义的流毒、1930年代的排外行为，以及在维希政府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而遭到社会各界的唾弃。然而，从1975年至1998年，法国的政治版图在剧烈的震荡中完全改观。在左派方面，解放时民意支持率曾高达30%的共产党，在1978年的立法选举中下降到20.6%，在1990年代末停滞在8%至10%之间。在1981年总统选举（法国共产党的候选人乔治·马歇只获得15.4%的支持率）和随后举行的立法选举（法国共产党赢得16.12%的选票）中被严重动摇的法国共产党，在1986年3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中进一步下滑到了9.78%，虽然在1988年6月的立法选举中有所回升（11.31%），但在1993年的立法选举中继续跌至9.35%，1997年的选举结果也与此相仿。由于一直在对抗的战略和团结社会党的战术之间犹豫不决，法国共产党始终无法对自身的结构和人员——坚持民主中间派路线，乔治·马歇长期领导——进行更新，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1981年波兰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政变时又缺乏断然与苏联保持距离的魄力，指导思想更是在通过工会运动的形式改造社会和在与资本主义决裂的基础上改变社会之间左右摇摆，因此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法国共产党就已经基本丧失了1945年以来建立起来的威信。尽管参加了从1997年开始执政的“多元左派”，在该政府拥有多名部长，而且现在的领袖罗贝尔·于的领导风格与乔治·马歇截然相反，法国共产党还是没有能够恢复从前的声誉，因为它错误地选择了一个明确界定敌友的战略，和定位于“总是更多”和“尾巴主义”之间的战术。共产党的衰退将左派的主导角色拱手让给了社会党。1970年代时，共产党仍然坚定地奉行着“拔掉社会党这帮鸡鸭的毛”

1072

（1950年代的习惯用语）的政策，不断抨击社会党，使密特朗的政党无法扩张和取得左派领导权，甚至千方百计阻碍密特朗赢得总统大选，然而密特朗不仅成功地在第一时间就逆转了强弱关系（在1978年3月的立法选举中，社会党联合左翼激进党赢得了24.9%的选票；在1981年的总统选举中，密特朗的得票率达到26%；而在1981年的立法选举中，社会党的支持率更是攀升到了37.77%），还牢固确立了社会党作为左派唯一大党的地位（1986年的得票率为32.65%，1988年为37.54%），左派的联合政府都围绕着社会党组成。尽管在1990年代出现了低谷（1993年3月在立法选举中仅获得19.2%的选票），但若斯潘使社会党重新振作了起来（若斯潘在1995年总统选举中赢得23.3%的选票，社会党在1997年立法选举中的得票率为25.7%），而且还成功地以自己为中心组成了"多元左派"的联盟，社会党得以在因生态流派（绿党）的崛起而焕然一新的左派中继承担当中枢的角色。

绿党首次出现在政治版图上是在1978年，它在当年的立法选举中赢得了2.2%的选票。绿党通过奉行自主的战略（非左非右）一点一点赢得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1993年立法选举中的支持率高达7.6%，但其内部的分化在逐渐加剧，原因是一部分人追求运动的自由，而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明确绿党的政治根基。1993年的立法选举结果其实令绿党深感失望，因为选举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绿党支持率高达15%，于是一心想要进入政府的绿党被迫将一部分人的想法转化为行动，加入了左派联盟。这个锚定左派的选择是以多米尼克·瓦内为中心的绿党多数派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不仅使绿党能够进入政府（实际上，布里斯·拉隆德在罗卡尔政府就出任过部长），而且可以真正地参与政治游戏，不仅对所有国家的、欧洲的和国际的文件产生影响，还可以使本党有限的选举成绩（1997年5月仅获得3.68%的选票）具有更大的价值。1968年5月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达尼埃尔·科恩-邦迪出现在绿党参加199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名单的首位，明确地将绿党置于了与共产党对抗的位置之上。

左派从此团结到了社会党主导的“多元”联盟之中，一些社会党的异端分子如创立“公民运动”的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也加入了其中。另外左派联盟还包括了从1980年起就长期由致力于工人斗争的阿尔莱特·拉吉埃领导的极左派，不过该党派正致力于革新自己的主旨和人员，希望能够重新团结各个分裂出去的支派，并在政府的辩论和计划中，尤其是有关移民、社会排斥和道德风俗问题上，体现自己的分量。

左派的深刻变化可以概括为，社会党的领导权和组织的多元化取代了共产党的优势地位和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对决。与左派相比，右派的巨变甚至更加令人眼花缭乱。首先极右派在1970年代初开始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强势上升，它在选举中的重要性和对传统右派的组成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整个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其领袖勒庞在1956年曾是一名布热德分子，在戴高乐时期则坚定地维护“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他在1983年市政选举中开始崭露头角，并从此不断攫取到更多的选举资源，使议会的右派联盟失去了稳定性。从1986年立法选举中9.65%的得票率到1997年立法选举中的15.24%，从勒庞在1988年总统大选中14.4%的支持率到1995年总统大选的15%，极右派的国民阵线已经牢固确立自己作为社会不满情绪代言人的地位，它争取到了一部分法国共产党的选民，从而在议会夺得了一些从前属于法国共产党的话语权。民族阵线实际上凝结了那些受到移民、城市危机、失业、不安全、欧洲建设、全球化、传统道德沦丧、腐败和金钱至上社会风气影响的法国人心中的挫败感、恐慌和痛苦，这些人要么投票支持国民阵线，要么非常赞成它的一些主张。左派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国民阵线的与众不同，不仅积极揭露了国民阵线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本质，还猛烈抨击了国民阵线的建议中存在的布热德主义的幻想。但是左派未能正视社会新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在打击国民阵线方面始终是言语多于行动。至于右派，在1970年末面对安全问题时也不得不对国民阵线做出让步（比如1979年司法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提交的“安全与自由”法案），而且还在讲话与行动中，大量借用国民

1073

阵线传播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右派即使在掌握了权力的时候（从1986年至1988年，从1993年至1997年），在反对勒庞的社会和经济主张方面，做的一点也不比左派更多。左派和右派就像是两个学习巫术的新手，自以为可以将国民阵线玩弄于股掌之间，并达到损害对手的目的，但总的来说两派的企图都告失败，而且还完全失去了对“游戏”的控制。比如1990年代末的选举中，由于在国民阵线内部，其创立者勒庞与其总代表布鲁诺·梅格雷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大，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认为可以“渔翁得利”，但结果国民阵线高达15%的支持率给右派造成了相对更大的麻烦。

对右派来说，这一时期的第二个重要事件是：分化、竞争和分裂。自1958年戴高乐党取得了法国政坛的霸权后，右派在1981年因内部分化失去了权力。这次失败并没有带来右派的重组，尽管法兰西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这两个主要的右派政党在随后的选举中再次联合了起来，但两党在选举后始终不能解决之间的政治分歧（一个更加强调国家干预主义和民族主义；另一个则更加注重自由主义，更加支持欧盟计划）和人事纠纷（一方是希拉克，另一方是雷蒙·巴尔，或吉斯卡尔·德斯坦）。这导致了两党在1988年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中接连遭到失败，因为两党在选举中都未能表现出更大的活力，每次都只获得了大约20%的支持率。1993年和1995年的选举结果稍好，但这些昙花一现的胜利，为右派带来了与1981年和1988年的失败同样难以愈合的伤口。1997年的失败终于导致右派发生了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分裂。保卫共和联盟从此由菲利普·塞甘领导，该党尽管保持了统一，但内部派系林立，巴拉迪尔、希拉克、塞甘和雷奥塔尔都有各自坚定的支持者。法兰西民主联盟则分崩离析。1997年选举失败后，塞甘和雷奥塔尔为了拉近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设计了将各个右派政党和运动团结起来组成议会右派的“右派联盟”的形式，但是未能如愿，因为右派政党因不同的战略选择严重分化，因对法国人民的不同导向互相攻击，因人事纠纷激烈争吵，已经成为一盘散沙，既找不到统一的组织原则，也形成不了公共的行动纲领，

甚至迟迟无法确定一位共同的不容置疑的领袖，于是右派无法正常地扮演议会首要反对派的角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占少数的多元左派管理国家，听任国民阵线继续不断地挖墙脚而又无可奈何。

与左派在 1958 年至 1971 年之间的经历很相似，这一次右派出现的严重的结构破坏，导致了一场严重的民主危机，很多事情都可以证明这个结论。由于各种丑闻事件的发生，以及从 1976 年以来的历任政府都未能解决失业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加上媒体将政治家如同“阿特柔斯兄弟”一样血腥的斗争完全展现了出来，政治阶层的声誉一落千丈，这就是弃权率在各种选举中不断攀升——1988 年省级选举为 50.9%；1988 年有关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的全民公决为 62%；1989 年市政选举为 27.6%；1989 年 6 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为 51.9%；1993 年立法选举为 28%；199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为 47%；1997 年立法选举第一轮为 32%，第二轮为 28.87%；1998 年 3 月的大区选举为 41.96%，和非传统主流政党的各党派在各种选举中支持率激增的原因，这些党派不仅包括国民阵线，还有生态主义的绿党和左派激进党，以及从左派和右派分裂出去的团体，比如原右派人物菲利普·德·维利耶领导的“保卫法兰西运动”。由此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选票分流现象，比如在 1995 年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多达 38% 的选民将票投给了希拉克、若斯潘、巴拉迪尔和罗贝尔·于之外的候选人。这种现象被很多法国政治生活的观察家称为“找不到的人民”、“民主的幻灭”、“病态的民主”或“意大利式的危机”，这些分析尽管不乏中肯之处，但基本上属于片面之言。

1074

法国人对政治的狂热结束之后，选举的得失也变得不太重要了。现在参加投票，再也不是为了支持或反对社会制度的转变、混乱局面的改变，以及肯定或否定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一切，与现在相比，从前选举的动员效果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在左右交替反复出现和政府实行温和政策的时期，仍然期望民众踊跃地参加投票已变得不太现实了。另外，法国现在倾向于选举的多层次化（国家、大区、省级、市政）和任期年限的多样化（5 年制、6 年制、7 年制、每 3 年更换一部

分的9年制），这使得选举活动过于频繁，即便是最具参与意识的“好”公民也会望而止步。另外法国的政治家们始终没有能力赋予欧洲选举——我们将在以后有关法国的国际政策的部分讨论这个问题——相应的意义和框架，使欧洲选举不能对公众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另外，在我们去除了“史诗般”的激情的民主当中，人民拥有很多投票以外的方法，都可以达到表达自己思想，并让别人听明白的目的，这些方法除了无法造成改变多数派的地位，对领导人的行为和决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小。社会舆论可以在第一时间反映出来，即便不能总是让领导人完全领会人民的心声，但至少可以让领导人听到人民的呼声，法国的政治生活因此变成了一个长久的政治集会。持续的民意调查、反复的征求意见、各司其职的委员会、反复修改的研究报告和各种广播电视互动节目（比如《电话铃响，听众有话要讲》节目等），使公民们拥有了一个巨大的“武器库”，另外还有互联网已经成为新的对抗论坛，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将选举视为表达自己信念和影响决策的唯一方式的时代早已远去了。如今，投票只能是多种方式之一，仅此而已。那些政治表达的新模式不仅仅是民主的现代形式，而且是分析法国的政治体系是否健康时必须的工具。对民主新载体的热爱证实了法国人的民主表达具有多样性和活力的传统，法国的国家行政结构也证明了这一点：法国有36690个市镇和相同数量的行政机关，这是欧盟国家中独一无二的；法国的地方议员的总数量同样惊人，共有55万个，即每106个居民就有1个议员，这个比例是意大利的4倍，英国的25倍。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场民主危机，而是政治表达方式的演变，而妇女突然大量涌入政坛仅仅是改变了这场演变的进程。妇女从1944年开始拥有选举权，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参加投票的妇女数量和男人一样多，从1986年开始，投票给左派的女人数量比男人更多，支持极右派和绿党的女人数量则比男人更少。因此，妇女们是在1970年代中期完全变成公民的，她们从那时起开始了自主的政治选择。但妇女的被选举权的发展则有所不同，尽管被选举权是和选举权同时通过1944年

4月21的政令获得的。事实上，在妇女的被选举权方面，法国在全欧1075洲排名几乎垫底，仅仅强于希腊。在1997年的立法选举中，有11%的女议员，这个比例与1993年（6%）相比可以视为一个小小的进步，而1993年的比例甚至比1946年（7%）的时候还要低。在省级行政委员会中，女议员占5%；在1995年的市政选举中，7.6%的当选市长为女性，女市政议员的比例则为21%；1994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的法国人有30%为女性。至于目前的政府，拥有30%的女性，这是法国的最高记录；上一个记录是1995年5月的朱佩政府（28%），但那个政府只是昙花一现，经过1995年11月的改组，该政府中妇女的比例锐减到了3%。可以看出，尽管妇女从政在最近几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政治生活始终是男人们的世袭领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1990年代初开始的妇女参政运动，如今仍在持续，而且正通过有关“男女均等”大讨论而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次大讨论起源于一场开始于1970年代的演变。1975年，当时的女国务秘书弗朗索瓦兹·吉鲁建议，建立女议员定额制，这个吉斯卡尔政府的发明规定妇女在市政议会中的定额为15%；1980年，主管家庭和妇女条件的总理助理莫尼克·佩勒提耶决定将该定额提高至20%；这个政策在1981年得到继承和放大，时任妇女权利部长的伊维特·鲁迪和国民议会女议员吉塞尔·阿利米将定额提高到了25%。但是这个在议会获得通过的法案，被宪法委员会否决，理由是这个法案曲解了平等的原则。妇女参政的问题在1980年代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进展，只有当定额的问题逐渐转化为对“男女均等”的诉求后，才出现了转机。“男女均等”最初只是一些小型团体或讨论会的秘密话题，该主题直到1992年由于弗朗索瓦兹·加斯帕尔、克洛德·塞尔旺－施莱贝尔、安娜·勒加尔合著的《自由、平等、均等》一书的出版才开始为公众所知；同年11月2日至3日，埃迪特·克勒松和西蒙娜·维尔在希腊雅典签署了一份欧洲文件，该文件宣布：“民主要求每个民族的代表和行政中都必须实现男女均等”。“男女均等”运动就此开始，各种社团和宣言不断出现，媒体也做出了响应。1994年6月，在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时，“工人斗

争”、共产党、“公民运动”、社会党和绿党5个政党提交的候选人名单体现了“男女均等”。在1995年总统选举的选战过程中，“男女均等”问题成了候选人们倡导的主题之一，每个候选人都做出了有关的建议和承诺。当选总统后，希拉克立即敦促总理朱佩增加妇女在政府中的比例，并于1995年10月18日成立了“男女均等”观察委员会，负责向公共决策者就该领域的法令法规改革做出解释。同12月，吉塞尔·阿利米将政治生活中男女均等委员会的报告上交给了总理朱佩，建议通过修改宪法来确定定额或均等原则。1996年，有关男女均等这个政治生活崭新话题的辩论，不仅在政治家、宪法学家、新闻编辑中间，也在妇女自身当中引发了激烈的论战。1996年6月6日，新闻周刊《快报》刊登了一篇有关“男女均等”的宣言，10个联名签署人的声望使该宣言的轰动效果得到了保障，她们是米歇尔·巴尔扎什、弗雷德里克·布勒丹、埃迪特·克勒松、埃莱娜·吉瑟罗、卡特琳娜·拉吕米埃尔、维罗尼克·奈伊埃尔兹、莫尼克·佩勒提耶、伊维特·鲁迪、卡特琳娜·塔斯卡和西蒙娜·维尔。不久之后的9月21日，社会党宣布该党参加下一届立法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中妇女将占到三分之一。1997年6月19日，获得立法选举胜利的若斯潘在国民议会宣读总体施政纲领时，强调“将对宪法进行修改，把实现男女均等的目标列入其中”。1998年春季，遵循这个设想的立法计划得到了部长会议的批准，共和国总统希拉克此前已经答应接受这个有关修改宪法的主张，尽管他明确表示自己其实并不太情愿这样做。在这个“男女均等”不断取得进展的时期，有关“任期累积”的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5年12月30日的法案对缩减任期累积做出了规定，1076 1999年开始实行的新法案进一步对任期积累做出了缩减（缩减任期积累会导致政界人员的更新和多样化，有利于妇女承担更多的责任），由此导致的变化的广度是可以想象的。

总之，法国的政治生活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戴高乐和蓬皮杜开启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第五共和国这个与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有着很大差异的政治背景下，法国重新找回了与欧洲

邻国相似的更加传统的议会民主道路，但同时又体现出由自身历史和第五共和国宪法共同决定的特性。在法国这样一个有着更多“恺撒”传统而不是“自由”传统的国家，出现这种“正常化”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政治家的意愿，而是公民们的选择，这一“正常化”是 1975 年的法国和二十世纪末的法国之间的显著区别。比较而言，法国同一时期在国际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也毫不逊色。

三、法国与世界

夏尔·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第一卷开篇这样写道：“法国迄今屹立于强国之列，其实不是靠自身的实力。法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成为‘强国’，而必须坚定地追求更高的目标，哪怕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简而言之，我的意思是：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1970 年代中期，法国的远大抱负丝毫没有改变。戴高乐将军在 1958 年开始的愿望，就是在国际上重建法国的伟大，而在国内法国总统应该成为这种伟大的“拱顶石”。根据第五共和国宪法，国家元首总统应该是民族独立和国土完整的保证。总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的最高责任是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使用战略力量，来决定祖国及其人民的命运。这种“核武器君主制”，除了可以保证法国的安全，还应该能够确保法国的独立地位（不是中立地位，因为法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正如密特朗所说：“在尊重维系我们与盟国关系的承诺的同时，还必须并且永远必须确保法国对当前各种国际事件拥有独自做出评价的能力，即做出决定的自由。而且，法国应该靠自己取得所有必不可少的条件”。

既然进行了这样的定位，“高卢雄鸡”的国际战略就只能是全球性的，其原则是在这个由东西方对抗主导的世界上，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这个原则至今未变，尽管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密特朗都稍微进行了调整，但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了戴高乐确定的战略的延续性。毫无疑问，在法国雄心勃勃的对外战略蓝图中，相对于法国在国际事

务中说话的真实分量，有相当一部分“幻想”的成分，但战略的意义正在于此。一直到1989年，尽管任务极为艰巨，甚至有些虚幻，但法国始终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达到目标。自从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针对新的世界局势，法国不得不对国际战略进行了取舍，调整了自己的抱负和目标。从战略在1980年代的艰难持续到1990年代的必要调整，法国与世界关系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1980年代的持续

石油危机、经济困难、冷战的回归和美国人恢复冷静是1975年至1989年之间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它们破坏了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独立自主地位的能力，削弱了法国的影响力的远度和辐射区域的广度。由于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管怎样，北约确实保护着法国的安全——的保护撑腰，由于拥有自主的军事打击能力，法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中自由地、理直气壮地讲话。戴高乐和蓬皮杜时期，由于法国与美国的立场有着明确的不同，甚至产生了阴暗的民族主义，这激怒了华盛顿，惹火了欧洲邻国，但赢得了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好感。法国追求的是始终能够与华盛顿和莫斯科平等对话，而且让双方都能清楚地听到法国自主发出的声音，于是法国根据外交局势的变化，通过不断与一方或另一方接近或疏远，主动在两个阵营之间承担调停者或中间人的角色。 1077

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国际

在1973年至1974年初两个阵营激烈较量期间，法国尽管因石油危机而被削弱，但仍然抵御了美国“拉拢控制”整个西方世界的企图。随后，刚开始自己为期7年的总统任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就与华盛顿迅速接近。1974年12月，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会见了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签署了法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合作的共同宣言；1976年1月，法美两国在牙买加达成协议，法国将在国际货币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这些举动宣告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但法国仍然拒绝回归北约，或成为北约的一个温

顺的伙伴国，因为团结在总理希拉克周围的戴高乐党人，一直密切观注着事态的发展，以防止法国的独立地位受到威胁（与欧洲伙伴国不同，法国在1974年11月拒绝加入“国际能源署”）。由于水门事件、福特短暂的总统任期、美军在越南的惨败而归和吉米·卡特总统的挫折（尤其是在伊朗）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一度徘徊不前；与此同时，苏联在非洲积极“拱卒”，并通过部署SS20导弹增强了在欧洲的军备，目的是恐吓欧洲人，使他们远离美国人。在这种局势下，法国自然再次玩起了“跷跷板”游戏，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重新建立了特别的关系，毫不顾忌当时在两个阵营之间越来越浓的冷战气氛。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与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保持着特殊的友好关系。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访问巴黎；1975年10月和1979年4月，吉斯卡尔·德斯坦两次访问莫斯科；1980年5月，两人还在华沙会晤，法国和苏联及其“卫星国”之间的部长级互访和合作则更加频繁。吉斯卡尔·德斯坦一点也不担心苏联在非洲、远东和近东的攻势（尽管这种攻势让华盛顿颇为担忧，而且使缓和的局势重新严峻起来），因为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自从1975年8月《赫尔辛基协定》——规定二战后形成的欧洲边界现状不可破坏——签订后，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威胁，而且苏联在欧洲大陆上的安全忧虑是正当合理的。另外，由于吉斯卡尔·德斯坦相信意识形态的斗争必将终结，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将趋同，他认为法国的角色在于与东方阵营的国家进行对话，促进它们追求经济发展，逐渐向和平理念转变。因此，尽管苏联在第三世界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性，而且在欧洲边境大量部署SS20导弹，以及在1979年12月25日入侵阿富汗，吉斯卡尔·德斯坦仍然坚持与苏联交朋友，因为他坚信对话、贸易、合作、缓和的作用，而所有欧洲伙伴国都有着与法国极不相同的分析结论，它们都因为华盛顿对莫斯科表现出来的弱势深感不安。正是由于这种不安，北约于1979年做出决定（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服了美国总统卡特之后）：如果苏联不拆除SS20导弹，北约将从1983年开始部署新的欧洲导弹（潘兴2导弹、巡航导弹），法国拒绝公开支持

北约的这个计划。于是冷战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苏联习惯性地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来动摇北约内部的团结，从而扭转了国际社会的舆论倾向，并从欧洲获得了急需的金融、技术和商业援助，用来供给本国的军事工业系统，并为人民提供食物。根据《赫尔辛基协定》，大批东欧异见者以追求自由的名义越过西欧国家开放的边界，但吉斯卡尔·德斯坦拒绝为他们提供便利；而卡特和一些欧洲国家则以人权的名义为他们提供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以外交和军事力量独立的名义，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与东方阵营保持对话，甚至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还和勃列日涅夫在华沙会谈，争取到了苏联承诺从阿富汗部分撤军的令人乐观的结果（事实证明部分撤军的承诺纯属谎言）；吉斯卡尔·德斯坦还拒绝和美国联合起来进行报复的号召，尤其是没有跟随美国抵制 1980 年 7 月的莫斯科奥运会。 1078

正如从前戴高乐将军仅仅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视为“航程”中的一个小事故，认为它并不会改变最终与东方阵营同奏“缓和—妥协—合作”的三部曲一样，吉斯卡尔·德斯坦在苏联试图将欧洲“芬兰化”（在维持议会民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又处于苏联势力控制之下），在第三世界孤立美国的时候，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与莫斯科的友谊。这显然超越了两个阵营之间的均衡，因此密特朗 1981 年上任伊始，就致力于恢复平衡，强调北约内部必须在 SS20 导弹等主要问题上保持亲密无间的团结，同时不加掩饰地开始与苏联保持距离。密特朗之所以作出这个重大转变的决定，是一系列国内的——正值冷战时期，因为政府中有共产党的存在，法国不得不作出姿态，以使欧洲邻国和美国放心——和国外的——受苏联入侵阿富汗刺激，卡特下定决心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推出了一系列军事计划；1980 年继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明显是一个坚决反对苏联的人，他决定使美国强势回归国际舞台，对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法国经过外交分析得出的结论。根据分析，保障和平的最好方法是力量的平衡，而这个平衡正因为苏联在第三世界采取的攻势，和莫斯科自认为在核武器方面对美国占据的优势而受到了严重威胁。

从此，密特朗对北约部署欧洲导弹的计划公开表示支持，在 1981 年至 1983 年间，密特朗与里根一共会晤了六次，并于 1984 年 4 月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还中止了每年与苏维埃国家进行一次高峰会谈的传统；甚至在 1983 年 1 月 20 日法德两国签署《爱丽舍条约》二十周年之际，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演讲，呼吁德国议员们投票支持在德国境内部署北约导弹，为了安抚大规模示威反对北约部署导弹的欧洲和平主义者，密特朗在演讲中强调："欧洲导弹是用来对付东方的，而和平主义者则是属于西方的"。这次"战斗"取得胜利后（科尔 1983 年 3 月 6 日以 49% 的支持率再次当选德国总理；北约内的欧洲国家统一执行北约 1979 年做出的决定），由于坚信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必将就此重新恢复，密特朗马上就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再次玩起了"跷跷板"游戏。1984 年 6 月，密特朗访问了苏联，会见了勃列日涅夫体弱多病的继任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和尤里·安德罗波夫，重新建立了法国与莫斯科之间的特殊联系。毫无疑问，尽管密特朗与前任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他毫不迟疑地强调了人权问题，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于苏联异见者（尤其是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支持，并直言不讳地反对苏联占领阿富汗，以及 1981 年的波兰政变，但他丝毫没有放弃戴高乐以来对克里姆林宫及其附庸国友好的传统，他甚至于 1985 年在巴黎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接见了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另外，密特朗于 1985 年 3 月 13 日参加了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葬礼，期间他在克里姆林宫与米哈伊·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三刻钟的会谈，从此就开始竭尽所能地支持戈尔巴乔夫。密特朗在 1985 年 10 月

1079 对戈尔巴乔夫说："我自幼学习历史，我深知从十六世纪开始，法兰西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几乎一直是盟国和朋友。历史和地理使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这种关系。"因此，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体系、一个苟延残喘的帝国的最后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法国作为自己访问的第一个西方国家，法国再次承担起了苏联的优先对话者的角色。由于担心历史的洪流最终会导致苏联陷入混乱，或导致苏联出现军人掌权的局面，从而导致苏联对内完全抹杀业已取得的自由化改

革成果，对外则为了防止苏联的崩溃和两德的统一而采取强硬的态度，法国竭尽全力帮助和拯救戈尔巴乔夫，直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下台。密特朗关心的是能够为东欧的演变进程设置一个框架，使其始终能够和平地发展，同时在从1945年形成的欧洲秩序行将终结的局势下，尊重外交平衡，维持法国作为一个强国的角色和地位。

法国之所以为苏联提供支持，还在于法国对美国的一种担心。密特朗坚信欧洲及其人民共同期盼的和平和缓和的唯一保障，就是维持两个阵营之间的平衡，他从1985年开始意识到，在经历了一段苏联占优势的不平衡时期后，世界正在进入美国占据强势地位的新时代，而这种美国的强势和从前苏联的优势是同样有害的。凭借在欧洲导弹这件事情上取得的成功、在美国国内和整个西方世界赢得的高民意支持率、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和国外军事实力的回归，强硬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希望进一步扼制苏联，他使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国际交流中占据上风，并积极动员欧洲配合自己的行动。本着这一强烈对抗的精神，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推出了《战略防御计划》，目标是将世界从核战争的威胁中解放出来。设计《战略防御计划》的初衷，本来只是作为一件意识形态的武器，目的是促进欧洲舆论接受欧洲导弹的部署，但是从1984年至1985年开始，法国清楚地意识到该计划其实只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空想的秘密。本着人道主义道德观（即提供一种保护，足以使战略核武器成为幻影，使原子弹大屠杀的幽灵消失），《战略防御计划》主要致力于动员科学和技术力量参与到公共计划里来，通过实现显著的科技进步，并在私人公司转化成具体的成果，确保美国在未来新科技领域取得优势地位。但是该计划更大的目标在于政治军事方面，即让美国重新变得坚不可摧（在苏联拥有原子弹和洲际导弹之前，美国就拥有这样的地位），使苏联在新的一轮超越了其经济和技术极限的军备竞赛中最终“窒息”。从1985年开始，法国就与该计划保持着距离，拒绝卷入美国的这场所谓“反原子弹盾牌”的行动之中，因为该计划如果有朝一日真的实现，法国的核威慑和外交地位都将立即灰飞烟灭。密特朗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反对这场新一轮

的军备竞赛，并向欧洲伙伴国提交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研究计划——欧瑞卡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使“旧大陆”在科技竞争中不被甩得太远。一直到苏联解体，密特朗都在坚决地反对战略防御计划，1993 年 5 月 18 日，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正式宣布放弃《战略防御计划》。

不过，法国和美国之间的争吵并不仅限于这个问题上。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由于美国想要对金融、技术和商业向东欧的转移拥有完全的支配权；在关贸总协定框架内的协商上，华盛顿总是希望获得更大的自由，以便利用其比较优势在全世界市场上赢得更大的利益。法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在上述第一个问题上对东欧更灵活一些，在上述第二个问题上则对美国更强硬一些。

1080

南北之间

尽管法国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奉行特殊划分的政策，除了在言语上独立自主地发表意见，并没有在东西方对抗中产生真正显著的影响力，不过在南北关系中，法国充分体现了自身的特殊性。戴高乐将军曾希望法国成为第三世界的“辩护律师”，充当第三世界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有效的调停者。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密特朗两位总统先后接过了这个火炬。

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和南方国家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使巴黎决心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由此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提出了南北对话的主张，旨在通过协商的方式，实现南方国家经济的去殖民地化，在南北之间开展互利的合作。1975 年 12 月，首届南北对话会议在巴黎召开，与会的是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非石油生产国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这一轮对话到 1978 年底以失败告终；取而代之的“三方对话”，即欧洲、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三方的谈判最终也没有形成任何决议，主要是因为组织者拒绝让巴勒斯坦人参加谈判。事实上，法国一直未能说服欧洲伙伴国，在近东问题以及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等问题上与自己采取相同的立场，也是对话

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巴黎与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与以色列走得更近。吉斯卡尔·德斯坦延续并加强了这个指导方针。为了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法国自认为与苏联和美国一样，是在中东有着较强势力的国家之一，每个国家在那里都有各自忠实的支持者），以确保获得石油资源，并通过与当地国家签订巨额民事（包括核能）和军事合同来收回部分能源支出，法国增强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友谊，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充当了“箭头”的角色（1974年法国外交部长会见了亚西尔·阿拉法特）；1975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巴黎设立办公室，相当于巴勒斯坦非正式的大使馆；法国在监督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军的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中占据了重要的比重；法国对《戴维营协议》和《以埃和平协定》（1979年3月，在美国总统卡特的主持下，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艾尔－萨达特共同签署）持保留意见；1980年6月在欧洲峰会上，法国还争取到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支持，发布了《威尼斯宣言》，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这些表现使法国不仅打开了伊拉克市场的大门，与海湾的酋长们达成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协议，进一步深入伊朗（直到1979年2月伊朗巴列维国王被推翻），还确保了作为阿拉伯世界优先对话者的地位，这个地位还因为1980年伊拉克开始进攻霍梅尼领导的伊朗后，法国不遗余力地支持萨达姆·侯赛因而得到加强。尽管法国自己获得了利益（外交高度、贸易成果和能源安全），但引领的开创世界经济新秩序和“三方对话”等计划均未取得成功。1981年密特朗出任总统后，法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继续这些计划，因为密特朗认为必须让第三世界听到来自法国的独立自主的和积极的声音。受到雷吉·德布莱——切·格瓦拉的朋友，1960年代在玻利维亚被捕——的鼓舞，新总统密特朗在经济手段之外，又提高了政治声调，支持各种革命运动，尤其是拉丁美洲的革命。1981年10月21日，在墨西哥坎昆举行南北对话峰会开始之前，密特朗对墨西哥进行了国事访问，他宣布自己与那些“拿起武器捍卫自由的人”站在一起，他还向那些饱

1081

受侮辱的人、流亡者、被放逐者、被剥夺言论自由的人、被虐待的人，勇敢战斗的人、教士、工会主义者、失业者和劳动者致敬，并强调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一定会实现。密特朗鼓励他们，“勇敢些，自由必将取得胜利”。就像当年戴高乐将军在魁北克和墨西哥城所做的那样，密特朗以自己的方式向美国的“后花园扔石头”，不过这些举动并没有产生具体的成果，而且在南美解放运动在政治上与苏联靠齐后，密特朗不得不赶紧脱身而出。于是，密特朗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前任吉斯卡尔·德斯坦一样承担起第三世界的辩护律师的责任，但是第三世界在 1980 年代因为失去了石油武器，并且内部出现了严重分化（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另一些非洲国家则深陷不发达状态无法自拔），已经没有了 1970 年代那样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密特朗试图说服“北方”伙伴国认识到“南北对话”的政治紧迫性和其中包含的经济利益，1981 年 9 月 1 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有关“最落后的国家”的报告会上，密特朗呼吁：“帮助第三世界，就是帮助自己走出危机”，他还承诺到 1988 年，将法国的公共发展援助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0.7% 的水平（1987 年达到了 0.56%）。在巴黎俱乐部的范围内，法国也始终是最坚定地主张减免贫穷国家债务的国家。巴黎先后与墨西哥城（1981 年 10 月）、阿尔及尔（1981 年 12 月）和新德里（1982 年 11 月）签订了双边协定，试图建立一种“三足鼎立”的构架，在此基础上推行帮助第三世界的政策，但这个构架作为吉斯卡尔·德斯坦推动的“三方对话”的代用品，并没有取得比“三方对话”更多的具体的成果，因为墨西哥城在华盛顿面前基本上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阿尔及尔则对法国向拉巴特（摩洛哥首都）献殷勤感到恼火，而新德里则为了国防与外交以及对抗来自中国的威胁，与莫斯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前几任总统任期内一样，第三世界政策很快就受到了局限，但密特朗成功地对政策方向进行了调整，转为近东地区，而且并没有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敌意。自从上任以来，密特朗先后取消了多个由前任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制定的针对以色列的限制条款，他宣布《威尼斯宣言》无效，并在 1982 年 3 月作为第一个法国国

家元首访问了以色列。密特朗在以色列国会进行了一次著名的演讲，阐述了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些新原则：巴勒斯坦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度”，即在时机成熟时，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而以色列有权得到巴勒斯坦人的承认，而且从巴勒斯坦人那里获得安全和边境不可侵犯的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通过相互承认和协商。这种在国际争端双方之间实现平衡的主张，是法国在近东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尽管否定了以前的立场，但是法国的新政策对巴以冲突问题的解决作用不大。前后两任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伊扎克·沙米尔由于有美国撑腰，始终对法国提出的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话的建议置之不理；以色列工党领袖希蒙·佩雷斯曾经在1986年至1988年担任总理，但他未能使以色列有所改变；1988年伊扎克·沙米尔由于利库德集团在议会的绝对优势，再次担任总理，但他仍然坚持从前的立场，丝毫不想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松动。不过，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阿拉法特两次在黎巴嫩遭到以色列军队和叙利亚军队的左右夹击时，都被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中的法国军人解救了出来（1982年9月和1984年12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因此得以保存，并在199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新局势和美国的意愿而得以实现，不过《奥斯陆协议》的签定无法避免和平进程中的重重困难。法国在进行有利于以色列的平衡的同时，也在积极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与伊朗作战的萨达姆·侯赛因，因此法国仍然拥有与阿拉伯国家——埃及、波斯湾的几个酋长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优先关系，并从中获得可观的利益，出售军火的利润尤 1082 其巨大。但是法国也为自己的近东政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1982年马尔伯夫街、1982年玫瑰街和1986年香榭丽舍大街先后发生三次炸弹爆炸；1986年9月发生恐怖主义攻击浪潮，其中雷恩街的炸弹爆炸造成5死53伤；1983年10月在贝鲁特发生的自杀式卡车爆炸造成58名法国伞兵丧生；1985年和1986年都有法国人在黎巴嫩被劫持为人质。

总的来说，在1975年至1989年的国际背景下，尽管面临着冷战

加剧、经济危机、能源依赖和美国恢复强势等不利因素，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密特朗两任总统仍然竭尽全力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在南北之间，维护戴高乐和蓬皮杜开创的“伟大”的传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密特朗并不比两位前任拥有更多可以改变世界秩序的手段，而且法国奉行的“夹缝型”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唱一些“高调”，但无法取得具体的结果。这个局限性是由法国中等的国家实力决定的，尽管法国算是强国之一，而且拥有可观的核武库，但是几乎不可能独立地对这个由两个阵营的对抗主宰的国际秩序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于是，法国的领导人们试图将法国的特殊地位和欧洲联合起来，希望通过欧洲传递自己的影响力。

选择欧洲

由于备受两个阵营的僵持和石油危机的打击的折磨，法国很难开展独立自主的行动，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密特朗两位总统为了让法国拥有更大的国际操作空间，选择了欧洲的道路。从 1974 年开始，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推动了欧洲理事会的建立，作为欧洲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定期会议，欧洲理事会旨在深化 1970 年代初由欧洲各国外交部长共同开创的合作政策，从上往下地推动欧洲的建设，解决那些紧急的重要问题，以及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公开采取一致的立场。另外，法国在规划欧洲货币系统的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 1969 年 12 月在海牙举行的欧共体领导人峰会上，作为同意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条件，蓬皮杜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系统的计划，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将应该能够对抗已经破烂不堪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取消了美元和黄金的固定兑换率，开始实行浮动汇率政策）。但是该计划受困难重重的国际经济和外交形势的拖累，未能及时得到执行。不过，货币的稳定对欧共体“九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是非常必要的。吉斯卡尔·德斯坦与德国总理施密特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他们共同恢复了戴高乐与阿登纳时期的法德友好关系，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深信欧洲团结的必要性，于是共同推出了建立欧洲统一货币的主张。

于是，1978年4月8日，欧洲货币系统及其货币埃居①诞生，从1979年3月13日开始生效，埃居是根据每个国家的经济比重确立的各国货币的聚合体。欧共体各国的货币与埃居之间建立起一种基准汇率，同时允许在基准汇率上下2.25%之间浮动，由此产生了一个相对于美元的稳定的货币地区，有利于欧共体各成员国的经济完整性。在1974年召开的欧共体委员会上，法国同意增大总部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的权力，以及按照《罗马条约》的精神通过普选选举欧洲议会的议员。尽管法国共产党和戴高乐派反对，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还是做出了同意的决定。1979年6月10日，欧洲议会第一次由普选产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亲信西蒙娜·维尔当选为欧洲议会主席，象征着法国接受了在本着超民族主义思想建立的欧洲组织中的新角色（这遭到了严格的戴高乐主义正统派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这样有损法国的国家主权）。然而，由于"反欧洲"的保卫共和联盟在多数派中的比重、法国共产党仍然强大的影响力、"亲欧洲"派内部法兰西民主联盟、与共产党共同组成议会反对派的社会党、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和英国在布鲁塞尔的消极态度，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德斯坦这对德法搭档的欧洲理想并未能立即实现。 1083

所以当密特朗上任之时，面对的是一个搁浅的欧洲建设工程。他将努力使欧洲建设的火焰重燃，因为他意识到："法国是我们的祖国，但欧洲是我们的未来"。密特朗在这个领域非常活跃，在1983年即担任总统仅两年之后，他就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法国的独自行动。在法国国内，由于经济振兴计划因经济形势萎靡而遭到失败，另外欧洲伙伴国由于选择自由主义，拒绝实施法国提出的明显意志至上的改革计划（1981年，法国提出建立"欧洲社会空间"、共商工业计划、共同缩减法定劳动时间），法国的财政赤字和法郎贬值不断加剧，所以总统密特朗1983年3月毅然决定走欧洲道路，因为只有依靠欧洲才能使法国的经济走出困局。在法国国外，由于冷战的约束，法国不得不与美国

① 即欧洲货币单位Ecu。

拉近距离，与德国保持紧密的联系；另外法国有关第三世界的单独行动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不论是在非洲和近东，还是在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框架内，法国总是因为自身实力不够，无法使事情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在国内和国外，法国使尽了浑身解数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单独的伟大"，但都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于是总统密特朗决定选择欧洲，认为欧洲是唯一能够替代已经走进死胡同的"独白"的可靠途径。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这对政治搭档依靠法德友谊的基础，成了欧洲新建设的发动机，为了加强法国在欧洲以及加强欧洲在世界的重要性，从以下三个方向进行努力：地理扩大、经济深化和政治超国家化。

法国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是蓬皮杜总统下决心接受了英国，没想到10年后英国居然阻止欧共体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想见蓬皮杜为此多么生气。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为希腊加入欧共体提供了大力支持，但不断"敲门"想要进入欧共体大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问题与希腊有所不同，因此尽管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与马德里当权的中间派以及西班牙王室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还是拒绝了这两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敌意、"埃塔"[①] 造成的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和法国农民为反对进口西班牙水果和蔬菜而对政府进行的频繁攻击，同时还因为英国提出的财政要求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废除对法国非常有利的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的主张，法国无法接受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如果加入欧共体，两国的经济升级将需要欧同体提供大量的资金，而且两国较低的工资水平会造成商品倾销、工厂迁移、劳动力涌入（法国的失业率尚在不断升高）等风险，另外法国的渔民和盛产葡萄酒、水果和蔬菜的南方的农民的忧虑，诸多原因导致法国决定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关上欧共体的大门。不过从长期来看，法国的利益在于促进欧共体向南欧扩张，使法国在地理上变成新的欧洲联盟的心脏，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越

① 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裂组织，后方基地设在法国南部巴斯克地区。

过一些障碍。第一个障碍因1982年10月社会党人费利佩·冈萨雷斯担任西班牙首相而被解除，他和密特朗是1970年代社会党国际的亲密战友，两人迅速接近，尤其在解决有关巴斯克问题的争议，缓解两国之间政治和媒体的紧张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84年底，两国间开始就西班牙加入欧共体的技术问题进行磋商，巴黎要求在葡萄酒、水果、蔬菜和渔业方面得到保障，而且是总体的保障。1985年6月，西班牙终于签署了加入欧共体的协定，1986年7月1日该协定正式生效。还有第二个障碍需要解除，即解除欧洲建设的总体阻碍。 1084

1984年6月在法国枫丹白露举行的欧共体峰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自从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1983年3月选择了欧洲道路——留在"欧洲货币体系"内——之后，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平衡政府财政收支，消除通货膨胀，巩固法郎的地位，他不能任由欧洲继续已经持续了十年的陷落。他的政策并不仅限于欧洲建设的重新启动。由于与德国总理科尔有着紧密的关系，在SS20导弹问题上也得到了科尔的大力支持，密特朗解决了前任总统未能解决的问题。法德的共同立场减弱了英国的抵抗，"支票"问题得以解决，另外法国从欧共体获得了更多资金（来自欧共体成员国缴纳的1%至1.4%的增值税），作为与西班牙和葡萄牙达成协议的交换条件；同时，根据巴黎的意愿，欧共体开始起草一个新的欧洲联盟条约，该条约将在教育、青年和研究等领域实现突破。此外，密特朗和科尔决定推举雅克·德洛尔自1985年6月1日起担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欧洲建设由此走上了深化的道路。首先是欧共体成员国于1986年2月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理事会上签署的《单一欧洲法令》，该法令规定：在1994年之前，建成欧洲"内部大市场"，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将在其中自由流通；将欧洲理事会制度化，并增加欧共体的职权范围；扩大有效多数投票的范围并加大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的职权，这意味着欧共体各国对欧洲进程中超国家化增强的认同。

事实上，欧洲建设的深化意味着超国家化和联邦化原则的增强，而这不仅是戴高乐时期的法国坚决反对的事情，也是吉斯卡尔·德斯

坦难以说服多数派中的保卫共和联盟接受的事情。根据《单一欧洲法令》的要求，德洛尔和欧共体委员会推动了各国法律的协调化工作，所有有关经济、技术（标准）、商业和金融的法国法律都有必要进行修改，德洛尔在 1985 年就断言，在 10 年的时间里，将有 80% 的法国法律根据欧共体的法规进行修改。另过《单一欧洲法令》通过有效多数投票比例的增加——这是巴黎传统的"眼中钉"，因为这是超国家化的"特洛伊木马"——和欧洲议会与欧共体决策之间更纯粹的联系（欧洲议会这个机构从性质上来说，本来就是超国家的），将法国纳入了一个从"欧洲国家同盟"——法国在其中坚持主权完整的前提，强调各国政府间行动的一致性原则——转变为"欧洲合众国"的进程之中，而"欧洲合众国"主要按照联邦性质的机制运转。当然，这个进程将很漫长，它在第三个千年的最初几年仍未能完成：现在主要由欧洲理事会这个特别的政府间机构来决定这个进程的前进步伐。在转让国家主权方面，密特朗领导的法国没有科尔领导的德国那么勇敢，但是法国的选择已经是对过去政策的断然否定（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众并不了解这一点）。从 1985 年开始，尽管法国仍然寻求保存作为独立自主的大国的特性，并努力使本国的看法和利益在布鲁塞尔[①]的决策中占据上风，但在事实上，法国已经同意放弃那些在实践中越来越虚幻的国家主权，目的是为了通过欧洲建设，弥补自身业已削弱的国家实力，法国希望就此走上经济、贸易和货币发展的"阳光大道"（1983 年 3 月的选择和一系列政策均源于此）。在 1988 年总统大选期间，密特朗在《致全体法国人民书》中部分地揭示了自己的计划：欧洲大市场仅仅是欧洲这座"冰山"上最显而易见的"一角"，最终目标是使欧洲成为一个强大的整体，而且法国能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说："欧洲已经在国际贸易中排名世界第一，只要欧洲愿意，它也可以在科学、技术和农业上成为世界第一，还可以在工业实力上与美国和日本一争高下。欧洲人刚刚确定的欧洲货币——埃居，将和

① 欧共体即后来的欧盟总部所在地。

美元与日元一样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三极之一。”密特朗在《致全体法国人民书》的末尾展望了未来的欧洲政治，还以一句颇似君主口吻的话作为结语：“由于我的努力，欧洲建设的主张已经步入了正轨”。欧洲将成为法国的“国界”，欧洲建设的发动机是法德两国，其远景是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对帝国的怀念

这个在1989年时看来必然的远景，在1975年时却远非如此。当时，法国还相信能够依靠广大的法语地区巩固自己的实力，并继续凭借自身的能力掌控在1960年代被正式赋予独立地位的广大殖民地地区，因为当时有广大的“法国南方”——非洲。1975年2月，欧洲和46个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国家签订了《洛美协定》，这些国家的产品得以免关税和无配额地进入欧洲市场，并通过“稳定出口收入制度”获得原材料出口的稳定收入的保障。1979年10月，第二个《洛美协定》续签。法国尽管在欧洲共同体内部扮演着“自己的南方”的有效代言人角色，但却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非洲特性。法国不仅通过多领域（金融、贸易、经济）合作给非洲提供双边援助；每年还在巴黎和非洲组织法非峰会（在峰会上，整个“大家庭”都会聚集在法国“宗主”身边）；并与非洲国家缔结特别协定以确保政局稳定；在总统府设置主管非洲事务的特别顾问，在非洲大陆派出总统的特别“巡查使”；法国总统还为了双边接触频繁访问非洲国家。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密特朗两任总统都追随着戴高乐缔造的“巴黎主导的法语共同体”的梦想。这些对帝国的怀念，经常使法国主动地去趟一些“浑水”，为了维护宗主国的地位，法国有时候甚至不顾人权、民主和非洲大陆的安全，而这些问题居然是法国进行军事干预时经常援引的理由。法国在1976年至1977年出兵吉布提，帮助该国抵抗来自索马里的压力；1977年4月和1978年5月两次向扎伊尔派出伞兵部队，解救饱受沙巴地区和以科卢韦齐市为中心的产矿省的起义困扰的蒙博托元帅；1977年9月，法国出兵西撒哈拉，帮助毛里塔尼亚抵御来自寻求

地区独立的“波列萨里奥阵线”[1] 的威胁；在乍得，法国出兵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利比亚将乍得“黎巴嫩化”，并把该国并入自己势力范围的企图。但是，这些军事援助行动都被法国与中非共和国及其不可捉摸的暴君让－贝代尔·博卡萨之间可疑的关系所遮盖，博卡萨作为中非共和国总统却自封皇帝，并于1976年12月4日加冕，由于坐视这件丑剧的发生，法国的国际形象遭到了玷污。中非迅速陷入困苦之中，社会制度因腐败和镇压而彻底沦丧，暴君博卡萨甚至屠杀儿童。虽然法国不久即推翻了博卡萨政权（1979年9月，被认为可靠的大卫·达科被法国扶植当上了中非共和国总统），但与博卡萨曾经的亲密关系（尽管当时还没有人将这种关系归因于博卡萨赠送的贵重礼物）使法国领导人的形象受损：“博卡萨钻石”事件对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81年谋求再次当选总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086

密特朗上台后也面临同样的矛盾。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了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却不小心因一个低劣的帝国的暴君而名誉受损；密特朗在墨西哥发表了鼓励当地人为自由战斗的讲话，却在扎伊尔长期支持破坏自由的蒙博托。好在到了1981年5月，一个新的非洲政策逐渐成型。早在1970年代，社会党人在密特朗和加斯东·德菲尔的领导下，提出了“对非洲和法国的关系去殖民地化”的主张。到了1981年，法国外交部长克洛德·谢松进一步提出了制定“全球新协定”的主张，以消除法国外交政策的非洲特性；合作与发展部长让－皮埃尔·科则希望将法国与非洲国家的联系“道德化”，结束秘密部门（间谍）或多或少的暧昧行动，减少军事干预，提倡对人权的尊重和以发展为目的的行动，而且不再仅仅关注法语国家，而是将非洲视为一个整体，对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一视同仁。但让－皮埃尔·科很快就不得不在政策上开倒车，甚至于1982年辞职。继任的克里斯蒂安·努西是一个对总统府言听计从的人，他丝毫都不想触及蒙博托、

① 即“西撒人阵”。

邦戈[①]和塞古·杜尔[②]等非洲领导人敏感的神经。实际上，密特朗在1981年当选法国总统后，保留了总统府中设置“非洲事务小组”的传统，由总统的亲信居伊·派讷担任组长，其前任先后为雅克·佛卡尔、勒内·儒尔尼亚克和马丹·伊尔什。一方面由于密特朗对非洲及其领导人的好感，另一方面非洲领导人也很愿意撇开马提尼翁府和法国合作开发署，走捷径直接和爱丽舍宫进行磋商，因此法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传统得到了延续。不过大多数社会党人和其他很多党派的政治家都希望法国能够摈弃这个传统，转而致力于发展非洲的民主，提高非洲国家的管理水平，尊重人权，将法国政府的援助真正用于非洲的发展，而不是听任非洲腐败的精英们中饱私囊，或者被法国的政党据为己有。于是，法国重拾“非洲宪兵”的角色，为了防止利比亚进攻乍得，密特朗派遣3000名法国士兵前往乍得（蒙博托派出了2000名扎伊尔士兵，负责法军的侧翼掩护），迫使利比亚在1984年底签订了《巴黎—的黎波里协定》。由于利比亚并没有遵守该协定从乍得完全撤军，密特朗不得不于两年后在克里特岛[③]与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进行会晤。不论是在法非峰会上（第一届法非峰会于1981年11月3日至4日在巴黎举行），还是在双边会谈中，密特朗总统经常强调增加法国对非洲国家的公共援助，支援最贫困的国家和稳定原材料的价格，但却没有要求非洲领导人改善政治习性，促进民主发展，消除贫困。继“博卡萨钻石”丑闻后，法国又爆发了“发展路口”资金挪用事件：“发展路口”有一笔资金本应用于1984年12月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召开的法非峰会，但是其中有一笔钱被挪用，用来支付选举费用和一些特殊关系的人的奢侈的支出。在非洲生活着大约17万法国人，还有2000家法国企业（其中约有1000家中小企业），尽管非洲每年从法国获得200亿法郎的公共援助，而且非洲与法国的年进出口总额达到500亿法郎，但非洲始终在贫困和无政府状态中无法自拔。一方面，

① 全名哈吉·奥马尔·邦戈（el Hadj Omar Bongo），从1973年起长期担任加蓬总统。
② 全名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e），几内亚前总统。
③ 希腊岛屿。

法国无力回天。原材料价格的暴跌造成资源紧缺，人口的膨胀需要更多的粮食供应，非洲领导人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向往动摇了农村的传统和平衡，工业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漠不关心，使非洲无法获得走出困局所必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另一方面，法国增加了对非洲的援助，促进了《洛美协定》的多次续签（根据1984年的第三个《洛美协定》，非洲每年获得88.54亿埃居的资金援助；根据1989年的第四个《洛美协定》，非洲每年获得的援助增加到了120亿埃居），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非洲的援助计划，法国不仅减轻了非洲国家的债务，甚至在1989年取消了最贫穷非洲国家的债务（约合270亿法郎）。尽管这样还不够，但法国和其他国家如美国一样只能做到这些了，因为当时的国际背景主要是遏制苏联，另外从国际援助中获益的主要是企业和政治阶层，而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府腐败问题严重，不尊重人权，无视人民的疾苦。由于深陷于非洲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既无法避免也无法控制的争斗之间难以自拔，又没有能力独自承担这个经济重负（别的西方国家不愿意与法国分担这个重负，法国也不愿意以自己的影响力受损来换取别的西方国家的分担），法国始终无法走出这个矛盾，直到苏联解体（在对抗的时代背景下，东西方两个阵营都对非洲的一些事实视而不见，任由法国在那里充当宪兵的角色）。1989年之后，法国必须放弃自己对帝国时代的怀念，在骤然变得不同的国际形势下重新制定有关非洲的政策。

1087

1990年代的调整

1989年至1991年之间，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形势骤然发生了变化。法国从1958年开始一直尝试着在旧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方阵营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旧的国际政治格局不复存在，欧洲不再一分为二，美国成了冷战的最大胜利者，德国则重新统一。法国从这场巨变中得失参半：它仍然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世界第四贸易大国，拥有核武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在约50个法语国家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但法国必须在

世界新秩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的王牌，因为继续在东西方之间和南北之间保持独立的地位和“玩跷跷板”已经不合时宜了。

伟大，有什么用？

由于这些重大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踵而至，法国在做出反应时面临艰难的抉择。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外交上，法国都不能反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和苏联的解体。法国此前一直表示希望看到德国的统一，至于与莫斯科保持缓和的关系，绝不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和法国所不赞同的意识形态而被迫采取的中立态度。巨变发生的速度之快实在出人意料，法国根本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密特朗总统最关心的事情是在演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保证巴黎能够在危机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因此他竭尽所能使两德的统一进程既有国际社会的监控，又有法国的积极参与。在 1989 年 11 月柏林墙倒塌和 1990 年 10 月 3 日两德正式统一之间，密特朗努力劝说德国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线”[①]（1945 年 7 月波茨坦会议确定的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边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50 年承认了该边界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0 年根据“东方政策”[②] 也承认了该边界线）。关于统一的德国是否接受该边界线，德国总理科尔最初希望由两德统一后的联邦议会通过投票来决定，但密特朗希望德波两国在两德统一之前就通过条约的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下来，因此他从 1989 年 10 月开始不断劝说科尔，直到 1990 年 4 月科尔接受了这个方案，期间密特朗甚至在巴黎会见了波兰总统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以表示他对波兰的支持，给科尔施加压力。在这件事情上，密特朗取得的成功是重大而颇具象征意义的：边境问题将不会被要求重审，国家或少数民族提出追还领土的要求的“潘多拉的盒子”将不会被打开，否则又会造成欧洲的不稳定，孕育无穷无尽的争斗，甚至武力对抗。尤其是在欧洲共产主义终结这个特殊的时刻，

---

① 即 Oder-Neisse。

② 即 Ost-Politik，前德意志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推行的“东方政策”，旨在改善与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最终实现东西德关系的缓和与改善。

那些在 1920 年代未能解决的、后来又被斯大林的“冰冻”政策搁置的少数民族问题有可能在东欧和中欧各地全面复发。科尔迟迟不愿意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线”，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了来自原住地在波美 1088 拉尼亚、西里西亚和前东普鲁士等地区的德国人的巨大压力。这些德国人组织了激烈的示威活动，德国的新闻媒体也非常同情这些日耳曼“黑脚[①]”，这些人都是在 1945 年德国东部边境进行有利于苏联和波兰的重新划分时，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强制离开原住地迁到德国的。德国的伤口很深，因此接受“奥德河—尼斯河线”很困难，但是如果重审边界线或者犹豫不决对欧洲旧秩序向新秩序的和平转变是很危险的。密特朗说服科尔接受了这个边界方案，这是法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外交成就之一，也是法国对和平做出的样板式的贡献。既然德国人都这么做了，此后其他民主国家怎么可能不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民族纠纷呢？这就是为什么暂时停止两德统一的快速进程的原因，为此密特朗总统还不顾争议访问了行将就木的德意志民主德国，在巴黎接见了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在德国议会选举的时候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基辅会见了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尽管这些活动让法国和德国的舆论陷入混乱，而且显然并未阻碍统一进程的最终结局（密特朗丝毫不反对两德统一的合法性和不可避免性），但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尊重国际法和现有边境线的前提下，通过协商和 1990 年 9 月 14 日的《德波协定》实现了两德统一，而不是“吞并”德意志民主德国（很多德国人都希望这样）。另外，密特朗还注重保留从 1945 年以来四国占领德国以保障德国秩序的形式（法国也是四国之一），通过“四加二”（美国、法国、英国、苏联、西德、东德）的形式解决了两德统一的程序问题。尽管 1990 年初发生在东德的示威行动以及东德货币体系的崩溃，促使科尔加快了两德统一的进程，但至少德国的版图得到了维持，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巩固，根据 1990 年底的最终协议，苏联将从德国撤军，而德国承诺永不拥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

①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从阿尔及利亚迁回法国的法国人，被习惯称为“黑脚”。

由于同样的原因，密特朗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仍然在1989年至1991年间为戈尔巴乔夫提供支持。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至少是结束时代的紊乱的最不坏的选择：可以保持对德国的压力；可以避免苏联帝国因民族主义和领土收复的爆发而陷入混乱；还可以帮助苏联度过危机，避免反对改革者当权，从而造成1985年至1990年之间发生的积极变化全部付之东流。

密特朗1989年12月6日出访基辅，并于1990年5月25日与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他希望帮助苏联度过这个艰难的航程，保持统一，并融入根据限制损害和平的风险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国际新秩序，尤其是欧洲新秩序。关于欧洲的安全问题，由于与苏联保持友好的缓和关系，密特朗认为问题不大。经过密特朗的反复劝说，苏联最终接受了法国的所有建议，包括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密特朗还动员其他西方伙伴国为苏联提供援助，使其财政体系避免出现崩盘的厄运。1990年9月，密特朗在法国再次会见戈尔巴乔夫，因为当时鲍里斯·叶利钦在苏联的声望与日俱增，而且在莫斯科发生军事政变的传闻愈演愈烈，密特朗郑重宣布对后者作为苏联唯一合法代表的身份的支持。

与此同时，密特朗还在1990年初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即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变成了协商解决分歧的堡垒。1990年11月19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巴黎召开，会上通过了《巴黎宪章》，不仅规定欧洲各国解决冲突时不应该付诸武力，而且倡导在整个欧洲境内推行共同的民主价值观。1991年5月6日在莫斯科，1991年9月30日至31日在法国朗德省的拉什[1]，密特朗和戈尔巴乔夫又再次会面，实际上，密特朗一直支持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直到12月8日苏联解体和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事实上，密特朗将戈尔巴乔夫誉为“本世纪为在本国实现民主，结束冷战和裁军作出重大贡献的伟人之一”，他希望苏联能够成为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的 1089

① 即Latche，曾经是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主要居住地之一。

国家联邦，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合作，而戈尔巴乔夫是保证这个构想能够实现的最佳人选。密特朗之所以与戈尔巴乔夫保持紧密的联系，而且竭尽全力地帮助他，还因为密特朗希望戈尔巴乔夫将巴黎视为优先对话者，这表明密特朗始终关心是否能在新的欧洲政治格局中保持法国的伟大和地位，是否能在欧洲对统一的德国，在世界上对独大的美国实现平衡。

法国对南斯拉夫问题作出的反应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在混乱的局势中不立即承认自行宣布的独立，即便宣布独立的民族行使的是人民自决的权利；将时间主要放在与当事各方寻求法律上可行的、政治上能够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上，避免留下隐患，造成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泛滥，并最终导致关系紧张或战争。密特朗对南斯拉夫的期望是：要么保持统一的状态，但是重新界定联邦内部的关系；要么通过谈判，在国际社会的安全保障下实现分裂。所以当 1991 年 6 月 25 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先后单方面宣布独立，并要求得到欧洲各国承认的时候，法国保持了沉默。密特朗反对这种行为，但德国对两国的做法持肯定态度。在 6 月 29 日举行的欧共体十二国首脑峰会上，密特朗努力说服了他的同行们，德国总理科尔暂时打消了承认两国的念头。法国只愿意承认经过南斯拉夫内部协商产生的新国家，而不是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国家，既然南斯拉夫的分裂已显然无法避免，法国希望能够减缓分裂的进程，并为其设立框架。但是南斯拉夫内部已经爆发了战争，德国也向法国加大了压力，要求承认两国独立。1991 年 11 月 15 日在波恩的欧共体峰会上，科尔再次要求法国承认两国独立，尽管承受着来自社会党、自由派人士、媒体、教会和德国的克罗地亚人（约 50 万）的巨大压力，密特朗总统仍然坚持不可改变边界和尊重少数民族等条件必须得到遵守。然而密特朗的努力以彻底失败告终，德国率先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欧共体内其他国家也争相效仿。由于波斯尼亚战争骤然爆发，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独立的承认遂变得不可避免。波斯尼亚战争持续了三年多时间，因为塞尔维亚是法国长达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传统盟友，还是分崩离析的巴尔干半岛实

现稳定的关键所在，所以尽管塞尔维亚对穆斯林实行“种族清洗”的政策，严重侵犯了人权，法国仍然在期间一直努力支持塞尔维亚。由于无法保持中立，法国于是积极推动欧洲进行干预，并派遣大量的士兵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当美国于1995年强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领导人签署了《岱顿协定》后，法国有派兵参加了执行该协定的多国部队。于是法国在南斯拉夫的悲剧中，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矛盾之中。怎样才能让德国接受谨慎和协商的解决方案，而又不损害德法两国在欧洲事务中的搭档关系？怎样才能让《人权宣言》的精神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得到普遍接受（尤其是在塞尔维亚），而又不破坏贝尔格莱德与巴黎之间传统的朋友和盟友关系？怎样说服欧洲各国接受一个对塞尔维亚宽松的解决方案，以避免美国最终成为实现表面上看来无法实现的和平的决定性力量？之所以产生这些矛盾，一方面是因为法国想要公正地、一劳永逸地解决南斯拉夫问题，即有组织地、通过国际社会的监控实现南斯拉夫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法国传统的外交考量决定的自私的动机。无论如何，法国在南斯拉夫问题上遭遇了深刻的矛盾，揭示了法国在1989年以来发生巨变的世界环境中所面临的新困难。 1090

在其他事情上也一样，比如海湾战争。作为伊拉克的传统盟友，法国未能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之前，劝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从1990年8月入侵的科威特撤军。不过，法国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由于法国长期以来对这个石油国家提供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帮助，以及法国在两伊战争中竭尽所能提供的支持，法国具有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说服力。但是，所有努力都因为萨达姆·侯赛因的固执己见而白费了。既然不能再充当有效的调停人角色，法国于是加入了美国的行列，接受美国的领导，承认美国保障国际秩序的角色（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并将自己的军队交给美国支配（1991年1月，法国的达

盖师[①]参加了解放科威特的战斗）。这一政策在国内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法国共产党和国民阵线对此激烈抨击，国防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愤而辞职，一些戴高乐主义者持保留意见；而且这一政策有损法国的形象，尽管法国参战巩固了法国的大国地位，但实际上，不论最终取得战斗胜利（绝大多数多国部队士兵都是美国人），还是解决冲突（由于没有符合自身利益的解决方案，同时为了在该地区制衡伊朗，美国决定结束战争，但并不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法国都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海湾战争还证明在国际新秩序中，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即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先后领导的美国，因此法国已经不可能在已经不存在的两个对抗阵营（东西）之间，在内部都很不团结的两个国家集团（南北）之间继续扮演独立自主的中间人角色了。正因为如此，法国在很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上，都被美国撇在了一边，比如近东问题。1993 年 9 月巴以双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这个巴以和平进程中的重要成就是美国逐渐促成的，法国就未能做到这一点，和往常一样，法国对该协议的评价与美国又有所不同。尽管法国总能找到机会挑战美国的权威，或者抨击美国的霸权，比如在 1993 年有关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法国坚持“文化例外”，反对美国将文化产业纳入总协定之中；1998 年在世界贸易组织对多边投资协议进行辩论时，法国又反对美国将通讯和视听媒体纳入其中。不过，为了巩固其国际地位，法国又不得不积极辅助美国领导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如在伊拉克、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等地区，换一句话说，就是甘愿追随美国，比如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的制裁。

新的国际政治格局还迫使法国修改国防政策。法国原来的国防政策完全建立在核武器的基础上（有三个支点：陆基洲际导弹、空基核武器、潜射导弹），宗旨是确保法国在海陆空三方面同时具备核威慑力，并以应对欧洲冲突或在非洲进行零星的军事行动为主要战争假设，

① 法国将法军在海湾战争中进行的军事行动称为“达盖行动”（Opération Daguet），参与海湾战争的法国部队统称“达盖师”（Division Daguet）。

这种传统的观念和法国的军事实力显然已经与最新的国际形势脱节。尽管密特朗总统在1990年至1995年间对国防政策进行了调整（比如放弃了阿尔比翁高原的陆基弹道导弹基地和陆基洲际导弹，以及1993年停止在穆鲁罗阿[1]环礁的核试验），但法国的军事部署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没有缩减预算和计划（其他大国因冷战结束都减少了军事开支），没有修改国防战略，没有改善军事投射能力（这种能力是新出现的地区冲突所必需的，比如在伊拉克和前南斯拉夫），也没有重新确定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程度（波斯尼亚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证明：后勤、通讯和兵力调遣都要求各军事力量具备高度的协调性，并且只有依靠北约才能实现军事投射）。希拉克上台后，才进行了必要的军事改革。

1091

为了显示自己与前任总统密特朗的不同，也为了巩固法国的军事现代化能力，希拉克不顾社会舆论和多国政府——尤其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反对，在1995年短暂地恢复了核试验。随后，希拉克宣布关闭位于穆鲁罗阿环礁的核试验场，法国不再进行核试验，未来的所有核试验都将采取模拟的方法。由此，法国核武器的现代化得到了保障，核威慑力量得到了维持，希拉克在经过这次非常戴高乐主义的“展示”后，终于能够对法国的军事部署进行必要的改革了。1995年，军费预算开始加速缩减；继皮埃尔·若克斯和弗朗索瓦·雷奥塔尔两任国防部长进行了军队重组之后，在1997年6月社会党在立法选举获胜后上任的国防部长阿兰·理夏尔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另外，希拉克总统还根据欧洲各国普遍出现的趋势，宣布终止义务征兵制，并计划在2002年完全实现军队职业化，这可以缩减军队的费用和人数，并使军队获得更高的可操作性。希拉克总统还推动法国兵器工业的改革，导致很多公共军火公司（尤其是地面武器工业集团公司）破产，他还根据欧洲军事合作的前景推行了一些更加符合军队需要的新计划。根据1996年2月希拉克宣布的决定，法国国防

① 即 Mururoa，位于太平洋中南部的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

部针对新时期面临的新威胁，制定了1997年至2002年的军事计划法案，1996年6月在议会获得通过，该法案规定每年的军费将为1850亿法郎（按照1995年法郎币值计算），其中990亿法郎用于保证军事系统运转，860亿法郎用于装备。该法案在保留由空基和海基核武器组成的核威慑力量的中心地位的同时，将情报工作（尤其是卫星情报工作）和为预防冲突进行的军队预置放到了优先考虑的位置。除了承担防御任务，法国军队以后必须发展“军力投射”能力，即为保护国家利益或参与国际社会框架内的集体行动，远距离实施传统军事行动的能力，以弥补伊拉克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中暴露的不足。该法案还充分考虑到了“战略性的非军事威胁”，比如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走私等，这要求大量增加法国国防的第四个兵种——宪兵部队的人数。到2002年的时候，实现了职业化的法国军队，将从1997年的50万人，减少至35.7万人（其中宪兵9.6万人），仍然多于德国（33.8万人）和英国（22.6万人）。为了替代或减少人员的使用，该法案强调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和军事科技的提高，比如勒克莱尔主战坦克、“虎”式直升机、由卫星网络控制的火炮系统、导弹制导系统和对欲摧毁目标的卫星定位等。由于公共舆论普遍反对派兵参加与本国并无重要利害关系的境外冲突，以及出现人员损失，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与美国一样尽量减少人员的使用，避免人员伤亡，但还是在近东和前南斯拉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另外，密特朗总统从伊拉克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以及国际政治新格局中吸取了教训，开始着手推动法国重返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 1092 化机构（30年前，戴高乐将军为了显示法国决策的独立性，宣布退出了该机构）。重返的准备工作在1992年至1993年间只能秘密地进行，直到1994年9月在塞维利亚[①]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法国国防部长弗朗索瓦·雷奥塔尔向北约成员国的15位同行确认了这个决定；1995年12月5日，法国又郑重宣布从此将重新参加北约军事委员会

① 即Séville，西班牙城市。

会议和北约国防部长会议。1994年1月，法国还表示拥护成立欧洲联合部队的主张，在必要的情况下，这支部队将在“西欧联盟”的指挥下，借助北约的军事资产，处理美国不愿意介入的危机。另外，在1996年6月3日至4日召开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法国促成了《柏林协定》的签署，从此法国的军队可以通过“多国多兵种联合特遣部队”① 参加欧洲境外的北约军事行动。从此，法国的军事机构就在事实上与北约一体化军事结构连接了起来，不过在法国最终正式地、完全地回归北约之前，还需要对北约进行改造，让欧洲人在其中占据更多的位置，并使北约成员国的国防计划实现同一化。法国之所以积极靠近北约，还有部分原因是希望倡导欧洲防御的主张，目的是消除法国在1966年的特立独行在欧洲伙伴国眼中造成的不良印象。这再次证明了法国在欧洲的抱负对法国的国际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欧洲的义务

甚至在1988年5月7日重新当选为法国总统之前，密特朗就已经根据1987年7月1日议会批准的《单一欧洲法令》（该法令由总理希拉克领导的右派推动，左派的社会党对该法案持反对态度），开始着手欧洲建设的一个新阶段，即货币统一阶段。密特朗希望统一的欧洲货币能够开启欧洲政治统一的进程，并最终实现欧洲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统一。柏林墙倒塌后，这个选择显然是必须的，从此法国致力于为两德的统一设置框架，并将统一后的德国与欧洲发展牢固地捆绑在了一起。欧洲计划如果出现任何闪失，对法国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欧洲计划从1983年开始就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且国际新形势使欧洲计划变得更为急迫。根据1989年4月17日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德洛尔报告》，密特朗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的11月底，要求立刻组织一次政府间会议，为加强和深化欧洲建设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1989年12月8日至9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了欧洲峰会，在法国总统的主持下，以后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目

① 即 Groupes de forces interarmées multinationales（GFIM）。

标的欧洲建设进程就此启动。经过紧张而激烈的协商，各国最终于1991年12月9日至10日，在当年达尔达尼昂去世的荷兰城市马斯特里赫特签订了条约，“欧洲联盟”应运而生。该条约的前言中明确了欧盟的性质和目标，该条约还赋予了欧盟成员国的每个公民欧盟公民权，享有参加市政和欧洲选举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建立了经济和货币联盟，以及欧洲统一货币，欧元计划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开始流通。管理欧元的欧洲中央银行，独立于政治权力，主要肩负着监督各成员国财政预算政策是否合乎规定，以及各成员国物价是否稳定的职责。该条约确定的目标需要欧盟各国在经济和货币政策上表现出更大的趋同性。另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不仅在很多领域——如教育、文化、公共健康、警察、司法和消费等——赋予了欧盟更多的和新的职权，还明确了欧盟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的目标，即欧盟各国未来将“形成共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将以“西欧联盟”为模板进行“共同的防御”。最后，一个有关社会问题的议定书也被纳入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主要涉及工作条件、反排斥和欧洲集体协定等。

1093

一回到巴黎，密特朗总统就在法国电视二台宣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罗马条约》以来最重要的文件”。从欧洲建设来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际上是欧共体道路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跃进，欧盟从此不再仅仅是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建立起来的简单的经济组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使欧盟作为一个具有大陆规模的超级国家，崛起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的重要角色，它逐渐具备了更多的主权的特征，比如统一的货币和国防。对于法国来说，这当然是一次无可争议的外交胜利。在柏林墙倒塌仅仅两年之后，法国将统一的德国融入加强的欧洲的设想，就变成了现实。如果把这一成就全部归功于巴黎，肯定会有失公允，因为赫尔穆特·科尔一直支持欧洲建设，他在担任德国总理前后一直都竭力推动欧洲建设，他希望重新统一的德国能够开放地、可持续地、决定性地成为欧盟的一员。这符合他作为康拉德·阿登纳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继承人的信念，以史为

鉴，希望永远驱除曾使德国沦为野蛮，并使德国变成一片废墟的恶魔。科尔首先把马克放上了欧洲的祭台，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政治举动。他非常理解其他欧洲国家（不仅是法国，还有英国和意大利）的担心，同时他希望能够通过牢固地扎根欧洲，使其他欧洲国家得以放心地接受统一的德国，从而彻底抹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并使德国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国际局势下，恢复从前的强国地位。如果没有赫尔穆特·科尔，没有他不遗余力地拥护法德轴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西班牙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的持续支持也为欧盟取得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欧洲很多预言家曾断定欧洲将被埋葬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下。

对于法国及其总统密特朗来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法国1983年确定的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现实一再证明单独实现“伟大”的局限性，且强国地位日益遭到侵蚀的法国，通过欧盟能够实现实力的延伸。略显矛盾的是，法国作为加强了欧盟的“联邦”职能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主要拟定者，却强迫德国接受了另外一种略有不同的构想。实际上，在荷兰和德国希望将新政策（货币、司法、警察、外交、安全）纳入现存的遵循联邦制的超国家原则的欧盟制度框架——有拥有创制权的欧盟委员会、做决策的欧盟理事会、拥有监督和共同决策权力的欧洲议会，以及负责审查的欧洲法院——之中时，法国成功地使其他国家（实际上是强迫他们）接受了所谓“三个支柱”的欧盟新框架。第一个支柱——即纯粹意义上的共同体，融合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增加了一些扩大的职能，尤其是条约中一些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条款——遵循联邦制的精神；第二个支柱（处理欧盟外交政策和共同安全事务）协调政府间的工作；第三个支柱（警察和司法）则仅仅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根据这种分类，有关国家主权的事务按照法国的意愿不受欧盟共同法的约束，而只能作为政府间按照全体一致的原则进行处理的问题，而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都不能过问。德国总理科尔希望建立更加联邦化的欧洲，而密特朗则继承了当年戴高乐推崇

1094 的“政府间的”欧洲模式，也就是说建立“合众国的欧洲”，而不是“欧洲的合众国”。尽管法国人对德国人的设想的不同意见，体现在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条款之中，但是还不足以让对国家主权完整仍然非常敏感的法国舆论感到安心。这种不安在密特朗启动全民公决程序来批准该条约的时候暴露无遗，公众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超国家性、法国独立自主作决定的自由、法国的国家主权等基本观念之上。和戴高乐将军时期一样，激烈斗争的一方坚持必须保证国家的绝对主权，使法国始终能够独自掌握自己的命运；另一方则赞成将部分主权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分享，他们认为绝对主权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坚信主权分享是现在和未来的法国的必然选择。维护绝对主权的一方包括国民阵线、大多数保卫共和联盟成员、很小一部分法兰西民主联盟成员、法国共产党和少数社会党人。而赞成分享主权的一方包括大多数法兰西民主联盟和社会党成员。左派和总统密特朗在 1992 年夏天民意支持率已经明显下降，使同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人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和所有第五共和国期间的全民公决程序一样，选民在投票时还揉入了很多与公决的问题毫不相干的因素。1992 年 9 月 20 日，“同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人仅以微弱的优势（51%）取得了胜利，为这次投票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作出巨大贡献的除了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担保的希拉克，还有那些有着深厚基督教民主文化的、拥护欧盟建设的地区，比如布列塔尼，以及那些传统上一直支持欧盟建设的地区，比如阿尔萨斯。总的来说，是城市的、现代的和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法国人投票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不是那些更直接地遭遇失业、郊区和农村的结构破坏、以及工业领域突变的法国人。

法国好不容易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让欧洲伙伴国，尤其是德国松了一口气。此前德国人无法相信政治上和身体上都行将衰竭的密特朗，居然仍能对欧洲的未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法国国家元首重新确认了自己在欧洲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法国从德国获得了短期内对欧盟建设实现更多突破的承诺

后，同意欧盟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奥地利开放，这让波恩感到满意，法德轴心之间的互信得到了巩固。1993 年 3 月社会党在立法选举中遭到失败后，法国新总理巴拉迪尔前往波恩，他和密特朗总统达成一致，共同要求欧盟支持将视听产品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内排除出去，以捍卫法国支持和保护创造力的机制。在会议上，法国还按照德国总理科尔的要求，宣布奥地利、瑞典和芬兰三个传统的民主国家加入欧盟是不可抗拒的事情，接受当时身为欧盟观察员国的三国在 1994 年 12 月的（德国）埃森会议上加入欧盟。根据密特朗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获得的保证，在希拉克当选为法国总统后不久的 1996 年 3 月 29 日，新一轮欧盟会议在意大利都灵召开，此次会议的目标是在欧盟向东欧国家开放（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已经于 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加入了欧盟）之前，复审条约并采用新的组织制度。1997 年 6 月 18 日，欧盟各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签订了《阿姆斯特丹条约》，该条约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但是一些关键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没有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欧盟成员国仍可以实施一些共同政策；提高“共同决策”，即将欧洲议会与欧盟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机制；将第三个支柱的部分事务（警察、司法）“共同体化”，主要集中在政治避难、移民和签证等问题上。当然，这个新的条约并没有解决那些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比如减少欧盟委员会的委员数量；扩大欧盟部长委员会以有效多数制决策的范围；对有效多数投票中的选票进行加权计算），延迟了欧盟向东欧国家开放的时间表。好在《阿姆斯特丹条约》取得了其他一些突破，而且这些突破都将欧盟导向更大的“超国家性”，要知道参加此次谈判的两个法国人（希拉克和朱佩）都是戴高乐主义者。1997 年 6 月，左派不仅在立法选举中获胜，社会党人还成功地推动了在《阿姆斯特丹条约》之中增加有关社会问题的补充内容，即欧洲各国在就业和消除失业等问题上协调一致，这证明每个巴黎的政治家都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任何独立自主的政策，如果不能得到欧盟其他国家的支持甚至参与，都很可能走向失败。随着一个个条约的签署，欧盟体现出越来越强的“超国家性”，因此很多法国政治家（包括右

1095

派的夏尔·帕斯夸和左派的共产党）深感忧虑，他们要求就批准《阿姆斯特丹条约》进行全民公决，因为他们认为《阿姆斯特丹条约》比《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超国家性”的原则上走得更远。1998年秋季，总统希拉克和总理若斯潘共同决定将该条约的批准仅仅付诸议会投票表决，这反映出左派的社会党和温和的右派从此对欧洲建设达成了以下共识：欧洲是法国外交的关键所在；欧盟将向联邦政体发展，统一的欧洲货币加重了这个趋势；欧盟建设的目标是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强国特征（货币、安全、外交、经济调节）的欧洲大陆。当然，每个政治家都谨慎地赞同希拉克总统1998年9月对所有的法国终身大使发表讲话时采用的提法——“欧洲的国家联盟”，以免引起那些无条件拥护“民族”和“祖国”的人的激烈反对。但实际上，法国已经以一种隐含的方式把赌注押在了“整体欧洲”之上，希望在欧洲成为一个与其他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大陆国家”的条件下，法国能够借助自己在欧盟内部具有的影响力，实现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想都不敢想的地缘政治的远大抱负。通过欧洲实现法国的伟大，这就是欧元开始流通的前夕和距离1999年6月的欧洲选举只有几个月时间的时候，民主社会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其选举基础已经遭到动摇）的共同信条。有趣的是，由于政治家们对1999年的欧洲选举感到忧虑（因为这是对欧盟建设表达不满的大好时机），他们对欧盟建设的逻辑采取秘而不宣的策略，但没想到反而是那些远非政策制定者的人群使法国开始进入了欧元时代，他们是超级市场收银员、餐馆的服务员、商店的售货员、银行的窗口营业员和广播游戏的主持人，从此以后，他们会用欧元和法郎衡量所有有关欧盟的政策。这再次显示出，政治家们也许没有必要在欧盟建设方面采取这样遮遮掩掩的方式。尤其欧盟是围绕着法德轴心建立的，并且这对共识和默契不断增长的搭档，从一开始就没有掩饰最终实现联邦制欧洲的愿望。此外，不正是法德轴心最早启动了最终将终结各国军队的进程吗？密特朗和科尔在1992年共同决定成立所谓“法德旅”；1994年7月14日，密特朗邀请科尔参加了法国国庆阅兵仪式，一起检阅了正在组建的“欧洲军团”的先头部队——“法

德旅”。1995年5月8日纪念第三帝国投降之日，密特朗早上还在巴黎和希拉克在一起，晚上就来到柏林参加了纪念活动，和1984年“凡尔登的握手”一样，密特朗的访问不仅象征着两个国家之间的敌意已经完全消除，而且两国还决心携手开创共同的未来，甚至在军事领域毫无保留地开展合作。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尽管法国人到今天仍然和英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一样，拥有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法国也派遣自己的部队参加各种国际军事行动。法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法国确信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独自行动的能力了。

在涉及欧洲未来的问题上，法国非常审慎，竭尽所能捍卫自己对欧盟的构想，即强大的欧盟不仅在成员国之间发展共同的政策，而且不断深化和扩大，使欧盟不局限于简单的实行自由贸易的地区，同时也不会形成典型的联邦制结构。由于有这个基础，“左右共治”的法国领导人希拉克和若斯潘，才能在欧元时代的欧盟的众多重大问题上，在欧洲领导人峰会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1096

首先是2000年初召开的新一轮政府首脑会议，旨在对欧盟进行必要的制度调整，为将来成员国增加到27个做准备（尽管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不属于首批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但两国也被包括在其中）。此轮会议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涉及到欧盟部长委员会的票数、各国欧洲议员的数量、欧盟委员会委员的数量的调整，以及进行有效多数投票的领域的扩大。由于每个国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很多文件的拟定都很棘手，作为2000年下半年欧盟轮值国的法国需要避免会议陷入僵局，并找到各国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法国勉强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在2000年12月20日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欧盟各国签订了《尼斯条约》，该条约经各国批准将于2003年春季生效。越过这道障碍后，每个人都明白进行了这些制度调整后，下一步就应该为扩大的欧盟制定一部宪法了。在欧洲宪法的拟定问题上，法国建议不采取政府间会议的传统途径，因为法国发现在协商《尼斯条约》的过程中，各国暴露出严重的民族自私主义，这将使宪法的制定陷入困境，尤其是当时各国民众对欧盟的好感度普遍不高，因此欧盟宪法需要体现更大的合理

性、有效性和透明性。根据法国的提议，欧盟理事会2001年12月在比利时拉肯做出决定，成立“有关欧洲未来的制宪会议”，由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候选成员国的代表，以及欧洲和各国议会的议员组成。为了在制定欧盟宪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国成功地推举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担任了欧盟制宪会议的主席。从此，吉斯卡尔·德斯坦主持和推动有关欧盟宪法的讨论，而法国当局则致力于捍卫自己对未来欧洲的构想。这种构想，因为是《罗马条约》签订40年之后有关欧洲未来的重要抉择，使法德关系的发展趋向复杂化。对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和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提出的建立联邦制欧盟的建议，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法国总理若斯潘立即加以驳斥，努力维护所谓“国家的欧洲”的原则，即政府间的欧盟，而非联邦制的欧盟，这是法国自戴高乐将军以来的一贯立场，随后的每一任法国领导人都没有偏离这个立场。不过希拉克在2002年再次当选法国总统之后，推动了法德轴心的重新运转，因为如果没有法德轴心，欧盟的建设就不可能实现任何进展。这体现在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致立场、《爱丽舍条约》（1963年1月20日）签订40周年的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和对欧盟未来实行“双主席制”的共同宣言上。“双主席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选举一位任期5年（或2年半）的欧盟理事会主席，从政治上代表欧盟（目前的欧盟理事会采取轮值制，每6个月更换一次），这个提议是德国在西班牙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建议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形成的；另一方面，接受通过欧洲议会选举，经过欧洲理事会批准，产生欧盟委员会主席，这个提议由德国提出，它完全推翻了现行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任命机制。法国还促使德国作出在2006年重新进行磋商之前，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不予质疑的承诺，因为此前德国为了尽快实现欧盟东扩，一直响应英国提出的建议，要求将共同农业政策中的农业补贴权“重新国有化”，以便为正在进行的欧盟东扩的谈判扫清障碍。1097 法德轴心重新开始运转，使2002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欧盟理事会能够达成协议，确定欧盟将很快扩大为25国。尽管法德两国与

一些欧盟的新成员国之间产生了分歧，那些国家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与阿斯纳尔—布莱尔—贝鲁斯科尼“三重奏”一起站在了美国一边，法国总统为此要求这些国家遵守欧盟的纪律，但法德轴心如果能够持续下去，将能使欧盟跨过这次危机，并根据法国的要求思索伊拉克的出路问题。尽管理论上存在着欧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但由于欧盟在外交上缺乏合法性和团结，欧洲各国之间自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于是这种合法性和团结有待建设，而且有必要突出欧洲不同于美国的自身利益，这些法德两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强调的利益，如果欧盟各成员国希望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一定分量的话，应该在将来成为整个欧盟的共同利益。

多国机制下的影响力延伸

除了在欧洲方面，法国在非洲和其他一些国际重大问题上，也被迫或主动作出了政策调整，目的是在多国机制下体现法国的影响力，而不再奢望能够独自实现法国的“伟大”。在非洲，法国几乎没有选择。冷战的结束，使法国对那些从前被视为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壁垒的非洲独裁者们的支持变得毫无意义。时代的发展似乎已经到了应该重新考虑民主和人权的时候了。1990 年 6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法国拉博勒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密特朗宣称：“法国将竭尽所能，帮助那些为获得更多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另外，他还呼吁重建非洲人民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以及援助国和私人投资者对非洲领导人的信心，他们都希望非洲国家能够拥有“运转良好、管理审慎的政府部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很多非洲国家正处于无组织、腐败严重的混乱局面，尤其是在那些最专制的国家。但是这些良好的意愿几乎都未能收获积极的效果。法国在卢旺达内战中支持胡图族对抗图西族，但未能防止1994 年的种族大屠杀；法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帮助蒙博托恢复权力，但却无法避免蒙博托 1997 年的覆灭；法国还承认 1993 年加蓬和1996 年乍得的可疑的选举结果；继续于 1996 年派遣部队前往（中非共和国）班吉，支持已经丧失民心的政府。由于已经无法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中体现长期的意图和优先的利益，法国发觉自己在非洲的地

位遭到了更大的损害。法国对非洲一些国家的动乱无能为力，尤其是在非洲大湖地区[1]。法国对非洲法语国家的财政状况的恶化束手无策，因此总理巴拉迪尔在1994年对西非法郎实行贬值，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非洲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法国做出对西非法郎实行贬值的决定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标志着法国不再有对昔日帝国的怀念，和法国已经不可能将非洲作为自己的“保留地”了。法国无法抵挡美国在非洲的强势回归，不仅美国人希望在法国人有着独特感情的非洲大地取代法国人，非洲自身也崛起了一些非法语的强国（乌干达、安哥拉、尤其是南非），它们希望在非洲的危机中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法国在非洲的处境因此更加艰难。当然，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得到了法语非洲的欢迎；希拉克总统在强调民主的同时，不仅重新加强法国与非洲传统友国的关系，还与其他几个新兴非洲国家建立了紧密联系，于1997年春季访问了纳米比亚和南非。但是他面对的非洲政治局势与其前任们截然不同。非洲大湖地区的危机——使法国政界动荡不安，法国议会组织了针对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调查委员会，非洲一些当权领导人有可能对大屠杀负有责任——将法国在非洲的衰落暴露无遗，法国无力承担非洲国家的经济和财政重负，自然也无力保障非洲国家的秩序。因此，在非洲和在世界其他地方，多边行动前所未有地成为了时代的要求，在法国的推动或影响下，各种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多种国际行动。尽管戴高乐当年曾把联合国称为“那玩意儿”，今天的法国却凭借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和来自非洲法语国家和其他非洲传统友国如埃及的支持，积极赋予联合国更为重要的地位。为此，法国积极展开活动，成功地突破美国人的阻挠，将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2]扶上了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可惜的是，法国在1996年谋求加利在1997年连任的努力遭到了失败，美国人支持的科

1098

① 位于非洲东部，包括世界第三大湖维多利亚湖等多个湖泊，位于该地区的国家有乌干达、肯尼亚、刚果、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赞比亚、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等。

② 即 Boutros Boutros-Ghali，埃及人，1922年11月14日生于埃及开罗，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

菲·安南[1]取得了胜利，这再一次证明了法国影响力的局限性。不过，不论在伊拉克还是前南斯拉夫，法国坚持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行动，并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积极参与，还是显示出法国是可以通过多国机制，在国际重大事件中延伸自己的影响力的。另外，法国还通过法国人在多个大型国际机构出任首脑职务（雅克·德洛尔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米歇尔·康德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克洛德·佩耶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雅克·德·拉罗齐埃尔在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确保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这些人在出色地领导各自机构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些机构对法国的愿望不至于充耳不闻。

于是一种调解战略在法国应运而生，一方面法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非洲统一组织、G7 等）的集体调节行动，另一方面法国参与各种地区安全系统，但继续维护在联合国的地位，因为联合国是进行调节、阐述权利、梳理地区性计划、并为大国干预提供政治屏障的全球性机构，法国在联合国承担着组织集体安全和维护和平的重要角色。在放弃单边主义之后，法国在欧盟建设和向北约靠拢的过程中，发现了多国组织的众多优势及其有效的调解能力。法国清楚地意识到尽管自身实力有限，但通过多国组织拥有的力量，是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并表现自己的影响力的。按照这个原理，法国还积极参与其他领域的国际活动。自从贝尔纳·库什内[2]创造出了有关人道主义的“干预的义务”的概念后，法国积极参与人道军事干预行动；为了防止核扩散，法国于1996 年 9 月签署了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从此在防止核扩散方面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在环境保护方面，法国先后参与和组织了 1993 年在里约热内卢和巴黎召开的“地球峰会”；此外，法国还积极参与有关人口和发展的国际行动。在所有这些领域，法国都

① 即 Kofi Annan，加纳人，1938 年 4 月 8 日生于加纳的库马西市，为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

② 即 Bernard Kouchner，法国政治家、医生，1939 年 11 月 1 日生于阿维尼翁，曾担任法国卫生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是无国界医生和世界医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试着通过多边外交的实践参与其中，尽管这些实践通常非常棘手，而且有时候令人沮丧，但法国还是坚定地参与“国家新社会”的艰难的孕育过程。1997年和1998年，希拉克在两次对法国终身大使们的讲话中，都将很大一部分法国的双边行动，归功于得到加强的多边机制。法国的政治习惯和外交工具，尽管从这些实践中获得了不少经验，但是仍然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最终实现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讷极力推动的外交政策的调整。而且美国的霸权和华盛顿通过多国机制实现其全球影响力的相同愿望，使法国的想法更加难以实现，1996年有关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之争就是一个明证。不过无论如何，法国的政策已经转弯，而且现实表明这种转变显然是不可逆转的。

如果需要一个确信的证明，从希拉克在2002年再次当选法国总统后采取的姿态就可以明显找到。多边主义从未像现在这样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首先表现在法国的非洲“保留地”——法语国家。当科特迪瓦在2002年底发生动乱后，法国及其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做出反应，比如与当局签订防卫协定，派兵救助当权总统，并严厉打击叛军，而是选择了一种“联合国式”的立场，首先派兵分隔双方的军队，然后进行外交调解。这样的对策最终使交战双方能够在巴黎地区的马库锡，围坐在一张桌子周围，展开谈判。法国希望双方签订协议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和西非几个主要国家的政府首脑能够出席，这表明法国不愿意在前殖民地地区继续充当宪兵的角色，而更愿意在联合国的担保下，将其外交和军事力量为非洲的多边主义提供服务。2002年夏季，当美国想要通过单边主义的途径，使用武力解除伊拉克的武装，并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时候，法国做出了相同的反应。法国外交人员首先利用法国的影响力，劝说美国回到联合国的框架内，并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的前提下同意以汉斯·布里克斯为首的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返回伊拉克。由此开始了巴黎和华盛顿之间的角力，法国主动担当联合国内赞成多边主义的国家的领头羊角色，积极反对华盛顿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为此，

法国不仅动员德国和苏联持相同的立场，还与每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展开对话，并积极拉拢非洲国家，希望武器核查进程能够顺利进行到底，而不受美国强加的时间表的限制，美国当然也希望联合国能就对伊动武开绿灯，但也下定决心，不管有没有联合国的支持，都要在2003年春季之前彻底瓦解伊拉克。2003年初，法国俨然是捍卫联合国宪章中有关付诸武力的原则的国家中最坚定的代表，它甚至推动与美国有着亲密关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主动采取措施束缚美国的步伐，另外法国还通过外长德维尔潘的声音，在安理会明确表达了坚决反对短时间内对伊拉克动武的新决议时，赢得了与会的各国代表的热烈掌声。法国一直担心失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但它利用此次伊拉克危机，向南方国家占多数的国际社会显示了，如果联合国安理会里没有法国这样一个审慎而又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国家，将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法国与美国单边主义作斗争的目的，还在于法国希望巩固自己在国际社会的新地位，即法国是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为了共同管理全球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法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和独立性，为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服务。

戴高乐将军在1960年代中期说过："伟大是不可分割的"。但从那时起，尤其是1989年之后，世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吉斯卡尔·德斯坦到密特朗和希拉克，历任总统都以各自的方式，努力维持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完整的影响和干预能力。"核武器君主制"、国内政治共识、经济实力、文化辐射、法语国家共同体的影响力、现实政治和普遍主义的混合，都是法国总统们可以利用的"王牌"。经过几任总统的努力，仅仅拥有中等实力的法国，却能在世界大国组成的"乐队"中，奏出了超出自己实际能力的"强音"。不过，面对"大陆国家"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法国的总统们必须努力防止本国的实力遭到削弱。经过艰难而且时常痛苦的改革，法国明确了自己的选择，在国际行动时采取辅从性的原则。对本国而言，法国充分考虑到国际环境的 1100 巨大变化，希望尽可能地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对于欧洲（法国已经逐渐放弃了成为欧洲唯一霸主的野心，尤其是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后），

法国希望在必要的时候都能以欧盟的名义采取行动，期望欧洲有朝一日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要的角色。对于多边机构，法国希望它们能够在管理危机和全球性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在预防冲突、集体安全和解决具有普遍性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此法国主动参与其中，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简而言之，法国在不放弃“世界使命”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了自身实力的不足，从 1974 年走到 2003 年，法国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尽管那些怀念戴高乐的豪言壮语的人和过于敏感的民族主义者们难免会因此感到失望和悲伤。不过，法国的选择，尤其是对欧盟的选择，无疑是唯一能够让法国最能保持“言行一致”的选择了，这一点在过去却是经常无法做到的事情。

四、价值观与文化

在 20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的价值观和文化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是因为法国战后长达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另一方面是因为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它们不仅加快了这个变化的进程，而且在二十五年这样一段较短的时间里，导致了其他的一些变化。

经济增长放缓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停滞，我们不应该忽视其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停滞不仅使民众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忧虑，还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恐慌，它还使“成功”的概念在法国社会中增加了一层含义。当社会的“升降机”出现故障，且丧失社会地位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时，人们千方百计地保障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学校、金钱和身体都成为取得成功的“王牌”，必须加以利用，实现它们的价值，人们在这些方面进行投资，为的是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石油危机的打击、欧盟建设、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和金融危机，使法国人得出教训，绝不能自我封闭，而应该有全球视野，对来自四方的经济、生态、文化、政治影响敞开大门，法国人在重新发现世界的同时，也

在对法国的身份，以及法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在“地球村”之中的地位进行反思。

经济形势的影响固然重大，那些长期的演变（尤其是众人皆知的那些领域的缓慢演变）的作用力也不容小觑。比如从十八世纪末出现在法国的自愿节育发展到1960年代的“性革命”，跨越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但“性革命”的影响力却集中体现在了最近这二十五年。由于“性革命”，法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分崩离析，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我和自由，这成了现代法国社会的新特征，而妇女更是这种新特征的主要载体。同样，在西方各国进行的非宗教化是一个可以回溯久远的社会现象，法国不仅未能避免这场宗教衰退的运动，而且比其他国家更有甚者的是，此前就已经见识了多种强大的替代性宗教，比如共和国世俗主义和有着自己的教士、信徒、祭祀和纪念场所的革命救世主降临说。宗教在过去几十年出现了明显衰退，在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变得模糊起来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索、对伦理的重新发现和对福利、幸福以及道德的忧虑。

成功之路

当丧失社会地位的威胁笼罩着自己以及后代的生活的时候，当为自己争取到“一小块阳光照耀得到的地方”都很困难的时候，学校、教育和知识无可避免地成为个人和社会最基础的价值。学校和共和国一直都在“携手前进”，社会“对学校的需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法国人在1970年代中期就已经意识到接受教育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事情。学校不仅仅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教育，还应该保证每个人都能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以及教学内容的职业有效性。

1975年至1998年是中等和高等教育学生数量暴涨的时期。在受教育年龄段法国人口的总量相对稳定（约1600万人）的情况下，入学率持续显著增长，从1975年的75%增至了1998年的92%。公立和私立的大学、中学和小学学生的总人数在1970年代超过了1380万人

（当时2岁至22岁的人口总量为1760万人），到今天增至了1500万人（2岁至22岁的人口总量为1600万人）。但是，在这些总体数据背后，隐藏着一场真正的革命，即大规模就读高中，以及业士[①]和大学生的人数暴涨。小学生的人数从720万降到了640万；中学生的数量从440万增加到了570万，其中230万是高中生，而1970年代初高中生人数只有150万；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包括各种专业教育）从85万增加到了1998年的210万。业士的人数在1970年代中期只有19万，到1998年达到了48.5万，大约相当于该年龄组总人数的62%，而1975年和1985年的时候，该比例分别只有21.3%和29.4%。为了容纳大量涌入的学生，大规模提高教育财政支出是全国的共识。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成为最大的财政支出，比如1998年，法国教育预算为3340亿法郎，占政府总预算的21%，而全国在教育领域的总投资接近6000亿法郎（除了教育部的支出，还包括其他政府部门、地方集体、企业、家庭的教育支出），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3%，每个居民平均9500法郎。所以说，教育领域从1970年代以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按照1975年的法郎价值计算，教育部的预算在1975年时只有500亿法郎。但1981年至1993年，教育部的预算从1170亿增至了2810亿，净增长幅度高达140.7%；同时教育部预算在政府总预算中的比例在此阶段从18.9%增加到了20.5%。从1991年开始，教育部预算在政府总预算中排到了第一的位置；随着1982年开始的“地方分权”，教育在地方政府预算中也明显增加，从1980年的15%增至如今的22%；企业的教育支出也略微上升，从4.9%增加到5.6%；只有家庭的教育支出出现了轻微下降，从12.2%减至10.3%。

伴随着教育支出暴涨的是不断进行的教育改革，目的是尽可能在中学和大学阶段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以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顺利就业。1975年7月颁布的《阿比法案》，创立了“统一的初中”（所

---

① 就是法国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即高中毕业者。

有学生升至六年级[1]时，都会就读于同样类型的学校），直到三年级毕业[2]后，进入传统高中或取代技术中学的职业高中时，才开始分科。该法案保留了教育框架内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公立教育和天主教会主导的私立教育。通过1959年的《德布雷法案》和1977年的《盖尔默尔法案》，法国的私立教育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左派希望结束教育的二元制，提出建立一个“世俗的和统一的国家公共教育系统”（这是密特朗的《110条纲领》中的第90条）。当选总统后，密特朗和他的教育部长阿兰·萨瓦里在经过深思熟虑和讨论之后，才开始实行预期的教育改革。然而，该改革计划没有转变为一项新的“政教协定”[3]，反而引发了天主教倾向和世俗倾向之间的激烈斗争，就像法国历史上多次经历的那样。千辛万苦于1984年春季达成的妥协方案，使私立学校的教师不再必须具备公务员身份，私立学校因此保留了自行挑选老师的权利，这看起来是私立学校得以维继的关键条件。然而，社会党议员们在持世俗化倾向的选民们的推动下，对这一被持天主教倾向的人视为关键的部分进行了修改。于是，对1984年5月24日通过的法案的抗议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6月24日的游行示威，大约有100万法国人以“选择自由”的名义走上了巴黎街头，最终该法案被废弃，教育部长被迫辞职，法国学校的二元制得以幸存。这个插曲，除了再现了“世俗者”和“教权主义者”之间的传统斗争，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法国人对学校的新态度。他们关心的首先是子女的前途问题，因为在学校学习是融入社会必须的经历，但同时也是难以顺利完成的事情，因为学业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学习计划和考试的要求非常严格。从那时起，大多数法国人，包括持世俗化倾向的人和左派选民，都认为最好还是保留这种二元制的教育系统，因为它可以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不测提供保障。这是因为法国人将自己视为学校的消费者，而这是统一的公立学校系统无法满足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1102

① 即初中一年级。
② 即初中毕业，法国初中为四年，从六年级至三年级。
③ 即罗马教皇与一国政府间的政教协定。

的要求从此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争吵。因此，新教育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制定了一项新的法案，在1985年1月获得议会投票通过，该法案将公共教育体系的教学质量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平息了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冲突（回归1959年的德布雷法案）。作为一名小学老师的儿子，部长舍韦内芒推崇儒勒·费里提出的"共和国精英教育"的主张，他坚决主张对小学和中学进行革新，并表达了使尽可能多的学生（每个年龄组至少80%）获得业士文凭的雄心，他确信教育水平今后将成为法国的集体财富和个人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将业士文凭设为基点后，每个人都可以将进入大学学习视为一个合理的志向，以及在社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必需的条件。

1975年时，人们都在关注学生大规模进入高中阶段。10年以后，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大学阶段。在此期间，失业者的人数超过了200万。大学是避免18岁至25岁年轻人成为失业者的有效手段，至少是一个延迟手段，而且大学的学习能够增加找到工作的机会，因为事实证明有文凭的人在求职的较量中，在任何社会群体和年龄段中，都是最具优势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传统上严格的大学入学选拔，从198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激烈竞争的局面。在1986年3月右派赢得了议会选举后，总理希拉克和高等教育部长阿兰·德瓦凯认为有必要重新讨论1984年1月26日的《萨瓦里法案》，该法案在大学院系管理和负责人选定等问题上，给非教授教师队伍、大学生、行政人员和左派控制的工会赋予了较大的权力，而"官员"和保守派工会的利益则受到了损害。新总理的高等教育改革法案（1986年7月11日），不仅决定将权力归还给教授们，还加强了大学的自主权，即大学可以征收400至800法郎的学费，在学生的文凭上印上本校的名字，以及自行规定入学条件。可能因经济实力的差异造成入学不平等、文凭的国家特征受到威胁、入学考试将变得极为"恐怖"，这就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对该法案的理解，他们在学生领袖的率领下，发动了让全国人民惊讶的抗议行动，这表明他们已经将教育视为必须首先得到保护和捍卫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被大规模失业和每个年龄段都存在的失业危险严重损害

1103

的不确定的世界里。从 11 月 17 日第一次示威游行到 12 月 8 日法案被迫撤销之间，学生运动席卷了整个法国，让政府备受煎熬，最终学生们付出了死伤的代价（马里克·乌塞吉讷于 12 月 6 日丧命），教育部长阿兰·德瓦凯名誉扫地，大学学费被明确规定必须保持一致（尽管实际上学费的差异性仍然存在）。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学生运动持支持态度，作为需求连任的总统，他将社会的大规模教育需求融入了计划之中，教育在其《致全体法国人民书》中被列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将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工作托付给了若斯潘和总统顾问克洛德·阿莱格勒，这两个人拥有充足的手段满足学校的消费者，实现业已公布的宏大目标，即到 2000 年时，每个年龄组中 80% 的人都能够获得业士文凭，每个希望进入大学学习的业士都能如愿，每个学生在离开校园的时候都能够达到“认可的教育水平”。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更多的教师，提高教师的待遇，并建设新的校园。《教育定向法》1989 年 6 月 9 日获得投票通过：在五年的时间里，总共 500 亿法郎的额外资金将注入国家教育预算之中；新设立 6 万个教师岗位；调整小学的学习阶段设置；考虑到父母被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子女的学习过程之中，增加他们在学生的学习定向中的决策作用，帮助孩子制定“立业计划”；革新教学内容；在全国各学区创立法国教师培训学院[1]，培养小学教师（变成学校教师）和教授。1991 年 5 月，政府出台了名为《大学 2000 年》的大学整治和发展五年计划，为了应对由于业士数量的增加和每个业士都有进入高等教育的权利而激增的大学新生数量，国家将投资 170 亿法郎，地方将投资 60 亿法郎，用于建设 7 所新的大学。

中学和大学的“前线”刚刚平静下来，第二次“左右共治”时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和中间派的教育部长弗朗索瓦·贝鲁，由于有在 1993 年 3 月议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多数地位的右派的支持，决定重新审议私立学校的融资问题，废除了 1850 年《法卢法案》中禁止地方

[1] 即 I. U. F. M.（Instituts universitaires de formation des maîtres）。

政府在私立学校的投资份额超过 10% 的有关条款。由于看到公立学校可以从政府获得用于硬件设施更新的大笔资金，一部分学生家长、教士领导和普通教士希望教会学校的教育也能获得更大的资金投入，以免在招生时与公立学校相比出现更大的劣势，他们认为若斯潘推动的数以百亿法郎计的资金投入，比 1984 年的《萨瓦里法案》更加危险，因为随着校园的翻新，以及高水平的教师和教育家的招募，公立学校将拥有更大的吸引力。从 1993 年 6 月 25 日展开对 1850 年法案进行改革的谈论开始，到 12 月 14 日新法案获得投票通过，左派和持世俗倾向的人的抗议不断升级。12 月 17 日，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开始猛增。12 月 22 日，总理巴拉迪尔宣布 5 年内共拨款 25 亿法郎用于改善公立学校的安全状况，消除 12 月发布的《韦戴尔报告》（认为需要投入 38 亿至 53 亿法郎，对私立学校的校舍进行翻新）引起的不良反应。但这不足以平息持世俗倾向的人的怒火。1994 年 1 月 18 日，尽管宪法委员会已经于 13 日判定该法案无效，仍有至少 60 万人走上了巴黎街头，参加示威活动。这场为教育经费的分配展开的斗争，再次证明了法国人对学校的消费主义已经超越了有关意识形态的争吵，公立学校的支持者认为公共资金就应该优先用于教育。这次斗争刚平息，火药桶在仅仅一个月后又被点燃，火种是 1994 年 2 月 24 日以政令的形式推出了“职业融入合同”。该政策的目标是让更多年轻人获得就业机会，主要适用于那些拥有职业或技术证书、业士或大学普通教育文凭、而且在国家就业局注册了超过 6 个月的年轻人。该政策以 20% 的工作时间将用于培训为理由，规定雇主可以向签订这种合同的年轻人支付占“跨行业最低增长工资” 80% 的工资，但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看来，“职业融入合同”意味着他们在高中和大学接受的教育遭到贬值。该政策对教育的价值造成了严重冲击，因为这一代年轻人将教育视为在法国这个拥有约 300 万失业者的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却因为该政策遭到严重贬值。还有，1995 年 1 月 20 日高等教育部长弗朗索瓦 · 菲永发布了一份通报，限制了大学职业教育学院的学生进入大学第二阶段的学习，因此遭到了这部分学生的抗议；菲永不得不在 2 月 20 日发

1104

布一份新通报，拓宽了这部分学生进入第二阶段学习的途径，这实际上进一步巩固了更多学生达到“四年大学”[1] 学习程度的趋势。

与此同时，教育部长弗朗索瓦·贝鲁提出了包括 158 个决定的“学校的新合同”，对 5 年内资金和教师职位进行了规划，该法案 1 年后（1995 年 7 月 13 日）在议会得到通过。为了简化教育计划让每个人都能接受教育，为了赋予基础知识优先的地位，为了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成功地接受教育，该法案计划提高技术和职业类业士文凭的地位，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在贫困城区和农村与“学校受挫”作斗争，重视职业融入水平，对学校人员和管理实现现代化，以及增加教师的数量。该法案希望在每个教育层次都确保机会平等，通过各种手段，使学生们能够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并具备尽可能多的融入社会的资质，考虑到社会的就业机会紧缺，接受教育是必要的，教育内容适应社会的需求则是必须的。从 1997 年 6 月开始，新教育部长克洛德·阿莱格勒对前部长弗朗索瓦·贝鲁的计划进行了调整，把重点放在了提高教育部行政系统的“性价比”（“为猛犸象抽脂”，即精简人员）和有关人员、决策和教师分配的权力下放上。他还力求将资源分配向面临困难的学生倾斜（招募 3.5 万名年轻学生作教学助手，以减少校园里日益增长的暴力，改善学校条件和帮助学生的能力），改革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至于大学方面，他希望能够优化大学容纳和接待学生的条件，改善学生们的物质条件（大学生社会计划）和生活环境，减少普通大学和重点高等学校的差距，推动学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扩大大学的自主权。就这样，法国的中小学和大学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始终面临大规模失业的社会形势，经历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它回应了年轻人及其家庭的不安，对于他们来说，学校教育是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教育的改革还是对知识和技术快速变化的适应。

但是，在这个新的世界里，还可以通过教育以外的渠道获得成功。

---

① BAC +4，即接受了 4 年大学教育的受教育程度。

古人说过，“健康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体”[1]。对身体的狂热，在20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也被树立为一个基本的价值，当我们的 1105 文化开始同样重视人的内在和外表时，好的身体也成为通往成功的一个有效途径。当然，对身体的狂热源自现代的享乐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不过，当人们发现必须始终面临激烈的竞争，而且只有赢得竞争才有可能融入这个就业机会紧缺的社会，或者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保留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拥有一份更好的工作并挣更多的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提高自己的身体状态，并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让自己每天看起来都很好。每个人都被触及，这是时代的标志之一，不过是女人们在 1970 年代末确定了标准。男人们通常更喜欢集体体育和娱乐性体育，他们最初觉得女人们对健身运动、伸展体操、有氧健身操和肌肉锻炼的迷恋不可思议。这些运动频繁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引领浪潮的是两个“媒体女传教士”——维罗尼克和达维娜，她们在每个周日的上午，都会现身法国电视二台的节目中。1979 年，第一家这种类型的训练房即健身俱乐部，出现在了巴黎的马耳他街上。此后，这一运动开始迅速发展，男人们也参与了进来。在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很多人拥有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卡，并在其中花费大量的金钱（当然消费金额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法国家庭的娱乐预算也随之猛涨。以前只需要几百法郎就可以加入足球或篮球俱乐部，现在想要成为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则动辄几千，因为体育活动实现了私有化，而且健身器材和产品都很昂贵。一个新兴市场蓬勃发展了起来，很多公司生意兴隆，除了提供健身场所的场馆或出售健身器材的商店或连锁店，还有销售健康和美容产品（护肤、“镀古铜色”、减肥）的“准药店”，各种从事放松治疗、海水治疗、水疗的康复中心也与日俱增，那些专业化媒体也从中获益，首先是女性媒体，随后是男性媒体。从前男女在健身房里分开参加运动，女人们参加集体有氧健身操，男人们在一旁进行肌肉锻炼，如今男女

---

① 原文为拉丁文，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

在混合房间里一同参加一些集体的练习，比如有氧舞蹈[①]（缓慢的有音乐伴奏的集体肌肉锻炼体操）。健身运动曾经在1980年代末经历了一段萎缩时期，随后在1990年代重新开始发展。健身运动的兴起显示了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胜利：自行车、山地自行车、慢跑、游泳、体操、健美（在家里，在森林，在健身房）取代了足球（从此只能算是第三运动，已经被山地自行车和游泳超过）、橄榄球和手球。人们希望通过这些运动使自己保持状态，拥有健康，感到舒服，如今的人们更希望能够健康地生活，得到放松，消除身心的紧张，而不是阿波罗和维纳斯那样健壮的身躯。水中体操、太极、瑜伽等节奏缓慢的运动，可以缓解压力、恢复活力，如今非常受欢迎。在14岁至65岁之间的法国人中，三分之二的人定期从事一项体育运动，表明他们希望拥有良好的体形和身心的舒适。同时得到巨大发展的还有营养饮食的市场，人们定期地，而且越来越多地消费矿泉水和生态食品（豆腐和其他黄豆制品、硬粒小麦、无糖和无糖浆或无脂肪食品、按照“克里特岛食谱”做的蔬菜食品、鱼、橄榄油等）。为了拥有足够的活力，人们没有忘记那些天然的和药物合成的辅食，以及食品或药物形式的维生素混合产品，它们在1980年代成为每个家庭必要的补充食品。在如今充斥着竞争、而且只有赢得竞争的人才能获得成功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想方设法顺利完成学业，通过各种考试和会考，承受城市生活和工作造成的紧张，“拼命往上爬”。对于那些未能获得成功，对生活感到抑郁的人来说，各种缓解抑郁的药物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能恢复身心的平衡，想要获得成功是徒然的。这些神奇的药丸如今每年让法国人支出50亿法郎。在高水平运动领域屡次爆发兴奋剂丑闻后，非常严肃的法国电视五台不禁自问：“我们每个人都服了兴奋剂吗？”在20世纪末的法国，人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身体的舒适，因为这是个人幸福的源泉，而且也是或者说尤其是竞争激烈的新世界的产物，就像1980年代一个极受欢迎的歌手弗朗西斯·卡布莱尔在歌

1106

① 即Pump。

中唱到的那样，“每个人都希望在飞速前行的列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昂贵，而且工作机会紧缺，社会局势也非常脆弱。

另外，这一时代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赚钱甚至通过“工作和储蓄”（这是七月王朝时基佐的名言）来保持生活水平都非常困难，因此赌博成了一项法国人喜爱的活动，他们希望在这个无法预知未来的不确定的社会，能够发一笔横财，使自己未来的生活一劳永逸地得到保障。

1970年中期，大多数人主要把时间花在玩一些安静的游戏上，比如纸牌、“大富翁”、国际象棋和“跳鹅游戏”[①]。但是最终拼字游戏成了这类游戏中的佼佼者，另外非常流行的还有“数字和字母”游戏（即1965年发明的名为“最长的词”的游戏），这些游戏表明“大脑体操”类型的游戏非常受老年人的欢迎。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赌博业的激增。人们最初只是每周买一张彩票或周末的时候投注赛马，后来发展成了参与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发财。著名的“乐透”产生于1976年，二十年之后，“乐透”变成了“法国国家彩票公司”，政府在这个公共企业中拥有72%的股份，“老战士协会”占20%，其员工和经纪人则占8%，“法国国家彩票公司”的年营业额高达330亿法郎。1998年，法国博彩游戏的数量已经和奶酪一样多，从早到晚各家博彩公司提供的博彩游戏让人目不暇接，法国人每年在博彩业的花费超过800亿法郎，相当于家庭总收入的1.5%。法国国家彩票公司是行业老大，不仅销售乐透，还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创造了很多新的游戏，包括宾果、二十一点、百家乐、百万富翁、纸牌接龙、即开式彩票、三子棋等。而法国赛马公司在这种竞争压力下，也不断更新产品，改善市场营销，力图吸引更多的顾客，1992年，法国赛马公司首次突破100万份投注单。法国人对赌博的狂热与经济形势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1992年，当最大幅度的增长期（1986年至1990年）结束的时候，法国人意识到这一时期只不过

---

① 即Jeu de l'oie，是一种法语学习游戏。

是昙花一现的辉煌，于是对赌博的热情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当年法国人在赌博上一共投入了650亿法郎，比1991年增长16%，比1990年增长了26%，而同年法国人用在购买书籍和报刊的总支出也不过630亿法郎。与此同时，法国人对赌场又恢复了兴趣，1991—1992年度，法国156个赌场的毛收入增长了26.15%，达到了30亿法郎，其中18亿来自著名的“独臂强盗”（老虎机），这些摆放在赌场大厅里的机器向所有人开放，在34个有权经营“老虎机”的赌场，老虎机的数量在1990年至1992年之间一共增加了45%。赌博就这样实现了大众化。法国人对赌博的热衷程度与失业率曲线的波动保持一致，与经济增长的曲线则正好相反。传统通过媒体得到了保留。最早的媒体游戏出现在广播上，比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推出的《1000法郎游戏》节目，和RTL电台的《行李箱》节目，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受欢迎度。但是电视游戏的影响力更大，1970年代末法国电视一台推出了著名的《财富之轮》节目，另外电视游戏节目还有法国电视一台的《公平价格》和《黄金家庭》，以及法国电视二台的《胜者为王》等，这些节目反映出新时期法国人对赌博的热情。总体来说，法国在1970年代中期大约有400万人参与“金钱游戏”，但到了1990年代初达到了1200万人，1998年1600万人，其中70万人可以被视为对赌博上瘾的“赌徒”。赌博上瘾的严重程度与酒精和毒品上瘾并无二致，因此“法国生活条件观察和研究中心”在1993年专门针对赌徒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结论是“这些人为了过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工资、家庭社会补助、公寓”。赌博已经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问题，触及到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法国人。从典型的法国赛马会投注者（35岁至60岁的工人）到不能归属于任何特定社会类型的乐透购买者和赌场投注者，除了极少数寻求刺激的人，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能够赚点钱补贴每月的支出，或发点财让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为了摆脱时代的困境，他们希望从自己的社会保险号码或生日中找到能够带来财富的数字组合，金钱在1980年代，成为成功的绝好标志。

1107

在这个时期，成功还意味着通过储蓄或投资，能够预防各种不时

之需。从 1985 年开始，法国家庭的资产比收入多增长了 1 倍，到如今达到了 37 万亿法郎，其中 6 万亿为债券，3.2 万亿为证券投资基金，还有 3.54 万亿为外国证券。法国人在银行的储蓄总额为 12.7 万亿法郎，而且还在继续收藏黄金和面额为 200 法郎和 500 法郎的纸币（总额约为 1000 亿法郎）。

综上所述，法国人为了预防生活中的不测风云，找到成功的道路，接受了一些新的价值，并投身于一些新的活动之中。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而且因为法国在法国人眼中也改变了形象。法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扩大了法国人的视角和前景，但是也增加了他们的不安，使他们以各种形式对民族归属感进行反思。

在世界大同和民族特性之间

20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的开放，以及整个法国社会对全世界的开放。这首先表现在旅游业上，法国人已经习惯于每年接待数以千万计的外国游客（1998 年访问法国的外国人总数达到 7900 万），和不断与其他民族和文化进行接触和交流。原本喜欢待在家里的“高卢人”，如今也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去旅行，所以才有 1950 年成立的“地中海俱乐部”和“新国界”（1967 年成立，是法国第一家“廉价”旅行社）的辉煌，包机这种旅行方式让法国人能够更便宜地前往国外。在这个每年至少有 5 亿人“用不到 80 天的时间”环游世界的时代，超过 10% 的法国人每年都会出国旅行，在国外居留的人数从 1994 年到 1997 年增长了 23%。这尤其有利于年轻人纯粹为了游玩前往欧洲和世界各国，而且法国大学生们越来越多地为了学习进行国际旅行，因为在 1976 年还只拥有 9.6 万名外国学生的法国，如今每年接待外国学生约 12.5 万人，其中 3.6 万欧洲人（在这中间有 2.7 万人来自欧盟国家）。另外，大量退休者因为既有钱又有时间，踊跃前往旅行社报名，充分利用包机价格的降低前往海外，或利用欧洲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乘坐旅行大客车游历欧洲。在法国人自发地去发现

“地球村”的同时，电视也让法国人能够随时看到世界各地的景象。从1970年中期开始，法国电视频道中有关国际的部分的比例在不断增加，这种现象还因为频道的多样化（比如有线的和卫星传输的新主题频道）而加剧。多种有关旅游的电视专栏或电视杂志（如《塔拉萨》、《别做梦》等），以及各种专业旅游频道（如地球、奥德赛和旅行等），1108 为电视观众提供了了解世界的稳定的渠道，而纪录片是这个领域“航标”式的产品。这让法国人高度重视“奇异的天窗”（电视）这个大规模的文化新载体，因为他们可以每天在其中领略到这个世界的不同面目，从悲惨的到壮丽的，从可怕的到神奇的。对世界的开放还深深影响了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为每个法国家庭打开了眼界，即便是最贫困的家庭，而且涵盖了所有年龄段。这种开放还因为电影、文学和音乐得到了放大，法国人看的电影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国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法国人找回了撰写游记的传统，他们还根据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对自我的认知创作了很多小说；至于音乐方面，法国人传统上就对流行音乐、摇滚乐和爵士乐持开放态度（至今爱好这些音乐的仍大有人在，其中包括那些出生于196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人的子女），如今他们不仅听全世界流行的音乐，还对某些地区和国家的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比如西印度群岛的瑞格舞曲、阿尔及利亚通俗音乐、说唱乐），并且深受“非洲音乐”、“拉丁音乐”和“东方音乐”的影响，不仅欣赏外国音乐家，还欣赏改编外国音乐的法国音乐家。

在这25年的时间里，由于经常需要将自己与其他的民族进行对比，因此法国人开始思考本民族的独特性。首先需要体现这种独特性的价值。实际上，不管是公共权力部门还是私营企业家，或者是手工业者和商业劳动者，所有人都很清楚，在这个开放的、交流无处不在的世界上，对于吸引成群结队的游客、艺术和文化爱好者、商人以及企业家来法国消费和投资，从而优化法国的外贸收支和增加就业机会，发掘本民族的“王牌”是最重要的事情。“法国的品质”建立在对法国的独特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它被视为法国在世界竞争中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所以，尽管很多其他因素都可以用来解释大型文化工程、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国土整治等领域的公共政策的广度，但是法国的决策者们在做出抉择的时候，一定把“法国的品质”这个国际性、欧洲性和世界性的变数融入了其中。由于地处欧洲地理的十字路口，不仅有利于吸引来自整个欧洲大陆的企业，还吸引着那些希望征服欧洲市场的美国或日本的公司。自然和文化的特质也让法国成为很多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但是，尽管现在法国各方面已经相当不错了，但还需要修建更多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在 1970 年代几乎还不存在的全球竞争的新价值观，以及一种真正的国际性文化，为法国人决心打造纵横交错的现代化道路设施和提供优质的服务做出了注解。为此，法国大量增加了电话线路，1970 年代中期法国还只有 1500 万部电话，在 1983 年、1993 年和 1998 年先后猛增到了 2000 万、3100 万和 3400 万部。所有的电话现在都是数字的，1985 年升位到 8 位数的电话号码，从 1997 年开始升位到了 10 位数。在固定电话方面，由于欧盟有关开放电信市场的规定，法国电信现在必须面临来自国内外的电信运营商的激烈竞争。戏剧家费尔南德·莱诺那出著名的有关电话的幕间短剧《阿斯尼埃尔 22 号》展现的场景如今早已成为历史，至于移动电话，它从 1990 年代诞生伊始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最近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从而使在 1975 年还是法国的缺陷的电话系统变成了法国的王牌。此外，法国政府在 1970 年代作出了一个主要由主观愿望驱动的决定，允许私有企业开发高速公路，从而弥补了法国在道路交通上的不足，当时法国的高速公路总长度只有 4000 公里，如今已经达到了将近 1 万公里，此外还增加了很多“四道公路”。在覆盖整个法国国土的高速公路网之外，法国还拥有国家公路和省级公路网，这些同样高质量的公路网更加稠密。在法国国土上，还纵横交错着高速火车线路，1975 年至 1998 年之间是高速火车取得长足发展的时期。高速铁路网的修建始于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期内，他开启了巴黎和里昂之间高速铁路路段的修建工程，1981 年 9 月其继任者密特朗宣布工程竣工。如今，法国拥有总长度为 6000 公里的高速铁路路线，400 列高速火车，每年运送的乘客数量超过 4500 万，而且这个网

1109

络已经延伸到了很多欧洲国家，可以通往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科隆、都灵/米兰和巴塞罗那，当然还有伦敦，1994 年落成的芒什海峡海底隧道和欧洲之星列车，使乘坐火车往返于法国和英国之间成为可能。如今，法国大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将法国与世界互联网络紧密联结在了一起，再次表明了法国政府将法国融入到一体化的欧洲和开放的世界的愿望，因此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法国的“王牌”的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标志性产品，是不可能吸引到其他国家的人的。法国独特的文化领域，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标志性产品。在法国，权力和大型建筑之间有着悠久的文化和政治传统，明显体现了封建制度下，包括共和制度下，法国人对声誉的追求。但是如果不对其进行深刻分析，将是不足的和不完整的。法国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兴起的大规模修建文化工程的浪潮，还源自全球化竞争的压力，通过这些建筑来体现法国文化独特性的价值，是非常有必要的。蓬皮杜时期在巴黎的波布尔街建成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吉斯卡尔·德斯坦任总统时落成了奥赛博物馆和科学城，他们都很清楚这个道理。密特朗的两次七年总统任期正好与法国向世界敞开大门的过程相吻合，所以他有很多项目可供选择。1995 年，总共大约有二十项大型工程在巴黎和外省全部竣工，包括大卢浮宫、法国国家图书馆、巴士底歌剧院、拉德芳斯大拱门、阿拉伯世界学院、财政部新大楼、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大展厅，以及阿尔勒的古代普罗旺斯博物馆。法国在这项工程中投入了约 350 亿法郎，这些钱不仅使建筑成为“密特朗时期”的首要“科目”，还提高了这些文化场所对游客的吸引力（1983 年有 250 万人参观了卢浮宫，1993 年就翻了一番），而且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象征着整个法国尤其是巴黎相对于纽约的国际文化首都的地位。希拉克也不例外，他在 1998 年决定，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布朗利河岸修建一座展示人类早期文明的艺术博物馆。总统们对“丰碑式”建筑的喜好，在实现了地方分权的法国引来了众多的追随者，那些地区大城市也增加了在文化领域的投资，比如蒙彼利埃的会议中心、尼姆的方形

艺术博物馆和里昂的歌剧院。这些在市区内完成的大型建筑，得益于1960 年代的《马尔罗法案》，该法案允许在城市老城区进行改造和新建，提高城市的吸引力。有很多国际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参与了法国这些大型城市建设项目，比如诺曼·福斯特、嘉艾·奥兰第、保尔加·胡伊德洛布罗、贝聿铭、奥托·冯·斯普里格森、卡洛斯·欧特、马里奥·博塔、伦佐·皮亚诺，在法国建筑设计师方面主要有让·努维尔、多米尼克·佩罗、保尔·舍梅托夫、阿德里安·凡西贝尔和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赞姆巴克等人，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在法国大展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法国由此铸造了自己的民族特殊性。

这些现代名胜不仅为法国的民族特性增加了新的吸引力，而且为法国从过去继承得来的文化遗产增添了新的亮色。对国家遗产的热爱 1110 不仅反映了法国人对民族特性的追求，也体现出法国人利用这种无可估量的巨大财富对外国人“推销”自己的愿望。翻修、改造、重建，以及对新发现的古迹的发掘和研究，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按照安德烈·马尔罗制定的法案的精神，一个旨在保护国家遗产的新法案在1988 年获得通过，大量城堡、修道院和教堂，甚至古时候最简陋的人类生存遗迹都因此得以修复。在这种对文化遗产进行投资的原则指引下，法国的地方政府也主动投入到国家遗产的保护工作之中（从前地方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投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与其同时，地区的媒体也为此展开了积极的宣传，另外各种民间组织也积极开展对国家遗产的修复、维护、发现和保护工作。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国家、各大区、各省和各地方政府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过去、乡土、城市和地区的挚爱，一方面体现了法国人对寻根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法国人吸引外国游客的愿望。从远古（亨利·科斯盖尔 1991 年在卡西附近一个深达 37 米的山洞里发现的岩画，以及让 - 马丽·朔维在阿尔代什的山洞里发现的岩画）到近代（工业考古潮兴起，旨在保护 19 世纪的矿井、高炉、工厂和制造场，并将它们改造成博物馆），从史前到现代，从古代到中世纪（发掘马赛的古港口以及位于巴黎的

菲利普·奥古斯都国王时期的城堡指挥塔），法国到处都在复原历史，通过创造或修复“保存记忆的地方”，吸引越来越多的参观者。一些特别的文化活动引导并扩大了这一运动，比如1990年的“考古年”活动，在一百多个法国城市展示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并在巴黎的大宫集中展览了来自284个地方的3000余件考古展品；还有创立于1993年的“国家遗产日”，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参观者，那些国家博物馆最受欢迎。很多相关书籍也大获成功，比如皮埃尔·诺拉的巨著《保存记忆的地方》①（一套7卷的“带插图的历史丛书”，1984年至1992年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再版了压缩成3卷的简装本）和费尔南·布罗代尔1986年创作完成的《法兰西的独特身份，空间与历史》，以及在此期间出版的其他图书，它们的成功证明了这种旨在提高法国的“文化特殊性”的追求法国民族独特性的运动的广度。中央政府得到了地方当局的积极配合（1990年，各省在文化上共投入了40亿法郎，相当于省级预算的2.5%，而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从1980年代末开始，就已经将超过13.7%的预算投入到了文化事业中），在所有文化领域都积极行动起来。为了保护法国的电影业不被“好莱坞制造”冲垮，法国通过资助机制为该行业提供支持，这个特设的基金由国家电影艺术中心进行管理；法国政府还要求公共和私有电视台必须播放超过一定比例的法国电影，由此避免法国的“第七种艺术”遭遇其他欧洲国家的电影业面临的“崩溃”局面。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法国电影保持了每年100至150部的生产量，而且法国的电影院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最大程度地抵抗住了美国电影的竞争。尽管到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数减少了（1979年为1.75亿人次，1982—1983年为2亿，1989年为1.19亿，1992年为1.15亿，不过此后又出现了明显回升，1996年为1.36亿，1998年为1.5亿），法国电影所占的市场份额，尽管也有所萎缩（1981年为44%，1989年为37%，1995年为40%，1998年为38%），但总的来说仍然比较高，并远远超

① 一译《记忆的亮点》。

过其他欧洲国家，而且法国的影视剧在欧洲的电视上取得非常大的成功，比如 1998 年的电视连续剧《基督山伯爵》，每一集平均都有 1200 1111 万名电视观众。由于拥有更多的预算支持（1993 年，颇具象征意义地达到了财政总支出的 1%，1981 年至 1991 年十年间的预算比前一个十年增长了一倍），文化部成了法国文化的特殊性的重要捍卫者。这一由社会党人杰克·朗（先后于 1981 年至 1986 年，1988 年至 1993 年两次担任法国文化部长）首创的政策，得到了继任者们（1986 年至 1988 年为弗朗索瓦·雷奥塔尔，1993 年至 1995 年为雅克·杜崩，1995 年至 1997 年为菲利普·杜斯特布拉吉，1997 年起为卡特琳娜·特罗特马恩）的坚持，因为经过了 1980 年代初期的大辩论和 1990 年代初的争议（马克·福马洛利 1991 年出版了《文化政府》，抨击了杰克·朗的政策，倡导简朴的文化政府），法国人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文化是法国屹立于当今世界的基石所在。因此，政府和支持政府政策的地方当局在所有艺术创作和“活剧”领域几乎无处不在，通过有关公共部门的支持，直接和间接地为各种私人的艺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补贴，音乐、舞蹈、戏剧和各种造型艺术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它们由于政府的资金支持和公共需求的激增而倍受鼓舞。另外，1987 年和 1995 年有关对文艺、科学、体育等事业提供资助的法律，让私人企业、富人或基金会能够参与到繁荣文化的事业之中。

在拥有 1100 万居民的首都“大巴黎”（作为法国的“王牌”，巴黎吸引了大批旅游者、艺术爱好者和商人，很多企业把总部设在这里，而且巴黎拥有大量的历史遗产，以及为数众多的近现代建筑，比如出类拔萃的商业中心位于上塞纳省①的拉德芳斯）、其他大城市和各地区的省会城市连接而成的网络拥有了巨大吸引力之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充分实现其价值，一方面需要适应经济的全球化，另一方面需要维持法国各地区的传统和专有技能。法国领土整治暨发展局在 1970 至 1980 年期间，对规划法国土地的大规模整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

① 即 92 省 Hauts-de-Seine，位于巴黎以西，属于“大巴黎”。

该局还把很大一部分工作放在了突出各地的地区独特性上，充分利用运输和能源成本的降低，以及消除了自然资源依赖等地理限制的新交通方式，将各地区融入到了全球竞争之中。法国通过利用工业遗产，经过网络化，以及将中小企业或中小工业纳入整体战略之中，成功地根据各地区的特点，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发展了面向国际的地方特色经济（代价是北部和东部的家庭传统工业遭到了破坏）。比如位于宝讷维尔和克吕兹之间的阿尔维河谷，变成了欧洲最大的车丝加工基地，与那些人为形成的工业城市相反，当地依靠的是从前的“工业土壤”，深深地植根于当地的传统，但是同时向全世界开放。与阿尔维河谷类似的还有生产皮鞋的肖勒泰，从事塑料加工的瓦亚纳克斯地区，以刀剪业著称的提埃尔，以及擅长木材加工的纪龙德省。

各地发展面向全球化经济的特色产业，还表现在食品领域。法国拥有5000多种葡萄酒和400多种奶酪，当然还有很多“王牌”可以用来抵御国际饮食的口味单一化，其始作俑者是美国或日本等国的饮食时尚。尽管拥有花样繁多的美食和技艺高超的厨师，法国还是遭到了来自外来饮食的入侵，1980年代有麦当劳、汉堡王和“快餐”[①] 的快餐食品和汉堡包，以及日本的寿司和墨西哥的辣味牛肉等；1990年代有各式三明治。不过，三明治的时兴，意味着法国人对1980年代流行的外国的和工业化的食物的兴趣在减退，而重新开始钟情于手工的和独特口味的美食。即便在超级市场里，绿色食品、有专属标签或冠以原产地质量证明的产品，以及按照传统方法生产的食品，也都大受欢迎，以至于学校和企业的食堂都开始在“大锅饭”菜肴中增加传统菜式，用新鲜的食材取代速冻食品，从而对顾客进行美味的教育或再教育，并让他们领略到极为丰富的法国烹调的口味的多样性。 1112

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法国就是以这种方式航行于世界大同和民族特性之间。法国从没有像这一时期那样对来自外面的（经济的、金融的、旅游的还是文化的）冲动如此开放而敏感，完全进入了一个交流的

① 汉堡王为Burger King，“快餐”为Quick。

时代，以远远超过从前的数量输出和输入各种产品和图像、人员和音乐、传统和时尚。法国人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人民（首先是欧盟范围内的欧洲人，然后是非洲人、阿拉伯人、亚洲人、拉美人和北美人）的持续接触，形成了一种混合的“世界大同”的文化，这种多文化融合引起了法国人对民族特性的深刻反思，他们希望通过突出“法国的特殊性”，来达到保持自我，在“地球村”保留本民族的标记，同时使其“王牌”在国际竞争中体现出价值，不仅促进商品和文化的输出，还能吸引投资者和游客的进入。“对民族特性的反思”与其说是一种寻求自我，还不如说是是有组织地向世界开放，比如 1998 年在法国举行的世界杯。尽管难免会导致一些矛盾，引起了社会辩论，但经过这四分之一世纪，法国下定了决心，在保持本国独特性（尽管有人预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同一化）的同时，积极投身至欧洲建设和全球化之中。

世界大同和民族特性两个方向的力量集中作用到了敏感的移民问题上，明显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问题的复杂性。1974 年吉斯卡尔·德斯坦入主爱丽舍宫伊始，即发布政令，实行“零移民”政策，为此他先后采取了“胡萝卜”（利昂内尔·斯托勒吕提出的《“帮助返回”法案》，旨在鼓励移民返回故国）和“大棒”（1980 年的《波内—斯托勒吕法案》，扩大了驱逐和遣返外国人的可能性）两种不同的措施，目的是防止遭遇外国劳动力激烈竞争的那部分法国人出现大规模失业。尽管 1981 年总统大选时，移民问题还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只有让-玛丽·勒庞（未能成为总统候选人，因为他没有收集到必要的 500 个签名）认为这是一个必须立即“制止”的“严重问题”。但是，在左派获得胜利以后，移民问题立刻得到了重视，因为人们发现尽管 1974 年法国就对移民“封闭了边境”，但相当数量的偷渡客，即“非法移民”在法国安了家。将他们合法化还是驱逐出境，这个问题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将他们实行大规模合法化（并不是全部合法化，因为非法移民的总数量大约为 30 万人，但是只有大多数为马格里布人的 13 万人，从 1982 年 8 月 11 日的通报中受益），不过这再次导致大量非法移民从马格里布地区或黑非洲涌入，他们被以后有

可能再次实行的合法化所吸引。另外，《“帮助返回”法案》被取消，《波内—斯托勒吕法案》也被废止，“家庭团聚”则得到许可（这方便了更多外国人来法国定居）。于是，在法国失业人口数量高达180万的情况下，政府尽管否决了密特朗在总统选举时提出的给与移民市政选举权的主张，但实施了一种更加自由主义的政策，另外从1982年开始，政府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完全杜绝非法移民进入法国境内是极端困难的事情。

移民问题在左派内部造成了很多的分歧，越来越多的左派人士投票赞成实施一种更加有力的政策；右派也开始出现激烈的辩论，有人恶毒地攻击有关移民的政策，尤其是支持者日益增加的国民阵线，这个极右派政党与移民问题有着双重的联系：一方面是失业，另一方面是治安恶化。法国开始重新审视移民问题，它已经是法国政治生活中一个结构性的组成部分。1983年6月10日的法案重新赋予了法院通过紧急程序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的权力；1984年4月27日颁布的政令恢复了《“帮助返回”法案》，将其更名为《“帮助重新融入”法案》；1984年12月4日的政令则增大了“家庭团聚”的难度。在议会，左派在1985年6月6日明确表示：法国不能再接纳更多的移民，法国政府将竭尽所能帮助那些想要离开的人达成心愿，帮助那些希望留下的人融入社会。由于国民阵线的推波助澜、右派的模棱两可、左派的犹豫不决和反种族主义抗议行动的日益加剧（“紧急反种族歧视运动”1984年开始启动，著名的胸牌“别碰我的兄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1986年3月的立法选举即将到来，局势顿时紧张起来。1985年11月，密特朗宣布：“法国就是移民们自己的家”。他再次提到赋予移民们参加市政选举的权利，而此时国民阵线强调的是“民族优先”，右派则以“保护民族特性”的名义反对非法移民。在1986年3月获得立法选举胜利后，法兰西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组成的同盟在9月9日投票通过了《帕斯夸法案》，明确规定外国人申请进入法国境内时，必须提交居留所需的足够财产的证明；而且如果威胁到公共安全，外国人将不能将居留证延期；另外，省政府也具有了驱逐非

法移民的权力，而不再仅仅是法院。为了显示决心，内政部长1986年10月18日将101名来自马里的非法移民，送上了前往（马里首都）巴马科的飞机。同时，内政部还对《国籍法》进行了改革：父母均为外国人，但是在法国出生的孩子，将不能在年满18岁的时候自动获得法国国籍，而必须根据1986年11月12日的法案提出申请，这意味着法国在传统的“出生地国籍权”方面出现了倒退。由于总统、左派、“人权联盟”的反对和天主教会的担心，1987年6月22日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这个由马尔索·龙主导的委员会在1988年1月7日提交了最终的报告，可是由于总统大选临近，报告中的任何结论（比如使申请法国国籍的程序变得更加快捷和清晰，这与政府的意愿正好相反）都没有得到采用，于是《国籍法》保持不变。

在密特朗再次当选法国总统，而让-玛丽·勒庞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率后，移民问题再次成为法国社会讨论的主要议题。1989年10月3日爆发的“穆斯林头巾”事件，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被极度政治化，而且得到媒体的深度报道。由于克莱伊中学的校长禁止三名佩戴“穆斯林头巾”的女高中生进入校园，而且在很多学校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左派和右派都开始围绕着社会融入、共和国，以及共和国的法律和价值观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可以接受世俗化走得如此远吗？那些拒绝融入的人怎么办？法国会变成不同社会团体的组合吗？政治家、知识分子和记者在这些问题上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支持教育部长若斯潘的内阁会议做出的一个复杂晦涩的决定（佩戴宗教装饰物与世俗化并不矛盾，但有关机构还是可以根据尚需明确的准则加以禁止），让局势更加混乱。从1989年至1994年9月教育部长弗朗索瓦·贝鲁颁布有关通告（该通告确定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学校里不能容许如此明显的宗教装饰物，作为宗教热忱的标志，这些装饰物会清晰地将一部分学生从学校共同的生活准则中分隔出来，”不过学校允许佩戴一些隐秘的代表宗教信仰的饰物）为止，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使舆论的焦点集中到了信仰的表达方式上，所引起的社会大辩论超越了传统政治的派系

的界限。同一时期，国民阵线在一些地方的“不完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表明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德勒、萨隆德普罗旺斯、马赛），反对移民的选票来自左右两派的选民。1989 年 12 月 3 日，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在法国电视一台宣称：“法国不可能收容全世界的贫困者”。移民聚居的城市郊区出现了不断升级的骚乱，甚至爆发了暴乱。在海湾战争期间（1991 年 1 月至 3 月），很多人害怕会爆发移民特别是阿拉伯裔移民的骚乱。尽管骚乱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但还是无法让人们平息对移民问题的不安情绪。于是，当法兰西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组成的同盟在 1993 年的立法选举中再次获得胜利后，立即着手修改《国籍法》。1993 年 5 月 13 日，新制定的《帕斯夸法案》获得投票通过，法案规定：父母是外国人但在法国出生的孩子将可以在 18 岁至 21 岁之间通过申请成为法国人；与法国人结婚获得法国国籍的时限从一年延长到了两年；父母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而自己出生在法国的孩子，将不再在出生之时被视为法国人。另外，政府着手恢复“对非法移民零容忍”的政策。为了控制非法移民问题，法国政府决定只有在合法居留两年以上，且拥有居住和经济条件的前提下，才可以申请“家庭团聚”（奉行“一夫多妻制”的人被排除在外）；另外政府还决定所有的社会补贴都适用于处于正常居留状态下的移民（但没有追溯力）。在 8 个条款（包括有关避难权的条款）被宪法委员会否定，和采纳了一些政治家（西蒙娜·维尔和皮埃尔·梅埃尼耶里）有关身份核查的方式的意见后，《帕斯夸法案》的实施仍然未能平息局势并削弱国民阵线的上升势头，这个极右派政党在 1995 年至 1998 年间，在各级选举中（总统大选、市政选举和地区选举）的支持率不断攀升。1996 年，“非法移民”问题由于栖身于圣贝尔纳教堂的移民被警察驱逐的事件，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1997 年夏季由若斯潘政府的内政部长让 - 皮埃尔·舍韦内芒推行的合法化新程序，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批评，右派认为其立场过于宽松，一部分左派则认为它不够宽松。1997 年 6 月 19 日，若斯潘决定委托社会学家帕特里克·韦伊就移民问题写一份研究报告，以帮助自己“在不背

弃法国的价值观以及不破坏社会平衡的前提下，制定坚定的和行之有效的移民政策”。韦伊的报告明确指出：像法国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不应该对移民封闭大门；移民的权利不应该总被各种暗含的限制条件所剥夺。报告主张不再接收不合格的劳动者，而应该欢迎法国在向外辐射和国际合作中所需的大学生或艺术家。报告还强调了避难权和家庭生活权，认为必须恢复出生地国籍权。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在1998 年被纳入了《舍韦内芒法案》和《吉古法案》。尽管有很多质疑，但这两个 1981 年以来最宽松的法案获得了投票通过。从此，父母是外国人，出生在法国的孩子和 1993 年以前（《吉古法案》）一样，在成年后即成为法国人；外国的退休者、科学家、病人和与法国有着家庭联系的外国人可以较容易地得到法国居留证；住宿证明被取消；家庭团聚变得宽松；避难权得到扩大；遣返和驱逐出境的滞留期得到了延长。

1115

此外，尽管可能存在数据的偏差，但统计结果明确地显示：在这25 年间，法国的移民人口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数量上，移民累计总数从 1975 年至 1998 年实现了显著的增长，从 360 万增至 700 万，与传统的只考虑外国人数量的统计方法相比，这里采用的是更加切合实际的方法，即统计对象为外国人或从前是外国人的法国人所在家庭的成员总数。其次是质量上，移民的人口来源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人（1975 年占总数的 60%）减少，而非洲和亚洲人增多（如今已经达到总数的 60%）。这些数据反驳了那些诸如“移民潮得到控制”和“法国境内外国人和外裔法国人的数量增长已经停滞”的传统言论。1974 年以来，历届政府都号称能够同时做到“零移民”和“最大限度的促进社会融入”，但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第一个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第二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一个意志至上的政策，因此历届政府实际上并没有针对这两个目标实施切实有效的政策。法国民众则以与政府不同的方式作出回应，即移民继续大规模增加，外裔法国人的数量通过不断增长，他们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取得了法国国籍。一方面，国民阵线的支持者迅速增加，促使法国民众在对民族特

性的反思中增加了一个排外的部分（即便如此，也无法打消人们支持国民阵线的念头），而且一部分左派民众和极少一部分右派选民也赞成国民阵线的排外主张。另一方面，尽管发生了很多事件，违法犯罪活动数量增多，人们普遍感到不安全，但是法国社会并没有对有色人种做出大规模的暴力的反应，即便也存在着敌视或隔离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还有加剧的可能性，但法国人普遍还是希望这些移民（不论是外国人，还是已经获得法国国籍的人）能够成为好邻居，能够彻底融入法国社会。在1996年夏季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尽管所谓“外族入侵”的威胁阴魂不散（其象征是偷渡），公众舆论对“非法移民”的态度还是以同情为主，他们几乎没有表达出任何动用公共暴力的愿望，而且在对非法移民合法化的问题上，他们也没有表现出1981年那样的反对。对于移民的融入问题，乐观的人认为可以顺利地实现，他们的看法总是被各种事件所否定；悲观的人则看到社会紧张关系已经接近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具体表现为各种种族主义和排外的行为，以及融入因为有可能对“法国的民族特性”造成威胁而面临困境。

相比1975年，法国人更加熟悉外面的世界（原因在此前已经有了详细的描述），对非洲和亚洲的痛苦和贫困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相信开发、接触和混合是新时代的必然存在，最终接受了从前不能想象的现实，即各种不同价值观和文化，以及不同肤色的人的“大规模侵入”，尽管政府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实现融入的政策。出现这样的局面，应该说是法国人自己的选择，是他们自己融合了这些价值观和文化，并赋予这些外来的东西不断提升的地位。今天的法国，不得不面对针对移民和外来法国人的种族主义和排外行为的风险在不断增多的问题，与此同时，法国社会还面临很多带有民族色彩的社会问题（郊区的危机、移民后代的失业问题、违法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和新问题交织在一起，放大了社会舆论对新问题的判断，以及新问题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 1116

“我”与“我们”，个体和集体

人们习惯于将个人自由、个人至上和“我”对“我们”取得的胜

利，作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有人将其归功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1789年的大革命，也有人将其归功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因为“五月风暴”导致了“干什么都行”的绝对自由主义和“我优先”的自私主义的文化的兴起。两种解释都有一些道理，但是还需要充分考量妇女解放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这一进程的根源尽管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最终实现就是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1967年有关避孕的《讷维尔特法案》、1974年有关流产的《维尔法案》和1975年有关离婚的法案（确定双方同意即可离婚，在事实分居或“过错”等条件下即可分手的原则，简化了离婚手续），突出了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淡化了服从和权威的观念，从法律上具体体现了一个既成事实。结婚数量的降低、自由结合和非婚生子女的增多、离婚数量的上升，都是这一时代的特征，而此前的1950年至1960年却正好相反，那时候的特点是早婚数量越来越多，而离婚和非婚生子女的数量非常有限。因此，结婚率从1975年的8%逐渐降低，1980年为6%，1993年为5%，如今更是降至了4.7%，每年法国的结婚数量只有25万例，远远低于1970年代中期的35万例。另外，结婚年龄越来越大，妇女从22岁增至26岁，男人从24岁增至28岁；离婚数量从1970年至1990年增加了两倍；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居然从9%增至了36%。如今，150万低于25岁的年轻人的父母再婚，66%的离异家庭的孩子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还有10%的孩子由单亲家庭抚养。这种新的局面经常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单位的分崩离析，这确实是事实，但它反映出社会关系的新的一面。传统的、不平等的、等级制的婚约被自我优先意识所取代，人们自行选择结婚或不结婚，选择解除婚约或同居，自由和平等从此充分体现在两性关系之中，但还不至于使人们丧失将“我”与“我们”结合起来的意愿，只不过这种意愿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而且父母与子女的联系反而因为这些不同的方式而得到了加强。尽管家庭的建立和重组在实践中出现了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并不会造成“家庭的解体”，“家庭”一词更是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含义。

性解放和社会的宽容并不仅限于妇女在夫妻关系中的地位。同性恋逐渐被社会接受，不再被视为一种“毛病”或异常的行为，这是最近二十五年一个较为显著的标志。1997 年，左派着手实施一种新的结合契约，那些“不能够或不愿意结婚，但决心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伴侣（性别不限）将能够根据这个契约结合起来。这个名为《公民结合契约》的法案，在 1998 年秋季提交讨论，在左右两派都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该法案居然使同性恋等结合方式合法化，可见“习俗的民主”在法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跟上了社会和民众心态以及政治民主的演进的步伐。另外，社会对这样一种“契约”的需求，反映出法国社会正在建立的实际上是一种“我”和“我们”之间的新的辩证关系。“我”肯定的是选择的自由，并将这种自由视为私人生活中不应该受到任何约束的部分，不过这种自由可以促使“我”产生与其他人建立某种共同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契约化”的愿望；“我们”则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而婚姻仅仅是这些形式中的一种而已。个体向社会要求的，是意识到个体的不同，并在个体希望的情况下，用法律的形式承认这种不同。这构成了法国社会组织形式的显著变化，当然无法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意识的混乱。

1117

这种“我”和“我们”之间、个人主义和结合（以双方同意的自由方式，在平等的基础上）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多个方面体现在了大多数社会行为之中。比如民众对个人自主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了一系列消费品及其使用方式上，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电视此前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从 1980 年代尤其是从 1990 年代开始，法国家庭开始拥有第二台甚至第三台电视机；人们开始对付费电视频道、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以及这些频道提供的丰富多彩的节目着迷，并因此出现了分化：在同一个家里，人们在不同的房间里寻求个人兴趣的满足，在节目单上选择适合自己的节目。1970 年末进入市场的录像机掀起的浪潮也证明了这一点。1980 年时已经有 1/2 的家庭拥有了录像机，1990 年代更是达到了 3/4。录像机使人们可以自由的、个性化的使用电视机，购买或在音像俱乐部租借录像带也体现了同一种精神，但主要是

相对于电影院而言。在这一时代的另一个标志性的产品上，也反映出了相同的社会演变，2/3 的家庭都拥有高保真音响，甚至在有些家庭，父母和孩子各自拥有自己的音响设备，这样每个人都能在家里欣赏自己喜爱的音乐，随着微型化的发展，随身听被发明了出来，人们从此不仅能够在家里听音乐，也能在上班的路上、在慢跑的过程中、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听音乐，甚至还可以同时看电视节目。另外，家用电脑和电子游戏大大丰富了家庭娱乐。微波炉主要用于解冻或重新加热那些已经烧熟的饭菜，这些饭菜越来越多地由超市送到家中。所有这些消费品的使用方式都体现出了个体和社会的基本单元的自主权力，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自主做出的选择。

不过，这种自主选择的态度始终与人们希望与其他人经常联系的愿望共存着。比如本来在法国起步缓慢的手机，从 1996 年开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97 年时手机用户达到了 300 万，1998 年的时候更多。而各种各样的寻呼机，比如 BP 机或 BB 机则满足了那些没有条件拥有手机的年轻人。手机不仅不会有损于人们的自主性，而且可以使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其他人联系，永远都不会与其他人失去联系并维持与其他人的关系。人们不仅有这种“联系”他人的需要，还有与人分享感情、感受和快乐的需要，因此才有了合唱团（法国大约有 30 万个合唱团，吸引了将近 1000 万人参与其中）和文化活动的巨大成功，比如 1980 年代由杰克·朗发起的成就不容置疑的“音乐节”，另外还有获得了大量国家补贴的“布尔日之春”音乐节，和在拉罗歇尔举行的“法语音乐节”，这些活动都是青年们或少年们旅行和交往的好机会，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和各种肤色的法国人都积极投身其中，欣赏各种各样的音乐，不仅是法国的传统歌曲，黑人音乐、马格里布音乐和西印度群岛音乐都非常受欢迎。在巴黎和外省，一些

1118 大型音乐厅（都被称为“天顶”[1]）相继落成，供人们举行各种音乐集

① 因为巴黎“天顶”音乐厅非常有名，因此人们习惯把其他城市的音乐厅也称为“天顶”，它们当然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会，而一些规模更大的场所（如巴黎的贝尔西多功能体育馆、王子公园体育场和法兰西体育场）也成为法国和世界著名流行歌手们举行演唱会的舞台，人们毫不迟疑地走上街头，与其他人并肩而立，一起宣泄感情与情绪，比如在歌星营造的气氛中，一起挥舞手中点燃的打火机。很多人曾害怕寻求自我会凌驾于政治集会之上，个人主义或自我封闭会凌驾于集体主义或交流之上，其实两者是可以共存的。当然，法国社会的结构性场合与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发生了显著变化（家庭、学校、阶级、政党、工会、教会的地位下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它们仍然在道德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文化，在民众的行为方式发生改变的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权威和等级观念的下降，对应着自由和平等的上升）。

但是能够说今天享乐主义的法国已经完全迷失方向了吗？法国在前进的道路上确实放弃了一些象征着集体愿望的路标，这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们在社会及政治问题上的思想和态度的深刻变化上。革命的“乌托邦”和世俗的“救世主”（马克思、黑格尔、弗洛伊德）曾经在1960年代是备受瞩目的“明星”，但它们从1980年代开始迅速变得晦暗起来。1974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出版了《古拉格群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销量达到70万册），他在书中向读者展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和那些人民民主的无人性的一面，这本书引发了一些“新哲学家”（如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和贝尔纳-亨利·莱维）对马克思主义的谴责。《古拉格群岛》不仅揭露了斯大林在导向上的错误，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必须摒弃的弊病。这是一个意识形态混乱的时代。现代法国生活的前景已经不再是未知的明天，这就是《世界的幻灭》的中心思想，马塞尔·戈谢在这本书中告诉人们，民主已经成为历史发展无法逾越的界限。由于没有先验的参照（宗教的或世俗的），人们不得自行组织起来，但是这种新的自由令人深为恐慌，因为有些人有可能主动投入所谓“导师”或“教主”的掌控之中，这种风险使民主成为一种脆弱的体制，必须加以保护，保护它免遭来自自身的损害。对于价值观和文化的演变，阿兰·芬克尔克劳在1987年写就的《思想

的失败》中，表达了自己对传统人道主义面临毁灭的担心；皮埃尔·罗桑瓦龙则在 1981 年完成了《福利国家的危机》，1998 年他还针对“代表危机”撰写了《找不到的人民》（之前的 1992 年创作了《公民的加冕》），分析了政治的困窘就像是未完成的或背离的民主的综合症，使民主陷入最初的矛盾，导致动荡和混乱。

由于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发生在 1989 年，正好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上述分析因此更显深刻。根据弗朗索瓦·孚雷在《法国大革命评判词典》（和莫娜·奥祖夫共同主编）中的阐述，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并已经实现了，法国社会必须学会“没有目标”的生活，谨慎地从容地对待民主。1995 年（几乎是贝尔纳 - 亨利·莱维 1977 年出版《人面兽行》之后二十年），孚雷出版了《幻象往事》，通过揭露斯大林利用纳粹主义来强制推行或保护共产主义的事实，激烈抨击了斯大林的伪善。斯特法尼·库尔图瓦在 1997 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的黑皮书》中，再一次揭示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就像美国人法兰西斯·福山写道的那样，由于“乌托邦”不复存在，人们除了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管理，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所以“历史已经结束了”。然而，资本主义并不能赢得人民的信心。从 1993 年皮埃尔·布尔迪厄的《世界的苦难》，到 1996 年维维安娜·弗莱斯特的《经济恐怖》，再到 1998 年夏季赞成布尔迪厄和反对布尔迪厄的人之间的大辩论，让人们深感不安的主要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和文化的危机。

1119

这是一个恐慌和信心丧失的时代。很多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 1990 年代令人震惊的“血液感染事件”，以及疯牛病、生长激素和石棉等丑闻。这些人为的悲剧，除了给受害者造成痛苦以外，只会进一步削弱公民们对社会制度的信心，让他们的信心深受打击的还有“金钱崇拜”、政治和金融腐败造成的危害，以及科学本身从各个方面遭到的质疑（正如马克·费罗 1998 年在《举步维艰的社会》中描述的那样）。在这个时代，人民已经不再沉湎于过去的“乌托邦”，他们不相信现在的社会精英，也不相信那些本应该代表他们利益的人，他

们备受各种内部威胁和外来危害的煎熬：从不受边境束缚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造成的烟云到恐怖主义，从文明的碰撞到原教旨主义，从教派、少数派到浓烈的（种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民族特征，看起来，法兰西民族和法兰西共和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听凭对社会各种传统标志的普遍质疑的时代洪流将自己卷走。由于社会生活充斥着不确定因素，很多法国人转而重新强调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家庭、宗教、学校，以及政府或戴高乐主义，他们认为这些价值观能够有效地重新确立社会关系，在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起码的平衡，凸现民族特征，重建超越民主、资本主义、多文化融合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共同的生活”，因此应该使这些价值观复苏。在左右两派，从菲利普·塞甘到雷吉·德布莱，从马克斯·加罗到夏尔·帕斯夸，很多人都试图给这个似乎已经毫无意义的世界赋予新的意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另外那些人认为，在上帝、马克思和阿隆[1]死后，人们仍然可以在个人命运中找到生存下去的好理由。图书出版业的巨大成功（哲学方面有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米歇尔·翁福莱，文学方面有菲利普·德莱尔姆、克里斯蒂安·博班，社会学方面则有米歇尔·马费佐利），揭示了人们对一种带有享乐主义的新智慧的向往：那就是像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一样，耕种我们的回园，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远离那些让我们的前辈心潮澎湃地去追求个人的命运和集体的革命的动荡和激情。对是否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个问题，回答是“可以”。

看起来，“我”、“个人的时代”、自私，甚至作为一个体系建立起来的寻求自我已经取得了胜利，个人的理性彻底战胜了集体的激情。但也许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70年代末，人们就意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并不会同时导致“我们”的终结，即共同的激情和集体的情绪的丧失殆尽。传统的集体斗争的不复存在并不能意味着集体斗争的寿终正寝，只不过其形式发生了变化。“世界医生”组织诞生后不久，

① 即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贝尔纳·库什内就成立了“医生无国界”组织，两个组织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1977 年，雷蒙·阿隆和让－保罗·萨特举行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面，发起了“向越南献上一艘船”的人道主义行动，旨在帮助那些在绝望的“大海”上漂浮的越南难民），人们意识到，需要大家一起奋斗的事业始终存在着。正如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在 1981 年出版的《犬儒与激情》一书中写到的那样，这个事业就是与“恶”作斗争。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因为“恶”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人道主义斗争取代了对政治的激情，其引发的民众热情显示出人们不能只顾着“种植自己的花园或管理好本国的自由主义民主生活”。由于媒体的大量报道，这些“我们”的表现形式和对“我”的确认一样，对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种人道主义动员行动纷至沓来，尽管它们经常像流行时尚一样来得快，去得更快，似乎证明了吉尔·利波维茨基创作的《昙花一现的帝国》的观点，但是这些行动实实在在存在着，而且永远都不会枯竭。从“紧急反种族歧视运动”到“爱心食堂”，从“马拉松式电视募捐”到“预防艾滋病行动”，从在全世界对抗饥饿到支持萨拉热窝的行动，从援助“非法移民”的运动到“帮助一切穷人——第四世界”运动，从全球性行动到地区性行动，人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如音乐会、集会、互助活动、募款、电视节目等），积极投身于抗击“苦难”的一时的或持续的斗争之中，“民众热情的团结”永远不会向“恶”的传统的、新的形式低头，这些形式包括自私主义、传统的束缚和统治者的压制。民众的热情在法国并没有消散，他们对司法、权利、道德也仍然怀有较高的期望，尽管其表现方式与 1970 年代尤其与 1960 年代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120

历史与记忆

在这一时期，法国人尤其年轻法国人还表现出另外一种渴望，那就是更多地了解最近的历史。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民众对历史的需要与日俱增。几乎所有历史人物传记的出版都非常成功；1978 年，

《历史》杂志问世，该杂志和其他历史类杂志非常受欢迎，《历史》、《历史月刊》和《我们的历史》的每期发行总数高达20万份；公共电视频道播放了大量的历史纪录片，还设置了很多有关历史的专栏节目，比如法国电视五台的《历史的意义》、艺术频道的《平行的历史》和法国电视三台的《历史星期三》等；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上出现的历史主题频道，比如TPS电视台的《历史频道》等。这些都显露出，1970年代末人们曾担心年轻人和以后几代人将对历史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希特勒何许人也"，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人们需要了解历史，不仅仅是为了知道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还是为了理解行将结束的20世纪，了解《大屠杀》和《古拉格》、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原子弹和两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一些尘封的往事的回忆也开始苏醒，比如维希政权、"通敌"和"抵抗运动"等。

早在蓬皮杜总统在位时，安德烈·阿里斯和阿兰·德·塞杜伊的电影《法国人，你们是否知道?》和围绕着"图维耶案件"展开的社会大辩论，就已经使法国人对那个特殊时期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不过这个有关"法国人互不相爱的时代"的案卷被蓬皮杜总统亲自合上了，他赦免了保尔·图维耶这个二战时期法奸保安队头目。另外，密特朗在二战时期曾被维希傀儡政府的首脑贝当颁发"法兰克战斧"的经历，在1970年代被旧事重提，激起了很多人对密特朗与社会党的抗议，包括当年抵抗组织内的战友和一些戴高乐主义者。不过这件事情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很快就过去了。1987年对德国前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尔比的诉讼案，再一次激起了法国人对那段历史的质疑，因为那个时期的经历者以及随后的几代人，此前都在尽力掩饰或美化那个时期，似乎想要把它变成一段值得庆贺的时光。人称"里昂屠夫"的克劳斯·巴尔比的出庭，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并激起了对让·穆兰的人格和角色，以及造成他被捕的真实原因的大辩论，还就此开启了持续十来年的历史与记忆的对质。有关著作因此大量问世，媒体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最著名的著作之中，有1993年出版的让-皮埃尔·阿泽马与弗朗索瓦·贝达里达合著的《黑暗年代的法兰

西》，书中揭露了勒内·布斯凯在维希政府中担任的角色，以及他后来如何得以逃脱处罚，并在战后的政治体系中谋取自己的位置的经过。考虑到勒内·布斯凯和密特朗之间的亲密关系，人们不禁再次开始怀疑密特朗总统在维希政府时期的经历，皮埃尔·佩昂在1994年出版的《一个法国人的青年时代》中对此进行了澄清。

从此，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再掩盖这个德国统治下的时期了（《德国统治下的法国》，是菲利普·布兰1995年出版的著作），针对莫里斯·帕蓬的司法程序和随后的诉讼将维希政府时期的法国展现在了法官们面前，并通过媒体报道展现在了全体法国人的眼前。对莫里斯·帕蓬这位前雷蒙·巴尔政府的预算部长的诉讼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3月之间再次进行，最终莫里斯·帕蓬成为第一位被判处“反人类罪”的维希政府高级官员。在这次案件中反映出来的法国人民对这段历史明显的无法释怀（按照历史学家亨利·鲁索的说法，“这段过去并没有真正过去”），引发了大量有关著作的相继出版：奥利维耶·巴鲁什的《为法国政府效力》，将莫里斯·帕蓬的情况重新放回到了历史背景之中，他指出当时法国政府大多数成员都屈服于德国人并与他们合作；德尼·佩尚斯基的《维希，1940—1944年，控制与排斥》，重现了当时的局势，分析了当时法国人的精神状态；让-皮埃尔·阿泽马与奥利维耶·维耶维奥尔卡合著的《维希，1940—1944年》，展现了一幅维希政府时代的整体画卷；美国人罗贝尔·帕克斯顿的《维希的法国》再版——该书的第一版发行于1973年，打破了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对这段历史的缄默，因为他们深受戴高乐主义的影响，认为那个时期的“法国政府”只是一段不光彩的插曲，对法国的历史无关重要。于是，任何发生在这段时期的事情都不再是禁忌，不仅包括维希政权的真正性质、维希当局的角色——1997年12月5日，希拉克总统应邀参加了纪念无名犹太牺牲者的仪式，他在讲话中肯定了“被占领的法国确实存在”，“对犹太人的有组织押送、逮捕和突然搜捕是在法国当局的参与下进行的”，他还重申了他在1995年的一些言论，承认法国对法国犹太人被押往集中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还有

法国抵抗运动的内部斗争。1997年，随着克洛德·贝里导演的电影《露西·奥布拉克》上映和吉拉尔·朔维创作的《奥布拉克，里昂，1943年》的出版，奥布拉克夫妇这对法国抵抗运动中的传奇伉俪一下子成为民众论战的焦点，很多批评是对他们形象的严重歪曲，以至于雷蒙·奥布拉克要求《自由报》组织了一次历史学家圆桌会议（参加者有亨利·鲁索、弗朗索瓦·贝达里达、让-皮埃尔·阿泽马和曾担任让·穆兰秘书的达尼埃尔·科尔蒂耶），讨论奥布拉克夫妇是否应该为让·穆兰的被捕承担责任（关于让·穆兰的生平，还有两部著作在1998年末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它们是雅克·贝纳克的《让·穆兰事件的秘密》和皮埃尔·佩昂的《让·穆兰》）。这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法庭”谴责了对历史的胡乱猜疑，这次子虚乌有的“奥布拉克事件”再一次证明了公众舆论对这个“黑色的年代”的兴趣，以及更深入了解法国历史包括光辉的“抵抗运动”的历史的愿望，另外还显示出历史学家在国家生活中突然凸现出的作用。历史学家不仅是专家，而且还是“见证者”，在国家与其过去之间的这个新对话中，从此历史学家还必须用自己的学识和尚存的历史亲历者、记者甚至法官作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历史学家在奥布拉克事件和对莫里斯·帕蓬的诉讼案中，有机会让民众听到自己的观点，这显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1997年9月，索福瑞公司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73%的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赞成“无休止”的莫里斯·帕蓬案件的预审以诉讼告终，而65岁以上的法国人中间只有53%的人同意。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了解所有的事实是一种苛求，或者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但历史学家、法官和记者们还是以各自的方式，在自己的岗位上，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舆论公开，接受公众的审查，即便他们内部累积的固有的差异和分歧，有时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满足民众对历史的需求，是记忆的责任所在（1998年末出版的热纳维埃芙·戴高乐-安托尼奥兹的回忆录《穿越黑夜》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还需要对知识分子对历史问题的态度进行反思——米歇尔·

维诺克因此凭借《知识分子的世纪》获得了美第奇散文奖，这部大师级的著作让人联想起始终处于时代论战中心的巴雷斯和萨特——并反思民众对那些意识形态引导大众投入政治激情和重大混乱的旋涡之中的时代的态度。1975 年至 1999 年这一时期，尽管参与国家生活的方式减少了，人们的信心也下降了，但还不至于使个体的“我”融入集 1122 体的“我们”的源泉出现枯竭。与从前相比，人们现在参与国家生活更多地是因为热情而不是意识形态，这种参与可能更加明智——我们不奢望改变世界，我们也不否定历史，我们也不去改变生活，但我们至少能够抑制“恶”——更加节制，毫无疑问也更加注重事实的真相。这种对透明的需要，及其可能带来的失望，似乎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五、民族国家的蜕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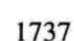
这就是新世纪和新千年来临之际法国的现状。历史学家将在以后，或很久以后，评价 1975 年至 1999 年这一时期在民族的漫长历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对于当代人来说，谁也不会否认其对这一时期的感受始终与危机感（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交织在一起，同时还伴随着对某些国家基础，甚至民族特性、特点和独特之处的质疑。不过，谁会相信几千年铸造的这个民族国家，将会像一根稻草一样，就此被全球化、欧洲建设、经济增长乏力和大规模失业的疾风一下子卷走呢？

历史学家们如今知道作为民族国家的法国的建设是漫长而艰难的，它因十九世纪末的第三共和国及其学校里宣扬共和国的教材得到了升华，通过 1940 年 6 月至 1969 年 4 月戴高乐的功勋达到了白炽化，但它从来都不曾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是完美的、整体的和完善的。不论是雅各宾派的集权，还是漫长的柯尔伯主义的传统，都不足以使米拉波眼中的这个“并不是由分裂的群体拼成的集体”的法国的内部变得整齐划一。高卢时期就存在的小国家、大块土地或小块土地的多样性，

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法国人对民族和故土的归属感是多方面的。另外，这个理想的国家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封闭一隅，那样的话它将和世界的其他部分断绝联系。不论对法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赖以生存的法则始终是交流，与欧洲的近邻以及世界上的每个国家进行人员、商品、金钱和思想的交流。幸运的是，在这些交流过程中，法国经常是赢家。

所以国家层面（按照法国特有的规则进行调解）和跨国层面（遵守其他的规范）的共存，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因此，有关法国的民族国家及其长久性的疑问是合理的，但是不能用二元论的方法提出疑问，比如“过去无所不能，现在则一无所能”。今天备受质疑的是国家与地方、与欧洲、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权力交错的世界上，法国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光辉，而且必须向其他国家让步，谁能否定这一点呢？但是也不应该忘记法国的真实实力，法国有能力体现其地区、城市和土地的价值，通过欧盟这个集体延伸自己的抱负，使自己的特殊吸引力和包容性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瞩目。

在这个方面，法国已经说了很多，但显然还没有说完。



1123

大 事 年 表

公元前

600 年	福赛人创立马赛城。
390 年	高卢人占领罗马。
*350 年	高卢人占领布洛涅。
*327—325 年	毕代亚斯从马赛出发在北海航行。
300 年（之后）	凯尔特人征服海滨高卢。
*250 年	比利时人在高卢出现；凯尔特人再次侵入内高卢。
231 年	马赛向西班牙派出了一个罗马使团。
123 年	建立阿卡·塞克斯提亚（埃克斯－昂－普罗旺斯）。
121 年	阿维尔尼人的国王比蒂伊特败北。外高卢设置罗马行省。
61 年	日耳曼人入侵高卢。
59 年	赫尔维蒂人入侵高卢；恺撒率军来到罗讷河畔。
53 年	高卢举行总起义，其领导人为维尔琴热托里

	克斯。
52 年	阿瓦里库姆与热尔戈维被包围；阿莱西亚。
50 年	恺撒占领于科斯罗杜努姆；高卢战争结束。
43 年	建立吕格杜纳姆（今里昂）。
12 年	在吕格杜纳姆召开首次高卢议会。

公元

21 年	弗洛卢斯与萨克洛维尔在高卢造反。
68 年	3 月，文戴克斯在吕格杜纳姆造反。
70 年	兰斯议会：试图建立高卢帝国。
121 年	哈德良巡游高卢。
162 年	日耳曼人侵入高卢东部。
186 年	马泰尔努斯的盗匪在高卢叛乱。
196 年	阿尔比努斯叛乱。
197 年	2 月 19 日，吕格杜纳姆之役；阿尔比努斯去世。
233—234 年	阿拉曼人首次入侵。
约 250 年	建造高卢大部分的教堂。
256 年	伽利埃努斯皇帝取得对法兰克人的胜利。
260—275 年	高卢帝国。
260—268 年	高卢皇帝波斯杜穆斯击退法兰克人的入侵。
306 年	君士坦丁征讨法兰克人。
313 年	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之自由的《米兰敕令》。
355 年	法兰克人、阿拉曼人与撒克逊人入侵高卢。
约 361 年	圣马丁创办利居日修道院。
364 年	阿拉曼人入侵高卢。
372 年	圣马丁创办马尔姆蒂埃修道院。
373—397 年	圣马丁担任图尔主教。

413 年	西哥特人进入高卢南部。
*418 年	圣卡西安创办马赛的圣维克托修道院。
435—437 年	巴高达大起义。
443 年	勃艮第人在萨伏依定居。
450 年（之前）	公共学校在高卢消失。
451 年	匈奴人入侵高卢。
[455—470 年]	阿拉曼人在阿尔萨斯定居。
469—476 年	厄里克征服高卢。
476 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
481 年	克洛维继承希尔代里克。
484 年	阿拉里克二世继承厄里克。
486 年	希亚格利乌斯在苏瓦松被克洛维打败并杀害。
*490—525 年	圣阿维担任维埃纳主教。
*493 年	克洛维与克洛蒂尔德成婚。
*494 年	克洛维进入卢瓦尔河南岸。
496 年（之前）	托尔比阿克战役。
496 年?	克洛维皈依基督教。
500 年	克洛维首次对勃艮第人开战。
501 年	贡德博将勃艮第人团结在一起，并拟订了勃艮第部族法——《贡伯特法》。
503 年	圣塞泽尔担任阿尔勒主教。
507 年	克洛维在福耶打败西哥特人。
[507—511 年]	撒利克法典公布。
509 年	提奥多利克与勃艮第人交战。
*509 年	里普埃尔法兰克人承认克洛维为国王。
511 年	奥尔良宗教会议[①]；克洛维去世，王国由其子瓜分。
515 年	西吉斯蒙建立阿戈纳修道院。

① 亦译宗教评议会、主教会议、公会议。

516 年	西吉斯蒙继承贡德博。
*520 年	《圣热纳维埃芙传》。
524 年	勃艮第人被法兰克人与提奥多利克制服。 1124
529 年	奥朗日宗教会议；阿尔勒的圣塞泽尔要求谴责半皮拉基亚斯主义的论点。
531 年	希尔德贝尔在西班牙击退西哥特人。
532—534 年	法兰克人征服勃艮第王国。
536—537 年	法兰克人征服普罗旺斯。
*538 年	11 月 20 日，格雷戈里 · 德 · 图尔出生。
543 年	阿尔勒的圣塞泽尔去世。
[543—556 年]	建造圣日耳曼 - 代 - 普雷教堂。
*550 年	圣拉德贡德建造普瓦提埃圣十字教堂。
558 年	克洛泰尔成为法兰克人唯一的国王。
561 年	克洛泰尔去世，王国由其子瓜分。
565 年	诗人福尔蒂纳在高卢。
567 年	夏里贝尔去世：出现新的瓜分；希尔佩里克杀害加尔斯文特，并与弗蕾德贡德成婚。
*568 年	阿瓦尔人进攻法兰克人。
569—575 年	伦巴第人 5 次入侵高卢。
573—593 年	格雷戈里 · 德 · 图尔担任主教。
573 年	希尔佩里克与西吉贝尔特之间的首次战争开始。
575 年	西吉贝尔特取得胜利，但被谋杀；希尔佩里克二世成为奥斯特拉西亚国王。
578 年	布列塔尼人占领瓦讷。
579 年	布列塔尼人入侵雷恩与南特地区。
585—589 年	贡特朗在塞普提曼尼亚遭受失败。
587 年	圣拉德贡德去世；加斯科涅人在阿基坦定居。
592 年	格雷戈里 · 德 · 图尔的《法兰克人史》完稿。

594 年?	圣科隆伯创办吕克瑟伊修道院。
597 年	弗蕾德贡德去世。
*597 年	福尔蒂纳担任普瓦提埃主教。
600 年（之后）	福尔蒂纳去世。
602 年	希尔德贝尔特制服加斯科涅人。
613 年	布吕纳奥遭受酷刑；克洛泰尔二世成为唯一的国王。
614 年	巴黎宗教会议：主教对其教区教士拥有专属的司法权。
629 年	克洛泰尔二世去世，达戈贝尔特即位。
630—631 年	达戈贝尔特在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巡视，并推行改革。
630 年?	在高卢出现本笃会教规。
634 年	西吉贝尔特从其父亲手里得到奥斯特拉西亚。
635 年	达戈贝尔特建立圣德尼集市。
639 年	达戈贝尔特去世。
640 年	奥斯特拉西亚宫相兰登的丕平去世。
640—660 年	圣艾鲁瓦担任努瓦永主教。
643 年	丕平之子格里莫担任奥斯特拉西亚宫相。
*650 年	建造圣旺德里耶修道院。
654 年	建造朱米埃热修道院。
656 年	格里莫为其儿子希尔德贝尔特三世篡夺奥斯特拉西亚王位。
*660 年	编撰所谓《弗蕾德贡德的编年史》。
662 年	格里莫与希尔德贝尔特三世遇刺。
663—679 年	圣莱热担任奥顿主教。
约 670 年	墨洛温王朝最后一批写在纸莎草纸上的王家法令。
673 年	显贵造反；希尔代里克二世成为唯一的国王。

675 年	希尔代里克二世遇刺。
*675 年	阿基坦人宣布独立。
*680 年	赫斯塔尔的丕平担任奥斯特拉西亚宫相；赫斯塔尔的丕平被纽斯特里亚的艾勃卢万击败；弗里松人拉德博德开始与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人进行斗争。
683 年？	艾勃卢万遇刺。
*686 年	纽斯特里亚宫相去世；丕平二世介入由此引发的与继承问题相关的争执并占领宫相府；墨洛温王朝最终衰落。
*695 年	丕平将弗里松人挡在莱茵河对岸。
696—742 年	宗教会议在高卢的教会中消失。
700 年	阿拉曼公爵戈特弗里埃德要求独立。
709—712 年	丕平征讨阿拉曼人。
714 年	丕平二世去世，其遗孀普莱克特鲁德试图维持宫相府的团结。
715 年	教皇格利高里二世即位；普莱克特鲁德在居伊斯败于纽斯特里亚宫相兰弗鲁瓦。
716 年	希尔佩里克二世赋予科尔比修道院在福斯、普罗旺斯的商业特权。
716—719 年	查理·马特制服纽斯特里亚人。
717—725 年	穆斯林征服塞普提曼尼亚。
719—738 年	查理·马特对撒克逊人开战。
720 年	查理·马特打败阿基坦人。
723 年	圣卜尼法斯在查理·马特身边担任主教。
724 年	创办雷舍诺隐修院的圣皮尔曼对阿拉曼人进行福音传教。
727 年（之后）	撰写《法兰克国王大事记》。
728 年	查理·马特降服巴伐利亚。

1125

730 年	查理·马特降服最后一位阿拉曼公爵。
731 年	教皇格利高里三世即位。
732 年	阿拉伯人在普瓦提埃败北。
733—734 年	查理·马特征服弗里西亚。
734—739 年	勃艮第人造反；萨拉森人入侵普罗旺斯；在与伦巴第人联手之后，查理·马特已平定全国。
735 年	查理·马特试图征服阿基坦。
737 年	纽斯特里亚、勃艮第和奥斯特拉西亚国王蒂埃里四世去世；墨洛温王朝王位空缺。
737—739 年	查理·马特战胜普罗旺斯公爵。
739 年	格利高里三世吁请查理·马特反对伦巴第人；法兰克人与伦巴第人之间的同盟继续维持。
741 年	教皇扎夏里埃即位。
742—743 年	查理·马特去世；发生反对其儿子的总叛乱。
742 年	丕平与卡洛曼制服阿基坦人与阿拉曼人；卡洛曼为改造教士请来卜尼法斯；查理曼出生。
743 年	希尔代里克三世成为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在艾斯蒂安召开奥斯特拉西亚主教会议；法兰克人的教会开始改革。
743—744 年	对萨克森人进行惩罚性的征讨。
744 年	巴伐利亚人臣服；阿拉曼人重新反叛；在苏瓦松召开纽斯特里亚主教会议；斯蒂尔米乌斯在福尔达建立隐修院。
746 年	阿拉曼人在康斯塔特被制服；卜尼法斯担任美因茨主教。
747 年	卡洛曼放弃权力；丕平成为唯一的宫相。
748—749 年	巴伐利亚反叛。
751 年	丕平在苏瓦松贵族大会上被选为国王；希尔

	代里克三世被废黜。
752—757 年	教皇斯特凡二世在位。
753 年	斯特凡二世在高卢。
754 年	斯特凡二世与丕平在蓬蒂翁会晤；丕平由教皇加冕；圣卜尼法斯殉教。
756 年（之前）	丕平令教会的什一税成为必须缴纳的税。
756 年	伦巴第人进攻罗马；丕平远征。
756 年（之后）	丕平和其儿子成为法兰克人的国王和罗马的贵族。
757—767 年	教皇保罗一世在位。
758 年	征讨撒克逊人。
759 年	阿拉伯人被赶出下朗格多克；丕平完成了对塞普提曼尼亚的征服。
760—768 年	丕平制服阿基坦。
763 年	巴伐利亚公爵塔西隆三世宣布独立；塔西隆三世占领卡林西亚。
768 年	教皇斯特凡三世即位；阿拉伯人向高卢派驻使团；丕平去世，王国由其儿子查理与卡洛曼平分。
768 年（之后）	伊尔德布朗和尼韦隆的《编年史》。
769 年	查理与卡洛曼不和。
770—840 年?	艾因哈德在世。
800 年	关于王家领地管理的德维利斯敕令。
771 年	查理成为唯一的国王。
772 年	阿德里安继承斯特凡三世。
772—776 年	查理在萨克森进行惩罚性的征讨。
772 年	查理与伊尔德加尔德成婚。
773 年	查理在意大利：帕维亚之围。
774 年	查理在罗马：他更新了丕平对教皇国的赠与；

	帕维亚投降：查理成为伦巴第的国王。
775 年	查理占领下萨克森地区。
约 776 年	建造洛尔施修道院。
778 年	虔诚者路易出生。查理曼在西班牙：龙斯沃。
779 年（之前）	查理曼进行货币改革。
781 年	路易成为阿基坦国王；忒奥杜尔夫在高卢。
782 年	查理曼兼并反叛的萨克森；查理曼召请阿尔昆。
[782—786 年]	保罗·狄阿克雷在高卢。
783—785 年	征服萨克森；亚琛成为查理曼的主要住地。
*784 年	保罗·狄阿克雷：《梅斯主教大事记》。
785 年	查理曼要求教皇国的居民宣誓效忠。
785 年?	《萨克森地区敕令》。
788 年	忒奥杜尔夫担任奥尔良主教。征服伊斯特里埃；查理兼并巴伐利亚。
789 年	查理曼下令开办修道士的学校；通过《全民谕敕令》，查理曼首次为有息贷款制订了规章。
790 年	查理曼与梅西埃的奥法国王签订协议。
791 年	开始对阿瓦尔人征战。
793—798 年	北萨克森反叛。
794 年	查理曼确定了食品的最高价格。
795 年	教皇列奥三世即位。
796 年	阿瓦尔人承认是法兰克人的附庸。
796—805 年	厄德·德·梅斯建造帕拉丁教堂。
797 年	亚琛议事大会：《萨克森敕令》。
799 年	亚琛主教会议召开；出现针对列奥三世的阴谋。
800 年	12 月 25 日，查理曼在罗马由列奥三世加冕为

1126

	皇帝。
802 年	巡按使制度正规化。
802—803 年?	针对阿瓦尔人的战争结束。
803 年	发布弗里松法典。
804 年	查理曼与撒克逊人签订萨尔茨和约；查理曼与尼塞弗尔决裂。
805 年	阿尔昆去世。威尼西亚贵族承认服从查理曼。
*805—862 年	鲁普·德·费里耶尔在世。
806 年	帝国首次瓜分；尼姆维根敕令禁止高利贷。
807 年	哈鲁恩·阿尔－阿希德使团，该使团承认法兰克人对圣地的权利。
*807 年	建造热尔米尼－戴－普雷教堂；建造热洛纳修道院。
809—810 年	丕平征服威尼西亚。
809 年	查理曼干预“共发圣神”问题。
810 年	丕平去世。
811 年	查理去世。
812—813 年?	圣基朗在热洛纳去世。
813 年	虔诚者路易制服阿基坦并占领纳瓦尔；路易成为帝位的继承人并且被加冕。
814 年	查理曼去世；虔诚者路易成为皇帝；诗人安吉尔贝尔去世。
815 年	重新与西班牙的萨拉森人交战。
816 年	教皇斯特凡四世即位；虔诚者路易在兰斯由斯特凡四世加冕。
816—817 年	亚琛宗教会议：达尼阿纳的圣贝努瓦的影响。
816—840 年	阿戈巴尔担任里昂主教。
817 年	罗泰尔成为皇帝；丕平成为阿基坦、塞普提曼尼亚与勃艮第的国王；路易成为巴伐利亚、

	卡林西亚、波西米亚和克罗地亚的国王；虔诚者路易承认教皇选举自由；帕斯卡尔教皇一世即位。
819 年	虔诚者路易与朱蒂特·德·巴伐利亚成婚；福尔达教堂的祝圣仪式。
821 年（之前）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
821 年	达尼阿纳的圣贝努瓦与忒奥杜尔夫·德·奥尔良去世。
822 年	路易在阿蒂尼公开忏悔。
823 年	6 月，秃头查理出生；教皇给罗泰尔加冕。
824 年	欧仁二世继承教皇帕斯卡尔一世；罗泰尔的《罗马法》。
824—825 年	结巴米歇尔与虔诚者路易就圣像崇拜通信。
828 年	法兰克人侵袭非洲；艾克斯教士大会：教士们与虔诚者路易对立。
829 年	8 月，沃尔姆斯法令；秃头查理的赠与；罗泰尔造反。
829—882 年	《圣贝尔坦年鉴》。
830 年	取消沃尔姆斯法令；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夺取权力。
830 年?	圣雅克团在康波斯泰尔创建。
831 年	艾克斯议会；虔诚者路易重新掌权；若纳斯·德·奥尔良：《王室制度》；帕夏斯·拉德贝尔：《论主的体恤》。
832 年	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再次造反；罗泰尔与查理成为唯一的继承人。
833 年	6 月，虔诚者路易被废黜。
	10 月 1 日，虔诚者路易在苏瓦松的圣梅达尔教堂悔罪。

1127

834 年	路易复辟。
836 年	诺瓦穆蒂埃的僧侣流亡圣菲尔贝－德－格朗－里厄。
838 年	秃头查理被加冕为国王；阿基坦的丕平去世。
840 年	6 月 20 日，虔诚者路易去世；罗泰尔与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争权。
841 年	罗泰尔与丕平二世在丰特诺瓦－昂－皮伊塞耶败北。
[841—843 年]	尼塔尔：《历史》。
842 年	2 月 14 日，路易与查理发表斯特拉斯堡誓约；向亚琛进军；三兄弟之间停止交战；清除丕平二世；“黑人”艾尔莫尔用诗体撰写的编年史。
843 年	凡尔登条约；“志同道合”体制。
844 年	蒂翁维尔会议；贝尔纳·德·塞普提曼尼亚被处决。
844—845 年	秃头查理在阿基坦征讨丕平二世失利。
845 年	让·斯科特在秃头查理的宫廷；丕平获得阿基坦；诺曼人洗劫巴黎；辛克马尔担任兰斯主教。
846 年（之前）	泰冈：《论虔诚者路易的一生与行为》。
847 年	教皇列奥四世即位；麦尔森会议。
848 年	6 月，查理在奥尔良由加纳隆加冕。
849 年	秃头查理夺回图卢兹；丕平二世被废黜；萨拉森人侵袭普罗旺斯；罗泰尔与查理在佩罗内和解。
849—854 年	查理二世在阿基坦连遭失败。
*850 年	让·斯科特：《宿命论》。
852 年	大力士罗贝尔担任马尔姆蒂埃修道院在俗的

	院长。
853 年	罗贝尔在安茹、都兰与曼恩传教。
855 年	罗泰尔一世去世，其属地被瓜分：路易二世为皇帝与意大利国王，罗泰尔二世为中（部）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为普罗旺斯国王，年幼者路易为阿基坦国王。
855—862 年	诺曼人蹂躏法兰西岛。
858 年	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
858—859 年	日尔曼人路易入侵法兰西，因遭到教士反对而失利。
859 年	查理向路易发起进攻。
860 年	6 月 6 日，《科布伦茨条约》；《“维持现状”和约》。
861 年	大力士罗贝尔成为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地区的公爵。
862 年	罗泰尔二世与特特贝热离婚，并与瓦尔德拉德成婚。
[862—869 年]	让·斯科特：《论自然划分》。
863 年	诺曼人在奥弗涅；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对罗泰尔二世离婚之事进行调查；梅斯与拉特兰主教会议；查理·德·普罗旺斯去世；秃头查理制服阿基坦；路易二世·德·意大利占据普罗旺斯；罗泰尔二世获得里昂公爵领；诺曼人侵袭阿基坦。
864 年	皮特雷贵族大会：商谈对付诺曼人的措施；秃头查理试图重新减少铸币作坊的数量；在皮特雷贵族大会遭到谴责的丕平二世进修道院。
865 年	蒂塞会晤：秃头查理与日耳曼人路易联手对

	付罗泰尔二世；罗泰尔二世屈服；特特贝热返回洛林的宫廷。
866 年	大力士罗贝尔在布里萨尔特战胜诺曼人；罗贝尔去世；修道院长于格成为罗贝尔的继承人。
869 年	8 月，罗泰尔二世去世；开始围绕洛林的继承问题展开争斗。
870 年	8 月，麦尔森条约；秃头查理与日尔曼人路易在洛林的领土有所扩大。
872 年	约翰八世教皇即位。
875 年	8 月，路易二世·德·普罗旺斯去世；开始就帝位的继承问题展开争斗。
	12 月 25 日，秃头查理在罗马由教皇加冕为皇帝。
876 年	1 月 31 日，查理成为意大利国王。
877 年	5 月，查理通过缴纳重金使诺曼人撤离。
	6 月，基耶尔齐贵族大会：国王向西法兰克王国的显贵们让步。
	10 月，查理去世；结巴路易在贡比涅加冕为国王。
878 年	约翰八世为寻求对付萨拉森人的救兵来到法国。贝尔纳·德·戈蒂埃在阿基坦的阴谋。
879 年	结巴路易去世。
	路易三世与卡洛曼。
	10 月 15 日，博松在芒塔耶主教会议上被选为普罗旺斯国王。
	10 月，法兰西加洛林王朝与德意志加洛林王朝的人关系趋近。
880 年	结巴路易的遗腹子天真汉查理出生。

1128

881 年	博松与贝尔纳·普朗特韦吕埃交战；路易三世在索库尔战胜诺曼人。
882 年	辛克马尔在兰斯去世。
	8 月，路易三世去世。
	修道院长于格成为“法兰西公爵领”管理者。
884 年	卡洛曼去世；胖子查理击败天真汉查理当选为国王。
885 年	巴黎为诺曼人围困，大力士罗贝尔之子厄德击退诺曼人；罗贝尔的公爵领扩大。
887 年	博松去世；埃尔芒加尔德在普罗旺斯摄政。
888 年	鲁道夫一世成为勃艮第国王。
	2 月，厄德宣布成为法兰西国王。
890 年	博松之子瞎子路易成为普罗旺斯国王。
893 年	1 月，天真汉查理由福尔克·德·兰斯加冕为国王；内战爆发。
897 年	查理与厄德媾和。
898 年	1 月，厄德去世；厄德的兄弟成为安茹、图尔、布洛瓦、巴黎伯爵。
901 年	路易·德·普罗旺斯成为皇帝。
905 年	路易被贝朗热打败，并被弄瞎眼睛。于格·德·阿尔勒在瞎子路易的法国领地进行管理。
910 年	纪尧姆·德·阿基坦建立克吕尼修道院。
911 年	圣克莱尔－苏尔－埃普特条约。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诺曼底定居。
914 年	天真汉查理从日耳曼尼亚国王手中夺取洛林。
[915—917 年]	建造克吕尼首座修道院附属教堂。
917 年	在戴奥尔建立首座克吕尼隐修院。
920 年	罗贝尔的支持者造反。
921 年	勃艮第公爵、伸张正义者理查去世；拉乌尔

	继承理查。
922 年	罗贝尔公爵称王。
923 年	6 月，罗贝尔去世；勃艮第公爵拉乌尔继承罗贝尔；查理被埃尔贝尔·德·韦芒杜瓦囚禁。
926 年	于格·德·阿尔勒成为意大利国王。
926—942 年	圣奥东担任第二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
928 年	瞎子路易去世；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加洛林王朝终结。
929 年	天真汉查理在囚禁期间去世。
931 年	教皇约翰十一赞同克吕尼修会拥有特权。
*934 年	勃艮第国王鲁道夫二世成为普罗旺斯国王；阿尔勒王国建立。
936 年	1 月，拉乌尔去世。
	6 月，天真汉查理之子路易四世加冕。
940 年	奥通一世夺回洛林，并接受于格的臣从宣誓。
945 年	路易四世主宰诺曼底。
*946 年	建造克莱蒙费朗大教堂。
948—994 年	圣马伊厄尔担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
954 年	9 月，路易四世去世。
	11 月，罗泰尔当选并加冕；大个子于格成为勃艮第与阿基坦公爵。
975—1000 年	建造第二座克吕尼附属教堂。
978 年	罗泰尔企图获得洛林。
980 年	兰斯大主教阿达尔贝隆在教堂安装彩绘玻璃窗。
986 年	3 月，罗泰尔去世，路易五世即位。
987 年	路易五世去世。
	7 月 1－3 日，于格·卡佩在兰斯当选为国王并举行加冕礼。

989 年	在阿基坦开始实行“上帝的和平”。
	罗贝尔太子亦成为国王。
990—1014 年	在巴黎建造圣日耳曼－代－普雷教堂的门廊与钟楼。
991—995 年	里歇:《历史》。
991—998 年	教皇与卡佩王朝在兰斯主教驻地问题上发生冲突。
996 年 3 月	布洛瓦伯爵臣服并去世。
	10 月 24 日，于格·卡佩去世，虔诚者罗贝尔成为唯一的国王；罗贝尔第二次结婚，王后为贝尔特·德·安茹。
*1000 年	在塞纳河畔夏蒂永建造圣沃尔莱教堂。
*1000—1008 年	贝朗热·德·图尔在世。
1002 年	于格·卡佩的兄弟亨利去世；虔诚者罗贝尔开始征服勃艮第。
1003 年	虔诚者罗贝尔第三次结婚，这次娶的是康斯坦斯·德·普罗旺斯。
1006—1019 年	建造圣菲利贝尔·德·图尔努斯教堂。
1009 年	建造圣马丁－迪－加尼古教堂。
1020—1021 年	圣热尼－戴－丰泰纳教堂过梁上的雕塑，此系最早注明日期的罗曼风格雕塑作品。
1022 年	一些异端分子（摩尼教信奉者）在奥尔良被烧死。
1023 年	布洛瓦－香槟伯爵领形成；虔诚者罗贝尔与皇帝亨利二世在伊伏瓦举行会晤。
*1023 年	修道士埃尔高为虔诚者罗贝尔立传。
1023—1024 年	建造圣米歇尔山修道院附属教堂。
1031 年	7 月 1 日，虔诚者罗贝尔去世，亨利一世即位。

1129

1032 年	亨利一世将勃艮第作为封地授予其兄弟。法王将维克辛让与诺曼人。
*1033 年	西方发生饥荒。
1035 年	亨利一世支持诺曼底公爵私生子威廉。
[1035—1065 年]	建造圣福瓦·德·孔克教堂。
1041 年	最终组织“上帝的休战”。
1046 年	拉乌尔·格拉贝尔:《历史》。
1046—1117 年	罗贝尔·德·阿尔布里塞尔在世。
1046—1130 年	伯德里·德·布尔格伊在世。
1049 年	教皇列奥九世即位。
	建造普瓦提埃的圣希莱尔－勒－格朗教堂。
*1049—1077 年	建造贝尔奈大教堂。
1049—1109 年	圣于格担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
1050 ?—1120 年	罗塞兰·德·贡比涅在世。
1051 年	亨利一世与安娜·德·基辅成婚。
1052 年	菲利普一世出生。
1055 年	教皇维克托二世即位。
	桑斯伯爵领并入王家领地。
1056—1133 年	伊尔德贝·德·拉瓦丹在世。
1057 年	教皇斯特凡九世即位。
1059 年	5 月 23 日，菲利普一世加冕。
1060 年	9 月 4 日，亨利一世去世。
*1060—1150 年	建造图卢兹圣塞尔南教堂。
1061 年	教皇亚历山大二世即位。
1062—1066 年	建造卡昂的女修道院。
1063 年	莫瓦萨克教堂的祝圣仪式。
1064 ? —1079 年	建造卡昂的男修道院。
1066 年	诺曼底的威廉成为英国国王。
1067—1107 年	建造圣贝努瓦旭卢瓦尔修道院附属教堂。

1068 年	加迪内并入王家领地。
1070 年	佛兰德尔继承问题事件。
1071 年	菲利普一世在卡塞尔被弗里松人罗贝尔打败。
1073—1085 年	教皇格利高里七世在位。
1074 年	科尔比并入王家领地。
1076 年	教皇要求法国国王偿还意大利商人在法兰西岛被勒索的钱财。
1077 年	贝叶大教堂的祝圣仪式。
1078 年	圣昂塞尔姆担任勒贝克修道院院长。
1079 年	阿贝拉尔出生。
约 1080 年	路易六世出生。
1081 ?—1151 年	苏热在世。
1082—1095 年	建造费康修道院附属教堂。
1084 年	圣布鲁诺建造大夏尔特尔修道院。
1087 年	赤发威廉继承征服者威廉。
1088—1130 年	建造第三座克吕尼修道院附属教堂。
1090—1113 年	伊夫担任夏尔特尔主教。
1091 年	伊尔德贝 · 德 · 拉瓦丹担任勒芒主教；建造库唐塞大教堂。
1092 年	菲利普一世与安茹女公爵贝尔特拉德 · 德 · 孟福尔成婚。
1094 年	菲利普一世被开除教籍。
1095 年	乌尔班二世法国之行。克莱蒙宗教会议。宣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约 1096 年	圣昂塞尔姆的《上帝何以化身为人》。
1096 年	鲁昂主教会议。
1096—1141 年	于格 · 德 · 圣维克托在世。
1097 年	内韦尔圣艾蒂安教堂的祝圣仪式。
1097—1098 年	赤发威廉与昂塞尔姆之间发生冲突。

1097—1110 年	太子路易在维克辛进行战争。
1098 年	罗贝尔·德·默尔梅建立西多会。
1099 年	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即位；普瓦提埃圣拉德贡德教堂的祝圣仪式。
约 1100 年	克洛瓦特尔·德·莫瓦萨克：雕刻作品。
1100 年	布尔日与登并入王家领地。
*1100 年	路易被立为国王。
1100(或 1101)年	罗贝尔·德·阿尔布里塞尔建立冯特维罗教堂。
[1100—1150 年]	威廉·德·奥兰治的功绩。
1102—1136 年	阿贝拉尔从事教育活动。
1103 年	纪尧姆·德·尚波负责巴黎主教学校。
1104 年	菲利普一世获得宽恕。
1108 年	7 月 19 日，菲利普一世去世，胖子路易继位。
1108—1137 年	罗里斯证书。
1109 年	圣昂塞尔姆去世。
1109—1122 年	蓬斯·德·梅尔盖尔担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
1112 年	拉昂主教戈德里在一次骚乱中被处死；圣贝尔纳进入西多会。
1113 年	纪尧姆·德·尚波拟定巴黎圣维克托议事司铎戒律。
*1113 年	爱洛依斯与阿贝拉尔的奇遇。
1114 年	吉索尔条约：博克莱尔成为曼恩与布列塔尼的封建君主；西多会第二个女子修道院彭蒂尼修道院建立。
1115 年	圣贝尔纳建立克莱沃隐修院。
1116 年	伊夫·德·夏尔特尔去世。
1118 年	圣殿骑士团建立。
*1118 年	蒙莱里并入王家领地。

1130

1119 年	路易六世在布雷米勒失利；教皇卡里克斯特二世即位；兰斯宗教会议；卡奥尔大教堂的祝圣仪式。
1120 年	圣诺尔贝创办普雷蒙特雷会。
约 1120 年	阿贝拉尔：《是与否》。
1120 年（之后）	建造佩里格圣弗隆教堂。
1121 年	阿贝拉尔在苏瓦松被定罪。
1122 年	苏热担任圣德尼修道院院长。
1122—1126 年	路易六世为保护教堂征战奥弗涅。
1122—1156 年	可敬的皮埃尔担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
1124 年	香槟遭到皇帝亨利五世入侵。
	教皇霍诺里乌斯二世即位；基贝尔·德·诺让去世。
*1125 年	里摩日的《圣体形式论》。
[1125—1150 年]	朝圣查理曼。
1127 年	阿基坦公爵纪尧姆九世去世；佛兰德尔伯爵好人查理遇刺；路易六世插手选择佛兰德尔伯爵的继承人事宜未能如愿，纪尧姆·克里通成为佛兰德尔伯爵。
1127 年（之后）	富歇·德·夏尔特尔：《耶路撒冷史》。
1128 年	纪尧姆·克里通在围攻阿洛斯特时阵亡。
1129 年	玛蒂尔德·德·英格兰与安茹伯爵热奥弗瓦·普朗塔热内结婚。
1130 年	选出两位相互对立的教皇：英诺森二世与阿那克莱二世；埃当普宗教会议。
*1130 年	《戈尔蒙与伊桑巴尔》。
[1130—1155 年]	行吟诗人塞尔卡蒙在世。
1131 年	路易七世由英诺森二世加冕。
1132 ?—1144 年	建造圣德尼修道院附属教堂。

约 1132 年	维泽莱修道院附属教堂与奥顿大教堂竣工。
1135 年	第二座克莱沃隐修院建成。
[1135—1145 年]	普罗旺斯的抒情诗处于兴盛时期。
*1135—1168 年	建造桑斯大教堂。
1137 年	阿基坦公爵与普瓦提埃伯爵纪尧姆十世去世；阿利埃诺尔成为女继承人。 7 月 22 日，路易七世与阿利埃诺尔·德·阿基坦成婚。 8 月 1 日，路易六世去世，路易七世即位。
1137—1147 年	建造蒙马特尔的圣皮埃尔教堂。
1138 年	两个教皇对峙的局面结束。
1139—1147 年	建造冯特奈修道院附属教堂。
*1140 年	《身体虚弱者之歌》；发布格拉蒂安通谕；《亚历山大传奇》；诗人若弗雷·吕德尔处于巅峰状态。
1140 年	桑斯宗教会议：阿贝拉尔被判决。
1141 年	路易七世被开除教籍；玛蒂尔德的支持者打败英国国王埃蒂安·德·布洛瓦。
1142 年	路易七世与香槟的蒂波交战；圣贝尔纳对此予以干预。
1144 年	路易七世与香槟的蒂波签订维特里条约。 圣德尼教堂祭坛祝圣仪式。
*1145 年	苏热：《路易六世国王传》；建造努瓦永大教堂；夏尔特尔王家建筑正门的雕塑。
1146 年	路易七世动身参与十字军东征；苏热成为王国的摄政。
1148 年	西多会修道院附属教堂祝圣仪式；吉尔贝·德·拉波雷在兰斯宗教会议上被判决。
*1150 年	建造克莱蒙费朗的勒波尔圣母院，以及圣－

	勒-戴塞朗教堂；《拉乌尔·德·康布雷之歌》。
1150—1220 年	建造朗格勒大教堂。
[1150—1155 年]	开始建造布尔日大教堂。
[1150—1165 年]	《底比斯传奇》；《埃涅阿斯传奇》；《特洛伊传奇》。
1150—1195 年	诗人贝尔纳·德·旺塔杜尔在世。
*1150—1210 年	让·博代尔在世。
1151 年	热奥弗瓦·普朗塔热内去世；亨利成为其继承者；苏热去世。
1152 年	博让西宗教会议；路易七世休掉阿利埃诺尔·德·阿基坦，后者与亨利·普朗塔热内结婚。
1153 年	圣贝尔纳去世。
1154 年	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即位；亨利二世·普朗塔热内成为英国国王。
	8 月，路易七世与亨利二世签订条约。
	路易七世与康斯坦斯·德·卡斯蒂尔第二次结婚；法国与诺曼底处于交战状态。
*1155 年	建造桑利斯大教堂。
1158 年	路易七世与亨利二世第二次签订条约。
1159 年	路易七世在图卢兹挫败亨利二世。
	皮埃尔·伦巴第担任巴黎主教；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位。
1160 年	路易七世与阿莉克丝·德·香槟第三次结婚；贝鲁尔：《特里斯坦与伊瑟尔特》；马蒂厄·德·旺多姆达到顶峰时期。
1160—1196 年	莫里斯·德·苏利在巴黎担任主教。
1162 年	勃艮第公爵于格三世即位；亨利二世占领维克辛。

1131

[1162—1182 年]	克雷蒂安·德·特鲁瓦的文学活动。
1163 年	巴黎圣母院开始建造；图尔宗教会议；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开始发生冲突。
1164—1213 年	编年史作家维尔阿杜安在世。
1165 年	路易七世之子菲利普出生。
1166—1173 年	路易七世在于格三世的帮助下征讨封建主。
1167 年	圣菲利克斯－德－卡拉曼卡塔尔教派主教会议。
1173 年	瓦尔戴斯在里昂建立伏多瓦教派。
1174 年	亨利二世与其儿子签订蒙路易条约；金雀花（普朗塔热内）王朝的领地被瓜分；一位看管者首次提及香槟集市。
*1175 年	玛丽·德·法兰西的《冲积地》。
1175？—1212 年	建造苏瓦松大教堂。
1177(或 1192)年	亚当·德·圣维克托去世。
1177 年（之后）	《列那狐传奇》开始编撰。
1179 年	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加冕。
1180 年	巴黎首个大学生社团建立；菲利普·奥古斯都与伊莎贝尔·德·埃诺（后者以阿图瓦作为陪嫁）结婚；布洛瓦－香槟与金雀花王朝结成对付菲利普的同盟。 6 月 28 日，吉索尔条约。
1181 年	佛兰德尔与香槟组成反对菲利普·奥古斯都的同盟；亨利二世进行干预。
1182？—1226 年	圣弗朗索瓦·德·阿西兹在世。
1185 年	与佛兰德尔伯爵签订亚眠条约；菲利普·奥古斯都获得亚眠与韦芒杜瓦。
1186 年	勃艮第的于格三世失利。
1187 年	获得图尔内；菲利普·奥古斯都与亨利二世

	决裂。
1187—1188 年	菲利普·奥古斯都占领贝里，并进入图尔内。
1189 年	鲁昂禁止工匠组成行会；阿泽-勒-里多条约；狮心理查继承亨利二世。
1190 年	菲利普·奥古斯都与狮心理查参加十字军东征。
*1190 年	开始建造布尔日大教堂。
1191 年	佛兰德尔伯爵菲利普·德·阿尔萨斯去世；路易太子在弗拉芒韦芒杜瓦征战。
1193 年	菲利普·奥古斯都与丹麦的安热比尔热结婚，随后将其抛弃。
1194 年	弗雷特瓦尔战役；巴黎小学教师最初的特权；夏尔特尔大教堂发生火灾并开始重建。
1196 年	菲利普·奥古斯都与阿涅斯·德·梅朗结婚。
1197 年	狮心理查组成反对菲利普·奥古斯都的同盟。
1198 年	教皇英诺森三世即位；吉索尔溃败。
1199 年	维尔农休战。
	无地让继承狮心理查；其法国领地内发生叛乱。
1200 年	与无地让签订古莱和约；英诺森三世在菲利普·奥古斯都与阿涅斯·德·梅朗之后禁止法兰西王国开展宗教活动；与佛兰德尔的博杜安十世签订佩罗内条约；菲利普·奥古斯都赞成巴黎的教师与大学生拥有特权。
[1200—1250 年]	撰写《奥加森与尼科莱特》。
1201—1214 年	重建鲁昂大教堂的祭坛。
1201—1253 年	香槟的蒂波四世成为行吟诗作者。
1202 年	菲利普·奥古斯都的法庭判决没收无地让的采邑。

1132

1203—1204 年	皮埃尔·德·卡斯泰尔诺与阿尔诺·阿马尔里克奉命对付阿尔比教徒。
1204 年	阿利埃诺尔去世。
	菲利普·奥古斯都完成对诺曼底与普瓦图的征服。
	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
1204—1209 年	英诺森三世鼓动菲利普二世对付阿尔比教派教徒未遂。
1205 年	菲利普二世征服都兰与安茹。
1205—1235 年	重建夏尔特尔教堂的正门。
1206 年	圣多米尼克在阿尔比教派的教徒中布道。
1206 年（之后）	罗贝尔·德·克拉里:《征服君士坦丁堡》。
1207 年	图卢兹的雷蒙六世被开除教籍。
1208(或 1209)年	巴黎教师与大学生协会建立。
1208 年	教皇特使皮埃尔·德·卡斯泰尔诺遇刺；英诺森三世鼓吹对阿尔比教派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
1209 年	贝济耶遭到洗劫；西蒙·德·孟福尔占有了图卢兹伯爵的土地。
1210—1240 年	创作巴黎圣母院正门的雕塑。
1210 年（之后）	开始建造兰斯大教堂。
1211—1213 年	封建主组成反对国王的同盟。
1212 年	“童子军”进行十字军东征；第二次对阿尔比教派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
	英诺森三世对起来反抗主教的巴黎教师予以保护，并承认他们组成的协会。
*1212 年	维尔阿杜安的《征服君士坦丁堡》。
1213 年	9 月，缪雷战役；菲利普二世与伊桑布尔重归于好；菲利普二世准备远征英国。
1214 年	圣路易出生；无地让在皇帝奥托·德·布伦

	瑞克的援助下登陆。
	7 月，法国方面取得罗什－奥－莫瓦内胜利与布汶大捷。
	里戈尔：《菲利普·奥古斯都的功绩》。
*1214 年	布列塔尼人纪尧姆：《菲利皮德》；在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巴黎大学的地位得到确定。
1215 年	西蒙·德·孟福尔成为图卢兹伯爵；英国人向太子路易赠献王位。
1215—1217 年	太子路易在英国失利；无地让去世；英国方面的反抗：亨利三世即位。
1216 年	教皇霍诺里乌斯三世鼓吹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17 年	未来的雷蒙七世夺回图卢兹。
1218 年	西蒙·德·孟福尔去世。
1219 年	布列塔尼人纪尧姆去世。方济各会开始在法国活动。
1220 年	开始建造亚眠大教堂。
1222 年	图卢兹的雷蒙六世去世，雷蒙七世继位。
1223 年	7 月 14 日，菲利普·奥古斯都去世，路易八世继位。菲利普·于尔佩尔的采地。路易八世与英国的亨利三世决裂。
1224 年	路易八世征服普瓦图与森通热；阿莫里·德·孟福尔将其在朗格多克的权利让与路易八世。
1225 年（之前）	散文体《朗塞罗》成文。
1225—1240 年	建造古希城堡。
1226 年	路易八世在朗格多克；占领拉罗歇尔与阿维尼翁。
	征服图卢森；设立博凯尔与卡尔卡松两个司

	法总管辖区；分封亲王们的采地：罗贝尔在阿图瓦，查理在安茹和曼恩，阿尔丰斯在普瓦图。
	11月8日，路易八世去世，路易九世即位；布朗什·德·卡斯蒂尔摄政；封建主组成同盟。
1227年	教皇格利高里九世即位。
1228年	纪尧姆·德·奥弗涅担任巴黎主教。
1229年	建立图卢兹大学；在朗格多克设立宗教裁判所。
	4月，与雷蒙七世签订巴黎条约。
1230年（之前）	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1230—1252年	建造第戎圣母院。
1231年	教皇发布有利于巴黎大学的谕旨。
[1231—1236年]	纪尧姆·德·奥弗涅：《论宇宙》。
1234年	路易九世与玛格丽特·德·普罗旺斯成婚；蒂博·德·香槟成为纳瓦尔国王。
1235年	蒂博四世、布列塔尼公爵、拉马尔什伯爵结成同盟。
	创作亚眠大教堂正面的雕塑。
*1236年	纪尧姆·德·洛里斯撰写《玫瑰传奇》的第一部分。
1242年	亨利三世在鲁瓦扬登陆；法国国王在塔耶布尔和桑特获胜。
1243年	《市民法院裁判书》。
1245年	里昂宗教会议。
1245—1248年	大阿尔伯特在巴黎执教。
	建造巴黎圣教堂。
1246年	查理·德·安茹与贝阿特里斯·德·普罗旺

1133

	斯成婚；巴黎大学取得盖章权。
1248 年	圣路易参加十字军东征；布朗什·德·卡斯蒂尔摄政。
1248—1256 年	圣波那文图拉在巴黎执教。
1249 年	圣路易占领达米埃特。
1250—1254 年	圣路易在巴勒斯坦。
1250?—1310 年	阿尔诺·德·维尔纳夫在世。
1252 年	布朗什·德·卡斯蒂尔去世；巴黎大学在俗的教师开始与托钵修会进行斗争。
1252—1259 年	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执教。
1254 年	圣路易参加十字军东征后回国。
1255 年	亚历山大四世取消巴黎大学所有针对托钵修会的措施。
1256 年	佩罗内的“格言”；亚历山大四世在巴黎强迫教师作出选择并清除反对者。
1257 年	巴黎大学屈服于教皇。
1258 年	与雅克·德·阿拉贡签订科尔贝伊条约。
1258—1274 年	罗贝尔·德·索邦组织他在巴黎建立的社团。
1259 年	《习惯法》。
	与已向法国国王作过臣从宣誓的亨利三世签订巴黎条约；路易九世将森通热、阿热内，以及利穆赞、凯尔西与佩里戈尔的部分领土归还给亨利三世。
1259—1260 年	圣托马斯：《反异教大全》。
*1260 年	创作巴黎圣母院圣母像正门上的雕塑。
[1260—1270 年]	吕特贝夫：《泰奥菲尔的奇迹》。
1261 年	圣托马斯开始对亚里士多德进行评论。
1262 年	路易九世的货币改革：金“埃居”与银“格罗”。

1262—1266 年	建造特鲁瓦圣于尔班教堂。
约 1266 年	邓斯·司各特出生。
1267 年	布吕纳托·拉蒂尼和弗洛朗坦用法语撰写《宝典》。 建筑师皮埃尔·德·蒙特勒伊去世；圣托马斯开始撰写《神学大全》。
1268 年	埃蒂安·布瓦洛：《巴黎职业手册》；克莱芒四世去世；教皇皇位空位期。
1269—1272 年	圣托马斯·阿奎那第二次在巴黎执教。
1270 年	8 月 25 日，路易九世在突尼斯去世，大胆菲利普三世继位；蒂波五世·德·香槟去世。
[1270—1280 年]	《韦尔吉的城堡主夫人》。
1270 年（之后）	创作布尔日大教堂的“最后的审判”。
1271 年	大胆菲利普三世继承图卢兹伯爵领。
1271—1284 年	卡佩王朝在维瓦莱进行兼并。
1272 年	《圣路易的部署》；开始建造纳尔榜大教堂与图卢兹圣埃蒂安大教堂的祭坛。
1273 年	菲利普三世成为帝位继承人的候选人；开始建造里摩日大教堂。
1274 年	首次用法语编撰《圣德尼大编年史》；罗贝尔·德·索邦与圣托马斯·阿奎那去世；里昂宗教会议：结束教会东西对立状态；教皇获得维内森伯爵领地；卡佩王朝在里昂内进行兼并；香槟的亨利三世去世。
1275 年	纪尧姆·迪朗：《司法之鉴》。
*1276 年	让·德·默恩撰写《玫瑰传奇》第二部；亚当·德·拉阿勒：《树丛中的游戏》。
1277 年	巴黎主教埃蒂安·唐普利埃谴责托马斯主义和阿威罗伊主义的论点。

1278 年	多明我会将托马斯主义奉为正统学说。
1279 年	亚眠条约：阿热内重新并入王家领地；森通热划为英国的亨利三世的领地。
*1280 年	雅克·德·勒维尼在图卢兹执教；纪尧姆·德·奥克汉姆出生。
1282 年	开始建造阿尔比的圣塞西尔教堂；亚当·德·拉阿勒：《罗邦与马里翁的游戏》。
1283 年	菲利普·德·博马诺瓦：《博韦西的习俗》；教皇马丁四世将阿拉贡的王位献给菲利普三世；查理太子获得瓦卢瓦伯爵领；巴黎宗教会议。
1284 年	博韦大教堂的祭坛倒塌；菲利普四世与让娜·德·纳瓦尔成婚。
1285 年	吕特贝夫：《桑克特教堂悲歌》；讨伐阿拉贡失利；菲利普三世在佩皮尼昂去世，美男子菲利普四世继位。
1287 年（之前）	《库西的城堡主》。
1289 年	蒙彼利埃大学的章程。
1291 年	纪尧姆·德·诺加雷在蒙彼利埃教授法学。
*1291 年	创作亚眠的涂金圣母像。
1294 年	菲利普四世获得基耶内；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即位。
1294—1295 年	美男子菲利普四世首次对货币价值予以变动。
1294—1297 年	对英国国王三次发动征讨；部分征服基耶内。
1295 年	《列那狐加冕》；皮埃尔·弗洛特与诺加雷担任国王法律顾问。
1297 年	佛兰德尔商人在法国被捕。
1301 年	帕米埃主教贝尔纳·塞赛被宣判。
1302 年	召开三级会议商议教皇的要求；法国人在布

	鲁日被屠杀；库尔特莱遭到失败。
1303年	基耶内被归还给爱德华一世；菲利普四世派诺加雷在阿纳尼城逮捕教皇。
1303年	纪尧姆·德·南日去世。
*1303年	《巴黎贵妇的回旋》。
1304年	蒙桑佩维尔战役；兼并里尔、杜埃与贝蒂纳。
1304—1308年	邓斯·司各特在巴黎从教。
1305年	教皇克莱芒五世当选并定居阿维尼翁；与佛兰德尔签订条约；皮埃尔·杜布瓦：《论圣地的收复》。让·德·默恩去世。
1307年	圣殿骑士团成员在法国遭到逮捕，美男子菲利普要求克莱芒五世判处卜尼法斯八世。
1308年	图尔议事大会；爱德华二世与伊莎贝尔·德·法兰西结婚；邓斯·司各特去世。
1308—1332年	建造内韦尔大教堂的祭坛。
1309年	茹安维尔：《圣路易传》。
1310年	5月12日，对54名圣殿骑士团成员施以酷刑。
1312年	取缔圣殿骑士团的谕旨。
1313年	诺加雷去世；出现金融危机与货币价值的变化；马西利乌斯·德·帕多瓦担任巴黎大学校长。
1314年	11月29日，在巴黎的宫廷中发生丑闻；美男子菲利普去世，顽夫路易十世继位。
1316年	6月5日，路易十世去世；让一世（遗腹子）与菲利普五世（长人）先后即位；约翰二十二世教皇即位。
1316—1391年	在阿维尼翁建造教皇的皇宫。
1317年	让·皮塞勒：《贝尔维尔的日课经》。3月，

	茹安维尔去世；分别在巴黎与布尔日召开三级会议。
1318 年	开始建设鲁昂的圣乌昂教堂。
1320—1322 年	卡尔卡松的纯洁派归降。
1322 年	1 月 3 日，菲利普五世去世，其兄弟继位，是为查理四世。
1323 年	让·德·让登：《论巴黎的功绩》。
1325 年	巴黎大学撤除了其对托马斯主义的谴责。
1327 年	让·比里当就任巴黎大学校长。
1328 年	2 月 1 日，路易·德·巴伐利亚废黜了约翰二十二世教皇，另立尼古拉五世为教皇；查理四世去世，卡佩家族绝嗣；英王爱德华三世因其母亲为已故法王的妹妹，遂要求继承法国王位。
1330 年	《假列那狐》。
1331 年	英王爱德华八世表示终身效忠其在法国的领地。
1332 年	约翰二十二世与巴黎大学之间就神学问题展开争论。
1333 年	菲利普六世不赞同约翰二十二世的神学。
	让亲王封为诺曼底公爵；法国支持拥护戴维·布鲁斯的苏格兰人。
1333—1336 年	菲利普六世准备十字军东征。
1334 年	教皇本笃十二世继约翰二十二世即位。
1337 年	巴黎大学谴责奥卡姆学说。
	彼得拉克在沃克吕兹。
	5 月 24 日，菲利普六世宣布查封基耶内；昂热大学建立。
1337—1410 年	让·弗洛瓦萨尔在世。

1135

1338 年	佛兰德尔反叛；雅克·范·阿特维尔德与爱德华三世联合。
1339 年	格勒诺布尔大学建立；诺曼底人在英国的入侵计划。 9 月，康布雷被爱德华三世围困；爱德华三世与路易·德·巴伐利亚结盟；菲利普六世与卡斯蒂尔联手。
1340 年	6 月 24 日，英国与弗拉芒结盟；埃克吕兹战役。
1341 年	路易·德·巴伐利亚转而与法国国王联合；菲利普六世在布列塔尼支持夏尔·德·布洛瓦反对孟福尔。
1342 年	马迪厄·德·阿拉斯着手建造布拉格大教堂；教皇克莱芒六世即位。
1343 年	热奥弗瓦·德·阿尔库尔在爱德华三世的宫廷中。
1343—1347 年	阿维尼翁，“鹿宫”城堡内大量的巨幅壁画。
1345 年	德比进行从巴约讷到昂古莱姆的袭击；阿特维尔德去世。
1346 年	8 月 26 日，克雷西战役；国王让·德·波希米亚去世；加莱城被围；德比在法国西部作战。戴维·布鲁斯在英国战败并被俘。
1347 年	8 月 3 日，夏尔·德·布洛瓦在拉罗什－德里安战败；加莱投降。
1347—1351 年	法英之间休战。
1348 年	让娜·德·那不勒斯将阿维尼翁卖给克莱芒六世。黑死病流行。
1348—1349 年	菲利普六世购买蒙彼利埃与多菲内。
1349—1387 年	坏人查理成为纳瓦尔国王。

1351 年	3 月 25 日，法英两国骑士在布列塔尼的普罗埃梅尔交手。 4 月，法英两国在 1347 年 9 月 28 日签订的休战协定到期。
1352—1363 年	纪尧姆·德·博尔德在多菲内的沃多派教徒中讲道。
1354 年	1 月 8 日，查理·德·西班牙遇刺。
1355 年	9 月，法英两国签订瓦罗涅条约。 11 月，黑太子侵袭朗格多克。
1356 年	春天，在图卢兹召开朗格多克三级会议。 4 月 5 日，好人让在鲁昂监禁了坏人查理。 7 月，黑太子入侵普瓦图。 9 月 19 日，普瓦提埃战役，好人让被俘。
1356—1357 年	冬天，巴黎商会会长艾田·马塞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劣币"。
1357 年	普罗旺斯的沃多派教徒杀死了两名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太子查理统治法国。 3 月，《三月大敕令》。 3 月 22 日，法英波尔多休战协定。
1358 年	1 月，艾田·马塞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太子，并与参加"扎克雷起义"的农民联手。 6 月 10 日，坏人查理击溃农民军。 艾田·马塞向英国人打开城门。 7 月，巴黎人民赶走了英国人，并且推翻了艾田·马塞的统治。
1359 年	太子与坏人查理签订和约；太子拒绝接受伦敦预备性条约。
1360 年	英诺森六世改革多明我会；爱德华三世在法国的侵袭受挫。

	5月1－9日，布雷蒂尼谈判与布雷蒂尼条约。
	10月24日，加莱和约。
1361年	好人让成为勃艮第公爵领的继承人。
1362年	4月6日，“迟到者”们在里昂南部击溃了国王与弗雷兹伯爵的部队。
1363年	加莱的羊毛“市场”设立；大胆菲利普成为勃艮第公爵。
1363—1365年	宗教裁判所法官弗朗索瓦·博雷尔追捕阿尔卑斯山区的沃多派教徒。
1363—1431年?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在世。
1364年	4月8日，好人让死于伦敦，查理五世即位。
	5月16日，迪盖克兰在戈什雷尔打败坏人查理。
	9月22日，布列塔尼继承战结束：奥雷战役。
1367年	乌尔班五世离开阿维尼翁前往罗马。
	弗洛瓦萨尔：《多情的斯频耐琴》。
1368年	冬天，法英两国重新开战。
1369年	佛兰德尔的女继承人与勃艮第公爵大胆菲利普成婚。
1370年	迪盖克兰成为法军统帅。
	重新征服利穆赞。
	乌尔班五世重返阿维尼翁。
1371年	迪盖克兰在香槟击败罗伯特·诺里斯。
1371—1372年	查理五世收复普瓦图、奥尼斯与森通热。
1372年	英军占领布列塔尼。
1373年	弗洛瓦萨尔：《编年史》第一卷问世；火焰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在建造亚眠大教堂时首次采用。
1374年	在图卢兹对纯洁派进行最后的迫害。

1136

1375 年	教皇设法安排了法英之间的布鲁日休战。
1377 年	英王爱德华三世驾崩，理查二世继位。
1378 年	查理五世夺取了坏人查理在诺曼底的领地。
	乌尔班六世与克莱芒七世分别被选为教皇，西方开始大分裂。
1379 年	在罗马遭受失败的克莱芒七世定居阿维尼翁。
1380 年	迪盖克兰去世；查理五世驾崩。
	11 月 4 日，查理六世的加冕礼。
1381 年	巴黎大学要求为解决西方的分裂召集一次公会议。
1382 年	安茹公爵试图依次接收让娜·德·那不勒斯在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的遗产。
	法国出现多起骚乱：巴黎有“铅锤党”人制造的骚乱，鲁昂有埃雷尔骚乱，朗格多克则有穷苦人的暴动。
1384 年	大胆菲利普成为佛兰德尔伯爵。
1385 年	查理六世与伊莎博·德·巴伐利亚成婚。
1387—1392 年?	弗洛瓦萨尔：《编年史》第二卷与第三卷问世。
1388 年	大胆菲利普对盖尔德尔公爵开战。
1389 年	皮埃尔·德·阿伊担任巴黎大学校长。
1391 年	热尔松要求查理六世终止大分裂。
1392 年	查理六世疯癫，其叔叔重新掌权。
1394 年	巴黎大学再次要求终止大分裂。
1396 年	热尔松担任巴黎大学校长。
	勃艮第公爵与奥尔良公爵之间开始发生冲突。
1404 年	大胆菲利普去世，无畏者让继位。
1407 年	11 月 23 日，无畏者让派人刺杀路易·德·奥尔良。

1408—1416 年	林堡兄弟：《贝里公爵极为富裕的时光》。
1412 年	圣女贞德出生；阿尔马尼亚克人与英国人谈判。
1413 年	在巴黎召开三级会议；卡博什分子骚乱。
1414 年	英国新国王亨利五世要求继承金雀花朝在法国的遗产。
1415 年	阿尔马尼亚克人与勃艮第派签订阿拉斯和约。
	10 月 25 日，阿赞库尔战役。
1418 年	巴黎人向无畏者让打开城门。
	12 月，太子查理，即查理六世之子宣称自己为摄政者。
1419 年	亨利五世控制诺曼底；无畏者让遭暗杀。
	好人菲利普成为勃艮第公爵。
1420 年	5 月 21 日，好人菲利普与亨利五世签订特鲁瓦和约。
1422 年	8 月 31 日，亨利五世死于万森讷城堡。
	10 月 21 日，查理六世驾崩。
1428 年	英军着手围困奥尔良。
1429 年	2 月 23 日，圣女贞德在希农遇到太子查理。
	4 月 29 日—5 月 8 日，圣女贞德解奥尔良之围。
	7 月 17 日，查理七世在兰斯加冕。
1430 年	5 月 23 日，圣女贞德在贡比涅被俘。
1430—1470 年？	弗朗索瓦·维永在世。
1431 年	5 月 30 日，圣女贞德在鲁昂惨遭火刑处死。
1431 年	12 月 16 日，英国的摄政给亨利五世之子亨利六世加冕为法国国王。
1435 年	查理七世与好人菲利普签订阿拉斯和约。
1436 年	查理七世占领巴黎。

1137

1437 年	蒙特罗之围。
1437—1451 年	开始在鲁昂建造圣马克卢大教堂。
1438 年	布尔日国事诏书。
1439—1440 年	法英之间的和谈破裂。
1440 年	雅克·科尔:“国王的总管家”。
1442 年	夏尔·奥尔良在勃艮第公爵菲利普的帮助下反叛;雅克·科尔成为枢密院成员。
1443 年	图卢兹法院建立。
1444 年	查理七世与英国人之间休战。
	亨利六世与玛格丽特·德·安茹成婚。
1445 年	查理七世建立国王敕令会。
1447 年	太子路易隐居多菲内。
1447 年?—1511 年	菲利普·德·科明在世。
1449 年	3 月 24 日,法英在福热雷重新开战。
1450 年	4 月 15 日,福尔米尼战役;查理七世夺回诺曼底。
1450—1454 年	建造圣米歇尔山祭坛。
1451 年	逮捕雅克·科尔。
1452 年(以前)	阿尔努·格雷邦:《激情》。
1452 年	埃图特维尔枢机主教对巴黎大学进行改革。
1453 年	7 月 17 日,卡斯蒂庸战役。
1454 年	蒙蒂尔-莱-图尔大司法敕令。
1456 年	太子路易在勃艮第避难。
1461 年	查理七世驾崩,路易十一继位。
1462 年	路易十一从让二世·德·阿拉贡手中得到鲁西永与塞尔达纳,并与玛格丽特·德·安茹联手。
1463—1472 年	普雷西-雷图尔城堡扩建。
1465 年	7 月 16 日,路易十一与公益同盟军队之间在

	蒙莱里发生未分胜负的战事；孔弗朗条约与圣莫尔条约。
1467—1540 年	纪尧姆·比代在世。
1468 年	10 月 9—14 日，路易十一与莽夫查理在佩罗内举行会晤。
1470 年	11 月，图尔大会；路易十一重新占据索姆河流域的城市；索邦大学拥有了一家印刷厂。
1472 年	路易十一占据庇卡底；博韦被莽夫查理围困：让娜·阿歇特。
	路易十一与西克科特四世达成和解协议，后者保留向国王推荐重要的有俸圣职人选的权利。
1473 年	皇帝腓特烈三世与莽夫查理在特里尔举行会晤。
1474 年	围困讷斯失败；勃艮第派的力量有所削弱。
1475 年	9 月 13 日，勃艮第公爵与路易十一之间休战；收复鲁西永。
1477 年	1 月 5 日，莽夫查理在南锡战役中阵亡。
	8 月 18 日，勃艮第公爵之女玛丽嫁给马克西米利安·德·哈布斯堡。
1479 年	8 月 7 日，基纳加特战役。
1480 年	国王勒内·德·安茹去世。
1481 年	路易十一制服了弗朗什－孔泰，获得了普罗旺斯与曼恩。
1482 年	12 月 23 日，阿拉斯谈判：马克西米利安·德·哈布斯堡放弃勃艮第与庇卡底。
1483 年	8 月 30 日，路易十一去世。
	《十日谈》首次在法国印刷。
1484 年	博若将巴卢瓦出让给勒内·德·洛林。

	安茹并入王家领地。
	图尔三级会议。
1488年	圣奥班迪科尔米耶战役："疯狂的战争"结束。
1489—1490年	科明撰写其《回忆录》的前六卷。
1490年	安娜·德·布列塔尼与马克西米利安·德·奥地利成婚。
1491年	法国人占领布列塔尼；安娜·德·布列塔尼与马克西米利安·德·奥地利的婚姻废除。
1492年	5月，查理八世与"摩尔人"吕多维克·斯福尔扎结盟。
1493年	查理八世与马克西米利安签订桑利斯条约；巴塞罗那条约：查理八世将鲁西永归还给费迪南德·德·阿拉贡；图尔特别法庭；法国入修会的教士恢复旧教规。
1494年?—1553年	弗朗索瓦·拉伯雷在世。
1494年9月	查理八世自1406年解放以来隶属于佛罗伦萨的比萨。
1495年	2月22日，查理八世身披饰有帝国标志以及法国、那不勒斯、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四重王冠图案的披风，进入那不勒斯。
	3月，"威尼斯同盟"组成。
	7月5日，福尔努战役。
1496年	2月，法国人在拿不勒斯被打败。
1496—1544年	克莱芒·马罗在世。
1498年	4月8日，查理八世驾崩，路易十二即位。
1499年	路易十二与威尼斯、佛罗伦萨结盟；路易十二与安娜·德·布列塔尼成婚。
	3月16日，与瑞士人签订卢塞恩条约。

1138

1500 年	11 月 11 日，法国与阿拉贡签订格拉纳达条约。
1503 年	法国与阿拉贡决裂。
1504 年	法国人失去拿不勒斯。
	9 月，路易十二与皇帝签订布卢瓦条约。
1506 年	图尔三级会议：克洛德·德·法兰西与弗朗索瓦·德·昂古莱姆定婚。
1507 ?—1573 年	米歇尔·德·罗斯皮达尔在世。
1508 年	12 月 10 日，康布雷同盟组成。
1509 年	勒费弗尔·德·埃塔普莱：《五十圣诗……》
1511 年	10 月 5 日，教皇朱利亚二世组织了一个反对路易十二的神圣同盟。
1512 年	4 月 11 日，拉文纳战役；加斯东·德·富瓦阵亡。
	马克西米利安抛弃路易十二。
	法国人失去意大利。
	勒费弗尔·德·埃塔普莱编辑《圣保罗书简集》。
1513 年	路易十二与威尼斯谈判，并与斐迪南签订休战协议。
1513—1593 年	雅克·阿米奥在世。
1514 年	纪尧姆·比代：《古代货币考》。
	路易十二同意出口免除关税。
1515 年	路易十二去世。
	设立诺曼底法院。
	9 月 13 日，马里尼昂战役。
	弗朗索瓦一世邀请达·芬奇。
	12 月 14 日，列奥十世与弗朗索瓦一世媾和。
1515—1524 年	弗朗索瓦一世修建其在布卢瓦的宫堡。

1515?—1568 年以前	让·古荣在世。
1516 年	法国与瑞士诸州签订“永久性和约”。
	8 月 13 日，努瓦永条约；教务专约。
1517 年	在巴黎重建圣－艾蒂安－迪蒙。
	3 月 11 日，康布雷条约。
1519 年	弗朗索瓦一世成为继承帝位者的候选人。
1520 年	6 月 7 日，“金毯营地”会晤。
1521 年	拜亚尔在梅齐埃尔成功地抵挡住了帝国军队的进攻。
1522 年	在拉比科克被打败的法军遭米兰人驱赶。
1522—1560 年	若阿香·杜贝莱在世。
1523 年	弗朗索瓦一世设立中央财务局。
1524 年	拜亚尔在皮埃蒙特去世；已成为查理五世的代理长官的波旁公爵入侵普罗旺斯。
1524—1585 年	皮埃尔·德·龙萨在世。
1525 年	2 月 24 日，帕维亚战役：弗朗索瓦一世被俘。
1527 年	波旁家族的领地被拆分。
1529 年	里昂大骚乱。
	8 月 5 日康布雷和约；伊拉斯谟的友人贝尔干被处决。
1530 年	开辟巴黎至勃艮第的邮路。
	弗朗索瓦一世创办法兰西学院。
[1530—1540 年]	重建圣日耳曼－昂－莱城堡。
1531 年	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罪孽灵魂的镜子》。
1532 年	拉伯雷：《巨人传》第一部。
1533 年	弗朗索瓦一世流放索邦大学的学者；法兰西国王与教皇在马赛会晤。
1533—1592 年	米歇尔·德·蒙田在世。

1534—1543 年	雅克·卡蒂埃出征。
1534 年	索邦大学在法院对王家读者提起诉讼。
	拉伯雷：《巨人传》第二部。
	揭帖事件。
1535 年	弗朗索瓦一世为其儿子要求得到米兰内。
1536 年	普罗旺斯被皇帝的军队占领。
1538 年	开辟里昂至都灵的邮路。
	7 月 14 日，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在埃格-莫特举行会晤。
	重新对法国的宗教改革活动进行迫害；蒙莫朗西成为法军统帅。
1539 年	8 月，维耶-科特莱敕令。
1541 年	蒙莫朗西失宠；马罗翻译圣诗。
	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被译成法文。
1541—1544 年	古荣与莱斯科：建造巴黎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祭廊。
1542—1560 年	法军远征苏格兰。
1544 年	弗朗索瓦一世解放其勃艮第领地中的农奴(1545 年撤销此敕令)。
	4 月 13 日，塞利索尔战役。
	9 月 16 日，与查理五世签订克雷皮条约。
1545 年	在阿维尼翁发生屠杀沃多派教徒事件。
1546 年	开始重建卢浮宫；拉伯雷《巨人传》第三部出版。
1547 年	弗朗索瓦一世去世；玛格丽特·德·纳瓦尔：《公主菊园中的菊花》。
1548—1549 年	莱斯科与古荣："无辜者"喷泉。
1549 年	杜贝莱：《捍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
1550 年	法英和约：勃艮第归属法国；龙萨：《颂歌

1139

	集》。
1551 年	亨利二世在意大利重新对教皇开战，并正式拒绝承认特伦托教务会议。
1552 年	弗朗索瓦一世落葬于圣德尼。
1552—1553 年	龙萨：《给卡桑德拉的情歌》。
1555 年	亨利二世与教皇结盟。
1557 年	8 月 10 日，圣康坦战役。
1558 年	玛丽·斯图亚特与法王太子成婚。
1559 年	4 月 3 日，卡托－康布雷齐条约。
	7 月 10 日，亨利二世去世。
	12 月 23 日，安娜·德·布尔被处决；埃库昂敕令。
1560 年	3 月，昂布瓦兹密谋。
	5 月，罗莫朗坦敕令。
	7 月 2 日，米歇尔·德·罗斯皮达尔担任掌玺大臣。
	8 月 21 日，枫丹白露大会。
	12 月 5 日，弗朗索瓦二世去世，查理九世即位。
1561 年	奥尔良三级会议；在普瓦提埃召开关于宗教改革的主教会议。
	普瓦西教士大会；蓬图瓦兹三级会议。
	9 月，普瓦西讨论会。
1562 年	龙萨：《论这个时代的悲惨》。
	1 月，圣日耳曼敕令。
	2 月，巴黎最高法院拒绝登记圣日耳曼敕令。
	3 月 1 日，瓦西屠杀；新教徒反叛。
	12 月 19 日，鲁昂之围；德勒战役。
1563 年	2 月 24 日，弗朗索瓦·德·吉斯遇刺。

	3月19日，昂布瓦兹和约。
1564年	拉伯雷的第五本书出版。
1564—1566年	查理九世巡游全法。
1566年	穆兰斯敕令。
1567年	新教徒重新拿起武器。
1568年	3月23日，隆朱莫和约；米歇尔·德·罗斯皮达尔失宠。
1569年	3月13日，雅尔纳克战斗。
	10月3日，蒙孔图尔战斗。
	路易·德·孔代遇刺；第三次"宗教战争"。
1570年	8月8日，圣日耳曼和约。
1571年	巴黎和里昂的印刷工人举行罢工。
1572年	龙萨:《法兰西亚德》。
	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屠杀；亨利·德·纳瓦尔发誓弃绝；第四次"宗教战争"。
1573年	卡特琳娜·德·美第奇与新教徒媾和。
1573—1613年	马蒂兰·雷尼埃在世。
1574年	查理九世去世。
	5月30日，亨利三世即位；宗教战争重新爆发。
	龙萨:《给埃莱娜的十四行诗》。
1576—81?—1660年	圣樊尚·德·保罗在世。
1576年	让·博丹:《共和六书》；神圣同盟组成；第六次和第七次宗教战争。
1580年	蒙田:《随笔集》(第一版)。
1584年	6月10日，安茹公爵去世。
1585年	3月30日，佩罗内宣言。
	9月9日，亨利·德·纳瓦尔由西克斯特五世加冕所拥有的权利被废除；最后一次宗教

	战争。
1588年	5月12日，“街垒日”；布卢瓦三级会议。
	12月23—24日，吉斯公爵与洛林红衣主教遇刺。
1589年	1月，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去世；亨利·德·纳瓦尔与亨利三世和解；马延成为同盟的首领。
	西斯科特五世给亨利三世的罪行检举命令书。
	8月2日，亨利三世去世，亨利四世即位；同盟推举波旁红衣主教为国王：查理十世；亨利四世占领迪埃普。
	9月20—21日，阿尔克战役。
1590年	3月14日，伊夫里战役。
1591年	9月，教皇征集了一支对付亨利四世的军队；同盟让恐怖情绪在巴黎盛行：处决布里松。
1593年	5月17日，亨利四世在夏尔特尔加冕。
	3月22日，布里萨克总督为亨利四世打开巴黎城门；巴黎最高法院驱逐耶稣会士出境。
1594—1665年	尼古拉·普桑在世。
1595年	6月，亨利四世在法兰西泉解救了遭受西班牙人入侵的勃艮第。
	9月，教皇与亨利四世媾和；富恩特斯占领康布雷。
1596—1650年	勒内·笛卡尔在世。
1597年	9月25日，亨利四世重新夺取亚眠。
1598年	4月13日，发布南特敕令。
	5月2日，与西班牙人签订维尔万和约。
1598—1666年	弗朗索瓦·芒萨尔在世。
1600年	亨利四世与玛丽·德·美第奇成婚；奥利

	弗·德·塞雷:《农业舞台》。
	9月18日，巴黎大学进行改革。
1600—1682年	“洛林人”克洛德·热雷在世。
1601年	里昂条约。
1602年	7月29日，处决比隆元帅。
1602—1674年	菲利普·德·尚佩涅在世。
1603年	亨利四世让耶稣会士重新进入法国。
1605—1606年	布永公爵叛乱。
1606—1684年	皮埃尔·高乃依在世。
1607年	开始在巴黎建造多菲内广场。
1608年	圣弗朗索瓦·德·萨勒:《笃信宗教的生活导论》。
1609年	4月，联（合）省与西班牙之间休战：亨利四世担任其仲裁人。
1610年	5月14日，亨利四世被拉瓦亚克刺杀。
	路易十三继位。
1610—1660年	斯卡隆在世。
1611年	主张改革的教会在索米尔召开大会。
1613—1680年	拉罗什富科在世。
1613—1700年	勒诺特尔在世。
1614年	5月15日，孔代叛乱：圣默纳乌尔德条约。
	10月27日，三级会议在巴黎举行。
1615年	孔代再次叛乱；建造卢森堡宫。
1616年	5月，孔代被任命为王政会议负责人。
1617年	4月24日，孔齐尼遇刺；黎塞留被免职。
	吕伊内得宠。
1619—1655年	西哈诺·德·贝热拉克在世。
	勒布朗在世。
1620年	8月，再次发生贵族造反；贝阿尔内归属

	法国。
1622—1673 年	莫里哀在世。
1623—1662 年	帕斯卡尔在世。
1623 年	法国、萨伏依和威尼斯结盟。
	2 月 7 日，巴黎条约。
1624 年	4 月，王太后让黎塞留进入国王议政会。
	8 月 13 日，逮捕黎塞留的对手拉维耶维尔：黎塞留执掌国王议政会。
1624—1629 年	建造苏利公馆。
1625 年	处决特奥费尔·德·维奥的模拟像。
1625—1712 年	让·卡西尼在世。
1626 年	2 月 5 日，拉罗歇尔和约。
	8 月，夏莱侯爵策划阴谋并因此被处决。
1626—1696 年	塞维涅侯爵在世。
1627 年	6 月 22 日，蒙莫朗西－布特维尔与德夏佩尔被处决。
	10 月，黎塞留围困拉罗歇尔。
1627—1704 年	博絮埃在世。
1628 年	11 月 1 日，国王进入拉罗歇尔。
1629 年	6 月 28 日，阿勒斯“恩典”敕令。
1630 年	3 月 31 日，黎塞留占领皮涅罗尔。
	7 月 20 日，路易十三征服萨伏依；占领萨吕塞。
	11 月 10 日，米歇尔·德·马里亚克被革职。
1631 年	泰奥弗拉斯特·勒诺多创办报纸。
	3 月 8 日，黎塞留与巴伐利亚签订防卫性盟约。
1632 年	9 月，贝济耶敕令。
	10 月 20 日，加斯东·德·奥尔良失败；蒙莫

1141

	朗西谋反并被处决。
1632—1687 年	吕利在世。
1633 年	基耶内发生骚乱；卡罗：《战争的苦难》
1634 年	圣文森特保罗与路易丝·德·马里亚克创办爱德修女会。
1635 年	2 月 10 日，法兰西学士院成立。
	勒梅尔西埃建造索邦教堂。
	5 月 19 日，法兰西国王向西班牙国王宣战。
1636 年	高乃依：《熙德》。
	8 月 15 日，科尔比投降；“乡巴佬”在昂古姆瓦、森通热、利穆赞和普瓦图起义。
1636—1711 年	布瓦洛在世。
1637 年	笛卡尔：《方法论》。
	围绕《熙德》展开的争论；乡间王港修道院隐遁者会开始活动。
1638 年	圣文森特保罗创办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
1639 年	路易十三的军队占领埃斯丹。
1639—1699 年	让·拉辛在世。
1640 年	8 月 9 日，攻占阿拉斯；在法国普遍重铸钱币。
	耶稣会禁止在其中学教授笛卡尔思想。
	王家印刷厂在巴黎建立。
	高乃依：《贺拉斯》。
1641 年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高乃依：《波利厄克特》。
1642 年	奥里埃建立了圣绪尔比斯修会。
	12 月 4 日，黎塞留去世。
1642—1648 年	弗朗索瓦·芒萨尔：梅松城堡。
1643 年	路易十三去世；安娜·德·奥地利摄政；马

	扎然掌权；法院的首次谏诤；首次抗税骚乱。
	5 月 19 日，罗克鲁瓦战役；莫里哀创办著名的剧院。
1644 年	设立“宽裕者”税的图瓦塞敕令。
	笛卡尔：《哲学原理》。
1645 年	弗朗索瓦 · 芒萨尔开始建造荣军医院；高乃依：《罗多古娜》。
1645—1648 年	勒苏厄尔：《圣布鲁诺传》。
1645—1696 年	拉布吕耶尔在世。
1646 年	罗特鲁：《圣热内》。
1646—1708 年	茹勒 · 阿尔杜安－芒萨尔在世。
1647 年	巴黎的价目表敕令。
	帕斯卡尔：《关于真空的新试验》；沃热拉：《论法兰西的语言》。
1647—1706 年	皮埃尔 · 培尔在世。
1647—1714 年	丹尼 · 帕潘在世。
1648 年	1 月 30 日，海牙条约。5 月 13 日，停止联合。
	5 月 17 日，祖斯马斯豪森战役。
	8 月 20 日，朗斯战役。
	10 月 24 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6 月 15 日，圣路易公会宣言。
	7 月 13 日，废除督办官。
	8 月 26 日，逮捕布卢瑟尔：巴黎发生反叛。
	摄政王太后逃跑。
	王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在巴黎建立。
1649 年	1 月 5 日，宫廷人员逃避至圣日耳曼；巴黎被国王包围。
	3 月 11 日，吕埃和约；蒂雷纳反叛。
	笛卡尔在瑞典。

1650 年	1 月 18 日，逮捕孔代、孔蒂与隆格维尔。
	拉图尔：《圣塞巴斯蒂安的殉教者》。
1651—1657 年	斯卡隆：《滑稽小说》。
1651 年	3 月，特权等级的代表要求召开三级会议。
1651—1715 年	费内隆在世。
1652 年	4 月，被蒂雷纳打败的孔代避难于巴黎。
	10 月 21 日，国王重返巴黎。
1659 年	11 月 7 日，比利牛斯和约。
1661 年	路易十四开始亲政。
	9 月 15 日，设立王家议事会。
1662 年	蒙马特尔条约：洛林归属法国。
	2 月 6 日，柯尔伯偿清了以“五大包税”作担保的公债。
	在整个王国设立综合医院。
	高乃依：《塞尔多里乌斯》；莫里哀：《太太学堂》。
	勒布朗：首次为国王画像；菲利普·德·尚佩涅：《阿涅斯嬷嬷与卡特琳修女》。
1663 年	3 月，国王与莱茵河沿岸国家的君主续订了莱茵同盟盟约。
	7 月，艾克斯法院宣布维内森伯爵领归属国王。
	8 月，占领洛林。
	12 月 19 日，督办官接受管理直接税的任务。
	柯尔伯建立铭文与美文学院。
	莫里哀：《〈太太学堂〉批评》、《凡尔赛宫即兴》。
1665—1686 年	拉封丹：《寓言》。
1665 年	柯尔伯担任财政总监。
	拉罗什富科：《箴言集》。

1142

	莫里哀：《唐璜》。
1666 年	1 月，路易十四在巴黎法院禁止谏诤。
	莫里哀：《愤世嫉俗者》；柯尔伯建立科学院。
1667 年	3 月 31 日，法葡（萄牙）同盟。
	5 月，成立荷兰公司。
1668 年	1 月 19 日，路易十四与利奥波德一世签订秘密条约。
	1 月 22—23 日，海牙三国同盟。
	5 月 2 日，亚琛条约。
	吉拉格：《葡萄牙书简》；拉辛：《讼棍》；莫里哀：《晚宴东道主》、《悭吝人》。
1669 年	2 月 1 日，限制南特敕令之影响的声明。
	3 月 7 日，柯尔伯担任负责海军事务的国务秘书。
	博絮埃：《昂里埃特·德·弗朗斯的悼词》。
1671 年	建筑学院成立。
	讲授笛卡尔主义在巴黎遭禁。
1672 年	6 月 12 日，路易十四与孔代在托鲁伊越过莱茵河。
	卢瓦进入王家议事会。
	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定居。
	莫里哀：《女学究》。
	音乐学院建立。
1673 年	6 月 30 日，路易十四与沃邦攻占马斯特里赫特。
1674 年	帝国议会与法国决裂。
	布瓦洛：《诗艺》。
1675 年	卢瓦以表格的顺序来确定级别与资历的等级。
	1 月，蒂雷纳在图尔凯姆获胜。

1675—1755 年	圣西门在世。
1677 年	拉辛：《费得尔》。
1678 年	4 月 10 日，法国与尼德兰之间签订尼姆维根条约。
	9 月 17 日，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签订尼姆维根条约。
	拉法耶特夫人：《克莱芙公主》。
1679 年	圣日尔曼条约；巴黎大学设立法国法教席。
1680 年	法兰西剧院建立。
1682 年	3 月 19 日，四点声明发表。
1683 年	西班牙向法国宣战。
	柯尔伯去世。
1683—1764 年	让－菲利普·拉莫在世。
1684 年	8 月 15 日，雷根斯堡休战协定。
1684—1721 年	瓦托在世。
1685 年	10 月 18 日，撤销南特敕令。
1686 年	丰特内尔：《论宇宙之多元性》。
1688 年	拉布吕耶尔：《品格论》。
1689—1755 年	孟德斯鸠在世。
1690 年	7 月 1 日，富勒吕斯获胜；非洲公司设立。
	丹尼·帕潘：《关于使用水蒸汽的回忆》。
1691 年	拉辛：《阿达莉》。
1692 年	5 月，在武格遭受失败。
	6 月，占领那慕尔。
1694 年	布瓦洛：讽刺诗《反对女人》。
	6 月，让·巴尔打败荷兰人。
1694—1778 年	伏尔泰在世。
1695 年	路易十四与荷兰进行和谈。
	1 月 18 日，设立人头税。

1143

1697 年	9 月 20 日与 10 月 30 日，里斯维克条约。
	马勒伯朗士：《论上帝的爱》。
1698 年	法英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进行谈判；成立中国公司。
1699 年	1 月，对付新教徒的措施趋于温和。
1699—1779 年	夏尔丹在世。
1700 年	11 月 1 日，查理二世在遗嘱中表示希望由安茹公爵继位。
	12 月 4 日，路易十四恢复西属荷兰统治的原状。
1701 年	8 月 27 日，法国在新大陆垄断了黑奴贩卖活动。
1702—1704 年	卡米扎尔起义。
1703—1770 年	布歇在世。
1704 年	法国占领萨伏依。
1705 年	法国征服尼斯与皮埃蒙特。
1707 年	沃邦失宠；丹尼·帕潘建造了一艘蒸汽船。
1707—1788 年	布丰在世。
1708 年	勒尼亚尔：《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
1709 年	10 月 23 日，路易十四驱赶乡间王港修道院的教徒。
	勒萨日：《蒂尔卡雷》。
	9 月 11 日，维亚尔与布福雷制止了在马尔普拉盖的入侵。
1710 年	4 月 28 日，将乡间王港修道院夷为平地。
	10 月 14 日，路易十四征收什一税。
	12 月 10 日，旺多姆公爵征服维亚维西奥萨。
	费内隆：《关于法国可悲状况的回忆》。
1711 年	4 月 16 日，路易十四之子去世。

	10 月 8 日，伦敦预备性和约。
1712 年	1 月 19 日，乌特勒支会议召开。
	2 月 18 日，勃艮第公爵去世。
	3 月 8 日，布列塔尼公爵去世。
	7 月 17 日，法英停战协定。
	7 月 24 日，德南之役。
	11 月 7 日，法葡停战协定。
	南海公司建立。
1712—1778 年	让－雅克·卢梭在世。
1713 年	4 月 11 日，乌特勒支条约。
	9 月 8 日，乌尼詹尼图斯（唯一天主子）通谕。
1713—1784 年	狄德罗在世。
1714 年	2 月 15 日，路易十四强令法院登记乌尼詹尼图斯（唯一天主子）通谕。
	3 月 6 日，拉斯塔特条约。
1715 年	9 月 1 日，路易十四去世，路易十五继位。
	9 月 12 日，法院废除了路易十四的遗嘱。
	勒萨日：《吉尔·布拉斯》。
1715—1747 年	沃弗纳盖在世。
1716 年	5 月 2 日，约翰·劳创办“总银行”。
	10 月，银行与国家联营。
	设置桥梁与道路机构。
	费内隆：《关于科学院的信》。
1717 年	瓦托：《舟发西苔岛》。
1717—1783 年	达朗贝尔在世。
1718 年	5 月，重铸货币。
	9 月 4 日，约翰·劳购买了烟草专卖权。
	12 月 4 日，约翰·劳所办的银行成为王家银

	行，并取代了塞内加尔公司。
1719 年	1 月 9 日，法国与西班牙交战。
	5 月 26 日，约翰·劳的公司取代了印度公司与中国公司。
	7 月，约翰·劳的公司取代了非洲公司。
	8 月 19 日，占领圣－塞巴斯蒂安。
1720 年	1 月 5 日，对约翰·劳的经营活动展开调查。
	3 月 27 日，法国与西班牙和好。
	首批共济会的支部在法国建立。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
1722 年	伏尔泰：《致于尼娜的书简》。
1723 年	路易十五成年；波旁公爵担任首相。
1724 年	5 月 14 日，反对新教徒宣言。
	7 月 18 日，关于行乞的敕令。
	巴黎证券交易所建立。
1725 年	6 月 5 日，征收五十分之一税。
	8 月 15 日，路易十五与玛丽·列琴斯卡结婚。
1726 年	6 月 12 日，波旁公爵失宠；弗勒里担任首相。
	8 月 19 日，建立总包税制。
1726—1729 年	伏尔泰在英国留居。
1726—1730 年	勒佩勒蒂埃·德·富尔担任财政总监。
1727 年	圣－梅达尔狂热的詹森派教徒事件开始爆发。
1727—1781 年	杜尔哥在世。
1730 年	德芳夫人的沙龙开始声名远扬。
	马里沃：《爱情偶遇游戏》。
1730—1745 年	奥里担任财政总监。
1731 年	解散“阁楼”俱乐部。
	迪普莱克斯担任尚德尔纳戈尔总督。
	伏尔泰：《查理十二世》，修道院院长普雷沃：

1144

	《马农·勒斯科》。
1732 年	1 月 29 日，弗勒里下令关闭圣－梅达尔墓地。
	伏尔泰：《扎伊尔》；马里沃：《不慎重的誓言》。
1732—1799 年	博马舍在世。
1732—1806 年	弗拉戈纳尔在世。
1733 年	11 月 17 日，征收什一税。
1734 年	4 月 1 日，皇帝向法国宣战；法国占领菲利普斯堡。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伏尔泰：《英国通信》（或译《哲学通信》）。
1735 年	10 月 5 日，法国奥地利秘密签订预备性和约。
	马里沃：《暴发的农民》。
1735—1736 年	拉孔达米纳与莫佩尔蒂伊斯测定子午线。
1735—1740 年	勒穆瓦纳：装饰苏比兹饭店。
	拉布尔多纳担任法兰西岛总督。
1735—1741 年	迪马担任法国在印度设立的殖民地商行总管。
1736 年	4 月 13 日，法国与奥地利签订条约。
	8 月 28 日，解决洛林问题。
1737 年	2 月 20 日，肖弗兰失宠。
	设立举办美术“沙龙”的制度。
	马里沃：《虚假的知心话》；拉莫：《卡斯托尔与波吕克斯》。
1737—1814 年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在世。
1738 年	颁布使王家劳役合法化的敕令。
	9 月 8 日，法国瑞典条约。
	伏尔泰：《牛顿哲学原理》、《论人》。
	创办万森讷瓷器制作坊（1756 年迁至色佛尔）。

1739 年	布夏尔东：巴黎格勒内尔街的喷泉。
1740 年	7 月 8 日，法国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
	12 月，法国与英国断交。
	法国、普鲁士、巴伐利亚举行谈判。
	夏尔丹：《餐前的祈祷》。
1741 年	拉图尔：《里欧的审判长立像》。
1741—1803 年	肖戴尔洛·德·拉克洛在世。
1741—1828 年	乌东在世。
1742 年	3 月 15 日，法国丹麦结盟。
	伏尔泰：《穆罕默德》；加布里埃尔任国王的首席建筑师；迪普莱克斯任法属印度总督。
1743 年	1 月 29 日，弗勒里去世。
	6 月 23 日，戴丁根之役。
	9 月，法军撤退至阿尔萨斯。
	9 月 31 日，法国与撒丁王国之间爆发战争。
	达朗贝尔：《论动力学》。
1743—1757 年	达尔尚松担任负责军事的国务秘书。
1743—1794 年	拉瓦锡与孔多塞在世。
1744 年	3 月 15 日，路易十五向英国与奥地利宣战；路易十五下令进军皮埃蒙特和荷兰；法军占领弗莱堡。
1744—1747 年	达让松侯爵担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
1745 年	马肖·达尔努维尔担任财政总监；蓬巴杜夫人开始得宠。
	5 月 11 日丰特诺瓦之役。
	路易十五与西班牙、热那亚签订阿朗朱埃条约。
	拉莫：《光荣的圣殿》。
1746 年	2 月 21 日，法军占领布鲁塞尔。

	3 月 21 日，法国－萨克森条约。
	9 月 21 日，拉布尔多纳占领马德拉，交给英国人。
	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沃弗纳盖：《箴言》；狄德罗：《哲学思想》。
1746—1818 年	蒙日在世。
1747 年	达让侯爵失宠；特吕丹创办巴黎路桥学校。
	4 月 17 日，法国与荷兰交战。
	7 月 2 日，劳菲尔德之役。
	9 月 16 日，法军占领贝尔根－奥普－祖姆。
	伏尔泰：《扎迪格》；拉图尔：《萨克森大人肖像》。
1748 年	10 月 28 日，亚琛条约。
	拉图尔：《路易十五肖像》。
1748—1822 年	贝特洛在世。
1748—1825 年	路易·大卫在世。
1748—1836 年	朱斯厄在世。
1749 年	4 月 30 日，莫尔帕失宠。
	5 月，颁布向全体国民征收二十分之一税的敕令；确立由王家控制教士财产的制度。
	9 月，迪普莱克斯从印度王公手里取得其出让的领土。
	布丰：《地球的理论》；狄德罗：《论盲人书简》。
1749—1791 年	米拉波在世。
1750 年	马肖与特权阶层进行斗争：解散了朗格多克的等级会议与教士大会。
	巴黎出现骚乱；有人试图向凡尔赛行进。
	马肖担任掌玺大臣。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
1750—1753 年	伏尔泰在柏林。
1751 年	1 月，法国与英国就阿卡迪签订临时协定。
	12 月 23 日，颁布免除教士缴纳二十分之一税的敕令。
	《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
1752 年	2 月 7 日，《百科全书》首次被禁止发行。
	"告解证"事件。
	加布里埃尔开始建造巴黎军事学校。
1753 年	4 月，"大谏书"。
	5 月，最高法院成员因"告解证"事件被流放，并于同年 10 月被召回。
	布丰：《论风格》；拉图尔：《达朗贝尔与卢梭肖像》。
	加布里埃尔开始建造凡尔赛的歌剧院。
1753—1821 年	约瑟夫·德·迈斯特在世。
1754 年	马肖由财政总监改任海军大臣。
	孔狄亚克：《感觉论》。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狄德罗：《对自然的解释》。
	加布里埃尔开始建造巴黎的路易十五广场。
	8 月，迪普莱克斯离开印度。
1755 年	格勒兹：《一个家长向儿童们读〈圣经〉》；拉图尔：《蓬巴杜夫人肖像》。
1756 年	5 月 15 日，法英战争。
	6 月 28 日，法军占领米诺卡。
	7 月 12 日，法国瑞典签订条约。
	8 月 21 日，关于设立一种新的二十分之一税

	的敕令。
	10月，终止围绕“告解证”而发生的争论的通谕。
	伏尔泰：《风俗论》；米拉波：《人类之友》。
	拉瓦莱特在安的列斯群岛破产。
1757年	1月5日，达米安行刺。
	2月，达让松伯爵与马肖·达尔努维尔失宠。
	3月21日，法国瑞典结盟。
	8月11日，法军占领汉诺威。
	8月23日，法军占领费尔登。
	狄德罗：《私生子》。
	拉莫：《爱情的惊奇》。
	12月，舒瓦瑟尔担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
	狄德罗：《家长》；卢梭：《给达朗贝尔的信》；魁奈：《经济表》。
1759年	3月8日，《百科全书》第二次被禁止发行。
	伏尔泰：《天真汉》。
1760年	法军占领黑森－卡塞尔。
1760—1825年	圣西门伯爵在世。
1761年	1月27日，舒瓦瑟尔改任负责军事的国务秘书。
	3月31日，法国向英国求和。
	5月8日，对拉瓦莱特进行审讯。
	6—9月，在凡尔赛进行谈判。
	10月15日，舒瓦瑟尔改任负责海军事务的国务秘书。
	卢梭：《新爱洛漪丝》。
1762年	卡拉斯被审讯和处决。

	3 月，法国与英国展开新的谈判。
	10 月 10 日，最高法院下令取消耶稣会。
	卢梭：《爱弥尔》、《社会契约论》。
1762—1768 年	加布里埃尔建造小特里亚农宫。
1762—1794 年	安德烈·谢尼埃在世。
1763 年	2 月 10 日，巴黎条约。
	伏尔泰：《论宽容》。
1764 年	4 月 15 日，蓬巴杜夫人去世。
	6 月 5 日，布列塔尼事件开始爆发：拉夏洛泰与埃吉永分庭抗礼。
	11 月，解散耶稣会。
1764—1780 年	苏夫洛在巴黎建造先贤祠。
1765 年	3 月 9 日，为卡拉斯冤案平反。
1766 年	2 月 23 日，斯塔尼斯拉斯·列钦斯基去世；洛林归属法国。
	3 月 3 日，因布列塔尼事件与巴黎法院发生冲突：施行鞭笞；对拉巴尔骑士进行审讯并判刑。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
1766—1817 年	斯塔尔夫人在世。
1766—1824 年	曼恩·德·比朗在世。
1767 年	5 月，耶稣会士被驱逐出法国。
1768 年	5 月 15 日，凡尔赛条约：法国获得科西嘉。
1769 年	8 月 15 日，拿破仑·波拿巴出生。
	12 月 22 日，特雷担任财政总监。
1770 年	5 月 16 日，王储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结婚。
	5－10 月，杜穆里埃在波兰执行任务。
	12 月 24 日，舒瓦瑟尔失宠。
1771 年	1 月 20 日，解散巴黎高等法院。

1146

1772—1837 年	傅立叶在世。
1773 年	法国共济会总会成立。
	7 月 21 日，克莱芒十四世解散耶稣会。
1774 年	5 月 10 日，路易十五去世，路易十六继位。
	5 月 12 日，莫尔帕成为国王贴心的顾问。
	7 月 20 日，杜尔哥担任海军大臣。
	8 月 24 日，杜尔哥改为负责财政事务。
	11 月 12 日，国王恢复了巴黎法院。
1775 年	巴黎出现粮食短缺。
	博马舍：《塞尔维亚的理发师》。
1776 年	1 月 5 日，取消劳役和行会。
	5 月 12 日，杜尔哥下台。
	8 月 11 日，恢复劳役和行会。
1777 年	拉法耶特在美洲。
	内克掌管财政。
	5 月 28 日，法国与瑞士诸州签订盟约。
	6 月，设立军事学校。
1779 年	在王家领地取消奴役。
	4 月 12 日，法国与阿朗朱埃的西班牙人建立同盟。
1780 年	8 月 24 日，废除预备问题。
	乌东：《戴安娜》。
1780—1867 年	安格尔在世。
1781 年	5 月 19 日，内克辞职。
	5 月，颁布在贵族中保留军事等级的敕令。
1782 年	拉克洛：《危险的关系》。
	卢梭的《忏悔录》出版。
1782—1854 年	拉默内在世。
1783 年	11 月 10 日，卡隆担任财政总监。

	拉瓦锡实现了对水的分析；蒙戈尔菲埃与皮拉特尔·德·洛齐埃乘气球升高。
	博马舍：《费加罗的婚礼》。
1783—1842 年	司汤达在世。
1784 年	内克：《论法国财政的管理》；卡隆重新设立法国印度群岛公司。
1784—1855 年	吕德在世。
1785 年	大卫：《贺拉斯兄弟誓言》。
1785—1786 年	王后项链事件。
1786 年	8 月 20 日，卡隆财政改革方案。
	9 月 26 日，法英商务条约。
	首次登上勃朗峰。
1786—1853 年	阿拉戈在世。
1787 年	1 月 11 日，法俄商务条约。
	4 月 8 日，卡隆下台。
	5 月 25 日，显贵会议延期。
	7 月 27 日，巴黎高等法院被解散；巴黎出现骚乱；巴黎高等法院被重新召回。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保尔和薇吉妮》。
	大卫：《苏格拉底之死》。
1788 年	5 月 1 日，废除先决问题。
	8 月 2 日，国王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8 月 25 日，召回内克。
	12 月 27 日，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中的代表名额增加一倍。
1789 年	4 月 27 日，圣安托万区出现骚乱。
	5 月，布列塔尼爆发内战。
	5 月 5 日，三级会议召开。
	6 月 20 日，网球场宣誓。

6 月 27 日，国王在第三等级面前屈服。
7 月 9 日，宣布成立“制宪议会”。
7 月 11 日，内克被解除职务。
7 月 14 日，攻克巴士底狱。
7 月 16 日，召回内克。
8 月 4 日，“大恐慌”与“8 月 4 日之夜”。
8 月 20 日—10 月 1 日，就宪法事宜进行首次讨论。
8 月 26 日，发表《人权宣言》。
11 月 2 日，教会财产归国家所有。
12 月 14 日，发行“指券”。
12 月 14、22 日，关于改组地方政府的法律。
朱西厄：《植物属志》；拉瓦锡：《化学概要》；大卫：《网球场宣誓》。

1790 年 1 月，市镇机构选举。
3 月 15 日，关于组织购买领主权的法令。
5 月 10 日，设立度量衡委员会。
5 月 14 日，出售教会财产。
7 月 12 日，投票通过《教士公民组织法》。
7 月 14 日，联盟节。
8 月 27 日，将“指券”转换为纸币；朱西厄在巴黎组建植物园。

1790—1869 年 拉马丁在世。

1791 年 3 月 2—17 日，废除行会。
4 月 2 日，米拉波去世。
6 月 14 日，投票通过勒夏普利埃法。
6 月 22 日，路易十六在瓦莱纳被截留。
7 月 17 日，马尔斯校场上的枪杀。
9 月 14 日，路易十六宣誓忠于宪法。

	9月14日，阿维尼翁归属法国。
	9月29日，向特里尔选侯发出最后通牒。
	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
	12月16日，罗伯斯庇尔发表反战演说。
1792年	4月25日，鲁热·德·里斯勒谱写《马赛曲》。
	6月13日，吉伦特派大臣被解职。
	6月16日，杜穆里埃辞职。
	7月11日，宣布祖国在危急中。
	7月22日，为发布相关法令举行军事游行。
	8月10日，国王被“停职”；成立革命法庭。
	8月25日，最终废除封建特权。
	9月2—5日，9月屠杀。
	9月21日，废黜君主制。
	9月22日，开始实行革命历。
	11月29日，取缔革命法庭。
	12月11日，开始审判国王。
	1月25日，法国向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
	4月20日，宣战。
	9月20日，瓦尔密战役。
	9月24日，法军占领尚贝里。
	9月29日，法军占领尼斯。
	11月6日，热马普之役。杜穆里埃征服比利时。
1792—1867年	维克多·库赞在世。
1793年	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
	3月10日，旺代起义。
	4月6日，成立救国委员会。
	7月13日，马拉遇刺。

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
9月11日，建立革命军队。
10月16日，审判与处决玛丽－安托瓦内特。
10月31日，处决吉伦特党人。
11月24日，关闭教堂。
12月8日，罗伯斯庇尔使宣布信仰自由的法令得以颁布。
12月19日，宣布初等教育为免费与义务教育。
1月31日，法国兼并尼斯。
3—9月，第一次反法同盟形成。
10月16日，茹尔当与卡尔诺在瓦蒂尼埃取得胜利。
12月19日，从英军手中夺回土伦。

1794年

1月27日，规定所有公共文件须以法语撰写。
3月10日，逮捕丹东派。
3月24日（芽月4日），处决埃贝尔派。
4月5日，处决丹东派。
7月27日（热月9日），罗伯斯庇尔倒台。
9月18日，完全实行政教分离。
10月30日，创办高等师范学院。
11月19日，封闭雅各宾俱乐部。
12月24日，取消最高限价。
5月，法军侵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
5月18日，茹尔当在图尔宽获得胜利。
6月25日，茹尔当在富勒吕斯获得胜利。
7月27日，皮什格吕攻占安特卫普。
11月22日，法国与普鲁士开始和平谈判。
12月27日，法军进入荷兰。

	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1795年	2月12—17日，与朱安党人进行谈判。
	2月21日，国家放弃制度化的教会。
	3月8日，召回吉伦特党人。
	4—7月，巴塞尔条约与海牙条约。
	5月31日，取缔革命法庭；白色恐怖；重新开放教堂。
	6月16日，清洗国民自卫军。
	8月22日，投票通过共和三年宪法。
	10月5日，“葡月13日事件”：波拿巴平定保皇党人的行动；拉卡纳尔教育法。
	10月26日，国民公会分成五百人院与元老院；成立督政府。
	12月，法国与奥地利签订停战协定。
1796年	2月—3月，镇压朱安党人。
	5月10日，巴贝夫被捕。
	12月4日，关于向某些反革命分子归还其公民权利的法律。
	3月2日，波拿巴统帅意大利方面军。
	5月14日，波拿巴率军攻陷米兰。
	8月5日，卡斯蒂里奥尼战役。
	11月15—17日，阿尔科尔战役。
	12月19日，法英谈判破裂。
1796—1875年	柯罗在世。
1797年	2—5月，对巴贝夫进行审判。
	6月27日，废除最后的针对流亡分子制订的措施。
	7月16日，废除最后的针对拒绝宣誓的教士制订的措施。

	7月26日，封闭俱乐部。
	9月5日，果月18日政变。
	9月30日，三分之二的人破产。
	1月12—16日，里沃利战役。
	3月21日，波拿巴率军攻陷戈里吉亚。
	8月10日，法国、葡萄牙和约。
	10月17日，康波福米奥条约。
	拉马克：《关于物理学的回忆录》。
1797—1799年	巴吕埃尔：《致力于雅各宾派史的回忆录》。
1798年	1月28日，米卢兹会议。
	3月26日，日内瓦会议。
	4月9—18日，共和6年雅各宾党选举。
	5月11日，花月22日政变。
	9月5日，茹尔当征兵法。
	11月12日，设立管理直接税的专门委员会。
	法国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1月22日，法国迫使荷兰接受宪法。
	2月8日，法国迫使瑞士的诸州接受宪法；法军占领罗马。
	5月19日，出征埃及。
	6月10—12日，攻占马耳他。
	7月1日，攻占亚历山大。
	7月21日，金字塔战役。
	7月23日，攻占开罗。
	8月1日，阿布基尔海战。
	7—12月，第二次反法同盟组成。
	9月15日，法军占领都灵。
	12月9日，完全占领皮埃蒙特。
	8月22日，波拿巴建立开罗研究院。

	格罗:《阿尔科尔桥》。
1798—1857 年	奥古斯特·孔德在世。
1798—1863 年	欧仁·德拉克洛瓦在世。
1798—1874 年	儒勒·米什莱在世。
1799 年	5 月 16 日,西耶斯入选执政府。
	6 月 18 日,牧月 30 日政变;富歇执掌警务大权。
	7 月 6 日—8 月 23 日,雅各宾俱乐部重建。
	8 月 1 日,废除对出版自由的限制。
	10 月 9 日,波拿巴返回法国。
	11 月 9 日,雾月 18 日政变。
	1 月 23 日,尚比奥内占领那不勒斯。
	2 月,波拿巴入侵叙利亚。
	4 月 16 日,蒙塔博尔战役。
	5 月 20 日,波拿巴在圣-让-达克尔遭到失败。
1149	8 月 22 日,波拿巴放弃埃及。
	9 月 25—26 日,马塞纳在苏黎士获得胜利。
	蒙日:《画法几何》。
1799—1850 年	巴尔扎克在世。
1800 年	2 月 13 日,开办法兰西银行。
	2 月 28 日,公民投票表决共和八年宪法。
	3 月 3 日,停止公布新的逃亡者名单。
	6 月 14 日,马伦哥战役。
	9 月 31 日,法美莫特丰丹纳条约。
	10 月 1 日,法国与奥地利重新开战。
	11 月 22 日,路易斯安那被归还给法国。
	12 月 24 日,圣尼凯斯街发生意欲谋害波拿巴的爆炸事件。

	比夏:《生命与死亡的生理学研究》。
1800—1805年	居维叶:《比较解剖学讲义》。
1801年	1月5日,雅各宾派分子被流放。
	2月9日,吕内维尔条约。
	5月29日,马尔梅松法令。
	7月15—16日,签订《教务专约》。
	10月1日,法英和约的预备性谈判。
	10月8日,法俄条约。
	10月28日,法国对瑞士进行军事干涉。
	比夏:《普通解剖学》。
	博纳尔:《社会秩序的自然法则析论》;斯塔尔夫人:《论文学》;夏多布里昂:《阿塔拉》。
1802年	1月18日,清洗保民院。
	1月24日,波拿巴担任内阿尔卑斯共和国总统,1月26日,该共和国成为意大利共和国。
	3月25日,亚眠条约。
	4月1日,对保民院进行重组。
	4月12日,禁止工人结社。
	5月,朱安党人恢复活动。
	8月2日,全民投票同意波拿巴任终身执政。
	8月4日,共和十年宪法。
	8月兼并厄尔巴岛;9月兼并皮埃蒙特;10月兼并帕尔马。
	9月13日,富歇失宠。
	12月24日,设立商会。
	博纳尔:《论早期法制》;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的真谛》;曼恩·德·比朗:《习惯的影响》;热拉尔:《雷卡米埃夫人肖像》。
1802—1885年	维克多·雨果在世。

1802 年	4 月 12 日，禁止工人联合。
1803 年	5 月 3 日，美国向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
	5 月 16 日，亚眠和约破裂，波拿巴占领汉诺威。
	9 月 27 日，法国—瑞士同盟。
	11 月 19 日，法国人在圣多明各遭驱逐。
	12 月，皮什格吕阴谋。
	J.-B.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
1803—1869 年	柏辽兹在世。
1803—1870 年	梅里美在世。
1804 年	2—3 月，逮捕莫罗、皮什格吕和卡达杜尔。
	3 月 15 日，绑架昂吉安公爵。
	3 月 21 日，处死昂吉安公爵；颁布民法典。
	5 月 18 日，共和十二年宪法，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5 月 24 日，法俄防卫同盟。
	7 月 10 日，富歇重新担任警务大臣。
	12 月 2 日，拿破仑加冕典礼。
	傅立叶：《全世界和谐》（发表于《里昂通报》）。
1804—1869 年	圣伯夫在世。
1805 年	3 月 18 日，拿破仑兼任意大利国王。
	6 月 6 日，兼并热那亚。
	9 月，法国开始出现金融危机。
	9 月 25 日，法国大军越过莱茵河。
	10 月 15 日，乌尔姆投降条约。
	10 月 21 日，特拉法加战役。
	12 月 2 日，奥斯特里茨战役。
	12 月 15 日，法国—普鲁士申布龙条约。

	12月26日，普列斯堡条约。
	曼恩·德·比朗：《关于〈思想之分析〉的回忆》；夏多布里昂：《勒内》。
1806年	2月13日，拿破仑与庇护七世决裂。
	2月15日，法国—普鲁士巴黎条约。
	5月10日，创建帝国教育团。
	10月14日，耶拿战役与奥尔斯塔特战役。
	11月21日，柏林敕令，开始实行大陆封锁政策。
	11月27日，拿破仑占领华沙。
	安格尔：《美丽的泽莉厄》；巴黎星形广场的凯旋门开始建造。
1807年	2月8日，埃劳战役。
	6月14日，弗里德兰战役。
	6月25日，提尔西特谈判开始。
	7月4日，夏多布里昂开始流亡。
	8月9日，塔列朗失宠。
	8月18日，吉罗姆·波拿巴就任威斯特伐利亚国王。
	8月19日，取缔保民院；颁布商业法典。恢复审计法庭；开始进行土地的测量及估价。
	10月13日，枫丹白露敕令。
	11月23日，米兰敕令。
	12月17日，法军占领西班牙。
	盖-吕萨克对气体膨胀进行研究。
	曼恩·德·比朗：《关于〈即时统觉〉的回忆》；大卫：《加冕礼》。
1808年	3月1日，册封帝国贵族。
	6月6日，缪拉就任那不勒斯国王。

1150

	11 月 30 日，索莫西埃拉战役。
	12 月 4 日，法军占领马德里。
	12 月，塔列朗与富歇策划的阴谋。
1808—1855 年	热拉尔·德·奈瓦尔在世。
1808—1879 年	奥诺雷·杜米埃在世。
1808—1889 年	巴尔贝·德·奥尔维利在世。
1809 年	6 月 10—11 日之夜，拿破仑被开除教籍。
	4 月 10 日，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
	5 月 13 日，拿破仑占领维也纳。
	7 月 6 日，劫持教皇。
	10 月 14 日，法奥申布龙条约。
1809—1865 年	蒲鲁东在世。
1810 年	2 月 1 日，颁布刑法典；法军攻占塞维利亚。
	2 月 2 日，法军攻占马拉加。
	2 月 5 日，恢复书报审查。
	3 月 3 日，恢复国家监狱。
	4 月 2 日，拿破仑与玛丽·路易丝成婚。
	6 月 3 日，富歇失宠。
	约瑟夫·德·迈斯特：《论政治组织的发生原理》。
1810—1857 年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在世。
1811 年	3 月 20 日，拿破仑与玛丽·路易丝的儿子，亦即罗马王诞生。
1811—1872 年	泰奥菲尔·戈蒂埃在世。
1812 年	2 月 23 日，拿破仑宣布废除《教务专约》。
	6 月，拿破仑把教皇押至枫丹白露。
	6 月 24 日，法军越过涅曼河。
	6 月 26 日，法军攻占了维尔纳。
	9 月 5—7 日，莫斯科战役。

	11 月 28—29 日，法军渡过别列津那河。
1813 年	1 月 25 日，枫丹白露教务专约。
	3 月 16 日，普鲁士向拿破仑宣战。
	3 月 24 日，教皇收回前言。
	8 月 12 日，奥地利向拿破仑宣战。
	10 月 8 日，威灵顿率军攻入法国南方。
	10 月 16—19 日，莱比锡战役。
1813—1978 年	克洛德·贝尔纳在世。
1814 年	1 月 5 日，缪拉背叛。
	3 月 30—31 日，巴黎投降。
	4 月 2 日，元老院宣布废黜拿破仑。
	4 月 6 日，元老院呼请路易十八登基。同日，拿破仑退位。
	4 月 11 日，枫丹白露条约。
	5 月 2 日，圣乌昂宣言。
	6 月 4 日，颁布《宪章》。
	10 月 1 日，塔列朗让法国在未来的维也纳会议上得到别国承认。
	安格尔：《大宫女》。
1815 年	1 月 3 日，法国、英国、奥地利同盟条约。
	3 月 1 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到法国。
	3 月 20 日，拿破仑抵达巴黎。
	6 月 1 日，附加法案。
	6 月 9 日，维也纳会议确定的最终条例。
	6 月 18 日，滑铁卢战役。
	6 月 22 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
	7 月 8 日，路易十八重返巴黎。
	7—9 月，白色恐怖。
	8 月 14—22 日，选举产生“无双议会”。

	9 月，塔列朗与富歇被免职。
	10 月 13 日，缪拉被枪决。
	11 月 20 日，巴黎条约。
	12 月 7 日，内伊元帅被处决。
1816 年	9 月 5 日，“无双议会”被解散。
	巴黎海外传道会恢复存在。
	居维叶：《动物界……》；布鲁塞：《医学学说之考察》；邦雅曼·贡斯当：《阿道夫》。
1817 年	拥护法国教会自主者拒绝了一份关于教务专约的方案。
	2 月 8 日，莱内选举法。
	拉默内：《论宗教领域的漠不关心》。
1818 年	3 月 12 日，古维永－圣西尔征兵法。
	12 月 25 日，黎塞留、德索尔与德卡兹退隐。
1818—1893 年	夏尔·古诺在世。
1818—1894 年	勒孔特·德·里斯勒在世。
1819 年	5—6 月，塞尔新闻法。
	11 月，德卡兹政府。
	盖－吕萨克对固体的可溶性进行研究。迈斯特：《论教皇》；席里柯：《梅杜萨之筏》；热拉尔：《在米赛纳海角的科里娜》。
1819—1856 年	夏斯里奥在世。
1819—1877 年	库尔贝在世。
1820 年	2 月 20 日，黎塞留公爵在贝里公爵遇刺后组成新的内阁。
	拉马丁：《沉思集》；安培第一个提出了“电动力学”；阿拉戈发明电磁铁，即用电流通过绕线的方法使其中的铁块磁化；发现奎宁。
1821 年	5 月 5 日，拿破仑去世。

	12 月 13 日，黎塞留公爵离开政府。
	建立古文献学院。
1821—1880 年	古斯塔夫·福楼拜在世。
1822 年	9 月，拉罗歇尔的 4 名中士被处死。傅立叶：《论家务与农业协作社》；司汤达：《论爱情》。
1822—1890 年	塞扎尔·弗朗克在世。
1822—1895 年	路易·巴斯德在世。
1822—1896 年	埃德蒙·德·龚古尔在世。
1823 年	1 月，与西班牙断交。
	5 月 23 日，占领马德里。
	8 月 31 日，占领特罗卡代罗。
	圣西门：《工业家问答》；德拉克洛瓦：《希阿岛的屠杀》。
1824 年	选举产生"重获的议会"。
	6 月 9 日，颁布七年任期法。
	路易十八去世。
1825 年	5 月，查理十世在兰斯举行加冕典礼。
1826 年	维尼：《古今诗集》、《桑－马尔斯》。
1827 年	11 月，维莱尔解散议会，自由派在新的选举中明显占据优势；
	维克多·雨果：《〈克伦威尔〉序》；维克多·库赞：《哲学史教程》。
1828 年	1 月 3 日，维莱尔辞职。
1828—1893 年	泰纳在世。
1829 年	8 月 8 日，波利尼亚克内阁。
	雨果：《东方集》；梅里美：《查理九世时代轶事》。
1830 年	2 月 25 日，《欧那尼》首演并引发激烈争论。
	7 月 5 日，法军占领阿尔及尔。

	7月27、28、29日，“光荣三日”。
	8月2日，查理十世退位。
	8月9日，路易·菲利普宣誓效忠宪章。
1831年	里昂丝织工人起义。
1832年	10月11日，布罗伊、梯也尔和基佐上台执政。
1832—1883年	马奈在世。
1833年	攻占穆斯塔加奈姆；创建“人权社”；米什莱开始出版其《法国史》；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1833—1836年	吕德：《马赛曲》雕塑。
1834年	4月，里昂和巴黎发生共和派骚乱。
	缪塞：《洛伦佐奇奥》；拉默内：《一位信徒的话》；巴尔扎克：《高老头》。
1834—1917年	埃德加·德加在世。
1835年	9月，针对共和派宣传的“反无赖法”。
	雨果：《黄昏之歌》；维尼：《夏特东》。
1835—1840年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835—1921年	圣桑在世。
1836年	修筑巴黎至圣日耳曼-昂-莱的铁路。
1839年	路易·勃朗：《论劳动的组织》；司汤达：《巴玛修道院》。
1839—1906年	保罗·塞尚在世。
1840年	10月29日，苏尔特-基佐内阁成立。
	蒲鲁东：《什么是财产?》；雨果：《光影集》。
1840—1902年	埃米尔·左拉在世。
1840—1926年	克洛德·莫奈在世。
1841—1918年	奥古斯特·雷诺阿在世。
1842年	7月13日，奥尔良公爵去世。

1842—1898 年	马拉美在世。
1844—1896 年	保尔·魏尔伦在世。
1845—1918 年	维达尔·德·拉布拉舍在世。
1846 年	8 月，立法选举；经济危机。
	柏辽兹：《浮士德的天谴》；创办雅典法兰西学院。
1847 年	基佐担任首相。
1848 年	2 月 24 日，路易·菲利普下台。
	2 月 25 日，宣布实行共和制。
	3 月 17 日，社会主义者要求推迟举行选举。
	4 月 16 日，社会主义者在巴黎举行的示威游行遭到失败。
	5 月 4 日，制宪议会召开。
	5 月 15 日，巴黎出现骚乱。
	6 月 22—26 日，“6 月行动日”。
	7 月 5 日，卡芬雅克担任总理。
	8 月 9—11 日 关于新闻的法律。
	8 月 27 日，关于俱乐部的法律。
	11 月 12 日，颁布宪法。
	12 月 10 日，路易·拿破仑当选总统。
1849 年	4 月 24 日，法国对罗马发动远征。
	5 月 26 日，解散制宪议会。
	6 月 19 日，取缔结社权。
	7 月 1 日，法军占领罗马。
	11 月 2 日，路易·拿破仑组成一个议院难以制约的内阁。
	11 月 27 日，禁止罢工。
	库尔贝：《采石工》；乔治·桑：《小法岱特》。
1850 年	3 月 15 日，法卢法投票通过。

1152

	5月31日，颁布反对普选的选举法。
	库尔贝：《奥尔南的葬礼》；米莱：《播种者》。
1850—1893年	莫泊桑在世。
1850—1923年	皮埃尔·洛蒂在世。
1851年	3月，争取重新选举路易·拿破仑委员会组成。
	12月2日，发动政变。
	12月4日，大林荫道上发生枪击事件。
	12月21日，公民投票拥护路易·拿破仑。
1851—1854年	奥古斯特·孔德：《实证政治体系》。
1851—1862年	圣伯夫：《星期一丛谈》。
1852年	1月14日，颁布新的法国宪法。
	2月17日，对新闻恢复通告制度。
	11月8日，开办动产信贷银行。
	12月10日，开办不动产信贷银行。
	巴黎第一家大百货商店“便宜”百货商店开张。
	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要义问答》；勒孔特·德·里斯勒：《古诗集》；吕德：《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的坟墓》。
	12月2日，重建帝国。
1853年	6月2日，法国舰队开往达达尼尔海峡。
	7月1日，奥斯曼就任塞纳省省长。
	雨果：《惩罚集》；缪塞：《喜剧与谚语》；吕德：《内伊元帅》。
1854年	3月27日，法国、英国向俄国宣战。
	6月26日，同盟国占领希腊。
	7月8日，同盟国与奥地利签订维也纳议定书。

	贝特洛提出热化学原理；库赞：《论美、真、善》；维奥莱-勒-杜克：《论中世纪的军事建筑》。
1854—1891 年	阿尔蒂尔·兰波在世。
1855 年	1 月 26 日，法国、英国、撒丁王国结盟。
	4 月，皮阿诺里与贝拉马尔试图谋害拿破仑三世。
	4 月 9—19 日，英法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遭受重挫。
	5 月 2 日，关于巴黎的工程以及工业财产的法律。
	5 月 19 日，费迪南·德·勒赛普斯从赛义德处获得建立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许可。
	6 月 18 日，英法联军在马拉霍夫遭受新的失败。
	9 月 8 日，占领马拉霍夫。
	贝特洛实现了酒精的合成；巴黎国际博览会；大西洋轮船公司成立；库尔贝：《画家工作室》。
1856 年	2 月 25 日，巴黎和会开幕。
	3 月 30 日，巴黎条约。
	7 月 26 日，法国对与商业公司有关的立法事宜进行改革。
	孔德：《主观的综合》；雨果：《沉思集》；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泰纳：《李维论》。
1857 年	9 月，拿破仑三世与沙皇在斯图加特举行会晤；费德尔布建立了达喀尔港。
	12 月 28 日，法国与英国军队占领了广州。
	蒙特—赛尼隧道工程开工。

波德莱尔：《恶之花》；库尔贝：《塞纳河畔的少女》；米莱：《拾穗者》。

1858 年　1 月 14 日，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三世。

2 月 19 日，公共安宁法公布。

1153

5 月 31 日，法国与英国的军队攻占天津。

6 月 24 日，在巴黎设立阿尔及利亚事务部。

7 月 13 日，拿破仑三世与加富尔在普隆比埃尔举行会晤；关于罗马尼亚公国的会议在巴黎召开。

蒲鲁东：《论革命与教会中的公正》；奥芬巴赫：《地狱中的奥菲欧》。

1858—1917 年　埃米尔·涂尔干在世。

1858—1929 年　乔治·库特林在世。

1859 年　1 月 23 日，法国与撒丁王国结盟。

2 月 18 日，法军占领西贡。

4 月 25 日，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

兴业银行建立。

6 月 4 日，马让塔战役。

6 月 8 日，占领米兰。

6 月 11 日，关于建立法国铁路财政制度的法律。

6 月 24 日，索尔费里诺战役。

7 月 8—12 日，停战与维拉弗兰卡预备性谈判。

8 月 15 日，大赦敕令。

11 月 10 日，签订苏黎士条约。

米斯特拉尔：《米蕾伊》；米莱：《晚钟》；安格尔：《土耳其浴室》；古诺：《浮士德》。

1859—1891 年　修拉在世。

1859—1906 年	皮埃尔·居里在世。
1859—1941 年	柏格森在世。
1860 年	1 月 23 日，法英商约签订。
	2 月 10 日，设立阿尔及利亚省政府。
	3 月 24 日，萨伏依归属法国。
	4 月 25 日至 1861 年 6 月 5 日，法军占领叙利亚。
	7 月 9—13 日，大马士革大屠杀。
	8 月 23 日，法英联军占领天津。
	10 月 6 日，法英联军占领颐和园。
	10 月 24—25 日，签订北京条约。
	11 月 24 日，立法团获上奏权。
	克雷米厄创办世界犹太人联盟；贝特洛：《合成有机化学》；勒南：《腓尼基的使命》；泰纳：《拉封丹及其寓言》；拉比什：《贝吕松先生的旅程》；圣－桑：《圣诞节神剧》。
1861 年	7 月 21 日，法国与西班牙就墨西哥的债务问题签订协议。
	12 月 21 日，立法团在财政领域的权力增加。
	蒲鲁东：《论税收》；夏尔·加尼埃开始建造巴黎歌剧院。
1861—1929 年	安托万·布尔代勒在世。
1861—1938 年	乔治·梅列斯在世。
1862 年	3 月 29 日，法国与普鲁士签订商约。
	6 月 5 日，交趾支那归属法国；法国人占领奥博克。
	10 月 30 日，拿破仑三世提议"继承战"的共同调停人。
	贝特洛合成乙炔获得成功；福柯测定光速；

	克洛德·贝尔纳发现血管运动神经的作用；梯也尔：《执政府与帝国史》；雨果：《悲惨世界》；勒孔特·德·里斯勒：《蛮族诗集》；福楼拜：《萨朗博》；马奈：《洛拉·德·瓦朗斯》；卡尔波：《乌谷利诺及其子孙》。
1862—1918 年	克洛德·德彪西在世。
1862—1923 年	莫里斯·巴雷斯在世。
1863 年	法律允许成立有限责任公司。 4 月 11 日，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里昂信贷银行成立。 勒南：《耶稣传》；蒲鲁东：《论联邦制原则》；泰纳：《英国文学史》；马奈：《草地上的午餐》。
1863—1869 年	维克多·杜律伊担任国民教育大臣。
1863—1870 年	圣伯夫：《星期一丛谈续编》。
1864 年	2 月，60 人宣言。 4 月 28 日，日内瓦公约：国际红十字会成立。 5 月 25 日，关于罢工权利的埃米尔·奥利维耶法。 9 月 15 日，法国与意大利就撤离罗马签订协议。 9 月 28 日，第一国际成立。 菲斯特尔·德·库朗治：《古代城邦》；维克多·库赞：《哲学史》；维尼：《命运》：米什莱：《人类的圣经》；小仲马：《男人们的朋友》；罗丹：《塌鼻男人》；古诺：《米雷叶》；奥芬巴赫：《美丽的海伦》。
1864—1901 年	图卢兹－劳特雷克在世。
1865 年	法律承认支票的价值。

	10 月，美国要求法军撤出墨西哥。
	贝特洛发明量热器；克洛德·贝尔纳：《实验医学导论》；G. 帕里斯：《查理曼诗史》；蒲鲁东：《论艺术原则》；卡尔波：《花神》。
1865—1866 年	杜达尔·德·拉格雷与弗朗西斯·加尼埃在湄公河流域进行探险。
1866 年	巴黎动产信托公司倒闭。
	6 月 12 日，法国与奥地利就威尼西亚签订协议。
	8 月 5 日，拿破仑三世要求获得莱茵河左岸。
	8 月 20 日，拿破仑三世要求获得卢森堡与比利时。
	勒南：《使徒们》；柯罗：《马里塞尔的教堂》；奥芬巴赫：《巴黎人的生活》。
1867 年	1 月 19 日，皇帝致信国务大臣；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得到承认。
	2 月，拿破仑三世将法军撤出墨西哥；巴斯德对酒的发酵进行研究；夏尔·特里埃发明冷冻机；巴黎国际博览会。
	10 月 23 日，加里波第侵入教皇国。
	10 月 26 日，派遣法军。
	11 月 3 日，门塔纳之役。
	米斯特拉尔：《卡朗达尔》；古诺：《罗密欧与朱丽叶》。
1868 年	3 月 20 日，第一国际法国支部解散；拿破仑三世为工伤事故设立经费保管机构。
	7 月 31 日，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成立。
	都德：《小东西》；柯罗：《珍珠女郎》。
1869 年	9 月，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就结盟进行

	谈判。
	11 月 17 日，苏伊士运河通航。
	12 月，巴黎职业介绍所设立。
	勒南：《圣保罗》；福楼拜：《情感教育》；都德：《磨坊书简》；卡尔波：《舞蹈》；奥芬巴赫：《强盗》。
1870 年	1 月 2 日，埃米尔·奥利维耶内阁组成。
	1 月 12 日，维克多·诺瓦尔的葬礼。
	4 月 20 日，参议院关于皇帝权力的法令。
	5 月 8 日，公民投票拥护帝国。
	6 月，埃米尔·奥利维耶下令逮捕第一国际的几位主要领导人。
	7 月 13 日，埃姆斯急电。
	7 月 19 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
	8 月 4 日，魏森堡之役。
	8 月 5 日，法军撤离罗马。
	8 月 6 日，弗勒施维勒与福巴克之役。
	8 月 9 日—9 月 28 日，斯特拉斯堡被围困。
	8 月 14—19 日，梅斯之役。
	8 月 30 日—9 月 2 日，色当之役。
	9 月 4 日，皇帝被废黜。
	9 月 19 日，巴黎开始被围困。
	10 月 27 日，梅斯投降。
	11 月 5 日，俄国废除巴黎条约。
	11 月 28 日，博内－拉－洛朗德之役。
	泰纳：《论智力》。
1871 年	1 月 3 日，巴波姆之役。
	1 月 10—11 日，勒芒之役。
	1 月 28 日，法普停战协定。

	2月12日，国民议会在波尔多召开。
	2月17日，梯也尔任政府首脑。
	2月26日，阿尔萨斯-洛林居民严正抗议。
	3月3日，就签订和约举行预备性谈判。
	3月10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
	3月18日，巴黎人民起义。
	3月26日，市镇议会选举。
	4月，市镇法、里韦法以及关于省议会的法律。
	4月5日，人质法令。
	5月21—28日，“流血周”；屠杀人质。
	7月5日，白旗事件。
	蒙特-塞尼隧道投入使用。
	勒南：《法兰西的道德与精神改造》。
1871—1922年	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世。
1872年	3月14日，反（第一）国际法。
	7月28日，军事法；法国新教徒举行全国教务会议。
	弗朗索瓦·科佩：《卑贱者》；杜米埃：《君主政体》。
1872—1946年	保尔·朗日万在世。
1873年	3月，对里韦法加以修改。
	5月24日，梯也尔辞职，麦克马洪当选为总统。
	9月16日，德军撤离法国领土。
	10月27日，复辟企图受挫。
	11月20日，七年任期法。
	弗朗西斯·加尼埃占领河内；基佐：《法国

1155

	史》；勒南：《反基督者》；兰波：《地狱一季》。
1873—1914 年	夏尔·贝居伊在世。
1874 年	3 月 15 日，法国与安南签订条约。
	福楼拜：《圣安东的诱惑》；塞扎尔·弗朗克：《赎罪》；印象派画展。
1875 年	1 月 30 日，瓦隆的宪法修正案投票通过。
	2 月 24 日，参议院组织法。
	2 月 25 日，国家权力组织法。
	7 月 16 日，国家权力关系法。
	12 月 31 日，国民议会分成参众两院；《小巴黎人报》创刊。
	马塞兰·贝特洛：《化学合成》；马奈：《阿让忒伊的划船者》；比才：《卡门》；圣－桑：《骷髅之舞》。
1875—1882 年	萨沃尔尼昂·德·布拉扎发现奥果韦地区，并在这一地区进行探险。
1875—1892 年	菲斯特尔·德·库朗治：《古代法国制度史》。
1875—1937 年	莫里斯·拉威尔在世。
1876 年	2—3 月，共和派获得选举胜利，儒勒·西蒙内阁成立。
	罗马法兰西学院建立；莫诺创办《历史评论》杂志；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马拉美：《牧神的午后》；小仲马：《外国女人》；雷诺阿：《烘饼磨坊》。
1877 年	5 月 16 日，麦克马洪解除儒勒·西蒙的职务。
	6 月，解散众议院。
	9 月 3 日，梯也尔去世。
	10 月 14 日，共和派获得选举胜利。

	11月10日，布罗伊辞职。
	勒南：《福音书》；库尔诺：《经济学说概要评论》；福楼拜：《三故事》；龚古尔：《少女艾莉莎》；左拉：《小酒店》；罗丹：《青铜时代》；马斯奈：《拉霍的国王》；圣－桑《桑松与达莉拉》。
1878年	克洛德·贝尔纳：《实验科学》；弗朗索瓦·科佩：《宣叙调与哀歌》。
1879年	1月30日，麦克马洪辞职。
	6月，于勒·格列维当选为总统。禁止未获授权的宗教团体办教育的法案。
	8月4日，适用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宪法。
	巴斯德发现免疫的基本原理。
	龚古尔：《桑加诺兄弟》；皮埃尔·洛蒂：《阿齐亚德》；奥芬巴赫：《军乐队队长的女儿》。
1880年	3月，政府颁布法令，要求耶稣会士和其他未获准许的宗教团体人士必须在8月底前离开学校，否则将强力驱逐。
	9月，儒勒·费里担任政府总理。
	圣戈塔尔隧道竣工。
	泰纳：《艺术哲学》；莫泊桑：《羊脂球》；罗丹：《思想者》；雷诺阿：《包厢》。
1880—1918年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世。
1881年	3月29日，市镇法。
	5月12日，勒巴尔多条约；弗拉泰尔考察队在撒哈拉的屠杀。
	6月30日，集会法。
	7月29日，出版法；儒勒·费里下台。
	9月，法国与中国在安南问题上出现冲突。

11 月 14 日，甘必大组阁。

法国对突尼斯进行远征。

普恩加莱：《关于梨形能的理论》；巴斯德发现可以预防炭疽病的疫苗；雨果：《精神四风集》；魏尔伦：《智慧集》；阿纳托尔·法朗士：《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皮维·德·夏瓦纳：《贫穷的渔夫》；雷诺阿：《游艇上的午餐》；塞扎尔·弗兰克：《吕贝卡》；马斯奈：《埃洛迪阿德》；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

1881—1958 年 马丹·杜伽尔在世。

1882 年 儒勒·费里初等教育法；通用联盟在巴黎出现金融崩溃。

1 月 7 日，法国与英国共同向埃及总督发出照会。

2 月 12 日，关于埃及事务的国际会议召开。

6 月 11 日，亚历山大出现骚乱。

7 月 29 日，法国议会否决了法英两国共同采取干涉行动。

1156

12 月 31 日，甘必大去世。

贝克：《群鸦》；马奈：《费里－贝舍尔酒吧间》（又名《女神游乐场的酒吧间》）。

1882—1944 年 让·吉罗杜在世。

1883 年 2 月至 1885 年 3 月，第二届儒勒·费里内阁。

4 月 25 日，里韦埃尔占领河内，库尔贝对于埃进行炮击，并迫使安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对越南东京发动远征；中法战争爆发。

5—12 月，法军占领马达加斯加。

莫泊桑：《一生》；塞扎尔·弗兰克：《可憎的

	猎人》。
1884 年	3 月 21 日，瓦尔德克－卢梭工会法。
	4 月 5 日，市镇法；纳盖离婚法。
	5 月 11 日，中法天津条约。
	10 月，法德两国就共同对付英国展开谈判：俾斯麦与儒勒·费里举行会晤。
	12 月 9 日，废除参议院议员终身制，改由选举产生。
	勒孔特·德·里斯勒：《悲剧诗》；都德：《萨福》；马斯奈：《马侬》。
1885 年	2 月 13 日，法军占领朗松。
	3 月 28 日，法军撤离朗松。
	6 月 9 日，第二次中法天津条约。
	12 月 17 日，签订马达加斯加成为法国的保护国的条约。
	12 月 28 日，于勒·格列维再次当选为总统。
	巴斯德首次用狂犬疫苗进行预防接种。
	左拉：《萌芽》；贝克：《巴黎女人》；法朗士：《友人之书》。
1885—1967 年	安德烈·莫洛瓦在世。
1885—1970 年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世。
1886 年	7 月 1 日，布朗热担任陆军部长。
	德律蒙：《犹太人的法国》；兰波：《灵光篇》；洛蒂：《冰岛渔夫》；库特林：《骑兵队的乐趣》；圣－桑：《C 小调第三号交响曲》。
1887 年	5 月，布朗热未能继续担任陆军部长。
	7 月，巴黎的里昂车站发生游行示威；威尔逊丑闻：格列维总统因受牵连在 12 月 2 日辞职；萨迪·卡尔诺当选为总统。

	11月16日，法英两国在新赫布里底恢复共同管理。
	洛蒂：《菊子夫人》；安托万建立自由剧院。
1887—1893年	勒南：《犹太民族史》。
1887—1965年	勒科尔比歇在世。
1888年	首次在巴黎发行俄国公债。
	巴斯德研究所成立。
	巴雷斯：《在野蛮人眼前》；莫泊桑：《皮埃尔和若望》；德彪西：《两首阿拉伯风格幻想曲》。
1889年	1月27日，布朗热在巴黎当选；贡斯当担任内务部长；解散爱国者同盟。
	4月1日，布朗热出逃。
	9月，布朗热派在选举中受挫。
	三年兵役法投票通过。
	首届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第二国际成立。
	巴黎国际博览会：埃菲尔铁塔。
	布朗－塞卡尔发现内分泌腺的作用。
	柏格森：《论意识的即时性》；保尔·布尔热：《门徒》。
1889—1893年	皮维·德·夏瓦纳：为巴黎大学与巴黎市政厅创作壁画。
1890年	5月，法俄签订反对虚无主义的协定。
	8月5日，法英两国就苏丹、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的殖民事宜签订协定。
	11月，红衣主教拉维热里宣布天主教徒归附共和国。
	耶路撒冷法兰西圣经学院建立；保尔·瓦莱

	里：《那喀索斯》；保尔·克洛岱尔：《黄金头》；左拉：《人兽》；克洛德·莫奈：《干草垛》。
1891 年	4 月 27 日，法俄外交协定。 5 月 1 日，富尔米的罢工与事变。 7 月 23 日，法国舰队访问喀琅斯塔得。 魏尔伦：《幸福》；巴雷斯：《贝丽妮丝的花园》；库特林：《8 点 47 分的列车》；克洛德·莫奈：《睡莲》。
1892 年	新的保护主义的关税：梅利纳税率。 4 月 17 日，法俄军事条约。 普恩加莱：《天体力学新方法》；达律斯·米约出生；魏尔伦：《内在的礼拜仪式》。
1892—1893 年	巴拿马丑闻。
1892—1955 年	亚瑟·奥涅格在世。
1893 年	3 月 8—21 日，对巴拿马案件进行审讯，勒塞普斯被判刑。 10 月 3 日，湄公河左岸归法国所有。 10 月 13—29 日，一支俄国舰队访问土伦港。 11 月 17 日，法国迫使达荷美成为其保护国。 马雷制成了第一台动态摄像机；《道德与形而上学杂志》创刊；魏尔伦：《哀歌》；马拉美：《诗与散文》；埃雷迪亚：《战利品》；左拉：《妇女乐园》；法朗士：《鹅掌女王烤肉店》；保尔·布尔热：《国际性都市》；库特林：《布布罗歇》。
1894 年	6 月 24 日，萨迪·卡尔诺遇刺；卡齐米尔·佩里埃当选为总统。 7 月 29 日，投票通过“邪恶的法律”。

	11 月，法军远征马达加斯加。
	12 月，首次对德雷福斯进行审讯。
	卢发现白喉血清。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之规则》；朗松：《法国文学史》；巴雷斯：《论血统、享乐与死亡》；法朗士：《红百合花》；罗丹：《加莱义民》；马斯奈：《黛依丝》；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
1895 年	1 月 13 日，卡西米尔·佩里埃辞职；菲利克斯·富尔当选为总统；总工会成立。
	4 月 24 日，法俄德在日本建立“友好委员会”。
	9 月 30 日，法国占领塔那那利佛；签订新的保护国条约。
	卢米埃尔兄弟研制出了第一台电影放映机。
	科佩：《为了王位》；罗斯唐：《远方的公主》；瓦莱里：《与泰斯特先生共度的夜晚》；莫拉斯：《天堂之路》。
1896 年	1 月 5 日，法英就暹罗湾签订协议。
	9 月 30 日，法国与意大利就突尼斯签订协议。
	勒努维耶：《分析的历史哲学》；亨利·德·蒙泰朗诞生。
1897 年	涂尔干创办《社会学评论》；布伦斯维克：《判断的方式》；柏格森：《物质与记忆》；马拉美：《题外话》；巴雷斯：《背井离乡的人》；纪德：《人间食粮》。
1897—1901 年	法朗士：《现代史话》。
1898 年	1 月 30 日，左拉发表《我控诉》。
	6 月 14 日，法英就非洲边界的划定事宜签订

	条约。
	7 月 30 日，德尔卡塞担任外交部长。
	8 月，亨利伪造文件事件；“法兰西行动”成立；工伤事故法。
	11 月 26 日，法国与意大利签订商约。
	在阿尔及利亚设立财政委员会。
	罗斯唐：《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罗丹：《巴尔扎克》；皮维·德·夏瓦纳：《照看着吕戴斯的热纳维埃芙》。
1899 年	菲利克斯·富尔去世。
	2 月 18 日，卢贝当选为总统。
	3 月 21 日，法英两国就埃及苏丹事宜签订条约。
	6 月，戴鲁莱企图发动政变；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成立。
	德雷福斯再次受到审讯，并获得减刑。
	8 月 9 日，法俄同盟秘密修改相关盟约。
	普恩加莱：《马克斯韦尔理论与电磁波的变动》；莫拉斯：《三种政治观念》；库特林：《特派员是个好孩子》；拉威尔《孔雀舞曲》。
1900 年	关于限制劳动时间的米勒兰法。
	12 月 6 日，法、意两国就的黎波里达成秘密协议。
	法国人摧毁在乍得的拉巴帝国。
	巴黎世界博览会。
	莫拉斯：《关于君主制的调查》；罗斯唐：《雏鹰》；马约尔：《坐着的女人》（佩皮尼昂）；夏庞蒂埃：《路易丝》；德彪西：三支《夜曲》。

1901 年	7 月 1 日，结社权得到完全承认。宗教团体受到排斥。
	7 月 20 日，法国与摩洛哥就边境的保安治理签订议定书。
	朱利安：《维尔琴热托里克斯》；莫拉斯：《安蒂内阿》；左拉：《劳动》；拉威尔：《戏水》。
1902 年	6 月，瓦尔德克－卢梭引退，孔勃上台。
	6 月 28 日，美国购买巴拿马法国公司的权益。
	6 月 30 日，法、意秘密签订中立协定。
	普恩加莱：《科学与假设》；纪德：《蔑视道德的人》；莫拉斯：《威尼斯的情人》；雷尼埃：《水城》；克洛德·莫奈：《维尔特耶的风景》；德彪西：《佩利亚斯与梅里桑德》。
1903 年	5 月，英王爱德华七世访问巴黎。
	左拉：《真理》；罗曼·罗兰：《人民戏剧》；库特林：《家中的安宁》；德彪西：《雨中的花园》；拉威尔：《舍赫拉查德》。
1904 年	4 月，卢贝访问罗马。
	4 月 8 日，法、英就殖民地问题达成协议，协约国集团开始建立。
	7 月 7 日，颁布禁止一切宗教团体办学的法律；“服役期为两年制”的兵役法。
	法国与罗马教廷断绝外交关系。
	11 月，圣勒内·塔扬迪埃使团前往非斯。
	莫奈：《卢登的景色》。
1905 年	1 月 19 日，孔勃辞职。
	4 月 25 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建立。
	5 月 30 日，德国要求法国撤换德尔卡塞外长，并在 6 月 6 日提议召开关于摩洛哥问题的国

1158

	际会议。
	9 月 28 日，法、德就摩洛哥问题达成协议。
	12 月 9 日，政教分离法。
	奥拉尔：《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莫拉斯：《智慧的未来》；塞尔蒂朗热：《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库特林：《阿尔塞斯特的改宗》；罗丹：《维克多·雨果》。
1906 年	1 月 17 日，法、英开始就军事合作进行会谈。
	2 月，教皇发布通谕，谴责法国的政教分离法；宗教团体的“财产清理”引发骚乱；法利埃就任共和国总统；全国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并通过《亚眠宪章》。
	5 月 19 日，森普隆隧道通车典礼。
	7 月 12 日，为德雷福斯恢复名誉。
	10 月，克雷孟梭内阁上台。
	利奥泰就任奥兰舰队的指挥官。
	普恩加莱：《科学的价值》；柏格森：《创造进化论》。
1907 年	3 月 26 日，颁布宗教信仰自由法。
	5 月，进行过海军军籍登记的海员举行罢工。
	卡约提议征收收入税。
	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发明彩色摄影技术。
	安娜·德·诺阿耶：《目眩》；保罗·塞尚旧作汇展。
1907—1928 年	朱利安：《高卢史》。
1908 年	7 月，德拉维发生罢工事件；克雷孟梭下令逮捕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
	7 月 25 日，布雷略乘飞机穿越芒什海峡。

	9 月 25 日，卡萨布兰卡外籍军团士兵事件。
	索雷尔：《论暴力》；罗兰：《从过去到现在的音乐家》；克洛德·莫奈：《威尼斯的景色》；拉威尔：《鹅妈妈》。
1909 年	2 月 9 日，法、德关于摩洛哥的协定。
	3 月，邮电局职工罢工。
	7 月，白里安接替克雷孟梭担任总理。
	纪德：《窄门》、《浪子回头》；巴雷斯：《科莱特·巴多什》；布尔代勒：《弓箭手赫拉克勒斯》。
1910 年	《犁沟》遭到庇护十世谴责。
	10 月，铁路工人大罢工。
	塞尔蒂朗热：《圣·托马斯·达甘》；罗斯唐：《尚特克莱》；贝居伊：《圣女贞德之爱德的奥秘》。
1911 年	5 月 4 日，法国占领非斯。
	克洛岱尔：《人质》、《五大颂歌》；德彪西：《圣塞巴斯蒂安的殉难》；马约尔：《弗洛尔》。
1912 年	1 月 14 日，普恩加莱内阁建立。
	5 月 30 日，法、德签定关于非斯的协定；法国拥有对摩洛哥的保护权，利奥泰为法国派驻摩洛哥的驻扎官。
	9 月，法英签订海军协定。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贝居伊：《第二种美德之奥秘的门廊》；巴雷斯：《克雷科或托莱德的秘密》；塔罗：《阿拉伯的节日》；克洛岱尔：《在马里作的声明》；布里厄：《信仰》；阿纳托尔·法朗士：《诸神渴了》；马约尔：《波莫那》；拉威尔：《达弗尼

斯与克洛埃》、《高贵与伤感的华尔兹》。

1913 年　1 月 17 日，普恩加莱担任共和国总统。

4 月 3 日，法、德两国在吕内维尔发生纠纷，继而又于 4 月 13 日在南锡发生纠纷。

马利坦：《柏格森的哲学》；巴雷斯：《有灵感的丘陵》；马丹·杜伽尔：《让·巴洛瓦》；于勒·罗曼：《伙伴们》；贝居伊：《圣母院的挂毯》。

1913—1927 年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1159

1914 年　4—5 月，立法选举：敌视加强军备的“荒唐行为”的和平主义和民主的议会。

里博内阁垮台。

6 月 13 日，维维亚尼就任政府总理。

7 月 31 日，德国向俄国与法国发出最后通牒。

8 月 1 日，法国进行总动员。

8 月 3 日，德国向法国宣战，德军入侵比利时。

9 月 2 日，法国政府前往波尔多避难。

9 月 5—10 日，马恩河战役。

9 月 24—25 日，埃纳河与索姆河战役。

10 月 29 日，英国与法国（于 11 月 6 日）决定对德国实行经济封锁。

12 月，在诺特尔－达姆－德－洛雷特与香槟地区采取行动。

12 月 22 日，召集议会开会。

纪德：《梵蒂冈的地窖》。

1915 年　2 月 19 日，协约国的舰队进攻达达尼尔海峡。

2 月 26 日，法国在香槟地区发动进攻。

3 月 4 日，俄国渴望得到君士坦丁堡和海峡

	地区。
	3月11日，在纳夫－沙佩尔采取行动。
	3月12日，英军，继而是法军（于4月10日）登陆纳夫－沙佩尔。
	4月5—8日，在沃埃弗尔发起进攻。
	4月25日，协约国在加里波里，继而又于10月5日在萨洛尼卡登陆。
	5—6月，协约国军队在阿图瓦发动进攻，继而又在同年9—10月间在香槟地区发动进攻。
	9月4日，进步派集团组成。
	10月29日，维维亚尼内阁辞职，白里安内阁组成。
	12月6—8日，协约国在尚蒂伊召开军事会议。
	罗曼·罗兰：《超乎混战之上》。
1916年	2月21日，凡尔登战役开始。
	2月25日，德军攻克杜奥蒙，贝当担任凡尔登战线司令。
	3月6—10日，莫尔－奥姆和304高地的战斗。
	6月6日，德军攻克沃克斯要塞，但在6月23日的总攻中遭到失败。
	6月21日，法金汉下令停止该战役。
	7月1日到10月23日，法英联军在索姆河地区发动进攻。
	9月15日，首次采用坦克进攻。
	10月24日，法军夺回杜奥蒙要塞，接着，又在11月1日夺回沃克斯要塞。
	12月，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一个少数

派团体宣告组成。

12 月 2 日，霞飞被尼维尔取代。

12 月 13 日，白里安内阁改组。

亨利·巴比塞：《炮火》。

1917 年 1 月 10 日，协约国关于战争目标的照会。

2 月 14 日，法俄签订关于战争目标的协定。 1160

2 月 24 日—3 月 13 日，德军根据兴登堡的意见撤退。尼维尔发动进攻：4 月 9 日，英军进入阿图瓦；4 月 16 日，法军进入香槟地区。全线败北。

3 月 14 日，白里安辞职。

3 月 31 日，波旁－帕尔莫的亲王们与普恩加莱会晤。

4 月 6 日，里博：设在贡比涅的法国军事委员会。

4 月 19 日，停止军事行动，协约国与意大利之间的圣让－德－莫里埃纳协定。

5 月 15 日，尼维尔被贝当取代。

5—6 月，巴黎发生罢工。

7 月 22 日，克雷孟梭对马尔维的抨击开始。

8 月 31 日，马尔维辞职。

9 月 7 日，潘勒韦接替里博。

10 月 11 日，英国向法国保证将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

11 月 3 日，法英意关于海军吨位的配置的协定。

11 月 6—7 日，协约国在拉巴洛召开会议。法国的“神圣同盟”破裂。

11 月 13 日，潘勒韦下台。

11月17日，克雷孟梭组阁。

瓦莱里：《年轻的命运女神》；杜阿梅尔：《受难者》；塔罗：《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1918年

1月2日，协约国在凡尔赛召开会议：设置执行委员会。

3月11日，协约国经济委员会设立。

3月21日，德方在索姆河一线发动进攻。英军的防线被突破。亚眠受到威胁。

3月26日，法英在杜朗斯举行会议：福熙担任协约国军最高统帅。

3—5月，罢工遭到克雷孟梭镇压。

4月5日，德军停止进攻。

4月9日，尼维尔在佛兰德尔发起进攻。

4月25日，攻克克梅尔山。

5月27日，在“贵妇之路”的进攻。

5月29日，攻克苏瓦松、多尔芒，并在5月31日攻克夏托－蒂埃里。

6月5日，停止进攻。

6月20日，协约国与俄国断绝关系。

7月15日，德军在马恩河一线发起进攻，并彻底失败。

7月18日，法军在维耶－利特莱发起进攻。

7月21日，鲁登道夫放弃马恩河战线。

8月8日，法美军队在索姆河地区发动进攻，法军在埃纳发起进攻。

8月21日，英军在康布雷发起进攻。

9月4日，德军根据兴登堡的意见总撤退。

9月15日，美军对圣米耶尔发起进攻。

9月26日，法军和美军分别在香槟和阿尔戈

纳发起进攻。
9 月 27 日，英军对索姆河地区发动进攻。
9 月 28 日，协约国军在佛兰德尔地区发起进攻。
11 月 4 日，德军向安特卫普－默兹一线撤退，这条战线于 11 月 7 日在色当被突破。
11 月 11 日，雷通德停战协定。
12 月，法军在敖德萨与克里米亚登陆。
克洛岱尔：《硬面包》；吉罗杜：《哀婉动人的西蒙》；莫洛瓦：《布朗勃上校的沉默》；罗兰：《科拉·布厄尼翁》；法朗士：《小皮埃尔》。

1919 年　2 月 25 日，法国要求以莱茵河作为法德之间的边界。以英美须共同担保法国东部边境的安全为交换条件，克雷孟梭放弃了这一要求。
3 月 4 日，第三国际（亦即共产国际）建立。
3 月，协议国军事联合协定废除。
3 月，驻敖德萨的法军撤离。
6 月 28 日，凡尔赛条约以及法英美保障条约签字。
9 月 19 日，圣日耳曼条约。
11 月 16 日，“国民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天蓝色”议会。
11 月 27 日，纳伊条约。
索雷尔：《关于一种无产阶级理论的材料》；吉罗杜：《埃尔佩诺尔》；巴比塞：《光明》；纪德：《田园交响乐》；贝努瓦：《亚特兰蒂德》。

1920 年　1 月，克雷孟梭辞职。图尔代表大会：社会主

	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分裂。
	1 月 10 日，凡尔赛条约与国际联盟盟约生效。
	1 月 17 日，德夏内尔担任共和国总统。
	1 月 24 日，赔偿委员会组建。
	3 月 8 日，法伊沙尔被立为叙利亚国王。
	4 月 6 日—5 月 17 日，达姆斯塔德与法兰克福被法国占领。
	6 月，设在巴黎的国际贸易商会建立。
	7 月 24 日，法国派人占领大马士革。
	8 月 10 日，色佛尔条约。
	9 月 23 日，米勒兰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柏格森：《精神的能量》；马利坦：《艺术与经院哲学》；朗松：《法国悲剧史》；克洛岱尔：《受辱的父亲》；杜阿梅尔：《子夜的忏悔》。
1920—1924 年	纪德：《如果种子不死》。
1921 年	1—12 月，白里安内阁。
	1 月 24—29 日，商讨赔偿事宜的会议在巴黎召开。
	3 月，法军占领杜塞尔多夫等地。
	4 月 30 日，就战争罪问题给德国发出最后通牒。
	7 月，罗马教廷与法国恢复外交关系。
	7 月 27 日，法德之间签订威斯巴登协定。
	吉罗杜：《苏姗与平和的人》；塔罗：《当以色列称王》；莫洛瓦：《奥格拉迪博士的演讲》；法朗士：《青春年华》。
1922 年	1 月 12 日，普恩加莱内阁。
	7 月，全国总工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分裂。

1161

	吉罗杜：《西格弗里德和里摩日》；莫里亚克：《和麻风病人亲吻》；瓦莱里：《幻美集》。
1922—1940 年	马丹·杜伽尔：《蒂波一家》。
1923 年	1 月 11 日，普恩加莱在比利时的赞同下出兵占领鲁尔。
	布罗伊提出了波动力学的原理。马利坦：《哲学的要素》；莫洛瓦：《雪莱传》。
1924 年	1 月 26 日，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结盟。
	3 月 11 日，“左翼联盟”在选举中获胜。
	6 月 11 日，米勒兰被迫辞职。
	6 月 13 日，杜梅格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6 月 15 日，赫里欧内阁成立。
	10 月 29 日，法国承认苏联。
	《超现实主义宣言》；瓦莱里：《灵魂与舞蹈》、《欧帕里诺》；莫拉斯：《哲学家们的林荫道》；蒙泰朗：《奥林匹克运动会》；吉罗杜：《男人国里的朱利叶》；罗曼：《诺克》。瓦莱里：《杂文集》。
1925 年	4 月 10 日，赫里欧内阁垮台。
	7 月 1 日，法国开始从鲁尔撤兵。
	里齐耶的列圣品仪式。
	纪德：《伪币制造者》；布尔代勒：《萨福》；马约尔：《为塞尚而立的纪念碑》；拉威尔：《孩子与巫术》；装饰艺术展览会在巴黎举办。
1926 年	1 月 31 日，从科隆地区撤兵。
	5 月 29 日和 7 月 12 日，法国先后与美、英签订关于战债的协定。
	7 月 20 日，法郎大幅度贬值。
	7 月 23 日，普恩加莱内阁组成。“法兰西行

动”遭到教皇谴责。

塞尔蒂朗热:《理智的生活》;艾吕雅:《痛苦的首都》;蒙泰朗:《古罗马的斗兽者》;吉罗杜:《贝拉》;贝尔纳诺:《在撒旦的阳光下》;莫里亚克:《泰蕾丝·台斯盖普》。

1927 年	1 月 31 日,在德国实行的军事管制结束。 莫洛瓦:《狄斯累利传》;杜阿梅尔:《萨拉万的日记》;布尔代勒:《密茨凯维奇》;马蒂斯获得卡内基奖;勒内·克莱尔:《一顶意大利草帽》。
1928 年	3 月,关于社会保险的法令。 法郎正式稳定。 4 月,温和派在选举中获胜。 8 月 27 日,《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签订。 11 月,激进党人退出普恩加莱内阁。 布勒东:《娜佳》;马尔罗:《征服者》;格林:《海中怪兽》;拉威尔:《波莱罗》;有声电影开始进入商业利用的阶段。
1929 年	7 月 27 日,普恩加莱引退。 10 月 24 日,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崩盘开始产生后果。 吉罗杜:《第三十八位晚宴东道主》;克洛岱尔:《缎子鞋》;第二份《超现实主义宣言》。
1930 年	5 月 22 日,法国为叙利亚颁布了一部宪法。 塞尔蒂朗热:《无宗教信仰者的教理问答》;杜阿梅尔:《未来生活的舞台》;马约:《佩有颈饰的维纳斯》;拉威尔:《左手协奏曲》。
1931 年	5 月 13 日,白里安在总统选举中败于杜梅尔。 瓦莱里:《对现实世界的关注》;罗曼:《多诺

	古》；莫拉斯：《向弗洛尔示意》；迪诺瓦耶·德·塞贡扎克为《农事诗》绘制插图；勒内·克莱尔：《自由属于我们》。
1932 年	2 月 2 日，裁军会议开幕。
	5 月 5 日，杜梅尔遇刺；勒布伦接任总统。
	5 月，举行大选。
	6 月 4 日，赫里欧内阁组成。
	11 月 29 日，法苏互不侵犯条约。
	12 月 11 日，协约国承认德国拥有平等权利。
	12 月 15 日，法国拒绝向美国支付战债。
	莫里亚克：《蝮蛇结》；塞利纳：《在茫茫黑夜中的漫游》；马蒂斯为马拉美的《诗集》绘制插图。
1932—1945 年	杜阿梅尔：《帕斯基埃家轶事》。
1932—1946 年	罗曼：《善意的人们》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
	10 月 14 日，德国退出裁军会议，继而又退出国际联盟。若里奥·居里在研制人工放射性方面取得成功。
	马尔罗：《人类的处境》；吉罗杜：《间奏曲》；马约尔：《德彪西的不朽之作》；马蒂斯：《舞蹈》。
1934 年	1 月，斯塔维斯基丑闻开始披露。
	1 月 30 日，达拉第组阁。
	2 月 6 日，协和广场上的枪击事件；达拉第辞职。
	2 月 9 日，杜梅格组阁；杜梅格在宪政改革问题上遭到失败。
	11 月 7 日，杜梅格辞职。

1162

	裁军会议延期。
	蒙泰朗:《单身汉们》。
1934—1937 年	马约尔:《美惠三女神》。
1935 年	1 月 6 日，德意两国的罗马协定。
	1 月 13 日，萨尔举行公民投票。
	4 月 14 日，法、奥、意三国的斯特莱萨协定。
	5 月 2 日，法苏互助条约。
	吉罗杜:《特洛伊战争将不会发生》。
	费德尔:《壮烈的主保瞻礼节》。
1936 年	“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
	5 月，罢工与占领工厂。
	6 月 4 日，勃鲁姆组阁。
	6 月 7 日，工会团体签订关于劳动时间与带薪休假的协定。
	8 月 9 日，法国与叙利亚的议定书。
	9 月 9 日，针对西班牙的不干涉委员会在伦敦开会；国际旅。
	9 月 25 日，法郎贬值。
	11 月 13 日，法国与黎巴嫩之间的议定书。
	纪德:《访苏归来》；贝尔纳诺:《一位乡村神甫的日记》。
1937 年	1 月 24 日，法国、土耳其两国关于亚历山大雷特的议定书。
	6 月 21 日，勃鲁姆政府垮台。
	6 月 30 日，法郎再次贬值。
	巴黎国际博览会。
	建造夏约宫。
1938 年	5 月，法郎第三次贬值。
	9 月 30 日，慕尼黑协定。

	10月，“人民阵线”破裂。
	11月30日，总罢工。
	12月6日，法德巴黎宣言。
	12月22日，意大利通告废除法意罗马协定。
	莫里亚克：《阿斯莫德》；马尔罗：《希望》；萨特：《恶心》；科克托：《人的声音》、《不安分的父母》；路沙革新马奥布松挂毯的制作工艺；莱热：《力量的输送》。
1939年	3月15日，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5月22日，意大利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
	7月，法、英军事使团抵达莫斯科。
	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
	9月3日，英、法先后向德国宣战。
	9月9—30日，法国在萨尔发起进攻。
	9月13日，达拉第内阁改组。
	10月19日，法、英、土（耳其）三国协定。
	11月10日，达拉第获得全权。
	12月12日，雷诺－西蒙财政协定。
	12月14日，苏联被开除出国际联盟。
1940年	3月20日，达拉第辞职，保尔·雷诺接替。
	3月28日，法英商定绝不单独媾和或停火。
	5月10日，入侵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
	5月14日，法方战线在色当被突破。
	5月18—21日，圣康坦、亚眠与阿拉斯被占领。
	5月28日—6月3日，敦刻尔克战役。
	6月6日，索姆河战线被突破。
	6月9日，鲁昂沦陷。

6月10日，意大利向法国宣战。

6月14日，巴黎被占领。

6月16日，贝当要求停火，保尔·雷诺辞职。

6月17日，贝当掌权。

6月18日，戴高乐在伦敦发出呼吁。

6月21日，里昂与维埃纳被占领。

6月22日，法德停止交战。

6月23日，法意停止交战。

6月28日，英国政府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兰西军队的领袖。

7月2日，法国政府以维希为驻地。

7月4日，法、英之间断绝外交关系。

1163 7月10日，在维希开会的议会授予贝当元帅制宪权。第三共和国终结。

8月7日，丘吉尔、戴高乐就自由法兰西部队的组织签订协定。

8月21日，戴高乐被缺席判处死刑。

8月28日，“赤道法国”站在戴高乐一边。

9月23日，日本就印度支那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

10月3日，颁布关于法国犹太人的身份的法令。

10月24日，希特勒、贝当在蒙图瓦尔会晤。

1941年 2月9日，达尔朗担任政府副总理。

5月11—12日，希特勒、达尔朗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

6月2日，颁布涉及犹太人的新法令。

6月8日，卡特鲁将军停止行使其在叙利亚、黎巴嫩的权限。

6月30日，维希政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7月17日，魏刚出任驻北非的总代表。
7月29日，法、日关于印度支那防务问题的协定。
8月14日，针对共产党人的特别法庭设立。大西洋宪章签署。
8月21日，“人质制度”生效。
9月23日，法国民族委员会组成。
10月4日，劳动宪章颁布。
10月22日，在夏多布里昂、南特和波尔多的人质被处决。
11月20日，德方要求魏刚退役。
12月1日，贝当、戈林在圣-弗洛朗坦会晤。
4月18日，赖伐尔重新操纵政府。
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
11月11日，德军占领“自由区”和土伦：法国舰队的舰船在11月27日自行凿沉。
11月16日，达尔朗被罢免。
11月20日，魏刚被德国人逮捕。
12月24日，达尔朗遇害。
维尔科尔：《大海的沉默》；阿拉贡：《艾尔莎的眼睛》；卡尔内：《夜间的来访者》。

1943年

1月30日，法国保安部队组建。
2月16日，确立义务劳动。
3月24日，吉罗与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会晤。
5月15日，抵抗委员会组成。
7月31日，吉罗担任法国部队司令官。
11月9日，戴高乐成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唯一的主席。

	维尔科尔：《向星球进军》。
1944 年	4 月 20 日，圣热尼－拉法尔大屠杀。 4 月 21 日，吉罗辞职。关于在解放后组织权力事宜的命令在阿尔及尔颁布。 6 月 6 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6 月 10 日，奥拉多尔－苏尔－格拉纳的大屠杀。 6 月 27 日，瑟堡得到解放。 6 月 28 日，菲利普·昂里欧遇害。 7 月 7 日，芒代尔遇害。 7 月 9 日，攻克卡昂城。 7 月 13—21 日，维尔科斯的大屠杀。 7 月 30 日，突破阿弗朗什。 8 月 15 日，盟军在普罗旺斯登陆。 8 月 20 日，贝当被德国人逮捕。 8 月 23 日，马赛和格勒诺布尔得到解放。 8 月 25 日，马耶的大屠杀，巴黎得到解放。 9 月 6 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组成。 9 月 11 日，里昂解放。 9 月 13 日，分别从法国北部南下和从法国南部北上的盟军会合。法国发起进攻：11 月 20 日，攻克贝尔福；11 月 21 日，攻克米卢兹；11 月 23 日，攻克斯特拉斯堡。 10 月 5 日，新的选举制度：妇女参加投票。 11 月 27 日，多列士回到巴黎。 12 月 10 日，法苏条约。 12 月 14 日，北方的煤矿实行国有化。 萨特：《苍蝇》、《禁闭》；加缪：《误会》；阿拉贡：《奥雷里安》。
1945 年	1 月 1 日，德国在洛林发起进攻。

1164

1月2—12日，雅尔塔会议。
1月20日，德方在阿登地区进行最终的撤退。
2月20日，戴高乐拒绝在阿尔及利亚与罗斯福会晤。
5月8日，德军全面投降。
6月，法英关系出现极度紧张局面，接着，在7月25日签订了关于地中海东岸地区国家的协定。
7月23日—8月14日，对贝当的诉讼。
8月3日，法国受邀出席商讨补偿战争带来的损失事宜的会议。
9月3日，戴高乐不承认全国总工会有权处理政治问题。
10月21日，决定举行大选。
11月9日—12月21日，巴黎进行大选。
11月15—21日，戴高乐与法共在组建政府问题上发生冲突。
12月3日，银行与信贷部门实行国有化。
瓦莱里去世；吉罗杜:《夏约的疯婆子》；加缪：《加里古拉》；卡尔内:《天堂中的孩子们》。

1946年

1月20日，戴高乐辞去政府首脑职务。
4月19日，对第一部宪法进行投票表决。
4月24—26日，煤矿与保险部门实行国有化。
6月23日，皮杜尔内阁。
9月14日，法国与越南之间达成一项临时协定。
12月16日，勃鲁姆组阁。
萨特：《死无葬身之地》、《毕恭毕敬的妓

女》；圣琼－佩斯：《流放集》；纪德：《岱塞》；贝尔纳诺：《欧伊纳先生》。

1947 年

1月22日，拉马迪埃组阁。

2月13日，总罢工。

3月4日，法英敦刻尔克同盟条约。

4月14日，戴高乐创建法兰西人民联盟。

6月，罢工浪潮。

8月5日，在突尼斯发生流血事件。

8月27日，就阿尔及利亚的地位进行投票表决。

10月5日，萨尔地区的选举结果确认了其在经济上与法国合并。

10月9日，法国在越南东京发动进攻。

10月19—26日，市镇选举：法兰西人民联盟大获成功。

11—12月，大规模的罢工浪潮。

11月12日，共产党人在马赛示威游行。

11月19日，拉马迪埃辞职。

11月23日，舒曼内阁。

11月30日，采取对付法国共产党的措施。

12月19日，全国总工会与“工人力量”之间出现分裂。

加缪：《鼠疫》；吉罗杜：《贝拉的阿波罗》；让·热内：《女仆》；奥迪贝尔迪：《短暂的苦恼》；马蒂斯：《英国女青年》。

1948 年

1月24日，法郎贬值。黄金实行自由交易。

4月4—11日，在阿尔及利亚举行选举。

5月20日，首届越南政府组成。

7月26日，马利取代舒曼。

	9月7日，第二届舒曼内阁。
	10月4日—11月29日，在工厂与铁路部门出现罢工浪潮。
	安托南·阿尔托去世；加缪：《戒严》；瓦扬：《有害的打击》；马蒂斯：《宽大的红色建筑物的内部》；查德金：《鹿特丹被毁纪念碑》。
1949年	9月19日，法郎贬值。
	9月20日，“将军事件”开始。
	10月5日，克耶内阁辞职。
	10月28日，皮杜尔内阁。
	12月30日，法国将权力移交给越南。
	加缪：《正义者》。
1950年	6月24日，皮杜尔内阁垮台。
	7月12日，普列文内阁。
	12月6日，德拉特尔·德·塔西尼被任命为派往印度支那的高级特派员。
	12月31日，对重整军备的拨款进行投票表决。
	尤内斯库：《秃头歌女》。
1951年	1月，越南独立阵线发动进攻。
	2月22日，欧洲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在巴黎举行。
	2月28日，普列文内阁垮台。
	3月13日，第三届克耶内阁。
	3月16日到4月4日，运输、能源部门的罢工。
	4月18日，设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巴黎协定。
	6月17日，大选。共产党与人民共和党的支持率下降。

1165

6月18日，法国在河内附近发动进攻。
8月11日，新一届普列文内阁。
9月21日，关于向私立教育提供援助的巴朗热法。
11月1日，卡萨布兰卡发生严重的骚乱。
朱里安·格拉克：《沙岸》；马尔罗：《沉默的声音》；萨特：《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热内的下述作品获准出版：《花的圣母》、《葬礼》、《严密的监视》、《窃贼的日记》。

1952年

1月7日，普列文内阁垮台。
1月17日，在突尼斯的比塞达与费里维尔发生流血骚乱。
1月18日，对在突尼斯发生的总罢工进行镇压。
1月20日，富尔内阁组成。
2月24日，从越南的和平撤兵。
5月26日，发行一种按指数计算的公债。
5月27日，关于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巴黎协定。
5月28日，法共在巴黎举行激烈的游行示威。
7月11日，人民共和党出现分裂。
10月30日—11月18日，在越南的东京进行“洛林行动”。
11月18日，摩洛哥素丹要求收回摩洛哥的主权。
11月21日，越南独立阵线在老挝发动进攻。
12月8日，卡萨布兰卡发生骚乱。
12月23日，比内内阁辞职。
保尔·艾吕雅去世；尤内斯库：《椅子》。

1953年

1月9日，梅耶内阁组成。

	4 月，越南独立阵线在老挝发动进攻。
	5 月 6 日，戴高乐脱离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议会党团。
	8 月 16 日，在摩洛哥发生严重骚乱。
	10 月 15—19 日，越南国会召开。
	11 月 20 日，占领奠边府。
	11 月 29 日，胡志明提出越方的停火条件。
	贝克特：《等待戈多》；勒努瓦：《金子的四轮华丽马车》。
1954 年	2 月 3 日—5 月 7 日，奠边府战役。
	6 月 19 日，孟戴斯·弗朗斯内阁。
	7 月 27 日，在越南的停火协定生效。
	7 月 31 日，孟戴斯·弗朗斯访问突尼斯，原则上同意突尼斯内政自主。
	8 月 30 日，议会否决了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
	9 月 4 日，法突（尼斯）谈判开始。
	10 月 9 日，从河内撤兵。
	10 月 21 日，法印就法国在印度的银行的让与事宜签订协议。
	10 月 23 日，关于萨尔地区的法德巴黎协定。
	11 月 1 日，在阿尔及利亚出现一系列暗杀事件，奥雷高原发生的起义开始。
	马蒂斯与科莱特去世；西蒙娜·德·波伏瓦：《名士风流》；塔蒂：《于洛先生》。
1955 年	1 月 26 日，苏斯戴尔被任命为驻阿尔及利亚总督。
	2 月 23 日，富尔内阁组成。
	3 月 31 日，对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紧急状态的法案进行投票。

	5月15日，法国最后一支部队撤离越南北方。
	克洛岱尔、费尔南·莱热与于特里约去世；米努-德鲁埃的诗歌出版；罗伯-格里耶：《窥视者》；贝雅尔：《单人交响乐》。
1956年	2月1日，居伊·摩勒就任政府总理。
	3月2日，法国承认摩洛哥独立。
	7月26日，苏伊士运河在埃及被收归国有。
	10月31日，法英军队轰炸埃及的飞机场。
	11月7日，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萨特与法共断交。
	12月3日，法英同意撤回其在赛义德港的部队。
	12月12日，法德关于萨尔地区的协定获得批准。
	保尔·莱奥托、居斯塔夫·夏庞蒂埃和米斯坦盖特去世。
	阿兰·雷奈：《夜与雾》。
1957年	1月7日，马絮负责维持在阿尔及利亚的秩序。
	1月28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布举行总罢工的命令。
	9月13日，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框架法草案在内阁会议中获得通过。
	11月6日，费利克斯·加亚尔就任政府总理。
	弗朗西斯·加尔科获得巴黎市的文学大奖；阿尔贝·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瓦扬：《法律》；布托尔：《修改》；贝克特：《剧终》；巴塔耶：《色情史》；圣琼-佩斯：《阿梅尔》；布雷松：《一个被判死刑者出逃》；路易·马

勒:《通向断头台的电梯》。

1958年

1月28日,选举法在国民议会获得通过;1月31日,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框架法在议会被通过。

3月27日,政府派人查扣亨利·阿莱格的《问题》。

5月13日,由马絮主持的一个救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成立。

5月15日,戴高乐发表其“准备担负起共和国的权力”的声明。

5月16—17日,投票通过实行紧急状态。

5月29日,科蒂总统紧急召唤戴高乐出任政府首脑,戴高乐表示同意。

5月31日,弗里姆兰辞职。

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将军组阁,并赋予其“全权”。

6月4—7日,戴高乐首次阿尔及利亚之行。

6月16日,马絮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行政长官。

9月19日,一个由法赫拉特·阿巴斯主持的“自由阿尔及利亚政府”在开罗组成。

9月24日,就新宪法进行全民投票:在本土有79.25%的选民投赞成票,而在阿尔及利亚则有95%的选民投赞成票。

10月5日,第四共和国终结。

12月21日,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及法兰西共同体总统。

弗朗西斯·加尔科与马丹·杜伽尔去世;阿拉贡:《神圣的一周》;博纳弗尔:《近来流行

荒凉》。

1959年 1月1日，共同市场生效。

1月8日，德布雷担任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理。

9月16日，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有权自治（需在恢复和平之后，且需获得公民投票的批准）。

9月28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宣称“准备进行谈判”。

12月2日，弗雷瑞斯的严重灾祸。

热拉尔·菲利普去世；巴罗成为法兰西剧院（前奥戴翁剧院）的经理，并在那里上演了克洛岱尔的《金头》；圣琼-佩斯获得法国文学大奖；萨特：《阿尔托纳的被关押者》；格诺：《地铁中的扎济埃》；夏布罗尔：《漂亮的塞尔热》；特吕弗：《四百击》；雷诺阿：《科尔德利埃博士的遗嘱》；戈达尔：《筋疲力尽》；雷奈：《广岛之恋》。

1960年 1月24日，阿尔及尔的“街垒周”开始，颁布戒严令。

2月1日，拉加亚尔德被监禁在疗养院。

2月2日，就为期一年的特别权力进行投票。

2月24日，“让松联络网”被摧毁。

4月13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投票通过一项要求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动议。

4月25日，苏斯戴尔被开除出保卫新共和联盟。

6月，马里、达荷美、尼日尔、上沃尔特、科特迪瓦、乍德、中非共和国、刚果和加蓬等

宣布独立。
9 月 5 日—10 月 1 日，针对“让松联络网”的诉讼。
9 月 6 日，关于“不服从的权利”的“121 人宣言”。
10 月 12—14 日，枢机主教与总主教会议谴责“不服从的权利”。
阿尔贝·加缪去世；列维－施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开始授课；瓦扬：《节日》；尤内斯库：《犀牛》；特吕弗：《对着钢琴师发射》。

1961 年 1 月 8 日，就阿尔及利亚政策举行公民投票。
2 月 20—22 日，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瑞士举行秘密会谈。
4 月 22—25 日，夏尔、茹奥、泽勒与萨朗在阿尔及尔采取强硬措施，宪法第 16 条实施。
5 月 10 日，利奥泰的遗骸被迁移到荣军院。
5 月 20 日，埃维昂谈判开始。
6 月 1 日，夏尔和泽勒被判处 15 年徒刑。
7 月 1 日，萨朗被缺席判处死刑。
9 月 30 日，宪法第 16 条停止实施。
11 月 8 日，议会通过对阿尔及利亚的拨款计划。
12 月 19 日，巴黎出现反对“秘密行动组织”的游行示威，有一百来人受伤。
塞利纳与梅洛－庞蒂去世；巴什拉尔获得全国文学大奖；索莱尔斯：《公园》；特吕弗：《朱尔与吉姆》；雷奈：《去年在马里昂巴》。

1962 年 1 月 4 日，秘密行动组织在巴黎进行针对法共的谋杀。

2 月 8 日，巴黎举行反对秘密行动组织的游行示威：8 人死亡（夏洛纳）。

3 月 15 日，穆鲁 · 费拉欧纳在埃尔 – 皮阿尔被秘密行动组织暗杀。

3 月 18 日，埃维昂协议签订。

3 月 19 日，在阿尔及利亚实现停火；秘密行动组织发动罢工。

3 月 23 日，秘密行动组织对维持秩序的部队开火；在巴布 – 埃尔 – 欧埃德发生激烈的战斗，35 人死亡。

4 月 8 日，就埃维昂协定和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进行公民投票，投赞成票者占 90.70%。

4 月 14 日，德布雷辞职，蓬皮杜就任政府总理。

4 月 20 日，萨朗在阿尔及利亚被捕。

7 月 1 日，在阿尔及利亚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7 月 3 日，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10 月 28 日，就以普选方式选举国家元首事宜进行公民投票，有 62.25% 的选民投了赞成票。

1963 年

1 月 4 日，国家安全法庭设立。

3 月 1 日，洛林的煤矿工人举行罢工。

12 月 18 日，德菲尔成为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

12 月 30 日，前上校阿尔古被判处终身监禁。

布拉克去世；贝克特：《噢！美好的日子》；勒克莱齐奥：《笔录》；罗伯 – 格里耶：《不朽者》；罗西弗：《死于马德里》；威尔逊继让 ·

	维拉尔就任巴黎国家剧院经理。
1964 年	1 月 27 日，法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3 月 16 日，戴高乐将军访问墨西哥、危地马拉和马提尼克。 5 月 17 日，多列士当选为法共主席，其总书记一职由瓦尔德克-罗歇取代。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娜塔莉·萨洛特：《金苹果》；戈达尔：《蔑视》；路沙：《世界之歌》。
1965 年	1 月 28 日，魏刚将军去世。 5 月 26 日，国民议会同意把国民服兵役的期限定为 16 个月。 9 月 9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竞选总统。 9 月 23 日，法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支持密特朗竞选总统。 10 月 29 日，本·巴尔卡在巴黎遭到绑架。 12 月 5 日，第一轮总统选举：戴高乐获得 44.64% 的选票，密特朗获得 31.72% 的选票； 12 月 19 日，戴高乐以获得 55.19% 的选票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雅各布·勒沃夫与莫诺以其在基因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吉阿科默蒂获全国艺术大奖；亨利·米修获得全国文学大奖（但其拒绝接受）；阿拉贡：《处死》；佩雷克：《物品》；戈达尔：《疯子皮埃罗》。
1966 年	2 月 9 日，马絮被任命为法国驻德部队总司令。 4 月 8 日，让·热内在奥戴翁剧院上演《屏风》；勒鲁施：《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

6 月 1 日，法国政府宣布，不再将驻扎在德国的法国军队编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吉斯卡尔·德斯坦为首的独立共和党成立。

6 月 20 日—7 月 1 日，戴高乐访问苏联。

1967 年　3 月 12 日，立法选举举行。

1168

4 月 17 日，对绑架本·巴尔卡者的新的诉讼在巴黎开始，判决结果是 2 人被判处 5 到 6 年监禁，5 人无罪释放。

马尔罗：《反回忆录》；克洛德·西蒙：《历史》；戈达尔：《中国女人》；梅尔维尔：《武士》；罗伯 - 格里耶：《横贯欧洲的列车》；杜拉斯：《音乐》。

1968 年　1 月 26 日，卡昂城在一次工人游行示威期间发生激烈的斗殴。

3 月 11 日，巴黎交易所中的黄金交易明显增加。

5 月 2 日，在南泰尔文学院有人闹事，院长下令暂停上课；3 日，警察前往巴黎大学；5—7 日，拉丁区出现游行示威；10—11 日，“街垒之夜”：468 名议员提出质询；13 日，巴黎大学被大学生占领。全法国出现群众示威游行；14 日，南特的南方飞机制造厂被占领；15 日，奥戴翁剧院被占领；19 日，伴随着占领工厂的罢工增多。戴高乐宣称：“改革可以，乱来不行！”25 日，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罢工；工会领导人、资方与政府达成协议。雷诺汽车工厂和一些大企业的工人宣布反对复工；27 日，夏尔莱蒂体育场的群众大会；30 日，国民议会解散，戴高乐的支持者在星形广场

示威游行。

6 月 5 日，法国电力公司和法国煤气公司和煤炭部门复工；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巴黎独立运输公司和邮电部门复工；7 月，在弗兰发生严重的撞车事故，一人死亡；8 日，皮杜尔返回法国；10 月，立法选举活动开始；11 月，在巴黎和蒙贝利亚尔出现游行示威：一位示威者被警察打死；12 日，禁止示威游行，一大批极左组织被解散；15 日，萨朗与另外 10 位因颠覆活动被判刑者得到赦免；16 日，警察撤离巴黎大学；23 日，首轮立法选举；30 日，在第二轮立法选举中，多数派获得了 485 个议席中的 358 个议席。

7 月 13 日，蓬皮杜辞职。顾夫·德姆维尔内阁。

9 月 4 日，取消对外汇的管制。

10 月 10 日，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法案在议会投票通过。

10 月 20—21 日，让奈特·多列士－维尔迈尔什辞去法共职务。法共对罗热·加罗迪实行公开纪律处分。

10 月 24 日，苏斯戴尔返回法国。

12 月，南泰尔出现罢课，警察占领校园。

1969 年

1 月 17 日，蓬皮杜在其前往罗马进行私人访问时宣布他将谋求成为戴高乐将军的继承人。

1 月 22 日，戴高乐宣布："把我的职责履行到任期结束，是我的义务与意愿"。

2 月 2 日，34 位大学生因为占领大学校长办公场所被勒令停学一年。蓬皮杜在瑞士的电

视上表示:“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我可能将拥有一种代表国家的命运”。

4月27日,就参议院和地区化事宜进行公民投票,52%的选民投了反对票。

4月28日,戴高乐辞职。

4月29日,波埃代理总统一职,蓬皮杜宣布参加竞选总统。

5月31日,第一轮总统选举:蓬皮杜获得44.46%的选票,波埃获得23.30%的选票,杜克洛获得21.27%的选票。

6月15日,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蓬皮杜以获得58.21%的选票当选为总统。法郎贬值。

普列松上演拉辛的《贝雷尼斯》;科斯塔-加夫拉斯:《Z》;罗梅尔:《我在穆德家的夜晚》。

1970年

1月19日,在南泰尔大学和桑西埃的中心发生骚乱。

1月23日,作家欧仁·尤内斯库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2月2—21日,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出现令人惊讶的地区性罢工,罢工涉及的地区从2月18日起扩大。

2月4—8日,法共第19次代表大会;罗热·加罗迪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2月20日,巴黎地区高速铁路网的第一条线路,即从星形广场到拉德芳斯新区的线路投入营运。

1169

2月23日—3月3日,蓬皮杜以总统身份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3 月 2—3 日，在南泰尔大学内发生激烈的骚动，一百多人受伤。

3 月 8—15 日，由保卫共和联盟和独立共和党组成的多数派在市镇选举中获胜。

3 月 12 日，首台燃汽轮机列车在巴黎至卡昂城的线路上投入使用。

3 月 16 日—4 月 24 日，南泰尔文学院和法学院的院长保尔·利科尔、让-玛丽·维尔迪埃先后辞职。

3 月 17 日，历史学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杰罗姆·卡科皮诺去世。

3 月 27 日，关于雷诺工厂工人工资月薪化的协定。

4 月 29 日，女生被允许到综合工科学校就读。

4 月 30 日—6 月 4 日，议会通过暴力破坏惩治法。

5 月 20 日，罗热·加罗迪被开除出法共。

5 月 23 日，法学家、前司法部长勒内·加比唐去世。

5 月 27 日，“无产阶级左翼”被解散。

6 月 19 日，导演雅各·埃贝托去世。

6 月 21 和 28 日，在南锡举行补充选举，让-雅克·塞尔旺-施莱贝尔在选举中领先于的罗热·苏夏尔。

7 月 9 日，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与工会就终身职业培训问题达成协议。

9 月 1 日，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去世。

9 月 20 日，波尔多举行补充选举，雅克·沙邦-戴尔马在第一轮选举中以获得 63.55% 选

票，击败了只获得16.59%选票的让－雅克·塞尔旺－施莱贝尔。

10月6—13日，乔治·蓬皮杜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

10月9日，作家让·季奥诺、路易·巴斯德－瓦莱里·拉多教授、国务部长埃德蒙·米什莱去世。

10月10日，前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去世。

10月23日，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总统铁托元帅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11月9日，戴高乐将军去世。

11月12日，戴高乐将军下葬于科隆贝－双教堂，举国哀悼。

12月11日，雷诺汽车公司的54.2万份股份在其4.56万名领取工资者中分配。

12月12日，法国的“佩奥勒”号卫星发射。

12月19日，医疗改革方案最终通过。

克洛德·西蒙：《法尔萨尔战役》、《盲目的奥里翁》；阿兰·罗伯－格里耶：《为在纽约的一场革命而制订的计划》；让·季奥诺：《苏斯的蓝蝴蝶花》；罗兰·巴特：《符号帝国》；勒克莱齐奥：《战争》；朱利安·格拉克：《半岛》。

1971年

1月7日，设立环境部长职位。

1月27日，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改制为“独立的企业”。

2月3—12日，蓬皮杜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法语国家进行正式访问。

3月14—21日，市镇选举。

4月11日，作家安德烈·比利与画家马塞尔·格罗梅尔去世。

4月22日，雅克·沙邦－戴尔马总理访问贝尔格莱德。

6月3日，朱利安·格林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8月5日与9月9日至10月15日，内政部与威胁要重新行使罢工权的警察发生严重冲突。

8月18—25日，货币危机：设立双重的汇兑市场。

8月30日，工程师路易·阿尔芒去世。

9月26日，多数派在参议院选举中占上风。

10月25—30日，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11月28日、12月5日和12日，补充选举。

12月23日，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就将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减少1/3签订协议。

克洛德·西蒙：《导体》；安德烈·马尔罗：《被砍伐的橡树林》；罗兰·巴特：《萨德、傅立叶、罗耀拉》；米歇尔·比托尔：《他在哪儿?》。 1170

1972年

1月3日、10日、14日、15日和2月7日，一些犯人在监狱里进行反抗斗争。

1月19日，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就纳税问题发表声明；政治与税收危机（对投资性企业的减税法问题）。

2月25日和3月4日，皮埃尔·欧韦尔纳被人射杀和埋葬。

3月15日，法国天主教工人青年会的创办者

乔治·盖兰神甫去世。

4月23日，就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全民投票，67.7%的选民赞成，32.3%的选民反对。

5月15—19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巴黎进行正式访问。

6月9日，乔治·蓬皮杜在里昂为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揭幕。

6月18日，在科隆贝-双教堂的夏尔·戴高乐的纪念碑落成。

6月27日和7月9日，法共与社会党的《共同执政纲领》订立并得到批准。

7月5日，雅克·沙邦-戴尔马总理辞职。

1972年7月5日至1974年5月27日，皮埃尔·梅斯梅尔担任总理（其首届内阁的任期是1972年7月7日至1973年3月28日）。

8月14日和9月21日，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于勒·罗曼和亨利·德·蒙泰朗去世。

10月8日，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埃塔”遭禁。

1973年 1月12—13日，蓬皮杜与勃列日涅夫在明斯克会晤。

2月9日，与东德建立外交关系。

2月15日，阿希尔·利埃纳尔枢机主教去世。

3月4—11日，立法选举：多数派战胜了少数派，其议席分别是273席和176席。

3月18日，罗兰·多热莱斯去世。

3月28日，皮埃尔·梅斯梅尔总理辞职。

4月2日，埃德加·富尔当选为众议院议长。

4 月 5 日—1974 年 2 月 27 日，第二届梅斯梅尔内阁。

4 月 8 日，毕加索去世。

4 月 29 日，雅克·马利坦去世。

5 月 24 日，人种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入选法兰西学士院。

5 月 31 日—6 月 1 日，蓬皮杜与尼克松在雷克雅未克会晤。

6 月 4 日，法国与马尔加什签订协议，规定法国军队最晚在 9 月 1 日前全部撤离马尔加什。

6 月 26—27 日，蓬皮杜与勃列日涅夫在朗布依埃会晤。

6 月 28 日，共产主义联盟与"新秩序"被解散。

9 月 23—30 日，区级选举，左派加大了竞选力度。

10 月 18 日，作家让·德·奥尔梅松入选法兰西学士院。

10 月 22—25 日，胡安·卡洛斯王子正式访问法国。

12 月 5 日，政府提出对付通货膨胀的计划。

克洛德·西蒙：《三联画板》；雅克·德里达：《无意义论述的考古学》；米歇尔·比托尔：《间隔》、《声誉 III》；路易·马勒：《拉孔勃·吕西安》。

1974 年

1 月 19 日，确定为期半年的法郎汇兑价格浮动期。

1 月 24 日，蓬皮杜在普瓦提埃宣布为期两年的能源计划。

1月30日，当局解散巴斯克、布列塔尼和科西嘉的自治主义者的组织。

2月27日，皮埃尔·梅斯梅尔总理辞职。

3月2日—5月27日，第三届梅斯梅尔内阁。

3月8日，戴高乐机场举行落成仪式，该机场于3月14日启用。

4月2日，蓬皮杜总统去世。

4月2日—5月27日，阿兰·波埃代理总统。

1974年4月21日—1977年1月30日，弗朗索瓦兹·克劳斯特尔在蒂贝斯蒂被囚禁。

5月5—19日，第二轮总统选举，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以获得50.81%选票，击败对手弗朗索瓦·密特朗，后者的得票率为49.19%。

1171

5月20日，让·达尼埃鲁枢机主教去世。

5月27日，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总统任期开始。

5月27日—1976年8月25日，雅克·希拉克担任总理。

6月12日，部长会议通过经济降温计划。

7月16日，雅克·希拉克内阁首次改组。设立负责妇女事务的国务秘书。

7月22日，雅克·希拉克内阁第二次改组。

9月4日，剧作家马塞尔·阿沙尔去世。

9月10日，200名被派往德拉基尼昂的士兵发表宣言。

9月17日，画家安德烈·迪诺瓦耶·德·塞贡扎克去世。

9月22日，参议院选举：左翼反对派获胜。

	9月29日和10月6日，议会补充选举。
	10月29日，雅克·希拉克内阁第三次改组。
	11月29日和12月15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先后投票通过《流产法》。
	12月5日，吉斯卡尔·德斯坦与勃列日涅夫在朗布伊埃会晤。
	12月14—16日，吉斯卡尔·德斯坦与美国总统福特在马提尼克会晤。
	12月18日，《流产法》开始生效。
	12月22日，就科摩罗独立举行全民投票（赞成者占95%）。
	雅克·德里达:《丧钟》；罗兰·迪比亚尔:《一位吸烟者的忏悔》（新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虔诚的回忆》。
1975年	1月6日，接替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七家公司投入运营。
	1月27—28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巴黎进行正式访问。
	1月31日，雅克·希拉克内阁第四次改组。
	4月10日，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法国总统第一次访问该国）。
	4月25日，法共党员雅克·杜克洛去世。
	5月12—16日，中国政府副总理邓小平在巴黎进行正式访问。
	7月6日，科摩罗群岛宣布独立：马约特岛的当选者表示拒绝。
	8月4日，前法国总工会总书记贝努瓦·弗拉商去世。

8月6日，出版业的工人举行罢工。
8月22日，两名宪兵在阿莱里阿被人暗杀，凶手是一名属于“为争取承认科西嘉独立而行动”组织的主张科西嘉独立的别动队队员。
8月27日，“为争取承认科西嘉独立而行动”组织被解散。
9月4日，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提出耗资305亿法郎的经济扶持计划，该计划先后于11日和12日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投票通过。
9月20日，诗人和外交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圣琼－佩斯去世。
9月30日，左翼激进运动主席罗贝尔·法布尔在爱丽舍宫受到接见。
10月3日，前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去世。
10月17日，国民议会投票通过地产改革。
11月15—17日，六大强国为确定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而在朗布伊埃举行会议：关于稳定汇率的协议。
11月27日—12月8日，对“士兵委员会”提起诉讼。
12月25日，出版商加斯东·伽利玛去世。
皮埃尔－贾克·埃利阿斯：《骄傲的马》；艾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厨娘与食人者》；米歇尔·福柯：《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埃尔维·巴赞：《前夫人》；米歇尔·比托尔：《梦的内容》。

1976年　1月11日，赋予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列奥尼德·普列欧切特齐避难权。枢机主教弗朗索

瓦·马尔蒂谴责法国的军火贸易。 1172

1月12日，雅克·希拉克内阁第五次改组。

1月21日，协和飞机首次商业飞行，其航线是巴黎—里约热内卢和伦敦—巴林。

2月4—8日，法共在圣乌昂召开第22次代表大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2月8日，就继续让马约特岛留在法国举行全民投票（赞成者占99.4%）。

3月7—14日，市镇选举：右翼反对派取得进展。

3月24日，雅克·希拉克被吉斯卡尔·德斯坦任命为多数派的协调者。

5月9日，图尔举行立法选举：57%的选民支持让·罗瓦耶（多数派及许多其他的派别）。

5月22日，民主主义中心与民主进步中心合并成为一个由让·勒卡努埃领导的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心。

5月24日，协和飞机首次在巴黎至华盛顿的航线上飞行。

5月31日，生物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雅克·莫诺去世。

6月23日和7月10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先后投票通过关于增值的法案。

7月23日，保尔·莫朗去世。

8月25日，雅克·希拉克总理辞职，雷蒙·巴尔被任命为总理。

8月27日—1977年3月28日，首届雷蒙·巴尔内阁。

9月22日，雷蒙·巴尔提出反通货膨胀的计

划公布。

10 月 11 日，吉斯卡尔·德斯坦所著的《法兰西民主》上柜销售。

10 月 25 日，作家雷蒙·格诺去世。

11 月 14—21 日，议会补充选举：多数派失去两个议席。

11 月 23 日，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去世。

12 月 5 日，雅克·希拉克组建保卫共和联盟（R. P. R.）。

12 月 24 日，前部长、来自厄尔省的议员让·德·布罗伊被暗杀。

米歇尔·福柯：《求知的愿望》；米歇尔·比托尔：《第二地下室》、《声望 III》；阿兰·罗伯-格里耶：《一个幽灵城市的拓扑学》；阿兰·雷奈：《神意》。

1977 年

1 月 28 日和 31 日，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相继出席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宫和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落成典礼。

1 月 30 日，皮埃尔·克劳斯特尔与弗朗索瓦兹·克劳斯特尔被图布人释放。

2 月 27 日，巴黎的圣尼古拉-迪-夏尔多内教堂被主张完全保存天主教传统的马塞尔·勒费弗尔主教大人的友人们占领。

3 月 13—20 日，市镇选举，左翼反对派占上风。

3 月 25 日，雅克·希拉克当选为巴黎市长。

3 月 28 日，雷蒙·巴尔总理辞职。

3 月 30 日到 9 月 26 日，第二届雷蒙·巴尔内阁。

5 月 8 日，全民投票批准了法属阿法尔和伊沙斯的独立（投赞成票者占 98.79%）。

5 月 10 日，左翼共同纲领估算出来的支持率在《人道报》上公布，股价大跌。

5 月 19 日，独立共和党在弗雷瑞斯改换门庭为共和党。

5 月 23 日，雷蒙·巴尔政府成功地发行了可筹资 60 亿到 80 亿法郎的公债。

6 月 13 日，企业与工会就私营企业职工年满 60 岁时能在享受退休金的情况下提前退休达成协议。

6 月 20—21 日，勃列日涅夫在巴黎进行正式访问。

6 月 27 日，法属阿法尔与伊沙斯获得独立并建立吉布提共和国。

7 月 6 日，青年就业法的合宪法性得到宪法委员会的承认。

7 月 8 日，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卡邦特拉就多数派必不可少的联合发表演说。

7 月 13 日，部长会议通过环境宪章。

7 月 15 日，科西嘉发生第一次“恐怖事件此起彼伏的夜晚”（有 20 人遇害）。

9 月 14 日，左翼联盟高层会议因国有化问题不欢而散。

9 月 23 日，左翼联盟破裂。

9 月 25 日，参议院选举，左翼党派取得相对的成功。

9 月 26 日—1978 年 3 月 30 日，第三届雷蒙·巴尔内阁。

10 月 6 日，议会通过了关于信息和自由的法律。

11 月 22 日，协和飞机首次在巴黎—纽约的航线上进行定期地航行。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思想大师》；雷蒙·阿隆：《为衰落的欧洲而辩》；贝尔纳－亨利·莱维：《人面兽行》；菲利普·阿里埃斯：《面对死亡的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北方的档案》。

1978 年

1 月 4—6 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巴黎进行正式访问。

1 月 14—23 日，雷蒙·巴尔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1 月 27 日，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杜河河畔凡尔登发表的演说中阐明了法国应采取的“明智选择”。

2 月 3 日，由共和党、社会民主人士中心和激进党联合而成的法国民主联盟成立。

2 月 22 日，太阳能委员会设立。

3 月 12 与 19 日，立法选举：多数派以 291 席对 200 席击败反对派。

3 月 16 日，利比里亚的油轮“阿莫科·卡迪克斯”号失事，布列塔尼西北沿岸长达一百多公里的区域被污染。

3 月 30 日，雷蒙·巴尔总理辞职。

4 月 3 日，保卫共和联盟的雅克·沙邦－戴尔马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

4 月 5 日—9 月 11 日，第四届雷蒙·巴尔政府。

5月19日—6月7日，为解救在第二次沙巴战争中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法国侨民，法国伞兵部队在扎伊尔的科卢韦奇采取行动。

6月5日，法、美、英、联邦德国和比利时五国就非洲的动乱在巴黎开会。

7月3日，科西嘉发生第二次“恐怖事件此起彼伏的夜晚”。

7月16—17日，第四次七国（美、英、法、日、意、加、西德）峰会在波恩召开，并签订关于重振经济与反对恐怖主义同盟的协定。

7月19—20日，吉斯卡尔·德斯坦首次对葡萄牙进行正式访问。

8月12日，自1793年以来首次放开面包的价格。

9月11日，第五届雷蒙·巴尔政府。

10月6日—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居住在伊夫林省的诺弗勒－勒－夏托。

10月10日，国民议会以276票对200票通过关于钢铁业的计划。

11月29日，让·弗朗索瓦－蓬塞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取代路易·德·吉兰戈。

12月6日，希拉克在科尚发表呼吁书，谴责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欧洲政策。

12月19日，为反对钢铁工业进行大规模的解雇，隆威发生全城罢工。

米歇尔·比托尔：《自食其果三》。阿兰·罗伯－格里耶：《金三角的回忆》、《弑君者》。罗歇·卡洛瓦：《阿尔菲河》。勒内·吉拉尔：《世界创建以来被隐藏的事物》。雅克·勒高

夫:《新史学》。

1979 年

1 月 1 日，开始征收增值税。

1 月 5—6 日，吉斯卡尔·德斯坦、吉米·卡特、詹姆斯·卡拉汉与赫尔穆特·施密特在瓜特罗普举行会晤。

1 月 24 日，法国重新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

1 月 24 与 26 日、2 月 6、9、21 和 24 日，取消自 1936 年以来赋予西班牙共和派分子的难民身份。

3 月 8 日与 23 日、5 月 18 日，冶金工人为反对解雇在不少地方举行示威游行。

3 月 10 日，科西嘉发生第三次“恐怖事件此起彼伏的夜晚”(发生 31 起凶杀案)。

1174

3 月 12—14 日，九个欧洲国家在巴黎举行会议，确定了建立在欧洲货币单位（每个单位相当于 5.79831 法郎）基础上的欧洲货币体系。

3 月 14—16 日，议会特别会议。

3 月 16 日，社会党梅斯代表大会。

5 月 2 日和 31 日，在巴黎发生两次由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制造的“恐怖事件此起彼伏的夜晚”(分别出现 33 和 22 起凶杀案)。

5 月 7 日，科西嘉发生第四次“恐怖事件此起彼伏的夜晚”(发生 33 起凶杀案)。

5 月 9—13 日，法共圣乌昂代表大会。

6 月 5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问巴黎。

6 月 7 日和 10 日，欧洲九国共同体举行首次普遍选举（选举斯特拉斯堡议会议员）。

6月16日，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在巴黎和科西嘉制造凶杀案。

6月19日，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提出对付危机的计划。

6月21和22日，欧洲九国共同体就能源问题在斯特拉斯堡召开峰会。

7月4日，内阁改组，雅克·巴罗和让·法尔热分别被任命为卫生部长和社会保障部长，以接替辞职的西蒙娜·维尔。

7月7日，第一艘有核动力推进装置的进攻型潜水艇普罗旺斯号下水。

7月17日，西蒙娜·维尔当选为欧洲议会议长，她在第二轮选举中获得了377票中的192票。

8月18日，已改名为“挪威”号的“法兰西”号邮轮从勒阿弗尔起航前往联邦德国的不来梅港。

9月4日，巴黎市长希拉克出席巴黎中央菜市场改造工程落成仪式。

9月20日，法共与社会党1978年以来的首次高层会晤无果而终。

9月26日，七大工业强国在巴黎举行关于节约能源问题的会议。

10月18日，由于法共、社会党和保卫共和联盟议员的反对，关于收入税的新的计算表未被国民议会通过。

10月23日，医生首次举行全国性的罢工。

12月20日，由于反对派的支持，议会最终投票通过了正式实施1975年堕胎法的法案。

12 月 24 日，1980 年的财政法被宪法委员会废除。

1979 年 12 月 27—28 日至 1980 年 1 月，议会为投票通过新的财政法举行特别会议。

1980 年

1 月 13 日，社会党通过了为 80 年代制订的“社会主义规划”。

5 月 30 日—6 月 2 日，教皇让－保罗二世的法国之行（访问的城市为巴黎与里齐耶）。

6 月 7—8 日，通过了新的激进宣言。

6 月 26 日，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举行其任期内的第九次记者招待会，宣布在 1982 年将有一颗可快速移动的战略导弹投入使用，以及开始研制中子弹。

9 月 4 日，法国民主工联的总书记埃德蒙·迈尔揭露“法国总工会与共产党宗派主义的孤立政策完全保持一致”。

9 月 13 日，法国总工会的总书记乔治·塞居伊揭露法国民主工联在“重新制定政策”时“该全面否定的状况”。

10 月 3 日，一颗炸弹在巴黎哥白尼街的犹太教堂前爆炸。

10 月 19 日，米歇尔·罗卡尔成为社会党竞选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的候选人”。

11 月 8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成为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

11 月 20 日，乔治·马歇提出由 131 点组成的“斗争计划”。

11 月 23—30 日，国民议会补缺选举（补选 7 名议员）。社会党与保卫共和联盟获得双重胜

利。法国民主联盟遭受失败。

12月18、19日，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先后通过《安全与自由》法案。

1981年

1月23日，教皇让－保罗二世与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梵蒂冈举行会谈。 1175

2月12日，科西嘉出现“恐怖事件此起彼伏的夜晚”，主张科西嘉自治者在此夜制造了多达46起凶杀事件。

2月27日，让－玛丽·吕斯坦热接替弗朗索瓦·马尔蒂担任巴黎总主教。

3月2日，在职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谋求连任。

3月28日，快帆喷气式飞机在法航相关航线上飞行22年后停飞。

4月9日，总统选举竞选活动正式开始，10位候选人参与角逐。

4月26日，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吉斯卡尔·德斯坦与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先，其分别获得了28.32%和25.85%的选票。

5月5日，吉斯卡尔·德斯坦与弗朗索瓦·密特朗举行电视辩论。

5月10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其获得了51.75%的选票，而吉斯卡尔·德斯坦只获得了48.25%的选票。

5月11日，巴黎证券交易所出现恐慌，为此连续停牌两天。

5月13日，雷蒙·巴尔总理辞职。

5月21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就任共和国总统。

5月22日—6月22日，社会党的皮埃尔·莫罗瓦担任总理。

1981年6月23日—1982年6月29日，第二届皮埃尔·莫罗瓦内阁。

1981年6月23日—1984年7月17日，有4名法共成员在皮埃尔·莫罗瓦为首的第二届至第五届左翼联合政府中出任部长。

1981年7月2日—1986年2月28日，第五共和国第七届国民议会。

7月7日，斯特拉斯堡成为欧洲议会所有全体会议的所在地。

7月14日—11月7日，有6510名囚犯因总统特赦获释。

7月29日，就《取消国家安全法庭法案》进行表决。

8月5日，关于赦免1981年5月10日前的违法者的法律。

9月12日，国民议会就权力下放法案第二部分的内容进行表决。

9月18日和20日，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分别以363票对127票、160票对126票通过废除死刑法案。

9月22日，往返于巴黎和里昂的高速列车在试运行了27次之后正式投入营运。

9月24日，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首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9月30日，购买黄金实行实名制。

10月4日，布鲁塞尔：法郎首次贬值（贬值3%），马克升值（升值5%）。

10 月 26 日与 12 月 18 日，国民议会就国有化法案进行表决。

11 月 7 日，新喀里多尼亚首府努美阿发生骚乱。

11 月 23 日，国有化法案在参议院表决时以 184 票对 109 票被否决。

11 月 25 日，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废除暴力破坏惩治法。

12 月 11 日，国民议会授权政府制定涉及社会事务的法令。

1981 年 12 月 15 日—1986 年 12 月 16 日，伊冯·加塔兹接替弗朗索瓦·塞拉克担任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会长。

1982 年

1 月 17 日，国民议会补缺选举，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的 4 名候选人当选。

1 月 23 日与 2 月 5 日，法国先后在巴黎与阿尔及尔分别与苏联、阿尔及利亚签订了关于苏联、阿尔及利亚向法国输送天然气的协定。

1 月 26 日，国民议会一读通过关于处理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关系的“基里奥法”。

2 月 1 日，设立第五个带薪休假周和 39 小时工作周（1 月 13 日部长会议的决定），并规定工资不得因此而减少（总统在 2 月 10 日作出的决定）。

2 月 11 日，宪法委员会批准了国有化法案。

3 月 2 日，关于赋予科西嘉特殊地位的法律。

3 月 3 日，《市镇、省与大区的权利与自由法》颁布。 1176

3 月 14 日与 21 日，在区级选举中，反对派以获得 49.92% 的选票略占上风（其对手只获得

了49.59%的选票）。

3月24日，在省级议会议长的选举中，作为反对派的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以59比36击败了左翼联盟。

3月25日，部长会议通过了7项社会法令。

6月4日—6日，几大工业国在凡尔赛举行第八次峰会。

6月9日，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第二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6月12日，布鲁塞尔：法郎再次贬值（贬值5.75%），马克再次升值（升值4.25%）。

6月29日—12月8日，第三届皮埃尔·莫罗瓦（社会党）内阁。

7月13日，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新的市镇选举法，并对巴黎、里昂、马赛做出了专门的规定。

7月21日，通过了一项与社会保障相关的经济计划。

7月22日，在努美阿召开的新喀里多尼亚领地议会遭到反独立分子的冲击。

7月24日，国民议会废除了《安全与自由法》。

7月28日，公民行动党（S. A. C.）解散。

8月4日—10月28日—11月13日—12月18日，关于工人在企业中的自由的“奥鲁法”。

8月8日，巴黎罗西埃街发生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在Jo Goldenberg饭店的顾客中，有6人死亡，22人受伤。

8月18日，“直接行动运动”根据部长会议

的决定被宣布解散。

8 月 21 日—9 月 13 日，多国干涉部队中的法国分遣队首次驻扎在贝鲁特。

8 月 31 日，设立以米歇尔·戈塔为首（其任职期限为 1982 年 8 月 31 日至 1986 年 9 月 9 日）的新闻媒体最高委员会。

1982 年 9 月 24 日—1984 年 3 月 31 日，多国干涉部队中的法国分遣队第二次驻扎在贝鲁特。

9 月 29 日，部长会议通过了贝雷戈瓦计划：在公务员的薪金中扣除 1% 作为失业金。

11 月 23 日，由政府出面向议会提出赦免秘密军队组织“O. A. S.”中的法国将领。

12 月 8 日，选举劳资调解委员会成员，总工会的力量有所消退，而具有改良主义色彩的联合会的力量压则有所增强。

1982 年 12 月 8 日—1983 年 3 月 22 日，第四届皮埃尔·莫罗瓦（社会党）内阁。

1983 年

1 月 5 日，巴黎总主教吕斯坦热与耶稣会神甫亨利·德·吕巴克晋升为红衣主教。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在科西嘉制造了多起谋杀案后被取缔。

2 月 14 日—5 月 20 日，医学专业的大学生罢课，反对医学教学方面的改革。

1983 年 3 月 4 日—1986 年 3 月 4 日，达尼埃尔·梅耶担任宪法委员会主席。

3 月 6 日与 13 日，举行市镇选举，作为反对派的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获胜。

3 月 21 日，法郎第三次贬值（贬值 2.5%），

马克再次升值（升值5.5%）。

1983年3月22日—1984年7月17日，第五届皮埃尔·莫罗瓦（社会党）内阁（3月24日最终完成组阁）。

3月25日，第二项紧缩计划。根据在同年4月29日和5月1日与11日颁布的3项条例，在3年里强制公债增加10%，1982年的可征税收入提取1%。

4月1日，实行60岁退休制。

4月5日，47名苏联外交馆因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被法方驱逐出境。

5月5、11、24日，维持秩序的部队与反对高等教育改革的示威游行者发生冲突。

5月31日，通过最终废除《安全与自由法》。

6月27日，最终通过关于1984—1988年军事规划以及修改国家兵役法典的法律。

1983年8月9—10日至1984年11月10日，在乍得实施“芒塔”行动。

8月14—15日，教皇让-保罗二世访问卢尔德。

9月25日，参议院选举，作为反对派的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获胜，其在参议院的席位增加了12个。

10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医院改革的法案。

1177

10月15日—12月3日，许多青年人为反对种族主义举行从马赛到巴黎的行进活动，有6万人到达首都。

10月22日，8万名主张教育自由者在南特举

行示威游行。

10月23日，58名法军士兵和239名美军士兵在贝鲁特发生的两起自杀式汽车爆炸事件中丧生。

12月1日，社会党与法共举行高层会晤，就双方遵守1981年6月23日签订的执政协定的情况进行核实。

12月21日，就高等教育方向法案进行最终表决。

1984年

1月22日、29日和3月4日，主张办私立学校的人士先后在波尔多、里昂和凡尔赛举行示威游行，其参加者分别为6万、15万、70万。

3月1—28日，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法国西南地区的法国人之间出现流血，甚至是凶杀事件。

3月12日，A320空中客车飞机（150个座位）正式投入使用。

3月25—31日，驻贝鲁特多国部队中的法军官兵撤离贝鲁特。

3月28日，政府公布“强硬计划”，在3年内取消2万个以上的职位。

4月1日，弗朗索瓦·密特朗第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4月25日，15万支持世俗教育者在巴黎举行示威游行。

6月17日，反对派在欧洲议会选举获胜，其得票率为43%，而社会党与法共的得票率则分别为21%、11%。

6月24日，150万私立学校的支持者在巴黎巴士底广场举行示威游行。

6月27日，科西嘉地区议会解散。

7月6日，弗朗索瓦·密特朗与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夏马利埃举行会晤。

7月12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计划就公共自由以及撤销萨瓦里教育法案举行公民投票。

7月16日，国民教育部长阿兰·萨瓦里辞职。

7月17日，皮埃尔·莫罗瓦总理辞职。社会党人洛朗·法比尤斯被任命为总理。法共拒绝加入政府，左翼联盟宣告终结。

7月19日，皮埃尔·贝雷戈瓦取代雅克·德洛尔就任经济、财政与预算部长，后者将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

7月24日，皮埃尔·弗里姆兰当选为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议长。

8月4日，阿里亚娜三号火箭在法属圭亚那的库鲁发射成功。

8月8日和9月5日，参议院否决了关于修改宪法第11款的法案（7月12日提交讨论）。

8月12日，第二届科西嘉地区议会选举：作为反对派的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以及国民阵线获得胜利。

9月17日，法国与利比亚签订从乍得撤军的协定。

9月23日，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多姆山省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其得票率高达63.25%。

10月11日，宪法委员会驳回了带有追溯既往

特征的新闻出版法的条款。
10 月 19 日，国民议会取消了 1973 年发行的利率为 7% 的公债，即与黄金挂钩的“吉斯卡尔公债”的税务优惠。
11 月 15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与卡扎菲上校在克里特岛的埃卢达举行会晤。
11 月 18 日，新喀里多尼亚领地议会选举：反对独立的一派获胜（获得 70.87% 的选票）；主张独立的一派拒绝承认其代表性。
1984 年 11 月 22 日—1985 年 5 月 21 日，在新喀里多尼亚，主张独立的一派与反对独立的一派之间发生冲突，其中包括多起流血冲突。
1984 年 12 月 1 日—1985 年 5 月 21 日，埃德加·皮萨尼出任新喀里多尼亚的政府代表。
1984 年 12 月 7 日—1985 年 9 月 20 日，第二届洛朗·法比尤斯内阁。

1985 年

1 月 1 日，雅克·德洛尔就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一职，首次会议于 1 月 7 日召开。
1 月 7 日，关于解决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的皮萨尼计划。 1178
1 月 12 日—6 月 30 日，新喀里多尼亚实行紧急状态。
3 月 10 日与 17 日，由组成反对派的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以及国民阵线，在区级选举中战胜左翼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双方的得票率分别为 59% 和 41%。
4 月 2 日，农业部长米歇尔·罗卡尔因反对选举方式的改革而辞职。
4 月 10 日，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签

订协定，其中提到，“为了能在1986年取得执政地位，只有结成一体”。

5月21日—11月13日，埃德加·皮萨尼担任负责新喀里多尼亚事务的部长。

5月25日，法国的第六艘核潜艇“刚毅号”开始服役。

6月8日、9日，自由派在巴黎举行大会，自1981年以来，反对派的“三位骑士”，即希拉克、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巴尔，首次汇聚一堂。

7月10日，反对进行核试验的绿色和平运动的船只“彩虹勇士号”在奥克兰港口因遭到破坏而沉没。

7月25日，最终通过因经济原因被解雇可获得一定假期寻找新的工作的法案。

8月24日，关于新喀里多尼亚地位（独特行政区）的新法律颁布。

9月20日，国防部长夏尔·埃尼辞职。

1985年9月20日—1986年3月20日，第三届洛朗·法比尤斯内阁：保尔·基莱担任国防部长。

9月29日，新喀里多尼亚首次举行行政区选举，反对独立的一派获得了60.84%的选票。

10月11—13日，社会党在图卢兹召开代表大会。

10月18日，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签订选举协定，内容包括45个省的共同选举名单。

10月20日，通过法令宣布成立人口与家庭事

务高级委员会。
10 月 21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第四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10 月 27 日，洛朗·法比尤斯与希拉克进行电视辩论。
12 月 20 日，最终投票通过禁止兼任两个以上选举产生的职务的法律。

1986 年

1 月 20 日，法国与英国在里尔签订关于在芒什海峡建造两条海底铁路隧道的协定，该隧道计划在 1993 年投入使用。
1 月 24 日，雷蒙·巴尔在电视三台的节目中重申反对（左右）“共治”。
2 月 12 日，在利比亚于 2 月 10 日进行干预后，法国军队返回乍得。
2 月 16 日，在乍得开始展开“雄鹰”行动。
2 月 19 日，罗贝尔·巴丹泰被任命为宪法委员会主席（3 月 4 日正式就任）。
2 月 28 日，最终通过了关于整治工作时间的法律。
2 月 28 日，第五共和国第七届国民议会最后一次会议。
3 月 16 日，立法选举：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以及与它们结盟的党派共获得了 291 席，与它们相对的社会党和法共则分别获得了 216 席和 35 席位。此外，国民阵线亦获得了 35 席。
3 月 20 日，洛朗·法比尤斯总理（社会党人）辞职，雅克·希拉克被任命为总理。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发生炸弹谋杀案。

3月21日，在大区议会议长的选举中，新多数派在20个大区获胜，而左派只在两个大区获胜。

3月22日，（左右）“共治”时期首次部长会议举行。

4月2日，雅克·沙邦-戴尔马就任国民议会议长。

4月9日，雅克·希拉克所提出的总体政策以292票对285票获得通过。

4月22日，让-皮埃尔·舍韦内芒推行的中学改革被勒内·莫诺里废除。

4月28日，勒内·莫诺里取消招募中学教育教师。

5月4—6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密特朗与希拉克共同出席此会。

5月15日，储蓄存款利率下调1.5%。

5月22日，黄金交易停止实行实名制。

1179

6月2日，宪法委员会赞同授权政府颁布严格保留解释权的社会经济条例的法律。

7月1日，菲利普·塞甘提出关于社会保障的财政计划。

7月3日，关于辞退无须经由行政部门批准的法律。

7月12日—1987年1月31日，以优惠政策鼓励非法流出国外的资本重新转移回国。

7月16日，反对私有化法令的密特朗签署了《青年（未满25岁者）就业法令》。

8月7日，《公报》公布了对65家企业实行私有化的法律（7月31日投票通过）。

8月19日，《公报》公布了关于为退休金与抚恤金筹集资金的法律，其内容包括对1985年和1986年的收入各提取0.4%。

8月24日与9月28日，根据宪法委员会7月8日所作的决定，先后在曾出现选举舞弊行为的上科西嘉和上加龙重新选举国民议会议员。

9月3日，宪法委员会批准针对对恐怖主义的特别条例。

9月18日，宪法委员会批准8月13日通过的关于广播电视管理的雷奥塔尔法。

11月13日，原负责全国广播电视管理的机构被通讯与自由全国委员会所取代，后者的主席为加布里埃尔·德·布罗伊。

11月17日，雷诺企业的董事长乔治·贝斯被"直接行动"组织杀害。

11月17日—12月10日，因反对阿兰·德瓦凯提出的大学改革法案，在一些大中学生中出现骚动。

11月18日，宪法委员会批准10月23日通过的关于重新划分选区的法律。

11月24日—12月12日，对圣戈班企业实行私有化。

11月28日，对媒体的集中化程度予以限制的雷奥塔尔法在《公报》上公布。

12月1日，主要收藏19世纪艺术作品的奥赛博物馆正式开放。

12月5—6日（之夜），参与游行示威的大学生马里克·乌塞吉纳在巴黎身亡。

12月6日，负责科研与高等教育的部长级代

表阿兰·德瓦凯辞职。

12 月 8 日（1986 年）—1987 年 1 月 15 日，在商船上和公共运输部门中出现社会冲突。

12 月 16 日，弗朗索瓦·佩里戈取代伊冯·加塔兹出任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主席。

12 月 20 日（1986 年）—1987 年 6 月 27 日，议会就工作时间的管理、调整进行辩论。

1987 年

1 月 1 日，在 1986 年 11 月 26 日得到国民议会批准的《单一欧洲法令》，以及在 10 月 26 日颁布的废除物价管制、放松汇兑限制的法令开始生效

1 月 2 日至 8 月 8 日，依靠法国在后勤方面提供的支持，希塞纳·阿布雷领导的派别重新占领了乍得从法达到奥祖之间的地区。

1 月 8 日，人权咨询委员会设立。

1 月 12 日，在布鲁塞尔重新调整欧洲货币蛇形浮动体系内的平价。

1 月 19—31 日，巴黎巴银行实行私有化。

1 月 20 日，内阁进行改组，雅克·瓦拉德（来自保卫共和联盟）出任负责科研与高等教育的部长级代表。

1 月 21 日，科西嘉争取自治运动的组织被解散。

2 月 13 日，空中客车 A320 在图卢兹起飞。

2 月 21 日，“直接行动”组织 4 名曾起过重要作用的首领在卢瓦雷的维特里 - 奥 - 洛热被逮捕。

2 月 23—28 日，乔治·易卜拉辛·阿布达拉受审，并被判处无期徒刑。

3月11—12日，法国与西班牙在马德里举行首次固定举行的峰会。

3月22日，上科西嘉举行地区选举，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结成的派别获得绝对多数（在61个席位中占据31席）。

4月7日，吉斯卡尔·德斯坦担任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1180

5月7日—7月9日，议会就涉及长期失业及其预防措施的法案展开讨论。

5月11日—7月4日，前纳粹德国党卫队军官克劳斯·巴尔比在里昂受审，并以7项反人类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5月18日，法共的安德烈·拉若瓦尼宣布竞选共和国总统（已在6月13日得到该党批准）。

5月22日，颁布1987—1991年军事规划法，该法在4月10日在国民议会一读通过（539票赞成，35票反对，1票弃权）。

5月29日，增加社会保险金。

6月11日，对金融与流动资产所得收入征收1%例外的社会抽取金。

6月15日—11月25日，召开关于社会保险的全国三级会议。

6月17日，积极反对科西嘉独立的让-保尔·拉费在阿雅克肖遇害。

6月22日—1988年1月7日，共有16名成员的顾问委员会就国籍法典举行会议。

6月29日—11月29日，法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瓦希德·古尔杰被封锁在伊朗

驻巴黎大使馆里。

6 月 30 日，国民议会的专门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对卷入“发展十字路口事件”的前社会党政府合作部长克里斯蒂安·努西提起控诉。

7 月 1 日，取消欧洲补偿金。

7 月 5 日、12 日，格拉斯举行市镇选举，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与国民阵线结成的联盟获胜。

7 月 7 日，对被遣返回国者补偿法。

7 月 8 日，完全取消汇兑控制。

7 月 15 日，取消巴黎证券交易所圆形场地内的交易。

7 月 17 日，古尔杰事件：法国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7 月 19 日，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巴黎批准了关于建设拉芒什海峡海底隧道的协定。由于伊朗在波斯湾布雷，“为捍卫法国的利益”，驻扎在土伦的法国海军航空部队以及“克雷孟梭号”航空母舰开往阿曼海域。

7 月 31 日，《公报》发表相关法律，该项法律对国家公务员举行短期罢工作出了一些限制。

8 月 29 日，社会党的让-皮埃尔·舍韦内芒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候选人。

9 月 2—4 日，密特朗与希拉克共同出席在魁北克召开的法语国家首脑会议。

9 月 3 日，发行年利率超过 10% 的国债。

9 月 13 日，在新喀里多尼亚就其是否仍留在

法国这一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结果 98.3% 的投票者选择仍留在法国。

9 月 17 日，汽车的增值税税率从 33.3% 降为 28%。

9 月 21—24 日，法国与德国首次共同举行代号为“大胆的莫瓦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10 月 5—17 日，苏伊士银行实行私有化。

10 月 19 日，纽约与巴黎证券交易所先后发生危机。

10 月 23 日，塔希提的帕皮提在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时发生骚乱。

11 月 22 日和 29 日，马赛举行区议会补缺选举，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虽遭到国民阵线的反对，仍取得选举胜利。

11 月 25 日，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了新喀里多尼亚新的地位。

11 月 27 日，法国人质让－路易·诺尔芒丹、罗热·奥克在贝鲁特获释。在德黑兰，法国用瓦希德·古尔杰与伊朗交换，换回了法国领事保尔·托里。

12 月 9 日，劳资调解委员选举，45.95% 的人弃权；工会组织“工人力量”开始崭露头角，获得了 20.49% 的选票。

12 月 10 日，参议院将克里斯蒂安·努西退回至高等法庭审讯。

1988 年

1 月 7 日，顾问委员会向雅克·希拉克提交关于国籍法典修改的报告。

1 月 7—9 日，埃里希·昂纳克主席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他是首位访问法国的东德国家

1181

元首。

1月16日，雅克·希拉克在马提尼翁宫宣布竞选共和国总统。

1月18日，偿还1973年发行的年利率为7%的债券，即“吉斯卡尔债券”的余额。

2月8日，雷蒙·巴尔在里昂宣布竞选共和国总统。

2月11—12日，12国在布鲁塞尔签订共同体财政改革协定（对农业方面的支出予以限制）。

2月25日，议会最终表决通过了两项涉及政治生活资金来源的法律。

3月11日，在圭亚那的库鲁用欧洲的阿里亚娜号火箭成功发射了一颗美国通讯卫星（Spacenet III）和一颗法国通讯卫星（Télécom 1 C）。

3月22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在电视二台宣布将竞选连任，这也是他第四次充当总统候选人。

4月7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发表《致所有法国人的信》。

4月21日，在与达索－布雷盖公司以及国营飞机发动机研制公司及斯奈克马签订了两份合同后，“阵风”战斗机项目正式启动。

4月21日—5月5日，有4名宪兵遇害，另有27名宪兵被洛亚尔提群岛的乌维阿岛的一支主张独立的卡纳克突击队扣为人质。

4月24日，首轮总统选举日。巴尔获得了16.54%选票，希拉克获得了19.94%的选票，

密特朗获得了34.09%的选票。国民阵线主席让-玛丽·勒庞在此次选举中大出风头，竟然获得了14.39%的选票。巴尔不久表示支持希拉克竞选总统。

4月24日，在新喀里多尼亚举行地区选举，反对独立的一派获胜，在48个席位中占据了35席。

4月27日，吉斯卡尔·德斯坦表示支持希拉克竞选总统。

4月28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和雅克·希拉克在电视一台与电视二台进行电视辩论。

5月4日，在黎巴嫩的最后3名法国人质：马塞尔·卡尔东、马塞尔·封丹和让-保尔·考夫曼在贝鲁特获释。

5月5日，法国通过使用武力解救了在乌维阿岛被扣留的23名人质。

5月8日，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连任成功。

5月10日，雅克·希拉克总理（来自保卫共和联盟）辞职。

5月10日—1991年5月15日，米歇尔·罗卡尔（来自社会党）担任总理。

5月12—13日，三名反对派成员加入政府。

5月14日，国民议会解散。

5月17日，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共同建立了中派联盟，确定在各选区联合推举候选人。

6月5日和12日，国民议会选举，社会党和与其结盟的党派获得相对多数。

6月14日，米歇尔·罗卡尔总理辞职。

6月23日，米歇尔·罗卡尔（来自社会党）被任命为总理。洛朗·法比尤斯（来自社会党）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法国民主联盟在议会中组成独立中派联盟党团。

6月26日，雅克·拉弗勒尔与让-玛丽·吉巴乌在马提尼翁宫签订关于新喀里多尼亚前途的协定。

6月28—29日，第二届米歇尔·罗卡尔政府。

6月30日，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为法国民主联盟主席。

7月8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大赦法案。

7月14日，弗朗索瓦·密特朗放弃开放政策。

9月8日，保卫共和联盟首次毫无保留地谴责任何与国民阵线结盟的选举联盟。

9月14日，米歇尔·罗卡尔与苏瓦松提出就业计划。

9月21日，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设立一种其所得收入用于失业救济金等开支的财产税，以及设立融入法国社会必须达到的最低收入标准的法案。

9月25日—10月2日，区议会选举，其弃权率创下新的记录，分别为50.87%、53%；左右两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基本平衡，其中右派的得票率50.9%。

10月7日，省议会议长选举，反对派有71人当选，总统所代表的多数派则只有30人当选。

10月8—11日，教皇让-保罗二世第四次前来法国，此次访问的地区是阿尔萨斯-洛林。

11月3日，与艾滋病进行斗争的政府计划。

11月6日，就新喀里多尼亚的前途举行公民投票，63.1%的选民弃权，而在投票者中，79.9%的人对相关法案投了赞成票。

11月17日，政府与工会首次就公共部门从业人员的工资问题达成协定，其有效期为1988、1989年。

11月25日，法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空间合作协定。

11月26日—12月21日，法国宇航员让-卢·克雷蒂安乘坐苏联“联盟号”飞船进行第二次太空飞行。

11月30日，国民议会一致通过了5月18日提交的关于设立融入法国社会必须达到的最低收入标准的法案。

12月19日，标致汽车公司与菲亚特汽车公司在都灵签订关于汽车生产的协定。

1989年

1月1日—12月31日，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仪式。

1月5日，法国民主联盟与保卫共和联盟就市镇选举签订协定。

1月9—14日，“直接行动组织”4名涉嫌在1986年11月17日杀害雷诺汽车公司董事长乔治·贝斯的成员受审。

1月12日，法共与社会党就市镇选举签订协定。

1月13日，颁布编号为89-18的便于雇佣求职人员的法律。

1月17日，颁布1988年12月22日未经辩论

就获通过的编号为 89 – 25 的法律，并以新闻媒体最高委员会取代全国传播与自由委员会。

1 月 29 日，贝尔纳 · 塔皮在罗讷河口省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其接替的是已被取消议员资格，且处于少数派的来自法国民主联盟的居伊 · 泰西埃。

1 月 30 日，在国家元首 1 月 24 日任命的主席雅克 · 布泰的主持下，新闻媒体最高委员会开始履行职责。

2 月 4 日，马克 · 布隆代尔取代安德烈 · 贝热隆担任工会组织“工人力量”总书记。

2 月 6 日，监狱管理人员举行罢工。

2 月 27 日，政府与工会组织就提高诊所开业人员的待遇等签订协定。

3 月 12、19 日，举行市镇选举，反对派略微受挫，失掉了 35 个居民人数超过两千人的城市。尽管如此，其仍然占据多数，拥有 60.11% 的议席。

3 月 16 日，政府与教育工会就提高大学教职员工的待遇签订协定。

3 月 20 日，社会民主党人中心最终拒绝贝尔纳 · 梅埃尼耶里提出的这一倡议，即在 6 月 18 日的欧洲选举中与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共同推出候选人。

3 月 21、24 日，企业行政与技术人员总工会与法国民主工联签订关于确定与调整工作时间的协议。

3 月 24 日，洛朗 · 法比尤斯正式成为社会党就欧洲选举提出的选举名单中的头号候选人。

3月28日—4月13日，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中心组成的反对派中一些年轻的主张改革者们，试图提出自己的同盟选举名单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4月8、13日，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的全国委员会表示支持由吉斯卡尔·德斯坦和阿兰·朱佩领导制订的反对派同盟选举名单。
4月18日，首次发行以埃居来结算的国债，其发行金额将在8年内达到70亿法郎。
4月27日，西蒙娜·维尔在社会民主党中心提出的选举名单中名列榜首。
4月28日，国民议会在无需辩论的情况下通过第十项计划（1989—1992）。
5月1日，教皇让-保罗二世访问留尼汪岛。
5月4日，主张独立的一派的两位领导人让-玛丽·吉巴乌、伊埃维纳·伊埃维纳双双遇害，凶手居伯里·维阿是位卡纳克族的极端主义分子，对1988年6月26日签订的关于新喀里多尼亚的马提尼翁协定强烈不满。
5月17日，皮埃尔·若克斯提出关于外国人进入法国以及在法国居留的条件的法案。
5月24—26日，法语国家在达卡尔召开第三次首脑会议：取消了35个黑非洲国家共达160亿法郎的债务。
6月6日，驳回了针对皮埃尔·若克斯5月17日提出的关于外国人进入法国以及在法国居留条件的法案的不信任动议。
6月11日，重振喀里多尼亚共和党在新喀里

多尼亚的省级选举中获胜。

6月13日，颁布关于欧洲经济利益集团的法律。

6月18日，在国民阵线（得票率为11.73%）与绿党（10.59%）的有力推动下，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结成的选举联盟在欧洲选举中获胜，得票率达到28.89%。

6月19日，国民议会未经辩论通过了关于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管理的法律，该法律涉及到对法国电视二台、电视三台实行统一管理。

7月1日—12月31日，法国担任欧洲经济共同体轮值主席国。

7月6日，颁布编号为89-461的涉及临时拘押的法律。

7月10日，颁布赦免科西嘉和瓜德卢普的民族主义者的法律。

7月14—16日，7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巴黎举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8月2日，颁布对法国电视二台、电视三台实行统一管理的法律；颁布编号为89-531的涉及证券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下的金融市场的安全与透明的法律；颁布编号为89-548的涉及外国人进入法国以及在法国居留的法律。

8月17日，针对其在7月11日提出的反犹建议，对让-玛丽·勒庞予以追究。

9月1日，米歇尔·罗卡尔提出“经济增长公约”草案。

9月24日，举行参议院选举，有1/3参议员

需要改选，保卫共和联盟在此次选举中占上风。

10月20日，行政法院作出判决，称条约的有效性强于后来的法律。

11月7日，科西嘉的民族主义者在维基奥港再次制造凶杀案。

11月26日和12月3日，在德勒选举新的国民议会议员，来自国民阵线的玛丽－弗朗斯·斯蒂尔布瓦在第二轮选举中当选。

12月19日，颁布编号为89－905的关于为处于困境的劳动者在专业（技术）融入方面提供便利的法律。设置融入事务高级委员会(1990年3月9日正式成立)。

12月20日，行政法院作出判决，要求教育机构加强其在内部纪律管理方面的责任（伊斯兰面纱事件)。

12月31日，颁布编号为89－1010的法律，其内容涉及暂时减轻因特殊情况负债过重者的负担。

1990年

2月9日，关于及时改进单一工资等级表的协定。

2月11日，保卫共和联盟举行会议，雅克·希拉克与阿兰·朱佩再次分别当选为总书记与秘书长。

3月5日—4月5日，法国进行第22次人口普查。

3月15—18日，社会党分裂为5个派别。

3月17日，巴士底歌剧院启用，首演剧目为埃克托·柏辽兹的《特洛伊人》。

3 月 21 日，社会党各派领导人签订综合协议。皮埃尔·莫罗瓦被一致选为该党的第一书记。
3 月 24 日，新喀里多尼亚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选举新的主席，保尔·内祖蒂伊纳成为让－玛丽·吉巴乌的继任者。
4 月 7 日，统一社会党自动解散。
4 月 11 日，将雷诺国营汽车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法案，两大股东雷诺与沃尔沃分别占有 75% 和 25% 的股份。
5 月 15 日，汤普森公司与飞利浦公司就开展高清晰度电视的研发签订协议，计划在 5 年内投入的经费为 200 亿法郎。
5 月 23 日，部长会议通过了涉及资金为 160 亿法郎的《大学发展状况报告》，
6 月 20—21 日，在拉博勒召开第十六次法国与非洲国家首脑会议。
6 月 26 日，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组成名为“保卫法兰西联盟”的反对派联盟。
6 月 28 日，议会通过了关于雷诺国营汽车企业改制的法案。
7 月 19—21 日，米歇尔·罗卡尔访问日本。
7 月 27 日，在偿还了 1983 年签约借贷的最后一笔数额为 220 亿法郎的外债后，法国已消除了外债。
8 月 2 日至 1991 年，因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
8 月 21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在近东创立一种“战争的逻辑”。
9 月 15 日，宣布在沙特阿拉伯实施“幼鹿”

行动。

9 月 18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与赫尔穆特·科尔出席在慕尼黑举行的法德峰会，会上商谈了与德国相关的问题，以及加强欧洲建设的问题。

9 月 19 日，米歇尔·罗卡尔提出了第三份“就业计划”，其涉及的经费开支为 80 亿法郎。

10 月 3 日、4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前往波斯湾地区访问。

10 月 6—9 日，一些年轻的入境者在里昂郊区的沃莱克 - 昂 - 韦兰闹事。

10 月 15 日—11 月 16 日，整个法国的中学生为争取“中学里的民主”举行示威游行。

10 月 23 日，司法从业人员举行全国行动与罢工日。

11 月 19 日，反对派就普遍缴纳的社会税提出的不信任案被驳回。

12 月 1 日，分头进行芒什海峡海底隧道施工的法英两国工程队会合。

12 月 4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在里昂宣布一项关于改造处境不利地区的五年计划。

12 月 6 日，米歇尔·诺瓦尔与米歇尔·巴尔扎什退出保卫共和联盟和国民议会。

12 月 8 日，决定在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区加强“幼鹿”行动的兵力部署（在 1991 年 1 月 15 日达到 9500 人）。

12 月 13 日，总工会在雷诺汽车工厂丧失绝对多数的地位，得票率仅为 46. 79%。

12 月 13 日，议会最终通过了限制抽烟与喝酒行为的法案。

12 月 21 日，米歇尔·德勒巴尔被任命为新设立的负责城市问题的国务部长。

12 月 21 日，诺尔 - 加莱海峡地区的最后一口仍在产煤的矿井在瓦尼关闭。

12 月 22 日，乔治·马歇再次被一致选为法共总书记。

1991 年

1 月 13—14 日，米歇尔·罗卡尔与皮埃尔·若克斯视察在沙特阿拉伯执行“幼鹿”行动的法军。

1 月 16 日，弗朗索瓦·密特朗致信给议会，请求其批准增加对付伊拉克的兵力。

1 月 17 日，法军对科威特领土上的伊拉克军队首次采取军事行动。

1 月 24 日，法军对在伊拉克的军事目标首次采取军事打击。

1 月 27 日，部长会议通过一项社会计划。

1 月 29 日，法国国防部长让 - 皮埃尔·舍韦内芒因反对“战争的逻辑”而辞职。皮埃尔·若克斯被任命为新任国防部长

2 月 23—25 日，在留尼汪出现严重骚乱。

2 月 25 日，科威特埃米尔向法国支付 10 亿美元。

3 月 3 日，联合国部队与伊拉克部队之间实行暂时停火。

4 月 12 日，国民议会最终投票批准了科西嘉新的地位。

4 月 17 日，政府声明接受有利于留尼汪的 60

项措施。

4 月 18 日，国民议会最终投票批准了关于市镇之间在财政方面提供互助的法律。

5 月 15 日，米歇尔·罗卡尔总理辞职。

5 月 19 日—1992 年 4 月 2 日，社会党的埃迪特·克勒松担任政府总理。

5 月 19 日，“阵风”战斗机的样机首次飞行。

6 月 3 日，法国决定加入核不扩散条约。

7 月 11 日—11 月 21 日，热拉尔·达博维尔驾着小船穿越太平洋（从日本的銚子到美国的伊尔瓦戈）。

9 月 29 日，20 万名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员、农业收入大幅度下降和债务过重的受害者在巴黎举行示威游行。 1185

10 月 16 日，皮埃尔－吉尔·德·热纳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0 月 17 日，共和国保安部队镇压护士在巴黎举行的示威游行。

10 月 21 日，“血液门事件”：雅克·卢教授、罗贝尔·内泰大夫、米歇尔·加雷塔大夫（法国全国输血中心主任）等被起诉。

10 月 25 日，法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偿还伊朗国王为实施欧洲气体扩散公司方案在 1975 年支付的预支款。

11 月 7 日，国立行政学院搬迁至斯特拉斯堡，烟草及火柴专卖公司搬迁至昂古莱姆。

11 月 17 日，10 万多从事保健工作的专业人员为捍卫疾病保障制度举行游行示威。

11 月 19—21 日，法语国家在巴黎举行第四次

首脑会议。

11月29日，占法国地方信贷银行资本27%的该银行的证券在证券交易所标价前的所有手续办理完毕。

12月1日，法国在里昂夺得戴维斯杯（网球）。

12月9日、10日，第46届欧洲理事会在马斯特里赫特举行，会议通过了《欧洲货币与经济联盟条约》。

12月19日，议会通过将国民服役期从一年减少为10个月的法案。

12月21日，通过了关于向在输血时所使用的血液制品中含有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提供赔偿的法案。

1992年

1月3日，电视五台提交其总结报告。

1月5—7日，鲍里斯·叶利钦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6日签订了法俄友好合作条约。

1月6日，由勒内·雷蒙主持的委员会向阿尔贝·德库尔特雷枢机主教提交关于“图维耶与教会”的报告。

1月9日至1993年4月3日，洛朗·法比尤斯担任社会党第一书记。

1月13日，路易·维阿内取代亨利·克拉絮基担任总工会的总书记。

1月14日，URBA事件（公共项目回扣丑闻）。预审法官勒诺·范·吕安贝克在社会党总部进行搜查。

1月29日，巴勒斯坦领导人乔治·哈巴什在巴黎住院治疗。乔治娜·杜弗瓦辞去所有

职务。

2月7日，签署确定欧洲联盟建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2月8—28日，第十六届冬季奥运会在阿尔贝维尔召开。

3月22日，保卫共和联盟与法国民主联盟组成的联盟在大区选举中获胜。

3月22—29日，社会党在区议会选举中遭到失败。

3月31日，设在布洛涅－比扬古尔的雷诺工厂关闭。

4月2日至1993年3月29日，社会党的皮埃尔·贝雷戈瓦担任政府总理。

4月8日，贝雷戈瓦推迟恢复核试验。

4月9日，宪法委员会提出有利于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前修改宪法的意见。

4月12日，欧洲最大的主题游乐公园欧洲迪斯尼乐园正式开放。

4月13日，巴黎上诉法院判定对保尔·图维耶不予起诉。

5月2日，关于创立欧洲经济区的波尔图条约。

5月5日，巴斯蒂亚的菲里阿尼球场发生惨剧，为增加座位而临时搭建的看台坍塌，造成15人死亡。

5月6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分裂，在全国小学教师工会的倡议下，全国中等教育工会脱离全国教育联合会。

5月23日，城市部长贝尔纳·塔皮辞职。

6月13日，杰克·朗与马克斯·克鲁佩神甫签订国家与私立学校协议。

6月22日—7月31日，对法国全国输血中心负责人进行审讯。

9月14日，国民议会议长、社会党前司库亨利·埃玛纽埃里受到雷诺·范·鲁伊姆贝克法官的控告。

9月20日，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举行公民投票，赞成票为51.01%。

9月28日，法德合办的文化电视频道“艺术频道”开播。

10月6日，乔治·夏尔帕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0月20日，参议院选举新议长，中间派的勒内·莫诺里当选。

10月23日，前法国全国输血中心主任米歇尔·加雷塔大夫被判处4年监禁，4名被告中有一人被免于起诉。

11月1日，反吸烟法开始生效。

12月20日，“血门事件”：在1984—1986年间担任相关职务的前负责健康事务的国务秘书埃德蒙·埃尔韦、前社会事务和全国救助部长乔治娜·杜弗瓦，以及前总理洛朗·法比尤斯在特别最高法院受审。

12月24日—1993年3月29日，左翼激进派运动的贝尔纳·塔皮再次担任城市部长。

1993年　1月1日，12国欧洲统一大市场建立。

1月20日，涉及预防腐败以及确保经济活动透明的法律生效。

2月5日，特别最高法院预审委员会确认洛

朗·法比尤斯、乔治娜·杜弗瓦、埃德蒙·埃尔韦的公共行为在“血门事件”中的时效性。

2月10日，提出“保卫法兰西联盟”计划，以及法国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的选举纲领.

2月17日，蒙路易－苏尔－卢瓦尔演说：米歇尔·罗卡尔的大跃进。

3月1日，新的刑事程序法典生效（相关法律于1992年12月19日通过，并在1993年1月4日的《公报》上公布）。

3月21日和28日，法国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组成的“保卫法兰西联盟”在立法选举中获胜：“蓝色浪潮”。

3月29日—1995年5月10日，保卫共和联盟的爱德华·巴拉迪尔担任第二次左右“共治”的政府总理。

4月2日，保卫共和联盟的菲利普·塞甘就任国民议会议长。

4月3日—10月23日，米歇尔·罗卡尔担任社会党合议制委员会主席。

5月1日，皮埃尔·贝雷戈瓦自杀身亡。

6月8日，在1942—1943年间担任法国警察部门秘书长的勒内·布斯凯在巴黎遇害。

6月23日，暴露出足球界腐败行径的马赛俱乐部“买球”事件开始。

6月24日，国民议会同意修改国籍法典。

6月25日—7月10日，“巴拉迪尔债券”大受欢迎，发行额度达到了1100亿法郎，大大

超过了原定的400亿法郎。

7月19日，涉及最高司法会议以及设置共和国法院的凡尔赛大会召开。

7月24日，在确保全国工商业就业联合会的账户做到收支平衡的前提下签订失业保险协定。

7月28日，宪法委员会撤销1993年7月6日通过的关于大学自治的法律。

8月2日，进行欧洲货币制度改革，以便行之有效地使相关欧洲国家货币之间的比价避免出现大幅波动。

8月4日，《公报》公布了法兰西银行的地位的改变。

10月12—29日，法航的领导部门与工会之间产生矛盾。

10月20日，最后签署关于控制保健开支的协议。

10月22—24日，社会党在布尔热召开第一次制宪大会。

10月23日—1994年6月19日，米歇尔·罗卡尔担任社会党第一书记。

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洲共同体被欧洲联盟取代。

11月16日，罗讷-普朗克公司开始实行私有化。

11月18日，弗朗索瓦·密特朗为卢浮宫博物馆的黎塞留馆揭幕。

11月19日，凡尔赛大会：为限制庇护权对宪法予以修改。

12 月 15 日，117 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员国在日内瓦签署《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

12 月 20 日，为期五年的就业法。

1994 年

1 月 1 日，法兰西银行独立。欧洲经济体生效。

1 月 13 日，宪法委员会取消允许地方机构向私立教育机构提供帮助的布尔格 - 布罗法的相关条款。

1 月 16 日，26 万人在巴黎示威游行，反对废除法卢法。

1 月 21 日，颁布关于向投资私立教育提供帮助的布尔格 - 布罗法。

1 月 25—29 日，法共在圣乌昂召开第二十八届代表大会，罗贝尔·于当选为总书记。

2 月 1—15 日，布列塔尼的渔民举行罢工。

2 月 3—10 日，埃尔夫 - 阿基坦公司实行私有化。

2 月 4 日，设在雷恩的布列塔尼议会所在地发生火灾。

2 月 23 日，关于使用包含职业融入内容的合同的法令。

3 月 1 日，新的刑事法典生效。

3 月 17 日—4 月 20 日，对二战期间的保安队队员保尔·图维耶进行审讯，并以反人类罪判其无期徒刑。

3 月 30 日，在反对者多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之后，关于使用包含职业融入内容的合同的法令被撤销。

4 月 15 日，《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在 4 月 12—15 日召开的马拉克什会议结束之后签署。

4 月 20 日，国民议会通过关于 1995—2000 年度军事规划的法律。

4 月 22 日，阿尔贝 · 加缪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人》出版。

5 月 6 日，伊丽莎白二世与弗朗索瓦 · 密特朗出席芒什海底铁路隧道通车典礼。

6 月 6 日，美军在欧洲登陆 50 周年纪念仪式。

6 月 9 日、12 日，欧洲 12 国举行欧洲议会选举，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在本国的选举中遭到重创。

6 月 19 日，亨利 · 埃马努埃利取代米歇尔 · 罗卡尔担任社会党第一书记。

6 月 23 日，通过三项涉及生命伦理的法律。

6 月 23 日—8 月 21 日，法国军队在联合国的保护下，在卢旺达进行具有人道主义特征的“青绿色行动”。

7 月 3 日，阿尔卡特 - 阿尔斯通董事长皮埃尔 · 苏阿尔遭受审查。

7 月 11 日，美国正式承认由吕克 · 蒙塔尼埃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了艾滋病病毒。

7 月 12 日，议会发表报告指出里昂信贷银行的管理存在严重缺陷。

7 月 14 日，欧洲军团首次在香榭丽舍大道参加阅兵。

7 月 17 日，通信部长阿兰 · 卡里尼庸辞职（7 月 25 日受到审查）。

8月4日，16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在其位于埃纳省弗朗布莱的住处被逮捕，并且受到传讯。

8月15日，化名为“卡洛斯”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在苏丹被捕并被押至法国。

9月8日，美、英、法国军队撤离柏林。

9月12日，让-皮埃尔·艾勒卡巴什就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过去对其进行电视采访。

9月27、29、30日，乔治娜·杜弗瓦、埃德蒙·埃尔韦和洛朗·法比尤斯因涉嫌“血门事件”遭受审查。

10月13日—1995年5月3日，前通信部长、保卫共和联盟的阿兰·卡里尼庸被羁押。

10月14日，工业、邮电与外贸部长吉拉尔·隆盖辞职。 1188

11月3日，雷诺国营汽车企业部分私有化。

11月4日，雅克·希拉克成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11月12日，合作部长米歇尔·鲁辛（来自保卫共和联盟）辞职。

12月11日，雅克·德洛尔拒绝作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12月14日，对贝尔纳·塔皮实行司法清理。

12月23—24日，最终投票通过关于向政治生活提供公共资金的法律的五项提案。

1995年

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诞生并取代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加入欧洲联盟，由此，欧盟共有15个成员国。

1 月 18 日，爱德华·巴拉迪尔竞选共和国总统。

1 月 23 日，埃尔维·布尔日被任命为新闻媒体最高委员会主席。

2 月 3 日，利昂内尔·若斯潘被一些社会党积极分子推举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2 月 20 日，菲永关于大学科技学院学生进入综合大学的通报被收回。

2 月 22 日，罗朗·迪马被任命为宪法委员会主席。

3 月 17 日，里昂信贷银行新的拯救计划。

4 月 23 日，首轮总统选举。

5 月 2 日，希拉克与若斯潘进行电视辩论。

5 月 7 日，雅克·希拉克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其得票率为 52.64%。

5 月 17 日，阿兰·朱佩被任命为总理。

5 月 18 日，首届阿兰·朱佩政府。

5 月 22 日，让·蒂贝里当选为巴黎市长。

6 月 11 日，首轮市镇选举。

6 月 13 日，雅克·希拉克宣布将在 1995 年 9 月至 1996 年 5 月间在南太平洋恢复核试验。

6 月 18 日，第二轮市镇选举。国民阵线在土伦、马里尼昂、奥朗日获得选举胜利。社会党在巴黎获得了 6 个市区区长的职位。

7 月 16 日，雅克·希拉克承认法国政府在法国犹太人被放逐的过程中负有责任。

7 月 19 日，雅克·希拉克访问非洲。

7 月 25 日，在巴黎地铁快线的列车上发生爆炸案，有 7 人死亡。

	7月31日，议会对宪法进行修改（九个月中仅有的一次会议）。
	8月17日，巴黎发生凶杀案，有17人受伤。
	8月23日，采取打击非常移民的措施。
	8月25日，经济与财政部长阿兰·马德兰辞职。
	9月5日，法国在穆鲁罗阿珊瑚岛实施了计划中的第一次核试验。
	9月8日，打击恐怖主义的“维杰皮拉特”计划生效。
	10月6日，巴黎发生谋杀案。
	10月10日，公务员为反对冻结工资举行总罢工。
	10月17日，巴黎发生凶杀案。
	11月1日，破获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联系网，逮捕一名涉嫌制造了夏季和秋季发生的爆炸案的人员。
	11月5日，关于大学的紧急计划。
	11月7日，第二届阿兰·朱佩政府。
	11月15日，阿兰·朱佩提出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计划。
	11月17日，阿兰·卡里尼庸被判处5年徒刑，其中2年缓期。
	12月21日，为结束12月份发生的针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而举行的罢工，在马提尼翁宫举行社会各方高层会议。
1996年	1月8日，弗朗索瓦·密特朗逝世。
	1月17日，法国通过同意在北约组织内部商谈核问题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靠拢。

1189

1月18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负责人雅克·克洛泽马里因在审计法院的一份报告中被追究责任而辞职，

1月29日，在进行了6次核试验后，法国终止其在穆鲁罗阿珊瑚岛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活动。

2月3日，让·米奥被任命为法新社负责人。

2月19日，为使议会更好地参与社会预算，对宪法进行了修改。

2月21日，政府决定对汤普森公司实行私有化。马塞尔·卢莱接替阿兰·戈梅。

2月22日，雅克·希拉克宣布军队实行职业化。

3月20日，弗朗索瓦·贝鲁提出一项在学校防止暴力的计划。

3月22日，300名没有证件的非洲人撤离巴黎的圣昂布瓦兹教堂。

4月1日，工业七国针对就业问题在里尔举行峰会。

4月4日，雅克·希拉克访问贝鲁特。

4月12日，罗歇·福勒关于教育问题的报告。

5月13日，雷诺汽车公司部分实行私有化。

6月10日，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拯救计划。

6月11日，关于工作时间的罗比安法。

6月29日，工业七国在里昂举行会议。

7月4日，法国航空公司与法国国内航空公司合并。

8月2日，米歇尔·德布雷逝世。

8月8日，对里昂信贷银行的前领导人开始进

行追究。
8月23日，“无证件者”撤离巴黎圣贝尔纳教堂。
9月4日，阿兰·朱佩的降税计划（1997年减少250亿法郎，5年内减少750亿法郎）。
9月18日，被指控为“反人类罪的同谋”的莫里斯·帕蓬被退回重罪法庭审讯。
9月23日，社会保障振兴计划，该计划力图在1997年将其赤字限定在297亿法郎的范围内。
9月30日，反对排斥的法案。
10月10日，罗贝尔·于和乔治·马歇因涉嫌“以其影响力不正当获利”受到审查。
11月12日，AXA与U.A.P.两大保险公司合并。
11月24日，安德烈·马尔罗的骨灰被迁至先贤祠安放。
11月27日，长途卡车司机之间发生的冲突结束。
12月3日，巴黎的地铁快线上发生爆炸案，4人死亡。
12月5日，法国与非洲国家在瓦加杜古举行首脑会议。
12月9日，法德两国提出“共同战略概念”。
12月12日，关于单一货币的都柏林协议。
12月24日，位于伊泽尔省克雷－马尔维尔的超级菲力克斯快速中子反应堆停止运行。

1997年
1月9日，生长激素事件披露出新的情况。
1月15日，关于养老金基金的托马斯法。

1月20日，雅克·希拉克宣布改革司法制度，以不断增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

1月26日，对1940年至1944年间被没收的犹太人的财产开始进行调查。

2月3日，贝尔纳·塔皮被监禁。

2月9日，在维特罗勒因社会党议员期满卸任而举行的补缺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绝对胜利。

2月22日，巴黎举行反对德布雷法的示威游行，这一法律试图通过"居住证明"对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加以控制。

3月5日，让·蒂贝里遭到审查。

3月11日，住院实习医生举行罢工。

3月12日，对娈童的社会环境予以质问。

3月29日，国民阵线代表大会在斯特拉斯堡召开，有5万名反对者前去示威抗议。

4月9日，贝鲁对大学进行改革。

4月21日，雅克·希拉克解散国民议会。

4月29日，社会党与法共签订选举协定与纲领。

5月15日，雅克·希拉克访问中国。

5月18日，第50届戛纳电影节闭幕。

5月19日，一位中学生在塞纳－圣德尼省的邦迪被人用匕首刺死。

5月25日，首轮立法选举。

6月1日，"复数的左派"在第二轮立法选举中获胜。

6月4日，若斯潘政府组成。

6月13日，法德两国在普瓦提埃举行首脑

1190

会议。

6月18日，对娈童活动场所进行新的搜查与质询。

6月19日，利昂内尔·若斯潘发表施政演说。

6月29日，20万同性恋者在巴黎举行游行，要求获得“世俗与社会的结合契约”。

7月6日，菲利普·塞甘当选为保卫共和联盟主席。

7月31日，帕特里克·韦伊就移民政策向总理提交了一份报告。

8月20日，玛蒂娜·奥布里向部长会议提出青年就业计划。

8月24日，天主教会组织的“世界青年日”结束。

9月8日，法国电信公司部分（占其资本的20%）私有化。

9月17日，普遍征收的社会税税率从4.1%提高到7.5%，其中的2.4%不得扣除；工薪者的疾病保险金则从5.5%降至0.75%。普遍征收的社会税的收入由此提高到3300亿法郎。

9月30日，法国教会就其放任维希政府的犹太人政策向犹太人社团致歉。

10月8日，波尔多重罪法庭开始审讯莫里斯·帕蓬。

10月10日，政府决定就35小时工作周准备一项法案。

10月12日，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主席让·冈多瓦辞职。

10月29日，伊丽莎白·吉古向部长会议提出

司法改革方案。

11 月 2 日，长途卡车司机举行罢工。

11 月 16 日，乔治·马歇逝世；法语国家在河内召开的首脑会议结束；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当选为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

11 月 21 日，社会党在布雷斯特召开代表大会。

12 月 1 日，投票通过关于国籍问题的吉古法。

12 月 5 日，雅克·希拉克在巴黎无名犹太人烈士纪念仪式上发表演说。

12 月 16 日，欧内斯特-安托万·塞利埃尔当选为法国全国雇主理事会主席。

12 月 17 日，投票通过关于移民问题的舍韦内芒法。

12 月 25 日，政府决定为平息社会动荡对失业者采取紧急措施。

1998 年

1 月 24 日，关于保护其不动产被扣押的债务过重者的法律。

1 月 28 日，设立在圣德尼的法兰西体育场落成典礼。

2 月 6 日，省长克洛德·埃里尼亚克遇害。

2 月 19 日，低租金住房允许转租。

3 月 2 日，奥布里在部长会议提出反排斥法案。

3 月 8 日，关于大区议会的作用的法律。

3 月 15 日，大区议会选举：弃权率颇高，左翼略占上风，国民阵线取得新的进展，共和派右翼与极右派别之间签订了多项地方性的协议。

4 月 17 日，对缴纳养老金超过 40 年的未满 60 岁的退休人员发放特殊津贴。

5 月 11 日，关于外国人进入法国、在法国居留以及避难权的法律。

5 月 12 日，为便于其加入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对关于法兰西银行的法规作了修改。

6 月 13 日，关于 35 小时工作周的奥布里法投票通过。

6 月 17 日，关于预防和惩治性犯罪以及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批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关于同意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联盟的议定书的法律。 1191

7 月 9 日，商业法庭在一份议会报告中受到谴责。

7 月 12 日，法国赢得世界杯足球赛冠军。

8 月 20 日，法国降低利率（4.6%）。

8 月 21 日，阿兰·朱佩因巴黎市政府在雇佣人员时作假的事件受到审查。

8 月 25 日，绿党在 1999 年欧洲议会选举的选举名单中为达尼埃尔·科恩－邦迪保留了一个名额，其在 11 月份正式成为候选人。

8 月 29 日，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宣布失业率在一年内降低了 4.6%。

9 月 2 日，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因手术性休克陷入昏迷状态。在经过较长时期的治疗与恢复后，他在 1999 年初重新履行部长职责。

9 月 25 日，在法国生产转基因玉米产品的批准被行政法院撤销。

10 月 1 日，保卫共和联盟的克里斯蒂安·蓬

塞莱击败法国民主联盟的勒内·莫诺里，当选为参议院议长。

10月14日，法国退出关于投资的多边协定的谈判，不久，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亦放弃了这一谈判。

10月21日，在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过了一周之后，克洛德·阿莱格勒提出一份关于中学的紧急计划。

10月26日，为使阿姆斯特丹条约获得批准，开始了修改宪法的程序。

10月30日，克里斯蒂娜·德维埃－荣古回忆录：埃尔夫公司曾为了影响罗朗·迪马（现已成为宪法委员会主席）向其发放酬劳。

11月5日，利昂内尔·若斯潘为“贵妇之路”的反叛者恢复名誉。

11月8日，在新喀里多尼亚举行的关于努美阿协定的磋商中，赞成派取得了胜利。

11月17日，法国共产党取消了自其创建以来对其成员采取的一些处分。

12月3日，失业者在圣诞节临近时举行新的示威游行。

12月4日，行政法院取消夏尔·米庸在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当选为领导人的选举结果。

12月9日，对将终止法国电力公司垄断地位的法案进行审查。

12月15日，基莱关于法国在卢旺达的作用（1990—1994）的报告。

12月23日，在布鲁诺·梅格雷被让－玛丽·勒庞开除出国民阵线之后，国民阵线分裂进

程开始。

12月30日，在1999年1月1日采用欧元之前，巴黎证券交易所最后一次以法郎标价。

1999年

1月24日，国民阵线出现分裂：布鲁诺·梅格雷建立“国民阵线－国民运动”。

1月26日，法国航空公司的资本少量对外开放。

2月1日，巴黎巴银行与里昂信贷银行之间的部分部门或业务实行合并。

3月4日，参议院通过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

3月9日，共和国法庭对“血门事件”进行审讯。

3月23日，司法改革法。

3月24日，勃朗峰隧道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3月27日，雷诺、尼桑两家汽车公司开始加强合作。

4月16日，因与雅克·希拉克意见不合，菲利普·塞甘辞去保卫共和联盟主席一职。

4月26日，在科西嘉发生茅舍事件。

4月29日，查尔潘提出关于退休金的报告。

5月9日，新喀里多尼亚选举领地代表大会成员。 1192

5月28日，马克·泰西埃被任命为法国电视公司董事长。

6月13日，举行欧洲选举，弃投率高达53%。自1979年以来，右派首次在此类选举中落后于左派。

8月17日，何塞·博韦因在弥约的麦当劳快餐店抢劫而受审。

	8月28日，兴业银行、巴黎国民银行和巴黎巴银行合并。
	9月12日，道达尔菲纳公司与埃尔夫公司合并。
	10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公民结合条约”。
	10月19日，第二项关于减少工作时间的法律。
	10月22日，潜逃的莫里斯·帕蓬在瑞士被捕。
	11月2日，因在对法国全国大学生互助会进行的调查中受到牵连，经济与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辞职。
	12月12日，“埃里卡号”油轮断裂沉没，泄出的重油形成的“黑潮”肆虐法国西部大西洋海岸。
	12月25日、27日，一场强度罕见的暴风雨肆虐法国与欧洲。
2000年	3月27日，内阁进行改组。
	3月31日，失业率低于10%，创1992年以来的新低。
	4月17日，马泰奥里关于1940—1944年间犹太人遭受掠夺情况的报告。
	5月30日，法国电信公司重新购买英国Orange移动电话运行系统。
	6月5日，雅克·希拉克赞同将总统任期缩短为5年的方案。
	6月13日，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访问法国。

6 月 20 日，威望迪－于尼维尔萨尔集团诞生。国民议会通过反宗派法。
7 月 1 日，法国担任为期六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
7 月 2 日，在赢得世界杯两年后，法国队在 2000 年欧洲杯足球赛中获得冠军。
7 月 20 日，关于科西嘉未来地位的马提尼翁协定。
7 月 25 日，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协和式大型客机在鲁瓦西机场附近的戈内斯坠毁。
8 月 7 日，科西嘉民族主义活跃分子让－米歇尔·罗西遇害。
8 月 29 日，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因不赞同政府的科西嘉政策提出辞职。
8 月 31 日，经济与财政部长洛朗·法比尤斯提出减税计划。
9 月 4 日，长途卡车司机因抗议汽油涨价举行罢工。
9 月 24 日，总统任期改为五年在公民投票中以 73.1% 的人赞成获得通过。
11 月 10 日，雅克·沙邦－戴尔马逝世。
11 月 14 日，与“疯牛病”进行斗争的计划。
12 月 10 日，欧盟首脑会议在尼斯召开。

2001 年

1 月 10 日，若斯潘宣布设立“就业津贴”。
1 月 12 日，“精神骚扰”被写入《劳工法典》。
1 月 18 日，尽管土耳其威胁将会因此改变与法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法国仍对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史实予以承认。
2 月 6 日，在其结束联合国驻科索沃特别代表

一职的任期后，贝尔纳·库什内被任命为负责卫生事务的部长级代表。

2 月 28 日，1 月份的失业率较上个月降低了 2.9%。

3 月 11 日，首轮市政选举。

3 月 18 日，第二轮市政选举。在多数城市为右派所掌控的同时，巴黎、里昂两大城市却转入左派手中。

3 月 29 日，达能公司同马克斯－斯潘塞公司进行重组和遣散。

1193

5 月 2 日，奥萨雷塞将军承认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曾参与拷打与屠杀平民。

5 月 17 日，通过科西嘉的新地位。

5 月 21 日，以阿尔诺·蒙特布尔为首的 30 名国民议会议员要求雅克·希拉克向特别高等法庭说明巴黎低租金住房的相关事宜。

6 月 11 日，父亲在其孩子出生时享受的带薪假期由 3 天延长为两周。

8 月 17 日，科西嘉民族主义活跃分子弗朗索瓦·桑托尼遇害。

9 月 21 日，设在图卢兹的 A. Z. F. 工厂发生严重爆炸。

2002 年

1 月 1 日，欧元在法国以及另外 11 个欧洲国家流通。

1 月 14 日，艾里克·阿尔方法官辞职。

1 月 28 日，统计数据表明犯罪率上升。

3 月 9 日，勃朗峰隧道重新开放。

3 月 27 日，南特在一次市镇议会开会时发生互相枪击事件。

4 月 21 日，利昂内尔·若斯潘在首轮总统选举中意外出局。

5 月 1 日，全法举行反对极右派的示威游行。

5 月 5 日，雅克·希拉克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以 82.21% 的得票率击败让-玛丽·勒庞，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5 月 6 日，让-皮埃尔·拉法兰被任命为政府总理。

6 月 9 日，右派在首轮立法选举中大胜。

6 月 16 日，右派在第二轮立法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

6 月 18 日，阿兰·朱佩当选为总统多数派联盟主席。

6 月 19 日，何塞·博韦因在弥约的麦当劳快餐店进行抢劫被监禁。

7 月 1 日，让-玛丽·梅西埃辞去威望迪-于尼维尔萨尔集团总裁一职。

7 月 14 日，发生行刺雅克·希拉克未遂事件。

9 月 18 日，莫里斯·帕蓬因健康原因恢复自由。

11 月 19 日，“威望号”油轮断裂沉没，西班牙海域受到极为严重的污染。

12 月 11 日，为保护法国侨民而向科特迪瓦增派军事人员。

参考书目

I. 概况

F. Braudel, *Identité de la France* (Flammarion, nouv. éd., 1990, 3 vol.). - A. Burguière,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P.U.F., 1986). - A. Burguière et J. Revel (sous la dir. de), *La France dans son Histoire* (Le Seuil, Paris, t. I et t. II, 1989). - J. Carpentier et F. Lebrun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 France* (Le Seuil, 1987). - J. Delumeau et Y. Lequin, *les Malheurs des temps. Histoire des fléaux et des calamités en France* (Larousse, coll. « Mentalités : vécus et représentations », 1987). - G. Duby, *le Moyen Âge : de Hugues Capet à Jeanne d'Arc, 987-1460* (Hachette,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t. I, 1987). G. Duby et R. Mandrou,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A. Colin, Paris, t. I, nouv. éd., 1984). - J. Dupâquier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P.U.F., 2ᵉ éd., 1991, 4 vol.). - J. Favier, *le Temps des principautés (1000-1515)*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t. II,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Paris, 1984]. - P. Goubert, *Initiation à l'histoire de France* (Tallandier, coll. « Approches », Paris, 1984). - E.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évolution* (Hachette, Paris, 1903-1911). - J. Le Goff et R. Rémond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 la France religieuse* (Le Seuil, Paris, t. I, 1988 ; t. II, 1988). - K.F. Werner, *les Origines. Avant l'an mil*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t. I,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1984).

Pour placer les phénomènes français dans le cadre de l'évolution européenne, on utilisera :

M. Crouzet,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P.U.F., Paris, nouv. éd., 1967-1985, 7 vol.). - M. Daumas,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 (P.U.F., Paris, nouv. éd., 1964-1979, 5 vol.). - A. Fliche et V. Martin, *Histoire de l'Églis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nos jours* (Bloud et Gay, Paris, 1935-1964). - J.-M. Mayeur, Ch. Piétri, A. Vauchez et M. Vénard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u christianisme :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Fayard-Desclée, 1990 et années suivantes, en cours). - L.-H. Parias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générale du travail* (Nouvelle Librairie de France, Paris, 1959-1961, 4 vol.). - R. Taton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P.U.F., Paris, nouv. éd., 1966-1983, 4 vol.).

II. 史前和古代

概况

J. Déchelette, *Manuel d'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et celtique* (A. et J. Picard, Paris, 1910 ; rééd., 1987-1989, 4 vol.). - A. Grenier, *Manuel d'archéologie gallo-romaine* (A. et J. Picard, réimpr., 1985-1989, 4 vol.). - J.-Ph. Rigaux (sous la dir. de), *les Hauts Lieux de la Préhistoire en France* (Bordas, coll. « Le Voyage culturel », 1989).

2. 史前

• 史前远古时代

Généralités. J. Demoule, *la France de la Préhistoire : mille millénaires des premiers hommes à la conquête romaine* (Nathan, 1990). - A. Leroi-Gourhan, *la Préhistoire*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ᵒ 1, nouv. éd., Paris, 1977) ; *Dictionnaire de la Préhistoire* (P.U.F., coll. « Grands Dictionnaires », Paris, 1988). - J. Piveteau, *Traité de paléontologie* (t. VII : *les Primates, l'Homme*) [Masson, Paris, 1957] ; *Origine de l'homme* (Hachette, Paris, 1962). - D. de Sonneville-Bordes, *l'Âge de la pierr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ᵒ 948, Paris, nouv. éd., 1981).

Peuplement paléolithique. E. Bonifay, *les Terrains quaternaires dans le sud-est de la France* (Impr. Delmas, Bordeaux, 1965). - F. Bordes, *les Limons quaternaires du bassin de Paris* (Masson, Paris, 1953). - J. Combier, *le Paléolithique de l'Ardèche dans son cadre paléoclimatique* (Impr. Delmas, Bordeaux, 1967). - L. Méroc, *la Conquête des Pyrénées par l'homme* (Paris, 1953). - L. Pales, *les Néanderthaliens en France* (Masson, Paris, 1958). - J. Roussot-Larroque, *la Préhistoire en Périgord* (Ouest-France, coll. « Guides couleur », Rennes, 1984). - P. Smith, *le Solutréen en France* (Bordeaux, 1966).

Vie quotidienne et culturelle. F. Bordes, *Typologie du paléolithique ancien et moyen* (C.N.R.S., Bordeaux, 1979). - H. Breuil, *Quatre Cents Siècles d'art pariétal* (Centre d'études et de documentation préhistorique, Montignac, 1952). - A. Leroi-Gourhan, *les Religions de la préhistoire paléolithique* (P.U.F., coll. « Quadrige », nᵒ 44, Paris, 1990) ; *Préhistoire de l'art occidental* (Mazenod, Paris, 1965). - A. Leroi-Gourhan et J. Allain, *Lascaux inconnu* (C.N.R.S., Paris, 1979). - C. Perlès, *Préhistoire du feu* (Masson, Paris, 1977). - D. Stordeur, *les Aiguilles à chas au paléolithique* (C.N.R.S., Gallia, Paris, 1979). - H. V. Vallois, *Vital Statistics in Prehistoric Populations as Determined from Archaeological Data* (Chicago, 1960) ; *The Social Life of Early Man. Evidence of Skeletons* (Chicago, 1961). - C. Zervos, *l'Art de l'époque du renne en France* (Éd. « Cahiers d'art », Paris, 1959).

On trouvera l'essentiel des résultats récents dans les ouvrages collectifs : *la Préhistoire française,* sous la direction de H. de Lumley (C.N.R.S., Paris, 1976). - *La Fin des temps glaciaires en Europ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nᵒ 271, C.N.R.S., sous la direction de D. de Sonneville-Bordes (C.N.R.S., Paris, 1979).

• 史前晚近时代

Généralités. J. Guilaine, *Premiers Bergers et paysans de l'Occident méditerranéen* (Civilisation et Sociétés, 58, Mouton, Paris-La Haye, 1976). - J. Lichdardus et collab., *la Protohistoire de l'Europe*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ᵒ 1 bis, 1985). - J.-P. Millotte, *Précis de protohistoire européenne* (A. Colin, coll. « U2 », Paris, 1970). - R. Riquet, *Populations et races au néolithique et au bronze ancien* (thèse, faculté des sciences, Bordeaux, 1967) ; *Anthropologie du néolithique et du bronze ancien* (Texier, Poitiers, 1970). - J.-G. Rozoy, *les Derniers Chasseur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champenoise, Charleville, 1978).

Mésolithique. M. et S.J. Péquart, M. Boule et H.V. Vallois, *Téviec, station nécropole mésolithique du Morbihan* (Masson, Paris, 1937).

Néolithique, chalcolithique et bronze. J. Arnal, *les Dolmens du département de l'Hérault* (P.U.F., « Préhistoire », t. XV, Paris, 1963). - J. Arnal, G. Bailloud et R. Riquet, *les Styles céramiques du néolithique français* (P.U.F., « Préhistoire », t. XIV, Paris, 1960). - G. Bailloud, *le Néolithique dans le Bassin parisien* (C.N.R.S., « Gallia-Préhistoire », IIᵉ Supplément, Paris, 1964). - J. Briard, *les Dépôts bretons et l'âge du bronze atlantique* (Travaux du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préhistorique, faculté des sciences, Rennes, 1965).

- P.R. Giot, J. L'Helgouach et J. Briard, *la Bretagne* (Arthaud, Grenoble-Paris, 1962). - J. Guilaine, *la France d'avant la France : du néolithique à l'âge de fer* (Hachette-Pluriel, coll. « Pluriel », nouv. éd., Paris, 1985). - J. L'Helgouach, *les Sépultures mégalithiques en Armorique, dolmens à couloir et allées couvertes* (Travaux du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préhistorique, faculté des sciences, Rennes, 1965). - A. Niederlender, R. Lacam et J. Arnal, *le Gisement néolithique de Roucadour* (C.N.R.S., « Gallia-Préhistoire », IIIe Supplément, Paris, 1966). - R. Riquet, A. Coffyn et J. Guilaine, *les Campaniformes français* (C.N.R.S., « Gallia-Préhistoire », t. VI, Paris, 1963). - C. Schaeffer, *les Tertres funéraires préhistoriques dans la forêt de Haguenau*. I, *les Tumulus de l'âge du bronze* (Impr. de la ville, Haguenau, 1923). - J. Vaquer, *le Néolithique en Languedoc occidental* (C.N.R.S., Paris, 1990).

Religion. P. M. Duval, *les Dieux de la Gaule* (P.U.F., Paris, 1957). - J. Le Goff, R. Rémond et F. Lebrun (sous la dir. de), *Des Dieux de la Gaule à la Papauté d'Avignon* (Le Seuil, coll. « Histoire de la France religieuse », t. I, Paris, 1988). - F. Le Roux, *les Druides* (P.U.F., Paris, 1961). - J. Markale, *le Druidisme : traditions et dieux des Celtes* (Payot, coll. «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 1985). - M.L. Sjoestedt, *Dieux et Héros des Celtes* (P.U.F., Paris, 1940). - E. Thévenot, *Divinités et Sanctuaires de la Gaule* (Fayard, Paris, 1968). - J. de Vries, *la Religion des Celtes* (Payot, Paris, 1963).

Art celtique. H.-J. Eggers, E. Will, R. Joffroy et W. Holmqvist, *les Celtes et les Germains à l'époque païenne* (A. Michel, Paris, 1964). - A. Varagnac et coll., *Art gaulois* (Ed. Abbaye Sainte-Marie de la Pierre-qui-Vire, Saint-Léger-Vauban, 1956).

Monographies régionales. Alsace : C.F.A. Schaeffer, *les Tertres funéraires de la forêt de Haguenau* (t. II, musée de Haguenau, Haguenau). - Bourgogne : R. Joffroy, *l'Oppidum de Vix et la civilisation hallstattienne finale dans l'est de la France*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60). - Provence : F. Benoît, *Recherches sur l'hellénisation du midi de la Gaule* (Ophrys, Gap, 1965). - M. Louis et O. et J. Taffanel, *le Premier Âge du fer languedocien*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études ligures, Bordighera, 1955-1960). - M. Py, *Recherches sur Nîmes préromaine* (Ed. du C.N.R.S., Paris, 1981).

Rites funéraires et tombes à char. R. Joffroy, *les Sépultures à char du premier âge du fer en France* (A. et J. Picard, Paris, 1958), *le Trésor de Vix* (P.U.F., Paris, 1954), *Vix et ses trésors* (Tallandier, Paris, 1979).

3. 罗马征服前的高卢

Textes. G. Dottin, *Manuel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 l'antiquité celtique* (Champion, Paris, 1906 ; ouvrage qui donne les textes des auteurs anciens qui ont parlé de la Gaule et des Celtes).

Généralités. M. Dillon et N. K. Chadwick, *les Royaumes celtiques* éd. augmentée de l'œuvre de J. Guyonvarchh et F. Leroux, *la Gaule dans le monde celtique* (Fayard, coll. « L'Aventure des civilisations », nouv. éd., 1977). - P.M. Duval, *les Celtes* (Gallimard, coll. « L'Univers des formes », Paris, 1977) ; *Travaux sur la Gaule (1946-1986)* [De Boccard, coll. de la D.E.F.A.R., Rome-Paris, 1990, 2 vol.]. - Ch. Gaudineau, *César et la Gaule* (Errance, Paris, 1990). - A. Grenier, *les Gaulois* (Payot, Paris, 1945). - J. Harmand, *Vercingétorix* (Fayard, Paris, 1984). - C. Jullian, *Histoire de la Gaule* (t. I, II et III, Hachette, Paris, 1907-1909). - V. Kruta, *les Celtes* (Hatier, Paris, 1978) ; *les Celte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649, Paris, 5e éd., 1990). - M. Rambaud, *César*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049, Paris, 4e éd., 1983). - E. Thévenot, *Histoire des Gauloi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06, Paris, 8e éd., 1987).

4. 罗马高卢人

Généralités. R. Bloch et J. Cousin, *Rome et son destin* (A. Colin, Paris, 1960). - F. Jacques et J. Scheid, *Rome et l'intégration de l'Empire, 44 av. J.-C.-260 apr. J.-C.*, t. I : *les Structures de l'Empire romain*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Paris, 1990). - P. Grimal, *la Civilisation romaine* (Arthaud, Paris, 1960). - L. Harmand, *l'Occident romain. Gaule, Espagne, Bretagne, Afrique du Nord (31 av. J.-C.-235 ap. J.-C.)* [Payot, coll. «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 Paris, nouv. éd., 1989]. - P. Lévêque, *Empires et barbaries. IIIe s. av. J.-C.-Ier s. apr. J.-C.*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 t. III, nouv. éd., Paris, 1974). - M. Meuleau, *le Monde antique* (t. II, Bordas-Laffont, Paris, 1965). - P. Petit, *la Paix romaine*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9, Paris, nouv. éd., 1982). - M. Rouche, *les Empires universels. IIe-IVe siècle*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 t. IV, nouv. éd., Paris, 1974).

Synthèses sur la Gaule romaine. F. Beck et H. Chew, *Quand les Gaulois étaient Romains* (Gallimard, coll. « Découvertes », Paris, 1989). - G. Coulon, *les Gallo-Romains : au carrefour de deux civilisations* (A. Colin, coll. « Civilisations », Paris, nouv. éd., 1990, 2 vol.). - P.M. Duval, *la Vie quotidienne en Gaule romaine pendant la paix romaine (Ier-IIIe s. apr. J.-C.)* [Hachette, Paris, 1953]. - A. Grenier, *la Gaule, province romaine* (Didier, Paris, 1946). - J.J. Hatt, *Histoire de la Gaule romaine (120 av. J.-C. à 451 apr. J.-C.). Colonisation ou colonialisme ?* (Payot, coll. «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 Paris, nouv. éd., 1970). - L. Lerat, *la Gaule romaine* (A. Colin, coll. « U2 », Paris, 1977). - F. Lot, *la Gaule, les fondements ethniques, sociaux, politiques de la nation française* (Fayard, Paris, 1947 ; éd. revue et mise à jour par P.-M. Duval, 1967). - E. Thévenot, *les Gallo-Romain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314, 6e éd., Paris, 1983).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administratifs. A. Audin, *Lyon, miroir de Rome dans les Gaules* (Fayard, coll. « Résurrection du passé », Paris, nouv. éd., 1979). - J. Carcopino, *Étapes de l'impérialisme romain* (Hachette, Paris, 1961). - P.M. Duval, *Paris antique, des origines au IIIe siècle* (Hermann, Paris, 1961). - R. Étienne et P. Barrère, *Bordeaux antique* (Fédération historique du Sud-Ouest, Bordeaux, 1962). - Ph. Fabia, *la Table Claudienne de Lyon* (Audin, Lyon, 1929). - M. Gayraud, *Narbonne antique des origines au IIIe siècle* (De Boccard, Paris, 1981). - P. et M. Levêque, *les Villes dans l'Occident romain* (Université de Besançon, Diffusion Belles-Lettres, 1984). - H.-G. Pflaum, *le Marbre de Thorigny* (Champion, Paris, 1948) ; *les Fastes de la province de Narbonnaise* (Éd. du C.N.R.S., Paris, 1978). - J. Prieur, *la Province romaine des Alpes Cottiennes* (Publications du Centre d'études gallo-romaine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de Lyon, Lyon, 1968). - W. Seston, *Dioclétien et la Tétrarchie* (E. de Boccard, Paris, 1946). - P. Wuilleumier, *Lyon, métropole des Gaules*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53).

Économie et société. R. Dion, *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 (chez l'auteur, Paris, 1959). - A. Grenier, *la Gaule romaine* (dans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sous la direction de T. Frank) [vol. III, Baltimore, 1937]. - J.J. Hatt, *la Tombe gallo-romaine* (Picard, nouv. éd., 1986). - F. Hermet, *la Graufesenque* (Leroux, Paris, 1934). - M. Le Glay, « la Gaule romanisée », dans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sous la direction de G. Duby et A. Wallon (Le Seuil, Paris, 1975, t. I, pp. 190-285). - A. Piganiol, *les Documents cadastraux de la colonie romaine d'Orange* (C.N.R.S., Paris, 1963). - M. Renard, *Technique et agriculture en pays trévire et rémois* (Latomus, Berchem, 1959).

- J.A. Stanfield et J. Simpson, *Central Gaulish Potters*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58).

Vie religieuse et culturelle. F. Benoît, *Mars et Mercure, 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interprétation gauloise des divinités romaines* (Ophrys, Gap, 1959). - P.M. Duval, *les Dieux de la Gaule* (P.U.F., Paris, 1957). - R. Étienne, S. Prete, L. Desgraves, *Ausone humaniste aquitain* (Société des bibliophiles de Guyenne, 1987). - I. Gobry, *les Moines en Occident*, t. I : *les Origines orientales (de saint Antoine à saint Basile)* [Fayard, Paris, 1965]. - E. Griffe, *la Gaule chrétienne à l'époque romaine* (Letouzey et Ané, Paris, 1947-1965, 3 vol.). - J.J. Hatt, *Sculptures gauloises* (Éd. du Temps,Paris, 1966). - H. Schoppa, *Die Kunst des Römerzeit in Gallien, Germanien und Britannien* (Fribourg, 1958). - H. Stern, *Recueil général des mosaïques de la Gaule* (C.N.R.S., Paris, 1957 et suiv.). - E. Thévenot, *Divinités et sanctuaires de la Gaule* (Fayard, Paris, 1968).

III. 中世纪前期

概况

M. Banniard, *le Haut Moyen Âge occidental*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807, Paris, 2ᵉ éd., 1986). - R. Folz, A. Guillou, L. Musset, D. Sourdel, *De l'Antiquité au monde médiéval* (P.U.F., coll. «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 t. V, Paris, 1972). - R. Fossier (sous la dir. de), *le Moyen Âge*, t. I, *les Mondes nouveaux, 350-950*, t. II, *l'Éveil de l'Europe, 950-1250* (A. Colin, Paris, 2ᵉ éd., 1990). - S. Lebecq, *les Origines franques, Vᵉ-IXᵉ siècle* (Seuil, Points-Histoire,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 t. I, 1990). - F. Lot, *la Fin du monde antique et le début du Moyen Âge* (A. Michel, Paris, nouv. éd. préfacée par P. Riché, 1989). - L. Musset, *les Invasions, les vagues germaniques* (P.U.F., Paris, coll. « Nouvelle Clio », n° 12, 2ᵉ éd., 1969). - P. Riché, *les Invasions barbare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556, Paris, 7ᵉ éd. avec la collab. de P. Le Maître, 1989).

5. 蛮族大迁徙

Textes. P. Courcelle, *Histoire littéraire des grandes invasions germaniqu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Paris, 3ᵉ éd., 1964). - Grégoire de Tours, *Histoire des Francs*, éd. et trad. R. Latouche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63-1965, 2 vol.). - Sulpice Sévère, *Vie de saint Martin*, éd. et trad. J. Fontaine (Éd. du Cerf, Paris, 1968-1969, 3 vol.).

La société et l'économie. S. Dill, *Roman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 (réimpr., New York, 1960). - A.H.M. Jones, *The Decline of the Ancient World* (Londres, 1966). - R. Latouche, *les Origines de l'économie occidentale (IVᵉ-XIᵉ siècle)* [A. Michel, Paris, nouv. éd., 1971]. - R. Macmullen, *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3).

La fin de Rome. A.H.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History* (Blackwell, Oxford, 1964, 3 vol.). - R. Rémondon, *la Crise de l'Empire romain de Marc Aurèle à Anastase*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11, Paris, nouv. éd., 1976). - V.A. Sirago, *Galla Placidia e la transformazione politica dell'Occidente*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Louvain, 1961). - E. Stein, *Histoire du Bas-Empire* (Desclée De Brouwer, Paris, 1949 et 1959, 2 vol.).

Vie religieuse et intellectuelle. M.B. Bruguière, *Littérature et droit dans la Gaule du Vᵉ siècle* (Toulouse, 1974). - Mᵍʳ L. Duchesne, *Histoire ancienne de l'Église* (t. III et IV, Fontemoing, Paris, 1911-1925). - I. Gobry, *les Moines en Occident*, t. II : *l'Enracinement (de saint Martin à saint Benoît)* [Fayard, Paris, 1985]. - E. Griffe, *la Gaule chrétienne à l'époque romaine* (Letouzey et Ané, Paris, 1947-1965, 3 vol.). - J. Hubert, J. Porcher et W. F. Volbach, *l'Europe des invasions* (Gallimard, Paris, 1967). - P. Riché, *Éducation et culture dans l'Occident barbare (VIᵉ-VIIIᵉ siècle)* [Le Seuil, Paris, 4ᵉ éd., 1989]. - An. *Rome et le christianisme dans la région rhénane* (P.U.F., Paris, 1963).

La conquête franque. F. Lot, *Naissance de la France* (Fayard, coll. « Grandes Études Historiques », Paris, 2ᵉ éd., 1970). - E. Salin, *la Civilisation mérovingienne d'après les sépultures, les textes et le laboratoire* (A. et J. Picard, Paris, 2ᵉ éd., 1986-1989, 4 vol.). - J. Stengers, *la Formation de la frontière linguistique de Belgique ou De la légitimité de l'hypothèse historique* (Latomus, Berchem, 1959). - C. Verlinden, *les Origines de la frontière linguistique en Belgique et la colonisation franque*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Bruxelles, 1955).

6. 墨洛温王朝时代

Textes. Grégoire de Tours, *Histoire des Francs*, éd. et trad. R. Latouche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63-1965, 2 vol.). - *Vie des Pères du Jura*, trad. F. Martine (Éd. du Cerf, Paris, 1968). - P. Riché et G. Tate, *Textes et documents d'histoire du Moyen Âge, Vᵉ-Xᵉ siècle*, t. I, *Vᵉ-milieu du VIIIᵉ siècle* (Sedes, Paris, 1972). -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archéologie mérovingienne, éd. *Bretagne, Pays de Loire, Touraine, Poitou à l'époque mérovingienne* (Errance, 1987).

Généralités. H. Atsma éd., « La Neustrie. Les pays au nord de la Loire de 650 à 850 »,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Rouen* (Thorbecke Verlag, Sigmaringen, 1989). - F. Cardot, *l'Espace et le pouvoir : étude sur l'Austrasie mérovingienne*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coll. « Histoir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 n° 17, Paris, 1987). - G. Faider-Feytmans, *la Belgique à l'époque mérovingienne*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Bruxelles, 1964). - G. Fournier, *les Mérovingiens* (P.U.F., coll. « Que sais-je ?, n° 1238, Paris, 1966 ; 6ᵉ éd., 1991). - P. O. Geary, *le Monde mérovingien. Naissance de la Fr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Flammarion, coll. « Histoires », 1989). - M. Rouche, *l'Aquitaine des Wisigoths aux Arabes (418-781). Essai sur le phénomène régional* (coéd. E.H.E.S.S., Jean Touzot, Paris, 1979). - J.-H. Roy et J. Deviosse, *... oct. 733, la bataille de Poitiers*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2, 1966). - G. Tessier, *25 décembre 496, le baptême de Clovis*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1, Paris, 1964). - L. Theis, *Dagobert* (Fayard, Paris, 1982).

Histoire sociale et économique. G. Fournier, *le Peuplement rural en basse Auvergne durant le haut Moyen Âge* (P.U.F., 1962) ; *les Mérovingien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238, Paris, 6ᵉ éd., 1991). - F.L. Ganshof, *Qu'est-ce que la féodalité ?* (Tallandier, 5ᵉ éd., 1982). - R. Latouche, *les Origines de l'économie occidentale (IVᵉ-XIᵉ siècle)* [A. Michel, Paris, nouv. éd., 1971]. - Ch. Lelong, *la Vie quotidienne en Gaule à l'époque mérovingienne*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63).

Vie religieuse et culturelle. M. Banniard, *Genèse culturelle de l'Europe, Vᵉ-VIIIᵉ siècle* (Le Seuil, coll. « Points histoire », n° 127, Paris, 1989). - J. Dubois, L. Beaumont- Maillet, *Sainte-Geneviève de Paris : la vie, le culte, l'art* (Beauchesne, coll. « Saints de tous les temps », nouv. éd., Paris, 1985). - I. Gobry, *les Moines en Occident*, t. III : *De saint Colomban à saint Boniface : le temps des conquêtes* (Fayard, Paris, 1987). - J. Hubert, J. Porcher et W.F. Volbach, *l'Europe des invasions* (Gallimard, Paris, 1967). - E. Mâle, *la Fin du paganisme en Gaule et les plus anciennes basiliques chrétiennes* (Flammarion, Paris, 1950). - O. Pontal, *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Cerf, I.R.H.T., 1989). - P. Riché, *Éducation et culture dans l'Occident barbare (VIe-VIIIe siècle)* [Éd. du Seuil, 4e éd., 1989] ; dans *Histoire spirituelle de la France* (Beauchesne, Paris, 1964 pp. 44-60). - E. Salin, *la Civilisation mérovingienne d'après les sépultures, les textes et le laboratoire* (A. et J. Picard, Paris, 2e éd., 1986-1989, 4 vol.).

IV. 中世纪

概况

A. Chédeville, *la France au Moyen Âg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69, Paris, 7e éd., 1988). - J. Chelini,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8). - R. Delort, *la Vie au Moyen Âge* (Le Seuil, coll. « Points Histoire », n° 62, nouv. éd., Paris, 1982). - G. Demians d'Archimbaud, *Histoire artistiqu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8 ; 2e éd. 1983). - G. Devailly, *l'Occident du Xe au milieu du XIII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70). - G. Duby, *l'É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France, Angleterre, Empire, IXe-XVe siècle* (Aubier, Paris, 1962, 2 vol.) ; *Adolescence de la chrétienté occidentale, 980-1140* (Skira, Genève, 1967 ; Flammarion, Paris, nouv. éd., 1984) ; *l'Europe des cathédrales* (Skira, Genève, 1966) ; *le Moyen Âge : de Hugues Capet à Jeanne d'Arc, 987-1460* (Hachette,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Hachette », t. I, 1987 ; coll. « Pluriel », n° 8457, Paris, 1990). - G. Duby, R. Mantran et collab., *l'Eurasie, XIe-XIIIe siècle* (P.U.F., coll. «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 t. VI, 1982). - J. Favier, *le Temps des principautés, 1000-1515*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t. II, Paris, 1984). - R. Fossier, *Histoire social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A. Colin, coll. « U », Paris, 2e éd., 1984). - R. Fossier (sous la dir. de), *le Moyen Âge*, t. II, *l'Éveil de l'Europe, 950-1250* ; t. III, *le Temps des Crises, 1250-1520* (A. Colin, Paris, 2e éd., 1986 et 2e éd., 1990). - G. Fournier, *l'Occident de la fin du Ve siècle à la fin du IX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70). - G. Fourqui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A. Colin, coll. « U », Paris, 4e éd., 1990). - L. Génicot, *les Lignes de faîte du Moyen Âge* (Casterman, Tournai, 6e éd., 1969). - B. Guillemain, *l'Éveil de l'Europe, 1100-1250*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 t. VI, nouv. éd., 1974). - J. Le Goff, *la Civilisation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Arthaud, coll. « les Grandes Civilisations », Paris, 1964 ; éd. poche, 1984) ; *le Moyen Âge (1060-1330)* [Bordas, coll. l'Aurige, Paris, 1971]. - J.-F. Lemarignier, *la France médiévale : institutions et société* (A. Colin, coll. « U », Paris, 8e éd., 1987). - Ch. Klapisch-Zuber (sous la dir. de), *le Moyen Âge* (Plon, coll. « Histoire des femmes » sous la dir. de G. Duby et de M. Perrot, t. II, Paris, 1991). - R.S. Lopez, *Naissance de l'Europe, V^e-XIVe siècle* (A. Colin, coll. « Destins du monde », Paris, 1962). - F. Lot et R. Fawtier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françaises au Moyen Âge* (P.U.F., Paris, 1957-1962, 3 vol. parus). - M. Pacaut, *les Structures politiques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9). - J. Paul,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9 ; rééd. 1973). - Éd. Perroy, *le Moyen Âge* (P.U.F.,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t. III, Paris, 6e éd., 1980). - P. Riché, *Grandes Invasions et Empires, V^e-Xe siècle*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 t. V, Paris, nouv. éd., 1974).

7. 加洛林王朝的建树

8. 最后的入侵

Textes. Ch. M. de La Roncière, R. Delort et M. Rouche, *l'Europe du Moyen Âg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t. I, 1969). - G. Tessier, *Charlemagne* (A. Michel, coll. « le Mémorial des Siècles », Paris, 1967).

Structures politiques. J. Boussard, *Charlemagne et son temps* (Hachette, Paris, 1968). - R. Delort, *Charlemagne* (MA Éditions, coll. « Le Monde de... », 1986). - J. Devisse, *Hincmar, archevêque de Reims, 845-882* (Droz, Genève, 1976). - J. Dhondt, *Études sur la naissance des principautés territoriales en France (IXe-Xe siècle)* [Bordas, éd. revue par M. Rouche, 1976]. - H. Fichtenau, *l'Empire carolingien* (Payot, coll. «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 Paris, 1958). - R. Folz, *25 décembre 800, le Couronnement impérial de Charlemagne*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3, Paris, 1964). - L. Musset, *les Invasions, le second assaut contre l'Europe chrétienne (VIIe-XIe siècle)* [P.U.F., Paris, coll. « Nouvelle Clio », n° 12 *bis* ; nouv. éd., 1971]. - R. Mussot-Goulard, *Charlemagn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471, Paris, 1re éd., 1984) ; *la France carolingienne, 843-987*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390, 1re éd., 1988). - P. Riché, *les Carolingiens, une famille qui fit l'Europe* (Hachette, Paris, 1983). - L. Theis, *l'Héritage des Charles. De la mort de Charlemagne aux environs de l'An mil* (Le Seuil, Points-Histoire,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 t. II, 1990). - P. Zumthor, *Charles le Chauve* (Tallandier, nouv. éd., Paris, 1981).

Économie et société. R. Boutruche, *Seigneurie et féodalité* (Aubier-Montaigne, Paris, t. I, 1959 ; 2e éd., 1968 ; t. II, 1970). - J. Dhondt, *le Haut Moyen Âge (VIIIe-XIe siècle)*, éd. et mis à jour par M. Rouche (Bordas, Paris, 1976). - R. Doehaerd, *le Haut Moyen Âge occidental.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14, Paris, 3e éd., 1990). - G. Duby, *Guerriers et paysans, VIIe-XIIe siècle. Premier essor de l'économie européenne* (Gallimard, Paris, 1973 ; coll. « Tel », n° 24, Paris, 1978). - F.L. Ganshof, *la Belgique carolingienne*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coll. « Notre passé », Bruxelles, 1958). - R. Latouche, *les Origines de l'économie occidentale (IVe-XIe siècle)* [Albin Michel, Paris, nouv. éd., 1971]. - St. Lebecq, *Marchands et navigateurs frisons du Haut Moyen Âg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1983). - E. Magnou-Nortier, *la Société laïque et l'Église dans la province ecclésiastique de Narbonne de la fin du VIIIe à la fin du XIe siècle* (Association des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Toulouse-Le Mirail, Toulouse, 1974). - P. Riché,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mpire carolingien*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4e éd., 1986).

Vie culturelle. J. Chelini, *l'Aube du Moyen Âge. Naissance de la chrétienté occidentale. La vie religieuse des laïcs à l'époque carolingienne* (Picard, Paris, 1991). - C. Heitz, *l'Architecture religieuse carolingienne* (Picard, Paris, nouv. éd., 1986). - J. Hubert, J. Porcher et W.F. Volbach, *l'Empire carolingien* (Gallimard, coll. « l'Univers des Formes », Paris, 1968).

9. 封建主时代

Textes. L'An Mil, présenté par G. Duby (Gallimard, coll. « Archives », n° 30, Paris, 1973). - *L'An mille. Œuvres de Liutprand, Raoul Glaber, Adémar de Chabannes, Adalbéron, Helgaud*, présentées par E. Pognon (Gallimard, Paris, 1947). - Ch. M. de La Roncière, R. Delort et M. Rouche, *l'Europe du Moyen Âg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t. II, 1969).

Structures politiques. D. Barthélemy, *l'Ordre seigneurial (XIe-XIIe siècle)* [Le Seuil, Points-Histoire,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 t. III, Paris, 1990]. - M. Bloch, *les Rois thaumaturges* (Istra, Strasbourg, 1924 ;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 nouv. éd., Paris, 1983). - P. Bonnassie, *la Catalogne au tournant de l'An Mil* (Albin Michel, 2e éd., 1990). - M. de Bouard, *Guillaume*

le Conquérant (Fayard, Paris, 1984). - M. Bur, *la Formation du Comté de Champagne v. 950-v. 1150* (Publ. de l'Université de Nancy II, Nancy, 1977). - R. Fawtier, *les Capétiens et la France* (P.U.F., Paris, 1942). - R. Fawtier et J.-C. Fawtier Stone, *Autour de la France capétienne : personnages et institutions* (Variorum Reprints, Londres, coll. « Recueil d'études », 267, 1987). - F.L. Ganshof, *Qu'est-ce que la féodalité ?* (Tallandier, coll. « Approches », 6e éd., Paris, 1987). - O. Guillot, *le Comte d'Anjou et son entourage au XIe siècle* (A. et J. Picard, Paris, 1972). - J.-F. Lemarignier, *le Gouvernement royal aux premiers temps des Capétiens (987-1108)* [A. et J. Picard, Paris, 1965]. - A. Lewis, *le Sang royal. La famille capétienne et l'État, France Xe-XIVe siècles* (Gallimard, Paris, 1986). - J.-P. Poly et E. Bournazel, *la Mutation féodale, Xe-XIIe siècle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16, Paris, 2e éd., 1991). - P. Riché, *Gerbert d'Aurillac, le pape de l'An mil* (Fayard, Paris, 1987). - Y. Sassier, *Hugues Capet* (Fayard, Paris, 1986). - L. Theis, *3 juillet 987. L'avènement de Hugues Capet*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4, Paris, 1984).

Économie et société. M. Bloch, *la Société féodale* (A. Michel, Paris, coll. « 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 éd. poche, n° 8, 1983). - P. Bonnassie, *la Catalogne du milieu du Xe à la fin du XIe siècle, croissance et mutation d'une société* (Association des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Toulouse-Le Mirail, Toulouse, 1976). - A. Déléage, *la Vie rurale en Bourgogne jusqu'au début du XIe siècle* (Protat frères, Mâcon, 1941). - G. Devailly, *le Berry du Xe au milieu du XIIIe siècle. Étude politique, religieuse, sociale et économique* (Mouton, La Haye-Paris, 1973). - G. Duby,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dans la région maconnaise* (E.H.E.S.S., coll. « Bibliothèque générale », 3e éd., Paris, 1982) ; *l'É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France, Angleterre, Empire, IXe-XVe siècle* (Aubier, coll. « Historique », Paris, 1962, 2 vol. ; Flammarion, coll. « Champs », nos 26 et 27, Paris, 1977) ; *les Trois Ordres ou l'Imaginaire du féodalisme* (Gallimard, Paris, 1978) ; *le Chevalier, la femme et le prêtre. Le mariage dans la France féodale* (Hachette, coll. « la Force des idées », Paris, 1981) ; *Mâle Moyen Âge. De l'amour et autres essais* (Flammarion, coll. « Champs », 1990). - R. Fossier, *Enfance de l'Europe, Xe-XIIe sièc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17 et 17 *bis*, Paris, nouv. éd., 1989, 2 vol.). - M. Parisse, *la Noblesse lorraine, XIe-XIIIe siècle* (Lille, Université de Lille-III ; Paris, diff. H. Champion, 1976, 2 vol.) ; *les Nonnes au Moyen Âge* (C. Bonneton, Paris, 1983) ; *les Religieuses en France au XIIIe siècle* (études réunies par) [P.U. de Nancy, réimpr. 1991]. - E. Power, *les Femmes au Moyen Âge* (Aubier-Montaigne, coll. « Historique », Paris, 1979). - J. Rossiaud, *la Prostitution médiévale* (Flammarion, coll. « Champs », 1990).

Vie religieuse, attitudes mentales, histoire culturelle. - X. Barral I. Altet (sous la dir. de), *le Paysage monumental de la France autour de l'an mil* (Picard, Paris, 1987) ; *l'Art médiéval*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518, Paris, 1re éd., 1991). - J. Chailley, *Histoire musicale du Moyen Âge* (P.U.F., Paris, coll. « Quadrige », n° 12 bis, nouv. éd., 1984). - Dom J. Leclercq, *l'Amour des lettres et le désir de Dieu* (Éd. du Cerf, Paris, 1957). - M. Pacaut, *l'Ordre de Cluny* (Fayard, coll. «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 1986). - P. Zumthor, *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VIe-XIVe siècle)* [P.U.F., Paris, 1954].

10. 十二世纪的飞跃

Textes. Suger, *Vie de Louis le Gros*, éd. et trad. H. Waquet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29).

Structures politiques. C. Beaune, *la Naissance de la nation France*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 1985). - E. Bournazel, *le Gouvernement capétien au XIIe siècle, 1108-1180. Structures sociales et mutations institutionnelles* (P.U.F., Paris, 1975). - M. Bur, *la Formation du comté de Champagne v. 950-v. 1150* (Publ. de l'université de Nancy-II, Nancy, 1977). - J.-F. Lemarignier, *la France médiévale : institutions et société* (A. Colin, coll. « U », Paris, 9e éd., 1989). - W.M. Newman, *le Domaine royal sous les premiers Capétiens (987-1180)* [Sirey, Paris, 1937]. - M. Pacaut, *Louis VII et son royaume* (S.E.V.P.E.N., Paris, 1964). - St. Scoones, *les Noms de quelques officiers féodaux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XIIe siècle* (Klincksieck, Paris, 1976).

Économie et société. M. Bourin-Derruau et R. Durand, *Vivre au village au Moyen Âge* (Messidor, 1984). - A. Chédeville, *Chartres et ses campagnes, XIe-XIIIe siècle* (Klincksieck, Paris, 1973). - R. Coquand, P.M. Duval, G. Hubert, G. Livet et L. Trenard, *les Routes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nos jours* (Hachette, Paris, 1959). - G. Devailly, *le Berry du Xe siècle au milieu du XIIIe siècle. Étude politique, religieuse, sociale et économique* (Mouton, Paris-La Haye, 1973). - J. Flori, *l'Essor de chevalerie* (Droz, Genève, 1986). - R. Fossier, *Chartes de coutume en Picardie, XIe-XIIIe siècl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1974). - F.L. Ganshof, *Étude s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villes entre Loire et Rhin au Moyen Âge* (P.U.F., Paris, 1943). - J. Gardelles et J. Lafaurie, *Bordeaux pendant le haut Moyen Âge* (Fédération historique du Sud-Ouest, Bordeaux, 1963). - J. Heers, *la Ville au Moyen Âge en Occident* (Fayard, 1990). - M. Pastoureau,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au temps des chevaliers de la Table ronde, XIIe-XIIIe siècle*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76). - C. Petit-Dutaillis, *les Communes françaises. Caractères et évolution, des origines au XVIIIe siècle* (A. Michel, coll. « 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 t. XLIV, Paris, 1947 ; nouv. éd. poche, 1970). - J.P. Poly, *la Provence et la société féodale, 879-1166.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structures dites féodales dans le Midi* (Bordas, Paris, 1976). - P. Wolff et P. Dollinger, *Bibliographie d'histoire des villes de France* (Klincksieck, Paris, 1967).

Vie religieuse, enseignement, histoire culturelle. Pierre Abélard. Pierre le Vénérable. Les courants philosophiques, littéraires et artistiques en Occident au milieu du XIIe siècle. Abbaye de Cluny, 2 au 9 juillet 1972 (C.N.R.S., Paris, 1975). - R.R. Bezzola, *les Origines et la form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ourtoise en Occident (500 à 1200)* [Champion, Paris, 1946-1960]. - R. Crozet, *l'Art roman* (P.U.F., Paris, 1981). - H. Davenson, *les Troubadours* (Éd. du Seuil, Paris, 1960). - G. Duby, *la Sculpture. Le grand art du Moyen Âge du Ve au XVe siècle* (Skira, Genève, 1990). - H. Focillon, *Art d'Occident : le Moyen Âge roman et gothique* (A. Colin, Paris, 1937). - J. de Ghellinck, *l'Essor de la littérature latine au XIIe siècle* (Desclée De Brouwer, Paris, 1946). - E. Gilson, *la Philosophie au Moyen Âge* (Payot, Paris, 4e éd., 1962). - M. Hélin, *la Littérature latine au Moyen Âge* (P.U.F., Paris, 1972). - J. Longère, *Œuvres oratoires de maîtres parisiens au XIIe siècle. Étude historique et doctrinale* (Études augustiniennes, Paris, 1975, 2 vol.). - J. Paul, *l'Église et la culture en Occident, IXe-XIIe siècle* (P.U.F., « Nouvelle Clio » n° 15 et 15 *bis*, 1986). - P. Miché, *Petite Vie de saint Bernard* (Desclée de Brouwer, coll. « Petites Vies », Paris, 1989). - A. Vauchez, *les Laïcs au Moyen Âge : pratiques et expériences religieuses* (Cerf, coll. « Histoires », 1987). - J. Vignaud, *la Pensée au Moyen Âge* (A. Colin, Paris, nouv. éd., 1958).

11. 卡佩王朝的整合

Textes. Joinville, *Histoire de Saint Louis*, éd. par A. Pauphilet et Ed. Pognon, dans *Historiens et Chroniqueurs du Moyen Âge* (Gallimard, Paris, 1952). - *Les propos de Saint Louis*, présentés par D. O'Connell et préfacés par J. Le Goff (Gallimard, « Archives », Paris, 1974). - *La Croisade albigeoise*, présentée par M. Zerner-Chardavoine (Gallimard, « Archives », Paris, 1979).

Structures politiques. J. Baldwin, *Philippe Auguste* (Fayard, Paris, 1991). - R.-H. Bautier présente *la France de Philippe Auguste. Le temps des mutations* (C.N.R.S., 1983). - M. Bourin, *Temps d'équilibres, temps de ruptures 1200-1350* (Le Seuil, coll. « Points »,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 t. 4, Paris, 1990). - R. Fawtier, *les Capétiens et la France* (P.U.F., Paris, 1942). - R. Fédou, *l'État au Moyen Âge* (P.U.F., coll. « l'Historien », n° 8, Paris, 1971). - C. Petit-Dutaillis, *la Monarchie féodale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x^e-xııı^e siècle)*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puis A. Michel, coll. « 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 t. XLI, Paris, éd. poche, 1971]. - J. Richard, *les Ducs de Bourgogne et la formation du duché du XIe au xıv^e siècle* (Slatkine, Genève, réimpr. 1987); *Saint Louis* (Fayard, 1983). - G. Sivery, *Saint Louis et son siècle* (Tallandier, coll. « Figures de proue », Paris, 1983); *Marguerite de Provence. Une reine au temps des cathédrales* (Fayard, 1987); *Blanche de Castille* (Fayard, 1990).

Économie et société. P. Desportes, *Reims et les Rémois aux XIIIe et xıv^e siècles* (A. et J. Picard, Paris, 1979). - G. Duby, *27 juillet 1214. Le dimanche de Bouvines*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5, Paris, 1973, coll. « Folio-Histoire », n° 1, 1985); *la Société aux XIe et xıı^e siècles dans la région mâconnaise* (S.E.V.P.E.N., Paris, 2e éd., 1971). - R. Fossier, *la Terre et les hommes en Picardie jusqu'à la fin du xııı^e siècle* (Nauwelaerts, Paris-Louvain, 1969, 2 vol.). - G. Fourqui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A. Colin, coll. « U », 4e éd., 1990). - Sous la direction de Ch. Higounet, *Histoire de Bordeaux*, t. III, P. Capra, J. Gardelles et B. Guillemain, *Bordeaux sous les rois d'Angleterre* (Fédération historique du Sud-Ouest, Bordeaux, 1965). - M. Th. Lorcin, *la France au xııı^e siècle* (Nathan, Paris, 1975); *Société et cadre de vie en France, Angleterre et Bourgogne : 1050 à 1250* (C.D.U.-S.E.D.E.S., Paris, 1985). - M. Le Méné, *l'Économie médiévale* (P.U.F., coll. « l'Historien », n° 29, 1977). - G. Sivery, *l'Économie du royaume de France au siècle de Saint Lou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III, 1984). - Ph. Wolff, *Histoire de Toulouse* (Privat, Toulouse, 1958).

Vie religieuse, attitudes mentales, histoire culturelle. J.-M. Bienvenu, *Robert d'Arbrissel, l'étonnant fondateur de Fontevraud* (Nouvelles Éditions latines, 1981). - J. Chailley, *Histoire musicale du Moyen Âge* (P.U.F., coll. « Quadrige », n° 12 *bis*, Paris, nouv. éd., 1984). - A. Demurger, *Vie et mort de l'Ordre du Temple : 1118-1314* (Le Seuil, coll. « Points Histoire », Paris, 2e éd., 1989). - J. Fouquet et Philippe-Étienne, *Histoire de l'Ordre de Grandmont, 1074-1772* (C.L.D., Paris, 1985). - É. Gilson, *la Philosophie au Moyen Âge* (Payot, Paris, 4e éd., 1962). - J. Le Goff, *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Âge* (Éd. du Seuil, coll. « Points Histoire », Paris, nouv. éd. 1985). - E.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Gallimard, Paris, 1975). - M. Th. Lorcin, *Façons de sentir et de penser : les fabliaux français* (H. Champion, coll. « Essais », Paris, 1979). - M. Mollat et A. Vauchez (sous la dir. de), *Un temps d'épreuves (1274-1449)* [Desclée de Brouwer-Fayard, coll. « Histoire du christianism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 t. VI, 1991]. - E. Panofsky, *Architecture gothique et pensée scolastique* (Éd. de Minuit, Paris, 1967). - J. Verger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en France* (Privat, Toulouse, coll. «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Privat », 1986). - M.H. Vicaire (sous la dir. de), *les Moines noirs, xııı^e-xıv^e siècle* (Privat, Toulouse, coll. « Cahiers de Fanjeaux », n° 29, 1984). - P. Zumthor, *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vı^e-xıv^e siècle)* [P.U.F., Paris, 1954].

12. 伟大的王国

Histoire et structures politiques. A. Artonne, *le Mouvement de 1314 et les chartes provinciales de 1315* (Alcan, Paris, 1912). - B. Chevalier, *l'Occident de 1280 à 1492* (A. Colin, coll. « U », Paris, nouv. éd., 1986). - R. Cazelles, *la Société politique et la crise de la royauté sous Philippe VI de Valois* (D'Argences, Paris, 1958). - J. Favier, *Philippe le Bel* (Fayard, Paris, 1978). - B. Guenée, *Entre l'Église et l'État : quatre vies de prélats français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xııı^e-xve siècle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 1987). - Ch. V. Langlois, *le Règne de Philippe III le Hardi* (Hachette, Paris, 1887). - P. Lehugeur, *Histoire de Philippe V le Long, roi de France* (t. I, Hachette, Paris, 1897 ; t. II, Sirey, Paris, 1931). - G. Zeller, « les Rois de France candidats à l'Empire », dans *Revue historique* (t. CLXXIII, 1934).

Économie, société, démographie. E. Baratier, *la Démographie provençale du XIIIe au xvı^e siècle* (S.E.V.P.E.N., Paris, 1961). - R. Cazelles,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 de la fin du règne de Philippe Auguste à la mort de Charles V, 1223-1380* (Hachette, Paris, 1972). - Ph. Dollinger, « le Chiffre de population de Paris au xıv^e siècle : 210 000 ou 80 000 habitants ? » dans *Revue historique* (t. CCXVI, 1956, pp. 35-44). - E. Fournial, *les Villes et l'économie d'échange en Forez aux xııı^e et xıv^e siècles* (Klincksieck, Paris, 1967). - G. Fourquin, « la Population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aux environs de 1328 », dans *Moyen Âge* (1956); *le Domaine royal en Gâtinais d'après la prisée de 1332* (S.E.V.P.E.N., Paris, 1963). - A. Higounet-Nadal, *Périgueux aux xıv^e et xve siècles. Étude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Bordeaux, 1978). - Ch. Higounet, *la Grange de Vaulerent. Structure et exploitation d'un terroir cistercien de la plaine de France (xıı^e-xve siècle)* [S.E.V.P.E.N., Paris, 1965]. - B. Leroy, *la Navarre au Moyen Âge* (Albin Michel, coll. « l'Aventure humaine », Paris, 1984). - F. Lot, « l'État des paroisses et des feux de 1328 », dans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929). - J.M. Richard, « Thierry d'Hireçon, agriculteur artésien », dans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892). - J. Schneider, *la Ville de Metz aux xııı^e et xıv^e siècles* (impr. G. Thomas, Nancy, 1950). - R.-W. Southern, *l'Église et la Société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Flammarion, coll. « Nouvelle Bibliothèque scientifique », 1987). - Ph. Wolff, *les « Estimes » toulousaines des xıv^e et xve siècles* (Association Marc-Bloch, Toulouse, 1956).

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G. de Lagarde, *Naissance de l'esprit laïque au déclin du Moyen Âge* (P.U.F., Paris, 1948). - Ch. V. Langlois, *la Vie en France au Moyen Âge, de la fin du XIIe au milieu du xıv^e siècle* (Hachette, Paris, 1924-1928). - J. Lods, *le Roman de Perceforest. Origines. Composition. Valeur et influence* (Droz, Genève, 1951). - M. Pastoureau, *Figures et couleurs : études sur la symbolique et la sensibilité médiévales* (Léopard d'Or, 1986); *Couleurs, images, symboles* (Léopard d'Or, 1989). - Y. Renouard, « l'Ordre de la Jarretière et l'ordre de l'Étoile. Étude sur la genèse des ordres laïcs de chevalerie et sur le développement progressif de leur caractère national », *le Moyen Âge* (1949, n°s 3 et 4, p. 281-300).

Les débuts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E. Déprez, *les Préliminaires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Fontemoing, Paris, 1902). - Jean le Bel, *Chronique*, éd. J. Viard et E. Déprez (Laurens, Paris, 1904). - E. Perroy, *la Guerre de Cent Ans* (Gallimard, Paris,

1946 ; nouv. éd., 1976). - P.C. Timbal et coll., *la Guerre de Cent Ans vue à travers les registres du Parlement* (C.N.R.S., Paris, 1961). - Ph. Wolff, « Un problème d'origines : la guerre de Cent Ans », dans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A. Colin, Paris, 1954).

13. 苦难时代

Sources. Thomas Basin, *Histoire de Charles VII*, éd. Ch. Samaran (Les Belles Lettres, « les Classiqu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au Moyen Âge », n°s 15 et 21, Paris, 2e éd., 1964-1965, 2 vol.). - A. Chartier, *Œuvres latines* (éd. P. Bourgain-Hemerick Paris, 1977). - *Chronique des règnes de Jean II et de Charles V*, éd. R. Delachenal (Laurens et Champion,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916-1920, 4 vol.). - J. Froissart, *Chroniques* (éd. S. Luce-G. Raynaud-L. et A. Mirot Renouard, Laurens et Klincksieck,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5 vol., parus de 1869 à 1976). -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Paris (1405-1449)*, éd. A. Tuetey (Champion,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881). - J. Juvénal des Ursins, *Histoire de Charles VI*, dans Michaud et Buchon, *Choix de chroniques*, pp. 333-469 (Paris, 1829). - J. Juvénal des Ursins, *Écrits politiques*, éd. P.S. Lewis et A.M. Hayez (C. Klincksieck,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n° 489 et n° 496, Paris, 1979 et 1985, 2 vol. parus). - J. Le Fevre, *Journal*, éd. H. Moranvillé (Paris, 1887). - Chr. de Pisan, *le Livre des fais et bonnes meurs du sage roy Charles V*, éd. Solente (Champion,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936-1941, 2 vol.). - J. de Roye, *Journal dit Chronique scandaleuse*, éd. B. de Mandrot (Renouard,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894 et 1896, 2 vol.). - P.C. Timbal et coll., *la Guerre de Cent Ans vue à travers les registres du parlement (1337-1369)* [C.N.R.S., Paris, 1961]. - J. de Venette, *Continuation de Guillaume de Nangis (1300-1368)*, t. II, éd. Géraud (Renouard,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Paris, 1844).

Généralités. Ch. Allmand, *la Guerre de Cent Ans*, trad. par Ch. Cler (Payot, 1989). - Ph. Contamine, *la Guerre de Cent Ans* (P.U.F., Paris, coll. « Que sais-je ? », n° 1309, 1968, 5e éd., 1989) ; *la Vie quotidienne pendant la guerre de Cent Ans, France et Angleterre*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77) ; *la Guerre au Moyen Âge*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24, Paris, 2e éd., 1986). - G. Duby et R. Mandrou,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t. Ier (A. Colin, coll. « U », Paris, 7e éd., 1984). -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évolution*, sous la dir. d'E. Lavisse ; t. IV, Ire partie, A. Coville, *les Premiers Valois et la guerre de Cent Ans (1328-1422)* ; 2e partie, Ch. Petit-Dutaillis, *Charles VII, Louis XI et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Charles VIII (1422-1492)* [Hachette, Paris, 1911]. - A. Demurger, *Temps de crises, temps d'espoirs. XIVe-XVe siècles* (Le Seuil, coll. « Points »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 t. 5, Paris, 1990). - J. Favier, *De Marco Polo à Christophe Colomb (1250-1492)*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 t. VII, Paris, nouv. éd., 1974]. - J. Favier, *La Guerre de Cent Ans, 1337-1453* (Fayard, 1980 ; Marabout, coll. « Marabout Université » n° 426, nouv. éd., Paris, 1983). - J. Favier, *le Temps des principautés (1000-1515)*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t. II, Paris, 1984]. - R. Fédou, *Lexique historique du Moyen Âg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3e éd., 1989). - A. Leguai, *la Guerre de Cent Ans* (Nathan, Paris, 1974). - P. Lewis, *la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Hachette, Paris, 1977). - E. Perroy, *la Guerre de Cent Ans* (Gallimard, Paris, nouv. éd., 1976).

Structures politiques et événements. F. Autrand, *Naissance d'un grand corps de l'État. Les Gens du Parlement de Paris, 1345-1454*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81). - Fr. Autrand, *Charles VI* (Fayard, Paris, 1986). - J. d'Avout, *la Querelle des Armagnacs et des Bourguignons* (Gallimard, Paris, 1943) ; *31 juillet 1358, le meurtre d'Étienne Marcel*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histoire de France », n° 8, Paris, 1960). - R.-H. Bautier présente *la « France anglaise » au Moyen Âge* (C.T.M.S., « Actes du IIIe congrès national des sociétés savantes [Poitiers, 1986], Paris, 1988. - R. Cazelles, *la Société politique et la crise de la royauté sous Philippe de Valois* (Librairie d'Argences, Paris, 1958) ; « Jean II le Bon. Quel homme ? Quel roi ? » (*Revue historique*, 1974, pp. 5-26). - R. Cazelles, *Société politique, noblesse, couronne sous Jean II le Bon et Charles V* (Genève, Droz, 1982). - R. Cazelles, *Étienne Marcel, champion de l'unité française* (Tallandier, coll. « Figures de proue », Paris, 1984). - Ph. Contamine, *Guerre, État et société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Mouton, Paris-La Haye, 1972). - R. Delachenal, *Histoire de Charles V* (A. et J. Picard, Paris, 1909-1931, 5 vol.). - J. Deniau, *la Commune de Lyon et la guerre bourguignonne, 1417-1435* (Masson, Lyon, 1935). - B. Guenée, *l'Occident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Les État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22, Paris, 3e éd., 1987). - B. Guenée et F. Lehoux, *les Entrées royales françaises, 1328-1515* (C.N.R.S., Paris, 1968). - J.B. Henneman, *Royal Taxation in fourteenth 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1971). - M. Jones, *Ducal Britanny, 1364-1399* (Oxford, 1970). - A. Leguai, *les Ducs de Bourbon pendant la crise monarchique du XVe siècle*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62) ; *De la seigneurie à l'État. Le Bourbonnais pendant la guerre de Cent Ans* (Impr. réunies, Moulins, 1969). - F. Lehoux, *Jean de France, duc de Berri* (A. et J. Picard, Paris, 1966-1968, 4 vol.). - E. Le Roy Ladurie, *l'État royal de Louis XI à Henri IV, 1460-1610* (Hachette,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Hachette », 1987 ; coll. « Pluriel », 1990). - R. Pernoud et M.V. Clin, *Jeanne d'Arc* (Fayard, 1986). - J. Quillet, *Charles V, le roi lettré. Essai sur la pensée politique d'un règne* (Perrin, Paris, 1984). - M. Rey, *le Domaine du roi et les finances extraordinaires sous Charles VI (1388-1413)* [S.E.V.P.E.N., Paris, 1965] ; *les Finances royales sous Charles VI. Les causes du déficit (1388-1413)* [S.E.V.P.E.N., Paris, 1965]. - P. Tucoo Chala, *Gaston Fébus. Un grand prince d'Occident* (Marimpouey jeune, Pau ; Paris, diff. Touzot, 1976). - M.G.A. Vale, *English Gasconny, 1399-145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Charles VII*, (Londres, 1974). - R. Vaughan, *Philip the Bold* (Longman, Londres, 1962) ; *John the Fearless* (Longman, Londres, 1966) ; *Philip the Good. The Apogee of Burgundy* (Longman, Londres, 1970).

Économie et société. É. Baratier, *la Démographie provençale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 (S.E.V.P.E.N., Paris, 1961). - É. Baratier et F. Reynaud,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t. II, *De 1291 à 1480* (Plon, Paris, 1951). - C. Billot, *Chartres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E.H.E.S.S., Paris, 1987). - J. N.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méditerranéens* (Mouton, Paris-La Haye, 1975-76, 2 vol.). - G. Bois, *Crise du féodalisme*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Paris, 2e éd., 1981). - R. Boutruche, *la Crise d'une société. Seigneurs et paysans du Bordelais pendant la guerre de Cent Ans*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2e éd., 1963). - M.-Th. Caron, *la Noblesse dans le duché de Bourgogne (1315/1477)*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Lille, 1987]. - E. Carpentier, « Autour de la peste noire : famines et épidémies dans l'histoire du XIVe siècle », dan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A. Colin, Paris, 1962, pp. 1062-1092). - E. Carpentier et J. Glénisson, « Bilans et Méthodes : la démographie française au XIVe siècle », dan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A. Colin, Paris, 1962). - R. Cazelles, *Paris de la fin du règne de Philippe Auguste à la mort de Charles V (1223-1380)*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Paris, 1972]. - B. Chevalier, *Tours, ville royale,*

1356-1520 (Vander/Nauwelaerts, Louvain-Bruxelles, Paris-Louvain, 1975) ; « Pouvoir urbain et pouvoir royal à Tours pendant la guerre de Cent Ans » *Annales de Bretagne*, 1974 ; *les Bonnes Villes de France du* XIVe au XVIe *siècle* (Aubier, coll. « Historique », 1982). - Ph. Contamine (présentés par), *la Noblesse au Moyen Âge du* XIe au XVe *siècle, essais à la mémoire de R. Boutruche* (P.U.F., Paris, 1976). - R. Delort, *le Commerce des fourrures en Occident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Rome-Paris, De Boccard, coll. « B.E.F.A.R. », fasc. 236, 1974-1980, 2 vol.). - H. Dubois, *les Foires de Chalon et le commerce dans la vallée de la Saôn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vers 1280-vers 1430)* [Imprimerie nationale, coll. «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 série Sorbonne 4, Paris, 1976]. - G. Duby, *l'É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France, Angleterre, Empire,* IXe-XVe *siècle*, t. II (Aubier, Paris, 1962). - J. Favier, *Paris au* XVe *siècle, 1380-1500* (Hachette,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 Paris, 1974). - J. Favier, *les Finances pontificales à l'époque du Grand Schisme d'Occident* (De Boccard, coll. de la « B.E.F.A.R. », fasc. 211, Paris, 1966). - J. Favier, *François Villon*, (Fayard, Paris, 1982). - R. Favreau, *la Ville de Poitiers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Une capitale régionale* (Soc. des Antiquaires de l'Ouest, Poitiers, 1978, 2 vol.). - É. Fournial, *les Villes et l'économie d'échange en Forez aux* XIIIe et XIVe *siècles* (Klincksieck, Paris, 1967). - G. Fourquin, *les Campagnes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U.F., Paris, 1963). - B. Geremek, *le Salariat dans l'artisanat parisien,* XIIIe-XVe *siècle* (Mouton, Paris-La Haye, 1969) ; *les Marginaux parisiens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Flammarion, coll. « l'Histoire vivante », Paris, 1976). - P. Gresser, *la Franche-Comté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L'être, Besançon, 1990). - B. Guillemain, *la Cour pontificale d'Avignon, 1309-1376, l'Étude d'une société* (De Boccard, coll. de la B.E.F.A.R., fasc. 201, Paris, 2e éd., 1966). - J. Heers, *l'Occident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23, Paris, 5e éd., 1990). - A. Higounet-Nadal, *Périgueux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Fédération historique du Sud-Ouest, Bordeaux, 1978). - Ch. Higounet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 Bordeaux*, t. III et IV (Fédération historique du Sud-Ouest, Bordeaux, 1965 et 1966). - F. Humbert, *les Finances municipales de Dijon du milieu du* XIVe *siècle à 1477*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Dijon ;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62). - M. Kriegel, *les Juifs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dans l'Europe méditerranéenne* (Hachette, Paris, 1979). - M.T. Lorcin, *les Campagnes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l'auteur, Paris-Lyon, 1974). - M. Mollat, *les Pauvres au Moyen Âge. Étude sociale* (Complexe, coll. « Historique », nouv. éd., Bruxelles, 1984). - M. Mollat et Ph. Wolff, *Ongles bleus, Jacques et Ciompi* (Calmann-Lévy, Paris, 1970). - G. Sivery, *les Structures agraires et la vie rurale dans le Hainaut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Lille, 1973). - L. Stouff, *Ravitaillement et alimentation en Provenc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Mouton, Paris-La Haye, 1971). - M.R. Thielemans, *Bourgogne et Angleterre :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entre les Pays-Bas bourguignons et l'Angleterre, 1435-1467* (Institut de sociologie de l'université libre, Bruxelles, 1966). - *Villages désertés et histoire économique* (S.E.V.P.E.N., Paris, 1965). - Ph. Wolff, *Commerces et marchands de Toulouse (vers 1350-vers 1450)* [Plon, Paris, 1954] ; « les Luttes sociales dans les villes du Midi français (XIIIe-XVe siècle) », dans *Annales* E.S.C. (A. Colin, Paris, 1947, pp. 443-454) ; *Regards sur le Midi médiéval* (Toulouse, 1978) ; *Automne du Moyen Âge ou printemps des temps nouveaux ? L'économie européenne aux* XIVe et XVe *siècles* (Aubier, coll. « Historique », Paris, 1986). - M. Zerner, « En Provence, une crise de mortalité au XVe siècle » (*Annales*, E.S.C., 1979, n° 3).

Vie religieuse. Attitudes mentales. Histoire culturelle. L. Binz, *Vie religieuse et réforme ecclésiastique dans le diocèse de Genève, 1378-1450* (Jullien, Genève, 1973). - J. Chailley, *Histoire musicale du Moyen Âge* (P.U.F., « coll. Quadrige », n° 55, Paris, nouv. éd., 1984). - A. Chiffoleau, *la Comptabilité de l'Au-delà. Les hommes, la mort et la religion dans la région d'Avignon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vers 1320-vers 1480)* [Palais Farnèse, « 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 1980]. - E. Delaruelle, E.R. Labande et P. Ourliac, *l'Église au temps du Grand Schisme et de la crise conciliaire (1378-1449)*, dans *Histoire de l'Église*, fondée par A. Fliche et V. Martin, t. XIV (Bloud et Gay, Paris, 1962). - J. Delumeau, *la Peur en Occident (*XIVe-XVIIIe *siècle). Une cité assiégée* (Fayard, Paris, 1978). - G. Duby, *Fondements d'un nouvel humanisme, 1280-1440* (Skira, Genève, 1966) ; *le Temps des cathédrales : l'art et la société, 980-1420* (Gallimard, Paris, 1978). - B. Guenée, *Histoire et culture historique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Aubier, coll. « Historique », nouv. éd., 1991). - J. Huizinga, *le Déclin du Moyen Âge* (Payot, Paris, 1948) ; *l'Automne du Moyen Âge* [nouveau titre du précédent ouvrage] (Payot, Paris, 1977). - F. Lebrun (sous la dir. de), *Du christianisme flamboyant à l'aube des lumières (*XIVe-XVIIIe *siècle)* (Le Seuil, coll. « Histoire de la France religieuse » sous la dir. de J. Le Goff et de R. Rémond, t. III, 1988). - É. Mâle, *l'Art religieux de la fin du Moyen Âge en France* (A. Colin, Paris, 1948). - H. Martin, *les Ordres mendiants en Bretagne, vers 1250-vers 1530* (Klincksieck, Paris, 1975). - M. Meiss, *French Painting in the Time of Jean de Berry* (Phaidon, Londres-New York, 1969, 2 vol.). - M. Parisse, *les Nonnes au Moyen Âge* (C. Bonneton, Paris, 1983). - D. Poirion, *le Poète et le pri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Grenoble-Paris, 1965) ; *le Moyen Âge II, 1300-1480*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rthaud, Paris, 1971). - F. Rapp, *l'Église et la vie religieuse en Occident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25, Paris, 3e éd., 1983). - A. Tenenti, *la Vie et la Mort à travers l'art du* XVe *siècle* (S. Fleury, coll. « la Mesure du temps », nouv. éd., 1982). - J. Toussaert, *le Sentiment religieux en Flandr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lon, Paris, 1963). - *Les Universités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éd. par J. Paquet et J. Isewijn (Louvain, 1978). - A. Vauchez, *la Sainteté en Occident aux derniers siècles du Moyen Âge (1198-1431). Recherches sur les mentalités religieuses médiévales* (De Boccard, coll. de la B.E.F.A.R., fasc. 239, Rome-Paris, 1981). - A. Vauchez et M. Mollat du Jourdin (sous la dir. de), *Un temps d'épreuves : 1274-1449*, t. VI de l'*Histoire du christianism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sous la dir. de J.-M. Mayeur, Ch. Piétri, A. Vauchez, M. Vénard (Fayard, Desclée, 1990). - J. Verger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en France* (Privat, coll. «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Privat, Toulouse, 1986).

14. 从重建到扩张

Textes. Thomas Basin, *Histoire de Louis XI*, éd. Ch. Samaran et M.-C. Garand (Les Belles Lettres, coll. « les Classiqu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au Moyen Âge », n°s 26, 27 et 30, Paris, nouv. éd., 1963-1972, 3 vol). - Jean d'Auton, *Chronique de Louis XII* (S.H.F., Paris, 1889-1895, 4 vol.) ; *Affaires de Jacques Cœur. Journal du Procureur Dauvet*, éd. M. Mollat (S.E.V.P.E.N., Paris, 1952-53, 2 vol.). - Philippe de Commynes, *Mémoires*, éd. J. Calmette et G. Durville (Les Belles Lettres, coll. « les Classiqu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au Moyen Âge », n°s 3, 5 et 6, Paris, nouv. éd., 1964-1965).

Généralités. J. Calmette et E. Déprez, *Histoire générale*, t. VII, *l'Europe occidentale de la fin du* XIVe *siècle aux guerres d'Italie* : 2e partie, *les Premières Grandes Puissances* (P.U.F., Paris, 1939). - B. Guenée, *l'Occident aux* XIVe et XVe s. *Les État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22, Paris, 3e éd., 1983).

- P. Lewis, *la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Hachette, Paris, 1977). - M. Mollat, *Genèse médiévale de la France moderne, xive-xve siècle* (Arthaud, Paris, 1970, rééd. Le Seuil, 1977). - E. Perroy, *la Guerre de Cent Ans* (Gallimard, coll. « la Suite des temps », Paris, 1946 ; nouv. éd., 1976).

Vie politique et institutions. J. Bartier, *Charles le Téméraire* (Arcade, Bruxelles, 1970) ; *Légistes et gens de finances au xve siècle. Les conseillers des ducs de Bourgogne Philippe le Bon et Charles le Téméraire* (Académie royale, Bruxelles, 1955). - B. Chevalier, Ph. Contamine (sous la dir. de), *la France de la fin du xve siècle : renouveau et apogée, économie, pouvoirs, arts, culture et conscience nationale* (Centre d'études supérieures de la Renaissance, Tours, 3-6 octobre 1983, éd. du C.N.R.S., 1986). - P. Champion, *Louis XI* (Champion, Paris, 1927, 2 vol. ; Slatkine, Genève, nouv. éd., 1984). - P.-R. Gaussin, *Louis XI, roi méconnu* (A.-G. Nizet, Paris, 1976). - P.M. Kendall, *Louis XI* (trad. fr. Fayard, Paris, 1974). - Y. Labande-Mailfert, *Charles VIII, le vouloir et la destinée* (Fayard, Paris, 1986). - R. Philippe, *Agnès Sorel* (Hachette, Paris, 1983). - B. Quillet, *Louis XII* (Fayard, Paris, 1986). - M. G. Vale, *Charles V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74). - R. Vaughan, *Charles the Bold, the Last Valois Duke of Burgundy* (Longman, Londres, 1973).

Économie et société. J. Bernard, *Navires et gens de mer à Bordeaux (vers 1400-vers 1550)* [S.E.V.P.E.N., Paris, 1968, 3 vol.]. - R. Boutruche et coll., *Histoire de Bordeaux*, t. IV, *Bordeaux de 1453 à 1715* (Fédération historique du Sud-Ouest, Bordeaux, 1966). - G. Caster, *le Commerce du pastel et de l'épicerie à Toulouse, 1450 environ à 1561* (Privat, Toulouse, 1962). - B. Chevalier, *Tours, ville royale, 1356-1520* (Vander-Nauwelaerts, Paris-Louvain, 1975). - Ph. Contamine, *Guerre, État et Société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Étude sur les armées des rois de France* (Mouton, Paris-La Haye, 1972). - J. Favier, *Paris au xve siècle, 1380-1500* (Hachette,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 Paris, 1974). - R. Favreau, *la Ville de Poitiers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Une capitale régionale.* (Soc. des Antiquaires de l'Ouest, Poitiers, 1978, 2 vol.). - R. Fédou, *les Hommes de loi lyonnais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Étude sur les origines de la classe de robe*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64). - G. Fourquin, *les Campagnes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U.F., Paris, 1963). - R. Gandilhon, *Politique économique de Louis XI* (P.U.F., Paris, 1941). - B. Guenée, *Tribunaux et gens de justice dans le bailliage de Senlis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vers 1380-vers 1550)*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63]. - M. Mollat, *le Commerce maritime normand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lon, Paris, 1952) ; *les Pauvres au Moyen Âge. Étude sociale* (Ed. Complexe, coll. « Historique », Paris, nouv. éd., 1984) ; *Jacques Cœur ou l'Esprit d'entreprise* (Aubier, coll. « Historique », 1988). - H. Touchard, *le Commerce maritime breton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67). - Ph. Wolff, *Commerces et marchands de Toulouse (vers 1350-vers 1450)* [Plon, Paris, 1954].

Vie religieuse. R. Aubenas et R. Ricard, *l'Église et la Renaissance (1449-1517)*, dans *Histoire de l'Église*, fondée par A. Fliche et V. Martin, t. XV (Bloud et Gay, Paris, 1951). - P. Imbart de la Tour, *les Origines de la Réforme*, t. I, *la France moderne* ; t. II, *l'Église catholique, la crise et la renaissance* (Librairie d'Argences, Paris, 2e éd., 1946). - F. Lebrun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s catholiques en France du xve siècle à nos jours* (Hachette, coll. « Hachette Pluriel », Paris, nouv. éd., 1985). - M.-T. Lorcin, *Vivre et mourir en Lyonnais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C.N.R.S., Paris, 1981). - V. Martin, *les Origines du gallicanisme* (Bloud et Gay, Paris, 1939, 2 vol.). - F. Rapp, *l'Église et la vie religieuse en Occident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25, Paris, nouv. éd., 1983). - A. Renaudet, *Préréforme et humanisme à Paris pendant les premières guerres d'Italie, 1494-1517* (Librairie d'Argences, Paris, 2e éd., 1953).

Culture et vie artistique. J. Huizinga, *le Déclin du Moyen Âge*, trad., J. Bastin (Payot, Paris, 2e éd., 1948, rééd. sous le titre *l'Automne du Moyen Âge*, Paris, 1977). - É. Mâle, *l'Art religieux de la fin du Moyen Âge en France* (A. Colin, Paris, 1948). - A. Michel, *Histoire de l'art*, t. II, 2e partie, *Formation, expansion et évolution de l'art gothique* (A. Colin, Paris, 1906) ; t. III, 1re partie, *le Réalisme. Les débuts de la Renaissance* (A. Colin, Paris, 1907).

15. 文艺复兴和宗教纷争

Textes. On trouvera des listes de sources dans les nos 30, 30 bis, 31 et 32 de la collection « Nouvelle Clio », respectivement pp. 9 (n° 30), 27-29 et 33-35 (n° 31) et 7-9 (n° 32), dont les titres figurent ci-dessous.

Généralités. B. Bennassar, J. Jacquart, *le xvi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2e éd., 1990). - F.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A. Colin, Paris, 9e éd., 1990, 2 vol.) ;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 (A. Colin, nouv. éd., Paris, 1986, 3 vol.). - A. Croix, J. Jacquart et Fr. Lebrun présentent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Études réunies en l'honneur de Pierre Goubert* (Privat, Société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Toulouse, 1984, 2 vol.). - J. Delumeau, *la Civilisation de la Renaissance* (Arthaud, Paris, 1967). - J.-Cl. Margolin (sous la dir. de), *l'Avènement des Temps modernes* (P.U.F., coll. «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 t. VIII, Paris, 1977). - M. Morineau, *le xvie siècle, 1492-1610*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 t. VIII, Paris, nouv. éd., 1974). - R. Mousnier,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les progrès de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 et le déclin de l'Orient (1492-1715)* [P.U.F., coll. «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 t. IV, Paris, 4e, 5e éd., 1967].

Travaux d'ensemble sur la France. J.-P. Babelon, *Henri IV* (Fayard, Paris, 1982). - B. Barbiche, *Sully* (Albin Michel, Paris, 1978). - P. Chevallier, *Henri III, roi shakespearien* (Fayard, Paris, 1985). - I. Cloulas, *Catherine de Médicis* (Fayard, Paris, 1980) ; *Henri II* (Fayard, Paris, 1985). - G. Dodu, *les Valois. Histoire d'une maison royale, 1328-1589* (Hachette, Paris, 1934). - J. Jacquart, *François Ier* (Marabout, coll. « Marabout-Université » n° 403, nouv. éd. en poche, Paris, 1984). - H. Lemonnier, *les Guerres d'Italie. La France sous Charles VIII, Louis XII et François Ier (1492-1547)*, dans *Histoire de Franc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visse, t. V, 1re partie (Hachette, Paris, 1911). - J.-H. Mariejol, *la Réforme et la Ligue. L'édit de Nantes (1559-1598)*, dans *Histoire de France...*, t. VI, 1re partie (Hachette, Paris, 1911). - H. Méthivier, *L'Ancien Régim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925, 10e éd., Paris, 1990). - H. Méthivier, *l'Ancien Régime, xvie-xviie-xviiie siècle* (P.U.F., coll. « Précis », Paris, 2e éd., 1991). - J. Meyer, *la France moderne, 1515-1789*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t. III, Paris, 1985). - M. Mollat et J. Habert, *Giovanni et Girolamo Verrazano, navigateurs de François Ier* (Imprimerie nationale, coll. « Voyages et découvertes », Paris, 1983). - J.-C. Sournia, *Blaise de Monluc, soldat et écrivain (1500-1577)* [Fayard, Paris, 1981]).

Vie politique et institutions. G. Cabourdin et G. Viard, *Lexique historique de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nouv. éd., 1990). - M. Devèze, *la Vie de la forêt française au xvie siècle* (S.E.V.P.E.N., Paris, 1961, 2 vol.). - R. Doucet, *Étude sur le gouvernement de François Ier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parlement de Paris (1525-1527)* [Champion, Paris, 1922-1926, 2 vol.] ;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 xvie siècle* (A. et J. Picard, Paris, 1948, 2 vol.). - M. Fogel, *les Cérémonies de*

l'information dans la Franc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Fayard, Paris, 1989). - H. Lapeyre, *les Monarchies européennes du xvie siècle ;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31, Paris, 1967 ; nouv. éd., 1973). - J.R. Major,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Renaissance France (1421-1559)* [Madison, 1960]. - G. Zeller et P. Magnard,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 xvie siècle* (P.U.F., coll. « Dito », Paris, nouv. éd., 1987).

L'évolu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Y.-M. Bercé, *Histoire des Croquants* (Le Seuil, coll. « Historique », Paris, 1986). - F. Billacois, *le Duel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 essai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 (E.H.E.S.S., coll. «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 n° 73, Paris, 1986). - M. Bloch, *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A. Colin, Paris, 3e éd., 1988). -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1450-1660)* [P.U.F., Paris, 1977, 2 vol., rédigés respectivement par P. Chaunu et R. Gascon et E. Le Roy Ladurie et M. Morineau]. - G. Chaussinand-Nogaret (sous la dir. de), J.-M. Constant, C. Durandin et A. Jouanna, *Histoire des élites en France du xvie au xxe siècle. L'Honneur, le Mérite, l'Argent* (Tallandier, Paris, 1991). - G. Duby et R. Mandrou,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 t. Ier, *le Moyen Âge et le xvi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7e éd., 1984). - G. Duby et A. Wallon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Le Seuil, Paris, 1975) : vol. II *(1340-1789)* dirigé par E. Le Roy Ladurie. - G. Fourquin, *les Campagnes de la région parisienn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U.F., Paris, 1963). - P. Harsin, *les Doctrines monétaires et financières en France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 (Alcan, Paris, 1928). - A. Jouanna, *le Devoir de révolt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et la gestation de l'État moderne (1559-1660)* (Fayard, coll. «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 Paris, 1989). - J.-P. Labatut, *les Noblesses européennes de la fin du xv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P.U.F., Paris, 1978). - E. Le Roy Ladurie,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S.E.V.P.E.N., Paris, 1966, 2 vol.). - Fr. Mauro, *le xvie Siècle européen. Aspects économique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32, Paris, nouv. éd., 1981). - J. Meyer, *la Noblesse française à l'époque moderne : xvie-xviie siècl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830, Paris, 1991). - G. Roupnel,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française* (Grasset, Paris, 1955). - B. Schnapper, *Histoire d'un instrument de crédit : les rentes au xvie siècle* (S.E.V.P.E.N., Paris, 1958). - H. Sé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A. Colin, t. Ier, Paris, 1948). - Fr. Spooner, *l'Économie mondiale et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France, 1493-1680* (Droz, Genève, et A. Colin, Paris, 1956). - P. de Vaissière, *Gentilshommes campagnards de l'Ancienne France* (Presses du Village, coll. « Terroirs de France », nouv. éd., Paris, 1986).

Les arts. L'Art de Fontainebleau (Éd. du C.N.R.S., Paris, 1975). - S. Béguin, *l'École de Fontainebleau* (Gonthier, Paris, 1960). - A. Blunt,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France, 1500-1700*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1957) ; *Philibert de l'Orme* (Julliard, Paris, 1963). - P. et G. Francastel, P. Tiné et M. Bex, *Histoire de la peinture française du xive au xviiie siècle* (Elsevier, Paris-Bruxelles, 1955, 2 vol.). - Fr. Gébelin, *les Châteaux de la Loire* (Alpina, Paris, 1957) ; *les Châteaux de la Renaissance* (Les Beaux-Arts, G. van Oest, Paris, 1927). - J. Hautecœur, *Histoire de l'art*, t. II, *De la réalité à la beauté* (Flammarion, Paris, 1959). - F. Herbet, *Fontainebleau* (Paris, 1937).

Les lettres. P. Barrière, *la Vie intellectuelle en France, du xvie siècle à l'époque contemporaine* (A. Michel, Paris, 1961). - H. Chamard, *Origines de la poésie française de la Renaissance* (E. de Boccard, Paris, 1920) ; *Histoire de la Pléiade* (Didier, Paris, 1939, 4 vol.). - P. Faure, *la Renaissanc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Paris, 9e éd., 1990). - P. Jourda, *Marguerite d'Angoulême, duchesse d'Alençon, reine de Navarre* (Champion, Paris, 1930, 2 vol.). - A. Lefranc, *Grands Écrivains français de la Renaissance* (Champion, Paris, 1914). - P. Mesnard, *l'Essor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au XVIe siècle* (Vrin, Paris, 2e éd., 1952). - J. Plattard, *la Renaissance des lettres en France de Louis XII à Henri IV* (A. Colin, Paris, 3e éd., 1952).

Les mentalités et la vie quotidienne. A. Denieul-Cormier, *la France de la Renaissance (1488-1559)* [Arthaud, Paris, 1962]. - J. Delumeau, *la Peur en Occident (xive-xviiie siècle)* [Fayard, Paris, 1978]. - R. Mandrou, *Introduction à la France moderne, 1500-1640. Essai de psychologie collective* (A. Michel, coll. « 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 t. LII., Paris, 1961 ; nouv. éd., n° 36, Paris, 1974). - R. Muchembled, *Culture populaire et culture des élites dans la France moderne, xve-xviiie siècle* (Flammarion, Paris, 1978).

Philosophie, religion. H. Busson, *les Sources et le développement du rationalisme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la Renaissance (1533-1601)* [Letouzey et Ané, Paris, 1922]. - L. Cristiani, *l'Église à l'époque du concile de Trente*, dans l'*Histoire de l'Église* d'A. Fliche et V. Martin, t. XVII (Bloud et Gay, Paris, 1948). - J. Delumeau, *Naissance et affirmation de la Réforme*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30, Paris, 3e éd., 1988) ; *le Catholicisme entre Luther et Voltaire* (P.U.F., Paris, coll. « Nouvelle Clio », n° 30 bis, 3e éd., 1985). - L.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A. Michel, Paris, 1947) ; *Au cœur religieux du xvie siècle* (Droz, Genève et S.E.V.P.E.N., Paris, 1957). - J. Garrisson, *les Protestants au xvie siècle* (Fayard, coll. «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 Paris, 1988). - P. Imbart de la Tour, *les Origines de la Réforme* (Hachette, Paris, 1905-1914, 4 vol. ; t. II et III, nouv. éd., Librairie d'Argences, Paris, 1946 et 1948). - F. Lebrun, *Du christianisme flamboyant à l'aube des Lumières (xive-xviiie siècle)* [Le Seuil, coll. « Histoire de la France religieuse », sous la dir. de J. Le Goff et de R. Rémond, t. II, Paris, 1988]. - E.G. Léonard, *Histoire générale du protestantisme*, t. Ier, *la Réformation* (P.U.F., coll. « Quadrige », n° 101, nouv. éd., Paris, 1988). - G. Livet, *les Guerres de Religion, 1559-1598*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016, Paris, 6e éd., 1988). - R. Mandrou, *Histoire de la pensée européenne. 3 : Des humanistes aux hommes de science, XVIe-XVIIe siècle* (Le Seuil, coll. « Points. Histoire », n° 8, Paris, 1973). - E. de Moreau, P. Jourda et P. Janelle, *la Crise religieuse du xvie siècle*, dans l'*Histoire de l'Église* d'A. Fliche et V. Martin, t. XVI (Bloud et Gay, Paris, 1950). - R. Stauffer, *la Réform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376, Paris, 4e éd., 1988).

16. 巴洛克时代的法国

Textes. Richelieu, *Testament politique ou les Maximes d'État de Monsieur le cardinal de Richelieu*, éd. D. Dessert (P.U.F., coll. « Historiques-Politiques », n° 63, Paris, 1990). - R. Mousnier, *Lettres et mémoires adressés au chancelier Séguier (1633-1649)* [P.U.F., Paris, 1964, 2 vol.].

Généralités. F. Bluche (sous la dir. de), *Dictionnaire du Grand Siècle (1589-1715)*, [Fayard, Paris, 1990]. - P. Chaunu, *la Civilisation de l'Europe classique* (Arthaud, coll. « les Grandes Civilisations/Poche », nouv. éd., Paris, 1984). - G. Durand, *États et institutions xvie-xviii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9). - P. Goubert et D. Roche, *Les Français et l'Ancien Régime* t. I, *La Société et l'État* ; t. II, *Culture et Société* (A. Colin, Paris, nouv. éd., 1990, 2 vol.). - H. Méthivier, *l'Ancien Régim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925, 10e éd., 1990). - H. Méthivier, *l'Ancien Régime, xvie-xviie-xviiie siècle* (P.U.F., coll. « Précis », Paris, 2e éd., 1991). - H. Méthivier, *le Siècle de Louis XIII*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138, Paris, 7e éd., 1990). - J. Meyer, *la France moderne, 1515-1789*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t. III, Paris, 1985). - R. Mousnier, *l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dans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t. IV (P.U.F., Paris, 1967). - V.L. Tapié, *la France de Louis XIII et de Richelieu* (Flammarion, Paris, nouv. éd., 1980).

Vie politique et institutions. D. Bitton, *The French Nobility in Crisis* (Stanford, 1969). - M. Carmona, *Marie de Médicis* (Fayard, Paris, 1981) ; *Richelieu. L'ambition et le pouvoir* (Fayard, Paris, 1983). - P. Chevallier, *Louis XIII, roi cornélien* (Fayard, Paris, 1979). - H. Duccini, *Concini. Grandeur et misère du favori de Marie de Médicis* (A. Michel, Paris, 1991). - E. Esmonin, *Études sur la France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U.F., Paris, 1964). - P. Goubert, *Mazarin* (Fayard, 1990). - J. M. Hayden, *France and the Estates general of 1614* (Cambridge, 1974). - E. Kossmann, *la Fronde* (Leyde, 1954). - Sous la direction d'E. Lavisse, *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évolution*, t. VI, 2e partie, J. H. Mariéjol, *le Règne de Louis XIII* (Hachette, Paris, 1911). - G. Livet,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083, Paris, 5e éd., 1990). - A. Lloyd Moote, *Louis XIII, the Jus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H. Méthivier, *la Fronde* (P.U.F., coll. « L'Historien », n° 4, 1984). - R. Mousnier, *la Vénalité des offices sous Henri IV et Louis XIII* (Mégariotis Reprints, 1979) ; *14 mai 1610, l'assassinat d'Henri IV*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13, Paris, 1964) ; R. Mousnier et ses collaborateurs, *le Conseil du roi de Louis XII à la Révolution* (P.U.F., Paris, 1970). - G. Pagès,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Payot, coll. « Regard de l'histoire », Paris, 3e éd., 1979). - O. Ranum, *les Créatures de Richelieu, secrétaire d'État et surintendant des Finances, 1635-1642* (Pedone, Paris, 1966). - V.-L. Tapié,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S.E.D.E.S., coll. « les Cours de Sorbonne », nouv. éd., 1989).

Économie et société. Fr. Billacois, *le Duel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s XVIe-XVIIe siècles. Essai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 (E.H.E.S.S., coll. «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 73, Paris, 1986). - M. Foisil, *la Révolte des Nu-pieds 1639* (P.U.F., Paris, 1970). - B. Carnot, *Société, cultures et genres de vie dans la France moderne, XVIe-XVIIIe siècle* (Hachette, coll. « Carré histoire », 1991). - P.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Contribution,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E.H.E.S.S., coll. « Démographie et Sociétés », n° 3, Paris, nouv. éd., 1983, 2 vol.). - H. Hauser, *la Pensée et l'Action économiques du cardinal de Richelieu* (P.U.F., Paris, 1944). - M. B. Porchnev, *les Soulèvements populaires en France de 1623 à 1648* (S.E.V.P.E.N., Paris, 1963).

Religion, mentalités, culture. A. Adam,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VIIe siècle* (Domat-Montchrestien, Paris, 1951-1956, 5 vol.). - H. Bremond, *Histoire littéraire du sentiment religieux en France depuis la fin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jusqu'à nos jours* (A. Colin, Paris, réimpress., 1967-68, 11 vol.). - A. Châtelet et J. Thuillier, *la Peinture française de Fouquet à Poussin* (Genève, Skira, 1963). - P. Coste, *Monsieur Vincent, le grand saint du grand siècle* (Desclée de Brouwer, Paris, 1935, 3 vol.). - L. Hautecœur, *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classique en France* (A. et J. Picard, Paris, 1943-1957, 7 vol.). - J. Le Goff, R. Rémond et F. Lebrun, *Du christianisme flamboyant à l'aube des Lumières, XIVe-XVIIIe siècle* (Le Seuil, coll. « Histoire de la France religieuse », t. II, 1988). - E. G. Léonard, *Histoire générale du protestantisme* (P.U.F., coll. « Quadrige », n° 101, Paris, 1988, 3 vol.). - É. Mâle, *l'Art religieux de la fin du XVIe siècle, du XVIIe siècle et du XVIIIe siècle* (A. Colin, Paris, 1951). - R. Mandrou, *Magistrats et sorcier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Plon, Paris, 1968). - H. J. Martin, *Livres,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Droz, Genève-Paris, 1969). - J. Morel, *la Tragédie* (A. Colin, Paris, 1964). - R. Mousnier, *Richelieu et la culture* (Éd. du C.N.R.S., Paris, 1987). - J. Orcibal, *les Origines du jansénisme* (Vrin, Paris, 1947-48, 3 vol.). - R. Pintard, *le Libertinage érudit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Boivin, Paris, 1943, 2 vol.). - V.-L. Tapié, *le Baroqu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923, Paris, 1991).

17 古典主义时代

Généralités. Fr. Bluche, *Louis XIV* (Fayard, Paris, 1986). - R. Bornecque (sous la dir. de), *la France de Vauban* (Arthaud, Paris, 1984). - A. Corvisier, *la France de Louis XIV, 1643-1715, Ordre intérieur et place en Europe* (S.E.D.E.S.,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n° 33, Paris, 2e éd., 1981). - A. Corvisier, *Louvois* (Fayard, Paris 1983). - P. Goubert, *Louis XIV et vingt millions de Français* (Fayard, coll. « l'Histoire sans frontières », Paris, 1969 ; Hachette-Pluriel, coll. « Pluriel », Paris, 1977). - J.-P. Labatut, *Louis XIV, roi de gloire*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84). - F. Lebrun, *le XVII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9e éd., 1990). - R. Mandrou, *la Franc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U.F., « Nouvelle Clio », n° 33, Paris, 4e éd. augmentée par M. Cottret) ; *Louis XIV en son temps, 1661-1715* (P.U.F., «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 t. X, Paris, 2e éd., 1978). - H. Méthivier, *le Siècle de Louis XIV* (P.U.F., « Que sais-je ? », n° 426, Paris, 11e éd., 1991). - J. Meyer, *la France moderne, 1515-1789*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t. III, Paris, 1985). - S. Pillorget, *Apogée et société d'ordres, 1610-1787*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 t. IX, nouv. éd., Paris, 1973). - A. Rossel, *Histoire de France à travers les journaux du temps passé : le faux grand siècle, 1604-1715* (A. Colin, coll. « l'Arbre verdoyant », Paris, 1982).

Politique étrangère. *Louis XIV et l'Europe* (*XVIIe Siècle*, numéro spécial 123, 1979). - Problèmes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sous Louis XIV (*XVIIe Siècle*, numéro spécial 46-47, 1960). - L. Bély, *Espions et Ambassadeurs au temps de Louis XIV* (Fayard, coll. «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 1990). - Ch.-A. Jullien, *les Français en Amérique au XVIIe siècle* (C.D.U., Paris, 1977).

Population. J. Dupâquier,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786, Paris, 1re éd., 1979) ; *la Population rurale du Bassin parisien à l'époque de Louis XIV*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et E.H.E.S.S., Paris, 1979). - J. Dupâquier (sous la dir. de),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1985) : *Vieillir autrefois* (E.H.E.S.S. Paris, 1986, 2 vol.) ;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t. II, *De la Renaissance à 1789* (P.U.F., Paris, 1989).

Vie économique. *Aspects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XVIIe siècle* (*XVIIe Siècle*, numéro spécial 70-71, 1966). - P. Léon, « 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u règne de Louis XIV (1685-1715) », dans *l'Information historique*, t. XIII, n° 4, septembre-octobre 1956, pp. 127-137. - J. Meuvret, *É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A. Colin, Paris, 1971) ; *le Problème des subsistances à l'époque de Louis XIV. La production des céréales dans la France du XVIIe et du XVIIIe siècle* (Mouton, Paris-La Haye, 1977). - J. Meyer, J. Tanade, A. Rex-Goldzeiguer, J. Thobi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loniale*, t. I, *De 1600 à 1914* (A. Colin, coll. « Histoires », 1991).

Vie sociale. Fr. Bluche et J.-F. Solnon, *la Véritable Hiérarchie sociale de l'ancienne France, le tarif de la première capitation (1695)* [Droz, Genève, 1983]. - J.-L. Flandrin, *Familles, parenté, maison, sexualité dans l'ancienne société* (Le Seuil, coll. « l'Univers historique », nouv. éd., Paris, 1984). - P. Goubert, D. Roche, *les Français et l'Ancien Régime*, t. I, *la Société et l'État* ; t. II, *Culture et Société* (A. Colin, Paris, 1990 et 1986,

2 vol.). - R. Mousnier, *les Hiérarchies sociales de 1450 à nos jours* (P.U.F., coll. « l'Historien », n° 1, Paris, 1969). [En particulier le chapitre VI.]. - R. Pillorget, *la Tige et le rameau. Famille anglaise et famille française aux XVI-XVII siècles* (Calmann-Lévy, Paris, 1979).

Gouvernement et institutions, dans leurs rapports avec l'état social. L. André, *Michel Le Tellier et Louvois* (A. Colin, Paris, 1942). - J. Meyer, *Colbert* (Hachette, Paris, 1981). - R. Mousnier (sous la dir. de), *Un nouveau Colbert*, actes du colloque pour le tricentenaire de la mort de Colbert (C.D.U.-S.E.D.E.S., 1985). - I. Murat, *Colbert* (Fayard, Paris, 1980). - R. Mousnier,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absolue, 1598-1789* (t. I, *Société et État* ; t. II, *les Organes de l'État et la Société*) [P.U.F., Paris, 2e éd., 1990 et 1re éd., 1980, 2 vol. ; coll. « Dito », 1990]. - *Serviteurs du roi. Quelques aspects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XVIIe siècle* (*XVIIe Siècle*, numéro spécial 42-43, 1959). - B. Pujo, *Vauban* (A. Michel, 1991). - J.-L. Thireau, *les Idées politiques de Louis XIV* (P.U.F., Paris, 1973).

Vie des provinces. G. Gabet, *la Naissance de Rochefort sous Louis XIV, 1666-1715 : une ville nouvelle et ses habitants au Grand Siècle* (Centre d'animation lyrique et culturel de Rochefort, 1986). - E. Le Roy Ladurie,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S.E.V.P.E.N., Paris, 1966, 2 vol.). - G. Livet, *l'Intendance d'Alsace sous Louis XIV*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56). - R. Pillorget, *les Mouvements insurrectionnels de Provence entre 1596 et 1715* (Pedone, Paris, 1975).

Vie religieuse. Les Camisards, présentés par Ph. Joutard (Gallimard, coll. « Archives », Paris, 1976). - L. Cognet, *le Crépuscule des mystiques : le conflit Fénelon-Bossuet* (Desclée et Cie, Paris, 1958). - *Fénelon et son tricentenaire* [*XVIIe Siècle*, numéros spéciaux 12 (1951) et 14 (1952)]. - E. Labrousse, *la Révocation de l'édit de Nantes : une foi, une loi, un roi ?* (Payot, coll. «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 n° 34, Paris, nouv. éd., 1990). - *Missionnaires catholiques à l'intérieur de la France pendant le XVIIe siècle* (*XVIIe Siècle*, numéro spécial 41, 1958). - J. Orcibal, *Louis XIV et les protestants* (Vrin, Paris, 1951). - R. Taveneaux, *Jansénisme et politiqu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5) ; *le Catholicisme dans la France classique (1610-1715)* [S.E.D.E.S., Paris, 1980].

Mentalités, vie intellectuelle et artistique. P. Bénichou, *Morales du Grand Siècle* (Gallimard, Paris, 1948). - L. Benoist, *Histoire de Versaille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526, Paris, 2e éd., 1980). - M. Bertaud, *le XVIIe Siècl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coll. « Phares », Nancy, 1990). - F. Bluche, *la Vie quotidienne au temps de Louis XIV*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84). - Y. Bottineau, *Versailles, miroir des princes* (Arthaud, Paris, 1989). - *Comment les Français voyaient la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XVIIe Siècle*, numéro spécial 26, 1955). - J.-M. Constant, *la Vie quotidienn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85). - P. Hazard, *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1680-1715* (Fayard, Paris, nouv. éd., 1989). - R. Mandrou, *Magistrats et sorciers en France au XVIIe siècle. Une analyse psychologique historique* (Plon, Paris, 1968) ; *la Bibliothèque bleue. La littérature populaire en France du XVIe au XIXe ssiècle* (Gallimard, coll. « Archives », Paris, 1971). - V.-L. Tapié, *Baroque et classicismé* (Plon, Paris, nouv. éd., 1972). - B. Teyssèdre, *l'Art au siècle de Louis XIV*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Paris, 1967). - *Versailles et la musique française* (*XVIIe Siècle*, numéro spécial 34, 1957). - J. de Viguerie, *l'Institution des enfants. L'éducation en France, XVIe-XVIIIe siècle* (Calmann-Lévy, Paris, 1978).

18. 启蒙运动

Textes. C.P. Duclos,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mœurs de ce siècle*, éd. Green (Cambridge, 1939). -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es*. - J.-J. Rousseau, *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 *Du contrat social*. - Voltaire, *Correspondance*, éd. Th. Besterman (Les Délices, Institut et musée Voltaire, Genève, 1953-1966, 107 fasc.).

Généralités. M. Denis et N. Blayau, *le XVIII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6e éd., 1990). - G. Durand, *États et institutions, XVIe-XVIII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9). - L. Forestier, *XVIIIe Siècle français.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Seghers, Paris, 1961). - P. Goubert, *Initiation à l'histoire de France* (Tallandier, coll. « Approches », Paris, 1984). - J. 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Londres, 1960). - R. Mandrou, *la Franc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33, Paris, 4e éd. augm. par M. Cottret, 1988). - H. Méthivier, *l'Ancien Régime* (P.U.F., « Que sais-je ? », n° 925, Paris, 10e éd., 1990) ; *le Siècle de Louis XV* (P.U.F., « Que sais-je ? », n° 1229, Paris, 7e éd., 1991) ;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P.U.F., « Que sais-je ? », n° 1411, Paris ; 6e éd., 1991) ; *L'Ancien Régime, XVIe-XVIIe-XVIIIe siècle* (P.U.F., coll. « Précis », Paris, 2e éd., 1991). - J. Meyer, *la France moderne, 1515-1789*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t. III, Paris, 1985). - R. Mousnier, E. Labrousse, *le Dix-Huitième Siècle, l'époque des Lumières, 1715-1815* (P.U.F., coll. « Quadrige », n° 79, Paris, 1985). - S. Pillorget, *Apogée et Déclin des sociétés d'ordres 1610-1787*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Larousse », t. IX, nouv. éd., Paris, 1973). - A. Soboul, G. Lemarchand et M. Fogel,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t. I, *l'Essor (1715-1750)*, vol. 1 (P.U.F., coll. «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 t. XI, Paris, 1977). - A. de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Gallimard, Paris, 1952 ; nouv. éd., coll « Folio », 1985).

Économie, société, État. M. Antoine, *le Conseil du roi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V* (Droz, Genève, 1970) ; *Louis XV* (Fayard, Paris, 1991). - J.F. Bluche, *les Magistrat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l'auteur, Paris, 1960). -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t. II, *Des derniers temps de l'âge seigneurial aux préludes de l'âge industriel, 1660-1789* (P.U.F., Paris, 1970). - G. Chaussinand-Nogaret, *Gens de finances au XVIIIe siècle* (Bordas, Paris, 1972 ; *la Noblesse au XVIIIe siècle : de la féodalité aux Lumières* (Complexe, coll. « Historique », n° 7, Bruxelles, nouv. éd., 1990). - A. Corvisier, *l'Armée française, de la fin du XVIIe siècle au ministère de Choiseul. Le soldat* (P.U.F., Paris, 1964, 2 vol.). - A. Daumard et Fr. Furet, *Structures et relations sociales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A. Colin, « Cahier des Annales », n° 18, Paris, 1961). - P. Deyon et J. Jacquart, *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30* (A. Colin, coll. «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 t. II, Paris, 1978). - J.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7-1788* (P.U.F., Paris, 1962) ; *Louis XV et l'opposition parlementaire, 1715-1774* (A. Colin, Paris, 1970). - E. Faure, *12 mai 1776 la Disgrâce de Turgot*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16, Paris, 1961). - E. Faure, *7 juillet 1720, la Banqueroute de Law*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15, Paris, 1977). - N. Ferrier-Caverivière, *Le Grand Roi à l'aube des Lumières : 1715-1751* (P.U.F., Paris, 1985). - F.L. Ford, *Robe and Sword. The Regrouping of the French Aris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53). - R. Forster, *The Nobility of Toul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960). - M. Garden, *Lyon et les Lyonnais* (Flammarion, coll. « Champs », nouv. éd., Paris, 1984). - P. Goubert, *l'Ancien Régime*, t. I, *la Société* (A. Colin, coll. « U », 6e éd., 1979) ;

t. II, *les Pouvoirs* (*id.*, 3ᵉ tirage, 1977). - P. Goubert, D. Roche, *les Français et l'Ancien Régime*, t. I, *la Société et l'État* ; t. II, *Culture et société* (A. Colin, Paris, nouv. éd., 1990, 2 vol.). - Ph. Haudière, *la 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Indes, 1719-1795* (Librairie de l'Inde, 1989, 4 vol.). - F. Hincker, *les Français devant l'impôt sous l'Ancien Régime* (Flammarion, Paris, 1971). - J.-P. Labatut, *les Noblesses européennes de la fin du xvᵉ siècle à la fin du xviiiᵉ siècle* (P.U.F., coll. « l'Historien », nº 33, Paris, 1978). - C.E. Labrouss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xviiiᵉ siècle* (Éditions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 coll. « Réimpressions », Paris, 1984). - C. Lefebvre, *Études orléanaises* (Bibl. nationale, Paris, 1963-64, 2 vol.). - J. Levron, *Madame de Pompadour. L'amour et la politique* (Perrin, Paris, 1973). - J. McManners, *French Ecclesiastical Society under the Ancien Régime. A Study of Ang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res, 1960). - J. Meyer, *la Noblesse bretonne au xviiiᵉ siècle* (S.E.V.P.E.N., Paris, 1966, 2 vol. ; E.H.E.S.S., coll. « Bibliothèque générale », nouv. éd., Paris, 1985, 2 vol.) ; *Noblesses et pouvoirs dans l'Europe d'Ancien Régime* (Hachette, Paris, 1973) ; *le Régent : 1674-1723* (Ramsay, 1985). - M. Morineau, *les Faux-semblants d'un démarrage économique : agriculture et démographie en France au xviiiᵉ siècle* (A. Colin, coll. « Cahiers des Annales », Paris, 1971). - R. Mousnier,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absolue, 1598-1789* (P.U.F., Paris, 2 vol., 2ᵉ éd., 1990 ; 1ʳᵉ éd., 1980, 2 vol.). - F. Olivier-Martin, *Histoire du droit français des origines à la Révolution* (Éd. du C.N.R.S., nouv. éd., Paris, 1984). - Ph. Sagnac, *la Formatio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moderne* ; t. II, *la Révolution des idées et des mœurs et le déclin de l'Ancien Régime (1715-1788)* [P.U.F., Paris, 1946]. - C. Saguez-Lovisi, *Les Lois fondamentales au xviiiᵉ siècle. Recherches sur la loi de dévolution de la Couronne* (P.U.F., coll. «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droit, d'économie et de sciences sociales de Paris, série : sciences historiques, Paris, 1984). - A. Soboul, *la Franc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t. I, *Économie et Société* (C.D.U., Paris, nouv. éd., 1966). - R. Vaillot, *le Cardinal de Bernis : la vie extraordinaire d'un honnête homme* (Albin Michel, Paris, 1985). - G. Zeller, *les Temps modernes*, II, *De Louis XIV à 1789*, t. II de l'*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achette, Paris, 1955). - G. Ziegler, *les Coulisses de Versailles*, t. II, *Louis XV et sa Cour* (Julliard, Paris, 1965).

Mouvement intellectuel et civilisation. S.M. Alsop, *les Américains à la cour de Louis XVI* (J.C. Lattès, Paris, 1983). - F. Bluche, *la Vie quotidienne de la noblesse française au xviiiᵉ siècle*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73) ; *la Vie quotidienne au temps de Louis XVI* (Librairie gén. française, coll. « le Livre de poche, série vie quotidienne », nº 5 810, Paris, 1984). - 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 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e Seuil, Paris, 1990). - A. Corvisier, *Arts et sociétés dans l'Europe du xviiiᵉ siècle* (P.U.F., coll. « l'Historien », nº 34, Paris, 1978). - E. Dacier, *le Style Louis XVI* (Larousse, Paris, 1939). - N. Dufourcq (sous la direction de), *la Musique, les hommes, les instruments, les œuvres* (Larousse, Paris, 1965, 2 vol.). - M. Launay et J.M. Goulemot,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Éd. du Seuil, Paris, 1968). - R. Mauzi, *l'Idée du bonheur au xviiiᵉ siècle* (A. Colin, Paris, 1960). - L. Réau, *l'Art au xviiiᵉ siècle en France. Époque Louis XVI* (Le Prat, Paris, 1952). - J. Starobinski, *l'Invention de la liberté (1700-1789)* [Skira, « Art, Idées, Histoire », Genève, 1962]. - M. Taillefer, *Une Académie interprète des Lumières :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de Toulouse au xviiiᵉ siècle* (Éd. du C.N.R.S., Paris, 1985). - V.-L. Tapié, *Baroque et classicisme* (Plon, Paris, nouv. éd., 1972). - P. Verlet, *le Style Louis XV* (Larousse, Paris, 1942). - J. Vier,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viiiᵉ siècle* (A. Colin, Paris, 1965-1970, 2 vol.). - G. Weulersse, *La Physiocratie à l'aube de la Révolution : 1781-1792* (E.H.E.S.S., coll. « Bibliothèque général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1984).

19. 大革命

Grands classiques. A. Aulard,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 Colin, Paris, 1901, réédit. 1926). - J. Jaurès, *Histoire socialiste* (nouv. éd. par A. Soboul, Éditions sociales, coll. « Bibliothèque du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Paris, 1983-1986, 6 vol.). - E. Laviss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t. I, *la Révolution (1789-1792)* par P. Sagnac, et t. II, *la Révolution (1792-1799)* par G. Pariset (Hachette, Paris, 1920). - A. Mathiez,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 Colin, Paris, 1922-1927, réédit. 1959). - H. Taine,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Hachette, Paris, 1876-1893). - A. de Tocqueville,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Lévy frères, Paris, 1856 ; éd. présentée par G. Lefebvre, Gallimard, Paris, 1952 ; nouv. éd., coll. « Idées », Paris, 1964).

Manuels. P. Caron, *Manuel pratique pour l'étud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 et J. Picard, Paris, nouv. éd., 1947). - A. Soboul et collab.,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U.F., Paris, 1989). - J. Tulard, J.-F. Fayard et A. Fierro, *Histoire et diction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affont, Paris, 1987). - G. Walter, *Répertoire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ravaux publiés de 1800 à 1940*, t. I, *les Personnes* ; t. II, *les Lieux* (Bibl. nationale, Paris, 1941-1945).

Synthèses récentes. Fr. Bluche et St. Rials (sous la dir. de) *les Révolutions françaises* (Fayard, Paris, 1989). - Fr. Bluche, St. Rials et J. Tulard,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º 142, Paris, 2ᵉ éd., 1979). - M. Bouloiseau, *la République jacobine (10 août 1792-9 thermidor an II)* [Le Seui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II, Paris, 1972]. - F. G. Dreyfus, *le Temps des révolutions, 1787-1870*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 t. X, nouv. éd., Paris, 1973). - F. Furet et D. Rich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Fayard, Paris, nouv. éd., 1987). - F. Furet, *la Révolution de Turgot à Jules Ferry, 1770-1880* (Hachette,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Hachette », t. IV, Paris, 1988 ; Hachette Pluriel, coll. « Pluriel », nº 8549 et 8550, Paris, 2 vol., 1990). - F. Furet et M. Ozouf,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Flammarion, 1888). - F. Gendron, *la Jeunesse sous Thermidor* (P.U.F., coll. « Histoires », nº 22, Paris, 1983). - J. Godechot, *les Révolutions (1770-1799)*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º 36, Paris, 4ᵉ éd., 1986]. - G.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U.F., «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 XIII, Paris, nouvelle rédaction en 1951, coll. « Dito », 1987) ; *É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U.F., Paris, 1954, réédit. 1963) ; *la France sous le Directoire, 1795-1799* (Éditions sociales, coll. « Terrains », nouv. éd. présentée par J.-R. Suratteau, Paris, 1984). - C. Mazauric et alii,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t. I *(1789-1799)* [Éd. sociales, livre-club Diderot, Paris, 1979]. - R. Mousnier, E. Labrousse et M. Bouloiseau, *le xviiiᵉ Siècle. Révolution intellectuelle, technique et politique (1715-1815)* [P.U.F., coll. « Quadrige », 1985]. - A. Soboul, *Précis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Éd. sociales, Paris, 1962)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Gallimard, coll. « Idées », nº 43 et 46, Paris, 1964, 2 vol.) ; *le Directoire et le Consulat*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º 1266, 3ᵉ éd., 1980) ; *la Civilisation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rthaud, coll. « les Grandes Civilisations », Paris, 1982-

1983, 3 vol. ; coll. « les Grandes Civilisations poche », 1988) ;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U.F., 1984). - J. Tulard, *les Révolutions de 1789 à 1851*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t. IV, Paris, 1985). - M. Vovelle, *la Chute de la monarchie, 1787-1792* (Seui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I, Paris, 1972). - D. Woronoff, *la République bourgeoise de Thermidor à Brumaire, 1794-1799* (Le Seui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III, Paris, 1972).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E. Labrousse, *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P.U.F., Paris, coll. « Dito », nouv. éd., 1990) ;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Éd.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 coll. « Réimpressions », Paris, nouv. éd., 1984, 2 vol.) - A. Soboul, *la Franc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t. I, *Aspec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C.D.U., Paris, 1961).

Déroulement et épisodes de la Révolution. P. Caron, *l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 (Maison du livre français, Paris, 1935). - J. Godechot, *la Prise de la Bastille*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17, Paris, 1965). - G. Lefebvre, *la Grande peur de 1789* suivi de *les Foules révolutionnaires* (A. Colin, Paris, nouv. éd. présentée par J. Revel, 1988) ; *Quatre-vingt-neuf*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nouv. éd., 1970). - J. Massin, *Almanach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Paris, 1963). - A. Ollivier, *9 novembre 1799, le Dix-Huit Brumaire*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19, Paris, 1959). - R. Palmer, *le Gouvernement de la Terreur. L'année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A. Colin, Paris, 1989). - M. Reinhard, *10 août 1792, la Chute de la royauté*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18, Paris, 1969).

Les hommes de la Révolution. Fr. Bluche, *Danton* (Perrin, Paris, 1984). - M. Bouloiseau, *Robespierr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724, Paris, 6e éd., 1986). - M. Bruguière, *Gestionnaires et profiteurs de la Révolution :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françaises de Louis XVI à Bonaparte* (Orban, 1986). - G. Chaussinand - Nogaret, *Mirabeau* (Éd. du Seuil, coll. « Points », Paris, nouv. éd., 1984). - J.J. Chevallier, *Barnave ou les Deux faces de la Révolution* (P.U.G., Grenoble, nouv. éd., 1979). - J. Egret, *Necker, ministre de Louis XVI* (Honoré Champion, Paris, 1975). - B. Gainot, *Dictionnaire des membr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Tallandier, Paris, 1990). - G. Maintenant, *les Jacobin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90, Paris, 1re éd., 1984). - K. Margerison, *P.L. Roederer : Political throught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1983). - J. Massin, *Marat*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Paris, 1960). - A. Mathiez, *Études sur Robespierre* (A. Colin, Paris, 1918, nouv. éd., 1973, 2 vol.). - Cl. Mazauric, *Babeuf et la 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 (Éd. sociales, Paris, 1962). - A. Ollivier, *Saint-Just et la force des choses* (Gallimard, Paris, 1955). - M. Poniatowski, *Talleyrand et le Directoire, 1796-1800* (Perrin, Paris, 1982). - M. Reinhard, *le Grand Carnot* (Hachette, Paris, 1950-1952, 2 vol.). - A. Soboul, *Girondins et Montagnards* (Clavreuil, Paris, coll. « Bibliothèque d'histoire révolutionnaire », 1981).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J. 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P.U.F., Paris, 1951 ; 2e éd. revue et augmentée, 1968 ; coll. « Dito », 1989).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 Bois, *Paysans de l'Ouest. Des structur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aux options politiques depuis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dans la Sarthe* (Mouton, Paris, 1960 ; E.H.E.S.S., coll. « Sociétés, mouvements sociaux et idéologies, études », nouv. éd., Paris, 1984). - F. Gautier, *la Voie paysanne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Maspero, Paris, 1977). - F. Hinck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e l'économie. Décollage ou catastrophe* (Nathan, coll. « Circa », Paris, 1990). - G. Lefebvre,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éédit. A. Colin, Paris, 1972). - J.-C. Martin, *La Vendée de la France* (Le Seuil, coll. « Univers historique », Paris, 1987). - A. Mathiez, *la Vie chèr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 (Payot, Paris, 1927 ; nouv. éd., 1973, 2 vol.). - G.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59). - R. Sécher, *le Génocide franco-français. La Vendée-Vengé* (P.U.F., coll. « Histoires », nouv. éd., 1989) ; *la Guerre de Vendée* (Tallandier, coll. « Guide Histoire », 1989). - A.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de l'an II : 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1793-1794* (Le Seuil, coll. « Points Histoire », 1979) ; *Problèmes paysans de la Révolution, 1789-1848* (La Découverte, coll. « Fondations », Paris, nouv. éd., 1983).

Idéologie révolutionnaire. P. Barbier et Fr. Vernillat, *l'Histoire de France par les chansons*, t. IV, *la Révolution* (Gallimard, Paris, 1957). - S. Bianchi,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de l'An II. Élites et peuples, 1789-1799* (Aubier-Montaigne, coll. « Floréal », Paris, 1982). - F.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1900*, t. IX,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A. Colin, Paris, 1927, 2 vol.). - F.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Gallimard, coll. « Folio Histoire », n° 3, 1985) ; *l'Héritag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Hachette, 1989). - J. Godechot, *la Pensée révolutionnaire en France et en Europe (1789-1799)* [A. Colin, Paris, 1964]. - P. Goubert et M. Denis, *1789, Les Français ont la parole : les Cahiers de doléances des États généraux* (Gallimard, « Archives », n° 1, Paris, nouv. éd., 1989). - Cl. Nicolet, l'*Idée républicaine en France, 1789-1924. Essai d'histoire critique*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 Paris, 1982). - M. Ozouf, *la Fête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9* (Gallimard, Paris, 1976). - J. Starobinski, *1789, les Emblèmes de la Raison* (Flammarion, Paris, 1973). - M. Vovelle,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fête en Provence, 1750-1820* (Aubier-Flammarion, Paris, 1976).

Histoire religieuse. C. Cholvy, *la Religion en France de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Hachette, coll. « Carré Histoire », 1991). - A. Latreille, *l'Église catholiqu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Hachette, Paris, 1946-1950, 2 vol. ; nouv. éd., 1971). - Mgr J. Leflon, « la Crise révolutionnaire, 1789-1848 », dans *l'Histoire générale de l'Église* de A. Fliche et V. Martin, t. XX (Bloud et Gay, Paris, 1951). - B. Plongeron, *Conscience religieuse en révolution. Regards sur l'historiographie religieus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 et J. Picard, Paris, 1964). - B. Plongeron (sous la dir. de), *l'Église de France et la Révolution*, t. I, *l'Ouest* (Beauchesne, coll. «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 Paris, 1983). - M. Vovelle, *Religion et Révolution, la déchristianisation de l'an II* (Hachette, Paris, 1976).

L'expansion révolutionnaire. M. Acerra et J. Meyer, *Marines et révolutions* (Ouest-France, 1988). - J.-P. Bertaud, *la Revolution armée, les soldats-citoyen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 Laffont, Paris, 1980). - R. C. Cobb, *les Armées révolutionnaires, instrument de la Terreur dans les départements* (Mouton, Paris, 1964, 2 vol.). - A. Fugier,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mpire napoléonien », t. IV de l'*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achette, Paris, 1954). - 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L'expansion révolutionnaire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 1789-1799* (Aubier-Montaigne, coll. « Historique », Paris, éd. refondue, 1983, 1 vol.) ; *la Contre-Révolution, doctrine et action (1799-1804)* [P.U.F., coll. « Quadrige », n° 63, Paris, 1984]. - G. Lefebvre, « Plac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l'histoire du monde », dan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948, pp. 257-266.

- G. du Pontavice, *la Chouanneri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594, Paris, 1re éd., 1991). - A. Soboul, *les Soldats de l'an II*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Paris, 1959). - J. Tulard et B. Yvert, *la Contre-Révolution : origines, histoire et postérité* (Perrin, Paris, 1990). - J. Vidalenc, *les Émigrés français, 1789-1825* (Public.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Caen, 1963).

20. 帝国

Ouvrages généraux. *Colloque Napoléon* (Paris, Sorbonne, et Ajaccio, octobre 1969), rapports et actes dans la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A. Colin, Paris, 1970). - L. Bergeron, *l'Épisode napoléonien : 1799-1815, aspects intérieurs* (Éd. du Seui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IV, Paris, 1972). - J.-P. Bertaud, *le Consulat et l'Empire 1799-1815* (A. Colin, coll. « Cursus », Paris, 1989) ; *la France de Napoléon 1799-1815* (Messidor-Éditions sociales, coll. « Histoire », 1987). - R. Dufraisse, *Napoléon*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358, Paris, 2e éd., 1991). - J. Godechot, *l'Europe et l'Amérique à l'époque napoléonienne 1800-1815*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37, Paris, 1967) ; *Napoléon* (A. Michel, « le Mémorial des siècles », Paris, 1969). - A. Latreille, *l'Ère napoléonienn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74). - G. Lefebvre, *Napoléon* (P.U.F., coll. «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 t. XIV, Paris, 5e éd. rev. et augm., 1969). - *Napoléon et l'Empire*, ouvrage collectif publié sous la direction de J. Mistler (Hachette, Paris, 1968, 2 vol.). - A. Soboul, *le Premier Empire 1804-1815*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541, Paris, 2e éd., 1980) ; *la Civilisation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 III, *la France napoléonienne* (Arthaud, coll. « les Grandes Civilisations », Paris, 1983). - A. Thiers, *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 (Lheureux, Paris, 1845-1862, 20 vol.). - J. Tulard, *Napoléon ou le mythe du sauveur* (Fayard, Paris, nouv. éd., 1986) ; *le Grand Empire 1804-1815*, (A. Michel, coll. « 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 Paris, 1982) ; *Dictionnaire Napoléon* (Fayard, nouv. éd., 1989).

Textes, mémoires, documents. J. Arnna, *Napoléon Ier. Lettres au comte Mollien...* (Gay, Rochecorbon, 1965). -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éd. Levaillant (Flammarion, Paris, 1964). - J. Damas-Hinard, *Dictionnaire ou Recueil alphabétique des opinions et jugements de Napoléon Ier* (Club de l'honnête homme, Paris, 1965, 4 vol.), rééd. sous le titre *Napoléon par Napoléon* (Club de l'honnête homme, Paris, 1965, 2 vol.). - A. Dansette, *Napoléon. Pensé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Flammarion, Paris, 1969). - E. de Las Cases,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 trois éditions récentes, par les soins de M. Dunan (Flammarion, Paris, 1951) ; A. Fugier (Garnier, Paris, 1961) ; J. Tulard (Éd. du Seuil, Paris, 1968). - J. Massin, *Almanach du Premier Empire : du 9-Thermidor à Waterloo* (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 Paris, 1988). - Napoléon, *Correspondance. Six cents lettres de travail (1806-1810)*, éd. M. Vox (Gallimard, Paris, 1943) ; *Lettres, ordres et apostilles. Extraits des archives Daru*, éd. S. d'Huart (Imprimerie nationale et S.E.V.P.E.N., Paris, 1965) ; *Œuvres littéraires et écrits militaires (1786-1815)*, préface de M. Dunan, appareil critique de J. Tulard (Société encyclopédique française, Paris, 1967, 3 vol.). - Exposition « Napoléon et la Légion d'honneur » (1968), *la Cohorte*, numéro spécial, Paris, 1968. - *Napoléon, l'œuvre et l'histoire*, 12 vol. de textes éd. par J. Massin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Paris, 1969 sqq.). - *Le Sacre de Napoléon Ier*, éd. H. Pinoteau (Les Seize. Éd. du Palais-Royal, Paris, 1969). - Exposition « Napoléon tel qu'en lui-même », Archives nationales (1969), catalogue. - A. Palluel, *le Dictionnaire de l'Empereur* (Plon, Paris, 1971). - Chancelier E.D. Pasquier, *Souvenirs, 1767-1862*, introduction et notes par R. Lacour-Gayet (Hachette, Paris, 1964). - Mme de Staël, *Dix Années d'exil*, réimpress. (Les Bibliophiles de France, Brie-Comte-Robert, 1957). - Général baron P. Thiébault, *Mémoires*, éd. R. Lacour-Gayet (Hachette, Paris, 1962).

Généalogies, biographies. T. Aronson, *les Bonaparte : histoire d'une famille* (Fayard, Paris, 1967). - L. Bergeron et G. Chaussinand-Nogaret (sous la dir. de), *Grands Notables du Premier Empire* (Éd. du C.N.R.S., Paris, 1978-1988, 18 vol. parus). - L. Chardigny, *les Maréchaux de Napoléon* (J'ai lu, coll. « J'ai lu l'histoire », n° 1621, Paris, nouv. éd., 1984). - J.M. Cornwall, *Masséna, l'enfant chéri de la victoire* (Plon, Paris, 1967). - G. Coutant le Saisseval, *les Maisons impériales et royales d'Europe* (Les Seize. Éd. du Palais-Royal, Paris, 1966). - N. Gotteri, *Grands Dignitaires, ministres et grands officiers du premier Empire : autographes et notices biographiques* (Nouvelles Éditions latines, Paris, 1990). - F.-G. Hourtoulle, *Ney, le brave des braves* (Lavauzelle, Paris, 1981). - H. de La Barre de Nanteuil, *le Comte Daru ou l'Administration militair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Peyronnet, Paris, 1966). - L. Madelin, *Fouché, 1759-1821*, (Plon, Paris, 1955). - B. Melchior-Bonnet, *Un policier dans l'ombre de Napoléon, Savary, duc de Rovigo* (Perrin, Paris, 1962). - J. Orieux, *Talleyrand ou le sphinx incompris* (Flammarion, Paris, 1970). - F. Papillard, *Cambacérès* (Hachette, Paris, 1961). - J. Pigeire, *la Vie et l'Œuvre de Chaptal* (Spes, Paris, 1932). - M. Poniatowski, *Talleyrand et le Consulat* (Perrin, Paris, 1986). - D. Reichel, *Davout et l'art de la guerre* (Delachaux et Niestlé, Lausanne, 1975). - J.-P. Rioux, *les Bonaparte* (Complexe, coll. « Le Temps et les hommes », n° 11, Bruxelles, 1982). - P. Saint-Marc, *le Maréchal Marmont, duc de Raguse* (Fayard, Paris, 1957). - A. Soubiran, *le Baron Larrey, chirurgien de l'Empereur* (Fayard, Paris, 1966). - R. Szramkiewicz, *les Régents et censeurs de la Banque de France* (Droz, Paris-Genève, 1974). - E. Tarlé, *Napoléon* (Éd. du Progrès, nouv. éd., 1990) ; *Talleyrand* (Éd.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Moscou, 1958). - J. Tulard, *Murat* (Hachette, Paris, 1983 ; Marabout, coll. « Marabout Université », n° 406, rééd., Paris, 1984). - J. Valynseele, *les Princes et ducs du premier Empire non maréchaux, leur famille et leur descendance* (l'auteur, Paris, 1959).

Institutions et vie politique. L. Bergeron et G. Chaussinand-Nogaret, *les Collèges électoraux du premier Empire* (Paris, 1978). - Fr. de Dainville et J. Tulard, *Atlas administratif de l'Empire Français d'après l'Atlas rédigé par ordre du duc de Feltre en 1812* (Droz, Genève, 1973). - C. Durand, *Études sur le Conseil d'État napoléonien* (P.U.F., Paris, 1949). - J. 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 (P.U.F., Paris, 2 éd., 1968 ; coll. « Dito », 1989). - B. Melchior-Bonnet, *la Conspiration du général Malet* (Del Duca, Paris, 1963). - M. Regaldo, *la Décade philosophique* (Atelier de reproduction des thèses, Lille, 1976). - J. Savant, *les Préfets de Napoléon* (Hachette, Paris, 1958). - J. Tulard, *l'Anti-Napoléon, la légende noire de l'Empereur* (Julliard, Paris, 1965) ; *Paris sous le Consulat et l'Empire, 1800-1815* (Diffusion Hachette,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 Paris, 1970 ; *Paris et son administration, 1800-1830* (Imprimerie municipale, Paris, coll. «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 1976). - L. de Villefosse et J. Bouissounouse, *l'Opposition à Napoléon* (Flammarion, Paris, 1969). - J. Waquet, « la Société civile devant l'insoumission et la désertion à l'époque de la conscription », dans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968.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L. Bergeron et G. Chaussinand-Nogaret, *les Masses de granit. Cent mille notables du Premier Empire* (E.H.E.S.S., coll. « Bibliothèque générale », 1979).

- L. Bergeron, *Banquiers, négociants et manufacturiers parisiens, du Directoire à l'Empire* (Mouton, Paris-La Haye-New York, 1978). - J. Bouvier, *les Rothschild* (Complexe, coll. « le Temps et les Hommes », n° 16, Paris, nouv. éd., 1983). - C.-I. Brelot, *la Noblesse en Franche-Comté de 1789 à 1808* (Public.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Besançon, 1972). - F. Caro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XIXe-XX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2e éd., 1984). - B. de Jouvenel, *Napoléon Ier et l'économie dirigée. Le Blocus continental* (La Toison d'or, Paris, 1942). - J. Labasse, *le Commerce des soies à Lyon sous Napoléon et la crise de 1811* (P.U.F., Paris, 1957). - M. Payard, *le Financier Ouvrard, 1770-1846* (Académie nat. de Reims, 1961). - R. Priouret, *la Caisse des dépôts. Cent cinquante ans d'histoire financière* (P.U.F., Paris, 1960). - J. Tulard, *Napoléon et la noblesse d'Empire avec la liste complète des membres de la noblesse impériale : 1808-1815* (J. Tallandier, coll. « Bibliothèque napoléonienne », Paris, nouv. éd., 1986) ; *la Vie quotidienne des Français sous Napoléon*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1978 ; nouv. éd. Librairie gén. française, coll. « le Livre de poche », n° 5803, Paris, 1983).

Histoire religieuse, intellectuelle et artistique. A. Cabanis, *la Presse sous le Consulat et l'Empire (1799-1814)*,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coll. « Bibliothèque d'histoire révolutionnaire », série 3, 16]. - S. Delacroix, *la Réorganisation de l'Église de France après le Concordat (1801-1809)* [Éd. du Vitrail, Paris, 1962, 3 vol.]. - A. Francastel, *le Style Empire, du Directoire à la Restauration* (Larousse, Paris, 1939). - L. Hautecœur, *l'Art dan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en France* (Le Prat, Paris, 1953). - A. Latreille, *l'Église catholiqu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t. II, *l'Ère napoléonienne et la crise européenne (1800-1815)* [Hachette, Paris, 1950]. - J. Leflon, *la Crise révolutionnaire (1789-1848)* dans *l'Histoire générale de l'Église* d'A. Fliche et de V. Martin, t. XX (Bloud et Gay, Paris, nouv. éd., 1966). - E.-G. Léonard, *Histoire générale du protestantisme*, t. III, *Déclin et Renouveau* (P.U.F., coll. « Quadrige », n° 103, Paris, nouv. éd., 1988). - M. Leroy, *Histoire d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t. II, *De Babeuf à Tocqueville* (Gallimard, Paris, 1951). - B. Melchior-Bonnet, *Napoléon et le pape* (Amiot-Dumont, Paris, 1958). - F. Pietri, *Napoléon et les israélites* (Berger-Levrault, Paris, 1965). - D. Robert, *les Églises réformées de France* (1800-1830) [P.U.F., Paris, 1961]. - J. Tulard, *L'Histoire de Napoléon par la peinture* (Belfond, coll. « l'Histoire... par la peinture », Paris, 1991).

Armée et campagnes. M. Baldet,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armées de Napoléon* (Hachette, Paris, 1965). - R. Darquenne, *la Conscription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Jemappes (1798-1813). Bilan démographique et médico-social* (Mons, 1970). - J. Jourquin, *le Dictionnaire des maréchaux du premier Empire* (Tallandier, coll. « Bibliothèque napoléonienne », 1986). - H. Lachouque, *Iéna* (G. Victor, Paris, 1962) ; *Napoléon et la Garde impériale* (Bloud et Gay, Paris, 1956). - H. Lachouque et J. Tranié, *la Garde impériale* (Lavauzelle, coll. « les Grands Moments de notre histoire », Paris, 1982). - Ph. Masson et J. Muracciole, *Napoléon et la marine* (Peyronnet, Paris, 1968). - J. Lovie et A. Palluel-Guillard, *l'Épisode napoléonien. Aspects extérieurs* (Éd. du Seui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V, Paris, 1972). - J.-Cl. Quennevat, *Atlas de la Grande Armée. Napoléon et ses campagnes (1803-1815)*. [Éd. Sequoia, Paris-Bruxelles, 1966]. - G. Six,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généraux et amiraux français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 (Saffroy, Paris, 1934-1935, 2 vol.) - J. Tranié et J.-C. Carmignani, *Napoléon et la Russie : les années victorieuses, 1805-1807* (Copernic, Paris, 1980).

Napoléon, l'Europe et l'Orient. S. Askenasy, *Napoléon et la Pologne* (E. Leroux, Éd. du Flambeau, trad. par H. Grégoire, Paris, 1925). - F. Crouzet, *l'Économie britannique 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1806-1813 (P.U.F., Paris, 1958, 2 vol.). - E. Driault, *Mohamed Aly et Napoléon (1807-1814). Correspondance des consuls de France en Égypte* (Champion, Paris, 1927). - M. Dunan, *Napoléon et l'Allemagne. Le système continental et les débuts du royaume de Bavière, 1806-1810* (Plon, Paris, 1942). - M. Dunan (sous la dir. de), *Napoléon et l'Europe* (Paris-Bruxelles, 1961). - A. Fugier, *Napoléon et l'Espagne* (1799-1803) [F. Alcan, Paris, 1930, 2 vol.] ; *Napoléon et l'Italie* (Janin, Paris, 1947) ;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mpire napoléonien* (Hachette,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t. IV, Paris, 1954). - C. de Grünwald, *Les Alliances franco-russes. Neuf siècles de malentendus* (Plon, Paris, 1965). - L. Madelin, *la Rome de Napoléon. La domination française à Rome, de 1809 à 1814* (Plon-Nourrit et Cie, Paris, 1906). - H. Nicholson, *le Congrès de Vienne, histoire d'une coalition, 1812-1822* (Hachette, nouv. éd., Paris, 1957). - J. H. Pirenne, *la Sainte Alliance et le traité de Vienne* (La Baconnière, Neuchâtel, 1946-1950, 2 vol.) - A. Sorel, *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lon, Paris, 1885-1904, 8 vol.). - J. Spellman *Napoléon et l'Islam* (S, s. l., 1970). - E. Tarlé,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e royaume d'Italie* (F. Alcan, Paris, 1928). - J. Tulard, *l'Europe de Napoléon* (Horvath, coll. « Histoire de l'Europe », Roanne, 1989).

21. 浪漫主义的法国

Textes et documents. H. de Balzac, *Correspondance 1819-1850* (Calmann-Lévy, Paris, 1876). -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éd. Levaillant (Flammarion, Paris, 1949). - F. Guizot,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mon temps* (Lévy Frères, Paris, 1858-1967, 8 vol.) ; *Lettres de François Guizot et de la princesse de Lieven*, préface de J. Schlumberger (Mercure de France, Paris, 1963-64, 3 vol.). - Ch. de Rémusat, *Mémoires de ma vie*, éd. Ch.-H. Pouthas (Plon, Paris, 1958-1962, 4 vol.). - Ch. Sainte-Beuve, *Correspondance* (Lévy, Paris, 1877-78). - G. Sand, *Correspondance*, éd. Lubin (Garnier, Paris, en cours, 6 vol. parus, 1964-1970). - Stendhal, *Mémoires d'un touriste*, éd. V. del Litto (Rencontre, Lausanne, 1962). - A. de Tocqueville, *Correspondance avec le vicomte de Beaumont* (Gallimard, Paris, 1967, 3 vol.). - L. Veuillot, *Correspondance*, éd. Fr. Veuillot (Lethielleux, Paris, 1931-1933, 12 vol.). - J. Viennet, *Journal* (Amiot-Dumont, Paris, 1955). - A. de Vigny, *Mémoires inédits* (Gallimard, Paris, 1958). - A. de Villeneuve-Bargemont, *Économie politique chrétienne* (Paris, 1834, 3 vol.). - L. R. Villermé, *Tableau de l'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employés dans les manufactures de coton, de laine et de soie* (Renouard, Paris, 1840, 2 vol.).

Étud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la Révolution de 1830 en France* (A. Colin, coll. « U2 », n° 117, Paris, 1970) ;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vus par les voyageurs américains, 1814-1848* (Flammarion, Paris, 1982) ; *Au soir de la monarchie. Histoire de la Restauration* (Flammarion, coll. « Histoire », nouv. éd., Paris, 1983) ; *la Restauration* (Flammarion, coll. « Champs », n° 237, Paris, 1990). - Fr. Bluche, *le Bonapartisme : aux origines de la droite autoritaire (1800-1850)* [Nouvelles Éditions latines, Paris, nouv. éd., 1980] ; *le Bonapartism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980, Paris, 1re éd., 1981). - L. Girard, *la Garde nationale, 1814-1871* (Plon, Paris, 1964). - A. Jardin et A.-J. Tudesq, *la France des notables : 1815-1848*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VI et VII, coll. Points, Paris, 1973). - J. Lhomme, *la Grande Bourgeoisie au pouvoir, 1830-1880* (P.U.F., Paris, 1960). - J.-J. Oeschlin, *le Mouvement ultra-royaliste sous la Restauration* (Libr.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Paris, 1960). - F. Ponteil, *la*

Monarchie parlementaire (1815-1848) [A. Colin, 2e éd., Paris, 1958] ;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de 1814 à 1870* (P.U.F., Paris, 1966). - R. Rémond,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puis 1789*, t. I., *1789-1848*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5) ; *la Droite en France, de la Restauration à nos jours* (Aubier-Montaigne, coll. « Historique », Paris, nouv. éd., 1982). - St. Rials, *le Légitimism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 107, Paris, 1re éd., 1983). - A.-J. Tudesq, *les Grands Notables en France 1840-1849* (P.U.F., Paris, 1964). - J. Vidalenc, *la Restauration, 1814-1830*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214, 5e éd., 1983). - Ph. Vigier,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002, Paris, 6e éd., 1982). - E. de Waresquiel, *le Duc de Richelieu, 1766-1822. Un sentimental en politique* (Perrin, Paris, 1990).

Économie et société : études dans le cadre national. M. Augé-Laribé, *la Révolution agricole* (A. Michel, Paris, 1955). - A. Beetran et P. Griset,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1815-1914)* [A. Colin, coll. « Cursus », 1988]. -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t. III. *De 1789 à 1880 :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le* (P.U.F., Paris, 1976). - F. Caro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XIXe-XX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2e éd., 1984). - A. Dewerpe, *le Monde du travail en France (1800-1950)* [A. Colin, coll. « Cursus », 1989]. - G. Duby et A. Wallon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t. III, *1789-1914* (Paris, 1976). - G. Duby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 la France urbaine*, t. III et t. IV (Le Seuil, Paris, 1981-1982). - A.L. Dunham,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en France, 1815-1848* (Rivière, Paris, 1953). - Cl. Fohlen, « Naissance d'une civilisation industrielle », t. III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du travail* (Nouvelle Librairie de France, Paris, 1961). - B. Gille, *la Banque et le crédit en France de 1815 à 1848* (P.U.F., Paris, 1959). - L. M. Jouffroy, *l'Ère du rail* (A. Colin, Paris, 1953). - A. Soboul, *Problèmes paysans de la révolution, 1778-1848* (Maspéro, coll. « Fondations », Paris, 1983). - J. Vidalenc,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1815 à 1848* (Rivière, Paris, 1970).

Études dans un cadre régional.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Paris sous) *la Restauration : 1815-1830* (Diffusion Hachette,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 Paris, 1977). - L. Chevalier,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à Paris pendant la première partie du XIXe siècle* (Rivière, Paris, 1958). - A. Corbin, *Archaï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au XIXe siècle* (Rivière, Paris, 1975). - A. Daumard, *la Bourgeoisie parisienne de 1815 à 1848* (S.E.V.P.E.N., Paris, 1963). - G. Désert, *les Paysans du Calvados, 1815-1895*, (Université de Lille-III, 1975, 3 vol.). - G. Fayolle, *la Vie quotidienne en Périgord au temps de Jacquou le Croquant* (Hachette, Paris, 1977). - M. Gillet, *les Charbonnages du nord de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Mouton, Paris-La Haye, 1973). - P. Leuilliot, *l'Alsac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S.E.V.P.E.N., Paris, 1956-1961, 3 vol.). - P. Lévêque, *Une société provinciale*, t. I, *la Bourgogne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 t. II, *Une société en crise : la Bourgogne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1846-1852)*, [E.H.E.S.S., Paris, 1983]. - G. Livet et Ch. Gras, *Régions et régionalisme en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Colloque de Strasbourg, 1975) [P.U.F., Paris, 1976]. - G. Ribe, *l'Opinion publique et la vie politique à Lyon lors d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seconde Restauration, 1815-1822* (Sirey, Paris, 1958). - G. Thuillier, *Aspects de l'économie nivernaise au XIXe siècle* (A. Colin, Paris, 1967). - L. Trénard, *Lyon, de l'Encyclopédie au préromantisme* (P.U.F., Lyon, 1958, 2 vol.). - J. Vidalenc, *le Département de l'Eure sous la monarchie constitutionnelle (1814-1848)* [Rivière, Paris, 1952]. - Ph. Vigier, *Essai sur la répartition de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dans la région alpine : son évolution, des origines du cadastre à la fin du second Empire* (E.H.E.S.S., coll. « Les Hommes et la Terre », n° 8, 1963).

Vie religieuse et culturelle. H.R. d'Allemagne, *les Saint-Simoniens* (Gründ, Paris, 1930). - D. Bagge, *les Idées politiques en France sous la Restauration* (P.U.F., Paris, 1952). - C. Bellanger et J. Godechot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resse française*, t. II, *De 1815 à 1871* (P.U.F., Paris, 1969). - H. Clouzot, *le Style Louis-Philippe-Napoléon III* (Larousse, Paris, 1938). - A. Dansette,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t. I (Flammarion, Paris, 1948). - L. Epsztein, *l'Économie et la Morale aux débuts du capitalisme industriel en France et en Grande-Bretagne* (A. Colin, Paris, 1966). - H. Focillon, *la Peinture au XIXe siècle* (Laurens, Paris, 1928). - Ch. Gide et Ch. Rist, *Histo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Larose et Ténin, Paris, 1909). - Y.-M. Hilaire, *Une chrétienté au XIXe siècle. La vie religieuse du diocèse d'Arras (1840-1914)* [Presses universitaires, Lille, 1977]. - R. Huyghe, *la Peintur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Flammarion, Paris, 1974-1976, 3 vol.). - Ch. Ledré, *la Presse à l'assaut de la monarchie, 1815-1848* (A. Colin, Paris, 1960). - M. Leroy, *le Socialisme des producteurs, Henri de Saint-Simon* (Rivière, Paris, 1923). - J. Lucas-Dubreton, *le Culte de Napoléon* (A. Michel, Paris, 1960). - P. Moreau, *le Romantisme*, t. VIII de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l Duca, Paris, 1957). - R. Picard, *le Romantisme social* (Brentano's, Paris, 1947). - F. Ponteil, *Histoir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789-1965* (Sirey, Paris, 1966). - Ch.-H. Pouthas, *l'Église et les questions religieuses sous la monarchie constitutionnelle* (C.D.U., Paris, 1942). - D. Robert, *les Églises réformées en France, 1800-1830* (P.U.F., Paris, 1961). - L. J. Rogier,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J. Hajjar, *Siècle des Lumières, Révolutions, Restaurations*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Église », t. IV, 1966).

Études biographiques. P. Barbéris, *Balzac et le mal du siècle* (Gallimard, Paris, 1970, 2 vol.). - P. Barral, *les Périer dans l'Isère au XIXe siècle d'après leur correspondance familiale* (P.U.F., Paris, 1964). - P. Bastid, *Benjamin Constant et sa doctrine* (A. Colin, Paris, 1966, 2 vol.). -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Un type d'ultra-royaliste, le comte Ferdinand de Bertier, et l'énigme de la Congrégation* (Presses continentales, Paris, 1952 ; nouv. éd., 1958). - J. Bouvier, *les Rothschild* (Fayard, Paris, 1967, Éd. Complexe, coll. « le Temps et les hommes », n° 16 ; nouv. éd., Paris, 1983). - J. Cabanis, *Lacordaire et quelques autres. Politique et religion* (Gallimard, Paris, 1982). - J.M. Carré, *Michelet et son temps* (Perrin, Paris, 1926). - R. de Castries, *Louis-Philippe* (Tallandier, Paris, 1980). - A. Dansette, *Louis-Napoléon à la conquête du pouvoir* (Tallandier, Paris, 1980). - J.-R. Derré, *Lamennais, ses amis et le mouvement des idées à l'époque romantique (1824-1834)* [Klincksieck, Paris, 1962]. - E. Dolléans, *Proudhon* (Gallimard, Paris, 1948). - J. H. Donnard, *Balzac, les réalité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ans la « Comédie humaine »* (A. Colin, Paris, 1961). - J. Gouhier, *la Jeunesse d'Auguste Comte et la formation du positivisme* (Vrin, Paris, 1933-1941, 3 vol.). - H. Guillemin, *Lamartine et la question sociale* (La Palatine, Genève, 1946). - J.-Cl. Lamberti, *Tocqueville et les deux démocraties* (P.U.F., coll. « Sociologie », Paris, 1983). - E. Lever, *Louis XVIII* (Fayard, Paris, 1988). - F. Ley, *Benjamin Constant, Chateaubriand,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Madame de Staël et Madame de Krüdener* (Aubier, Paris, 1967). - Ph. Mansel, *Louis XVIII*,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D. Meunier (Pygmalion, Gérard Watelet, Paris, 1982). - P. Moreau, *Chateaubriand* (Hatier, Paris, 1956). - Ch.-H. Pouthas, *Guizot pendant la Restauration* (Plon, Paris, 1923). - M. Reclus, *Monsieur Thiers* (Plon, Paris, 1929). - V.L. Tapié, *Chateaubriand par lui-même* (Le Seuil, Paris,

1965). - J. Touchard, *la Gloire de Béranger* (A. Colin, Paris, 1968).

Politique extérieure et politique coloniale. J. Ancel, *Manuel historique de la question d'Orient* (Delagrave, Paris, 1927). -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Metternich et la France après le Congrès de Vienne* (Hachette, Paris, 1968-1972, 3 vol.). - J. Droz,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648 à 1919* (Dalloz, coll. « Études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 Paris, 3ᵉ éd., 1972). - J.-B. Duroselle, *l'Europe du XIXᵉ siècle à nos jours : vie politique e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º 38, Paris, nouv. éd., 1988). - J.-P. Faivre, *l'Expansion française dans le Pacifique (1800-1842)* [Nouvelles Éditions latines, Paris, 1953]. - Ch.-A. Julien, *Histoire de l'Algérie contemporaine*, t. I, *la conquête et les débuts de la colonisation* (P.U.F. Paris, 1964). - J.-H. Pirenne, *la Sainte Alliance et le Traité de Vienne* (La Baconnière, Neuchâtel, 1946-1950, 2 vol.). - Ch.-H. Pouthas,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constitutionnelle* (C.D.U., Paris, 1948). - P. Renouvi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t.V, *le XIXᵉ siècle*, vol. I : *De 1815 à 1871* (Hachette, Paris, 1954). - J. Tramond et A. Reussner, *Éléments d'histoire maritime et coloniale contemporaine (1815-1914)* [Sté d'Édit. géographiques, maritimes et coloniales, Paris, 1946-1948]. - Ch. Webst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Londres, 1934).

22. 革命与和解共和国

Les mises au point les plus récentes : M. Agulhon, *1848 ou l'apprentissage de la République, 1848-1852*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VIII, coll. « Points. Histoire », nº 108, Paris, 1973) ; *les Quarante-huitards* (Gallimard, coll. « Archives », nº 61, Paris, 1975) ; *1848 : les utopismes sociaux* (S.E.D.E.S., Paris, 1983). -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la Révolution parisienne de 1848 vue par les Américains*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de la Ville de Paris, coll. « Verte », 1984). - P. Dominique, *les Journées de Juin* (Berger-Levrault, Paris, 1967). - G. Duveau, *1848* (Gallimard, coll. « Idées », Paris, 1965). - L. Girard, *Naissance et mort de la IIᵉ République* (Calmann-Lévy, Paris, 1968). - F. Ponteil, *1848* (A. Colin, Paris, 3ᵉ éd., 1955). - A.-J. Tudesq,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0 décembre 1848* (A. Colin, coll. « Kiosque », Paris, 1965). - Ph. Vigier, *la Seconde République* (P.U.F., « Que sais-je ? », nº 295, 5ᵉ éd., Paris, 1988) ; *la Vie quotidienne en province et à Paris pendant les journées de 1848*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82). - L. Willette,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1851* (Aubier-Montaigne, coll. « Floréal », Paris, 1982).
renvoient elles-mêmes :

a) soit à des *histoires anciennes* ayant plutôt un caractère de sources (Daniel Stern, Garnier-Pagès, E. Ollivier, Lamartine, etc.) ;

b) soit à des synthèses dépassées, mais riches de faits, telles que celle de Ch. Seignobos au tome VI de l'*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Hachette, Paris, 1921) de É. Lavisse, celle de G. Renard au tome IX de l'*Histoire socialiste* (1906) dirigée par J. Jaurès, ou celle de P. de la Gorce, *Histoire de la Seconde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887), qui représentent bien respectivement les trois orientations classiques : républicaine, socialiste et conservatrice ;

c) soit à des *travaux particuliers* dont on trouvera une sélection dans les mises au point citées plus haut.

On retiendra seulement que les principaux *renouvellements récents* de points de vue sont venus :
a) d'une part, des beaux travaux néo-lamartiniens de H. Guillemin, *le Coup du 2-Décembre*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Paris, 1952) et *la Première Résurrection de la République, 24 février 1848*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Paris, 1967) ;

b) d'autre part, des thèses d'histoire sociale à cadre régional : Ph. Vigier, *la Seconde République dans la région alpine* (P.U.F., Paris, 1963, 2 vol.). - M. Agulhon, *la République au village : les populations du Var,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IIᵉ République* (Seuil, coll. « Univers historique », 1979) et *Une ville ouvrière au temps du socialisme utopique : Toulon de 1815 à 1851* (E.H.E.S.S., coll. « Publ. de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Sorbonne. VIᵉ section :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 nº 18, nouv. éd., 1977). - A. Corbin, *Archaï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au XIXᵉ siècle* (Rivière, Paris, 1975, 2 vol.), et la série n'en est pas close ;

c) d'une active historiographie sociale de langue anglaise, dont on peut retenir R. Price, comme auteur de *The French Second Republic, a social history* (Batsford, Londres, 1972), et comme « éditeur » de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1848 and the Second French Republic* (CroomHelm, Londres, 1975), ainsi que J. Merriman, *The Agony of the Republic*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d) d'un récent regain d'intérêt pour l'histoire intellectuelle, dont émerge *le Temps des prophètes* de Paul Bénichou (Gallimard, Paris, 1977).

L'École française d'histoire ouvrière, celle d'E. Dolléans, de G. Duveau, d'E. Labrousse, s'exprime principalement dans *le Mouvement social*, revue trimestrielle (Éditions ouvrières, Paris). Elle a réalisé sous la direction de J. Maitron un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1ʳᵉ partie, *1789-1864* (Éditions ouvrières, Paris, 1965-1971, 3 vol.) où la plupart des « quarante-huitards » connus font l'objet de notices élaborées de première main.
Enfin la *Société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qui avait naguère publié le périodique *Études, bibliothèqu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interrompu depuis 1968), a donné en 1975 un utile numéro spécial aux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1848 - et la Seconde République ») ; elle apporte aujourd'hui sa coopération à *Romantisme, revue du XIXᵉ siècle* (trimestrielle, chez Champion).

23. 一种新文明的演进

N'ont été retenus que des ouvrages et articles récents et originaux. Ch.-R. Ageron, J. Thobie, G. Meynier, C. Coquery-Vidrovitch,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loniale*, t. II, *De 1914 à nos jours* (A. Colin, coll. « Histoires », 1991). - M. Agulhon, *la République : de Jules Ferry à François Mitterrand, 1880 à nos jours* (Hachette,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Hachette », t. V, 1990). M. Agulhon (sous la dir. de), *la Ville de l'âge industriel, le cycle haussmannien (1840-1950)* [Éd. du Seuil, coll. « Histoire de la France urbaine » dirigée par G. Duby, t. IV, Paris, 1983]. - A. Armengaud,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u XIXᵉ siècl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º 1420, Paris, 2ᵉ éd., 1976). - J.-C. Asselai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u XVIIIᵉ siècle à nos jours*, t. I *(du XVIIIᵉ siècle à 1919)* [Éd. du Seuil, Paris, 1984]. - P. Bairoch, *Commerce extérieur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IXᵉ siècle* (Mouton, La Haye-Paris, 1976). - P. Barral, *le Département de l'Isère sous la IIIᵉ République, 1870-1940* (A. Colin, Paris, 1962). - A. Beltran et P. A. Carré, *la Fée et la Servant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face à l'électricité (XIXᵉ-XXᵉ siècle* (Belin, coll. « Histoire et Société »). - L. Bergeron, *les Capitalistes en France, 1780-1914*

(Gallimard, coll. « Archives », Paris, 1978) ; *l'Industrialisation de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Hatier, Paris, 1979) ; *les Rothschild et les autres : la gloire des banquiers* (Perrin, coll. « Histoire et fortunes », 1991). - J. Bouvier, *le Crédit Lyonnais de 1863 à 1882. Les années de formation d'une banque de dépôts* (S.E.V.P.E.N., Paris, 1961, 2 vol.) ; *Naissance d'une banque : le Crédit Lyonnais* (Flammarion, Paris, nouv. éd., 1968) ; *Un siècle de banque française* (Hachette, Paris, 1973). - J. Bouvier, Fr. Furet et M. Gillet, *le Mouvement du profit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Mouton, La Haye-Paris, 1965) ; *Charbon et sciences humaines. Actes du colloque de Lille, 1963* (Mouton, La Haye-Paris, 1966). -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t. III, *l'Avènement de l'ère industrielle, 1789-années 1880* (P.U.F., Paris, 1976, 2 vol.) ; t. IV, *l'Ère industrielle et la société d'aujourd'hui, 1880-1980* (P.U.F., Paris, 1976 et 1979, 2 vol.). - D. et A. Cabanis, *Histoire économique, social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Privat, Toulouse, 1990). - R.E. Cameron, « Profit, croissance et stagnation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 dans *Économie appliquée*, avr.-sept. 1957 ; *la France et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Europe, 1800-1914* (Le Seuil, Paris, 1971). - « La Concentration des établissements en France de 1896 à 1936 », dans *Études et conjoncture*, sept. 1954. - F. Caron, *Histoire de l'exploitation d'un grand réseau, la Compagnie du chemin de fer du Nord, 1846-1937* (Mouton, La Haye-Paris, 1973). - F. Caro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XIXe-XXe siècles* (A. Colin, coll. « U », Paris, 2e éd., 1984) ; *Le résistible d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Perrin, Paris, 1985) ; *La France des patriotes de 1851 à 1918*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t. V,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Paris, 1985). - P. Cayez, *Du métier Jacquard aux hauts fourneaux : aux origines de l'industrie lyonnaise* (P.U.L., Lyon, 1978) ; *Crises et croissance de l'industrie lyonnaise, 1850-1900* (P.U.L., Lyon, 1980). - F.-P. Codaccioni, *De l'inégalité sociale dans une grande ville industrielle : le drame de Lille de 1850 à 1914*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Lille-III, Lille, 1976). - A. Corbin, *Archaï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au XIXe siècle* (M. Rivière, 1975, 2 vol.). - F. Crouzet, « Essai de construction d'un indice annuel de la production industriell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 dans *Annales E.S.C.*, janv.-févr. 1970, pp. 56-99 ; « Encore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 dans *Revue du Nord*, juill.-sept. 1972. - A. Daumard et alii, *les Fortunes françaises au XIXe siècle* (Mouton, La Haye-Paris, 1973). - M. Daumas et alii,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 t. III et IV (P.U.F., Paris, 1969 et 1979). - G. Désert, *Une société rurale au XIXe siècle ; les paysans du Calvados 1815-1895* (Université de Lille-III, Lille, 2 vol. ; Champion, Paris, 1975, 1 vol.). - J. Dupâquier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T. III : *de 1789 à 1914* ; T. IV : *de 1914 à nos jours* (P.U.F., Paris, 1988 et 1989). - G. Dupeux, *Aspects de l'histoire sociale et politique du Loir-et-Cher, 1848-1914* (Mouton, La Haye-Paris, 1962) ;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789-1970* (A. Colin, Paris, 6e éd., 1986) ; *Atlas historique de l'urbanisation de la France (1811-1975)* [Éd. du C.N.R.S., 1982]. - Dik. Fieldhouse, *Economics and Empire, 1830-1914* (MacMillan, Londres, 1984). - Cl. Fohlen, *l'Industrie textile au temps du Second Empire* (Plon, Paris, 1956). - J. Fourastié, *Migrations professionnelles* (P.U.F., coll. I.N.E.D., Paris, 1957). - P. Fridenson et A. Strauss (sous la dir. de), *le Capitalisme français, XIXe-XXe siècle. Blocages et dynamisme d'une croissance* (Fayard, 1987). - R. Fruit,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u pays de Saint-Amand (Nord), 1668-1914* (A. Colin, Paris, 1963). - G. Garrier, *Paysans du Beaujolais et du Lyonnais, 1800-1970* (P.U.G., Grenoble, 1973, 2 vol.). - G. Garrier (sous la dir. de), *la Domination du capitalisme 1840-1914* (A. Colin, coll. «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 sous la dir. de P. Léon, t. III, Paris, 1977). - B. Gille, *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 1848-1870*, t. II (Droz, Genève, 1967) ; *la Sidérurgi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Droz, Genève, 1968). - M. Gillet, «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ou « take-off » ?, dans *l'Information historique*, mars-avr. 1970, pp. 67-75 ; *les Charbonnages du nord de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Mouton, La Haye-Paris, 1973) ; *Histoire sociale du Nord et de l'Europe du Nord-Ouest* (P.U.L., Lille, 1984). - L. Girard, « Valeur et permanence des thèmes saint-simoniens », dans *Cahiers de l'I.S.E.A.*,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avr. 1970. - A. Gueslin, *les Origines du Crédit agricole* (Annales de l'Est, Mémoire n° 59, Nancy, 1978). - P. Guillaume, *Individus, Familles, Nations* (S.E.D.E.S., Paris, 1985). - R. Hübscher, *l'Agriculture et la société rurale dans le Pas-de-Calais du XIXe siècle à 1914* (Arras, 1974, nouv. éd., 1979-1980, 2 vol.). - Ch. Kindleberger, *Economic Growth in France and Britain, 1851-195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4). - M. Laget, *Naissances. L'accouchement avant l'âge de la clinique* (Éd. du Seuil, Paris, 1982). - Cl. Lamming et J. Marseille, *le Temps des chemins de fer en France* (Nathan, 1986). - P. Léon, *la Naissance de la grande industrie en Dauphiné (fin du XVIIe siècle-1869)* [P.U.F., Paris, 1954, 2 vol.] ; « l'Usine d'Allevard, 1869-1914 », dans *Cahiers d'histoire*, 1963 ; P. Léon, F. Crouzet, R. Gascon et alii, *l'Industrialisation en Europe au XIXe siècle* (C.N.R.S., Paris, 1972). - Y. Lequin, *les Ouvriers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1848-1914* (P.U.L., Lyon, 1977, 2 vol.). - M. Lévy-Leboyer, «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 dans *Annales E.S.C.*, juill.-août 1968, pp. 788-807 ; M. Lévy-Leboyer et alii, *la 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e* (E.H.E.S.S., 1977). - F. Loyer, *le Siècle de l'industrie* (Skira, Paris, 1983). - J. Marczewski, « le Produit physiqu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13 ; comparaison avec la Grande-Bretagne », dans *Cahiers de l'I.S.E.A.*, série AF, juill. 1969. - T.J. Markovitch, « l'Industr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64 », dans *Cahiers de l'I.S.E.A.*, série AF, 4 vol., 1965-1966 ; « les Cycles industriels en France », dans *le Mouvement social*, avr.-juin 1968 ; « les Secteurs dominants de l'industrie française », dans *Analyse et prévision*, mars 1966. - J. Marseille, *Empire colonial et capitalisme français : histoire d'un divorce* (Albin Michel, coll. « l'Aventure humaine », 1986 et Le Seuil, coll. « Points-Histoire », n° 426, 1989) ; *l'Âge d'or de la France coloniale* (Albin Michel, coll. « Beaux livres », 1986) ; *les Paysans : 1850-1880* (Atlas, coll. « Un certain âge d'or », 1987). - C.-A. Michalet, *les Placements des épargnants français de 1815 à nos jours* (P.U.F., Paris, 1968). - G.-P. Palmade, *Capitalisme et capitalistes français au XIXe siècle* (A. Colin, Paris, 1961). - M. Perrot (sous la dir. de),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Grande Guerre* (Le Seuil, coll. «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 t. IV (sous la dir. de G. Duby et de Ph. Ariès), Paris, 1987). - Ph. Pinchemel, *Structures sociales et dépopulation rurale dans les campagnes picardes de 1836 à 1936* (A. Colin, Paris, 1957). - A. Prost, *Histoir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800-1967)* [A. Colin, coll. « U », Paris, 6e éd., 1986] ; *Petite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5e éd., 1986). - R. Rémond, *Notre siècle (1918-1991)* [Fayard,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t. VI,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Paris, 2e éd., 1991]. - J.-P. Rioux,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1780-1880* (Le Seuil, Paris, 1971). - R. Roehl, « l'Industrie française : une remise en cause », dans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77. - W. Serman, *les Officiers français dans la nation 1848-1914* (Aubier-Montaigne, coll. « Historique », 1982). - J.-F. Sirinelli, *Intellectuels et passions françaises. Manifestes et pétitions au XXe siècle* (Fayard, coll. «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 Paris, 1990). - P. Sorlin,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t. I *(1840-1914)* [Arthaud, Paris, 1969]. - A. Thépot et alii, *l'Ingénieur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Éditions ouvrières, coll. « Mouvement social », Paris, 1985). - G. Thuillier, *Pour une histoire du quotidien au XIXe siècle en Nivernais* (Mouton, La Haye-Paris, 1977). - R. Trempé, *les Mineurs de Carmaux, 1848-1914* (Éditions Ouvrières, 1971, 2 vol.). - J. Vial, *l'Industrialisation de la sidérurgie, 1814-1864* (Mouton, La Haye-Paris, 1968, 2 vol.). - E.A. Wrigley, *Société et population* (Hachette, Paris, 1969).

24. 第二帝国

Ouvrages généraux. A. Dansette, *Du 2 décembre au 4 septembre* (Hachette, Paris, 1972). - A. Gérard, *le Second Empire, innovation et réaction* (P.U.F., Paris, 1972). - P. Labracherie, *le Second Empire* (Julliard, Paris, 1962). - P. Miquel, *le Second Empire* (A. Barret, Paris, 1979). - A. Plessis, *De la fête impériale au mur des Fédérés, 1852-1871*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IX, Paris, 1973). - G. Pradalié, *le Second Empir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739, Paris, 7e éd., 1987).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Man of destiny. Enlightened statesman or protofascist ? ed. by B.G. Gooch (New York, 1962). - L. Girard, *Napoléon III* (Fayard, Paris, 1986). - W. Smith, *Napoléon III* (Hachette, trad. fr., Paris, 1982).

Les personnes. N. Blayau, *Billault, ministre de Napoléon III d'après ses papiers personnels* (Klincksieck, Paris, 1969). - J. Durieux, *le Ministre Pierre Magne d'après ses lettres et ses souvenirs* (Champion, Paris, 1929). - G. Lameyre, *Haussmann, préfet de Paris* (Flammarion, Paris, 1958). - B. Leclère et V. Wright, *les Préfets du second Empire* (A. Colin, Paris, 1972). - J. Maurain, *Un bourgeois français au XIXe siècle : Baroche, ministre de Napoléon III* (Alcan, Paris, 1936). - B. Melchior- Bonnet, *Jérôme Bonaparte, l'envers de l'épopée* (Perrin, Paris, 1979). - M. Parturier, *Morny et son temps* (Hachette, Paris, 1969). - J. Rohr, *Victor Duruy, ministre de Napoléon III. Essai sur la politiqu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au temps de l'Empire libéral*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Paris, 1967). - R. Schnerb, *Rouher et le second Empire* (A. Colin, Paris, 1949).

Institutions et vie politique. R. Bellet, *Presse et journalisme sous le second Empire* (A. Colin, Paris, 1967). - J.-J. Chevallier, *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de 1789 à nos jours* (Dalloz, nouv. éd. Paris, 1981). - J. Dubois, *le Vocabulaire politiqueet social en France de 1869 à 1872* (Larousse, Paris, 1962). - L. Girard, R. Gossez, A. Prost, *les Conseillers généraux en 1870* (P.U.F., Paris, 1967). - P. Guiral, *Prévost-Paradol, pensée et action d'un libéral sous le second Empire* (P.U.F., Paris, 1955). - B. Le Clère et V. Wright, *les Préfets du second Empire* (A. Colin, Paris, 1973). - A. Plessis, *Régents et gouverneurs de la Banque de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 (Droz, Genève-Paris, 1985). - H.C. Payne. *The Police State of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51-186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 M. Rubel, *Karl Marx devant le bonapartisme* (Mouton, Paris, 1960). - I. Tchernoff, *le Parti républicain au coup d'État et sous le second Empire* (Pedone, Paris, 1906). - V. Wright, *le Conseil d'État sous le second Empire* (A. Colin, Paris, 1972). - Th. Zeld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éon III* (McMillan, Londres, 1958).

L'Empire libéral et la « crise » finale. Les Élections de 1869, sous la direction de L. Girard (Rivière, Paris, 1960). - Th. Zeldin, *E. Ollivier and the Liberal Empire of Napoléon III*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63).

La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A. Armengaud, *les Populations de l'Est aquitain au début de l'époque contemporaine. Recherches sur une région moins développée (vers 1845-vers 1871)* [Mouton, Paris, 1961]. - A. Armengaud et A. Fin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167, Paris, 2e éd., 1976). - R. Cameron, *la France et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Europe* (Seuil, coll. « Univers historique », Paris, 1971). - A.-L. Dunham. *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 of 1860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ance* (Detroi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30). - G. Duveau, *la Vie ouvrière sous le second Empire* (Gallimard, Paris, 1946). - C. Fohlen, *l'Industrie textile au temps du second Empire* (Plon, Paris, 1956). - J. Gaillard, *Paris, la Ville, 1852-1870* (Université de Lille-III, 1976 ; Champion, Paris, 1976). - L. Girard, *la Politique des travaux publics du second Empire* (A. Colin, Paris, 1952). - L. Girard, *Paris sous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et le second Empire, 1848-1870* (Diffusion Hachette,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 Paris, 1981). - P. Guiral,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à l'âge d'or du capitalisme, 1852-1879* (Hachette, Paris, 1976). - J. Lhomme, *la Grande Bourgeoisie au pouvoir, 1830-1850* (P.U.F., Paris, 1960). - T.J. Markovitch, *Salaires et profits industriels en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et le second Empire* (Cahiers de l'I.S.E.A., 1965). - *Marse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Centenaire de la chambre de commerce* (Plon, Paris, 1961). - P. Pierrard, *la Vie ouvrière à L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 (Bloud et Gay, Paris, 1965). - A. Plessis, *la Banque de France et ses deux cents actionnaires sous le second Empire* (Droz, coll. « Travaux d'histoire éthico-politique », n° 40, Genève, 1983). - A. Rowley, *Évolution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u XIXe siècle à 1914* (C.D.U. et S.E.D.E.S., 1982).

Aspects de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St Bobr-Tylingo, *Napoléon III, l'Europe et la Pologne, 1863-1964*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Polonicum, 1963). - L.M. Case, W. Spencer, *French Opinion on War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Philadelphie, 1954). - G. Delamare, *la Tragédie mexicaine, une faute de Napoléon III* (Thone, Liège, 1963). - A.-L. Dunham, *The Anglo-French Treaty of commerce of 1860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ance* (Detroi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30). - J.-B. Duroselle, *l'Europe du XIXe siècle à nos jours, vie politique e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38, Paris, nouv. éd. 1988). -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 (C.N.R.S., Paris, 1964). - J.-G. Larregola,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face à la guerre de Sécession* (Pedone, Paris, 1970). - P. Renouvi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t. V, *le XIXe siècle,* vol. I : *de 1815 à 1871* (Hachette, Paris, 1964).

Les guerres du second Empire ; armée, diplomatie et conflits. L.M. Case, *Franco-Italian Relations 1860-1865. The Roman Question and the Convention of September* (Philadelphia, 1932). - P. Guichonnet, *l'Unité italienn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942, Paris, nouv. éd. 1978) ; *Histoire de l'annexion de la Savoie à la France* (Roanne, Horvath, 1983). - R. Guillemin, *la Guerre de Crimée* (France-Empire, Paris, 1981). - L. Monnier, *Études sur les origines de la guerre de Crimée* (Droz, Genève, 1978). - B. Schnapper, *le Remplacement militaire au XIXe siècle* (S.E.V.P.E.N., Paris, 1968). - Fr. Valsecchi, *l'Unificazione italiana e la politica europea dalla guerra di Crimea alla guerra di Lombardia 1854-1859* (Milano, 1939).

La guerre de 1870 et la Commune. J.-F. Audoin-Rouzeau, *1870 : la France dans la guerre* (A. Colin, 1989). - J. Bruhat, J. Dautry, E. Tersen, *la Commune de 1871* (Éd. sociales, Paris, 1970). - A. Decouflé, *la Commune de Paris* (Cujas, Paris, 1969). - L. M. Greenberg, *Sisters of Liberty. Marseille, Lyon, Paris and the Reaction to a Centralized State, 1868-187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H. Lefebvre, *26 mars 1871, la Proclamation de la Commune*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 26, Paris, 1965). - Ch. Rihs, *la Commune de Paris (1871). Sa structure et ses doctrines* (Le Seuil, coll. « Univers historique », Paris, 1973). - J. Rougerie, *Procès des Communards* (Julliard, Paris, 1964) ; *Paris libre 1871* (Le Seuil, Paris, 1971) ; *la Commune de Paris* (P.U.F., « Que sais-je ? », n° 581, Paris, 1re éd., 1988). - W. Serman, *la Commune de Paris (1871)* [Fayard, Paris, 1986].

25. 第三共和国

Études d'ensemble. L'histoire de la IIIe République est réinsérée dans un cadre mondial par A. Jourcin, *Prologue à notre siècle, 1872-1918*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 t. XI, Paris, 1974). Son étude est esquissée dans le livre, bref et clair, de P. Bouju et H. Duboi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1870-1940)*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520, 11e éd., 1988]. Elle est plus détaillée par C. et A. Ambrosi, *la France (1870-1986)* [Masson, coll. « Un siècle d'histoire », 4e éd., 1986]. - Elle est éclairée par J. Dalloz,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par les textes* (Masson, coll. « Un siècle d'histoire », Paris, 1985). - Les ouvrages les plus complets sont ceux de J.-M. Mayeur, *les Débuts de la IIIe République, 1871-1899,* et de Madeleine Rebérioux, *la République radicale, 1899-1914,* qui forment les t. X et XI de la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Éd. du Seuil, Paris, 1973 et 1975) [larges orientations bibliographiques]. L'ouvrage de J.-B. Duroselle, *la France de la Belle Époque.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1900-1914* (Éd. Richelieu, Paris, 1972), éclaire la fin de la période. Des œuvres d'écrivains plus anciens sont aujourd'hui des classiques, telles celles de F. Goguel, *la Politique des partis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Éd. du Seuil, Paris, 1946, 2 vol.), d'A. Siegfried, *Tableau politique de la France de l'Ouest* (Paris, 1914 ; A. Colin, Paris, 1964), de D. Halévy, *la Fin des notables et la République des ducs* (le Livre de Poche, Paris, nouv. éd., 1972), et, de Ch. Seignobos, *l'Évolution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Hachette, coll. «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VIII sous la dir. d'E. Lavisse, Paris, 1921).

Études particulières. Les principaux faits politiques sont relatés par J. Chastenet, *Histoire de la IIIe République* (Hachette, Paris, t. I à IV, 1952-1954), par R. Rémond,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puis 1789,* t. II *1848-1879* (A. Colin, Paris, 3e éd., 1986)et par J.-P. Azéma et M. Winock, *la IIIe République* (Calmann-Lévy, Paris, 1970). - Les grandes crises et les « scandales », sont relatés dans la collection « Archives » (Gallimard, Paris) : J. Bouvier, *les Deux Scandales de Panama* (1964), J. Julliard, *Clemenceau, briseur de grèves* (1965), J.-M. Mayeur, *la Séparation de l'Église et de l'État* (1966), et dans la collection « Kiosque » (A. Colin, Paris) : P. Boussel, *l'Affaire Dreyfus et la presse* (1963), A. Kriegel et J.-J. Becker, *1914, la Guerre et le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1964), J. Néré, *le Boulangisme et la presse* (1964), M. Ozouf, *l'École, l'Église et la République, 1871-1914* (1963). Pour l'histoire religieuse, consulter J.-M. Mayeur (sous la dir. de), *Guerres mondiales et totalitarismes (1914-1958)* [Fayard-Desclée, *Histoire du christianism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t. 12, 1990].

Ouvrages de référence. L. Charlet, P. Albert, F. Terrou, et R. Ranc,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resse française,* sous la dir. de Cl. Bellanger, L. Charlet, J. Gudechot, t. III, 1871-1940 (P.U.F., Paris, 1972). - J. Jolly (sous la dir. de), *Dictionnaire des parlementaires. Notices biographiques sur les ministres, députés et sénateurs français de 1889 à 1940* (P.U.F., Paris, 1960-1977, 8 vol.). - J. Maîtron,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Éd. ouvrières, Paris, 1964-1983, 20 vol.). - R. Rémond et collab., *Atlas historiqu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1800-1965* (A. Colin, coll. « U », Paris, nouv. éd., 1966). - A. Robert et G. Gougny, *Dictionnaire des parlementaires français... depuis le 1er mai 1789 jusqu'au 1er mai 1889...* (Bourcoton, Paris, 1889-1891, 5 vol.).

La vie politique. P. Chevallier, *la Séparation de l'Église et de l'École. Jules Ferry et Léon XIII* (Fayard, Paris, 1981). - J. Gadille, *la Pensée et l'Action politique des évêques français au début de la IIIe République, 1870-1883* (Hachette, Paris, 1967, 2 vol.). - J. Kayser, *les Grandes Batailles du radicalisme des origines aux portes du pouvoir, 1820-1901* (Rivière, Paris, 1961). - G. Lachapelle, *le Ministère Méline. Deux années de politique intérieure et extérieure 1890-1898* (Éditions d'Art, Paris, coll. des « Politiques contemporains », sous la dir. de J.L.L. d'Artrey, 1928). - B. Lavergne, *Journal : 1879-1887. Les deux présidences de Jules Grévy* (Fischbacher, Paris, 1967). - J.-M. Mayeur, *la Séparation de l'Église et de l'État* (Julliard, Paris, 1966). - J.-M. Mayeur, *la Vie politique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Éd. du Seuil, Paris, 1984). - B. Ménager, *la Vie politique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Nord* (P.U.L., Lille, 1983). - P. Miquel, *l'Affaire Dreyfu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867, Paris, 7e éd., 1985). - Cl. Nicolet, *le Radicalism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761, 5e éd., 1983). - R. Rémond, *les Droites en France* (Aubier-Montaigne, coll. « Historique », nouv. éd., 1982). - A. Thibaudet, *la République des professeurs* (Grasset, Paris, 1927). - E. Weber, *l'Action française* (Stock, Paris, 1962). - G. Wormser, *la République de Clemenceau* (P.U.F., Paris, 1961).

Personnages. J.-C. Allain, *Caillaux*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81). - G. Aumercier, *Paul Leroy-Beaulieu* (Université de Paris IV). - P. Barral, *les Périer dans l'Isère au XIXe siècle, d'après leur correspondance familiale* (P.U.F., Paris, 1964). - P. Barral, *les Agrariens français*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8). - P. Barral, *les Fondateurs de la IIIe République* (A. Colin, Paris, 1968). - J. Bouvier, *les Rothschild* (Éd. Complexe, coll. « le Temps et les Hommes », n° 16, Bruxelles, nouv. éd., 1983). - R. Cazelles, *le Duc d'Aumale* (Tallandier, coll. « Figures de proue », Paris 1984). - G. Cendrars (présenté par), *Jean Jaurès (1859-1914)* [les Éd. ouvrières, coll. « Aux sources du socialisme », Paris, 1984). - J. Chastenet, *Léon Gambetta* (Fayard, Paris, 1969). - Ch. Chesnelong, *les Derniers Jours de l'Empire et le gouvernement de Monsieur Thiers* (Perrin, Paris, 1932). - A. Dansette,*Histoire des présidents de la République. De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à Georges Pompidou* (Plon, Paris, 1981). - J. Estèbe, *les Ministres de la République* (F.N.S.P., Paris, 1982). - B. Foucart, *Courbet* (Paris, 1982). - J.-M. Gaillard, *Jules Ferry* (Fayard, Paris, 1989). - H. Goldberg, *Jean Jaurès. La biographie du fondateur du parti socialiste* (Fayard, Paris, 1970). - P. Guiral, *Adolphe Thiers* (Fayard, Paris, 1986). - D. Halévy, *Péguy* (Grasset, Paris, 1979). - J. Julliard, *Fernand Pelloutier* (Éd. du Seuil, Paris, 1971). - B. Leroy, *Gustave Eiffel* (F. Hazan, Paris, 1984). - Ph. Levillain, *Boulanger, le fossoyeur de la monarchie* (Flammarion, Paris, 1982). - Albert de Mun, *Catholicisme français et catholicisme romain du Syllabus au ralliement*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83). - J.-M. Mayeur, *Un prêtre démocrate, l'abbé Lemire, 1853-1928* (Casterman, Paris, 1968). - Louise Michel, *Matricule 2182. Souvenirs de ma vie (extraits)* [Dauphin, coll. « Archives », Paris, 1982]. - P. Miquel, *Poincaré* (Fayard, Paris, nouv. éd., 1984). - C. Molette, *Albert de Mun* (Beauchesne, Paris, 1970). - F. Pisani-Ferry, *le Général Boulanger* (Flammarion, Paris, 1969) ; *Jules Ferry et le partage du monde* (Grasset, Paris, 1962). - M. Rebérioux, *Jean Jaurès* (Calmann-Lévy, Paris, 1983). - J. Silvestre de Sacy, *le Maréchal de Mac-Mahon, duc de Magenta* (Édi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1970).

- P. Sorlin, *Waldeck-Rousseau* (A. Colin, Paris, 1966). - C. Willard, *Jules Guesde, textes choisis*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9) ; *les Guesdistes* (Éd. sociales, Paris, 1965). - A. Zévaès, *Jules Guesde* (Rivière, Paris, 1929) ; *Clemenceau* (Julliard, Paris, 1949).

Vie économique. J.-P. Aron et alii, *Misérable et glorieuse. La femme au XIXe siècle* (Fayard, Paris, 1980). - H. Boni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epuis 1880* (Masson, coll. « Un siècle d'histoire », Paris, 1988) ; *l'Argent en France depuis 1880. Banquiers, financiers, épargnants dans la vie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Masson, coll. « Un siècle d'histoire », Paris, 1989). - J. Bouvier, *le Krach de l'Union générale* (P.U.F., Paris, 1960). - J.-P. Chaline, *les Bourgeois de Rouen* (F.N.S.P., Paris, 1982). - R.-H. Hubscher, *l'Agriculture et la société rurale dans le Pas-de-Calais* (Commission départemental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du Pas-de-Calais, 1979-1980, 2 vol.). - G. Jacquemet, *Belleville au XIXe siècle* (E.H.E.S.S., Paris, 1984). - J. Maurin, *Armée, Guerre, Société. Soldats languedociens (1889-1919)*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82]. - J.-Y. Mollier, *Histoire du capitalisme d'édition, 1860-1920* (Fayard, coll. «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 Paris, 1988) ; *le Scandale de Panama* (Fayard, coll. «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 Paris, 1991). - C. Omnes, *De l'atelier au groupe industriel, Vallourec, 1882-1978* (Paris, 1981). - Michelle Perrot, *les Ouvriers en grève, 1871-1890* (Mouton, Paris, 1974).

Politique étrangère. Ch. Andrew, *Théophile Delcassé and the Making of the Entente Cordiale* (Londres, 1968). - J. Droz,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648 à 1919* (Dalloz, coll. « Étud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 3e édit., 1972). - J.-B. Duroselle, *l'Europe de 1815 à nos jours. Vie politique e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38, nouv. éd., 1988). - R. Girault, *Emprunts russes et investissements français en Russie, 1887-1914* (A. Colin, Paris, 1973). - P. Guillen, *l'Allemagne et le Maroc de 1870 à 1905* (P.U.F., Paris, 1967). - G. Haupt et M. Rebérioux,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et l'Orient* (Cujas, Paris, 1967). - P. Milza,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1871 à 1914* (A. Colin, Paris, 1968). - R. Poidevin, *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et financières entre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de 1890 à 1915* (A. Colin, Paris, 2e éd., 1979). - P. Renouvin, *le XIXe siècle, de 1872 à 1914* (Hachette, coll. «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t. VI, Paris, 1955). - J. Thobie, *l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financiers et politiques français dans la partie asiatique de l'Empire ottoman*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75).

Politique coloniale. Ch. R. Ageron, *les Algériens musulmans et la France, 1871-1919* (P.U.F., Paris, 1968, 2 vol.) ; *Politiques coloniales au Maghreb* (P.U.F., coll. « Hier », Paris, 1973) ; *Histoire de l'Algérie contemporaine,* T. II. *De l'insurrection de 1871 à la guerre de libération, 1954* (P.U.F., Paris, 1979). - H. Brunschwig, *Mythes et réalités de l'impérialisme colonial français* (A. Colin, Paris, 1960) ; *Noirs et Blancs dans l'Afrique noire française ou comment le colonisé devient colonisateur (1870-1914)* [Flammarion, coll. « Nouvelle Bibliothèque scientifique », Paris, 1983]. - C. Coquery-Vidrovitch, *le Congo au temps des grandes compagnies concessionnaires (1898-1930)* [Mouton, Paris, 1932]. - J. Ganiage, *les Origines du protectorat français en Tunisie* (P.U.F., Paris, 1959) ; *l'Expansion coloniale de la France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1871-1914* (Payot, Paris, 1968). - R. Girardet, *l'Idée coloniale en France* (La Table ronde, Paris, 1972). - P. Goinard, *Algérie, œuvre française* (Robert Laffont, Paris, 1984). - Ch. Meyer, *la Vie quotidienne des Français en Indochine 1860-1910* (Hachette Littératur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85). - M. Michel, *l'Appel à l'Afrique* (Édi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82). - J.-L. Miège, *Expansion européenne et décolonisation de 1870 à nos jours* (P.U.F., coll. « Nouvelle Clio », n° 28, Paris, nouv. éd., 1986). - A. Reussner, *Éléments d'histoire maritime et coloniale contemporaine (1815-1914)* [Société d'éditions géographiques, maritimes et coloniales, Paris, 1946-1948]. - X. Yacono,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U.F., « Que sais-je ? », n° 452, 5e éd., Paris, 1988).

26.知识传播和文化变革

Témoignages. G. Bonheur, *Qui a cassé le vase de Soissons ? L'album de famille de tous les Français* (Laffont, Paris, 1963) ; *La République nous appelle* (Laffont, Paris, 1965). - É. Carles, *Une soupe aux herbes sauvages* (J.-C. Simoën, Paris, 1977). - L. Chaleil, *la Mémoire du village* (Stock, Paris, 1977). - *La Classe ininterrompue. Cahiers de la famille Sandre, enseignants 1780-1960, présentés par Mona Ozouf* (Hachette-Littérature, Paris, 1979). - B. Dussane, *Dieux des planches* (Flammarion, Paris, 1964). - Jacques-Charles, *le Caf'Conc'* (Flammarion, Paris, 1966). - R. Jeanne, *Cinéma 1900* (Flammarion, Paris, 1965). - J. Ozouf, *Nous les maîtres d'école* (Gallimard, Paris, 1967). - M. Proust,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Gallimard, Paris, 1913-1927, 15 vol.). - R. Thabault, *1848-1914. L'ascension d'un peuple : mon village, ses hommes, ses routes, son école* (Delagrave, Paris, 1945).

Généralités. J. Cassou, E. Langui et N. Pevsner, *les Sources du XXe siècle* (Éd. des Deux-Mondes, Paris, 1961). - M. Crubelier,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XIXe-XXe siècle* (A. Colin, Paris, 1974). - R. L. Delevoy, *Dimensions du XXe siècle (1900-1945)* [Skira, Genève, 1965]. - F. Loux, *le Corps dans la société traditionnelle* (Berger-Levrault, Paris, 1979). - *Niveaux de culture et groupes sociaux. Actes du colloque réuni du 7 au 9 mai 1966 à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Mouton, La Haye-Paris, 1967). - N. Ponente, *les Structures du monde moderne (1850-1900)* [Skira, Genève, 1965].

Cadres de la vie culturelle. C. Amalvi, *les Héro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hot'œil, Paris, 1980). - L. Charlet, P. Albert, F. Terrou et R. Ranc, *De 1871 à 1940* (P.U.F., coll. «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resse française », t. III sous la dir. de C. Bellanger, L. Charlet, J. Godechot, P. Guiral, R. Ranc, F. Terrou, Paris, 1972). - M. Blancpain,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a France du Nord sous les occupations (1824-1914)*[Hachette-Littératur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83]. - G. Désert, *la Vie quotidienne sur les plages normandes du second Empire aux années folles*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83). - R. Dumesnil, *l'Époque réaliste et naturaliste* (Tallandier, Paris, 1945). - « Enseigner l'histoire », *H-Histoire,* n° 1, mars 1979. - F. Furet et J. Ozouf, *Lire et écrire* (Éd. de Minuit, Paris, 1977, 2 vol.). - P. Gerbod,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lycées et collèges au XIXe siècle*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60). - P. Guiral et G. Thuillier, *la Vie quotidienne des domestiqu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Hachette-Littératur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78). - P. Labracherie, *la Vie quotidienne de la bohème littéraire au XIXe siècle*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67). - F. Mayeur,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es jeunes filles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Paris, 1977) ;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éducation en France,* T. III (Nouvelle Librairie de France, Paris, 1981). - A. Martin-Fugier, *la Place des bonnes, la domesticité féminine à Paris en 1900* (Grasset, Paris, 1979). - R. Moulin, *le Marché de la peinture en France* (Éd. de Minuit, Paris, 1967). - P. Ory, « Sorbonne, cathédrale de la science républicaine », dans *l'Histoire,* n° 12, mai 1979. - P. Ory et J.-F. Sirinelli, *les Intellectuels en France de l'affaire Dreyfus à nos jours*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86). - B. Plessy et L. Challet, *la Vie quotidienne des mineurs au temps de Germinal* (Hachette-Littératur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84.) - Ch. Prochasson, *les Années électriques : 1880-1910* (La Découverte, coll. « l'Aventure intellectuelle du XXᵉ siècle », Paris, 1991). - A. Prost, *Histoir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800-1967)*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8].

Idées politiques et vie intellectuelle. E. Carassus, *le Snobisme et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Paul Bourget à Marcel Proust, 1884-1914* (A. Colin, Paris, 1966). - G. Cholory et Y.-M. Hilaire,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t. II : *1880-1930* (Privat, coll. «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 Toulouse, 1986). - R. Girardet, *Le Nationalisme français 1871-1914* (A. Colin, Paris, 1966). - R. Griffiths, *Révolution à rebours, le renouveau catholique dans la France de 1871 à 1914* (Desclée de Brouwer, Paris, 1971). - G. Leroy et alii, *les Écrivains et l'affaire Dreyfus* (P.U.F., Paris, 1983). - J. Lethève, *Impressionnistes et symbolistes devant la presse* (A. Colin, Paris, 1959). - M.-B. Palmer, *Des petits journaux aux grandes agences* (Aubier-Montaigne, Paris, 1983). - R. Rémond, *l'Anticléricalisme en France. De 1815 à nos jours* (Fayard, coll. « Grandes Études contemporaines », Paris, 1986. Éditions Complexe, coll. « Historiques », Bruxelles, 1985). - Z. Sternhell, «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u racisme en France », dans *l'Histoire*, nº 17, nov. 1979 ; *Maurice Barrès et le nationalisme français* (A. Colin, Paris, 1972). - M. Ambrière (sous la dir. de), *Précis d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XIXᵉ siècle* (P.U.F., coll. « Précis », 1990).

Vie artistique. J. Combarieu et R. Dumesnil, *Histoire de la musique*, t. IV et V (A. Colin, Paris, 1958 et 1960). - P. Francastel, *Peinture et société* (Audin, Lyon, 1952). - R. Huyghe, *l'Art et l'homme*, t. III (Larousse, Paris, 1961). - J. Leymarie, *l'Impressionnisme* (Skira, Genève, 1955, 2 vol.). - D. Pistone, *la Musique en France de la Révolution à 1900* (Champion, Paris, 1979). - M. Raynal, *Peinture moderne : Matisse, Munch, Rouault* (Skira, Genève, 1953). - M. Raynal, J. Lassaigne et A. Rudlinger, *De Picasso au surréalisme* (Skira, Genève, 1950). - J. Rewald, *Histoire de l'impressionnisme* (édit. franç., A. Michel, Paris, 1955, nouv. éd. poche, 1965). - G. Sadoul, *Histoire générale du cinéma*, t. I, II, III (Denoël, Paris, 1946, 1947, 1952). - M. Sérullar, *l'Impressionnism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º 974, Paris, 9ᵉ éd., 1990). - M. Seuphor, *la Peinture abstraite, sa genèse, son expansion* (Flammarion, Paris, 1965) ; *la Sculpture de ce siècle* (Le Griffon, Neuchâtel, 1959).

27. 第一次世界大战

Histoire générale. J.J. Becker, *le Carnet B, les pouvoirs publics et l'antimilitarisme avant la guerre de 1914* (Klincksieck, Paris, 1973) ; *1914 : comment les Français sont entrés dans la guerre* (F.N.S.P., Paris, 1977) ; *les Français dans la Grande Guerre* (Robert Laffont, Paris, 1980). - Ph. Bernard, *la Fin d'un monde, 1914-1929*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XII, Paris, nouv. éd., 1975). - P. Miquel, *la Grande Guerre* (Fayard, coll. « Histoire », 1983). - P. Renouvin, *la Crise européenne e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U.F., «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 t. XIX, Paris, nouv. éd., 1969). - P. Renouvin,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º 326, Paris, 7ᵉ éd., 1987).

L'histoire proprement militaire est largement renouvelée par deux ouvrages d'ensemble : Celui de J.E. Valluy et P. Dufourcq,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Larousse, 1968, 2 vol.) ; celui de F. Gambiez et M. Suire, *Histoir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Fayard, Paris, 1968-1969, 2 vol.). Elle l'est aussi par les mises au point de H. Contamine, *la Revanche* (Berger-Levrault, Paris, 1957) ; *9 septembre 1914, la Victoire de la Marne*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º 27, Paris, 1970). À signaler la thèse de G. Pedroncini, *Pétain, général en chef, 1917-1918* (P.U.F., coll. «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 Paris, 1974). Le cadre politique est mis en place par E. Bonnefous,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IIIᵉ République*, t. II,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 (P.U.F., Paris, 1957, nouv. éd., 1967).
Les plus importants des Mémoires de chef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 sont ceux de R. Poincaré,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Plon, Paris, 1926-1928, 5 vol.), de G. Clemenceau, *Grandeurs et misères d'une victoire* (Plon, Paris, 1929), du maréchal Joffre (*Mémoires*, t. II, 1910-1917) [Plon, Paris, 2 vol.] et du maréchal Foch (*Mémoires pour servir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1914-1918*) [Plon, Paris, 2 vol., 1931].
Si les monographies concernant les opérations sont trop nombreuses pour être citées, les livres d'*histoire de la nation et de la société* sont au contraire très rares. Il faut signaler : A. Ducasse, J. Meyer et G. Perreux, *Vie et mort des Français, 1914-1918* (Hachette, Paris, 1962). - G. Perreux, *la Vie quotidienne des civils en France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66). - J. Meyer, *la Vie quotidienne des soldats pendant la guerre mondiale*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68). De nombreux témoignages de combattants ont été analysés et critiqués par J. N. Cru, *Témoins* (Les Étincelles, Paris, 1929). Un modèle d'étude minutieuse a été donné récemment par G. Pedroncini, *les Mutineries de 1917* (P.U.F., Paris, nouv. éd., 1983).

Pour l'*histoire diplomatique*, consulter J.-B. Duroselle,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e la France de 1914 à 1945* (C.D.U., Paris, 1965). - P. Renouvi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t. VII, *les Crises du XXᵉ siècle, de 1914 à 1929* (Hachette, Paris, 1957) ; *11 novembre 1918. L'armistice de Rethondes* (Gallimard, coll. « Trente Journées qui ont fait la France », nº 28, Paris, 1968) ; *le Traité de Versailles* (Flammarion, Paris, 1969) ; J. Bariéty, *Les Relations franco-allemandes aprè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10 novembre 1918-10 janvier 1925* (A. Pédone, nouv. éd., 1986).

En ce qui concerne l'*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voir l'article bibliographique de J.-B. Duroselle dan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t. XVI, janv.-mars 1969).

28. 两次大战之间

Témoignages. S. de Beauvoir, *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 (Gallimard, Paris, 1958) ; *la Force de l'âge* (Gallimard, Paris, 1960) ; *la Force des choses* (Gallimard, Paris, 1963). - L. Blum, *À l'échelle humaine* (Mermod, Lausanne, 1945). - G. Bonnet, *le Quai d'Orsay sous trois républiques* (Fayard, Paris, 1961) ; *Vingt Ans de vie politique, de Clemenceau à Daladier* (Fayard, Paris, 1969). - R. Brasillach, *Notre avant-guerre* (Plon, Paris, 1941). - A. François-Poncet, *De Versailles à Potsdam* (Flammarion, Paris, 1948). - J. Guéhenno, *Journal d'un homme de quarante ans* (Grasset, Paris, 1934). - Éd. Herriot, *Jadis*, t. II, *D'une guerre à l'autre, 1914-1936* (Flammarion, Paris, 1952). - E. Moreau, *Souvenirs d'un gouverneur de la Banque de France* (M.-T. Génin, Paris, 1954). - J. Paul-Boncour, *Entre deux guerres* ; t. II, *les Lendemains de la victoire 1919-1934* ; t. III, *Sur les chemins de la défaite 1935-1940* (Plon, Paris, 1945-1946). - P. Reynaud, *Mémoires*, t. I, *Venu de ma montagne* ; t. II, *Envers et contre tous, 1936-1940* (Flammarion, Paris, 1960-1963).

Généralités. M. Agulhon et A. Noushi, *la France de 1914 à 1940* (Nathan, coll. « Fac », Paris, 1971). - Ch. Ambrosi,

la France 1870-1981 (Masson, Paris, 1981). - J.-P. Azéma, *De Munich à la Libération 1938-1944* (Éd. du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XIV, Paris, 1979). - J.-P. Azéma et M. Winock, *Naissance et mort de la IIIe République* (Calmann-Lévy, Paris, 1970). - J.-J. Becker et S. Berstein, *Victoires et Frustrations : 1919-1929* (Seuil, Points-Histoire, 112,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XII, Paris, 1990). - F. Bédarida, J.-M. Mayeur, J.-L. Monneron et A. Prost, *Histoire du peuple français*, t. V (Nouvelle Libr. de France, Paris, 1964). - S. Berstein, *la France des années 30* (A. Colin, coll. « Cursus », 1988). - D. Borne et H. Dubief, *la Crise des années trente : 1929-1938* (Éd. du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XIII, Paris, nouv. éd., 1989). - Cl. Fohlen, *la France de l'entre-deux-guerres (1917-1939)* [Casterman, Paris, 1966]. - J. Néré,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1914-1940*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7). - Y. Trotignon,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Bordas/Mouton, coll. « Études », 2 vol., 1968 et 1976).

Économie. M. Augé-Laribé, *la Politique agricole de la France de 1880 à 1940* (P.U.F., Paris, 1950). - Ch. Bettelheim, *Bilan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1919-1946)* [P.U.F., Paris, 1946]. - J.-J. Carré, P. Dubois, F. Malinvaud,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Un essai d'analyse économique causale de l'après-guerre* (Éd. duSeuil, Paris, 1972). - B. Gazier, *la Crise de 1929*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126, 3e éd., Paris, 1989). - P. Guillaume, P. Delfaud, *les Anciens Combattants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914-1939* (Presses de la F.N.S.P., Paris, 1977, 3 vol.). - J. Néré, *la Crise de 1929* (A. Colin, coll. « U Prisme », n° 22, Paris, 5e éd., 1983) ; *les Crises économiques au XXe siècle* (A. Colin, coll. « Cursus », 1989). - M. Roncayolo (sous la dir. de), *la Ville aujourd'hui. Croissance urbaine et crise de la cité* (Le Seuil, coll. « Histoire de la France urbaine » dirigée par G. Duby, t. V, Paris, Paris, 1985).

Sociétés. G. Dupeux,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789-1970* (A. Colin, coll. « U », 6e éd., 1986). - S. Hoffmann et coll., *À la recherche de la France* (Éd. du Seuil, Paris, 1963). - R. Predal,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914-1945 à travers le cinéma* (A. Colin, coll. « U2 », Paris, 1972). - J.-F. Sirinelli,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Khâgneux et normaliens dans l'entre-deux-guerres* (Fayard, coll. «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 Paris, 1988). - P. Sorlin,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B. Arthaud, coll. « Sociétés contemporaines », Grenoble, 2 vol., 1972).

Vie politique. S. Bernstein, *Histoire du parti radical* (F.N.S.P., Paris, 1980 et 1982, 2 vol.). - Éd. Bonnefous,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t. III à VI, *De 1919 à 1940*) [P.U.F., Paris, 1960]. - F. Goguel, *la Politique des partis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Éd. du Seuil, Paris, 1946, 3e éd., 1958). - J.-N. Jeannency, *François de Wendel en République : l'argent et le pouvoir, 1914-1940* (Le Seuil, coll. « l'Univers historique », 1976) ; *Georges Mandel, l'homme qu'on attendait* (Le Seuil, coll. « XXe siècle », 1991). - A. Kriegel, *le Congrès de Tours 1920. Naissanc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Gallimard, coll. « Archives », n° 7, Paris, 1964) ; - *Aux origines du communisme français 1914-1920.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Mouton et Ce, Paris-La Haye, 1964, 2 vol., Flammarion, Paris, 1969). - G. Lefranc, *les Gauches en France 1789-1972* (Payot, coll. « le Regard de l'histoire », Paris, 1973) ; *Le Mouvement socialiste* (Payot, coll. « Petite Bibliothèque Payot », n° 307 et 308, Paris, 1977). - R. Rémond, *les Droites de 1815 à nos jours* (Aubier-Montaigne, coll. « Historique », Paris, nouv. éd., 1982). - E. Weber, *l'Action française* (Stock, Paris, 1964).

Le Front populaire. L. Bodin et J. Touchard, *Front populaire 1936* (A. Colin, Paris, 1961). - G. Dupeux, *le Front populaire et les élections de 1936* (A. Colin, Paris, 1959). - G. Lefranc, *Histoire du Front populaire (1934-1938)* [Payot, coll. « Études et Documents », Paris, 1965] ; *Juin 1936 : l'explosion sociale* (Gallimard, coll. « Archives », n° 22, 2e éd. 1970) ; *l'Expérience du Front populaire* (P.U.F., coll. « Dossiers Clio », n° 40, 1972) ; *le Front populair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209, Paris, 6e éd., 1984). - A. Prost, *la C.G.T. à l'époque du Front populaire 1934-1939* (A. Colin, Paris, 1964).

29.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

Mémoires et témoignages. M. Bloch, *l'Étrange Défaite* (Gallimard, coll. « Folio- Histoire », Paris, nouv. éd., 1990). - Cl. Bourdet, *l'Aventure incertaine* (Stock, Paris, 1975). - H. du Moulin de Labarthète, *le Temps des illusions* (le Cheval ailé, Genève, 1947). - H. Frenay, *La nuit finira* (Laffont, Paris, 1973). - Général Gamelin, *Servir* (Plon, Paris, 1947, 3 vol.). - Ch.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Plon, Paris, 1954-1959, 3 vol.). - Général Giraud, *Un seul but : la victoire. Alger 1942-1944* (Julliard, Paris, 1949). - P. Reynaud, *La France a sauvé l'Europe* (Flammarion, Paris, 1947, 2 vol.). - M. Weygand, *Mémoires. Rappelé au service* (Flammarion, Paris, 1953).

Études. H. Amouroux, *la Grande Histoire des Français sous l'Occupation* (R. Laffont, Paris, 8 vol., 1976-1987). - J.-P. Azéma, *De Munich à la Libération, 1938-1944*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XIV, Paris, 1979). - J.-J. Becker,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France depuis 1945* (A. Colin, coll. « Cursus », 1988). - J. Chapsal et A. Lancelot,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puis 1940* (P.U.F., coll. « Thémis », 5e éd., 1979). - M. et J.-F. Cointet, *la France à Londres : renaissance d'un État, 1940-1943* (Complexe, Bruxelles, 1990). - J. Defrasne, *Histoire de la collaboration*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030, Paris, 2e éd., 1987). - F.-G. Dreyfus, *Histoire de Vichy. Vérités et légendes* (Perrin, Paris, 1990).- Y. Durand, *la France dan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A. Colin, coll. « Cursus », Paris, 1989). - E. Jäckel, *la France dans l'Europe de Hitler* (Fayard, Paris, 1968). - A. Latreill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Hachette, Paris, 1966). - Cl. Lévy, *les Nouveaux Temps et l'idéologie de la collaboration* (A. Colin, Paris, 1974). - J. Marseille et D. Le Febvre, *1940 au jour le jour* (Albin Michel, Paris, 1989). - Ph. Masson (sous la dir. de), *Dictionnair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avec le concours d'A. Melchior-Bonnet (Larousse, 1979-1980, 2 vol.). - H. Michel, *Vichy, année 40* (Laffont, Paris, 1966) ; *la Drôle de guerre* (Hachette, Paris, 1972) ; *Histoire de la France libre* (Hachette, Paris, 1972) ;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en Franc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429, Paris, 10e éd., 1987) ; *le Procès de Riom* (A. Michel, Paris, 1979) ; *Pétain et le régime de Vichy*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720, 3e éd., Paris, 1986) ;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65, Paris, 7e éd., 1989). - P. Ory, *la France allemande* (Gallimard-Julliard, Paris, coll. « Archives », 1977). - O. Paxton, *la France de Vichy*, 1940-1944 (Le Seuil, Paris, 1973). - C. Richard,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La Guerre 1939-1945* (Masson, coll. « Histoire contemporaine générale (1680-1984) », Paris, 1987). - J.-P. Rioux (sous la dir. de), *la Vie culturelle sous Vichy* (P.U.F., coll. « Questions au XXe siècle », n° 18, Paris, 1990). - D. Rossignol, *Histoire de la propagande en France de 1940 à 1944. L'utopie Pétain* (P.U.F., coll. « Politique d'aujourd'hui », Paris, 1991). - A. Sauvy, *la Vie économique des Français de 1939 à 1945* (Flammarion, Paris, 1978). - R. Thalmann, *la Mise au pas. Idéologie et stratégie sécuritaire dans la France occupée* (Fayard, coll. « Pour

une histoire du xxe siècle », Paris, 1991). - O. Wormser et H. Michel, *Tragédie de la déportation, 1940-1945* (Hachette, Paris, 1954).
Voir aussi les comptes rendus de colloques : *Français et Britanniques dans la drôle de guerre* (C.N.R.S., Paris, 1979) ; *le Gouvernement de Vichy, 1940-1942* (A. Colin, Paris, 1972) ; *la Guerre en Méditerranée* (C.N.R.S., Paris, 1971) ;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C.N.R.S., Paris, 1976).
Consulter également la *Revue d'histoire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trimestrielle), qui publie, depuis octobre 1950, des travaux scientifiques et analyse tous les ouvrages importants consacrés à l'histoire de la guerre. Chacun de ses numéros comporte une bibliographie complète des livres et articles parus au cours du trimestre.

30.战后法国经济社会史

Ouvrages généraux. P. Arnaud Ameller, *Mesures économiques et financières de décembre 1958* (A. Colin, Paris, 1967) ; *la France à l'épreuve de la concurrence internationale* (A. Colin, Paris, 1970). - P. Bauchet, *la Planification française* (Éd. du Seuil, Paris, 1962). - P. Bleton, *le Capitalisme français* (Éd. ouvrières, Paris, 1966). - F. Bloch-Lainé, *À la recherche d'une économie concertée* (Éd. de l'Épargne, Paris, 1959). - D. Borne,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puis 1945* (A. Colin, coll. « Cursus », 2e éd., Paris, 1988). - P. Bourdieu et J.-C. Passeron, *les Héritiers. Les étudiants et la culture* (Éd. de Minuit, Paris, 1964). - G. Cholvy et Y.-M. Hilaire,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t. III, *1930-1988* (Privat, coll. « Bibliothèque historique », Toulouse, 1988). - P. H. Chombart de Lauwe. *Des hommes et des villes* (Payot, Paris, 1965). - M. Crouzet,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t. VII, *l'Époque contemporaine. À la recherche d'une civilisation nouvelle* (P.U.F., Paris, nouv. éd., 1969). - Darras, *le Partage des bénéfices. Expansion et inégalités en France* (Éd. de Minuit, Paris, 1966). - A. Delattre, *Politiqu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epuis 1945* (Sirey, coll. « Politiques économiques », Paris, 1966). - Cl. Delmas,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P.U.F., Paris, 1962). - J. Derogy et P. Lescaut, *Population sur mesure* (Éd. du Seuil, Paris, 1965). - P. Drouin, *l'Europe du Marché commun* (Julliard, Paris, 1963). - G. Dupeux, *la France de 1945 à 1965*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9, 4e éd., 1983). - J. Ensemble, *le Contre-Plan* (Éd. du Seuil, Paris, 1965). - P. Fabra. *Y a-t-il un Marché commun ?* (Éd. du Seuil, Paris, 1965). - J.-P. Fourastié et J.-P. Courtheoux, *la Planification économique en France* (P.U.F., coll. « l'Économiste », n° 3, Paris, 1968). - J.-F. Eck, *Histoir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puis 1945* (A. Colin, coll. « Cursus », 1988). - M. Gervais, C. Servolin et J. Weil, *Une France sans paysans* (Éd. du Seuil, Paris, 1965). - R. Girardet, *la Crise militaire française (1945-1962). Aspects sociologiques et idéologiques* (A. Colin, cahiers de la F.N.S.P., n° 123, Paris, 1964). - J. F. Gravier, *Paris et le désert français* (Flammarion, nouv. éd., Paris, 1958 et 1972) ;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et l'avenir* (Flammarion, Paris, 1964). - J. Guyard, *le Miracle français* (Éd. du Seuil, coll. « Société », n° 6, Paris, 1965). - H. Hatzfeld et J. Freyssinet, *l'Emploi en France* (Éd. ouvrières, Paris, 1964). - S. Hoffmann et coll., *À la recherche de la France* (Éd. du Seuil, Paris, 1963). - J.-M. Jeanneney, *Forces et faiblesses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1945-1956* (A. Colin, Paris, 1956). - J.-N. Jeanneney, *l'Argent caché : milieux d'affaires et pouvoirs politiques dans la France du xxe siècle* (Éd. du Seuil, Paris. 1984, Le Seuil, coll. « Points-Histoire », n° 70, Paris, 1984). - B. de Jouvenel, *Arcadie. Essai sur le mieux-vivre* (S.E.D.E.S., Paris, 1969). - A. Delattre, *la France* (Sirey, Paris, 1966). - G. Lefranc, *le Mouvement syndical, de la Libération aux événements de mai-juin 1968* (Payot, Paris, 1969). - M. Le Lannou, *le Dé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Éd. du Seuil, Paris, 1967). - J.-A. Lesourd et C. Gérard, *Histoire économique, XIXe et xxe siècle,* t. II (A. Colin, coll. « U », Paris, 9e éd., 1987). - J.-P. Maillard, *le Nouveau Marché du travail* (Éd. du Seuil, Paris, 1968). - S. Mallet. *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Éd. du Seuil, Paris, 1969). - P. Masse, *le Plan ou l'Anti-Hasard* (Gallimard, Paris, 1965). - G. Mathieu, *Peut-on loger les Français ?* (Éd. du Seuil, Paris, 1965). - M. Niveau, *Histoire des faits économiques contemporains* (P.U.F., coll. « Thémis », Paris, nouv. éd., 1984). - F. Perroux, *l'Europe sans rivages* (P.U.F., Paris, 1954) ; *la Coexistence pacifique* (P.U.F., Paris, 1958, 3 vol.) ; *le IVe Plan français (1962-1965)* [P.U.F., Paris, 1962]. - A. Philip, *Histoire des faits économiques et sociaux de 1800 à nos jours* (Aubier, Paris, 1963). - A. Prost (sous la dir. d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à nos jours* (Le Seuil, coll. «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 t. V, sous la dir. de G. Duby et de Ph. Ariès, Paris, 1987). - J.-D. Raynaud, *les Syndicats en Franc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64). - A. Sauvy,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entre les deux guerres (1918-1931)* [Fayard, Paris, 1965]. - F. Sellier, *Stratégie de la lutte sociale* (Éd. ouvrières, Paris, 1961) ; *Dynamique des besoins sociaux* (Éd. ouvrières, Paris, 1970). - A. Touraine, la *Civilisation industrielle* (Nouvelle Libraine de France, coll. « Histoire générale du travail », t. IV, Paris, 1961) ; *la Conscience ouvrière* (Éd. du Seuil, Paris, 1966) ; *Sociologie de l'action* (Éd. du Seuil, Paris, 1965) ; *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Gonthier, Paris, 1969). - M. Villain, *la Politique de l'énergie en Franc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à l'horizon 1985* (Cujas, Paris, 1969). - L.-A. Vincent, « la Mesure de la productivité à l'échelle de la nation et des branches d'activité », dans *Études et conjoncture,* août 1961.

Publications diverses. Le Phénomène urbain, n° spécial de *l'Action populaire,* n° 165, févr. 1963. - « Qu'est-ce que la classe ouvrière française ? » dans *Arguments,* n°s 12-13, 1959. - *Vues sur l'économie et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jusqu'en 1970,* Cahiers de l'I.N.E.D., n° 17, 1953. - *Des villes pour les hommes,* n° 161 d'*Économie et Humanisme,* 1965. - *L'Aménagement urbain en question,* n° 176 d'*Économie et Humanisme,* août 1967. - N° spécial d'*Esprit,* décembre 1957. - « Les Transports en France », dans *la Documentation photographique,* n° 5-223. - « La Population en France », dans *la Documentation photographique,* n° 5-262. - « Le Tourisme en France », dans *la Documentation photographique,* n° 5-271. - « Les Industries chimiques en France », dans *la Documentation photographique,* n° 5-275. - « Les Échanges extérieurs de la France », dans *la Documentation photographique,* n° 5-280. - « Prix, coûts et revenus en France de 1949 à 1968 », dans *Documents du Centre d'études des revenus et des coûts,* n° 2 (1969).

Généralités. A. Armengaud et A. Fin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167, Paris, 7e éd., 1988). - Fr. Bloch-Lainé et J. Bouvier, *La France restaurée (1944-1954). Dialogue sur les choix d'une modernisation* (Fayard, 1986). - R. Boyer, J. Mistral, *Accumulation, inflation, crises* (P.U.F., Paris, 1978). - F. Caro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XIXe-XX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2e éd., 1984) ; *le Résistible Déclin des sociétés industrielles* (Perrin, coll. « Histoire et décadence », 1985). - J.-J. Carre, P. Dubois, E. Malinvaud,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Un essai d'analyse économique causale de l'après-guerre* (Le Seuil, Paris, 1972) ; *Abrégé de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Le Seuil, Paris, 1973). - A. Gauron,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Ve République* (la Découverte-Maspero, 1983, 1 vol. paru). - P. Guillaume, P. Delfaud, *Nouvelle Histoire économique,* t. II : *le xxe sièc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9e éd., 1987). - P. Léon, *le Second Vingtième Siècle de 1947 à nos jours* (A. Colin, coll. «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 sous la dir. de P. Léon,

t. VI, 1977). - A. P. Mariano, *Métamorpho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1963-1973* (Arthaud, Paris, 1973). - A. Pratte, *les Batailles économiques du général de Gaulle* (Plon, coll. « Espoir », Paris, 1978). - M. Roncayolo (sous la dir. de), *la Ville aujourd'hui. Croissance urbaine et crise de la cité* (le Seuil, coll. « Histoire de la France urbaine », dirigée par G. Duby, t. V, Paris, 1985). - R. Sédillot, *Histoire du franc* (Sirey, Paris, 1979). - Y. Trotignon,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t. I et II (Bordas, Paris, 1968 et 1976). - G. Vincent, *les Français - 1945-1975. Chronologie et structure d'une société* (Masson, Paris, 1977). - INSEE, *Rapport sur les comptes de la nation* (Collections de l'INSEE, C. 62-63, 1977) ; *Statistiques et indicateurs des régions françaises* (Collections de l'INSEE, R. 34-35, 1979) ; *les Transports en France en 1978* (Collections de l'INSEE, C. 81, 1979) ; Tableaux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INSEE, 1984). - « Le Monde », *l'Anné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75-1979)* [Dossiers et documents]. - « Le Nouvel Observateur », *Faits et chiffres (1973-1979)*.

Système productif, industrie. M. Battiau, *les Industries textiles de la région du Nord-Pas-de-Calais* (Lille-Paris, Champion, 1976). - B. Bellon, P. Allard, M. Beaud, A.-M. Levy, S. Liénart, *Dictionnaire des groupes industriels et financiers en France* (Le Seuil, Paris, 1978). - B. Bellon, *le Pouvoir financier et l'industrie en France* (Le Seuil, Paris, 1980). - A. Cotta, *la France et l'impératif mondial* (P.U.F., Paris, 1978). - H. Delestre, J. Mairesse, *la Rentabilité des sociétés privées en France 1956-1975* (I.N.S.E.E., 1978). - J. Denizet, *la Grande Inflation (salaires, intérêt et change)* [P.U.F., coll. « l'Économiste », n° 68, 1978]. - J. Labasse et M. Laferrère, *la Région lyonnaise* (P.U.F., Paris, 1966). - G. Lafay, *Dynamique de la spécialisation internationale* (Economica, 1979). - F. Morin, *la Structure financière du capitalisme français* (Calmann-Lévy, Paris, 1974). - Ch. Stoffaes, *la Grande Menace industrielle* (Calmann-Lévy, Paris, 1978). - L. Stoléru, *l'Impératif industriel* (LeSeuil, Paris, 1969). - H. Bertrand, «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analysée en sections productives (1950-1974) » [*Statistiques et études financières*, n° 35, 1978]. - Desrosières, « le Découpage de l'industrie » (*Économie et statistiques*, n° 40, 1971). - B. Guibert et alii, *la Mutation industrielle de la France. Du traité de Rome à la crise pétrolière* (2 tomes) [Collections de l'INSEE, E. 31-32]. - INSEE, *Fresque historique du système productif* (Collections de l'INSEE, 27, 1974). - C. Leprêtre, *la Concentration des établissements industriels français en 1962 et 1972* (Collections de l'INSEE, E. 43).

Agriculture. M. Gervais, M. Jollivet et Y. Tavernier, *la Fin de la France rurale de 1914 à nos jours* (Le Seuil, coll. «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 t. IV, sous la dir. de G. Duby, 1976). - J. Klatzmann, *l'Agriculture française* (Le Seuil, Points Économie, Paris, 1978). - *Le Monde paysan (les Cahiers français*, n° 187, juill.-sept. 1978). - J.-P. Girard, M. Gombert, M. Petry, *les Agriculteurs*, t. I : *Clés pour une comparaison sociale* (Collections INSEE, 46-47, Entreprises).

Énergie. F. Bollon, *la Situation énergétique de la France. État et perspective (Économie et humanisme*, n° 250, nov.-déc. 1979). - *Problèmes économiques, la Politique énergétique française depuis 1975 (Bulletin du ministère de l'Économie et du ministère du Budget*, n° 1605, 10 janv. 1979). - P. Amouyel, *l'Avenir énergétique de la France (Projet*, n° 137, juill.-août 1979). - Lacoste, *Énergie, quelles contraintes ? (Projet*, janv. 1980).

Commerce international. Les Multinationales (les Cahiers français, n° 190, mars-avr. 1979) ; *le Commerce mondial (les Cahiers français*, n° 191, mai-juin 1979) ; *Redéploiement ou protectionnisme (les Cahiers français*, n° 192, juill.-sept. 1979).

Classes sociales. C. Baudelot, R. Establet, J. Malemort, *la Petite Bourgeoisie en France* (Maspero, Paris, 1975). - P. Bourdieu, J.-C. Passeron, *la Reproduction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système d'enseignement)* [Éd. de Minuit, coll. « le Sens commun », Paris, 1970]. - F. Braudel et E. Labrousse (sous la dir. de), *l'Ère industrielle et la société d'aujourd'hui (1880-1980)*, vol. 3 : *Année 1950 à nos jours* (P.U.F., coll. «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 t. IV, Paris, 1982). - M. Debatisse, *la Révolution silencieuse. Le combat des paysans* (Calmann-Lévy, Paris, 1963). - B. Lambert, *les Paysans dans la lutte des classes* (Le Seuil, Paris, 1970). - G. Lefranc, *le Mouvement syndical de la Libération aux événements de mai-juin 1968* (Payot, Paris, 1969) ; *les Organisations patronales en France* (Payot, Paris, 1976). - S. Mallet, *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Le Seuil, coll. « Politique », Paris, 1969). - M. Perrot, *le Mode de vie des familles bourgeoises* (Presses de la F.N.S.P., Paris, nouv. éd., 1982). - N. Poulantzas, *l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e capitalisme d'aujourd'hui* (Le Seuil, coll. « Points-politique », Paris, 1974). - J.-D. Reynaud, *les Syndicats en France* (2 tomes) [Le Seuil, coll. « Points-politique », Paris, 1975] ; *les Syndicats, les patrons et l'État* (Éd. ouvrières, Paris, 1978). - P. Sorlin,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t. II, *1914-1968* (Arthaud, coll. « Sociétés contemporaines », 1971). - INSEE, *Données sociales* (Éd. 1978). - P. Rosanvallon, A. Touraine, M. Wieviorka, E. Maire, B. Trentin, *Crise et avenir de la classe ouvrière* (« Faire », n° 49, nov. 1979).

Revenus, inégalités. Dispersion et disparités de salaires en France, au cours des vingt dernières années (Revue C.E.R.C., n°s 25 et 26, 1er et 2e trimestre 1975). - *Les Revenus des Français* (C.E.R.C., n°s 37 et 38, 3e trimestre 1977). - *Le Patrimoinedes Français, montant et répartition* (C.E.R.C., n° 49, 1979). - *Deuxième Rapport sur les revenus des Français* (C.E.R.C., n° 51, 1979).

31. 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

Ouvrages généraux. Faits, textes et statistiques sont répertoriés par *l'Année politique*, publiée depuis 1945 aux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On complétera cette documentation par deux ouvrages : F. Goguel et Alfred Grosser, *la Politique en France* (A. Colin, Paris, 1970) et J. Chapsal,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 1940 à 1958* (P.U.F., coll. « Thémis », Paris, 5e éd., 1979). L'histoire de la France de 1939 à 1969 est réinsérée dans son cadre mondial par M. Crouzet, *l'Époque contemporaine* (P.U.F., coll. «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civilisations », t. VII, 5e éd., 1969) et par les ouvrages de P. Thibault, *l'Âge des dictatures, 1918-1947* et *le Temps de la contestation, 1947-1969* (Larousse, coll. « Histoire universelle », t. XII et XIII, nouv. éd., 1974).

Les forces politiques au se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h. Ardant et O. Duhamel, *le Mendésisme* (P.U.F., Paris, 1983). - S. Bernstein, *Histoire du parti radical* (Presses de la F.N.D.S.P., Paris, 1980-1982, 2 vol. parus). - E.F. Callot, *le Mouvement républicain populaire* (Rivière, Paris, 1978). - J. Charlot, *le Gaullisme d'opposition 1946-1958. Histoire politique du gaullisme* (Fayard, Paris, 1983). - A. Chebel d'Appollonia, *Histoire politique des intellectuels en France 1944-1954*, t. I : *Des lendemains qui déchantent*, t. II : *le temps de l'engagement* (Complexe, Diffusion P.U.F., coll. « Questions au XXe siècle », n°s 31 et 32, Bruxelles-Paris, 1991). - Fr.-G. Dreyfus, *Histoire des gauches en France, 1940-1974* (Grasset, Paris, 1975). - J. Droz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générale du socialisme*, t. IV, *De 1945 à nos jours* (P.U.F., Paris, 1978). - F. Goguel et A. Grosser, *la Politique en France* (A. Colin, coll. « U », 8e éd., Paris, 1980). - F. Goguel,

Chroniques électorales (Presses de la F.N.D.S.P., t. I, 1981). - S. Hoffmann, *le Mouvement Poujade* (A. Colin, Paris, 1956). - A. Kriegel, *les Communistes français, essai d'ethnographie politique* (Éd. du Seuil, Paris, 1968). - G. Lefranc, *les Gauches en France 1789-1972* (Payot, coll. « Le Regard de l'histoire », 1973). - Cl. Nicolet, *le Radicalism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761, nouv. éd., 1983). - P. Ory, *l'Anarchisme de droite* (Grasset, Paris, 1985). - Ch. Purtschet, *le Rassemblement du peuple français* (Cujas, 1965). - R. Quilliot, *la S.F.I.O. et l'exercice du pouvoir, 1944-1958* (Fayard, Paris, 1972). - R. Rémond, *les Droites en France de 1815 à nos jours* (Aubier-Montaigne, coll. « Historique », nouv. éd., 1982). - J.-P. Rioux et J.-F. Sirinelli, *la guerre d'Algérie et l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Complexe, coll. « Questions au XXe siècle », Bruxelles, 1991). - Ph. Robrieux, *Histoire intérieure du parti communiste* (Fayard, Paris, 1980-1984, 4 vol.). - J. Touchard, *le Gaullisme, 1940-1969* (Éd. du Seuil, Paris, 1978) ; *la Gauche en France depuis 1900* (Éd. du Seuil, coll. « Points », Paris, nouv. éd., 1981). - M. Vaussard, *Histoire de la démocratie chrétienne*, (Éd. du Seuil, coll. « Esprit », Paris, 1956). - E. Weber, *l'Action française* (Stock, Paris, 1964).

Période de la guerre et de la Libération. R. Aron, *Histoire de Vichy* (Fayard, Paris, 1954) ; *Histoire de la libération de la France* (Fayard, Paris, 1959). - J. Dalloz, *la France de la Libération, 1944-1946*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108, Paris, 3e éd., 1991). - La lecture des *Mémoires de guerre* de Ch. de Gaulle (Plon, Paris, 1954-1959, 3 vol.) est également indispensable.

La IVe République. Les cinq ouvrages les plus accessibles sont ceux de J. Fauvet, *la IVe République* (Fayard, Paris, 1959), de J. Julliard, *la IVe République* (Calmann-Lévy, Paris, 1968), de J.-P. Rioux, *la IVe République 1944-1958* et *La France de la IVe république : l'expansion et l'impuissance, 1952-1958* (Seuil, Points-Histoire, n°s 115 et 116,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XV et XVI, Paris, 1980 et 1983) et de P. Courtier, *la IVe Républiqu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613, Paris, 5e éd., 1989). Autres travaux : de J. Chapsal,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 1940 à 1958* (P.U.F., coll. « Thémis », 1979). - G. Elgey, *la République des illusions* (Fayard, Paris, 1965) ; *la République des contradictions* (Fayard, Paris, 1968). - P.-M. de La Gorce, *Apologie et mort de la IVe République* (Grasset, Paris, 1979). - Philip Williams, *Politics in Post-War France* (Longmans, Londres, 1954). - M. Duverger (sous la dir. de), *Partis politiques et classes sociales en France* (A. Colin, Paris, 1955). - A. Grosser, *la IVe République et sa politique extérieure* (A. Colin, Paris, 1961). - V. Auriol, *Mon septennat* (Gallimard, Paris, 1970), témoignage précieux sur la vie politique.

La Ve République. La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a commenté le texte de la Constitution (numéro spécial, mars 1989). - Sous la dir. de F. Luchaire et de G. Conac a été entreprise l'étude de la pratique de la *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conomica, Paris, 2e éd., 1987). -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a fait de même : *la Constitution de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Presses de la F.N.D.S.P., 1985). La nature et la vie du régime ont été l'objet de nombreux travaux : P. Avril, *le Régime politique de la Ve République*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Paris, 1975). - J. Chapsal, *la Vie politique sous la Ve République* (P.U.F., coll. « Thémis », 2e éd. 1984) ; *la Vie politique sous la Ve République* (P.U.F., coll. « Thémis », t. I : *1958-1974* [Section sciences économiques] ; t. II : *1974-1987* [Section sciences politiques], Paris, 1987-1989). - C. Debbasch (et alii),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Economica, Paris, 1985). - Henry W. Ehrmann, *Politics in France* (Little Brown, Boston, 1976). - F. Furet, J. Julliard et P. Rosanvallon, *la République du centre, la fin de l'exception française* (Calmann-Lévy, 1988 ; Hachette-Pluriel, coll. « Pluriel », n° 8534, Paris, 1989). - J. Gicquel, *Essai sur la pratique de la Ve République*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Paris, 1968). - L. Hamon, *Une République présidentielle ?* (Bordas, Paris, 1977). - P.-M. de La Gorce, B. Moschetto,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763, Paris, 5e éd., 1989). - A. Lancelot, *les Élections sous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109, Paris, 2e éd., 1987). - J. Massot, *la 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rance, vingt ans d'élection au suffrage universel*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86) ; *le Chef du gouvernement en Franc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79). - S. Sur,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sous la Ve République* (Montchrestien, coll. « Université nouvelle », Précis Domat, Paris, nouv. éd., 1982). - B. Tricot et R. Hadas-Lebel, *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françaises* (Presses de la F.N.D.S.P., Paris, 1985). - J.-L. Quermonne : *le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sous la Ve République* (Dalloz, Paris, 1980).

L'histoire de la période gaullienne est retracée par S. Berstein, *La France de l'expansion : la République gaullienne, 1958-1969* (Seuil, Points-Histoire ; 117,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XVII, Paris, 1989). Sa lecture est éclairée par celle irremplaçable des œuvres de Ch.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Plon, Paris, 1970) ; *Mémoires d'espoir* (Plon, Paris, 1970, 2 vol.). Sous la dir. de G. Pilleul, *l'« Entourage » et de Gaulle* (Plon, Paris, 1979) éclaire les mécanismes de prise de décision. Les courants d'idées sont étudiés par J. Touchard, *le Gaullisme, 1940-1969* (Seuil, Paris, 1978) et par J. Charlot, *les Français et deGaulle* (Plon, Paris, 1971), les événements de mai 1968 par M. Grimaud, *En mai, fais ce qu'il te plaît* (Stock, Paris, 1977), et les thèmes de la révolte, par Épistémon, *Ces idées qui ont ébranlé la France* (Fayard, Paris, 1968). Trois auteurs analysent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du chef de l'État : M. Couve de Murville, *Une politique étrangère* (Plon, Paris, 1971), A. Grosser,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e la Ve République* (Seuil, Paris, 1965) et G. de Carmoy, *le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La Table ronde, Paris, 1973).

La pensée de G. Pompidou se révèle dans les *Entretiens et discours* (Plon, Paris, 1975, 2 vol.) et dans *le Nœud gordien* (Plon, Paris, 1974). Celle de V. Giscard d'Estaing s'est exprimée à travers son livre *Démocratie française* (Fayard, Paris, 1976). Voir également « le Giscardisme » (N° spécial de la revue *Pouvoirs*, n° 9, 1979) et l'ouvrage de S. Cohen et M.-Cl. Smouts,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e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Presses de la F.N.D.S.P., Paris, 1985). L'état récent des forces partisanes est fourni par Fr. Borella dans *les Partis politiques dans la France d'aujourd'hui* (Seuil, Paris, 1975) et par O. Duhamel : *la Gauche et la Ve République* (P.U.F., Paris, 1980).

Les thèses du parti socialiste ont été exposées dans *le Projet socialiste* (Paris, Club socialiste du livre, 1980) et celles de F. Mitterrand dans *Politique* (A. Fayard, Paris, 1977) et *Ici et maintenant* (A. Fayard, Paris, 1980). Sous la dir. de D. Chagnollaud, des universitaires analysent les résultats de leur application dans *1991 : Bilan politique de la France, les Institutions, les Partis, la Vie politique, les Débats* (Hachette, 1991).

32. 文化表述与传播

Généralités. G. Berger, *l'Homme moderne et son éducation* (P.U.F., Paris, 1967). - P. Cabanne, *le Pouvoir culturel sous la Ve République* (Orban, Paris, 1985). - B. Charbonneau, *le Paradoxe de la culture* (Denoël, Paris, 1965). - É. Gilson, *la Société de masse et sa culture* (Vrin, Paris, 1967). - M. Cointet,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1918-1959 (S.E.D.E.S.-C.D.U.,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n° 66, Paris, 2ᵉ éd., 1989). - M.-C. Gousseau, *Qu'est-ce que la culture ?* (Morin, Colombes, 1969). - C. Lévi-Strauss, *Race et histoire* (Gonthier, Paris, 1967). - M. Nicholson, *la Révolution de l'environnement* (Gallimard, Paris, 1973). - P. Ory, *l'Entre-deux- mai,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mai 1968 - mai 1981* (Le Seuil, Paris, 1983). - A. Prost, *Histoire de l'enseignement en France (1800-1967)* [A. Colin, coll. « U », Paris, 6ᵉ éd., 1986].

Théâtre. A. de Baecque, *le Théâtre d'aujourd'hui* (Seghers, Paris, 1964). - *Enciclopedia dello Spettacolo* (Le Maschere, Rome, 1954-1968, 11 vol.). - J. de Jomaron (sous la dir. de), *le Théâtre en France* (A. Colin, coll. « les Grands classiques », Paris, 1989, 2 vol.). - P.-L. Mignon, *le Théâtre contemporain* (Hachette, Paris, 1969). - E. Piscator, *le Théâtre politique* (L'Arche, Paris, 1962). - L.-C. Pronko, *le Théâtre d'avant-garde* (Denoël, Paris, 1963). - *Le Théâtre moderne*, ouvrage collectif, t. II : « Depuis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 (C.N.R.S., coll. « le Chœur des Muses », Paris, 5ᵉ éd., 1978). - J. Vilar, *De la tradition théâtrale* (L'Arche, Paris, 1955). - *Les Voies de la création théâtrale* (C.N.R.S., coll. « Arts du spectacle », Paris, 1970-1985, 13 vol. parus).

Télévision. P. Albert et A.-J. Tudesq, *Histoire de la radio-télévision,*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904, Paris, 2ᵉ éd., 1986). - T. de Galiana, *la Télévision* (Éd. du Cap, Monte-Carlo, 1966). - E. Melon-Martinez, *la Télévision dans la familleet les sociétés modernes* (Éd. sociales françaises, Paris, 1969). - P. Miquel, *Histoire de la radio et de la télévision* (Perrin, Paris, nouv. éd., 1984).

Presse. P. Albert et F. Terrou, *Histoire de la press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368, Paris, 6ᵉ éd., 1990). - Cl. Bellanger, L. Charlet, J. Godechot...,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resse française,* t. IV : *De 1940 à 1958 ;* t. V : *De 1958 à nos jours* (P.U.F., Paris, 1975 et 1976). - H. Calvet, *la Presse contemporaine* (Nathan, Paris, 1959). - R. Cayrol, *la Presse écrite et audiovisuelle* (P.U.F., coll. « Thémis », Paris, 1973). - *Le Lieu théâtral dans la société moderne* (C.N.R.S., Paris, 4ᵉ éd. 1979). - B. Voyenne, *la Presse dans la société contemporain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nouv. impr. 1966).

Cinéma. Histoire du cinéma français contemporain, 1945-1977 (Paris, 1978). - C. Clouzot, *le Cinéma français depuis la nouvelle vague* (Nathan, Paris, 1972). - J. Daniel, *Guerre et cinéma* (A. Colin, Paris, 1972). - J.-P. Jeancolas, *le Cinéma des Français, la Vᵉ République* (Stock, Paris, 1979). - A. Kyrou, *le Surréalisme au cinéma* (Le Terrain vague, Paris, 1963). - A. Labarthe, *Essai sur le jeune cinéma français* (Le Terrain vague, Paris, 1960). - J. Mitry, *Esthétique et psychologie du cinéma* (Éd. universitaires, Paris, 1963-1965, 2 vol.). - J. L. Passek, *Dictionnaire du cinéma* (Larousse, Paris, 1986). - R. Prédal,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914-1945, à travers le cinéma* (A. Colin, coll. U², n° 201, 1972). - G. Sadoul, *le Cinéma français, 1890-1962* (Flammarion, Paris, 1962) ; *Histoire du cinéma mondial,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Flammarion, Paris, nouv. éd., 1966). - J. Tulard, *Dictionnaire du cinéma* (R. Laffont, coll. « Bouquins », Paris, 2ᵉ éd., 1984, 2 vol.). - Voir aussi les *Cahiers du Cinéma,* numéros en cours et collection.

Littérature. J.-P. Bernard, *le Parti communiste et la question littéraire, 1921-1939* (P.U.G., Grenoble, 1972). - P. de Boisdeffre, *Une histoire vivante de la littérature d'aujourd'hui 1938-1964* (Le Livre contemporain, Paris, 1964) ; *le Roman français depuis 1900* (P.U.F., coll. « Que sais-je ? », Paris, 2ᵉ éd., 1985). - G. Bré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t. XVI (Arthaud, Paris, 1978). - P. Foulquié, *l'Existentialism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53, Paris, 20ᵉ éd., 1984). - R. Garaudy, *Perspectives de l'homme* (P.U.F., coll. « Bibl. Phil. cont. », Paris, nouv. éd., 1969). - G. Loiseaux, *la Littérature de la défaite et de la capitulation*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84). - E. Mounier, *Introduction aux existentialismes* (Denoël, Paris, 1947). - J.-P. Sartre, *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 (Gallimard, coll. « Folio-Essais », n° 19, Paris, nouv. éd., 1985). - P. Deshusses, *Dix Siècles d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t. II, *XIXᵉ-XXᵉ siècle* (Bordas, 1991). - R.-M. Albérès, *Métamorphoses du roman* (A. Michel, Paris, 1966). - F. Alquié, *Philosophie du surréalisme* (Flammarion, Paris, 1955). - Y. Duplessis, *le Surréalism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432, Paris, 13ᵉ éd., 1987). - M. Nadaud, *le Roman français depuis la guerre* (Gallimard, Paris, 1963). - Y. Olivier-Martin, *Histoire du roman populaire en France 1840-1978* (A. Michel, Paris, 1980). - M. Raimond, *le Roman français contemporain,* t. I, *le Signe des temps* (C.D.U. et S.E.D.E.S., 1976) ; *les Romans de Montherlant* (C.D.U.-S.E.D.E.S., 1982). - A. Robbe-Grillet, *Pour un nouveau roman* (Éd. de Minuit, Paris, 1964). - N. Sarraute, *l'Ère du soupçon* (Gallimard, Paris, 1956). - P. Claudel, *Réflexions sur la poésie* (Gallimard, Paris, 1963). - P. Eluard, *les Sentiers et les routes de la poésie* (Gallimard, Paris, 1954). - G. Mounin, *Poésie et société* (P.U.F., Paris, 1962). - P. Seghers, *la Résistance et ses poètes* (Seghers, Paris, 1974). - M. Merleau-Ponty, *Éloge de la philosophie* (Gallimard, Paris, 1965). - G. Picon, *Panorama de la nouvelle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Gallimard, Paris, nouv. éd., 1960). - R. Verneaux,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moderne* (Beauchesne, Paris, 1957).

Arts plastiques. L'Art de notre temps depuis 1945 (Éd. de la Connaissance, Bruxelles, 1969). - R. Charmet, *Dictionnaire de l'art contemporain* (Larousse, Paris, 1965). - *Dictionnaire de la peinture française* (Larousse, coll. « Essentiels », 1989). - H. Koepf, *la Sculpture en Europe* (Hachette, Paris, 1964). - M. Laclotte, *Petit Larousse de la peinture* (Larousse, Paris, 1979, 2 vol). - J. Marchiori, *la Sculpture moderne en France* (Bibliothèque des arts, 1963). -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la sculpture moderne* (Hazan, Paris, 1970). - H. Perruchot, *la Peinture* (Hachette, Paris, 1965). - V. Scully Jr., *l'Architecture moderne* (Éd. des Deux-Mondes, Paris, 1963). - Y. Taillandier, *Naissance de la peinture moderne* (Les Libraires associés, Paris, 1963). - P. Walberg, *les Demeures d'Hypnos* (Éd. de la Différence, Paris, 1976).

Musique et ballet. J. Attali, *Bruits. Essai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musique* (P.U.F., Paris, nouv. éd., 1981). - H. Barraud, *Pour comprendre les musiques d'aujourd'hui* (Éd. du Seuil, Paris, 1968). - P. Boulez, *Penser la musique aujourd'hui* (Gallimard, coll. « Tel », n° 124, 1987). - R. de Candé, *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musique,* tome II (Éd. du Seuil, Paris, 1978). - A. de Mille, *l'Âme de la danse* (Flammarion, Paris, 1964). - *Dictionnaire de la musique : Les hommes et leurs œuvres,* 2 vol. ; *Science de la musique : technique, formes, instruments,* 2 vol. (Bordas, Paris, 1976). - *Dictionnaire du ballet moderne* (Hazan, Paris, 1957). - Sous la direction de N. Dufourcq, *la Musique, les hommes, les instruments, les œuvres* (Larousse, Paris, 1964-1965, 2 vol.). - W. Furtwängler, *Musique et Verbe* (A. Michel, Paris, 1963). - G. Hacquard, *la Musique et le cinéma* (P.U.F., Paris, 1959). - Cl. Samuel, *Panorama de l'art musical contemporain* (Gallimard, Paris, 1962). - P. Schaeffer, *Traité des objets musicaux* (Éd. du Seuil, coll. « Pierres vives », Paris, 1966). - M. Scriabine, *Introduction au langage musical* (Éd. de Minuit, Paris, 1961). Sous la direction de M. Vignal, *Dictionnaire de la musique française* (Larousse, Paris, 1988).

Sciences et technologie. J. Bureau, *l'Ère logique* (Laffont, Paris, 1959). - L. Couffignal, *la Cybernétique* (P.U.F., coll. « Que sais-je », n° 638, Paris, 5ᵉ éd., 1978). - A. Danjon, *Astronomie générale* (Sennac, Paris, 1962). - M. Daumas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chniques*, t. IV et V : *les Techniques de la civilisation industrielle* (P.U.F., Paris, 1979). - L. Leprince-Ringuet et J. Rigal (sous la dir. de), *la Science contemporaine* (Larousse, Paris, 1964, 2 vol.). - J. Sarano, *Hommes et sciences de l'homme* (Éd. de l'Épi, Paris, 1968). - R. Taton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 t. III, vol. 2, *la Science contemporaine, le vingtième siècle* (P.U.F., Paris, 2e éd., 1983).

近期的著作

Histoire générale. J. Barbey, *Être roi. Le roi et son gouvernement en France de Clovis à Louis XVI* (Fayard, Paris, 1992). - H.-M. Bercé et Ph. Contamine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 France, historiens de Franc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Reims, 14 et 15 mai 1993 (Librairie Honoré-Champion,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no 510, 1994). - H. Bonin, *la Banque et les banquiers en France du Moyen Âge à nos jours* (Larousse, Paris, 1992). - Th. Charmasson, A.-M. Lelorrain, M. Sonnet, *Chronologie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U.F., Paris, coll. « Premier Cycle », 1994). - A. Corvisier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France* (P.U.F., Paris, 1992-1994, 4 vol.). - J. Le Goff et P. Rémond, *Histoire de la France religieuse* (Le Seuil, Paris, 1988-1992, 4 vol.). - A. Lombard-Jourdan, *la Plaine Saint-Denis, deux mille ans d'histoire* (C.N.R.S., Paris, 1994). - J. Meyer et M. Acerra, *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Ouest-France, Rennes, 1994). - P. Nora (sous la dir. de), *les Lieux de mémoire*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 Paris, 1993). - M. Vergé-Franceschi (sous la dir. de), *Guerre et commerce en Méditerranée, IXe-XXe siècle* (Veyrier, Paris, 1991).

Histoire ancienne. J.-L. Brunaux et B. Lambot, *Guerre et armement chez les Gaulois, 450-52 av. J.-C.* (Errance, Paris, 1988). - P.-M. Duval, *De Lutèce oppidum à Paris capitale de la France* (Hachette diffusion,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 1993). - F. Favory et J.-L. Fiches (sous la dir. de), *les Campagnes de la France méditerranéenne dans l'Antiquité et le haut Moyen Âge : études microrégionales* (coll. « Documents d'archéologie française »,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Paris, 1994). - A. Ferdière, *les Campagnes en Gaule romaine, 52 av. J.-C. – 486 ap. J.-C.* (Errance, 1988, 2 vol.). - St. Fichtl, *les Gaulois du Nord de la Gaule, 150 – 20 av. J.-C.* (Errance, Paris, 1995). - Ch. Goudineau, *César et la guerre* (Errance, Paris, 1990). - Ch. Goudineau et Y. de Kisch, *Vaison-la-Romaine* (Errance, Paris, 1991). - Jules César, *Guerre des Gaules*, présentation par Ch. Goudineau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4). - C. Jullian, *Histoire de la Gaule* (Hachette, réédition intégrale, Paris, 1993). - Y. Le Bohec (sous la dir. de), *Militaires romains en Gaule civile* (Centre d'études romaines et gallo-romaines de l'université de Lyon-III, Lyon, 1993). - A. Pelletier, *la Civilisation gallo-romaine de A à Z*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1993).

Le Moyen Âge. M. Aurel, *les Noces du comte. Mariage et pouvoir en Catalogne, 785-1213* (Presse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95). - F. Autrand, *Charles V le Sage* (Fayard, Paris, 1994). - D. Barthélemy, *la Société dans le comté de Vendôme de l'an Mil au XIVe siècle* (Fayard, Paris, 1993). - C. Bozzolo et E. Ornato (études réunies par), *Préludes à la Renaissance. Aspects de la vie intellectuelle en France au XVe siècle* (C.N.R.S., Paris, 1992). - G. Brunel et E. Lalou (sous la dir. de), *Sourc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IXe-milieu du XIVe siècle* (Larousse, coll. « Textes essentiels », Paris, 1992). - J.-P. Brunterc'h, *Archives de la France*, t. I, *Ve-XIe siècle*,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Fayard, Paris, 1994). - L. Buchet (sous la dir. de), *la Femme pendant le Moyen Âge et l'Époque moderne* (C.N.R.S., Paris, 1994). - M. Bur, *Suger, abbé de Saint-Denis, régent de France* (Perrin, Paris, 1991). - M.-Th. Caron, *Noblesse et pouvoir royal en France (XIIIe-XVIe siècle). De Saint Louis à François Ier* (A. Colin, Paris, 1994). - Ph. Contamine, M. Bompaire, St. Lebecq et J.-L. Sarrazin, *l'Économie médiéva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93). - Ph. Contamine et Ch. Giry de Loison, *Guerre et société en France, en Angleterre et en Bourgogne, XIVe-XVe sièc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III, 1991). - Ph. Contamine, *Des pouvoirs en France, 1300-1500* (Publications de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Paris, 1992). - Ph. Contamine (présentation par), *Mémoires de Philippe de Commynes*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4). - J. Day, *Monnaies et marchés au Moyen Âge* (Imprimerie nationale, « Comité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 Paris, 1995). - B. Delmaire, *le Diocèse d'Arras de 1093 au milieu du XIVe siècle. Recherches sur la vie religieuse dans le Nord de la France au Moyen Âge* (Arras, commission départementale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du Pas-de-Calais, 1995). - J. Favier, *Dictionnaire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Fayard, Paris, 1993). - J. Flori, *la Chevalerie en France au Moyen Âg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o 972, Paris, 1995). - R. Fossier, *la Société médiéva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re éd., 1991). - R. Fossier, *l'Occident médiéval du Ve au XIIIe siècle* (Hachette, Paris, 1995). - F. Gasparri (sous la dir. de), *le XIIe siècle : mutations et renouveau en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Ie siècle* (Le Léopard d'Or, Paris, 1994). - Cl. Gauvard, *« De grâce especial », Crime, État et société en Franc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91). - P.-J. Geary, *le Vol des reliques au Moyen Âge* (Aubier, Paris, 1993). - N. Gonthier, *Délinquance, justice et société dans le Lyonnais médiéval de la fin du XIIIe siècle au début du XVIe siècle* (Arguments, Paris, 1993). - B. Guenée (préface de),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ys contenant le règne de Charles VI de 1380 à 1422* (C.T.H.S., Paris, 1994). - B. Guenée, *Un meurtre, une société. L'assassinat du duc d'Orléans, 23 novembre 1407* (NRF, 1992). - O. Guillot, A. Rivaudière, Y. Sassier, *Pouvoirs et institutions dans la France médiévale*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re éd., 1994, 2 vol.). - P. Guiral, *Clemenceau en son temps* (Grasset, Paris, 1994). - O. Guyot-Jeannin, *le Moyen Âge, Ve-XVe siècle* (Fayard, coll. « Archives de l'Occident », t. 1, sous la dir. de J. Favier, 1992). - P.-M. Gy, *Guillaume Durand, évêque de Mende (v. 1230-1296)* (C.N.R.S., Paris, 1992). - J. Heers, *Gilles de Rais* (Perrin, coll. « Vérités et légendes », Paris, 1994). - Ch. Higounet, *Défrichements et villeneuves du Bassin parisien, XIe-XIVe siècle* (C.N.R.S., Paris, 1991). - G. Jéhel, *la Méditerranée médiévale de 350 à 1450* (A. Colin, coll. « Cursus », Paris, 1992). - R.W. Kaeuper, *Guerre, justice et ordre public. La France et l'Angleterr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Aubier, coll. « Historique », éd. franç., Paris, 1994). - J. Krynen, *l'Emprise du roi. Idées et croyances politiques en France, XIIIe-XVe siècle* (Gallimard, Paris, 1993). - J. Krynen et A. Rigaudière, *Droits savants et pratiques françaises du pouvoir, XIe-XVe sièc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 1992). - M. Laharie, *la Folie au Moyen Âge, XIe-XIIIe siècle* (Le Léopard d'Or, Paris, 1991). - R. Locatelli, *Sur les chemins de la perfection. Moines et chanoines dans le diocèse de Besançon vers 1060-1220*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de Saint-Étienne, 1992). - A. Lombard-Jourdan, *Fleur de lis et oriflamme : signes célestes du royaume de France* (C.N.R.S., Paris, 1991). - B. Merdrignac, *la Vie religieuse en France au Moyen Âge* (Ophrys, Gap, 1995). - R. Musso-Goulard, *la Naissance de la France* (Perrin, Paris, 1995). - M. Pacaut, *les Moines blancs. Histoire de l'ordre de Cîteaux* (Fayard, Paris, 1993). - M. Parisse (études réunies par), *À propos des actes d'évêques. Hommage à Lucie Fossier*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1991). - M. Parisse (sous la dir. de), *Veuves et veuvages dans le haut Moyen Âge* (Picard, Paris, 1993). - R. Pernoud, *Christine de Pisan* (Calmann-Lévy, Paris, 1995). - J.-Ch. Picard (sous la dir. de), *les*

Chanoines dans la ville. Recherches sur la topographie des quartiers canoniaux en France (De Boccard, Paris, 1994). - A. Plaisse, *À travers le Cotentin : la grande chevauchée guerrière d'Édouard III en 1346* (Isoète, Cherbourg, 1995). - L. Pressouyre (sous la dir. de), *Pèlerinages et croisades*. Colloque de Pau, 1993 (C.T.H.S., Paris, 1995). - B. Prévot, B. Ribemont, *le Cheval en France au Moyen Âge* (Paradigme, coll. « Medievalia », Caen, 1994). - Ch. Prigent, *Pouvoir ducal, religion et production artistique en Basse-Bretagne 1350-1575* (Maisonneuve-et-Larose, Paris, 1992). - Ch. Raynaud, *Mythes, cultures et sociétés (XIIIe-XVe siècle). Images de l'Antiquité et iconographie politique* (Le Léopard d'Or, Paris, 1995). - A. Renoux, *Fécamp. Du palais ducal au palais de Dieu. Bilan historique et archéologique des recherches menées sur le site du château des ducs de Normandie* (C.N.R.S., Paris, 1991). - P. Riché, *les Carolingiens, une famille qui fit l'Europe* (Hachette, coll. « Pluriel », nouv. éd., Paris, 1992). - P. Riché (sous la dir. de), *la Christianisation des pays entre Loire et Rhin, IVe-VIIe siècle* (Éd. du Cerf, Paris, 1993). - P. Riché et D. Alexandre-Bidon, *l'Enfance au Moyen Âge* (Le Seuil, coll. « Bibliothèque de France », Paris, 1994). - A. Rigaudière, *Gouverner la ville au Moyen Âge* (Anthropos, Paris, 1993). - S. Roux, *le Monde des villes au Moyen Âge, XIe-XVe siècle* (Hachette Supérieur, coll. « Carré Histoire », Paris, 1994). - Y. Sassier, *Louis VII* (Fayard, Paris, 1991). - A. Saunier, *« Le pauvre malade » dans le cadre hospitalier médiéval : France du Nord, vers 1300-1500* (Arguments, Paris, 1993). - P. Sicard, *Hugues de Saint-Victor et son École* (Brépols, Paris, 1991). - G. Sivéry, *Philippe Auguste* (Plon, Paris, 1993). - G. Sivéry, *Louis VIII le Lion* (Fayard, Paris, 1995). - M. Sot, *Un historien et son Église. Flodoard de Reims* (Fayard, Paris, 1993). - Suger, *la Geste de Louis VI*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4). - A. Terroing, *Un bourgeois parisien du XIIIe siècle. Geoffroy de Saint-Laurent (1245 ?-1290)*, édité par L. Fossier (C.N.R.S., Paris, 1992). - C. Vincent, *les Confréries médiévales dans le royaume de France, XIIIe-XVe siècle* (A. Michel, Paris, 1994). - C. Vincent,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Le livre de poche, Paris, 1995). - A. Saint-Denis, *Institutions hospitalières et société aux XIIe et XIIIe siècles. L'Hôtel-Dieu de Laon, 1150-1300*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1982). - A. Saint-Denis, *le Siècle de Saint-Deni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1481, Paris, 1re éd., 1994). - A. Saint-Denis, *Apogée d'une cité : Laon et son pays aux XIIe et XIIIe sièc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1994).

Histoire moderne. A.-L. Angoulvent, *l'Esprit baroqu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3000, Paris, 1994). - I. Aristide, *la Fortune de Sully* (Comité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0). - M. Balard, J.-Cl. Hervé, N. Lemaître (présentation par), *Paris et ses campagnes sous l'Ancien Régime*. Mélanges offerts à Jean Jacquart (Presse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94). - F. Bayard, P. Guignet,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x XV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Ophrys, Gap, 1991). - L. Bély, *la France moderne, 1498-1789* (P.U.F., coll. « Premier Cycle », Paris, 1994). - Y.-M. Bercé, *la Naissance dramatique de l'absolutisme, 1598-1661*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moderne », t. III, n° H 209, Paris, 1992). - J. Bérenger et J. Meyer, *la France dans le monde au XVIIIe siècle* (SEDES,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n° 84, Paris, 1993). - J. Bergin, *l'Ascension de Richelieu* (Payot, Paris, 1994). - F. Bluche et J.-F. Solnon, *la Véritable Hiérarchie sociale de l'ancienne France. Le tarif de la première capitation, 1695* (Droz, Genève, nouv. éd., 1995). - J.-L. Bourgeon, *l'Assassinat de Coligny* (Droz, Genève, 1992). - R. Bourgerie, *Magenta et Solférino (1859). Napoléon III et le rêve italien* (Économica, Paris, 1993). - L. Bourquin, *Noblesse seconde et pouvoir en Champagn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94). - E. Brian, *la Mesure de l'État. Administrateurs et géomètres au XVIIIe siècle* (A. Michel, Paris, 1994). - P. Burke, *Louis XIV. Les stratégies de la gloire* (Le Seuil, Paris, 1995). - P. Butel,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SEDES,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n° 87, Paris, 1993). - A. Cabantous, *Dix Mille Marins face à l'océan. Les populations maritimes de Dunkerque au Havr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660-1794* (Publisud, Lagny-sur-Marne, 1991). - A. Cabantous, *les Citoyens du large. Les identités maritimes en France, XVIIe-XIXe siècle* (Aubier, Paris, 1995). - R. Chartier, *Malesherbes, mémoires sur la librairie, mémoire s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4). - S. Charton-Le Clech, *Chancellerie et culture au XVIe siècle. Les notaires et secrétaires du roi de 1515 à 1547*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 coll. « Histoire notariale », Toulouse, 1993). - L. Châtelier, *Catholicisme et Contre-Réforme (début du XVIe-milieu du XVIIe siècle)*, t. I, *le XVIe siècle* (SEDES,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Paris, 1995). - P. Chaunu, *la Civilisation de l'Europe des Lumières* (Arthaud, Paris, nouv. éd., 1993). - G. Chaussinand-Nogaret, *le Citoyen des Lumières* (Éditions Complexe, coll. « Historiques », n° 91, Bruxelles, 1994). - G. Chaussinand-Nogaret, *Voltaire et le siècle des Lumières* (Éditions Complexe, Bruxelles, 1994). - O. Christin, *les Réformes. Luther, Calvin et les protestants* (Gallimard, coll. « Découvertes », Paris, 1995). - G. Collard, *Voltaire, l'affaire Calas et nous*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94). - J.-M. Constan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x XV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Ophrys, Gap, 1994). - J. Cornette, *le Roi de guerre. Essai sur la souveraineté dans la France du Grand Siècle* (Payot, Paris, 1993). - J. Cornette, *le XVIe siècle. Chronique de la France moderne* (SEDES,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Paris, 1995). - J. Cornette, *l'Affirmation de l'État absolu, 1515-1652* (Hachette Supérieur, coll. « Carré Histoire », Paris, 1993). - J. Cornette, *Absolutisme et Lumières 1652-1783* (Hachette Supérieur, coll. « Carré Histoire », Paris, 1993). - B. Cottret,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aux XV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Ophrys, Gap, 1991). - B. Cottret (présentation par), *Jacques Fontaine. Mémoires d'une famille huguenote, victime de la révocation de l'édit de Nantes* (Chaleil, Montpellier, 1993). - L. Crété, *les Camisards* (Perrin, Paris, 1992). - D. Crouzet (présentation par), *la Vie de Bayard par Champier*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3). - D. Crouzet, *la Nuit de la Saint-Barthélemy. Un rêve perdu de la Renaissance* (Fayard, Paris, 1994). - J. Cubero, *l'Affaire Calas. Voltaire contre Toulouse* (Perrin, Paris, 1993). - G. Daridan, *MM. Le Coulteux et Cie, banquiers à Paris. Un clan familial dans la crise du XVIIIe siècle* (Loysel, Paris, 1994). - Ch. Delmas, *la Tragédie de l'âge classique, 1553-1770* (Le Seuil, Paris, 1994). - R. Darnton, *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Odile Jacob, Paris, 1992). - P. Delsalle, *la France industrielle aux XV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Ophrys, coll. « Synthèse et histoire », Gap, 1993). - P. Delsalle, *le Cadre de vie en France aux XVIe, XVIIe, XVIIIe siècles* (Ophrys, Gap, 1995). - J. Delumeau, *le Temps des supplices : de l'obéissance sous les rois absolus, XVe-XVIIIe siècle* (A. Colin, coll. « Références », Paris, 1992). - J. Delumeau (sous la dir. de), *Jurieu, l'accomplissement des prophèties*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4). - G. Deregnaucourt et D. Poton, *la Vie religieuse en France aux XVIe,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Ophrys, Gap, 1994). - J. Ducoin, *Naufrages, conditions de navigation et assurances dans la marine de commerce du XVIIIe siècle. Le cas de Nantes et de son commerce colonial avec les îles d'Amérique* (Librairie de l'Inde, Paris, 1993). - J.-M. Duhamel, *la Musique dans la ville, de Lully à Rameau*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1994). - Cl. Dulong, *Marie Mancini. La première passion de Louis XIV* (Perrin, Paris, 1993). - Y. Durand,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Institutions et société* (SEDES,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n° 85, Paris, 1992). - F.-X. Emmanuelli, *État et pouvoirs dans*

la France des XVI-XVIII siècles. La métamorphose inachevée (Nathan, Paris, 1992). - A. Farge, *Vivre dans les rues de Paris au XVIII siècle* (Gallimard, coll. « Folio-Histoire », Paris, 1992). - A. Farge, *la Vie fragile, violence, pouvoirs et solidarités à Paris au XVIII siècle* (Le Seuil, coll. « Points-Histoire », Paris, 1992). - A. Farge, *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 siècle* (Le Seuil, coll. « La Librairie du XX siècle », Paris, 1992). - A. Félibien, *les Fêtes de Versailles. Chroniques de 1668-1674* (Dédale/Maisonneuve-et-Larose, Paris, 1994). - M. Fogel, *l'État dans la France moderne de la fin du XV au milieu du XVIII siècle* (Hachette, coll. « Carré Histoire », sous la dir. de R. Muchembled, 1992). - M. Foisil,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II* (Hachette, coll. « La Vie quotidienne », Paris, 1992). - B. Carnot et D. Poton,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au XVIII siècle. Sociétés et pouvoirs, 1715-1788* (Ophrys, Gap, 1992). - J. Garrisson, *Royaume, Renaissance et Réforme, 1483-1559*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moderne », t. I, n° H 207, Paris, 1991). - J. Garrisson, *Guerre civile et compromis, 1559-1598*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moderne », t. II ; n° H 208, Paris, 1991). - J. Garrisson, *Marguerite de Valois* (Fayard, Paris, 1994). - J. Gaston, *la Communauté des notaires de Bordeaux, 1520-1791*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 Toulouse, 1992). - J.-P. Gutton (sous la dir. de), *l'Intendance du Lyonnais, Beaujolais, Forez en 1698 et en 1762. Édition critique du mémoire rédigé par Lambert d'Herbigny* (C.T.H.S., Paris, 1992). - M. Hamon et D. Perrin, *Au cœur du XVIII siècle industriel. Condition ouvrière et tradition villageoise à Saint-Gobain* (Éd. PAU, Paris, 1993). - Ph. Hamon, *l'Argent du Roi. Les finances sous François I* (Ministère des Finances, Paris, 1994). - Ph. Haudrère, *La Bourdonnais, marin et aventurier* (Desjonquères, Paris, 1992). - D.Hickey, *le Dauphiné devant la monarchie absolue. Le procès des tailles et la perte des libertés provinciales, 1540-1640*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Grenoble, 1993). - F. Hildesheimer, *le Jansénisme en France aux XVII et XVIII siècles* (Publisud, Paris, 1992). - F. Hildesheimer (édité par), *Testament politique de Richelieu* (Honoré Champion,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n° 511, Paris, 1995). - J. Imbert, *le Droit hospitalier sous l'Ancien Régime* (P.U.F., Paris, 1993). - R. Kleinman, *Anne d'Autriche* (Fayard, Paris, 1993). - A. Kraatz, *la Compagnie française de Russie. 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co-russe aux XVII et XVIII siècles* (F. Bourin, Paris, 1993). - M. Lachiver, *les Années de misère. La famine au temps du grand Roi, 1680-1720* (Fayard, Paris, 1991). - J. Lecler, *Histoire de la tolérance au siècle de la Réforme* (A. Michel, Paris, nouv. éd., 1994). - M. Le Moël, *la Grande Mademoiselle* (Éditions de Fallois, Paris, 1994). - E. Le Roy Ladurie, *l'Ancien Régime, 1610-1770* (Hachette, coll. « Histoire de France », t. III, Paris, 1991). - E. Le Roy Ladurie (présentation par), *la Dîme royale du maréchal Vauban*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2). - G. Lesage, *Denain, 1712, Louis XIV sauve sa mise* (Economica, Paris, 1992). - M.-F. Limon, *les Notaires au Châtelet de Paris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V*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 Toulouse, 1992). - G. Livet, *l'Intendance d'Alsace du Saint Empire romain germanique au royaume de France, de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à la mort de Louis XIV, 1634-1715*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trasbourg, 1991, 2 vol.). - Ph. Loupès, *la Vie religieuse en France au XVIII siècle* (SEDES,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n° 89, Paris, 1993). - B. Lugan, *Histoire de la Louisiane française, 1682-1804* (Perrin, Paris, 1994). - Abd. Ly, *la Compagnie du Sénégal* (Karthala, Paris, nouv. éd., 1993). - Ph. Masson et M. Verge-Franceschi (sous la dir. de), *la France et la mer au siècle des grandes découvertes, XVI siècle* (Tallandier, Paris, 1993). - H. Merlin, *Public et littérature en France au XVII siècle* (Les Belles Lettres, Paris, 1994). - J. Meyer, *Béveziers, 1690. La France prend la maîtrise de la Manche* (Economica, Paris, 1993). - J. Meyer, *La Chalotais. Affaires de femmes et affaires d'État sous l'Ancien Régime* (Perrin, Paris, 1995). - Cl. Michaud, *l'Église et l'argent sous l'Ancien Régime. Les receveurs généraux du clergé de France aux XVI-XVII siècles* (Fayard, Paris, 1991). - G. Minois, *Censure et culture sous l'Ancien Régime* (Fayard, Paris, 1995). - J.-M. Moriceau, *les Fermiers de l'Île-de-France, XV-XVIII siècle* (Fayard, Paris, 1994). - J.-M. Moriceau et G. Postel-Vinay, *Ferme, entreprise, famille. Grande exploitation et changements agricoles, XVII-XIX siècles* (Éd. de l'E.H.E.S.S., Paris, 1992). - R. Mousnier, *l'Homme rouge ou la vie du 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1642* (Laffont, coll. « Bouquins », Paris, 1992). - R. Muchembled, *le Temps des supplices. De l'obéissance sous les rois absolus, XV-XVII siècles* (A. Colin, coll. « Références », Paris, 1992). - R. Muchembled, *le Roi et la sorcière. L'Europe des bûchers, XV-XVIII siècles* (Desclée de Brouwer, Paris, 1993). - R. Muchembled, *Magie et sorcellerie en Europe du Moyen Âge à nos jours* (A. Colin, Paris, 1994). - R. Muchembled, *Cultures et société en France du début du XVI au milieu du XVII siècle* (SEDES,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Paris, 1995). - R. Muchembled, *Société et mentalités dans la France moderne, XVI-XVII siècle* (A. Colin, coll. « Cursus », Paris, 1990). - A. Muhlstein, *Cavelier de La Salle, l'homme qui offrit l'Amérique à Louis XIV* (Grasset, Paris, 1992). - B. Neveu, *Érudition et religion aux XVII et XVIII siècles* (A. Michel, Paris, 1994). - M. Pernot, *la Fronde* (Éditions de Fallois, Paris, 1994). - J.-Cl. Perrot, *Un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XVII-XVIII siècles* (Éd. de l'E.H.E.S.S., coll. «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 n° 85, Paris, 1992). - J. Peter, *Vauban et Toulon. Histoire de la construction d'un port-arsenal sous Louis XIV* (Economica, Paris, 1994). - J. Peter, *les Artilleurs de la marine sous Louis XIV* (Economica, Paris, 1995). - J.-Ch. Petitfils, *Louis XIV* (Perrin, Paris, 1995). - P. Pluchon,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t. I : le Premier Empire colonial. Des origines à la Restauration* (Fayard, Paris, 1994). - A. Poitrineau, *Ils travaillaient la France. Métiers et mentalités du XVI au XIX siècle* (A. Colin, coll. « Références », Paris, 1993). - O. Ranum, *la Fronde* (Le Seuil, Paris, 1995). - M.-E. Richard, *la Vie des protestants français de l'édit de Nantes à la Révolution, 1598-1789* (Éd. de Paris, Paris, 1995). - D. Richet, *De la Réforme à la Révolution. Études sur la France moderne* (Aubier, Paris, 1991). - D. Roche,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Fayard, Paris, 1993). - M. Simonin, *Charles IX* (Fayard, Paris, 1995). - J.-F. Solnon, *les Ormesson au plaisir de l'État* (Fayard, Paris, 1992). - J.-F. Solnon (sous la dir. de), *Sources d'histoire de la France moderne, XVI – XVII -XVIII siècles* (Larousse, « coll. Textes essentiels », Paris, 1994). - R. Taveneaux, *Jansénisme et Réforme catholiqu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1992). - M. Touzery, *Atlas de la généralité de Paris au XVIII siècle. Un paysage retrouvé*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5). - D. Troyanky, *Miroirs de la vieillesse : en Franc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Eshel, Paris, 1992). - D. Van Der Cruysse, *l'Abbé de Choisy, androgyne et mandarin* (Fayard, Paris, 1995). - M. Vénard, *Réforme protestante, réforme catholique dans la province d'Avignon, XVI siècle* (Éd. du Cerf, Paris, 1993). - M. Vergé-Franceschi, *Marine et éducation sous l'Ancien Régime* (C.N.R.S., 1991). - M. Vergé-Franceschi, *Abraham Duquesne. Huguenot et marin du Roi-Soleil* (France-Empire, Paris, 1992). - M. Vigié, *Dupleix* (Fayard, Paris, 1993). - J. de Viguerie, *Histoire et dictionnaire du temps des Lumières, 1715-1789* (R. Laffont, coll. « Bouquins », Paris, 1995). - R. Vincent, *Pondichéry (1674-1761). L'échec d'un rêve d'empire* (Autrement, Paris, 1993). - T. Wanegffelen,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 XVI – milieu du XVII siècle, la vie religieuse* (Ophrys, Gap, 1994). - J. Villain, *la Fortune de Colbert* (Comité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4). - D. Woronoff, *Histoire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du XVIe siècle à nos jours* (Le Seuil, Paris, 1994). - A. Zysberg, *la Puissance et la guerre, 1661-1715*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moderne », t. IV, n° H 210, Paris, 1994). - A. Zysberg, *l'État et les Lumières, 1715-1783* (Le Seuil,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moderne », t. V, n° H 211, Paris, 1995).

Histoire contemporaine. Ch.-R. Ageron, *la Décolonisation française* (A. Colin, coll. « Cursus », Paris, 1991). - Ch.-R. Ageron, M. Michel, *l'Afrique noire française : l'heure des indépendances* (C.N.R.S., Paris, 1992). - M. Agulhon (sous la dir. de), *Cultures et folklores républicains*. Colloque de Toulouse, 1992 (C.T.H.S., Paris, 1995). - A. Anderson, *Politiques de la ville* (Syros, Paris, 1998). - F. Arnault, Frédéric Le Play, *De la métallurgie à la science socia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1993). - J. Attali, *Pour un modèle européen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Stock, Paris, 1998). - J.-P. Azéma et F. Bédarida (sous la dir. de), *le Régime de Vichy et les Français* (Fayard, coll. « Pour une histoire du XXe siècle », Paris, 1992). - J.-P. Azéma et F. Bédarida, *la France des années noires* (Le Seuil, Paris, 1993, 2 vol.). - J.-P. Azéma et O. Wieviorka, *les Libérations de la France* (Éd. de la Martinière, Paris, 1993). - É. Balladur, *Deux ans à Matignon* (Plon, Paris, 1995). - C. Barbier, *les Derniers Jours de Mitterrand* (Grasset, Paris, 1998). - M.-O. Baruch, *Servir l'État français* (Fayard, Paris, 1997). - N. Baverez, *les Trente Piteuses* (Flammarion, Paris, 1997). - N. Bazire, *Journal de Matignon* (Plon, Paris, 1996). - J.-J. Becker, *Crises et Alternances. 1974-1995* (coll. « Nouvell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 XIX, Paris, Le Seuil, 1998). - J.-J. Becker,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France depuis 1945* (A. Colin, Paris, 1998). - F. Bédarida, *l'Histoire et le métier d'historien en France. 1945-1995* (M.S.H., Paris, 1995). - A. Beitone, *l'Économie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u second XXe siècle* (A. Colin, Paris, 1995). - R. Bellet, *Jules Vallès* (Fayard, Paris, 1995). - A. Bergounioux et G. Grunberg, *le Long Remords du pouvoir. Le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 1905-1992* (Fayard, coll. « L'espace du politique », Paris, 1992). - S. Beroud, *le Mouvement social en France* (La Dispute, Paris, 1998). - S. Berstein et P. Milza,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Éd. Complexe, Bruxelles, 1991, 3 vol.). - S. Berstein, P. Milza,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Éd. Complexe, coll. « Questions au XXe siècle », n° 65, Bruxelles, 1994). - J.-P. Bertaud, *les Caus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 Colin, coll. « Cursus », Paris, 1992). - J.-P. Bertaud, *l'An I de la République* (Perrin, Paris, 1992). - M. Biard, *Collot d'Herbois. Légendes noires et révolu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1995). - E. Biasini, *les Grands Travaux* (O. Jacob, Paris, 1995). - J. Binoche, *Histoire des relations franco-allemandes* (Masson/A. Colin, Paris, 1995). - O. Blanchard, *Croissance et Chômag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97). - F. Bourillon, *les Vill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Ophrys, Gap, 1992). - M. Bourset, *Casimir Perier. Un prince financier au temps du romantisme*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94). - D. Boy, *l'Écologie au pouvoir* (F.N.S.P., Paris, 1995). - F. Bozo,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a France depuis 1945*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7). - Cl.-I. Brelot, *la Noblesse réinventée. Nobles de Franche-Comté de 1814 à 1870*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esançon, Besançon, 1992, 2 vol.). - Ph. Burrin, *la France à l'heure allemande, 1940-1944* (Le Seuil, Paris, 1995). - P. Buton et J.-M. Guillon (sous la dir. de), *les Pouvoirs en France à la Libération* (Belin, Paris, 1994). - J.-C. Cambadelis, *la France blafarde* (Plon, Paris, 1998). - J.-Cl. Caron, *la France de 1815 à 1848* (A. Colin, coll. « Cursus », Paris, 1993). - R. Castel,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 (Fayard, Paris, 1996). - M. Charasse, *55, rue du Faubourg-St-Honoré* (Grasset, Paris, 1996). - Ch. Charle, *la République des universitaires, 1870-1940* (Le Seuil, coll. « L'Univers historique », Paris, 1994). - A. Chauveau, *l'Audiovisuel en liberté* (F.N.S.P., Paris, 1997). - L.-M. Clénet, *la Contre-Révolution*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2633, Paris, 1re éd., 1992). - D. Cohen, *Partage de la valeur ajouté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97). - E. Cohen, *Service public - secteur public*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97). - S. Cohen, *Mitterrand et la sortie de la guerre froide* (P.U.F., Paris, 1998). - J.-P. Cointet, *Pierre Laval* (Fayard, Paris, 1993). - M. Cointet, *Vichy, capitale 1940-1944* (Perrin, Paris, 1993). - J.-P. Colin, *l'Acteur et le roi* (Georg, Genève, 1994). - E. Conan et H. Rousso, *Vichy, un passé qui ne passe pas* (Fayard, Paris, 1994). - O. Coquard, *Marat* (Fayard, Paris, 1993). - C. Coquery-Vidrovitch (sous la dir.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au temps des Français. Colonisateurs et colonisés, 1860-1960*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2). - A. Corbin et N. Gérôme (sous la dir. de), *les Usages politiques des fêtes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1994). - M. Cotta, *les Secrets d'une victoire* (Plon, Paris, 1995). - S. Courtois, M. Lazar, *Histoire du P.C.F.* (P.U.F., Paris, 1995). - F. Crouzet, *la Grande Inflation. La monnaie en France de Louis XVI à Napoléon* (Fayard, Paris, 1993). - M. Crubellier, *l'École républicaine 1870-1940* (Éd. Christian, Paris, diffusion A. et J. Picard, Paris, 1993). - P. Darmon, *Pasteur* (Fayard, Paris, 1995). - O. Davanne, *Retraites et épargn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98). - J.-M. Domenach, *Regarder la France. Essai sur le malaise français* (Perrin, Paris, 1997). - D. Domergue-Cloarec, *la France et l'Afrique après les indépendances* (SEDES,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n° 97, Paris, 1994). - J.-M. Donegani, M. Sadoun, *la Ve République, naissance et mort* (Calmann-Levy, Paris, 1998). - O. Donnat, *les Français face à la culture*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4). - Ph. Douste-Blazy, *Pour sauver nos retraites* (Paris, Plon, 1998). - J. Dupâquier,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t. IV (P.U.F., Paris, 1995). - J. Dupâquier, *Morales et politiques de l'immigration* (P.U.F., Paris, 1998). - J. Dupâquier et D. Kessler,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Tradition, transition, transformations* (Fayard, coll. « Nouvelles Études historiques », Paris, 1993). - E. du Réau, *Édouard Daladier, 1884-1970* (Fayard, coll. « Pour une histoire du XXe siècle », Paris, 1993). - J.-B. Duroselle, *la France de la « Belle Époque »*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Paris, 1992). - J.-B. Duroselle, *la Grande Guerre des Français, 1914-1918* (Perrin, Paris, 1994). - J.-F. Eck, *Histoir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puis 1945* (A. Colin, Paris, 1996). - E. Edou, *les H.L.M.* (Économica, Paris, 1998). - G. Elgey, *Histoire de la IVe République* (Fayard, coll. « Grandes Études contemporaines », Paris, 1965-1992, 3 vol.). - L. Engel, *Mitterrand, le fil d'Ariane* (Michalon, Paris, 1996). - P. Éveno, *le Monde 1944/1995* (Le Monde Éditions, Paris, 1997). - P. Favier, M. Martin-Rolland, *la Décennie Mitterrand*, 3 tomes (Le Seuil, Paris, 1990, 1991, 1997). - A. Fierro et J. Tulard, *Histoire et dictionna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 (R. Laffont, coll. « Bouquins », Paris, 1995). - J.-B. de Foucault, *Une Société en quête de sens* (O. Jacob, Paris, 1995). - H. Fréchet,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IXe siècle* (Ellipses, Paris, 1993). - J.-M. Frodon, *La Projection nationale. Cinéma et Nation* (O. Jacob, Paris, 1998). - F. Furet et M. Ozouf, *la Gironde et les Girondins* (Payot, Paris, 1991). - F. Furet et M. Ozouf (sous la dir. de), *le Siècle de l'avènement républicain* (Gallimard, Paris, 1993). - J.-M. Gaillard, *Tu seras riche mon fils* (Plon, Paris, 1994). - J.-M. Gaillard, *l'É.N.A. miroir de l'État. 1945-1995* (Complexe, Bruxelles, 1995). - A. Garapon, *le Gardien des promesses* (O. Jacob, Paris, 1997). - M. Gauchet, P. Manent, P. Roranvallon dir., *Situation de la démocratie* (*La pensée politique* n° 1,

Le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3). - M. Gauchet, *la Religion dans la démocratie* (Gallimard, Paris, 1998). - G. de Gaulle-Anthonioz, *l'Engagement* (Le Seuil, Paris, 1998). - A. Gérard, *la Vendée, 1789-1793* (Champ Vallon, Seyssel, 1992). - P. Goetschel et E. Loyer, *Histoire culturelle et intellectuell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A. Colin, Paris, 1994). - A. Gueslin, *l'État, l'économie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XIXe-XXe siècle* (Hachette Supérieur, coll. « Carré Histoire », Paris, 1992). - A. Gueslin (sous la dir. de), *Michelin, les hommes du pneu. Les ouvriers Michelin à Clermont-Ferrand de 1889 à 1940* (Éd. de l'Atelier, Paris, 1993). - H. Guillaume, *Technologie et innovation*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98). - P. Guillaume, *Histoire social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Masson, Paris, 1992). - C. Guinzburg, *le Juge et l'historien* (Verdier, Lagrasse, 1997). - P. Guiral, *les Militaires français à la conquête de l'Algérie, 1830-1857* (Critérion, Paris, 1992). - J.-N. Jeanneney, *le Passé dans le prétoire* (Le Seuil, Paris, 1998). - P. Jeannin, *Deux siècles à Normale Sup'. Petite histoire d'une grande École* (Larousse, Paris, 1994). - C. Jelen, *La France éclatée* (Nil, Paris, 1996). - M.-T. Join-Lambert, *Chômage, mesures d'urgence, minima sociaux*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98). - J. Julliard, M. Winock, *Dictionnair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Le Seuil, Paris, 1997). - J. Julliard, *l'Année des dupes* (Le Seuil, Paris, 1995). - Y. Knibiehler, *la Révolution maternelle depuis 1945* (Perrin, Paris, 1997). - Y. Lacoste, *Vive la Nation !* (Fayard, Paris, 1998). - J. Lacouture, *Mitterrand. Une histoire de Français*, 2 tomes (Le Seuil, Paris, 1998). - G. Lamarque, *l'Exclusion* (P.U.F., Paris, 1995). - P.-A. Lambert, *la Charbonnerie française (1821-1823). Du secret en politiqu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1995). - Ch. Lazergues, *Réponses à la délinquance des mineur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98). - J.-P. Le Goff, *Mai 1968. L'héritage impossible*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8). - P. Lévêque, *Histoire des forces politiques en France*, t. I : *1789-1880* ; t. II : *1880-1940* (A. Colin, coll. « U », Paris, 1992 et 1994). - A. Martin-Fugier, *la Vie quotidienne de Louis-Philippe et de sa famille* (Hachette, Paris, 1992). - N. Mayer, *le Front national à découvert* (F.N.S.P., Paris, 1996). - G. Merle, *Émile Combes* (Fayard, Paris, 1995). - J. Meyer et A. Corvisi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U.F., coll. «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 t. XIII, 1er vol., Paris, 1991). - P. Milza et R. Poidevin, *la Puissance française à la Belle Époque. Mythe ou réalité ?* (Éd. Complexe, Bruxelles, 1992). - P. Milza,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 1918 à 1939* (A. Colin, Paris, 1995). - P. Miquel, *le Second Empire* (Plon, Paris, 1992). - P. Miquel, *la Guerre d'Algérie* (Fayard, Paris, 1993). - F. Monnet, *Refaire la République. André Tardieu, une dérive réactionnaire, 1876-1946* (Fayard, coll. « Pour une histoire du XXe siècle », Paris, 1993). - J.-F. Muracciole, *Histoire de la Résistance en France* (P.U.F., coll. « Que sais-je ? », n° 429, Paris, 1re éd., 1993). - H. Néant, *la Politique en France XIXe-XXe siècle* (Hachette Supérieur, coll. « Carré Histoire », Paris, 1991). - Cl. Nicolet, *l'Idée républicaine en France 1789-1924* (Gallimard, Paris, 1995). - Ph. Nivet, *la France de 1815 à nos jours* (Ellipses, Paris, 1994). - G. Noiriel, *Sur la « crise de l'histoire »* (Belin, Paris, 1996). - P. Nora dir., *Science et conscience du patrimoine* (Fayard-Éd. du Patrimoine, Paris, 1997). - P. Ory et J.-F. Sirinelli, *les Intellectuels en France de l'affaire Dreyfus à nos jours* (A. Colin, coll. « U », Paris, 2e éd., 1992). - J. et M. Ozouf, *la République des instituteurs* (Gallimard/Le Seuil, Paris, 1992). - P. Péan, *Une jeunesse française. François Mitterrand 1934-1947* (Fayard, Paris, 1994). - G. Pedroncini (sous la dir. de), *Leclerc et l'Indochine, 1945-1947* (A. Michel, Paris, 1992). - G. Pedroncini, *Pétain, la victoire perdue, novembre 1918-juin 1940* (Perrin, Paris, 1995). - P. Perrineau, *le Symptôme Le Pen*, Paris, Fayard, 1997. - P. Perrineau, C. Ysmal, *le Vote de cris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1995* (F.N.S.P., Paris, 1995). - A. Pessin, *le Mythe du peuple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P.U.F., coll. « Sociologie d'aujourd'hui », Paris, 1992). - P. Poirrier, *Société et culture en France depuis 1945* (Le Seuil, Paris, 1998). - Ch. Prochasson, O. Wieviorka, *la France du XXe siècle* (Le Seuil, Paris, 1994). - M. Rebérioux, G. Candar, *Jaurès et les intellectuels* (Éd. de l'Atelier, Paris, 1994). - M. Reinhard, *Le Grand Carnot. Lazare Carnot, 1753-1823* (Hachette, Paris, nouv. éd., 1994). - F. Renault, *le Cardinal Lavigerie. L'Église, l'Afrique et la France, 1825-1892* (Fayard, Paris, 1992). - H. Rey, *la Peur des banlieues* (F.N.S.P., Paris, 1996). - F. Rigaux, *la Loi des juges* (O. Jacob, Paris, 1997). - J.-P. Rioux, J.-F. Sirinelli,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t. IV, « Le temps des masses » (Le Seuil, Paris, 1998). - P. Rosanvallon, *le Sacre du citoyen. Histoire du suffrage universel en France* (Gallimard, Paris, 1992). - P. Rosanvallon, *la Monarchie impossible. Les chartes de 1814 et de 1830* (Fayard, Paris, 1994). - P. Rosanvallon, *La Nouvelle question sociale* (Le Seuil, Paris, 1995). - P. Rosanvallon, *le Peuple introuvable* (Gallimard, Paris, 1998). - P. Rosanvallon (et autres), *France : les révolutions invisibles* (Calmann-Levy, Paris, 1998). - H. Rousso, *les Années noires. Vivre sous l'Occupation* (Gallimard, coll. « Découvertes », Paris, 1992). - M. Ruby, *Jean Zay* (Corsaire, Orléans, 1994). - J. de Saint Victor, *la Chute des aristocrates. La naissance de la droite, 1787-1792* (Perrin, Paris, 1992). - J.-M. Salmon, *le Désir de société*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8). - R. Schneider, *la Haine tranquille* (Le Seuil, Paris, 1992). - D. Schneiderman, *l'Étrange Procès* (Fayard, Paris, 1998). - S. Schweitzer, *André Citroën, 1878-1935* (Fayard, coll. « Pour une histoire du XXe siècle », Paris, 1992). - W. Serman, *la Vie professionnelle des officiers français a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Éd. Christian, Paris, diffusion A. et J. Picard, Paris, 1994). - A. Siegfried, *Tableau politique de la France de l'Ouest*, présentation par P. Milza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95). - J.-F. Sirinelli (sous la dir. de), *Histoire des droites en France* (Gallimard, Paris, 1992, 3 vol.). - F. Sirinelli, *la France de 1914 à nos jours* (P.U.F., coll. « Premier Cycle », Paris, 1993). - J.-F. Sirinelli (sous la dir. de),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Le livre du bicentenaire* (P.U.F., Paris, 1994). - J.-F. Sirinelli (sous la dir. d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U.F., Paris, 1995). - A. G. Slama, *la Régression démocratique* (Fayard, Paris, 1995). - F. Sudt, *Un passé imparfait. Les intellectuels en France, 1944-1956* (Fayard, coll. « Pour une histoire du XXe siècle, Paris, 1992). - J.-P. Sueur, *Demain la vill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98). - I. Théry, *Couple, filiation et parenté aujourd'hui* (O. Jacob, Paris, 1998). - L. Trenard,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la région Rhône-Alpes* (Perrin, Paris, 1992). - J. Tulard, *Napoléon II* (Fayard, Paris, 1992). - P. Vaisse, *la IIIe République et les peintres* (Flammarion, Paris, 1995). - M. Vaisse, *La France et l'O.T.A.N., 1949-1996* (Complexe, Bruxelles, 1996). - J. Valette, *la Guerre d'Indochine, 1945-1954* (A. Colin, Paris, 1994). - J. Valette, *la France et l'Afrique. L'Afrique subsaharienne de 1914 à 1960* (SEDES, coll. « Regards sur l'histoire », n° 90, Paris, 1994). - H. Védrine, *les Mondes de François Mitterrand* (Fayard, Paris, 1996). - P. Verley, *Entreprises et entrepreneurs du XVIIIe siècle* (Hachette, Paris, 1994). - M. Vovell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1799* (A. Colin, coll. « Cursus », Paris, 1992). - M. Vovelle, *la Découverte de la politique. Géo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3). - P. Weil, *La France et ses étrangers* (Calmann-Lévy, Paris, 1991). - P. Weil, *Mission d'étude des législations de la nationalité et de l'immigration*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aris, 1998). - O. Wieviorka et Ch. Prochasson (présentation de) *la*

France du XXe siècle. Documents d'histoire (Le Seuil, coll. « Points », Paris, 1994). - Cl. Willard (sous la dir. de), *la France ouvrière*, t. I : *Des origines à 1920* (Éd. de l'Atelier, Paris, 1993). - M. Winock, *le Socialisme en France et en Europe XIXe-XXe siècle* (Le Seuil, Paris, 1992). - M. Winock, *Parlez-moi de la France* (Plon, Paris, 1995). - M. Winock, *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 (Le Seuil, Paris, 1997). - J.-M. Wiscart, *la Noblesse de la Somme au XIXe siècle* (Encrage, Amiens, 1994). - T. Wolton, *la France sous influence. Paris-Moscou : 30 ans de relations secrètes* (Grasset, Paris, 1996). - J. Wolff, *les Périer. La fortune et les pouvoirs* (Économica, Paris, 1993). - X. Yacono, *Histoire de l'Algérie de la fin de la Régence turque à l'insurrection de 1954* (Éd. de l'Atlanthrope, Paris, diffusion Distique, Lucé, 1993). - E. Zemmour, *le Coup d'État des juges* (Grasset, Paris, 1997). - D. Zeraffa-Dray, *Histoire de la France : d'une république à l'autre, 1918-1958* (Hachette Supérieur, coll. « Carré Histoire », Paris, 1992).



索　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法文原书页码。）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O

P

Q

R

S

T

W

X

Y

Z

译后琐记

乔治·杜比（1919—1996 年）是一位享誉法国，乃至国际史坛的著名历史学家，曾先后在 1970 年和 1987 年进入法兰西学院并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这位史学大师在其学术生涯当中，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其中不仅有独自撰写的一系列关于中世纪史的专著，而且还单独主编或与人联袂主编了多种大部头的“集体著作”，如五卷本的《私人生活史》、四卷本的《法国乡村史》等等，这些著作表明，他不仅是一位对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史和心态史有着精深研究的专家，同时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家——此处的“大”字从好的方面似乎怎么理解都行。毋庸讳言，当今之世，“专家”显然相对易得，而真正的“大家”（欺世盗名者自然不在此列）则可谓日益难求，鉴此，不由得对乔治·杜比更生敬意。

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这本《法国史：从起源到当代》就是乔治·杜比后一类著作中的一种。它最初的版本问世于 1970 年代初期，是由印制考究、图文并茂的三大卷组成的——构成本书的三大部分各为 1 卷。本书在问世后好评如潮，广受欢迎，遂一版再版，尤其是在出了一卷本的平装本后，更是成了典型的既畅销又长销的佳作。人们如果有机会经常光顾法国的书店的话不难发现，大概隔个一两年，此书就会推出新的版本。要而言之，这部由乔治·杜比这位名副其实的

"大家"领衔主编，莫里斯·阿居隆、米歇尔·优维尔等诸多当时法国第一流的史学名家参与撰写的著作，已经堪称是法国通史类著作中的经典之作。

笔者对自己能够在把这样一部佳作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过程中略尽绵薄深感荣幸，同时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缘分。笔者最早见到此书是在1970年代末期，是时，本人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在选修我国著名的法国史专家张芝联教授所开设的"法国史"课程期间，在北大图书馆偶然看到了此书。当时，这部装帧考究、图文并茂、篇幅巨大的"洋书"立马就对我产生了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并且随即就不由得想到，我们国家什么时候也能出这样气派的书那该多好啊！80年代前期，本人在杭州大学师从我国法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沈炼之教授研读法国史，当时，沈师主持的法国史研究室恰好有此书，而且还不止一套，这自然令我喜出望外，遂在先生的恩准下将其中的一套借来，作为自己读研期间的枕边书，不时翻阅。如果说当年在北大初见此书时，更多地是为此书的气派和精美的"外形"所吸引的话，那么，在读研期间，随着自己法语阅读能力有所提高，对法国历史的了解程度略有加深，则更多地是为本书的内容，或曰该书主编及作者们的功力和洞见所折服。光阴荏苒，当年不过二十几岁的年轻学子而今也已成了半百之人。其间，亲身感受到了我们的国家或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包括目睹了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出版事业的长足发展。虽然如此，在我自己潜心翻译本书的相关章节或对合作者们的译稿进行统校时，仍时不时地冒出这样的念头，即觉得如今我们的出版社要印制出在外观上堪与本书最初的版本媲美，乃至更为让人有"惊艳"之感的书早已不在话下，但在内容方面能同样以"既厚重又精辟"誉之的书，似乎出得还远远不够多。

如前所述，翻译此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缘分。因而，当商务印书馆的王明毅先生在2005年一再表示希望我能承担此项译事时，尽管手头事情很多，包括有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之类的研究任务需要按时完成"计划"，但在经过慎重考虑后还是硬着头皮接

受了下来。之所以有“硬着头皮”一说，倒并非是怕自己因此而无法按时完成那些“计划”色彩浓重的课题，主要是担心自己才疏学浅，难以胜任；而又之所以接受，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无论是商务印书馆还是我们这些译者都深知此书的价值，认为需要有人来做这项工作，尽快将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当然，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来接受这一任务，还有一点非常关键，这就是因为有一些志同道合者从一开始就鼎力相助，积极加盟。他们分别是本人多年的同事与好友沈坚教授，以及既懂法语，又熟悉法国历史文化的顾杭、黄艳红、沈衡等过去的学生、现在的好友。为了确保及时完成这项规模甚大的译事，后来又由商务印书馆出面约请了田军、杨庭芳两位既精通法语，又熟悉相关内容的青年才俊。

本书的翻译具体分工如下：

吕一民独自翻译了序言、第 8 章、第 29 章、第 31 章以及大事年表和索引，并与黄艳红合译了第 19、20、23、26、27、28、30 章，与沈衡合译了第 24 章。

沈坚翻译了第 1 - 7 章。

黄艳红独自翻译了第 9 - 17 章，并与吕一民合译了第 19、20、23、26、27、28、30 章。

顾杭翻译了第 18、21、22 章。

沈衡独自翻译了第 25 章，并与吕一民合译了第 24 章。

杨庭芳翻译了第 32 章。

田军翻译了第 33 章。

在此，谨对上述合作者的精诚合作与出色的翻译表示感谢。

钱虹、盛瑜、倪振恒等先后在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就读的研究生，以及“法兰西论坛”创建人顾东东先生在本人整理、翻译大事年表和索引（亦即译名对照表）时出力甚多，特此说明并致谢。

商务印书馆译作室副主任王明毅先生在我们进行此项译事的过程中始终悉心指导，鼎力相助。本书的责任编辑郭可女士不仅极其认真负责地对译稿进行编辑加工，而且在发现原书的索引存在收录不够齐

全等问题后，出于方便中国读者的考虑，毅然在编辑过程中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中文版之索引的内容大幅度地加以增补。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浙江大学南都历史学科建设基金对本书的翻译提供了部分资助，法国国家图书中心亦曾为此提供了奖译金，对此深表感谢。此外，本人在2005年和2008年先后赴巴黎政治学院20世纪欧洲史研究所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访学时，曾就此书的翻译向一些法国同行请教，受益非浅。特此致谢！

作为本书的主译，本人除了出面约请合适的译者之外，还负责了全书的通校，包括对其他译者的译稿分别予以审定、修改。因此，本书的译责当主要由我承担。由于我们几位译者学识有限，加之本书篇幅实在巨大，内容既广又深，尽管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始终谨慎行事，如履薄冰，译文中仍会有一些纰漏不妥之处。在此，敬祈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是一部集体著作，加之撰写者多为风格独特的名家，故全书各章在文笔上不一定非常统一，对此，也请读者理解与海涵。

吕一民

2009年8月19日于浙江大学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丛书名=
作者=
页数=
尺寸=
DX号=
SS号=
出版社=
主题词=
ISBN号=
出版日期=
原书定价=
中图法分类号=
参考文件格式=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